1921-2011

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历程

90 Years' History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共赴国难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21-2011

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历程

90 Years' History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共赴国难

1921–2011

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历程

90 Years' History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共赴国难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历程
第四卷　共赴国难

主　编：刘会军　周知民

副主编：马洪武　王德宝

编　者：李晔晔　任欣欣　张　瑞　李云波　郭　忠
姬长艳　张志远　刘　春　黄晓煜　郭鸿雁
王胜柏　张　力　张式原　费宏寰　黄亚楠
戚文红　裘　新　潘明志　田封剑　戴左贤
孙大伟　李　晨　李玉荣　刘华清　张　琦
张民耕　郭文亮　萧吉汉　蔡明泽　王　勇
马　全　杨凤义　接　胜　陈玉杰　肖立华
徐敬华　何俊岩　孙建国　于立斌　陈明磊
何茂才　杨立新　张和平　张翔宇　陈焕光
陈瑞玲　苏永军　苏晓娟　王玉香　马洪武
王德宝　孙其明　戴金生

统　稿：田居俭　马仲廉

目 录

第六章　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 抗战中的中共与各民主党派

第七章　百团大战　敌后军民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

日本加紧全面战争的准备

1936 年 11 月 ~12 月，中国发生了两件被日本视为“决定命运”的大事，绥远抗战与西安事变。在日本军政各界看来，这两个事件的发生不仅促进了中国抗日形势的迅速发展，更宣告了日本既定对华政策的失败。1937 年初，日本政府被迫再次调整对华政策，提出“对华再认识”，其侵华政策由逐步蚕食转向大规模战争，为了实现扩大战争规模的目的，日本开始在佐藤外交掩护下加紧了全面战争的准备。

1937 年 3 月，日本政府打出改善陷入僵局的中日关系的旗号，在外相佐藤尚武的主持下，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执行相对缓和的对华政策，即所谓的佐藤外交粉墨登场。首先，佐藤外交在政治上的表现是，尽量避免中日之间的正面冲突。1937 年初，日本对南京政府态度软化，不再策动华北和内蒙独立。为了麻痹中国民众，日本停止了对绥远的军事进攻和建立伪蒙古国的工作。在日本指使下，德王于 1936 年 12 月和 1937 年 3 月两次发出停战通电，以缓和与南京政府的紧张关系，几乎与此同时日本也停止了公开策动华北自治的活动。其次，加强与中国的经济交流往来。1937 年 1 月底，日本军部与满铁产业部在天津召集经济会议，主要研究了建筑津石铁路、塘沽港及恢复龙烟铁矿的问题，决定首先让津石路本年 4 月兴工，工程经费“除日资外，希望宋切实合作，诱发华人加入资本”。1937 年 3 月，以大财阀儿玉谦次为团长，由日本银行家实业家组成的日本经济使团来华访问，与国民党南京方面的军政要员蒋介石、张群等人多次就中日之间的经济合作问题举行会晤。在会谈中日本方面也一改过去强硬态度，表示诚意改善中日邦交，愿与中方合作并帮助中国统一复兴。

除此之外，日本还决定增加对华北文化事业的投资。1937 年 2 月，日本派外务省主管文化的田村真吾到天津进行调查，田村与华北各地日本领事会商，并且视察了中日中学、中日商业学校、爱善日语等学校。其间，特别注重扩大爱善日语学校，以培养亲日人才。1937 年初，日本派出松井石根

大将率领一个大型歌舞团来到济南与韩复榘及山东军政要员举行联欢，日本歌舞团演出了许多慰问节目。为了表示中日亲善，1937 年的 4 月，日本邀请宋哲元赴日本参观陆海空军联合演习，宋哲元派张自忠率团前往。行前，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堀内干城等设宴为张自忠饯行，代表团访日期间，除了参观了日军的军事演习之外，还访问了东京、京都、奈良、大阪等地，在各地日方接待周到，完全体现出了对中亲善的政策。

总之，1937 年初，日本对华政策表现出少有的“亲善”，中日关系也出现了短暂的平静。但是这种平静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和平的感觉，甚至是在中国的外国人也感觉到了缓和局势背后的巨大危机。当时在华著名“中国通”美国人拉铁摩尔评价中国时局时说：“这太像 1931 年，太平静了，太平静了！平静得不能使我们放心，我们怕又要见到一个‘九·一八’呢！”[①]毛泽东则更明确告诫世人：“佐藤外交是大战准备，大战在我们面前。”[②]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些预见的正确，佐藤外交并没有带来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真正转变，不过是日本一直所宣传的所谓“大东亚共存共荣”的翻版。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在 1937 年 1 月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向日本政府提出的报告中得到了完全的体现，报告中明确提出，为完成战争准备，应改变对华政策，即以互惠互荣为目的，将主要力量投入经济和文化工作中，并以公正态度对待南京政府的统一行动，不再进行华北分治工作，而走与南京政府实行“提携”共同反共反苏，建立一个思想一元化、国防共同化、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化的以日本为盟主的东亚联盟。这段话足以说明，日本并没有放弃侵略中国的梦想，佐藤外交不过是为了扩军备战争取时间而释放和平的烟雾。

在佐藤外交的掩饰下，日本军政各界扩大对华战争的叫嚷已经甚嚣尘上。日本军界首先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对华一击论”。1937 年 3 月上旬，日军驻华大使馆武官喜多诚一等人在汇报华北形势时提出：“中日关系的恶化，不能设想用一般的手段即可调整”。“应在对苏开战前，首先予中国一击，用以挫伤蒋政权的基础。”[③]这种观点在当时的日本军界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另外，日本军部方面派出对中国动向的观察的人员对中国形势的认识也大体一致，认为只有对中国打击一下才能改变现在对日不利的局势。日本陆军教育总监本部部长香月清司视察了中国东北、华北之后，于 1937 年 6 月向日本内阁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中国华北形势紧迫，有必要增强华北中

国驻屯军兵力。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在6月初对日本政府的建议中也公然提出："从准备对苏作战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如我武力许可，则应首先对南京政府加以一击，以除去我背后的威胁，相信此为最上策。"[④]至此，日本军部形成了所谓的"对华一击论"。1937年5月31日，林铣十郎内阁辞职后，近卫内阁上台，日本内阁与军部在对华问题认识上趋于，一致即准备进一步扩大侵略规模，以求重新瓜分世界。1937年7月6日，近卫内阁召开"阁议"，讨论确立施政方针问题。广田外相在会议上表达了下述见解：日本的对华外交方针，虽然与以往相比并无改变，但并不准备强行采取对华亲善；而在当前抗日、排日的潮流中，即使实现日中亲善，也难望有成效。日本方面诚然不能不对此表示不满，但是，除了毅然推行正确政策之外，别无他途。广田的意见，得到了全体阁僚的一致同意。[⑤]至此，为完成对华一击，军界与政界联合，围绕其侵略国策从1937年上半年开始，日本一方面大规模发展军事工业以满足扩大战争的需要，另一方面积极搜集中国情报，制定侵华具体作战方案，并向中国增兵备战，为进一步扩大战争做准备。

为加紧战争准备，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研究后，1937年3月29日正式制定了《陆军省重要产业五年计划方案》。这一计划主要拟定了日本在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指导下，产业方面扩充的内容。大体是围绕兵器工业、飞机工业等军事工业，以及发展军事工业的基础——重工业，如钢铁工业、液体燃料、煤炭工业等等展开的。具体的指标如下：

"（一）飞机工业根据产业计划，保持年产一万架的设备能力，第一年生产一万架，第二年生产二万架。

（二）军械工业除加强官营设施外，还要把民间设备能力约增加为四倍，并通过教育和订货等办法，把准备转为战时的规模扩大为三倍。

（三）弹药工业官营设施，重点设在满、朝并予以加强，民间设施能力的增加为七倍，特别是在增加榨出设备的同时，把准备转为战时的规模约扩大三倍。

（四）坦克工业设备能力增加为二倍

（五）机械器具工业把准备转为战时的规模扩大保持三十万辆。"[⑥]

按照这个计划，飞机工业设备能力增加到年产一万架以上，军械工业和

弹药工业，把准备转为战时的规模扩大二至三倍。其他军需工业也要迅猛增长。同时为了保证军用工业的发展，日本政府决定增加对军用工业以及相应重工业的资金和技术的投入。这一计划出台后得到了内阁的首肯并得以实施。由此可见，在 1937 年上半年，日本军政各界已经基本达成共识，所有一切工作均为扩军备战扩大侵略战争这一中心目标服务。

按照军部初步确定侵华的方案，早在 1936 年就已经开始向中国增兵，增兵的重点地区仍然锁定在日本一直垂涎的华北。1935 年的策动华北独立失败后，日本认为有必要在既定的对华政策之外，确定单独的华北政策。1936 年 1 月 9 日，参谋本部发表了《华北自治运动的演变》，总结了以前的华北事变，并提出日本今后的目标是“使华北明朗化变成现实”，进而以华北自治为基础，实现华北五省从政治上脱离南京政府的目标。1 月 13 日，陆军省对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发出了《处理华北纲要》的指示，进一步明确了日本对华北的政策。其主旨在于，援助完成以华北民众为中心的自治；自治的区域为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目前首先完成冀、察两省及平、津二市的自治，其他三省自动与之合流，支持冀东政府的独立性；由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担任处理华北的任务，以冀察、冀东为对象，主要进行内部指导，对于经济扩张则进行侧面指导；关东军及各驻华机关要协助、配合华北工作。[7]

为了实现所谓的华北分治，占领华北五省，1936 年 4 月 17 日，广田内阁决定加强中国驻屯军，18 日以“军令陆甲第六号”命令中国驻屯军实行新编制：司令官改为亲补职，兵力由 1 771 人增加到 5 774 人，由一年轮换制到改为永驻制。[8]换防的部队 1936 年 5 月从日本本土出发，6 月上旬在中国登陆并完成了改编，编制由联队改为混成旅团，司令官由军队任命升格为天皇直接委任，中国驻屯军以田代皖一郎中将任司令，桥本群少将任参谋长，司令部设于天津。从 1936 年下半年日军继续增兵，实力大增的中国驻屯军很快成为在华北发动侵略战争主力军。1937 年初，平津一带日军经常派出小股部队进行侦查和骚扰，通过这一方式获得了平津一带地形以及中国守军的重要情报，同时这支部队还不断制造事端，为最终挑起战争创造机会，并最终挑起了卢沟桥事变。

日方除了加强军事实力的同时，为发动更大规模战争还加紧搜集各方面

的军事情报。1937 年 5 月下旬，借日军在中国东北进行的参谋旅行演习的机会，日本参谋部第三课公平匡武少佐和井本熊男大尉，奉命到关内旅行。他们先后到天津、北平、张家口、归绥、大同、太原、济南青岛等地进行各种侦查。[9]天津方面，日本的华北驻屯军和特务机关加紧对二十九军进行搜集军事部署情报工作。

另外，在这一时期，日本为企图独占中国，称霸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继续在欧洲寻找盟友，

在国际上与法西斯德国、意大利逐渐接近，走上了结盟的道路。对日本而言，尽管在中国问题上与德国存在一定的矛盾冲突，但德国可以牵制英法美三国，因而日本还是将德国纳入了自己的侵略联盟中。1936 年 8 月，日本五相会议制定了南北并进向外扩展的基本国策之后，加紧与德国勾结。在 1936 年 11 月 25 日，日本与德国签订了《日德关于反共产国际的协定》，双方相互约定，缔约国的一方，在“非因挑衅而受到苏联进攻或进攻威胁时，不采取任何足以减轻苏联负担的措施”。实际上建立了军事同盟关系，为日本实现其侵略亚洲的野心解除了后顾之忧，日本更加肆无忌惮地为实现大陆政策而疯狂地侵略中国甚至是苏联。

至 1937 年卢沟桥事变之前，日本军国主义不仅已经为扩大侵华战争做好了战争物资准备，增加了在华的军队，并且完成了初步的军事部署和情报收集工作，国际上又与德国结盟，此后日本更加有恃无恐侵略中国。至此，在亲善外交掩盖之下，日本这架庞大的战争机器已经悄悄发动起来，日本军队已经剑拔弩张，华北上空笼罩着战争的阴云。

注释：

①武月星等著：《卢沟桥事变风云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 206 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75 页。

③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年 5 月，第 1 版，第 93 页。

④（日）秦郁彦：《中日战争》（附录资料），原書房，1979 年 12 月版，第 315 页。

⑤日本防卫厅：《战史丛书》（8），朝云新闻社，1969—1974 年版，第 429 页。

⑥［日］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 年 3 月第 1 版，第 36 页。

⑦［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日本国际联合协会出版，1955 年版，第 322～323 页。

⑧日本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79 年版，第 71 页。

⑨《一九三六年五、六月间，有关中国、特别是华北实行的资料介绍》，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室：《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资料选编》，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3 页。

卢沟桥事变

1937 年 7 月 7 日夜，驻北平西南丰台的日军悍然向驻守宛平城西侧卢沟桥附近中国守军发动进攻，“卢沟桥事变”爆发，驻守卢沟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

1935 年日本策动华北独立失败和 1936 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两件大事对中国政治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国共两党逐步达成和解，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运动不断掀起高潮的同时，国民党的抗日态度也日益坚决，国共两党加紧了谈判的步伐，越来越趋于走向团结抗战。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从 1936 年完成了各方面的准备，逐步走上了战争轨道。此后，中日冲突逐步升级，作为中日冲突的前沿的华北平津地区形势日趋紧张。

卢沟桥事变之前，平津地区情况十分复杂，北平附近的丰台地区在军事上首先成为对日作战的国防前线。根据《塘沽协定》与《何梅协定》，长城抗战结束，中国国民政府的军政人员与中央军从平津冀察等地撤走。此后，西北军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分别进驻冀察二省和平津两市负责该地区的防卫任务。该军共辖四个主力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一个骑兵旅、一个特务旅还有两个保安旅，总兵力大约 10 万人。为了加强北平周边的防守，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命令第二百二十团抽调第二营派往丰台，以“保卫丰台车站，维护南北交通”。[①]而此时，距离二十九军丰台驻军以东 400 米就是日军的驻地。1935 年，国民党中央军撤出同时，日本立刻将在平津的驻屯军一个混成营调至丰台地区，其中包括步兵四个连，骑兵大约一个排以及山炮兵一个连，该部扼守平汉、平津两线。于是从 1935 年下半年开始，中日两国军队在丰台附近形成对峙局面。从 1936 年 4 月开始，日本华北驻屯军在丰台一带经常寻衅滋事，不断引起双方摩擦，丰台局势日趋紧张，最终引发了两次丰台事件。

第一次丰台事件发生于 1936 年 6 月 26 日上午 9 时半，当时二十九军三

十七师二百一十七团三营的官兵从张垣调至丰台驻防。行抵丰台火车站时，因火车突鸣笛，致使五匹军马受惊，四处狂奔，其中一匹奔入日军驻屯军营房，被日军扣留。中国士兵追至日本军营，与值勤的日兵交涉，要求归还。日兵不仅拒绝归还军马，而且还蛮横地将中国士兵殴打致伤，同时日军还派出多人持枪跑出营房，在一触即发之时，幸而二十九军派来的军官及时赶到，忍气说服了中国士兵，才避免了一场大祸。第二天，日军派出一名朝鲜流氓寻衅滋事，冲进二十九军三十八师的马厩，硬说马厩是他花钱买的，要二十九军把马厩腾出来。三十八师取出书面证据，说明这座马厩系二十九军建造，并一直归二十九军所有。该朝鲜流氓突然即从腰间拔出短刀动武，并叫来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几十名，前来助阵，双方发生械斗。事件发生后，二十九军为避免争端升级做出了让步，将驻丰台的一个营调回，换成冀北保安司令石友三部的一个营。但是日军没有就此罢休，在丰台一带自恃优势兵力，此后多次挑衅，又引发了第二次丰台事件。

1936 年 8 月 31 日，日侨森川太郎闯入二十九军驻丰台军营，与卫兵发生冲突被刺杀身亡，日军以此为借口，要求二十九军让防。此后，中日之间再次发生冲突。9 月 18 日下午，二十九军丰台驻军的第五连孙香亭部在营房外铁道附近举行演习，6 时演习结束，回营途中与日本驻屯军穗积大尉指挥的在该地演习的一中队相遇，双方狭路相逢，各不相让。日军小队长岩井带领两名日本骑兵，冲入孙香亭连行进的队列中，孙部士兵气愤难忍，便以枪托击马。日军指挥官穗积大尉说中国士兵侮辱了日军，立即命令军队散开，将孙香亭连团团围住，并要解除孙连士兵的武装。孙香亭连长上前交涉，竟被日军扣押。中国士兵立刻列阵以待，准备还击。日军立即从北平派一个大队，由联队长牟田口廉也率领驰援。行抵丰台附近的大井村时，与中国军队展开枪战，日军趁机将丰台通北平的电话线切断，并层层包围了中国军队。日军占领丰台的各重要地点，威逼二十九军，双方对峙达一整夜，战火一触即发。第二次丰台事件发生后，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为避免中日之间更大规模的冲突，再一次作出让步，按照日方的要求，9 月 19 日后，命令第二十九军丰台驻军移防赵家庄，丰台陷于日军之手。

日本强行占领了丰台后，下一个目标便锁定为卢沟桥。卢沟桥位于北平西南 15 公里的丰台区永定河上，是北平最古老的石造联拱桥也是华北地区最长的石桥。卢沟桥及其相邻的宛平城同为拱卫北平的战略要地。处于平汉铁路干线上的卢沟桥，“是北平西南的门户”，[②]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当时北

宁铁路沿线为日军所控制，而在平汉路上的卢沟桥就成了北平的唯一门户。我军据此，进可攻退可守；若为敌人所占，北平则变成一座孤立的死城，所以卢沟桥这一战略据点就必然成为敌我必争之地。”[③]宛平城位于桥东，是卢沟桥周围地区的制高点，城池坚固，因此卢沟桥及其相邻的宛平城成为保卫北平地区的前沿堡垒。而位于卢沟桥北300多的铁路桥从战略上讲更是关键中的关键。从当时的形势分析，日军欲占华北必先侵占平津，欲夺北平必先控制卢沟桥和宛平县城，只有占领了卢沟桥，日军的势力才能延伸到宛平城、长辛店，和已被日军占领的丰台连接起来，形成对北平的包围。

事变之前，日本关东军与早已楔入华北的驻屯军从北、东北、西北三个方向对平津形成了包抄之势，形势对二十九军十分不利。另外，从对峙的中日双方军事实力来讲，日军的战斗力也明显在我军之上。当时驻守在北平及丰台地区的日军是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人数在1 000人左右，配备了火炮以及24辆坦克等重型武器，同时日军在丰台地区专门设立了军事指挥部。中国方面，在七七事变之前，驻守在宛平城内的是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百一十旅二百一十九团金振中营。由于宛平城非常重要，所以这个营不但有五个连，还配备机枪和其他配属部队，共1 000多人。人数与日军相当，但是中国军队几乎没有火炮等重型武器，主要靠机枪、步枪和每个士兵背后背的一把大刀等轻型武器。由于二十九军武器装备较差，所以两军对峙过程中，日军对中国军队十分轻视，特别是1936年日军进驻丰台之后，经常以演习的名义在卢沟桥附近活动，侦查地形，刺探我军虚实，同时日军在宛平城演习的过程中还经常寻衅滋事故意引发事端。根据当时宛平县长王冷斋回忆：“自一九三六年九月九日军增兵丰台后，时常在附近地带演习，由昼间演习至夜间演习，由虚弹射击渐至实弹射击。我方屡次提出抗议，日方均置若罔闻”，[④]后来竟公然将夺取平津作为演习的战略任务，1937年5月到6月，华北形势恶化，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⑤]，最终在1937年的7月，日本在卢沟桥一带挑起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1937年7月7日17时，驻扎在丰台的日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队长清水节郎的带领下，来到宛平城附近演习。日驻屯军把演习的起点选择在龙王庙附近，向东面的大瓦窑假设敌主阵地进攻，“夺取第一线，接着巩固阵地”。由于时间尚早，吃过晚饭后，待至黄昏日军才开始演习。晚19时30分，日军开始演习。[⑥]22时40分，日军声称演习地带传来枪声，并有一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立即强行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

城搜查，遭到中国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百一十旅第二百一十九团严词拒绝。日军一面部署战斗，一面借口“枪声”和士兵“失踪”，假意与中国方面交涉。24 时左右，冀察当局接到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松井称：日军在卢沟桥郊外演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兵，疑放枪者系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并认为该放枪之兵已经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冀察当局以时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枪声非中方所发，予以拒绝。不久，松井又打电话给冀察当局称，若中方不允许，日军将以武力强行进城搜查。实际上，当时宣称失踪的士兵志村菊次郎，三个小时之后就归队了，日军完全是故意以此为借口，蓄意挑起事端，扩大战争以实现其侵吞华北的野心。

此时，冀察当局也接到卢沟桥中国守军的报告，称日军已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最终达成一致意见：中日双方共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事实真相。中国方面派出了河北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宛平县长王冷斋，冀察政委会外交委员会专员林庚绥及冀察绥靖公署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等人。日方派出了冀察绥署顾问日人樱井、日军辅佐官寺平和秘书斋藤等人，中日调查人员在 7 月 8 日凌晨 4 时到达宛平县署。实际上，日军此时已经命令驻丰台营区的第三大队率主力四五百人，附山炮 4 门和机关枪队前去支援，日军部署在宛平城东门和卢沟桥火车站附近，并抢占了宛平城外唯一的制高点沙岗村。日军自恃军事实力在中方之上，因而在谈判中态度蛮横，竟然提出要求中国军队立即撤离宛平城。在遭到中方的拒绝后，日军立刻发动炮击。中国第二十九军司令部立即严令前线官兵：“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⑦]第一百一十一旅旅长何基沣也命令部队：对日本的野蛮进攻“坚决回击”，“绝不退让”。[⑧]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二百一十九团第三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连续击退日军 3 次进攻。

日军见中国军队作战顽强，遂于 7 月 8 日午后 2 时，再次提出谈判解决争端，实际上是缓兵之计。8 日晚 6 时，日军又向卢沟桥、宛平城猛烈射击，中日双方重燃战火，日军派出第三大队猛攻龙王庙和附近的铁路桥。当时守卫桥头阵地的二十九军只有两个排的兵力，但战士们却以必死的决心，以一当十，奋勇杀敌，终因寡不敌众，60 多名战士壮烈牺牲，以鲜血和生命实践了“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誓言，同时给敌人以重创。此后，

中国守军与日军展开了拉锯战，白天日军占领的阵地，晚上大刀队夜袭，重新夺了回来。7 月 8 日夜 12 时许，吉星文团即派出突击队，夜袭宛平城与铁路桥，二十九军威名远扬的大刀再一次发挥作用，出其不意地将日军一个中队全歼在铁路桥上，夺回了铁路桥和龙王庙，军心为之大振。中国守军以简陋的武器和血肉之躯迎击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尽管满透着悲壮与无奈，但卢沟桥头不愿屈服的怒吼声却明白无误地宣告了中国人誓死抗战的决心！

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同时，北平中共地下组织发动各界同胞援助二十九军抗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北平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代表赴前线慰劳抗日官兵；青年学生参加情报、募捐、救护等工作，并组织战地服务团；长辛店的工人运送枕木、铁板和铁轨到宛平，修筑阵地；郊区农民为前线输送粮食、饲料、燃料和民工。

人民群众的支援，激发了二十九军广大官兵的抗日热情。冀察当局却根据国民党政府“应战不求战”的方针，放弃了歼敌的有利时机。于 7 月 9 日晨，接受了日方缓兵之计的和谈要求，并达成三项口头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撤退到丰台，二十九军撤向卢沟桥以西；三，城内防务由保安队接防。7 月 10 日，日本又在“就地解决”的幌子下，提出二十九军向日军道歉，卢沟桥、宛平县和龙王庙地区不得驻扎中国军队等无理要求。7 月 11 日，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赶至天津同日方和平交涉，仍然认为卢沟桥事变只是“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因而延误了战机。7 月 17 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声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一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但此时宋哲元仍未完全放弃对日媾和幻想，仍想将卢沟桥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的范围内，企图通过外交途径，谋求和平解决。7 月 19 日，宋哲元抵北平后，下令拆除城内的防御工事，打开关闭数日的城门，谢绝全国各界赠送给二十九军的抗战劳军捐款。同时，继续与华北日军进行“现地谈判”。同日，日本华北驻屯军与冀察当局第三次达成的协议，结果停战协议第三次被卢沟桥时断时续的炮声证明是一纸空文。“现地谈判”使日军赢得了增兵华北的时间，但它却蒙蔽了冀察当

局的视线，迟缓了第二十九军布兵应战的准备，给平津抗战带来极大危害。到7月25日，陆续集结平津的日军已达六万人以上。日本华北驻屯军的作战部署基本完成之后，日本侵华战争规模进一步扩大。

总之，卢沟桥事变完全是一起由日军蓄意制造的，旨在挑起一场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军事冲突。卢沟桥事变对中国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全面抗日的开始。卢沟桥的枪炮声惊醒了沉睡的中华大地，更激起了中华民族的义愤，中国人民从此进入了百年以来未曾有过的全国范围的对外抗战的历史阶段。

注释：

①③④⑦⑧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第43页，第20页，第14页，第20页。

②孙文涛：《历史不会忘记卢沟桥畔的枪声》，政协北京市丰台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丰台文史资料选编》（第七辑），丰台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出版，1995年版，第11页。

⑤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资料选编》（内部资料），1986年版，第14页。

⑥《日军第三大队战斗详报》，《北京档案史料》，1992年第1期，第14页。

国共两党发表声明与宣言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国上下群情激昂，国共两党在事变后多次公开发表抗日通电和讲话，声讨日军的侵略行径，表现出了中华民族坚决抗战的决心。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附近向中国驻军发动攻击，大举入侵平津地区。目睹日军的野蛮侵略，中国共产党首先行动起来，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即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各团体，各军队，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暨全国同胞”呼吁，在当前中华民族面临严峻形势之时，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应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在通电中，中国共产党再一次表示希望与国民党“亲密合作”，实行全民族的抗战。“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①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为日军入侵华北的第二次宣言，除了继续呼吁全国同胞联合抗战之外，第二次宣言还具体提出了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阶级力量，应该采取的措施，具体包括以下八个方面：

（一）立即命令冀察当局宋哲元等拒绝执行日本所提的三条件。

（二）立刻派遣大军增援二十九军，并动员全中国的海陆空军实行抗战。

（三）立刻实行全国人民总动员，开放党禁，开放爱国运动，释放政治犯，实行民主权利，满足人民生活上的迫切需要，实行大规模的发动民众，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建立各种各样人民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

（四）立即实行全面的对日抵抗，停止对日外交谈判，实行武装缉私，抵制日货。逮捕一切日本侦探与汉奸，解除日寇与汉奸在中国内地的一切武装的与非武装的团体。

（五）立刻改革政治机构，使中央与地方政治民主化。

（六）立刻实现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以国共两党的合作为基础，团结

一切抗日救国的党派。

（七）立即实施财政、经济、土地、劳动、文化教育等各种新政策，以巩固国防，改善民生。

（八）立刻实现抗日的积极外交，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法西斯侵略阵线，同英美法苏等国订立各种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协定。[2]

第二次宣言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各个方面更加具体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抗日主张，为保证全民族抗战的实现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办法，也为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红军主要将领也纷纷发出抗日通电，表明工农红军全体将士的抗战决心。1937 年 7 月 8 日，毛泽东与朱德等致电北平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天津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张家口第一百四十三师师长刘汝明，保定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请他们策励全军，为保卫平津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并再一次表示，红军战士，义愤填膺，准备随时调动，追随贵军，与日寇决一死战！[3]此后，红军将士密切关注前线抗战形势，并主动致电国民党将领。在 7 月 13 日，国民党军高桂滋师和李仙洲师开赴抗日前线，毛泽东与朱德联名发出致敬电。7 月 14 日、15 日、17 日、20 日，毛泽东四次致电阎锡山，呼吁团结抗日，协商抗日办法。7 月 18 日，延安市民众举行援助平津抗战大会，与会者数千人，声势浩大。毛泽东出席大会并报告卢沟桥事件的经过及最近情况。大会通过了致二十九军将士电，为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进行了示威游行。中央军委及红军主要将领通过一系列的通电和宣言在向英勇抗战的二十九军及所有积极开赴抗战前线的国民党军队表示敬意和声援的同时，工农红军也向蒋介石主动请缨，要求开赴抗日战场。1937 年 7 月 8 日，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发表了《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蒋委员长电》，号召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通电言辞恳切，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4]1937 年 7 月 9 日，工农红军主要将领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叶剑英、左权、萧克和徐海东致电国民党军政要员，吁请国民政府迅速派兵增援河北、增援抗击日军的 29 路军，同时表示红军将士翘首待命，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5]

除此之外，抗战全面爆发之后，为适应全民族抗战的新形势，中共中央也对工作方针的调整。1937 年 7 月 8 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

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工作方针问题给华北局的指示》，指示华北局针对华北抗战形势制定了新的工作方针：第一，提出革命工作新口号，以“不让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为口号坚决保卫平津保卫华北，第二，“立即与政府当局及各界领袖协商执行上述方针的具体办法，迅速结成巩固的统一战线”，第三，“立即在平绥平津以东地区着手组织抗日义勇军，准备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在平汉线津浦线亦应准备组织抗日义勇军，注意与各界爱国知识分子合作。”[⑥]根据中央的精神，中共华北局在工作中加大了统战工作的力度，通过爱国宣传、组织北平学生慰问等形式推动二十九军将士以及平津地区社会各个阶层抗日活动。

总之，在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的宣言通电表达了自己坚定的抗战立场以及为争取民族解放愿与一切党派积极合作的真诚的态度，为推动抗战新局面到来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在全国抗战高潮的推动下，国民党的对日态度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表现出积极的抗战态度，不仅多次电令宋哲元严守平津，并积极派兵援助，还多次公开发表通电和宣言，逐渐表明了国民党政府的抗日立场。

1937 年 7 月 8 日，卢沟桥事变第二天，蒋介石即电令冀察当局：“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⑦]同时，蒋介石紧急调拨了高射炮、步枪子弹等武器装备支援二十九军。同时，国民政府外交部也于 1937 年 7 月 8 日下午 6 时向日本使馆提出口头抗议，驻日大使馆同时向日本外务省提出口头抗议，要求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动。7 月 11 日，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卢沟桥事件转趋严重，责任在日方，日方如再误，远东将陷危险。同一天，驻日大使馆再次抗议日军侵略行为。自此，国民政府明确表现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但是，日本军政当局一意孤行，不断增兵，肆意扩大战争，并拒绝了国民政府提出直接交涉的建议，至此和平已到绝望之时，国民政府终于决定以自卫战争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

1937 年 7 月 17 日，国民党在庐山召开了包括文化、教育界学者名流和党派领袖人物参加的第一期谈话会，蒋介石在会上发表演讲，首次严正表明了国民政府对待卢沟桥事变的态度。蒋介石的讲话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分析了国内局势。当前国内的形势是，（日本军队挑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让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

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的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二，蒋介石提出了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四项条件：“（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受任何约束。”

第三，面对这样的危局，蒋介石代表中央政府表明了态度，中国政府“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须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⑧

蒋介石的这一讲话，受到了庐山谈话会与会者普遍的赞扬，19 日公开发表后受到了举国一致的好评。蒋介石此次讲话的公开发表，明确了抗战方针，一扫人们的困惑与不解，极大地振奋了民心，鼓舞了士气，立即得到了全国各界的一致拥护。各地纷纷组织抗敌后援会，举行集会、游行，发出通电，表示拥护政府的抗日方针，决与日寇血战到底。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余汉谋、龙云、商震、陈诚、阎锡山、汤恩伯、刘湘等将领也通电全国，拥护政府抗战。李宗仁表示，蒋介石的讲话义正辞严，“实为代表我国民众之公意，决拥护委座，抗战主张到底，任何牺牲在所不辞。”⑨国外舆论也纷纷评论肯定蒋的讲话，认为是“蒋委员长可钦佩之文告”代表了“南京政府坚强之立场”。国民政府公开其坚决抗战的立场进一步推动了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

1937 年 7 月末，平津失陷后，抗战形势更加紧张，国民党更加明确了抗战态度，并号召全军将士且负守土之责。1937 年 7 月 29 日，蒋介石对记者发表谈话，主动承担平津事变的责任，同时提出，平津之战不过是中日之间全面战争的一个开端，而不是结局，面对这样的形势，在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政府将抗战到底，同时希望国民“各尽其职，共存为牺牲之决心”，如果这样，“则最后之胜利，必属于我也。”此后，在 1937 年 7 月 31 日和 8 月 18 日，国民政府先后两次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鼓励全军

将士“驱逐日寇，复兴我们的民族。”[10]1937 年 8 月 15 日，国民政府又发表了《国民政府对于现在中日局势发表声明》，首先提出中国政府的态度，“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其后，详细分析了卢沟桥事变经过以及中国政府为争取和平所作出的种种努力、日本的步步紧逼的形势，提出郑重声明：“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这篇声明表现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前所未有的坚决抗战的态度。[11]

总之，从卢沟桥事变之后，国共两党发表的对外宣言和讲话宣告了中国长期以来对于日本侵犯的忍让、妥协政策的结束，中华民族已经到了不怕牺牲，下定决心抵抗日本侵略的“最后关头”。虽然蒋介石并没有完全放弃以和谈求和平的幻想，但是国民党抗战态度已经十分明确，即使是和谈也是以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前提。国民党抗战态度的转变成为全民族抗战局面形成的枢纽，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解放》，第 1 卷第 10 期，1937 年 7 月 12 日出版。

②《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新中华报》第 378 期，1937 年 7 月 26 日。

③《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宋哲元等电》，《解放》第 1 卷第 10 期，1937 年 7 月 12 日出版。

④《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蒋委员长电》，《解放》第 1 卷第 10 期，1937 年 7 月 12 日出版。

⑤《人民抗日红军要求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通电》，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选集》第 11 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 280 ~ 281 页。

⑥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选集》第 11 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 276 页。

⑦《蒋委员长复示冀察绥靖主任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并动员以备事态扩大电》，1937 年 7 月 8 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1986 年，第 209 页。

⑧《蒋委员长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民国二十六年于第一期

庐山谈话会第二次共同谈话会议》，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1986年，第209页。

⑨《大公报》，1937年7月22日。

⑩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年谱》，中国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253~254页。

⑪《国民政府对于现在中日局势发表声明》，《中央日报》，1937年8月15日。

廊坊事件与广安门事件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守卫卢沟桥的中国第二十九军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形下奋起抗击，多次打退日军的进攻。在军事进攻受挫后，日军便以和谈为幌子麻痹二十九军，为增兵华北赢得了时间。1937年7月下旬，日军在完成了包围平津的战略部署后，伺机进一步扩大战争，由此引发了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

廊坊位于河北省中部偏东，当时是安次县的一个小镇，地处平津两大城市之间，北临千年古都北平，东邻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天津，北宁路由此通过，廊坊因此成为华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廊坊的战略位置也十分重要。中国军队固守廊坊可以保卫平津，而日军如得廊坊便可截断平津之间中国军队的联系进而攻取平津。

当时驻守廊坊的中国军队是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一百一十三旅二百二十六团，这个团有“三个营及迫击炮、重机枪各一连。每个营四个连。每个连三个排。每个排三个班，每班十四人。”以此计算，当时驻守廊坊的部队大约有1 746人，与入侵廊坊的日军人数相当。在武器装备方面，由于长城抗战结束后，二十九军退守平津地区，军长宋哲元利用大沽造船厂生产了一部分轻武器，也从德国、捷克购买一些武器，因此二百二十六团武器装备与以前相比极大提高，“配备八二迫击炮四门，捷克造重机枪四挺，每连配备捷克式或大沽造轻机枪六挺，掷弹筒四个（以后改为连的小炮排）。每个战斗列兵发捷克式步枪一枝，刺刀一把，木柄手榴弹四个。连长发手枪一枝，排长是冲锋枪或手枪、步枪不等。通讯器材、骡马、军需用品均有所改善。”[①]虽然二百二十六团此时武器装备与长城抗战时期相比已经有相当大的改善，但在日军的飞机、大炮、装甲车面前仍无法相提并论。显然这是一次实力不对等的战役，日军在武器装备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

卢沟桥事变后，为防止日军继续入侵，中国驻廊坊守军加强了防御，第二百二十六团官兵在廊坊多处修筑防御工事，“把车站和街市隔离开，各街

口都用旧枕木、麻包袋塞起来，挖一道壕沟，在房顶上垒起各种类型掩体，迫击炮、机关枪都对预定想象目标，测定距离，加以标志。”[2]而此时日军也在积极准备战争，大规模增兵平津地区。7 月 15 日，日军向华北增派第一批精锐部队，原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和原属于朝鲜军的第二十师团，以及临时空兵团，官兵共五六万人，先后抵达天津、唐山、密云一带，编入中国驻屯军麾下。在廊坊事件发生之前，日军在天津的东局子、海光寺、飞机场均有驻屯军，北平以南的丰台地区也有日军的兵营。同时日军还采取各种隐蔽的方法增兵，如通过换防多来少走，逐渐增兵。根据二百二十六团团长崔振伦的回忆：“从卢沟桥事变爆发至廊坊战事之前，光北平一带增加的兵力（经过我们监视哨统计）就有三个连队和一些特种兵。”[3]同时，日军对我军阵地不断进行侦查和骚扰，7 月 11 日 ~ 25 日，日军以“检查通讯”为借口，多次对我廊坊守军进行骚扰和挑衅。1937 年 7 月 11 日，日军五六名士兵“携带通讯鸽两笼到廊坊车站”并要求到市内逛逛，后来在安次县廊坊公安局局长的反复劝说后，这几个士兵放了两只通讯鸽后即离开。[4]但自此之后日军挑衅事件不断发生，并且人数一次比一次多，态度一次比一次强硬。到 7 月 25 日，由于日军的肆意挑衅，最终引发了“廊坊事件”。

1937 年 7 月 25 日下午 4 时，从朝鲜调至唐山、天津地区的日军第二十师团，派出五井步兵中队，以维修通信线路为名，由天津乘火车抵达廊坊，占领车站之后强行出站进入廊坊镇。为了避免冲突，中国驻军派代表与日方交涉，要求他们尊重中国主权，撤回天津，日军态度蛮横，竟然要求中国驻军撤出自己的营房让给日军住宿。双方反复争执后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中方代表刚刚返回驻地，日军就派出一股部队，全副武装并带有工具，选择有利地形向着市区的方向修筑工事。当中国守军注意到日军的活动，并提出抗议后，日军竟野蛮地表示，中国军队必须先让出营房，日军才能停止修筑工事。面对日军的反复挑衅，中国驻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 1937 年 7 月 25 日夜乘月色向盘踞在火车站的日军发起进攻，日军据守火车站顽抗，双方均有伤亡，廊坊事件发生。

中日冲突爆发后，日军迅速增援。当日午夜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立即命令第二十师团第 77 联队和驻屯混成旅团之一部分乘火车增援廊坊。26 日拂晓，日军 17 架飞机开始在廊坊上空轮番轰炸。上午 8 时，日军在装甲车的配合下，向中国守军发起猛攻。面对日军的进攻，二百二十六团官兵

作战十分英勇，中日双方激战至当日中午。但由于廊坊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我军又没有重武器和攻坚的准备，日军又出动了飞机和装甲车等重型武器将中国驻军营房炸成一片废墟，中国守军伤亡惨重。下午1时，廊坊及附近的北仓和落伐车站均被日军占领，中国廊坊守军被迫后撤。至此，北平和天津之间的铁路交通被切断，第二十九军处境更加艰难。

廊坊事件发生的第二天，1937年7月26日，日军又制造了广安门事件，继续为扩大战争制造事端。

广安门事件是日军为扩大战事向北平增援的驻军强行进入北平城而引起的中日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广安门是北平故都十大城门之一，位于北平城的西南侧，是北平市区的重要门户，此门距日军盘踞的丰台镇仅有10多公里。守卫广安门的中国部队是二十九军第一百三十二师独立第二十五旅所属第六百七十九团一个步兵连，人数大约120人左右。

1937年7月26日晨1时，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下令驻屯军步兵第二联队第二大队（即广部大队），由天津出发直趋北平，按原定计划该大队到北平后即受北平留守警备队长冈村的指挥，并将执行保护北平的日本侨民的任务。广部大队于7月26日早晨5时30分自天津出发，于午后2时到达丰台。在丰台，广部大队换乘了26辆汽车开往广安门，并决定按照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与冈村、今井武夫等日本在平校尉们的既定方案，伪称该队日军为出城演习归来的北平日本使馆卫队，由广安门进入北平城，为了顺利蒙混过关，事先与二十九军的日本顾问樱井联系，以其作为内应蒙混二十九军守城部队。广部大队于26日晚6时左右抵达广安门，二十九军的日本顾问中岛、樱井，以及书记官佐藤茂等立刻与刘汝珍部营长李延赞联系，称该部为使馆戍卫队演习归来，要求进入城内。日军的谎言很快被守门的中国军队识破，立即关闭城门加以制止。但城外日军坚持进城，并摆出了欲以武力攻城的架势，态度十分蛮横。六百七十九团团长刘汝珍得知情况后下决心迎战日军，坚决制止日军入城。为争取战争的主动权，中国守军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方式，当晚7时左右，守军先慢慢开启城门，诱日军进入，当进至一半，刘汝珍团长乃下令关闭城门并向日军开枪射击，日军便被分割为城内、城外两部分，陷入混乱中，广安门事件发生。至当晚10时战斗结束的时候，日军战死两名，负伤四名，从军记者三名负伤，冀察军事顾问松井德太郎翻译官被击毙，松井负伤。[5]

广安门事件发生后，驻丰台的日本驻屯军河边旅团马上与冀察当局交

涉，经过商议，双方达成协议：城外的日军部队返回丰台，已经进入城内的日军广部大队，分乘13辆汽车于27日凌晨2时进入东交民巷的日军兵营，至此广安门事件以双方和谈的方式得到了暂时的解决。

廊坊事件与广安门事件之后，日本政府和军界虽打着和谈的幌子，但实际上已经开始积极筹备进一步扩大战争，中日之间更大规模的战争即将到来。1937年7月27日，日本政府立即发表声明，公然声称这两个事件是中国军队以武力妨害日本驻屯军执行确保北平、天津间交通线和保护侨民的正常任务而引起的。同时宣称为完成此项保护任务，日本此时是“不得已而采取必要的自卫行动。”同一天，日本将本土的部队大量派到平津地区，讨伐二十九军，除此之外还向青岛和上海分别派了一个师团。也是在这一天，日本参谋本部向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下达了正式作战任务，并为进一步扩大战事进行了详细的军事部署，规定日军“作战地区应在北平、天津附近，不要到离津浦、京汉、京包沿线太远的地方作战。极力避免市街战，要考虑在京津郊外迅速果敢地把敌人击溃。”⑥

与此同时，驻华的日军也已经行动起来。1937年7月26日的广安门的战斗刚刚停止，日本驻屯军便于22时20分下达了攻击二十九军的作战命令。27日，日军分别攻击了通县、团河和小汤山的二十九军驻军。增兵与军事部署工作基本完成后，日军撕毁了谋求和平解决事端的伪装，公然威胁二十九军。至此，宋哲元和蒋介石都意识到了日军大规模侵华的野心，以和平方式解决中日冲突已经毫无希望。在此情况下，宋哲元于27日召开的军政要员会议后，通电全国决心誓死守土。但由于前一阶段对日态度的摇摆使二十九军错失了作战的最佳时机，日军在增兵备战完成后，绝不允许二十九军有任何喘息的机会。1937年7月28日，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电话通知宋哲元：声称广安门事件是对日军的欺骗和侮辱，日方“决不能宽恕”，因此通知宋哲元，日军将单独采取行动，并且公然威胁，“为使北平城内免遭战火，劝告你立即全部撤出城内军队。”⑦而就在这一天凌晨，日军二十师团和驻屯旅团已经对二十九军军部所在的南苑地区发动进攻，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一百三十二师师长赵登禹光荣殉国，二十九军作战失利。南苑陷落后，北平已经无险可守。此时，蒋介石电令宋哲元：“速离北平，到保定指挥。”⑧

经过反复研究，冀察当局首脑宋哲元决定，自己率领三十七师立即离开北平，命张自忠代理自己的职务继续与日人折冲，并留下赵登禹部独立27

旅和张自忠部独立三十九旅，负责维护北平治安。28 日晚 10 时，宋哲元将三十七师撤出北平一事通知日军松井机关，然后与副军长秦德纯、平绥铁路局长张维藩等一行数人出西直门经长辛店赶赴保定。二十九军驻北平部队于 7 月 30 日晚间撤退完毕，至此古都北平沦陷日本侵略军之手。

从 1937 年 7 月 7 日的卢沟桥事变开始到 7 月 30 日平津沦陷，短短的 23 天时间，日军就侵占了华北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平津地区，并一步步深入中国腹地。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是这 23 天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两次事件的爆发，都是由于日本中国驻屯军有计划的挑衅行为所引起，最终都为日本当局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战争提供了新的借口。正如广安门事件发生后宋哲元给何应钦的电报中所说："似此情形，敌有预定计划，大战势所不免。"⑨自此之后，日本侵略者一方面已经做好了扩大战争的准备，另一方面也已经为扩大战争找到了充分的借口。从 7 月 26 日开始，从日本军政各界到日本的华北驻屯军对中国的态度都不再以和平作为遮掩，公然倡导对华开战，预示着中日战争将进一步升级，中华民族危机加剧。

注释：

①②③④⑦崔振伦：《廊坊抗战始末》，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年版，第 96 页，第 99 页，第 97 页，第 101 页，第 72 页。

⑤（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年版，第 39 页。

⑥《日本参谋本部向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下达的正式作战任务》，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厅发行，1986 年版，第 67 页。

⑧《卢沟桥事变史料》上册，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 106-107 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986 年，第 234 页。

⑨《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蒋何宋等密电选》，《历史档案》，1985 年，第 1 期。

日本《帝国政府声明》及其侵华战略部署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军政当局由最初处理“华北事变”为核心的对华政策逐渐形成了以处理“中国事变”为主的全面侵华政策，并于1937年8月15日公开发表《帝国政府声明》，公然宣称要对中国“采取断然措施”，这一声明标志着日本事实上对中国政府宣战。与此同时，日本也加紧进行侵华战略部署，为扩大战争规模积极准备。于是，在日本军政各界的策划之下，日本侵华的战火从卢沟桥、宛平县城烧到中国平津地区，又由平津扩大到华北地区，进而逼近上海及中国华中地区。

卢沟桥事变之前，日本军政各界已经形成了对华“一击论”，并为扩大战争规模进行了初步的准备。因此，事变爆发之后，无论是在华的日本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以及日本政府、军部反应均十分迅速。但是，在实行全面亡华政策的前提下，如何确定侵华战争步骤以及选择什么时机扩大战争规模，日本军界、政界内部也出现了不同意见。

卢沟桥事变第二天，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日本关东军就召开紧急会议，研讨“卢沟桥事件”的对策，会议一致认为，应乘机对“（中国）冀察（地区）一击”，并决定将关东军第十一旅团主力调往长城一线待命，以支持日本中国驻屯军，并另动员两个旅团准备进行华北作战。关东军还派人赶赴天津，鼓动日本中国驻屯军“彻底地扩大下去”。日本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获知消息后，立即向日本参谋本部进言：日本应“利用这一事件推行统治中国的宏图”[①]。此时，日本参谋本部也认为现在是“千载一逢的良机，此时还是干为好”[②]。一时间，日本军界硝烟四起，对华开战之声甚嚣尘上。7月8日，参谋本部便拟定了向华北派兵的计划：从关东军派遣两个旅团、从日本朝鲜军派遣一个师团、从国内派遣三个师团到华北作战。

此时，日本内阁认为仅仅是“卢沟桥事件”还不足以作为扩大侵华的

借口，还需等待时机。7月9日上午，日本内阁四相会议制定了所谓“不扩大”方针，即要求中方反省、道歉，否则“我方将及时采取措施”[③]。日本内阁的这一决定引起了军界的强烈不满，参谋本部第二部认为，中国正在继续准备抗日，这种情况再发展下去，日本将失去出兵良机，日本中国驻屯军也将陷于中国军队的包围之中。为此，必须从速出兵救援[④]。这一意见很快得到了军部认可。在日本军部的大力主张下，7月11日上午，日本内阁五相会议通过了反应这一意见的提案，决定增兵华北，同时，会议还决定将“卢沟桥事件”改称为“华北事变”。这一提案的通过充分说明，在具体的侵华步骤方面，日本军界和政界初步达成一致意见，也说明了日本已决心将“卢沟桥事件”造成的局部冲突扩大为华北地区的战争。

为了实现其对华作战目标，7月11日下午，日本政府发表《派兵华北的声明》，决定立即增兵华北，并且声称中国第二十九军“于7月7日夜在卢沟桥附近进行非法射击，由此发端，不得已而与该军发生冲突”。“这次事件完全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已无怀疑余地”，将责任完全推给中方。而日本增兵的目的是出于“维持东亚和平”，日本政府还继续施放和平烟幕，假惺惺地表示“政府为使今后局势不再扩大，不抛弃和平谈判的愿望，希望由于中国方面的迅速反省而使事态圆满解决。”[⑤]

总之，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初，日本军界、政界借题发挥，决心将“卢沟桥事件”变为扩大侵华战争的借口和导火线。正如日本陆军省《业务日志》记载的所言：“事变发生后陆军大臣姑且不说，政府的态度大致是乐观的：‘卢沟桥事件’近期可以解决。然而，担心这样大嚷大叫，煽动举国一致，仅仅只解决‘卢沟桥事件’，无论如何也不会满意，如果一疏忽就会给人留下话柄。同时，因为是建立举国一致体制的好时机，就想利用这一机会把多年的悬案解决好。这种考虑在内阁成员、特别是总理心中是很牢固的”[⑥]。日本政府派兵华北的声明实际上成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动员令，声明公布的当晚，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文麿亲自召集贵族院、众议院议员代表、财界和新闻界人士开会，通报内阁会议决定派兵华北声明的经过，要求得到两院和各界的支持。同时日本参谋本部下令派国内师团、关东军和日本朝鲜军至华北，增援在华日军，并向海军下达了必要时出兵青岛和上海的命令。此时侵华的具体战略是，在华北作战以陆军为主，海军主要担任华中、华南的警戒，当战争扩大到华中、华南时，陆军至少应派遣两个师团协同海军作战[⑦]。11日，参谋本部还任命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接替患重病

的田代皖一郎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12 日，香月清司即从东京飞往天津。关于这一段经历，香月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在陆军中央接受任务时，“感到那时必要的紧急派兵、内地 3 个师团的及时动员、山东作战的意图等，完全是对华作战的开端”[⑧]。香月一到天津就下令全军，随着增援部队的到来，“做好适应对华全面作战的准备”[⑨]。

在进行军事部署的同时，日本政府继续以外交活动障目，并为扩大战争伺机挑起新的争端。1937 年 7 月 17 日晨，日本陆军部对中国政府提出新的谈判条件：彻底镇压共产党的策动，罢免排日要人，撤除冀察地区的国民党系统各机关、各排日团体，取缔排日言论、排日运动和排日教育，北平城内不得驻扎军队等要求，如果中方不同意，就被认为是没有诚意，日本就有了开战新借口。正如香月所言，这样一来战争一定会扩大，“其结果要变成全面战争”[⑩]。在做好战争准备后，7 月 19 日晚 10 时，日本中国驻屯军突然宣布：从 20 日零时开始采取自由行动。20 日凌晨 1 时 30 分，日本外务省宣称，事态恶化是由于中国政府妨碍当地交涉和派兵北上造成的。20 日晨，日本参谋本部会议认为，“以外交谈判终究不能解决事变，为使平津地区安定，现在必须决定使用武力。”为此，将从关东军和朝鲜调往华北的日军编入日本中国驻屯军，并着手从国内派兵。这一决定得到内阁认可。[⑪]

但此时，天皇却认为进一步增兵扩大战争借口并不充分，顾虑师出无名，于是陆军部不得已，只好静待时机。就在这时，1937 年 7 月 25 日与 26 日，廊坊事件与广安门事件接连发生，为日军继续增兵华北，扩大战争创造了机会，日本中国驻屯军立即以此为借口，向陆军部报告：“对于在廊坊附近中国军队的非法射击，我军为了自卫而动用了兵力，给该地中国军队以惩罚。以此为转折，不得已事态可能扩大，为此，恳乞批准可随时使用武力。”日本陆军部接报后欣喜不已，一致认为行使武力的时机已经到来，参谋本部立即同意日本中国驻屯军“可以行使武力”[⑫]。

于是，日本陆军部迫不及待地在广安门事件第二天即决定迅速从国内派遣三个师团到华北，同时参谋本部命令日本中国驻屯军向驻守平津地区的中国二十九军发动攻击。28 日，香月清司指挥日军向平津地区发动全面攻击，当晚，便控制了平津地区。8 月初，日本为了进一步扩大战争以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逼迫中国政府投降，继续增兵华北，8 月 5 日，日本参谋本部在《形势判断》中指出，中日两国已处于全面战争状态，日本中国驻屯军在国内师团到达华北后，尽快发动华北会战，“迅速对中国军队特别是中央军的

空军，给予沉重打击，使南京政府在失败感下不得已而屈服，并由此造成结束战局的机会”[13]。

至此，“卢沟桥事变”这一中日局部冲突，在日本军政当局的精心策划下，急剧向全面战争扩展、升级。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日本政府不仅出动了陆军，日本海军也在积极推动出兵上海，将战场由华北扩大到华中。“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海军预计战争将波及全中国，便秘密制订进攻华北、华中、华南作战计划。7 月 16 日，在上海的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在向海军军令部呈送的《对华作战用兵的意见》中提出，“欲置中国于死地，以控制上海与南京最为重要”。他主张派遣五个师团兵力进行华中作战，确保攻占上海与南京[14]。长谷川清的建议得到了日本海军军令部和海军省肯定，海军军令部下令：“鉴于今后形势有很大可能导向对华全面作战，因此，海军应做好全面对华作战准备。”[15]8 月 9 日，上海发生了日军冲击上海虹桥机场引发的“大山事件”，以这一事件为借口，8 月 13 日上午，日本内阁会议确认了陆海军出兵上海的决定，同一天，淞沪抗战爆发，中日战争进一步升级。8 月 14 日，日本海军航空队出动，袭击南京、杭州、南昌等地中国空军机场，将战火扩大到长江下游地区。当晚，日本内阁举行临时会议，要求正式对华宣战，将华北事变改称中国事变，迅速攻占南京、洛阳等地。

在军事准备基本完成，日本军政各界达成全面一致之后，1937 年 8 月 15 日凌晨 1 时 30 分，日本内阁发表《帝国政府声明》。《声明》开篇即将中日之间冲突的责任本末倒置地推给中国，中日之间的军事冲突，无论是“在通州发生的令人难以容忍的残虐事件”还是“华中、华南”的冲突，直至此次永定河畔的事件，都是由于中日之间的战争起因是中国“轻侮帝国”，“非法残暴无所不至”，而日本却是这些冲突的受害者，“我在华民的生命财产，陷于危殆”，现在“帝国隐忍已达极限。为了膺惩中国军队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反省，今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在声明的最后部分日本宣称：“帝国之希望在于日华提携，为此应根绝中国之排外抗日活动，铲除造成此类似事件之根源，并取得日满华三国融和提携之实效。此外别无他意。”[16]为了欺骗和麻痹中国，在《帝国政府声明》公布之前，日本政府多次表示不扩大战争的意愿，7 月 11 日，日本政府还声明表示“希望中国方面迅速反省，以期事态圆满解决”。7 月 27 日又声明“现在依然切望中国方面反省，将局面限定于最小范围，以期迅速求得圆满解决。”但是 8 月 15 日的

《帝国政府声明》中却公然宣布，此次中日之间冲突，日方的态度即以“采取断然措施”，膺惩中国军队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反省为目的，说明日本对外宣称的不扩大方针消失，转而进行全面战争。声明中还宣称战争的最终的目的是将日本的殖民地由中国东北扩大到整个中国，最终实现“日满华三国融和提携”。因此《帝国政府声明》被视为实际上对华全面开战的宣言。同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下令组建日本上海派遣军，辖两个师团，准备开赴上海作战。9月2日，日本内阁临时会议决定，将“华北事变”改称“中国事变”。4日，宣布天皇“敕语”，以代替宣战诏书。至此，中日战争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面战争。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对华不宣而战，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对华仍然是战而不宣，直至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在历时14年的战争中，中日之间全面开战，日本却不曾正式对华宣战，甚至在电文、政府文件中都尽量避免使用战争字眼，而以事变来代替，其中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抗日战争爆发初期，日本不正式宣战是妄图在不扩大的口号下拖延时间，主要是由于分裂抗日阵营之“谋略”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适应其“以华制华”扶植傀儡政权，为扩大战争作准备。

第二，日本最初不愿公开对华宣战，是为了避免刺激美英苏等国而引起干涉。日本陆相事后曾说，事变爆发时都非常担心第三国对我施加压力和进行强有力的干涉。同时，日本不正式宣战，在战争之初就仍然可以从美国等国获得日本稀缺的一些重要战略物资。

第三，是为了逃避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日本不宣而战，不承认中日两国事实上的战争状态，使用“事变”而不使用“战争”字眼，可避免因发动战争必须承担的责任，例如在对华作战时，日本方面从未遵照战争国际公约关于设立管理战俘与被拘平民的机构的规定。对此战犯武滕章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陈述中也狡辩地提出，中日之间不是“战争”，而是“事变”，因此，对捕获的中国人不能作为俘虏处理。

总之，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迅速制定了全面侵华的方针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部署，虽然日本政府对外一再打出“不扩大”的幌子以及“维护东亚和平”的旗号，没有对华正式宣战，但是历史已经证明日本全面侵略中国是有预谋有步骤的，特别是在1937年日本《帝国政府声明》公开发表之后，日本政府已经决心立即向中国全面开战。

注释：

①③⑨⑩⑪⑫⑬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7页，第139～140页，第157页，第157页，第187页，第194页，第211～212页，第224页。

②④⑧［日］小林龙夫等：《日中战争》（4）（《现代史资料》12），美铃书房，1977年版，第424页，第160页，第563页。

⑤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册），原书房，1978年版，第366页。

⑥⑦⑭［日］臼井胜美等：《日中战争》（2）（《现代史资料》9），美铃书房，1978年版，第527页，第527页，第168页。

⑯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册，原书房，1978年版，第370页。

国共两党正式合作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军随即占领了平津地区，并迅速扩大为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在民族危亡之际，祖国山河破碎之时，国共两党终于携手走到了一起，1937 年 9 月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建立。

早在 1935 年，国共两党就以几个渠道开始了谈判。1936 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表示接受爱国将领及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至此，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国共两党在兵戎相见 10 年之后，再次坐到了谈判桌前，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机第二次携手。从 1937 年 2 月开始，到 1937 年 9 月下旬达成协议，国共两党前后共举行了五次谈判，历时七个多月，整个谈判过程异常曲折艰难。

1937 年 2 月，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举行谈判。谈判的基础是共产党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以及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决议案，谈判的中心是红军改编和苏区政权改制问题。[①]

关于红军改编后的编制及人数的问题，双方争论得十分激烈。谈判开始时，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国民党代表就提出只准红军编为三个团，后又增加为六个团、九个团，人数限 3 000 至 5 000 人。[②]而周恩来等中共代表提出的方案是将红军主力编为三个国防师，计六个旅 12 个团，每师 15 000 人，共四至五万人；其他如骑兵、炮兵、通信、辎重部队等编为直属队；地方红军编为保安团和民团。[③]在改编人数方面，双方争执不下。同时关于红军改编后的指挥领导权问题，双方也没能达成一致。中共代表提出在三个国防师之上设总指挥部或某路军总指挥部，红军领导不变，各级指挥人员由中共推荐，国民政府军委会任命。[④]但国民党提出改编后的军队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取消工农红军的独立性。

关于苏区政府问题，中共代表认为，可以将陕甘宁边区改名为中华民国

特区，接受南京政府的指导，改变苏维埃制度，边区行政人员经民主选举推荐，由南京政府委任。[5]国民党代表则提出，不仅要向边区政府派人，而且还要担任主要职务。

最后，此次谈判因为在红军改编与苏区改制等关键问题上，双方谈判条件差距过大，没能达成共识。但在西安的谈判的最后阶段，双方都同意为建立合作继续举行谈判，同时国民党方面接受中共代表提出的同蒋介石直接谈判的建议，于是，3月下旬至4月初，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蒋介石在杭州进行第二次国共谈判。

杭州谈判过程中，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向蒋介石提出11项书面要求和五项口头声明，重申中国共产党坚持边区行政完整、政府人员民选推荐、红军编为三个师和红军领导人不变等主张，并严正声明：中共为国家和民族利益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合作，但绝不忍受投降、收编之诬蔑。他指出，如果国民党能够彻底实行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共产党可以拥蒋抗日，切实履行自己的四项保证，作出必要的让步。蒋介石最初并不同意以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式建立合作关系，提议中共可以在拥护蒋委员长的旗号下与国民党共同抗战。[6]这一建议遭到中共代表拒绝后，蒋介石勉强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国共两党合作必须有明确的形式和“一个共同纲领”的主张，并同意继续举行国共谈判，商谈具体问题。

在1937年6月8日~15日，国共两党在庐山又举行了第三次谈判。谈判中，蒋介石一改杭州谈判中的态度，提出了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作为国共合作机构的主张。蒋介石提出由国共双方同等数目干部组成同盟会，他本人任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两党合作的共同纲领及国共两党一切对外宣传活动，统由同盟会讨论执行。[7]蒋介石力图通过所谓的国民革命同盟会形式实现国共合作，表现出国民党不愿承认中共和合法地位，妄图取消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的企图。

同时，在合作的具体问题上国民党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让步，提出：国共两党合作，先由中共发表宣言，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红军改编为三个师、4.5万人，但同时强调师以上必须设政训处，朱德、毛泽东须离开红军。边区政府可由中共推荐副职；并承诺分批释放在狱中的中共党员；由中共方面派人联络南方游击队，经调查后实行编遣，但其领袖必须离开部队；国民大会指定中共出席代表，但不能以中共名义参加；国防会议可容中共干部参加。[8]

对于国民党的条件，周恩来表示，中国共产党可以接受设立同盟会建立合作关系的形式，但是坚决不同意同盟会的组织原则、有关红军指挥机关与边区政府人事安排意见，坚持设改编后的总司令部或指挥部。两党谈判就此陷入僵局，其间，周恩来与宋子文、宋美龄和张冲等人也举行了会谈，再三阐述中共的立场和原则，并通过他们与蒋介石磋商，但蒋介石坚持红军改编后设政训处等观点，于是第三次和谈仍然未取得重大进展。

此后，中日关系日趋紧张，全国民众抗战不断掀起高潮，由于面临日益高涨的抗日民情和国土危机，6 月 26 日，南京政府致电周恩来到庐山就合作抗日问题继续谈判。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日大战一触即发，国共两党都加紧了抗日战争的准备，从而推动了国共合作的谈判进程。7 月 14 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抵达庐山，随即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又于当日就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权问题与张冲举行会谈。17 日，周恩来等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会谈，并向蒋介石建议，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迅速发动全国抗战。此次谈判中，蒋介石虽对日本侵华政策有了新的认识，对共产党的态度也有所转变，但在红军改编、陕甘宁边区改制，特别是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权和人事安排等问题方面的观点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蒋介石仍要求红军改编后各师直属行营，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坚持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指挥权，提出政治主任可以由周恩来担任，毛泽东为副主任[⑨]。周恩来当即严正表示：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与人事意见，我党决不能接受。但是，中共中央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17 日在就谈判中双方争执的问题进行了协商时，决定再次给予一定的让步，提出可承认平时指挥人事等政治制度，要求设正副主任，朱（德）正、彭（德怀）副，但战时必须设指挥部，以资统率。但蒋介石坚持红军在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机关，使此次谈判再度陷入僵局。

在国共两党第四次和谈结束后，中国抗战形势进一步恶化。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国民政府决定 8 月中旬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邀请包括中共在内的各方将领共商国防大计。8 月 1 日，蒋介石令张冲急电延安，邀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速至南京共商国防问题。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通过谈判解决发表国共合作宣言、确定政治纲领、决定国防计划、发表红军指挥系统等问题。

8 月 9 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飞抵南京，11 日，周恩来在国防

会议上作长篇讲话，阐述了中共的抗日战略和指导方针。会议期间，周恩来等与宋美龄、宋子文、孙科、张治中、邵力子、冯玉祥、白崇禧、刘湘、龙云、黄琪翔等国民党上层有一定政治影响力的人物多次接触，通过这一方式实际上取得了公开合法活动的地位。8 月 13 日，淞沪抗战爆发，日军逼近国民党统治中心，蒋介石急于派红军奔赴抗日前线，牵制日方兵力，减轻上海压力，于是，在谈判中不再设置障碍，国共两党关于红军改编、苏区改制以及合作宣言内容问题才逐渐达成一致意见。

8 月 18 日，蒋介石终于表示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下编三个师，部队的给养等一律照发。蒋介石还答应国民党不派军官到八路军任职，只在总部和三个师各派联络参谋一人，不再派政治主任和参谋长。这样，国共两党谈判中僵持已久的有关红军改编的军事指挥与人事安排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但陕甘宁边区范围和政府人员、国共合作宣言何时发表等问题尚未解决。

21 日，周恩来、朱德回延安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谈判中的未了事宜由叶剑英留在南京交涉。22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了红军改编的命令。25 日，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9 月 11 日，八路军改称为第 18 集团军，属第二战区，八路军总指挥部改称第 18 集团军总司令部，朱德、彭德怀分别担任总司令和副总司令，红军改编任务全面完成。

在陕甘宁边区和宣言问题上，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最初各执一词，国民党方面仍想通过人事任命一定程度地控制共产党的政权，提出“边区公署主任内定丁惟汾先生，日内即可与副主任林祖涵先生同时任命”。对于边区人事任命，中国共产党态度坚决，提出“关于边区坚持林（伯渠）正张（国焘）副，不要国民党任何人（不待说不要丁惟汾）为合宜”。[10]这一问题的解决一直到 9 月 25 日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之后，蒋介石表示承认边区政府。虽然在 10 月 22 日行政院第 333 次会议上通过决议依然任命了丁惟汾为边区行政长官，林伯渠为副行政长官，但同时表明，边区问题因为没有一定的规章制度可以遵循，所以等待规章制度制定后再发表。就此将行政人员任命问题束之高阁，实际上是国民政府默认了边区政府由共产党人自己控制的事实。

由于国共两党政治主张存在重大差异，因而两党在宣布合作宣言的内容方面也产生了分歧。在谈判中，关于《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国民党以唯一执政党自居，一方面对于中共要求其给民众民主的要求十分不

满，认为是对其统治权的一种挑战；另一方面删减中共的政治主张，主要是尽量减少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政治影响。因而提出许多无理要求，例如要将“民主”改为“民用”，将宣言中政治主张删除等等。国民党的要求遭到了中共严辞拒绝，而国民党认为这是维护其统治地位所必须的。因此，9 月下旬的谈判中关于两党共同宣言问题，国民党代表康泽在谈判中坚持原来的意见，认为：“后面说的大堆政治主张是多余的”，要删掉，因此就宣言的内容问题两党一度僵持不下，后经过博古和叶剑英的反复争论，国民党同意中共意见，重新修改宣言，并达成协议。

在反复谈判的基础上，9 月 20 日，博古和康泽分别代表共产党和国民党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上签了字。1937 年 9 月 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23 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讲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国共第二次合作宣告正式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宣告形成。

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建立，以及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使中国两个最大的政党团结合作，有利于充分调动各个阶级和各种力量共同抗日，有利于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前方的抗战，从而推动了全国抗战新局面的到来。国共两党合作正式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得到改善。同时，国民党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合法性，使中国共产党可以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公开活动，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逐渐壮大自己的力量，为中国革命带来了新的希望。正如毛泽东所说，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建立，“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性的作用”[11]。

总之，国共两党合作的建立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下，中国社会各界的积极努力下，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后建立的。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形成为中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注释：

①⑤⑦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87 页，第 228 页，第 225 页。

②《蒋介石关于改编共军方针给顾祝同的补充指示电》，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重庆出版社，1992 年版，第 326 页。

③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年版，第 22 页。

④《中央书记处对周恩来关于谈判方针意见的批复》1937 年 2 月 24 日，转引自《中共党史资料》，2007 年第 2 期。

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与蒋介石谈判经过和对各方面策略方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年版，第 330 ~ 335 页。

⑧《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周恩来同志第二次与蒋介石在庐山谈判结果致共产国际书记处电》，《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336 ~ 338 页

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年谱》，中国档案出版社，1992 年版，第 250 页。

⑩《洛浦、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电》，1937 年 9 月 20 日，《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2000 年版，第 499 页。

⑪《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364 页。

淞沪会战

1937 年 8 月 13 日，日军继华北的“七七事变”之后又在上海制造了“八一三事变”，再次挑起中日军事争端，把侵略的战火又烧到了上海。中国驻上海守军奋起还击，淞沪会战由此拉开了帷幕。这场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第一场重要战役，也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中国军民经过浴血苦战，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

淞沪地区位于长江下游黄浦江、吴淞两江的汇合处，是中国工商业中心，其中上海是我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和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同时淞沪地区战略位置也十分重要，该区域北控长江口，南领杭州湾，东临东海，西屏南京。淞沪地区的得失将会直接影响到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安全，日军如占领这一地区不仅可以威胁南京甚至可以溯江西上而威胁汉口。

淞沪会战前，日军在上海地区的军事实力明显强于中国守军。1932 年的一二八事变之后，中日双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按照协定日军大量向上海派兵，至淞沪抗战前，日军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兵力大约 4 000 人，在租界各要地还修建了坚固的工事，另外还得到了海军第二舰队的支援。而中国方面由于受到《淞沪停战协定》的限制，军队不能在上海及周围驻守，只能在苏州河以南驻兵。[①]上海市内仅有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所辖上海市警察总队以及江苏保安部队两个团守备。

随着 1935 年日军策动华北独立，中日关系逐渐紧张，上海及周边地区形势也发生变化，中日双方在这一地区开始进行对峙。国民政府为防止日军进攻上海，1937 年 7 月初，先后修筑了吴福线（吴县至福山）、锡澄线（无锡至江阴）、乍平嘉线（乍浦经平湖至嘉善）三道国防工事。卢沟桥事变后，国防委员会决定继续加强上海地区的防御，于 1937 年 8 月上旬调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部向吴县、常熟、无锡一带集结。与此同时，日军也加强了上海地区的布防，在上海日本租界内，日军各哨所的兵力都有所增加，另外还积极备战。“各屋顶上设高射炮，各要点构筑工事，对市中心区及南翔方

面试射炮位，日夜加以练习”，同时还“撤退各地侨民，扩编义勇军及在乡军人队”等等。[②]日军在备战的同时还不断向中国军队进行挑衅，中日关系日趋紧张，军事冲突已不可避免，就在此时，大山事件（或称虹桥机场事件）发生，点燃了淞沪会战的导火索。

1937年8月9日下午5时许，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率一等水兵斋藤要藏，驾军车沿虹桥路由东向西急驶，直冲虹桥飞机场大门，进行挑衅。机场守兵喝令停车无效，遂开枪击车。日军车急速右转弯驶人碑坊路。在离机场大门北百余米处军车被击坏，大山勇夫当场中弹毙命于车内，斋藤要藏弃车而逃，后也被击毙。事件发生后，上海市长俞鸿钧立即提出与日方领事交涉，力图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一争端，但日方却缺乏和谈诚意，竟然蛮横地以武力相威胁，提出：中国政府立即撤出市内保安部队，拆除军事设施。同时日本第二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下令在佐世保待命的部队立即增援上海，至此战争已不可避免。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以租界和黄浦江中的日本军界为作战基地，炮轰闸北，八一三事变爆发，淞沪会战开始。

在淞沪会战之初，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表现出了抗战的积极性和决心。八一三事变第二天，中国国民政府发表《中国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庄严宣告：“中国绝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③]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事变后迅速进行了紧急军事部署。同一天，军委会下令将京沪警备部队改编为第九集团军，任命张治中为总司令，攻击虹口及杨树浦之日军，苏浙边区部队改编为第八集团军，张发奎为总司令，守备杭州湾北岸，并扫荡浦东之敌，炮击浦西汇山码头。同时出动空军配合陆军作战并承担防空任务。

接到命令的当天，中国空军首次出战，对虹口及汇山码头的日军据点进行轰炸，轰炸日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巡洋舰。随后陆军出动，第八十七、八十八师向八字桥、杨家浦之日军发动猛攻，战斗至日落夺回八字桥、持志大学、沪江大学等地，此后中国军队一鼓作气又将五卅公墓、爱国女校和粤东中学等地克复。17日，中国军队在此对杨树浦方面日军发起进攻，第八十七师一度攻占了日海军俱乐部，第八十八师攻占了日军驻地坟山。但是由于中国军队缺乏重型武器，而日军经过长年经营，工事又十分坚固，致使中国军队在付出巨大伤亡之后仍未能攻占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根据第九集团军第八十八师参谋长张柏亭回忆，这一阶段中国军人在巷战中为取得有限战果伤亡惨重，在8月14日的战斗中仅二百六十四旅即有七名

连长阵亡。另外负责指挥五百二十七团、五百二十八团、超二百六十二团的黄梅兴将军在爱国女校附近指挥作战时被迫击炮击中，当场殉国。[4]

随着战场形势逐渐严峻，为统一战备，1937 年 8 月 20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颁布中国军队战斗序列及作战指导计划，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其中京沪杭地区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前敌总指挥陈诚，并明确了作战方针："以主力集中互动，迅速扫荡淞沪敌海军根据地，阻滞后继敌军登陆，或乘机歼灭之。"[5]此后按照前敌总指挥陈诚的建议，对战略部署进行了调整，将新到达的 69 军也投入战斗，与 87、88 师一起在 8 月 20 日再次对敌发起总攻。但不再攻击虹口日本海军陆战队总司令部而改为汇山码头，意在将日军截为两段再分别歼灭。经过激战，22 日晚三十六师虽突破日军阵地一度进至汇山码头，但遭到敌海军炮火的阻击，先头部队又因进展过快与后续部队中断联系，结果一时之间失去指挥造成混乱，官兵伤亡达 2 000 多人，后三十六师奉命撤回唐山路原驻地。至此，中国军队处于攻势的阶段基本结束。

1937 年 8 月 23 日凌晨，日军第三、第十一师团在长江南岸的吴淞、狮子林、川沙口等处陆续登陆，并以一部在殷行至张华浜之间登陆，对中国军队侧翼造成威胁，中国军队被迫停止了对市区日军的进攻，转而对付登陆之敌。面对日军的增援，中国方面被迫做出新的调整。第三战区临时将长江南岸守备区扩编为第 15 集团军，由陈诚兼总司令，又抽调三个军予以加强，迎击日军第十一师团；由第 9 集团军迎击日军第三师团。战至 25 日，双方形成对峙。9 月 1 日，日军为连接和扩大两个师团的登陆场，从狮子林和吴淞两面夹击宝山。守备宝山的第十八军姚子青营多次击退日军进攻后，全营壮烈牺牲，宝山失守。中日战至 9 月 10 日，日军将两块登陆场连成一片，中国军队陷于被动，被迫后撤。至 17 日，中国军队撤至北站、江湾、庙行、罗店、浏河一线，与日军对峙，战场形势更加吃紧。为挽救危局，蒋介石亲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21 日再次调整部署：以第 9 集团军为中央军，朱绍良任总司令，位于北站、江湾、庙行一线及其以西地区；以第 8、第 10 集团军为右翼军，张发奎任总司令，位于苏州河以南至杭州湾北岸地区；以第 15、第 19 集团军为左翼军，陈诚任总司令，位于蕴藻浜以北的万桥、罗店、广福地区。9 月中下旬，为迅速结束战斗，日军再次增兵，调第九、第十三、第一百零一师团及重藤支队（台湾旅）到上海，以备对中国军队发动总攻。

10月1日，日海军、航空兵协同地面部队发起新的攻击，中国守军防线很快被突破。15日，日军突破蕴藻浜，26日攻占庙行和大场。至此，苏州河北岸的中央军腹背受敌，不得已于27日放弃北站、江湾阵地，向苏州河南岸转移。

11月5日，从华北、东北和日本国内抽调日军新组建第10集团军突然在杭州湾的全公亭、金山卫间登陆，策应上海派遣军实施迂回包围。此后，战场形势急转直下，日军步步紧逼，中国军队只能节节抵抗。日军登陆时，杭州湾北岸的守军大部已调去支援上海市区作战，只有第六十三师的少数部队守备。6日，日军占金山。7日，日军上海派遣军和第10集团军合编为华中方面军，由松井石根统一指挥，企图对上海守军迅速达成合围。战局急转直下，8日，蒋介石下令全线撤退。自9日起，日军击退中国军队零散抵抗，连占虹桥机场、龙华、枫泾、青浦。11日，日军进至苏州河岸，南市及浦东中国方面担任掩护任务的部队奉令撤出阵地。当日，上海市长俞鸿钧发表告市民书，沉痛宣告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沦陷。此后，日军在陆海空军猛烈炮火攻击下，一路追击国民党军队，至12月初，日军以一部向宣城、芜湖入侵，一路由郎溪北上逼近南京，至此淞沪地区失守，淞沪抗战结束。

历时三个月的淞沪会战是中国抗战史上规模空前、惨烈异常的一场大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双方均投入大量兵力。日军先后集中了九个师团又两个旅团，人数近20万人，国民党方面先后集结了55个师又五个独立旅，总兵力更是达到了70万人，淞沪会战对整个抗战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中国军队英勇奋战给予日军严重杀伤，打破了日军10天占领上海，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为中华民族最终赢得这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淞沪会战中，日军参战近20万人，被中国军队打死打伤四万多人[⑥]，甚至将原本用于华北战场的精锐部队抽调到华东地区作战。中国方面基本上达到了消耗战的目的，有力地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淞沪会战使日军元气大伤。

第二，由于在淞沪战场所需兵力过大，日军被迫将华北方面部队一部分主力转移到华东，因此在淞沪会战后日本不得不调整其在华的作战方略，将作战的重点由华北转向华东，这一战略调整带来了战场形势的巨大变化，最

终形成了有利于中国进行持久抗战的新局面。淞沪会战迫使日军将进攻方向由华北俯冲武汉改为沿长江向上仰攻，将敌从有利于其机械化行军的华北平原引向地形相对复杂并有坚固国防工事的长江三角洲来，可以解除敌沿平汉线南下直捣武汉切断中国的危险局面。

第三，这场战役在淞沪战场拖延日军达三个月之久，为沿海工业、学校的内迁以及国家转入战时体制赢得了时间。国民党军队的英勇表现一定程度上阻滞了日军侵略的步伐，使一些重要的工厂和学校及其战略物资得以运往内地，加强后方的物资力量，保存了民族工业的基础和文化教育的基础，为改变大后方落后的局面，发展大后方的经济，最终赢得这场消耗战的胜利，甚至为战后国家经济的复兴都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第四，淞沪会战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在战争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如姚子青营死守宝山、八百壮士守卫四行仓库等，这些英雄事迹鼓舞了社会各界的抗战热情，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正如 11 月 13 日，国民政府发表自上海撤退之声明中所描述的那样，淞沪会战留给中国人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鼓励，让人们看到，各地战士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即使“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这种精神“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淞沪会战的结果，是中国军队在付出死伤 30 万的代价后仍然无法阻滞日军的进攻，其中的原因，除了中日军队在武器装备到士兵的素质方面的差异外，国民党军事指挥者在战略战术上的失误也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蒋介石选择在淞沪地区这样地势平坦、河渠交错、军事几乎无险可守的地区与装备精良的日军展开旷日持久的阵地战在战略上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上海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其特殊的地形十分有利于日军展开机械化作战和海陆空军配合作战，同时日军在上海还有经营多年的坚固工事。相比之下，中国方面空军和海军与日军相比实力相差悬殊，唯有陆军具有一定实力，但武器装备较差，火力也明显不足，在此情况下展开阵地战是以己之短御敌之长，最终导致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中损失惨重。同时此次战役中损失的中国军队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很多都是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即中央军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如 87 师、88 师等，如此一来，淞沪会战在消耗敌人有生

力量的同时也使中国陆海空军精华蒙受巨大损失。

其次，在防御作战中，蒋介石专守一线兵力分散，而且忽视侧翼防守，以至于日军利用杭州湾守备空虚而乘机登陆，然后直插我军后背，使我军队形大乱。蒋介石后来也承认："我军上海撤退乃为受金山卫敌人登陆于侧背动摇之故。"⑦

最后，在国民党军队撤退过程中，蒋介石幻想依靠国际支援，使军队再次蒙受了不必要的损失。1937 年 10 月下旬，中国军队在基本完成原本设定的消耗战的预定目标时，在上海已经处于十分危险境地，开始向吴福县撤退，但蒋介石在获悉九国公约组织将于 11 月 3 日召开讨论中国的会议，蒋竟不顾前线情况，为了争得所谓的国际同情，朝令夕改，要求各军返回原阵地再撑几个星期，结果导致队伍大乱。到 11 月 8 日蒋介石下达撤退命令时，中国军队"已经溃不成军，各军仓皇后撤，加以敌机日夜轰炸，人马践踏，秩序大乱。大军数十万竟越过钢筋水泥所建的苏嘉国防线阵地而不能停足。阵地上虽有坚固的堡垒，退兵因一时找不到钥匙，不得其门而入，竟一一放弃，溃退之惨，一言难尽"⑧

尽管在淞沪会战中蒋介石在指挥作战中战略战术中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国民政府和军队抗战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同时也是由于淞沪会战的爆发，国民政府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了日军吞并中国的野心，以及单靠一党力量难以抗击日军的现实，于是国民党进一步调整与中共的关系，在国共合作过程中表现出更多地诚意，最终在两党的共同努力下，1937 年 9 月下旬，国共合作正式宣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此正式形成，为中华民族赢得抗战胜利带来了希望。

注释：

① 中央档案馆等编：《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8 年版，第 631 ~634 页。

②《张治中回忆录》，华文出版社，2007 年 2 月版，第 116 页。

③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 2 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年版，第 11 页。

④张柏亭：《淞沪会战纪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八一三淞沪抗

战》，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30页。

⑤蒋纬国总编著：《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5卷，黎明文化事业出版公司，1981年版，第14页。

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战史丛书》86），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83页。

⑦蒋介石：《省克记》，1937年11月20日，摘自《蒋介石日记》，台北国史馆藏，转引自杨天石，《蒋介石与1937年的淞沪、南京之战》，《学术探索》，2005年第3期。

⑧《李宗仁回忆录》下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96页。

中国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摆在中华民族面前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面对这一关系全局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提出了两套不同的解决办法，形成了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即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的战争。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的变化，迅速地制定了一条全面抗战路线。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提出了“全民族实行抗战”[①]的方针。7 月 23 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针对国民党和日本谈判谋求妥协的活动，明确指出，“妥协退让的方针如不迅速改变，将使平津和华北尽丧于敌人之手，而使全民族受到绝大的威胁”，只有实行坚决抗战的方针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文章系统地论述了一整套坚决抗战的方针办法，提出了抗战救国的八大纲领，并号召全国人民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避免“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而斗争，[②]这篇文章中形成了全面抗战理论的雏形。

为了制定抗战时期的政策与方针，1937 年 8 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了洛川会议，会上确定了“全面的民族抗战的方针”[③]。洛川会议上通过的两个文件，即《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正式形成。

此后，中国共产党对于全面抗战路线问题曾多次进行阐述。1937 年 10 月 25 日，在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说，“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基本口号”[④]。同年 11 月 12 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又概括说：“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⑤]从此，争取全国各族人民各个阶级、阶

层参加的全面抗战路线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项基本的政策与路线，对抗战时期中国政治局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不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则坚持了一条单纯依靠政府和国民党正规军的片面抗战路线。国民党正式抗战始于卢沟桥事变，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后，国民党的对日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日军的步步紧逼下开始积极抗战，先后组织了平津抗战与淞沪会战，一定程度地抗击了日军的侵略，并于 1937 年 9 月下旬与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了合作关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此正式建立，开创了抗日战争新局面，但同时国民党也逐渐形成了一条片面的抗战基本方针和路线。

1937 年 8 月 11 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了国防会议，并以大本营的训令颁布战争指导方案、指导方针、作战计划。其中明确提出了要以武力对抗侵犯我国的日本帝国主义，确定了持久战的方针。但同时也体现出了片面抗战路线，例如对贯彻持久战的部署和指导缺乏周密考虑和计划，相反提出了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即准备于主战场以主力实行柔性攻击，在主战场侧面攻取张北等地，并集中空军主力协同陆军作战，先歼灭淞沪日军。这些具体的战略部署与其所制定的“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思想是相互矛盾的。[⑥]另外，对于如何进行持久战，没有具体提及。国民党拟定的作战方案主要体现出了依靠政府和军队作战，训令作为国民党进行抗日战争基本文件，标志着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基本形成。

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更加完整的体现，则是 1938 年 3 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该纲领详细阐述了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各项政策和方针，标志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正式形成。

根据国共两党在抗战全面爆发初期通过一系列文件以及抗战中执行的政策分析，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为争取抗战胜利依靠的主要力量不同。

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在国内主要依靠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正规军抗战。《抗战建国纲领》中虽然强调：“中国国民党领导全国从事于抗战建国之大业”，“固有赖于本党同志之努力，尤须全国人民戮力同心，共同担负。”但是对人民武装，国民党更强调“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之下，与正式军队配合作战。”实际上是强调抗战的主要力量是正规军。对外国民党则过分依赖英美等国的“外援”。1937 年 11 月上海沦陷后，蒋介石的讲话十

分具有代表性“日本占领上海以后的气焰，各国是受不住的，尤其是英国决不能忍受的”，只要我们继续努力抗战下去，“一定可以达到各国在远东敌视日本、包围日本的目的”。⑦

与国民党路线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共产党主张中国的抗战应依靠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并争取和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中共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即明确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在使国民党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也明确提出了执行全面依靠群众的抗日路线应采取的具体政策，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实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即“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实行全国抗战。反对单纯防御的消极作战方针，采取独立自主的积极作战方针”。同时，实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将“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⑧

第二、国共两党对待国内民众抗日力量的态度以及政治主张不同。

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反对抗日战争成为人民的战争，在这条抗战路线之下，除了依赖政府和军队就是外国援助，不必发动群众起来抗日，也就不需要调动民众的积极性，给人民以民主，改善下层民众的生活条件，因而不需要对政府进行民主改革。因而在《抗战建国纲领》中在国内政治民主和发动民众抗日方面，只规定建立国民参政会吸收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的少数代表参加咨询、视察政务，而没有提出召集由人民选举产生代表组成的国民大会，选举国防政府；只规定民众在国民党政府法令范围内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权，而没有规定制定民主宪法，给人民以充分的各项民主权利，更不敢提出释放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各党派平等合作等内容。在经济方面，只笼统的提出改善人民生活，而没有明确规定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和措施。

而中国共产党提出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发动群众就必先给群众政治上的权利和自由，经济上减轻下层民众的压力，因而必须在全国进行必要的政治、经济改革，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因此，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要“改革政治机构：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改良人民生活：改良工人、职员、教员和抗日军人的待遇，优待抗日军人的家属，废除苛捐杂

税，减租减息，救济失业，调节粮食，赈济灾荒”等等一系列具体的方法和主张。

正是因为国共两党总的抗战路线不同，因此在具体的抗战方针的制定上也存在巨大的差别。例如国民党抗战时期的总纲领为《抗战建国纲领》，而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虽然“建国”、“救国”不过一字之差，却体现出了政治主张上的巨大差异。国民党提出“抗战建国”，以示与共产党“抗日救国”相区别，表明要把抗战与巩固其统治同时并举，现有国家制度、政治稳定程度只能通过抗战得以强化而不能削弱，使抗战的胜利成为国民党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则认为，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胜利也将是人民的胜利，伴随击败日寇而出现的，应该是一个自由平等政治民主的新中国。

另外，在抗战方针的执行过程中由于路线的不同也产生了不同的效果。例如，在抗战之初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曾提出中日之间“持久战”的观点。在蒋介石提出中国抗战将是一场持久战的理论根据主要有两点，第一，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可以支持持久抗战。蒋介石提出，“敌欲尽占我广大之土地，宰割我四万万之人民，所需兵力，当为几何，敌之武力，终有穷时。”[⑨]第二，幻想依靠国际力量特别是英国、美国、苏联的支持和干涉来战胜日本。由此看来，蒋介石所谓的持久消耗战，不过是中国政府和军队坚持抗战，拖延时日，以期待英国、美国、苏联对日忍无可忍之后进行干涉，这样中国就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根本不需要去发动民众，实行全民族的抗战。而毛泽东的持久战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人民战争，在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同时，“广大的游击战争和人民抗日运动将疲惫这一大批日本军”，[⑩]日军最终将陷入人民战争中，胜利必将属于中国人民。由此可见，是否意识到人民的力量，是否能够发动人民的力量，成为国共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重要区别。

片面抗战路线的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由于国民党忽视民众的抗战力量，把抗战看成只是政府的事，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不去彻底改革政治机构，从而使抗战出现了参战的地域是全国性的，参战的成分却不是全国性的现象。这就使抗战“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即“存在着严重失败的可能”。正是由于国民党执行了片面抗战路线，给抗战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在抗战初期国民党虽然进行了较为积极的抗战，歼灭大量日军，牵制了日军主力，但由于没有充分发动群众，结果无力阻止日军优势兵力的进攻，

造成继东北失陷之后的中国华北、华中、华南大片领土相继丧失。要克服这个“危险性”，防止抗战失败的办法，只有把抗战发展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即不仅从参战的地域上而且从参战的成分上都是全国性的。

总之，在抗战全面爆发后，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因为对形势的判断、分析不同，所以制定的抗战路线、方针上存在很大差别。反映到战争中则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结果即全面抗战路线与片面抗战路线，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们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贡献。国民党在抗战爆发后组织了正面战场的抗战给日军重大杀伤和消耗，但同时由于其路线方针的局限和错误，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始终坚持全民、全面的抗战路线，最终成为中国赢得抗日战争的法宝，全面抗战路线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之一载入史册。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电》，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选集》第 11 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 274～275 页。

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331、第 336 页。

③《张闻天文集》第 2 卷，中央党史出版社，1993 年版，第 343～349 页。

④⑤⑩《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374 页，第 356 页，第 454 页。

⑥王辅：《日本侵华战争》第 1 册，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 525～533 页。

⑦蒋介石：《最近军事与外交》1937 年 11 月 20 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研究会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 14，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4 年印，第 624～625 页。

⑧《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电》，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选集》第 11 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 327～330 页。

⑨蒋介石：《我军退南京告国民书》1937 年 12 月 7 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研究会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 14，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4 年印，第 651 页。

中共中央改编红军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大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的同时，决定改编中国工农红军开赴抗日战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急时刻的优异表现，充分体现出了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为国家为民族不怕流血牺牲的高尚情怀。

作为中国革命的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中国工农红军在改编之前，包括红一、红二方面军和援西军等部。其中红一方面军，总指挥兼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辖第一、第十五军、骑兵第二团，总部驻山西云阳地区。全方面军共 2.4 万人，有 1.2 万支枪。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参谋长周士第、政治部主任朱瑞。辖第二、第六军团和第三十二军及骑兵第一团，全方面军共 1.15 万人，有 8 900 支枪，部队驻地陕西耀县地区。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张浩、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宋任穷，辖第四、第二十八、第三十一军和骑兵第三团等，全方面军共 1.55 万人，有 9 300 支枪，部队驻陕甘边区。另外还有陕北红军第二十七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军，独立第一师、独立第二师、第七十四师，共 7 065 人，4 442 支枪。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总计 74 404 人，有 40 584 支枪。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共产党密切关注中国抗战局势，多次公开谴责日军侵略行径，并积极准备开赴抗战前线。1934 年夏，中共中央曾派遣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但此时红军尚在国民党大规模围剿之中，开赴抗战前线条件还不成熟。

1936 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战争基本结束，但同时前线抗战局面也更加危急。中国共产党为早日扭转前线局势，促成工农红军尽快开赴抗战前线作出了大量的努力。从 1937 年 2 月至 1937 年 9 月的国共两党的谈判中，中共一方面积极推动国共合作，争取早日整编。另一方面，为了在国共达成一致后，红军能够早日开赴抗战前线，谈判的同时，中共即开始为红军

整编积极筹备。1937年6月，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和前敌政治委员任弼时接待国民党中央考察团时，就对红军三个方面军的领导干部进行了考察和了解，提出红军改编后干部配备的详细的方案，包括改编后三个师及所辖各个旅干部的人选。但是国共在1937年6月份的谈判中关于是否在三个师以上设立政训处的问题双方争执不下，因此中央决定，“如蒋同意设立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八月一日自行宣布改编。”此后，关于红军改编问题，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积极争取与国民党达成一致，同时自行改编的各项工作也在稳步推进中。1937年6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责成彭德怀与任弼时在7月15日之前拟定出红军改编的具体方案，包括改编后的各项制度、条例等，为8月1日红军改编做准备。

按照中央的指示，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政治部于1937年6月28日决定7月15日联合召开会议，并部署各军组织部长携带连以上军政干部名册及详细履历，7月13日前到云阳报道。1937年7月2日，关于改编后的部队基层干部的选择和审查办法基本拟定。“各兵团首长、政治部主任及保卫部长、组织部长可参加审查改编后的连、营、团正副首长及团政训主任”，同时还确定了选拔干部的标准，主要包括政治素养的要求和军事指挥才能方面的条件。总政治部还命令各部将干部情况于7月15日前形成鉴定名册，20日前送前敌总指挥部审定。另外召集陈光、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贺龙、关向应、刘伯承、林育英等部队主要负责人至前敌总指挥部讨论改编问题。[①]正在中共紧锣密鼓准备自行改编之时，中国国内抗战形势再次出现新变化。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华战争规模进一步扩大，中国工农红军积极筹备开赴抗战前线。7月11日，驻在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电请中共中央先派先遣师东开河北，援助二十九军抗战。同一天，毛泽东、朱德致电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就改编具体问题进行磋商，提出：“第一步拟派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各改为团，加上骑兵团，编成一个小师先行派去，主力编成后去。请即令二十八军、三十二军两部加以训练，准备从他军补给该先去部队子弹；二十七军即开洛川，暂维交通。”[②]13日，毛泽东、朱德召开延安市共产党员和各机关工作人员紧急会议，号召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战前线”去。

14日，毛泽东、朱德电令红军各部：限10天内完成各项抗日准备工作，听候出动命令。并要叶剑英通过西安行营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

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惟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最好与长于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并愿意一部深入敌后打其后方。”[③]同时还要红军各路将领到云阳集中，讨论红军改编问题，并对红军参战、部队编制等做了周密的部署。聂荣臻回忆道：“到七月中旬，尽管同国民党政府的谈判还没有结果，我们已经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开始酝酿部队的改编工作，着手进行开赴前线的准备了。”[④]7月下旬，红军前方司令部在陕西泾阳县云阳镇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央军委以军为单位改组红军为国民革命军，限10天准备完毕，待命出动的指示。随着华北局势日趋严重，蒋介石仍不肯下达红军改编的命令，但几番催促红军迅速出动。7月28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决定："红军八月十五日改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但红军“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⑤]为解决红军开赴抗战前线后的战略战术问题，前敌总指挥部在云阳召开了红军高级干部会议，基本确定了“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的方针。

8月13日，日军突然向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战火燃烧到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蒋介石看到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已难避免，才勉强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所提的红军改编包括人数以及设立独立指挥机关等条件。

1937年8月19日，国共双方终于正式达成一致意见，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中共中央在8月21日至25日召开的洛川会议上，集中讨论了红军改编问题。[⑥]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8月25日正式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南京已开始对日抗战，国共两党合作初步成功。为着实现共产党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红军改名之保证，使红军成为抗日民族战争的模范，推动这一抗战，成为全民族的抗日革命战争，以争取最后的彻底胜利。特依据与国民党及南京政治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同时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

改编后的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第一百一十五师由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陕北红军第七十四师编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肖华，全师共1.55万人；第一百二十师由红二方面军第二、第六军团，第三十二军和陕北红军第二十七、第二十八军

等部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淇，全师共1.4万人；第一百二十九师由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一军和陕北红军第二十九、第三十军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全师共1.3万人。另总部直属队共3 000余人。八路军共4.6万人。与此同时，八路军供给部、卫生部和兵站部成立，赵尔陆、姜齐贤、杨立三分别任各部部长。

此外，以一百二十九师三百八十五旅（不含七百六十九团）为骨干，组成留守部队，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为加强对留守部队的统一指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延安成立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参谋长曹里怀，政治部主任莫文骅，下设东、西两个地区留守处。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在主力开赴抗日前线后，承担保卫陕甘宁边区，协同地方保安部队肃清土匪，发动与组织民众参加抗战及扩大与训练新战士、补充主力部队的重要任务。

1937年8月25日，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向南京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各行营主任、各省主席等，发出《通电》，“宣布就职”。《通电》指出：“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兹幸国共两党重趋团结，坚决抗战，众志成城。”并严正表示：“部队现已改编完毕，东进杀敌。德等愿竭至诚，……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而奋斗到底。”[⑦]8月26日，朱德、彭德怀签发《八路军总指挥部布告》，对全国庄严宣告：本军奉命抗日，为求民族生存，拥护中央领导，驱逐日寇出境，团结全国各界，联合法苏美英，保卫中华领土，收复失地完整。为了保证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8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主力开赴抗战前线情况下，中央决定前方设党的军委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九人组织之。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受中央军委统辖。”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受军委分会统辖。[⑧]

9月11日，八路军奉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令，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八路军政治部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

为加强全国的抗日斗争，八路军出师前后，分别在西安、太原、上海、南京、武汉、长沙、桂林、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重庆、广州、香

港、南宁、洛阳、贵阳等地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或八路军通讯处等联络机构。他们在宣传抗日、组织抗日力量、开展后方保障等方面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在华北战局危急的情况下，八路军不等改编全部就绪，就开始出动。8月22日，八路军第一百一十五师主力，作为抗日的先遣队，第一批从陕西三原出发，经韩城县芝川镇渡黄河，沿同蒲铁路北上，第一百二十师和一百二十九师也于9月初出动。

至此，中共中央红军改编完成，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终于获得了北上开赴抗战前线的机会，8月25日，八路军在云阳举行了庄严的誓师大会。随后，八路军主力三个师先后从山西汉城和潼关东渡黄河，兼程北上，开赴山西抗战前线。从此，抗日战场上又多了一支抗战的劲旅，中国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实践着他们在抗日通电中的誓言，愿为驱逐日寇保卫国家、民族独立流尽最后一滴血。

注释：

①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年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5～336页。

②《毛泽东、朱德致彭、任、邓电》，1937年7月11日。

③《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致叶剑英电》，1937年7月14日。

④《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2版，第338页。

⑤《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电》，1937年7月28日。

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7年8月23日。

⑦《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宣誓就职电》，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选集》第1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33～334页。

⑧《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前方设军委分会及军政委员会的命令》，1937年8月29日。

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前面爆发，中国共产党决定将工农红军改编并开赴抗战前线。为了将中共领导的军队建设成为“抗日的模范军队”与“全国抗日武装和人民大众团结的核心”[①]，1937年8月1日，中央军委做出了《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决定》加强了我党对八路军的政治上的领导，帮助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迅速适应了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新的政治形势。

中国共产党一向十分重视军队中的政治工作，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队伍，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此，革命的政治工作成为我军区别于其他军队的一个显著标志。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1931年2月17日，根据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在红军中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以统一并加强对全国各地红军的政治指导。1934年2月，周恩来、王稼祥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这一科学论断，使我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又有了新发展。[②]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国家和民族利益毅然决定改编工农红军，与此同时共产党人也意识到，在改编之后的八路军不仅是抗日队伍，同时也是革命的武装，将承担更重的责任，因此必须坚持加强政治工作。

此时，中共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在抗战全面爆发，红军改编的新形势下，如何保证八路军的建设方向，使这支军队成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抗战主张，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有力工具。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37年7月15日，毛泽东就指示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彭德怀，着眼于直接对日抗战，红军政治工作决定须加修改。[③]根据这一指示，总政治部于1937年8月1日作出《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

《决定》全文共分10个部分，对工农红军所面临的新形势以及在新的形势之下部队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方针政策和基本方法，做出

了全面的阐述和规定。

《决定》首先指出了华北事件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所面对的新形势的特点："第一，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停止了九年来的内战，在红军面前放着新的敌人——具有现代武装的日本帝国主义；第三，红军改名后，各种破坏者对于我们的破坏将必然采取更多更巧妙的方法。"在这一特殊的形势之下，部队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有三项：第一，一切工作为着积蓄与加强抗战的力量，保证抗战的胜利，"这一工作不仅在未加入作战前的每一分钟去进行，特别要抓住抗战中的每一空隙去实现。"第二，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依靠于党的领导的加强，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第三，提高部队的军事技术和战术，提高指战员的政治文化水平，迅速走上正规化的道路，并造就大批新的干部，使之适应于对日作战的需要。

《决定》特别指出了在红军改编之后，中共领导的军队内部可能出现的问题，我军由于"在某些制度上有了原则上的改变（如政治委员制的取消，政治工作地位在组织形式上的降低，采用官阶制度等）以及外来的影响，特别是军阀军队的影响的容易侵入，可以侵害这些光荣的传统"，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与各种不良倾向作斗争，这也是当前政治工作的重要责任。

《决定》阐述了这一时期红军政治工作中要注意的一个要点，"保证红军思想上的一致"。具体讲，即要避免左倾、右倾的错误情绪。左倾是指红军的关门主义的倾向，主要表现在："地方工作和友军工作束缚于狭小的范围内，不善于运用旧的形式来实现新的内容，对部队战士的要求过高以及个别同志对红军改编的怀疑等"。另外一种倾向则是影响更为恶劣的"右倾"情绪，主要表现为军阀主义的开始抬头与可能的发展，以及贪污腐化、动摇堕落，失掉阶级立场，易为外界所影响，对革命的厌倦和对抗战缺乏胜利的信心，而轻视党的政治工作，建立个人系统，忽视群众利益，侮辱战士等等。针对左倾和右倾的错误问题，我们只有用高度的警觉性和不断的正确的思想斗争，才能预防与克服这些倾向的产生与发展，才能保证红军的革命性和抗战伟大任务的完成。

另外，在《决定》中还具体指出了对战士和干部进行政治教育工作的总方针和应采取的六条措施。"政治教育工作的方针是教育战士和干部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忠实于劳苦人民的利益，忠实于共产党路线和主张，并依靠于军事政治教育的加强，创造大批的新干部，来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

围绕这一总方针，应该采取的六项措施有：第一，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进行民族的与阶级的教育，编订各种必需的教材。第二，确立统一的政治教育制度，分期推行。第三，除基本的系统教育外，应特别着重事实问题与具体策略的讨论，干部必须阅读并讨论党报《解放》的重要论文和实事述评。第四，提高文化水准，消灭文盲。第五，干部的教育采取轮换训练为基本方式，并加紧日常工作的学习。第六，教育的方式应采取“不求多而求深入”与“有计划的逐步提高”的原则，反对一般的条文化公式化与单板的死记的方法。

《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是红军总政治部根据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新形势提出的，在新的形势下强调了政治工作对于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和完成其他任务的重大作用，使全军充分认识到我们的军队如果没有党领导下的政治工作，就不可能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保证命令的执行，也不可能实现一切为了前线胜利的总目标而奋斗。《决定》为工农红军改编之后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保持我军的政治上的先进性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因为我军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加强党的领导，保持了革命军队的本色，才成为抗日战场上的生力军，才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可依靠的武装力量。④

《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颁布后不久，国共两党就红军改编问题正式达成一致意见，8 月 25 日，中国共产党正式颁布了整编命令，将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改编后为了保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权，1937 年 8 月 29 日，中共中央决定：八路军前方部队设立军委分会，朱德任书记，彭德怀任副书记，任弼时任秘书长，由中央军委领导，作为华北八路军最高领导机构。同时，在各师设立军政委员会作为这一级部队党的最高领导，受军分会领导。三个师的军政委员会组成分别是：一百一十五师为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周昆、肖华，林彪为书记；一百二十师为贺龙、关向应、肖克、甘泗淇、王震，贺龙为书记。一百二十九师为刘伯承、张浩、徐向前、陈赓、王宏坤，刘伯承为书记。与此同时，仍存在师党委会，是在同级军政委员会领导下，大体上只负责党务工作的组织。

红军改编后在政治工作的机构组织方面最大的变动是取消了政委制，并将政治部改为政训处，原各师政治委员改为政训处主任。这一变化使八路军思想政治工作和部队建设受到了一些损失。

按照《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中的精神与指示，八路军开赴华北战场之后仍十分重视部队政治工作，平型关战斗后，军委分会秘书长任

弼时派黄克诚到一百一十五师检查政治工作。黄克诚在检查中发现取消政委制后，政治工作显著削弱，军阀习气开始滋长，“即返回总政治部向任弼时主任作了汇报”，任弼时当时要黄克诚将到部队检查的情况及建议起草一份报告，并很快将之以情况反映报给中央。10 月 19 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联名提交《恢复军队政治工作及执行党代表制的意见》，文中指出：“部队改编，政治工作人员的公开地位降低，因而影响到政治工作人员积极性降低，政治工作已开始受到若干损失。而在各级指挥方面，仍有个别同志因改单一领导不大接受他人意见，多数单一首长感自己能力不够，致使军队建设上也受到某些损失。对此现象，我们认为除教育干部反对地位观念及轻视政治工作外，还需积极地从组织上得到适当的解决，以红军的传统，并以此传统影响友军。”因此建议：“（一）团以上或独立营执行党代表制度，争取党代表名义的公开。党代表的职权一般与过去政委相同，应是负责保证党的路线与上级命令之执行，领导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对党及政治工作有最后决定权力。（二）估计到山地游击战任务和方式，部队分开活动，旅应设政治处，负责旅政治工作之领导。（三）各营单独行动时，可临时派遣营党代表，并由团政治处分配一部分工作人员，在营代表或教导员指挥之下，进行政治工作。（四）师政（训）处改为政治部，连仍为指导员。”[⑤]10 月 22 日，张闻天、毛泽东复电朱德、彭德怀和任弼时指出：关于恢复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速令执行。唯党代表名义不妥，仍应为政治委员，等将来国民党采用党代表时，方可改为党代表。[⑥]

此后，部队团以上均设政治委员，营设教导员，连为指导员，政训处改为政治部。“政治委员应是负责保证党的路线与上级命令之执行，领导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对党及政治工作有最后决定权力”。[⑦]为了统一并加强前后方部队政治工作的领导，贯通前后方的联系，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总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所有八路军和各留守部队、医院、学校及边区各地区部队，全国各游击区部队的政治工作，均由军委总政治部负统一领导之责，[⑧]同时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任命聂荣臻为八路军第一百一十五师政治委员，关向应为一百二十师政治委员，张浩为一百二十九师政治委员。随后，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任命了各旅团的政治委员，政委制的恢复为加强党对改编后军队的领导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谭政在总结抗日战争时期恢复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制度时说：“事实证明，政治工作最好的组织形式，就是政治委员、政治机关、党的支部和党支部领导下的各种群众组

织，这样更好地实现了党与政治工作在组织形式上结合。”[9]

总之，在抗战形势更加严峻以及工农红军改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加强部队政治工作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作出了《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进一步加强了部队的政治工作，进一步阐述了政治工作的地位与作用，规定了政治工作的原则和内容，使我军的政治工作理论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正是由于对部队政治工作始终如一的重视，“八路军在抗战过程中，起了他在政治上、军事上和政治工作（包括地方群众工作）上的模范和推动作用，故八路军在全国人民和军队当中，有极高的威信。”[10]

注释：

①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02页。

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王主任的开幕词》，《红星报》第28期，1934年2月11日出版。

③⑤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第353～354页，第36页。

④《总政治部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选集》第1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05～311页。

⑦《关于恢复军队政治工作及执行党代表制的意见》1937年10月19日。

⑧《军委关于成立总政治部的决定》，1937年10月16日。

⑨谭政：《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回顾》，《八路军回忆史料》（3），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⑩任弼时：《山西抗战的回忆》，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6册，第51页。

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

1937 年 8 月淞沪会战爆发，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国共两党面对共同的敌人进一步加紧了合作谈判的进程。为了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问题，1937 年 8 月 22 日～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了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洛川会议是我党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之际召开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我党在全民族抗战新形势下的基本任务和各项具体政策。

1937 年 8 月，国共两党谈判关于红军改编问题基本达成一致意见，面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工农红军改编即将开赴抗战前线的新情况，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制定适应形势的新方针以及军事方针、作战指导原则和部署。于是，中共中央于 1937 年 8 月 9 日在延安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成员毛泽东、凯丰、张国焘以及各方面负责人董必武、郭洪涛、吴亮平、蔡畅、林彪、罗瑞卿、萧劲光、徐向前、罗迈（李维汉）等 19 人。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并初步形成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 8 月下旬的洛川会议作了充分的准备。

经过紧张的筹备，1937 年 8 月 22 日～25 日，洛川会议在陕西省洛川县城北 10 公里处的红军指挥部驻地冯家村顺利召开，当时之所以把会址选在处于国民党统治区的冯家村，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第一，冯家村交通便利，地形特殊，便于与会人员的集结和疏散。冯家村靠近咸（阳）榆（林）公路，交通便利，而且处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和红军前方指挥部所在地泾阳的中间位置，该地距延安 120 公里，距泾阳 200 公里左右，便于政治局委员和军队指战员参加会议。同时冯家村位于洛川塬上，四面沟壑，如遇紧急情况有利于隐蔽和撤离。第二，冯家村虽然是国民党统治区域，但是距离苏区很近，村北面几公里的地方就是苏区和国统区的分界线——介子河，如遇紧急情况，与会人员可快速撤入苏区，这进一步保证了与会代表的安全。正是基于这些方面的考虑，“党中央就在这样一个条件简陋的小村里，召开了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洛川会议。”[①]

洛川会议的会场设在冯家村西北角一所私塾里，周围的环境十分简陋。根据参加此次会议的抗大军政部主任傅钟回忆：“私塾的院子里，中间有个小花坛，院子的一侧有一株桑树，正当面是两孔砖砌的窑洞。毛泽东同志在私塾先生那孔窑洞里办公、居住，会间修订文件的同志也到那里去。另一孔窑洞是教室，中间放了些长的、方的、粗糙的、古朴的桌子，拼成整齐的一排，20 多个人挤在周围坐下，便算是会场了。”[②]由于这次会议研究的问题主要是我党在新形势下的政治和军事的方针政策，因此参加会议的代表不仅有政治局委员，还包括了军队的代表，共 23 人。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任弼时、关向应、凯丰、彭德怀，犯有严重错误、被解除军事职务、当时还是政治局委员的张国焘也到会了。另外到会的还有部分红军领导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刘伯承、贺龙、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张文彬、肖劲光、周建屏、林伯渠、徐向前、傅钟等。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李富春负责会议记录，大会主要讨论了政治任务问题、军事问题、国共两党关系问题。

作为会议主持人，张闻天在 8 月 22 日与 8 月 24 日都有较长的发言。其中对于当前新的政治形势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概括总结，特别指出群众运动的重要性，以及我党在领导群众运动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张闻天说：在当前日军大举进攻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应该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与国民党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要突破国民党的局限，积极领导群众运动，靠持续不断地发动群众来争取最后的胜利。要重视发动群众，要把我党：“坚持争取全面、全民族抗战的方针，坚持抗日十大纲领的实现，反对民族失败主义，向全国人民进行解释。”在发动群众过程中，应该看到：“群众中也有许多弱点，看不远，因此我们不能随着群众走，而是要以我们的观点去教育群众。”张闻天的讲话为我党在抗战时期如何开展群众运动提出宝贵的意见。

另外，会议还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首先分析了当前中国抗战的形势，一方面是日本蓄意扩大侵略，“芦［卢］沟桥事变的挑战与平津的占领，不过是日寇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整个计划的开始。”另一方面南京政府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已经开始定下了抗战的决心”，“七月七日的芦［卢］沟桥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在全民族抗战的大环境之下，“中国的政治形势也开

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实行抗战阶段。”在此阶段，各党派中心任务是争取抗战胜利，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变国民党发动的抗战为全民族的抗战。虽然在争取抗战胜利的过程中我们会遭遇各种困难，但是中国共产党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与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的前进与发展。”决定在最后还对共产党员及其领导的民众与武装力量发出了号召，号召党员及民众：“应该最积极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把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的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只要我们真的能够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的”③。

《中共中央公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正式文件也是由张闻天主持通过的，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十个方面的内容：（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总动员；（三）全国人民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六）实行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十）建立抗日的民族团结。④

会议讨论得最热烈的，是战略任务、方针、作战指导原则和部署等重大问题。毛泽东深入分析了中日战争中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情况，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总战略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胜利。”⑤在这场战争中红军的战略任务是：“（一）创造根据地；（二）钳制与消灭敌人；（三）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四）保存与扩大红军；（五）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其中前四条是要实现的，后一条是要争取的。另外，毛泽东还重点谈了红军的战略方针：“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这种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略下的“相对的独立自主”。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⑥关于开展山地游击战，毛泽东还明确提出了部队出动后应部署于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冀察晋绥四省交接地区而开展的建议。这一提议得到了张闻天等与会大多数代表的赞同，并最终成为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个重要的军事指导方针。历史证明，这一方针对于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和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都是十分正确的。参加此次会议的肖劲光后来回忆道：“洛川会议上在讨论军事指导方针中尽管意见不同”但“在以后抗日战争的实践中，逐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是高瞻远瞩的。”⑦

张闻天、朱德、任弼时等人对抗战的长期性和可能出现的曲折、危险，出师华北的战略部署和群众工作等问题，都发表了重要意见。张闻天说，要很好的使用我们的力量。红军是党军。抗日是持久战，“须知持久战包含进攻、防御与退守，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是一个艰苦斗争的过程”。[8]朱德指出，持久战主要是发动广大群众，首先是发动华北的一亿多人；军事上是发动游击战争。即使各友军都退下来，我们也能在华北坚持。[9]任弼时也谈到，抗战是长期的战争，红军要发挥自己进行山地战、运动战、游击战的特长，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力量消灭敌人，这关系到增强我们的领导和部队的扩大。

8 月 25 日，洛川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作总结报告，精辟地分析了日本进犯中国的近因及其前途。其中，完整地阐述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部分，也就是会议讨论并通过的主要文件《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毛泽东还做了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分析了在当前新形势下“国共合作”中如何处理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关系的问题。毛泽东提出在处理国共两党关系中应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应积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我们也要提高警惕，要保持我党的独立性，独立性包括“组织的独立性和政治的独立性”两个方面[10]。此外，中国共产党还要全面发动群众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做斗争，争取执行中共主张的全面抗战路线，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抗战的最终胜利。

也是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军委正式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宣布将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通过了朱德、彭德怀同志的《就职通电》、《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八路军抗日三大纪律》、《八路军抗日八项注意》等文件，为八路军开赴抗战前线制定了相关的制度和纪律。

在红军主力改编开赴前线后，为了保卫陕甘宁根据地的安全，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大会决定留下一支部队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使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大本营。这支部队被称为留守兵团，在后来保卫陕甘宁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会议决定进一步健全中央军委，委员由 10 人增加到 11 人，他们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毛泽东为军委主席。另，肖劲光为参谋长，杨尚昆为秘书长，聂鹤亭为参谋部部长，协助军委处理日常工

作。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还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军分会，同时建立长江沿岸委员会。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为委员；周恩来为长江沿岸委员会书记。

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历史转折关头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确定了建立统一战线的正确指导思想；在军事上制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深入敌后的战略任务，对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实现民族独立，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洛川会议上形成的一系列重要的决议，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为巩固两党合作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进行了政治和军事上准备，体现出我党促成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决心；另一方面，在统一战线内部我党强调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说明中共党经过10年的残酷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在政治上逐渐成熟。

注释：

①⑦《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02页，第204页。

②傅钟：《敌后抗战的开端——忆八路军总部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回忆史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页。

③④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326页，第327～330页。

⑤⑥⑩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4日，1937年8月22日，1937年8月24日。

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央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89页。

⑨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4日。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1937年8月22日～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个纲领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全面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主张，成为我党在抗战时期的总纲领，对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内政治形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卢沟桥事变、平津失守的之后，围绕着"争取抗战胜利"为中心，产生了一系列重要问题迫切需要解决，例如抗战路线、国共合作方针、军事战略、红军改编后的战略任务、作战方针和步骤等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1937年8月初在延安召开的政治会议后，在总结前一阶段我党抗战主张的基础上，由毛泽东负责草拟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抗战救国十大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对抗战初期所提出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路线、方针的一次概括性的总结，全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态度。七七事变后，根据当时的国内形势，共产党很快提出了为实现全民族抗战的各项主张。中共中央在7月8日发表的《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中号召实行全民族抗战；1937年7月15日，周恩来在庐山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付国民党。《宣言》一定程度体现出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政治方面的主张。紧接着，在7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提出了全面抗战的路线，《指示》主张实行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详细阐述了统一战线的内涵以及为了建立统一战线应该开展的各项工作，"使政府机构民主化，肃清一切亲日派汉奸分子，进行统一的、积极的、全面的抵抗。"①为实现全面抗战的路线，中共中央又在7月23日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系统地提出了实行坚决抗战的"八项办法"，在军事方面主张坚决抗击日军，提出："立刻命令冀察当局宋哲元等拒绝执行日本所提的三个条件，率领全部廿九军实行武装抵

抗"，"立刻派遣大军增援廿九军，并动员全中国的海陆空军实行抗战"；政治方面的要求："立刻实行全中国人民总动员"，给民众民主权利并且满足人民生活上的需要。同时立刻改革政治机构，使中央与地方政府民主化，立刻实现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以国共两党的合作为基础，创立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外交方面，中国共产党主张立即实行全面的对日抵抗，停止对日外交谈判。并立刻实现抗日的积极外交，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法西斯侵略阵线，同英美法苏等国订立各种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协定。《宣言》最后还进一步补充提出："立即实施财政经济土地劳动文化教育等各种新政策，以巩固国防，改善民生。"[②]同一天，毛泽东写了《论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分析了日军大举入侵的严峻形势下，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团结起来，实行坚决抗战的方针和办法以及争取胜利的前途。

在对前一阶段抗战纲领初步总结的基础之上，在1937年8月9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会议上，张闻天提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八大纲领"，进一步丰富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张闻天在《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中八项办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现"全国性民族抗战"的"八大纲领"。其要点为：一、停止中日和平谈判，宣布对日绝交，公布实行全国性民族抗战的坚决方针。二、动员全中国的海陆空军实行抗战。三、全中国人民的总动员。四、全面的对日抗战。五、改组政府组织。六、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七、实现财政、经济、土地、劳动、文化、教育的新政策，巩固国防，改善民生。八、实现抗日的积极外交。张闻天的发言提交大会讨论过程中，毛泽东提议增加为"十大纲领"，做一个"决议案"。他说，纲领、宣言上有"肃反"无"教育"，我的文章上有"教育"无"肃反"。现在我们要做一决议案，应做到尽有。所谓"全面的抗战"、"改良生活"要一条，"教育"要一条，原有八条再加上"坚决抗战"一条，"统一战线"一条则为"十大纲领"。[③]以张闻天的讲话为基础，结合毛泽东的意见，在8月9日政治会议后，毛泽东起草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8月15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完成，并于1937年8月22日～25日召开的洛川会议讨论后正式通过。

《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共分为十个部分，分别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实行抗日的外交政

策。六、实行战时的财政经济政。七、改良人民生活。八、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建立抗日的民族团结。全文1 000余字，逐一提出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政治、外交、教育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

《纲领》首先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大背景之下，中国共产党的对日态度，与国民党的一再妥协退让的态度不同，中国共产党坚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保卫华北与沿海各地而血战到底。为收复平津与东北而血战到底。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进而提出了具体的对日政策：“对日绝交，驱逐日本官吏，逮捕日本侦探，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财产，否认日本外债，废除日本条约，收回日本租界”。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共提出了具体的抗战方针，即进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在军事方面建议国民政府“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实行全国抗战”，并且“建立经常的国防会议，讨论与决定国防计划与作战方针。”为了调动全国军队的抗战积极性，必须“实现一切抗战军队的平等待遇。”在战略、战术等方面提出：“反对单纯防御的消极作战方针，采取独立自主的积极作战方针”，“建立全国各地军区，动员全民族参战，以便从雇佣兵役制转变为义务兵役制。”为了实现抗日战争的胜利，在发动全国军队的同时也必须调动全国民众的抗战积极性。就此问题，中共提出，全国人民无论什么阶级、民族，除了汉奸之外“皆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抗敌之自由。”为了保证这些权利和自由，当局必须“废除一切束缚人民爱国运动的旧法令，颁布革命的新法令。释放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开放党禁”，“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只有这样才能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形成“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的全面抗战局面，因此可见，实现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和人民的总动员是抗战胜利的必备条件。

《纲领》还提出了改革政治机构的要求，“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国防政府执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实行地方自治。”同时，必须“铲除贪官污吏”，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廉洁政府”。

在对外政策方面，《纲领》明确主张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时，与其他同样反日的国家如英、法、美、苏等国结盟，可以签订抗日军事协定，

“拥护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

《纲领》提出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时期可以实行“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这一经济政策的原则是“有钱出钱及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实施这一经济政策所应采取的措施“是整顿与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农产品的自给。提倡国货，改良土产，禁绝日货，取缔奸商，反对投机操纵”。

另外，《纲领》还指出，教育方面在课程设置等方面也应作适当调整政策，应该“改编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教育课程”，“实行全国学生的武装训练”。

最后，《纲领》特别强调了要“巩固后方肃清卖国贼和汉奸以及要实现抗日的民族团结”对抗战胜利的重要性。[④]

总之，《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全面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实行全面抗战路线的纲领，它把实行抗日和争取民主紧密地结合起来，争取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朝着有利于人民胜利的方向发展，其中确立的军事、政治等方面的方针对中国的抗战形势产生了重要影响。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对于中国来讲最重要的便是确立正确的军事方针，《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颁布后，中共在军事方面进一步明确并且执行了洛川会议及《纲领》中确定的军事方针。在1937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宣布改编之后，在9月12日、9月16日和21日毛泽东先后三次致电八路军，做出了关于八路军战略战术方面的指示，基本体现了我党在抗战救国纲领中在军事方面确定的方针。毛泽东在8月16日致林彪的电文中明确提出：“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⑤]在8月21日毛泽东给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的电文中明确了八路军在山西作战的部署时，也特别强调了坚持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战。[⑥]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认真执行了洛川会议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定的运动战与游击战的作战方针。在全国抗战时期，游击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保存和发展敌后地区人民抗日力量，消灭和驱逐日本侵略者，配合了正面战场的正规战争。这一战略方针的确立及执行确保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军队在抗日战场上保持主动性，也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政治方面，中国共产党为促成国民政府的改组，建立由各个政党参加的国防政府也作了大量的工作。在1937年9月25日，中共拟定了《中央关

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的草案》，提出在政治方面必须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转变为全民的统一战线的政府，要成立这样的政府，国民政府必须做到三项，其中最基本的是"接受本党所提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基本内容，依据此内容发布施政纲领。"[7]在改革政治机构、参加政权问题上，9月25日中央书记处就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发出一个决定草案，提出共产党准备参加全民族的统一战线的政府，但不参加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可见，中共在抗战时期对《抗战救国十大纲领》中路线和方针坚定不移地执行了，这些政治方针对抗战时期及抗战接受后我党赢得政治上的主动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在抗战全面爆发后，谋求建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政治工作的重点，特别是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发布之后，中共继续为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而积极努力，1937年8月的两党和谈中为与国民党达成一致意见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认真执行了《纲领》最后提出的"在国共两党彻底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下，国共两党最后终于正式建立了合作。

总之，《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在政治、军事各个方面的总纲领，一方面解决了抗战全面爆发时，面对新形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应该采取何种方针的问题；另一方面，《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提出，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国内的政治形势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各项政策的基本准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推动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到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选集》第1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1～293页。

②《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选集》第1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4～298页。

③据1937年8月9日张闻天在中央局政治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④《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解放》第1卷第16期,1937年9月13日出版。

⑤《关于我军应坚持以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方针的指示》,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选集》第1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38页。

⑥《关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选集》第1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39页。

⑦《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的草案》,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选集》(第1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第345~347页。



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

1937 年 8 月下旬，日军进占华北后又侵入国民党统治中心区域——淞沪地区，并对山西展开攻势，中国抗日战场的形势岌岌可危。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国共关于红军改编问题终于达成一致意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立即下令红军改编、开赴华北抗日战场。1937 年 8 月末 ~9 月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背负着民族的重任，携带着民族的希望，东渡黄河开赴抗战前线。

为了此次红军整编工作顺利进行，早在卢沟桥事变前，中国共产党及工农红军就已经开始多方面的筹备工作。1937 年 6 月，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和前敌政治委员任弼时接待国民党中央考察团时，就对红军三个方面军的领导干部进行了考察和了解，提出红军改编后干部配备的详细方案，包括改编后三个师及所辖各个旅干部的人选等内容。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了红军可以早日奔赴抗日前线，进一步加紧了出师前的准备工作。7 月 13 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抗战动员大会，号召共产党员和机关工作人员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去。7 月 14 日，毛泽东、朱德电令红军各部：限 10 天内完成各项抗日准备工作，听候出动命令。同时还命令工农红军开始进行战前的政治教育工作，例如编印《抗日紧急救援课本》、《抗日军人必读》、东北四省、华北五省地图等发给大家，在政治教育动员的同时让大家了解日军侵华的基本情况及中国被占领区的地理状况，为我军开赴抗战前线做准备。[①]与此同时，为早日拯救人民于水火，中共中央还多次向蒋介石表达了希望红军早日改编、开赴抗战前线的愿望。但是，在国共谈判过程中由于双方多有分歧，红军改编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面对日趋恶化的战场形势，无奈之下中共中央一度决定即使国共和谈无法达成协议，我军也将自行改编开赴前线。此后，随着民族危机逐渐加重，国共谈判出现了转机。1937 年 8 月 22 日，国民党终于同意了中共提出的关于工农红军改编的各项条件，并正式发布八路军改编命令，从此中国

工农红军终于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并得以开赴抗战前线对日作战。

改编命令宣布后，工农红军的主力部队先后在驻地召开整编、誓师大会，并先后开赴抗战前线。八路军一百一十五师早在改编命令宣布前就已经召开了抗战誓师大会，并做好了开赴前线的准备。1937 年 8 月 21 日，八路军抗日先遣部队的红军第一军团奉令换装，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百一十五师，并于改编的当天在陕西省三原县云阳镇云阳大操场举行了誓师大会。大会由一百一十五师三百四十三旅旅长陈光主持，首先宣读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和陕北红军第七十四师改编为八路军一百一十五师的命令。接着，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宣读抗战誓词，"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坚决抗战到底！为了抗日救国，我们已经奋斗了六年，现在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功。我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上前线去杀敌。我们要严守纪律勇敢作战，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完全肃清，誓不回家！我们是工农子弟兵，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利益，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反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和同志的指责。"② 誓词宣读完毕，又进行了出征前的政治总动员。誓师大会的第二天，一百一十五师在罗荣桓、陈光的率领下浩浩荡荡朝禹门渡口挺进。

9 月 3 日，继八路军一百一十五师开赴华北前线后，一百二十师也在位于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城西北 13 公里的庄里镇，向东靠近流曲的地方举行了"改编暨抗战出征誓师大会"。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及一百二十师主要军政人员都参加了大会。朱德在会上做了重要的讲话，主要向一百二十师全体指战员分析了抗战面临的紧迫形势，进行了出征前的总动员。另外，朱德还特别针对部分官兵对于换装产生的抵触心理和疑虑，向大家保证：虽然红军改编了，番号变了，军帽换了，但是有一条是不变的，就是这支军队仍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接着，贺龙师长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部队进行政治总动员："国民党的帽子我戴过将军服我穿过。今天国难当头，为了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愿带头穿上灰衣服，戴上白帽徽。别看我们外表是白的，可心里是红的，永远是红的。"两位红军重要领导人的讲话打消了官兵们关于红军改编问题的疑虑。接着，一百二十师进行了红军出征前的最后一次全师总动员。最后，全师将士庄严宣誓：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誓不还家！誓师大会后，一百二十师过合阳到韩城县芝川镇准备东渡黄河。③

最后进行整编的是八路军一百二十九师。9 月 6 日，一百二十九师在陕



西省泾阳县桥底镇冒雨举行了誓师大会。会场选在桥底镇的一片旷野，红军将士临时用几张木桌和几块木板搭了一个简易的阅兵台，为了烘托会场的氛围，还在会场张贴了很多的抗战标语。9 月 6 日清晨，一百二十九师近万人举行了誓师大会，当时虽天降大雨，但丝毫没有影响会场的氛围，时任八路军第一百二十九师第三百八十六旅旅长陈赓后来回忆道：会场上红军将士“人人精神奋发，口号震天，无有畏雨者”[④]。大会开始后，首先由师长刘伯承讲话。刘伯承简单分析了国内抗战形势之后，针对部分指战员对统一战线以及红军改编没有深刻理解的现象再一次进行了政治教育和动员，明确指出，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要将昔日屠杀和镇压我们的敌人当做朋友，因为：“现在大敌当前，国家民族危在旦夕”，“为了抗日救国，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进而针对红军将士不愿意换国民党军装、军帽的现象进行思想动员，自己身先士卒戴上国民党军帽，同时发布换帽的命令，一百二十九师全体将士立即脱下了红星帽换上了缀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国民党军帽。换装之后，第一百二十九师政训处主任张浩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授予红军十年纪念章，表彰了各部十年来的革命功勋，紧接着刘伯承率一百二十九师全体官兵宣读抗战誓词。1937 年 9 月 16 日，整编工作刚刚结束，一百二十九师就离开泾阳出师河东，准备开赴晋东北。[⑤]

一百二十九师誓师的前一天，1937 年 9 月 5 日，八路军总部在云阳镇的大操场举行隆重的抗日誓师大会。云阳镇位于陕西省泾阳县城东北约 10 公里处，北靠嵯峨山，东与三原接壤，西北则与淳化县一山之隔，是通往陕北的交通要道。誓师大会的会场贴满了“坚决拥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力保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等抗战标语。大会由邓小平主持，首先由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率全体指战员宣读《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全体指战员跟着一字一句地诵读。任弼时代表八路军政治部在大会上宣布了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三大纪律是：实行抗日救国纲领，服从上级指挥，不拿人民一点东西。八项注意是：进出宣传，打扫清洁，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物送还，损物赔偿，不乱屙屎，不杀敌兵。[⑥]接着，全体战士的代表讲话，表明了八路军全体指战员誓死杀敌的决心。群众代表讲话则主要鼓励八路军走上前线后多打胜仗，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八路军将士的殷切期望。最后当地国民党政府专员代表国民政府做了鼓舞全军将士的讲话，[⑦]整个誓师大会在庄严而热烈氛围中结束。誓师后的第二天，部队出发奔赴抗战前线。

根据同国民政府达成的协议，八路军整编后即开赴阎锡山负责的第二战

区——山西省。在八路军开赴山西之前，为保证军队入晋后顺利，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与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一百一十五师副师长聂荣臻、一百二十师副师长肖克、129副师长徐向前以及程子华、南汉宸等人先期到达太原，并在梁化之的陪同下赶到太和岭口同阎锡山会商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区域、作战原则、指挥等事宜。经过协商，阎锡山答应将以五台、阜平一线的11个县划为八路军活动地区，并同意成立统一战线性质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总动员委员会。

根据当时山西的形势以及阎锡山的态度，八路军入晋后的初步计划是：一百一十五师开赴晋北，一百二十师开赴晋西北，一百二十九师开赴晋东北，这样，八路军的三个主力师就可分别以太行山、五台山、吕梁山为依托，进可攻、退可守，又能相互联系、互相支援的贯穿山西全境，同时配合国民党军队抗击日军。按照这一设想，1938年8月末~9月初八路军出动到达华北后，计划参加南口战役配合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但是我军先头部队刚刚出动，国民党军队却已经从南口张家口一线撤退，而后，国民党军在沧州、涿州、大同部署防御阵线。孰料，国民党军统帅部却没有处理好这三个防线之间的关系，三条防线既无重点又漏洞百出，缺乏联系，在涿州和大同防线之间竟然露出一个长达200公里的裂缝，面对这一情况，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开赴察哈尔蔚县地区，填补空缺防止日军由此突破中国军队防线。但是，国民党军与日军刚刚交火就一溃千里，八路军还在行军途中，9月11日蔚县就已失守，八路军不得已只能再次调整作战方案。随着南口张家口的失陷，在平绥线上，天镇、大同相继失守，津浦线上，日军进攻泊镇、沧县；平汉线上，日军攻陷涿县，兵锋直指保定。

一路伴随着国民党军溃退的消息，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战场。作为八路军先锋军的一百一十五师在罗荣桓、陈光的率领下首先赶到禹门渡口，杨成武的独立团、师直机关和六百八十五团、三百四十四旅的两个团先后渡河。1937年9月3日，大军抵达晋西重镇侯马镇后，由于第二战区接待方面出现问题，一百一十五师没能乘坐火车，而是转乘汽车沿同蒲路日夜兼程向晋东北恒山山脉地区挺进，9月下旬抵达平型关一带，准备迎击日军。[8]

继一百一十五师渡河的是八路军第一百二十师，9月3日，在贺龙、关向应的率领下一百二十师主力从富平出发，过合阳到韩城县芝川，1937年9月8日东渡黄河，13日到达山西侯马镇，在侯马乘火车直奔太原抗战前线，19日达到榆次，驰援雁门关国民党军队。

最后渡河的是八路军一百二十九师，1937年9月16日，一百二十九师



在刘伯承、张浩的率领下在韩城县芝川渡过黄河，并于当晚到达山西省荣成县新宿营，第二天从新宿营出发，两天后到达了侯马镇。在侯马，一百二十师收到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派人送去的弹药和粮食，乘坐火车直抵太原，主力开赴正泰路南侧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

在一百二十九师渡河前一天，1937 年 9 月 15 日，八路军总部在朱德、任弼时、左权的率领下，渡过黄河，21 日抵达太原，23 日进驻山西省五台地区，在抗战前线直接指挥八路军作战。

八路军主力三个师及总部在渡河西进沿途受到了各地民众的热烈欢迎和支持，群众们热切盼望中国共产党率领的部队可以早日与日军交战、收复失地。一百二十九师在侯马车站就遇到了大量民众，“群众祝愿我们能挡住日军，使家园免遭战火。由许多送茶水的，端糖果和中秋月饼等慰问品的，挤上去塞到战士手里，递到战士嘴边，其亲切之情在别的军队是见不到的。”⑨群众的鼓励和支持为八路军将士提供了巨大的精神鼓励。

面对日寇的猖狂进攻和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1937 年 8 月末 ~9 月初，八路军主力各部先后渡过黄河开赴抗战前线，并立即投入战斗，取得了一些战役的胜利，振奋了中国人民抵抗日寇的信心，八路军也成为了抗日战争中的一道亮色。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年谱》，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338 页。

②田国浩：《三原誓师》，《星火燎原》（五），战士出版社，1981 年版，第 3 页。

③《廖汉生回忆录》，八一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94 ~ 195 页。

④《陈赓日记》，战士出版社，1982 年 8 月版，第 10 页。

⑤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百二十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 3 ~ 6 页。

⑥杨实编：《八路军的战斗经验》，扬子江出版社，1938 年版，第 73 ~ 74 页。

⑦⑨傅钟：《敌后抗战的开端》，《八路军回忆史料》（上），解放军出版社，1989 年版，第 63 页，第 65 页。

⑧杨成武：《初上抗日前线》，《星火燎原》（抗日战争回忆录专辑），战士出版社，1981 年版，第 17 ~ 21 页。

平型关战役

1937年8、9月间，八路军开赴山西之时，正是前线国民党军队与日军战事进行得最为激烈的时刻。日军已占平津，并迅速沿平绥路西出南口，向晋绥奔袭，先后占领了南口、张家口、大同等地，战火蔓延到了山西境内。在此危急时刻，八路军一百一十五师出征山西，并于平型关首战告捷，对山西战场形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山西省位于中国的腹心地带，是中国东西部交界地区。山西省内山脉众多，东屈太行山，西有吕梁山，北亘北岳恒山、五台山，南耸中条山，中立太岳山。这些山脉形成了天然屏障。如得山西进可攻，退可守，因此自古以来，山西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中国军队守住这一战略要地，就可对平津地区的日军形成威胁，并且利用山西易守难攻的地理特点确保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全，同时还可对入侵华北地区的日军和继续南下的日军构成威胁。而日军为了确保平津地区的安全，并从右翼配合日军华北方面军平汉路的作战，也必须占领山西，为此日军十分重视山西境内的作战，并派出了日军小有名气的板垣征四郎的华北方面军第五师团。板垣征四郎是一个著名的中国通，早在1929年就在关东军任参谋，当时是大佐军衔。九一八事变之后，他曾代表关东军同溥仪谈判，参与伪满洲国的建立，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板垣征四郎已经升任中将师团长。由于长期接触日本侵华事务，板垣对中国情况十分熟悉。板垣本人具有强烈的武士道精神，其带领的部队也以作战顽强而著称，后来的战况也证明板垣的第五师团确实是一个凶猛的劲敌，派此人进攻山西，可见日军对其重视程度。

1937年9月中旬，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五师团在师团长板垣征四郎的指挥下，由宣化、逐鹿南下，并在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的配合下，很快占领了晋东北的广灵、浑源和灵丘。下一步日军意在突破平型关要隘，直逼太原，从右翼配合华北方面军主力在平汉线的作战，山西形势十分危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通过对战场形势分析，提出日军入侵山西必取太原，



而想攻下太原，必先夺取大同或平型关，因此首先布置了大同会战的计划。然而事与愿违，虽然国民党在山西布置了十多万人的军队组成了几道防线，但是仍然被只有三万多人的日军层层突破。大同失守，无奈之下，阎锡山只得立即布置平型关战役，并希望刚刚进入华北的八路军可以配合国民党军队在平型关一带执行防御任务。而根据中共与国民党达成的抗战协议，八路军在战略上配合国民党军队，但是战役上不受其指挥，应该跳到敌人的后方开展游击战。但此时日军进逼太原，山西危急、华北危急，中国共产党在综合分析了各方面形势之后，毅然决定，在此民族危亡之时冲到抗战的最前端，配合友军作战，阻击日军。

作为八路军的先头部队，一百一十五师最先从陕北出发渡过黄河，在9月下旬进入晋东北抗日前线。到达这一地区之后首先遇到了大量国民党的溃兵，“一批又一批的溃兵，用步枪挑着子弹、手榴弹和抢来的包裹、母鸡等等东西，像潮水般地涌下来。”[①]沿途尽是一片破败的景象，但是八路军并没有受这种惶恐情绪的影响，继续向抗战的最前方开进。部队行至平型关附近，一百一十五师师长林彪在经过勘察地形后，决定就在此地伏击日军，同友军配合作战。具体的作战计划是：国民党军坚守平型关正面，八路军一百一十五师隐蔽集结于日军前进道路侧面，由侧后方伏击敌人。之所以选择在平型关与日军交战主要是因为平型关一带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平型关位于山西省东北部，是雁门十八关隘之一，因地形像瓶形，古时称瓶形寨。平型关是晋东北的一个咽喉要道，两侧峰峦迭起，陡峭险峻，道路崎岖。关前是一条由西南向东北延伸的狭窄沟道，这是日军进入平型关的必经之路，尤其是关沟至东河南镇之间长约13公里的地段，沟深道窄，最宽的地方只能通过一辆汽车，路北山高坡陡，路南侧山低坡缓易于部署部队进行伏击，此地是伏击歼敌的理想之地。

平型关战役计划制定后，林彪立即电告中央军委，并很快得到批准。1937年9月23日，朱德、彭德怀向第一百一十五师下达了的命令：“一一五师应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同一天中午，一百一十五师连以上干部齐聚在一个农家小院里，进行战前动员，一百一十五师师长林彪首先介绍了敌情，分析了这次与日军作战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副师长聂荣臻做了政治动员，最后由林彪下达作战任务，具体部署是：以师独立团和骑兵营安插到灵丘——涞源——广灵之间的地区，钳制和阻击敌人增援部队；以三百四十三旅两个团担任主攻，第六百五十八团占领

关沟至老爷庙以东的高地，截敌先头部队；第六百八十六团占领小寨至老爷庙移动高地，分割歼灭沿公路开进之敌，以第三百四十四旅，第六百八十七团占领西沟村、蔡家峪、东河南村以南高地，断敌退路并阻敌增援；第六十八十八团为预备队，置于东长城、黑山村地区，随时准备支援。9 月 23 日阎锡山第六集团军为八路军送来日军进军的情报，24 日又送来了平型关出击计划，说明国民党军队主要负责正面防御，并派八个团由平型关西北出击，要求一百一十五师按计划西南出击。

1937 年 9 月 23 日，一百一十五师主力出发，连夜赶到上寨、冉庄待命。24 日傍晚，林彪和聂荣臻下达了各旅团出击的命令，第三百四十三旅于 24 日晚 24 时出发进入白崖台一线阵地埋伏，第三百四十四旅随后跟进。按照命令，八路军一百一十五师于 9 月 24 日午夜冒大雨从营地出发，整个行军过程异常艰苦。根据聂荣臻回忆："那天夜里，天下起了倾盆大雨。干部士兵们既无雨衣，又缺御寒的服装，只得任凭秋雨湿透征衣，沿着崎岖的山沟向前行进，最糟糕的是山洪暴发了，湍急的山洪咆哮着，盖住了哗哗的雨声。大家只得把枪和子弹挂在脖子上，手拉手结成'缆索'，或者拽着马尾巴从激流中趟过去。"②八路军克服重重苦难，黎明前进入了预定的伏击地点，平型关至东河南镇间 20 华里的山沟，做好了战斗准备。

1937 年 9 月 25 日上午 7 时许，日军板垣征四郎率领的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的辎重和后卫部队乘 100 余辆汽车由西向东开进了一百一十五师的伏击圈。由于前一天刚刚下过雨，道路泥泞，日军的几十辆汽车在兴庄至老爷庙之间停了下来，后面的敌军不清楚前面的情况，仍然向前拥，一时间人马车炮挤成一团，十分混乱。③一百一十五师抓住战机，突然之间全线开火，发动进攻，第六百八十五团迎头截击日军，歼灭日军先头部队并封闭了日军向南逃窜之路。隐蔽在蔡家峪与西沟村之间的六百八十七团，迅速抢占了韩家湾北侧高地，切断了日军的退路。至此，日军被四面包围，压缩在狭长的峡谷之中，八路军利用优势地形从制高点向日军射击，日军伤亡惨重。但是板垣二十一旅团是一支非常有战斗力的部队，"他们从最初的懵懂中一清醒过来，其骄横、凶狠、毒辣、残忍的本性就发作了，指挥官举着军刀拼命地嚎叫着，钻在汽车底下的士兵爬出来拼命往山上爬。"④意图占领老爷庙制高点突出重围，均被控制老爷庙高地的六百八十六团击退。在此期间六百八十六团还打退了占东跑池日军的回援。蔡家峪以东日军一部与小寨以南日军会合后，在六架飞机的掩护下回援被围的辎重部队，一度妄图为被围日军杀出



一条活路，但是由于短兵相接，两军处于胶着状态，飞机轰炸无法锁定目标，因此飞机转了几圈也未投弹。在多次打退日军进攻后，六百八十六团乘胜由高地冲向公路，与六百八十五团相互配合，与日军展开了肉搏战，将日军横腰拦截并且分割成小块，逐一歼灭。平型关之战以八路军的绝对胜利而告终。

平型关大捷，共歼敌 1 000 多人，击毁日军汽车 100 辆，大车 200 辆，缴获步枪 1 000 多支，轻重机枪 20 多挺，火炮一门，战马 53 匹，另有其他大量战利品。⑤此役敌板垣师团二十一旅团遭歼灭性打击。同时八路军也第一次体验了日军作战的顽强。据时任一百一十五师副师长的聂荣臻后来回忆，25 日中午，在战役即将结束之时，他视察战果的时候："还碰到一个日本兵，躲在山洞里面向战士们放冷枪，战士们对着山洞用中国话喊：'缴枪不杀！'他以枪弹回答，死不投降。由于敌人拼死抵抗，也使我军遭受巨大伤亡，战役进行得十分惨烈。六百八十五团团长杨得志回忆，六百八十五团二营五连连长曾贤生在白刃格斗中，一个人刺死十几个鬼子，用最后的一枚手榴弹与一个鬼子同归于尽，战斗中指导员身负重伤仍然坚持指挥战斗，"排长牺牲了，班长顶替；班长牺牲了，战士接着指挥。就这样前赴后继，打到最后全连就剩下三十多位同志，却仍然顽强地坚持战斗。"⑥

虽然在整个抗日战争历史上平型关一役不是大仗，但它带给全国的巨大震动并且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首先，这是中国抗战开始后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它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人心，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卢沟桥事变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南口、张家口相继失守，淞沪战场频频告急，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就在全国上下一片悲观之时，中共领导的军队首战告捷，这场胜利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及中华民族必将取得胜利的信心，在平型关获得重大胜利的消息传遍全国之后，全国各界人士和团体给发来了大量贺电、贺信。

第二，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八路军的武器装备远远不如国民党军队，但是这支军队可以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主动出击迎战日军，并且首战告捷，极大的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为八路军赢得了威信。特别是给那些饱受日军蹂躏的华北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使全国人民认识到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可以信赖的，为后来中共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第三，通过平型关迎战日军，中共领导的军队也在实际战争中积累了经验，逐步完善了党对领导抗日战争的军事指导思想。对八路军来说，同日本军队作战是一次新的考验，红军虽然已有十年内战的经验，但从来没有同具有现代军事装备的日军交过手。八路军的作战方针虽已在洛川会议上确定下来，但还需要在实战中进一步充实、检验和完善。毛泽东根据平型关战斗的经验，在1937年9月29日进一步提出了八路军的作战方针："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不仅又把这一战略思想概括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⑦

第四，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阻滞了敌人的进攻，迫使敌人进至浑源和保定的一部分兵力转移到平型关方向，因而有力支援了平汉铁路和同蒲铁路友军的作战。但是，由于敌我实力悬殊，国民党军队抗战组织不力，平型关大捷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整个战局，板垣征四郎很快再次调集兵力最终攻占了平型关。⑧

第五，平型关战役是国共合作，共创民族抗战伟业在战役上配合的典范。战前，阎锡山把指挥部设于岭口，与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副总指挥彭德怀共商作战计划；阎锡山还接受周恩来建议，建立战地动员会。会战中国共两党军队配合作战，国民党军正面迎敌，八路军侧后方配合阻击，体现出民族团结，共赴国难的精神，为新形势下第二次国共合作积累了经验，为进一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树立了模范。

注释：

①②《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2版，第347页，第352页，第399页。

③李天佑：《首战平型关》，《星火燎原》（五），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14页。

④杨得志：《出师大捷——回忆平型关之战》，《八路军回忆史料》（上），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页。

⑤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39~40页。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

⑧《杨得志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260页。



广阳两次伏击战

平型关战役结束后，日军大规模入侵山西，1937年9月下旬，日本察哈尔兵团由茹越口等关口突破了国民党军防线，进逼太原。10月1日，日军大本营命令华北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在山西省北部作战占领太原”。[①]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决定在忻口组织正面防御战。为支援国民党军保卫太原，八路军第一百一十五师在平型关战役后经短暂休整立即出动，1937年10月下旬，于广阳两次伏击日军，重创日军二十师团辎重部队。

执行广阳伏击任务的是八路军包括师部及三百四十三旅在内的一百一十五师主力。平型关战役后，一百一十五师肩负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和继续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双重任务。因此，经八路军总部研究决定将一百一十五师兵分两路，一部由林彪率领，包括一百一十五师师部和三百四十三旅，南下正太路，与一百二十九师配合支援国民党军忻口正面战场，在“灵丘上寨镇附近，小部经廊下去扰乱灵丘、涞源之敌”。另一部由聂荣臻率领包括三百四十四旅和独立师，“第三百四十四旅在阜平东北随时准备南移。预备旅相继袭击由灵丘、平型关西进或由涞源向平汉路南进之敌。在可能条件下，组织有力的挺进游击队深入易县、紫荆关、魏县、涿鹿之间活动，收编散兵，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②]以开创晋察冀根据地。

五台山分兵后，林彪率领一百一十五师主力由五台山南下，正当该师开进时，1937年10月26日，防守娘子关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溃退，日军占领娘子关后继续西犯。沿昔阳、广阳西进的南路日军在昔阳以东虽屡次遭到八路军第一百二十九师伏击，却仍向西进犯，并企图攻占榆次。此时，第一百一十五师已经到达平定西南地区，为了阻止日军向榆次地区进犯，三百四十三旅经过几天急行军，10月30日，终于到达正太路以南的沾尚地区，待机打击日军左翼进犯之敌。一百一十五师抵达沾尚之时，日军第二十师团在川案文三郎的带领下已经占领了平定及其以南的白家掌一带。一百一十五师指

战员从前方战场的形势以及正太路以南的地形分析，日军左翼必经沾尚、松塔向榆次开进，为配合忻口正面战场，师长林彪决定在沾尚镇与松塔镇之间选择有利地点相继伏击日军。[③]

经过实地勘察，林彪将伏击地点选在了沾尚镇至松塔镇之间的广阳。当时的广阳是个不到200户人家的小村镇，处在崇山峻岭包围之中，附近都是南北走向的山岭，而且沟壑纵横，有的山沟长达几十里。从沾尚经松塔途经广阳只有一条碎石泥结公路，为日军的必经之路。由于年久失修，加上山洪暴发，沙石冲击，这条公路已经破坏得不成样子，“似路非路，似河非河”。[④]一百一十五师指战员经过实地考察认为，广阳地形复杂，有山有沟又有树木为掩护，便于部队隐蔽和运动作战，同时这一地区道路狭窄难行，沟深林密不便于日军机械化运动，日军空中优势也很难充分发挥，因此从地理位置及周围环境来分析，广阳都是伏击日军的一个理想的地点。

伏击地点确定后，又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将担任此次作战任务的三百四十三旅分成两部，首先以第三百四十三旅六百八十六团的一个营在昔阳城西马道岭地区节节抗击，拖延日军行进的速度，争取时间。同时第六百八十五团、第六百八十六团主力在广阳地区设伏，最终将二十师团辎重部队消灭于广阳我军的伏击圈内。计划制定后，一百一十五师指战员静待日军出动的消息，以便进一步行动。

11月2日，日军第二十师团第四十旅团先头第79联队主力逼近马道岭，由于一百一十五师六百八十六团第二营的阻击，日军行进速度十分缓慢，一天只能开进七公里，为三百四十三旅主力布置广阳伏击战赢得了时间。第三百四十三旅则抓紧时间迅速占领了广阳及其以东道路两侧的有利地形，并根据前方2营传来的战况结合广阳地形特点，完成了伏击作战的具体部署。以六百八十六团的一、三营为主要突击部队，进入前小寨、离村以北高地，六百八十五团进至狼沟北山，除主力一部配合六百八十六团出击外，其余部队主要任务是打击日军回头增援的兵力。11月3日夜，三百四十三旅提前进入阵地，形成包围圈，静待敌人到来。

就在一百一十五师广阳伏击战准备基本完成之时，1937年11月4日，八路军总指挥朱德与副总指挥彭德怀指示林彪，一百一十五师应加紧对沾尚、广阳敌之侦查，如该敌西进时，陈光旅（三百四十三旅）应积极迟滞该敌，同时命令一百二十九师以小部向昔阳迟滞敌人外，主力应准备迅速与一百一十五师靠拢，并利用松塔、广阳、大小寒口一线有利地形消灭该敌由



林师长按具体情况决定，迅速通知一百二十九师，并由林彪统一指挥。林彪接到命令后，立即要求一百二十九师三百八十六旅向一百一十五师靠拢，以配合一百一十五师给予日军更大打击。至此，广阳伏击战准备就绪，只待敌人钻进包围圈。

11 月 4 日早上 7 时，日军在山道上出现，因为在平型关吃了苦头，所以日军此次行军十分谨慎，加大了侦查力度，骑兵部队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主要负责侦查搜索，随后是主力部队，有步兵、炮兵和少量装甲车。整个队伍行进顺序经过周密安排，前有骑兵开路后有步兵保护，辎重部队被夹在中间，同时天上还有飞机负责侦查和掩护。但是，由于山路狭窄，路况较差，辎重部队行进不便，整个队伍行进十分缓慢。

而此时三百四十三旅官兵正在各自的伏击地点密切关注日军的动向，日军每通过一个地方，一百一十五师观察哨就甩动帽子或摇动树枝发来信号。至中午，日军二十师团主力 4 000 多人大部分进入了三百四十三旅的伏击区。面对在狭窄山路上缓慢行动的日军长蛇阵，一百一十五师指战员分析：如我军伏击队伍中间部分，前面部队想要回头援助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对我军威胁不大，而后续队伍的增援将对我军造成威胁，所以此次伏击战只有后续部队人数较少时，我军才有必胜的把握。一百一十五师只能静待二十师团的 79 联队后卫队离开沾尚，日军的辎重部队进入我军包围圈才能开始伏击。下午 3 点多，行进的日军先头部队已经达到松塔镇，后面的部队还在广阳附近缓缓前行。就在二十师团辎重队终于完全爬进了我军所设的包围圈之时，三百四十三旅指挥员当机立断，立刻发动进攻。六百八十五团与六百八十六团各路伏兵从山间、林中冲出，一时间机关枪、步枪声，手榴弹、迫击炮爆炸声响成一片。面对突然袭击，日军十分惊慌，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队伍就被压在山沟里，进退维谷，加上辎重部队有很多装甲车和骡马，行动不便，队伍在我军的进攻下霎时就变得七零八落，人仰马翻。在忙乱了一阵后，日军逐渐清醒起来，利用山沟洼地进行抵抗。我军战士在公路上将日军切成数段，分别围歼。一部分战士火力掩护，另一部分战士冲向山谷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战，八路军奋勇杀敌，日军负隅顽抗，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

经过半个小时的恶战，枪声渐渐疏落下来，山谷中大部分日军被消灭，只有少数还在垂死挣扎。为迅速消灭此小股敌军，六百八十五团战士们兵分两路，一部分从正面用机关枪向敌人扫射，另一部分绕到土岔村和广阳村北面在敌人背后扔手榴弹，很快这一小撮敌人被消灭。天黑后，我军部队进入

了广阳镇，最后消灭了镇内占据几栋民房与我军对峙的少数几名日军，一百一十五师第一次广阳伏击战结束。

经过四小时的激战，三百四十三旅将士们将进入伏击圈的敌人全部消灭。这次伏击战，八路军共歼灭日军近 1 000 人，缴获骡马 700 余匹，步枪 300 余支，以及大批军需物资。八路军也付出了一定代价，伤亡 200 余人。

在这次战役中，三百四十三旅参谋长陈士榘带领一支小分队还俘虏了日军 79 联队辎重兵曹加滕幸夫，并获得了二十师团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军事情报，据加藤供述，川岸第二十师团辎重队大多数是朝鲜人还有很多满洲人，日本人只占 1/3。当天，在师长林彪得知二十师团只不过是杂牌军后，专门致电一百二十九师，希望能与一百二十九师配合歼灭敌人，进一步扩大战果，届时，一百一十五师将担任追击监视敌人的任务。具体计划是：陈光旅尾随敌跟进，袭击与抑制该敌。此时一百二十九师三个团应留一个营附电台，监视与阻滞昔阳方向之敌，余两团及两营应于 4 日 4 时赶至广阳村，埋伏待敌。

而此时的日军虽然二十师团的尾部的辎重队被歼，但是由于忻口前线急需增援和后勤补给，为了避免贻误战机，日军二十师团的先头部队仍然大踏步地向太原推进。11 月 4 日，川岸师团的指挥机关和直属队在东塔镇过了一夜，5 日凌晨继续西行。5 日上午 7 时，川岸来到松塔镇以西两公路处，再次遭到一百一十五师伏击。这时，日军的前锋山下第四十旅团才回兵救援，5 日上午 11 时，山下率兵赶至松塔镇以西地区，被围师部才得以解围。黄昏时分，山下收拢部队在东塔镇过夜，当晚遭到八路军小分队多次偷袭，日军十分疲乏。

日军遭到一百一十五师连续打击后，不敢冒进，将进至松塔的两个联队于 11 月 6 日撤回广阳，以接应由昔阳以西的沾尚镇西进的后续部队。11 月 7 日，川岸师团又进入了一百二十九师在广阳以东的大寨口、中山村、户封村等地所设的伏击圈。参加此次伏击的我军部队包括第三百八十六旅、第三百四十五旅的七百六十九、七百七十二、七百一十一三个团，由一百二十九师第三百八十六旅旅长陈赓负责指挥。战前，一百二十九师根据前线传来的情报已经得知，受到一百一十五师打击的川岸师团先头部队“约八百人，附炮兵”，并有骡马五百余，满载辎重，11 月 7 日“由松塔镇向广阳回进，



黄昏时以一部渡河，企图占领由广阳至安丰之隘口。估计为敌之掩护部队。”[⑤]依据敌情，一百二十九师立即决定，以七百七十一团隐蔽在明水头、瑶村一带，七百七十二团隐蔽于安丰及马威岭。另外在沾尚还有七百六十九团之侦察队，土岔、胡丰一带还部署有我军的便探，以便随时侦察敌情。部署完毕后，一百二十九团静待川岸师团先头部队进入包围圈。

11 月 7 日下午 1 点左右，敌人先头部队到达广阳并逐步进入我军伏击圈。5 时许，当由沾尚镇西进的日军先头部队基本进入大寨口、中山村、户封村伏击区时，设伏部队迅即发起攻击，七百七十一团利用广阳地形的优势打击进犯日军，七百七十二团也主动出击以牵制广阳之敌。而日军由于4 日前刚刚在广阳遭到一次伏击，同时此次敌人事前做了一些准备，因此在与我军接火后，并没有过于慌乱。日军很快占领土岔一带房屋及沟北高地，并且以炮兵火力封锁进入沟内的道路，我军指战员根据战场形势在取得一定战果的情况下，主动撤出了战斗。此次伏击战，敌我双方经过 1 小时激战，我军歼灭日军 250 余人，另外还缴获了一些武器和物资。

经过广阳地区的两次伏击作战，八路军第一百一十五、第一百二十九师共歼日军千余人，更重要的是迟滞日军进攻太原的行动达一周之久，并使敌军左翼部队处于全线混乱状态，从而援助和掩护了防守娘子关地区的国民党友军的安全撤退。[⑥]

然而，就在八路军一百一十五师、一百二十九师，广阳两次伏击战取得一定战过后，国民党却放弃了太原，11 月 4 日，日军已经从东、南两个方向接近了太原市郊，11 月 8 日，板垣师团占领了太原。次日，一百一十五师主力接到中央军委的指示，在林彪的率领下南下，进入吕梁山，准备开辟晋西南抗日根据地，此后八路军一百一十五师将士们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敌后游击战中继续战斗。[⑦]

注释：

①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1），中华书局，1979 年版，第 355 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 174 页。

③⑦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86 页，第 186 页。

④陈士榘：《威震广阳》，《八路军回忆史料》（上），解放军出版社，1989 年版，第 269 页。

⑤《陈赓日记》，战士出版社，1982 年版。第 29 页。

⑥左权：《坚持华北抗战两年中之八路军》，《八路军回忆史料》（上），解放军出版社，1989 年版，第 41 页。

一百二十师建立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1937年9月初，八路军第一百二十师在陕西庄里镇举行抗战誓师大会后，即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按照洛川会议的战略部署，八路军各部此次作战的共同任务是“创建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敌人，配合友军作战和保存与扩大自己，争取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领导权，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①]为了保证这一方针的实施，中央军委决定，继一百一十五师开赴山西之后，一百二十师东渡黄河开赴恒山山脉创建抗日根据地。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在山西抗战不利，日军挺进神速，中央立即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很快调整了这一部署。一百二十师最终进入山西北部，并创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1937年9月，当一百二十师到达侯马时，日军已经占领了察南、晋北和河北省的沧县、保定等地，并继续分兵南下，“以大迂回的姿态，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线中央军而最后击破之，夺取黄河以北。”根据山西战场形势的变化，中央军委对战局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恒山山脉必为敌军夺取晋察冀三省之战略中枢。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在上述敌我情况下，已根本不适用了。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而“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②]经过对山西抗战形势以及晋西北重要地理位置的综合考虑，中央军委决定一百二十师转至晋西北管涔山地区并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晋西北管涔山地区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东起同蒲路北段，与晋察冀北岳区相接；西至黄河，与陕甘宁边区隔河相连；南至汾（阳）离（石）公路，与晋军驻区毗邻；北至清水河，与大青山区连接。另外，该地区丘陵起伏、沟壑纵横，地形地貌相当复杂，有利于建立根据地，开展山地游击战争。同时，晋西北地区也是党中央与晋察冀等根据地联系的唯一通道，因此，控制晋西北地区对整个华北战场都十分重要。

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对于开辟晋西北根据地工作十分重视，为了进一步

明确一百二十师开赴晋西北后的战略部署，1937 年 9 月 17 日，毛泽东专门致电彭德怀，提出“贺龙部应位于晋西北，处于大同、太原之外翼，向绥远与大同游击，方能给敌南进太原以相当有效的钳制。”所以，“贺师应速赴晋西北占先着。将来刘师可与林师靠近，位于晋南太岳山脉至吕梁山脉（吉县汾河间）”。[③]9 月 20 日，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由太原到忻县与一百二十师师长贺龙会晤，商讨怎样执行毛泽东的指示，经过反复研究，最后形成了关于一百二十师详细的战略部署，其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一百二十师应立即进入晋西北的管涔山区，以宁武、神池为中心，在五寨、岢岚、岚县、河曲、偏关、保德等地区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还应派部队前出雁北。第二，从战争全局需要考虑，派王震旅东进到五台山以北的豆村镇一带相机作战。根据这一部署，9 月 22 日，王震首先率 359 旅开赴管涔山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为开辟根据地做准备。

此时，山西战场形势进一步恶化，大同、浑源、灵丘纷纷失陷，茹越口被日军突破，国民党军防线一溃千里。山西形势十分严峻，沦陷区的社会秩序也陷入混乱之中，“政权被敌人摧毁了，地方官吏逃亡了，汉奸政权——维持会产生了，而溃兵又到处骚扰，居民惶惶不安。这种情况，使晋西北前线和接近前线的后方，成了一种非常混乱的局面。”[④]

面对严峻的战场形势，9 月 28 日，一百二十师军政委员会在神池县义井镇召开会议，决定将三百五十八旅分为三路执行开创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任务，第一路以三百五十八旅七百一十六团 2 营为骨干，编成独立支队，由七百一十六团团长宋时轮率领，北出长城，在朔县以北、同蒲铁路以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袭扰和切断交通线，迟滞日军向神池、宁武的进攻，给一百二十师主力在晋西北的活动创造有利条件。第二路由三百五十八旅七百一十六团主力和一百二十师师部组成，由张宗逊率领，开赴五寨地区。第三路由李井泉政委率七百一十五团及骑兵连到神池以西、五寨以北地区，打击日寇。与此同时，针对晋西北人心不稳、秩序混乱、社会动荡的局面，由一百二十师抽调部分干部组织地方工作团在关向应、甘泗淇率领下奔赴岢岚，开展宣传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等群众工作。

按照军政委员会的决定，9 月 30 日，贺龙率领司令部进入神池县八角镇、义井镇指挥对日作战，关向应率领师政治部和供应部、卫生部的一部分以及教导团组成后方工作领导机构开赴岢岚执行发动群众，组建抗日团体等任务。同一天，宋时轮支队也经利民堡进入雁北，并立刻投入抗日游击战



中。10 月 1 日，宋时轮支队首战雁北取得井坪镇袭击战胜利。从 10 月 4 日 ~26 日，宋时轮支队连战连捷，先后取得了平鲁城战役、榆林村战役、辛庄伏击战、口泉村战役的胜利。其中仅 10 月 23 日周庄伏击战即歼敌 100 余人，击毁汽车 18 辆。这些战役的胜利在打击日军后方运输线的同时还积极配合了一百二十师主力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活动。

另一方面，一百二十师工作团在宁武、朔县以西各县的群众工作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一百二十师政委关向应充分利用了当地两个重要的抗体团体"牺牲救国同盟会"与"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将一百二十师工作团与这两个团体相结合，开展群众工作，通过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文件，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及政治观点，也使老百姓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积极的抗战态度，提高人民抗战热情，并且以此为突破口，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使其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上升为拥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发动群众工作取得一定成绩的基础上，一百二十师还进一步协助恢复和建立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同时组建游击队和抗战团体，扩大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和抗日武装。从 1937 年 10 月初至 10 月末，仅仅 20 多天的时间，一百二十师工作团就发动和组织了 5 700 余人的抗日自卫队，群众工作初见成效。

此后，关向应、甘泗淇领导工作团在晋西北又经过八个多月的艰苦工作，建立了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后称晋西北区党委）及各县临时县委，恢复了政权组织，收容了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安定了社会秩序，也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入人心，晋西北出现了抗日的新局面，一百二十师也在晋西北站稳了脚跟，并初步打开了局面。贺龙曾高兴地说："晋西北持久抗战的基础现在是胜利地初步地奠定了。"[⑤]1937 年底，"晋西北 14 个县，游击队和脱产民兵发展到 1.1 万余人。一百二十师也由东渡时的 8 000 余人发展到 2.5 万人"。[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中心区初具雏形。

就在一百二十师主力展开于管涔山区的时候，日军突破雁门关等内长城要隘，沿同蒲铁路长驱直入，并于 11 月 8 日攻陷太原，山西战场国民党的正面抗战基本结束。针对太原失守后的战场形势，中共中央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并提出："共产党和八路军决心坚持华北的游击战争，用以捍卫全国，钳制日寇向中原和西北的进攻。"[⑦]按照中央指示，一百二十师大力展开建立了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以及以根据地为依托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后方，引起了日军的恐慌。日军为了保障后方安全和运输补给，于1938年初趁我军后方兵力空虚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展开进攻，妄图一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日方集中日伪军一万多人进犯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其中主力日军第二十六师团黑田旅团，大约8 000多人，分路直扑晋西北腹地。黑田旅团由雁北出发，兵分两路，一路为千田联队，由朔县出发，23日占领宁武神池后，再分两股，一股向西，一股向南，先后占领五寨、岢岚县城；另一路为竹内联队，由井坪出发，先后占领偏关、河曲等地。敌军先后占领了宁武、神池等七座县城，意在逼迫我军撤至黄河以西。

此时，八路军第一百二十师主力，在贺龙师长率领下，正在同蒲铁路忻县至阳曲段展开破击战，闻讯后，立即于2月29日星夜回师晋西北，并决定发动“收复7城战役”，巩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38年3月3日，第一百二十师集中主力四个团，首先打击进占五寨、岢岚的日军，相继收复两城，尔后再向神池、宁武方面发动进攻。3月7日，第三百五十九旅进攻岢岚城日军，进占岢岚日军第二十六师团第十一联队1 000余人，被第三百五十九旅围困在城内，在交通联络中断，物资粮弹无法补给的情形下被迫于10日弃城北逃。于10日晚至三井镇固守待援。尾追日军的第三百五十九旅第七百一十七团于当日夜间对三井日军发动攻击，消灭日军一部。日军于11日10时继续向五寨逃走。由三井逃入五寨城的日军与该寨日军共计1 000余人，被跟踪追击的第三百五十九旅包围，第三百五十八旅亦于此时赶到五寨城郊。由于五寨城池坚固，日军兵力较强，且有义井、三岔日军相策应，第一百二十师所部炮火不足不利强攻，遂决定以第七百一十八团第二营及地方游击队继续围困日军；第七百一十七团进至五寨与三岔之间；第三百五十八旅进至义井与神池之间，截断五寨、三岔、义井、神池间的交通，以逼退五寨日军，并将其在运动中歼灭。同时，警备第六团、独立第一支队、骑兵营等部在利民堡、八角堡地区袭扰朔县、神池、三岔日军交通，配合主力作战。17日17时，第三百五十八旅进至义井以南的虎北村、山口村时与由神池出动的日军1 000余人遭遇。激战六小时，日军伤亡300余人后退入义井镇。18日，义井日军向第三百五十八旅反扑，又被该旅击退。同日，三岔堡日军出动200余人企图增援五寨，中途被第七百一十七团击溃后逃回三岔。至此，五寨城内日军完全孤立。在此期间，第一百二十师其他各部积



极活动，打击日军，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的作战行动。日军在处境日益不利的情况下，被迫于20日全线撤退。当日，偏关、河曲、保德和五寨的日军均弃城向东撤退。保德日军和三岔日军会合后，于21日向神池撤退，在田家窳遭第七百一十七团的截击，后逃入义井镇。22日夜，义井日军共三个大队向神池撤退，行至凤凰山附近，又遭第三百五十八旅伏击，后逃向神池。23日，神池日军继续逃往朔县。1938年4月初，岢岚、偏关、河曲、保德、五寨、神池各城均被八路军第一百二十师收复。

至此，进入晋西北的日军已全部退出，一百二十师成功地稳固了新生的晋西北根据地，同时重创日军并缴获了大量武器："整个战役共消灭敌1 500余人，缴获山炮1门，汽车14辆，步机枪200多支。"⑧在这些战役中，一百二十师官兵特别是中共党员为建立抗日根据地也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共产党员在伤亡的人数中占60%以上。他们有的在火线上负伤或牺牲了，有的是深入敌巢而罹难了。他们英勇牺牲的壮烈行为，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表现了中华儿女的高尚气节！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光荣。"⑨

八路军第一百二十师广大指战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在1938年初建立并且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迅速打开了山西西北部抗日局面，对于八路军敌后抗战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晋西北是支持华北抗战的重要根据地和主要堡垒之一，是大西北的屏障。坚持晋西北的抗战，不仅威胁着敌人在山西的主要交通线——同蒲路，对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起着重要的战略配合作用，而且籍制着进攻大西北的一大部分敌人。所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对于坚持敌后抗战，保卫大西北，是具有伟大的意义的。"⑩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7页。

②③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毛泽东军事年谱》，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2页，第202页~203页，第216页。

④⑨⑩贺龙：《依靠群众夺取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85页，第87~88页，第86页。

⑤贺龙：《晋西北之今昔》，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贺龙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90页。

⑥⑧王震：《一二〇师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页，第141页。

雁门关战役夜袭阳明堡机场

为了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一百一十五师广阳伏击日军的同时，八路军一百二十师、一百二十九师按照中央的指示，分别于雁门关与阳明堡机场伏击突袭日军，打击了日军交通运输线与空中战斗力，从而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

1937年10月，阎锡山组织忻口会战后，中共中央与八路军总指挥部一直密切关注战场形势。10月6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人，要其转告国民党军事当局毛泽东对于当时战局分析的意见："敌占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故龙泉[①]娘子关两点需集结重兵实行坚守，以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②]同时根据抗日战场的新形势，毛泽东提出了一百二十师、一百二十九师的军事部署：一百二十师主力担任东、西两方破坏忻口地区日军的侧后纵深地区；一百二十九师主力或全部将使用于正太铁路，发动群众，配合娘子关守军作战。中共中央与八路军总部经研究基本同意毛泽东意见，八路军总部于10月6日、7日发出命令：以第一百二十师主力位于岱岳（今山阴县）以西山地，完全隔绝与大同与雁门关之间交通，以第三百五十八旅主力配合友军夹击武宁以南之敌；以第一百二十九师一部进至正太路之阳寿、平定地区，积极钳制与打击西进之敌。接到八路军总部的命令，一百二十师立即奔赴雁门关一带待机组织伏击战。

为了首战告捷，一百二十师在战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937年10月中旬，负责雁门关战役的七百一十六团到达雁门关西南10多公里的老窝村驻地后，通过当地群众了解到：在忻口会战打响之后，每隔四五天就会有大量的汽车运送日本士兵或者武器弹药以及后勤补给物品从此地通过，同时，由于日军将这一地区视为自己的后方，所以警戒非常的疏忽。根据这一情况，一百二十师初步计划在雁门关一带打击日军交通线来配合友军作战。10月16日，群众又送来情报，大同敌人集结了300多辆汽车，满载了武器弹药好像要经过雁门关开赴忻口。根据这一情况，七百一十六团迅速开展战前

准备工作。

10 月 17 日，七百一十六团团长贺炳炎和政委廖汉生来到雁门关附近实地勘察，最后经反复研究将伏击地点选在了雁门关西南的黑石头沟和吴家窑一带。根据贺炳炎回忆，石头沟附近地势十分特殊，站在附近的山顶往下俯瞰只见“一条弯弯曲曲的公路，由雁门关盘旋而下；在这里由西向东绕了一个大圈，公路西面是悬崖峭壁，北面是一段陡坡，顺公路向南不远有一座石拱桥”。如果我军提前在此地埋伏，形成包围圈，并充分利用地形，出其不意攻击日军，胜算的把握很大。根据石头沟特殊地形，我军又制定了非常周密的作战计划，将参加此次战役的“一、三营分别埋伏在陡坡南北，由三营担任主攻，再由 1 营派出一个连向阳明堡方向警戒，三营十一连伏在桥西，断敌逃路。我们总的计划是：全团一起，突然动作，力求把敌全部消灭在黑石头沟内。”③

按照预定计划，1937 年 10 月 18 日凌晨，在夜色的掩护下，一百二十师“沿着崎岖的小道，插入了黑石头沟”，“进入阵地之后，一切准备停当，单等着敌人的大队汽车越山而来”，上午 10 时许，北面公路终于开来日军 100 辆满载步兵的汽车，并很快驶入了伏击区。七百一十六团抓住战机，待到敌人完全进入伏击圈后，立即以密集的火力向日军车队进行袭击。日军最初一阵慌乱，伤亡不小，有的士兵还没从车上跳下来参加战斗就被击毙，其后，日军稍加整顿，端起枪准备反扑，正在此时，三营十一连的勇士们冲向公路，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我军战士勇猛地和敌人对刺，有的索性用长征时用过的‘鬼头刀’和敌人拼杀”④。在我军的猛烈进攻下，大部分敌人被歼灭，只有少量残敌还凭借汽车为掩体负隅顽抗，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指导员胡觉三发现有一个鬼子趴在汽车底下，就想活捉一名日军俘虏，不料刚跑过去，这名日军突然开枪，胡觉三被击中胸部，当场牺牲。战士们看到指导员牺牲了，怒火中烧，高喊着“为指导员报仇”的口号，冲向残余的日军。双方正在激战时，突然载有日军的 200 辆汽车由阳明堡方向驶来，由于此时日军人数较多，我军也基本完成了作战任务，为避免不必要的伤亡，七百一十六团立刻决定带伤员主动撤出战斗，雁门关伏击战结束。这次伏击战，炸毁汽车 20 余辆，日军伤亡 200 多名，其中死亡 67 人，据廖汉生回忆：日军撤离战场后，还“在黑石头沟竖了一块木牌子，写着此地被打死 67 人，提醒过往车队千万小心”。我军还切断了日军主要交通线，取得了一定的战果。此次战役我军也付出了一定的牺牲，负伤 53 人，阵亡



50 人。[5]

为了进一步打击日军交通线，一百二十师三百五十八旅七百一十六团于两日后再次设伏于黑石头袭击日军运输线。1937 年 10 月 20 日夜，第七百一十六团分兵三路，一路占雁门关，一路向广武镇，一路向太和岭，连夜破坏桥梁八座。并于 21 日拂晓前，部队隐蔽埋伏于黑石头沟地区。10 月 20 日上午 9 时，日军“由南向北汽车约百余辆。由北向南之汽车因公路破坏不进，下车之步兵约一个营，敌机五架。激战两小时，结果我伤 13 名，亡 20 名，敌 3 倍于我。三营仍占雁门关。[6]而日军由于有了上一次的教训，加强了防守，难以取得更大战果，最后我军在基本完成作战任务后安全撤离。

自 18 日 ~21 日，八路军第三百五十八旅七百一十六团主力在雁门关以南黑石头沟地区共歼灭日军 500 余人，毁日军汽车 20 余辆，切断了其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后方补给线，积极配合了国民党正面的忻口战役。同时雁门关之战，也成为了是八路军配合正面战场展开敌后游击战的典型范例。南京国民政府曾专门对七百一十六团传令嘉奖，也大力宣传雁门关伏击的战果，称之为“雁门关大捷”。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也曾经专门提到“太原北部忻口战役时，雁门关南北的游击战争破坏同蒲铁路、平型关汽车路、阳方口汽车路，所起到的战役配合作用是很大的。”[7]由此可见，在当时，雁门关伏击战在八路军内和抗日战场上都具有一定有的影响。

在国民党各部与八路军相互配合下，日军进攻忻口地面部队和后勤补给线不断受阻，便频繁地由代县西南阳明堡前线飞机场出动飞机，以加强空中运输力量并对忻口国民党军阵地轮番轰炸，针对这种情况，八路军总部决定以一百二十九师先头部队七百六十九团对阳明堡机场给予打击，为太原、忻口奋战的友军减轻作战压力。

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10 月初，八路军第一百二十九师第七百六十九团，由东冶向原平东北的山地挺进，执行侧击南犯忻口日军后方的任务。10 月中旬，第七百九十六团抵代县西南、滹沱河东岸的苏龙口村，该村隔河五公里就是阳明堡机场。七百九十六团抵达预定地点后立即对阳明堡机场展开侦查，并很快通过当地群众对机场的情况有了详细的了解，“阳明堡机场的飞机分三列停放，每列八架，计 24 架。白天轮番轰炸太原、忻口，晚上停放于该机场。”同时由于忻口前线战事正酣，因此后方守卫兵力较少，当时阳明堡只有日军的一个联队驻守，而且大部驻在阳明堡街里，机场只有一小股警卫部队，守备相对松懈。针对阳明堡机场的情况，七百六十九团立即制

定了夜袭机场的战略计划，具体部署是，以第一、第二营各一部，置于崞县和阳明堡镇方向可能来援之敌，并保证突击分队的侧后安全，以第三营，作为突击分队，担任袭击机场炸毁飞机的任务，团迫击炮连和机枪连置于滹沱河岸边，随时准备对第三营进行火力支援，团预备队第二营一部和团指挥所置于苏龙口北侧地区。”⑧各营、连的部署和任务确定后，七百六十九团各营各连分别召开党支部大会，进行战地动员，另外为了夜间行军和偷袭，干部和战士一律轻装简行，放下棉衣、背包，将所有可能发出声音的装备如刺刀、手榴弹和枪支都绑紧，避免夜袭时发出声音暴露目标。

一切准备就绪后，10 月 19 日夜，八路军第七百九十六团以当地农民为向导，分队出动。七百九十六团战士摸进飞机场时，正是午夜时分，日军大部分在休息，因此飞机场十分寂静，八路军乘着夜色爬过日军的铁丝网之后，第三营十连、十一连兵分两路，十连在三营营长赵崇德亲自带领下向机场西北角运动，袭击敌守卫队的掩蔽部。与此同时，第十一连直接向机场中央的机群扑去，十连与十一连官兵同时与日军哨兵交火。

战斗一开始就打得十分激烈，“机枪、手榴弹一齐倾泻，一团团的火光照亮了夜空。正在机群周围巡逻的敌哨兵，慌忙赶来，和冲在前面的战士绕着飞机互相角逐。机舱里值勤的驾驶员被惊醒了，他们惊慌之中盲目开火，后边飞机上的机枪子弹接连打进了前面的机身。”正在此时，日军守卫队听到枪声赶来，急忙加入战斗，与三营战士在飞机群里开展白刃战，三营战士个个奋勇杀敌，很快杀退守卫队的进攻。在哨兵基本被消灭后，营长赵崇德指挥三营官兵抓紧时间，凭借轻重机关枪和手榴弹轰炸飞机。随着一声声巨响，机场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就在作战任务即将完成之时，三营营长赵崇德突然被一颗子弹打倒英勇牺牲了，“他的牺牲使同志们感到万分悲痛，战士们高喊着‘为营长报仇’的口号，抓起手榴弹，冒着密集的枪弹向敌机冲去……”经过几十分钟的激战，三营胜利完成了任务，停靠机场的飞机被全部摧毁，机场守卫队被歼。当驻在街里的香月师团的装甲车急急赶来增援时，八路军第三营早已安全撤离。

八路军此次夜袭阳明堡机场，歼日军 100 余人，击毁飞机 24 架。阳明堡之战有力地削弱了日军进攻忻口的空中打击和运输力量，为支援国民党忻口战场的正面战场作出突出了突出贡献。

八路军一百二十师、一百二十九师于 1937 年 10 月份先后发动的雁门关战役和阳明堡机场战役，切断了日军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运输，并摧毁

了阳明堡机场，一度使日军的后勤补给陷入中断，地面和空中攻击受到挫折，从而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队忻口正面战场。同时，八路军的英勇表现也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打出了抗日的威名，为八路军在华北沦陷后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初步基础。忻口战役结束后，华北战场以国民党正面抗战为主体的时期基本结束，进入了以八路军敌后抗战为主的新时期。

注释：

①注：应为九龙关。

②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电，1937年10月6日。

③④贺炳炎：《雁门关伏击》，《星火燎原》（5），解放军出版社，1981年版，第21～22页，第24页。

⑤《廖汉生回忆录》，八一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页。

⑥贺炳炎、廖汉生1937年10月21日向贺龙的报告，引自《周士第日记》未刊稿。

⑦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7页。

⑧陈锡联：《夜袭阳明堡》，《星火燎原》（5），解放军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一百二十九师正太路伏击战
七亘村两战两捷

1937年10月，日军在忻口一线的正面进攻遭到中国军队沉重打击之后，决定派兵由正太路及其南侧西进，迂回忻口、太原侧后，以便配合忻口正面日军夺取太原。为配合友军的正面作战，八路军一百二十九师于10月20日至28日，先后在正太路的长生口、东石门、马山村、七亘村连续作战打击日寇。其中一百二十九师的长生口之战虽不是一场大规模的战役，但却是八路军一百二十九师在太行山地区的第一仗，这场战役的胜利，极大鼓舞了一百二十九师官兵的士气。

长生口地处太行八陉之一——井陉的要塞地点，是石家庄通往太原的必经之路，由于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因此自古以来就是兵家激烈角逐之地，1937年10月21日，一百二十九师就利用长生口特殊地形与日军成功地打了一场遭遇战。

1937年10月20日，八路军一百二十九师三百八十六旅七百七十二团三营奉命到达支沙口后立刻准备阻击日军，10月21日夜，七百七十二团三营在副团长王近山的率领下前往板桥，准备袭击板桥一带的日本驻军。部队刚过长生口，就发现了一队人数大约100人左右的日军。三营立刻对长生口附近地形进行勘查，并决定就地形成包围圈歼灭此小股日军。七百七十二团三营在副团长王近山的指挥下迅速占领了山坡、高地等有利地形，然后形成了包围圈，静待敌人进入。当日军多数进入包围圈后，王副团长一声令下，我军凭借地势立即开始进攻，“顷刻间，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连成一片”，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敌人被打得乱了阵脚。当他们前后逃窜受阻时，才发觉已经被四面包围了”，我军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性。[①]战斗持续了一个小时，日军大部分被消灭，少数日军逃窜到长生口村子的一个空场后突围逃跑。整个战役我军共消灭日军50余人，缴获10多支步枪和一些弹药等军



需用品。

此次战役第二天，为了配合布防娘子关曾万钟部，一百二十九师又在长生口采取侧后迂回的战术突袭了日军炮兵阵地。战役由陈赓为总指挥，共出动一百二十九师七百七十二团3个营的兵力，其中两个营为前锋，一个营为预备队。10月22日，七百七十二团在团长叶成焕、副团长王近山的带领下，迅速奔赴长生口，并在长生口以南距离敌军营地2公里地方停驻，同时展开侦查工作。通过一天的实地侦查，叶成焕、王近山注意到，前方日军营地包括炮兵营地与步兵营地两个营地，其中炮兵营地上有几十门大炮。由于长生口一带被日军视为自己后方，再加上对中国军队的轻视，因此营地周围不仅没有外围的警戒，而且营地内守卫也十分麻痹。从人数来讲炮兵营地人数较少，考虑到支援友军正面战场等因素，七百七十二团决定首先突袭日军炮兵营地，如有机会再袭击日军步兵营地。

10月22日黄昏，“担任袭击任务的两个连，每人携带八枚手榴弹，每班配备两挺机枪，在副团长王近同志的带领下采取分组交替前进，迅速、机警插进了敌营地”。并在营地附近隐蔽起来，做好了接应后续部队的准备，待后续部队到达后，立刻行动。按照预定计划，两个排战士直接插入敌人炮兵阵地，迅速解决了炮兵阵地上的日军，并“分头将山西造的大个手榴弹一个一个地塞进炮筒内。”顿时阵地上爆炸声四起，几十门大炮刹那间被炸毁。紧接着，2营两个连的战士还迅速向日军步兵营阵地进攻，用机枪、步枪猛烈扫射帐篷内外的日军，敌人毫无准备，被打得四处逃窜，完成了任务后，我军安全撤离。此次战役虽然只进行了短短两个小时，但是战绩明显，长生口阵地的大炮基本被我军摧毁，另外还给炮兵阵地、步兵阵地敌人一定的打击，给了娘子关友军以有力的配合。长生口战役后，日军由于缺少炮火支援，有三四天没有向娘子关进攻，缓解了孙仲连部的压力。孙得知长生口战果后曾专门打电话向一百二十九师表示感谢和敬意。[②]

长生口战役后，一百二十九军又在东石门、马山村、七亘村给予进犯日军以沉重打击，创造了四战四捷的战绩，特别是七亘村战役，战果最为显著。

位于太行山脉中段、晋冀两省交界处的七亘，是平定、昔阳、井陉三县的交界地带。它是井（陉）平（定）小道的必经之地，从七亘往东到石门，正好是10里峡谷，谷深数十米，底宽不足三米，地势十分险峻。坐落于七亘的七亘村四面环山，重峦叠嶂，沟壑纵横，峡谷陡峭，道路奇险。一百二

十九师师长刘伯承经过实地勘察，认为七亘村地处日军第二十师团进犯平定、太原的必经之路，同时此地地形也十分适合进行伏击战，因此提出一百二十九师可在七亘村附近伏击日军，并随即命令八路军一百二十九师第七百七十二团第三营进至七亘村附近待机歼敌。

1937年10月25日下午，一百二十九师得到前方传来的消息，日军第二十师团开始向平定方向进犯，其中辎重部队约1 000余人，在距七亘村10公里的测鱼镇宿营。一百二十九师师长刘伯承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判断："七亘村是测鱼镇通往平定的咽喉要道，日军明天一定经七亘村向前方运送军需物资"，一定要吃掉这块"送到嘴的狗肉"。刘伯承亲自下达了作战任务，命令陈赓调集部队在七亘村路南的土坎上设伏，切断日军的交通，夺其辎重。[3]

按照刘伯承的命令，陈赓马上派七百七十二团副团长王近山，带领第三营进至七亘村，详细察看地形，选择具体伏击地，同时进行战前准备。10月26日拂晓，副团长王近山带领"第三营秘密进到营庄以南高地伏击敌人。"并将三营分成了三个部分，以两个连又一个排的兵力为主攻，布置在七亘村至甲南峪间的大道南侧，另外两个连作为预备队，控制七亘村以南高地，同时并派出"便衣二十余人附轻机枪，向测鱼游击"[4]，以便及时掌握敌情。营指挥所设在离大道约300米的青脑北边的山头上，从那里俯瞰山下，可以将七亘村大道两旁的战况尽收眼底，另外，作为伏击战斗的火力指挥信号，指挥所专门配备一挺重机枪。

部署完毕后，七百七十二团三营官兵各自进入自己的隐蔽地点，"战士们为了搞好隐蔽，灵活地利用地形地物，有的钻进草木丛，有的用野草和树叶把自己伪装起来，有的藏在土坎、岩石后，个个严阵以待"，只等日军钻进包围圈。上午8时左右，一队日军终于出现在石门村一带，当时与我军距离大约三公里，人数在500人左右，前后各有100多名步兵保护着中间的辎重部队大约300人。得知敌情后，王近山马上向陈旅长报告，并立即召开由各个连主要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明确了各个连的作战任务：战斗打响后，十一连要沿山沟迅速占领七亘村南大道两侧，切断前面日军步兵同辎重部队的联系，并阻击敌步兵对其辎重部队的援助。然后，要以一部分兵力，抢占七亘村西南边不到100米高的定盘山，形成对敌军步兵的包围，防止敌军步兵抢占和利用村庄负隅顽抗，力争将其全歼于大道上。而十二连则承担正面突击日军辎重部队，夺其辎重的主要作战任务。在此期间，十一连在占



据高地后，要配合十二连担任穿插、阻击和包围任务。另外，特务连的一个排负责阻击后退之敌，九连十连最后相机投入战斗。总之，此次作战的任务是伏击日军，夺取辎重。三营各个连队的作战任务确定后，主要负责人立刻跑步进入阵地继续隐蔽，等待指挥员发出进攻的指令。

上午9时左右，日军步兵开始进入我伏击区。日军先头部队很快接近营庄，就在辎重部队行至我十二连伏击阵地前面之时，副团长王近山一声令下，重机枪立即向日军扫射，伏击部队随之向日军猛烈射击。刹那间，成群的手榴弹，密集的子弹，全都向道路上的日军射去，正在行进中的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懵了，还没搞清是怎么回事，就死伤了一大片。这时候，十一连按照原定计划，迅速抢占了七亘村南大道两侧及该村西南的定盘山，将日军步兵和辎重部队拦腰隔开。日军先头步兵掉头增援辎重部队时被十一连阻击，而后面的掩护部队则被十二连击毙的横躺竖卧的马匹、骆驼及抛弃的军用物资挡住道路。辎重部队被围在包围圈之中，进退维谷，成了瓮中之鳖，场面十分混乱："骡马和骆驼受到惊吓，四处奔跑，畜撞畜、人撞人，人畜相撞，在狭窄的道路上自相践踏，尘土飞扬，血肉四溅。"[⑤]部分日军侥幸从十一连、十二连包围中逃脱，一窝蜂似的朝东石门方向逃窜，刚跑到甲南峪，又遭我预先埋伏在那里的特务连1个排的猛烈袭击。这时，王副团长命令九、十连投入了战斗，战斗进行得更加激烈。根据当时任一百二十九师宣传部长的李志坚回忆："有1个战士在同敌人拼杀中，身上5处受伤坚持不下火线。当他同1个日本军官搏斗时，已筋疲力尽，但他急中生智，啪地一下将手中的步枪向敌人掷去，在敌人一愣的瞬间，猛扑过去将其压倒在地，用牙咬掉敌人的鼻子，并趁敌痛不可忍之时将其击毙。"[⑥]双方激战至11时左右，日军除一部分掩护部队逃回测鱼镇外，其余均被我军歼灭，第一次七亘村伏击战结束。此次战役共歼灭日军300余名，打死、缴获骡马和骆驼300余匹还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

日军在七亘村遭到伏击当天，退到测鱼镇。第二天，他们一面派出部队在七亘村附近收敛尸体，一面整顿部队，调集兵力，准备继续西进。根据这一形势，刘伯承当机立断，命令陈赓继续利用七亘村的有利地形，准备再次伏击日军。为了迷惑日军，27日，日军派兵到七亘村来收尸时，刘伯承故意安排一百二十九师七百七十二团三营当着日军的面佯装撤退，造成七亘村无兵把守的假象，实际上第七百七十二团第三营绕了一圈又返了回来，集结在七亘村西改道庙公路南侧山地里，只待日军再次进入我军包围圈。负责此

次战役指挥的陈赓将第二次伏击战的地点选在七亘村西面，由于时间紧迫，得到命令后七百七十二团立即行动起来。

10月28日，七百七十二团副团长王近山奉命带领三营进入伏击阵地。九连和十连埋伏在七亘村至改道庙间的大道南侧，十一连十二连及特务连一个排作为预备队，侦察分队前往测鱼镇负责侦查日军的动静，上午10时左右，侦察分队首先发现有一股日军辎重部队向七亘村开来。日军此次行军接受教训，加强了对辎重部队的保护，先以100余人的骑兵开路，100余名步兵在后掩护，继续沿大道西进。王近山当即将这一情况报告陈赓，陈赓电话中命令："近山，坚决出击！"并增派第二营和第一营的一个连支援。11时左右，日军先头骑兵开始进入我伏击区。这次日军的警戒搜索较上次严密，凡可疑之处，他们都先用炮火轰击，然后才向前推进。日军边走边打，大道两侧不断响起轰隆轰隆的爆炸声。三营指战员为了民族的利益置生死于度外，"即使呼啸的炮弹掠过头顶，炸在身边，大家也严守纪律，纹丝不动。不一会，下起了秋雨，战士们爬在泥水里，隐蔽如初，一动也不动"。前方开路的日军见山上山下均无动静，便通知辎重部队大胆前进。当日军骑兵通过改道庙到达营庄，辎重部队进入我军伏击圈时，王副团长一声令下，我伏击部队一起向日军辎重部队发起猛烈的火力袭击，顿时，打得日军人仰马翻，狂呼乱叫。刚刚爬上营庄的日军骑兵，看到辎重部队受到袭击，马上转过头来增援，并集中火力袭击我营指挥所。我侧翼部队发现后，当即予以猛烈的还击，日军骑兵部队被得乱作一团。这次伏击，由于日军加强了掩护部队，加上风雨交加，道路泥泞，我增援部队未能按时赶来，因此，战至黄昏时，日军辎重部队在骑兵和步兵拼死掩护下突出包围圈向平定和测鱼镇突围。七亘村第二次伏击共歼灭日军100余人，缴获骡马10余匹，第三营伤亡30余人。

在日军疯狂进攻太原的情况下，八路军一百二十九师在刘伯承的指挥下，三天之内以一个营的兵力在七亘村两次成功地伏击日军，沉重地打击了日军不可一世的狂妄气焰。这是一百二十九师先头部队进入太行山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振奋了八路军的士气，同时也为一百二十九师开辟太行山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李聚奎，黄振棠：《两战长生口》，《八路军回忆史料》（上），解放

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13页。

②孙继先：《配合友军袭击敌人》，《星火燎原》（未刊稿6），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166~168页。

③⑤⑥刘志坚：《巧妙设伏出奇制胜——忆七亘村大捷》，《八路军回忆史料》（1），第276页，第278页，第278~279页。

④《陈赓日记》，战士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26页。

冀中冀东抗日根据地建立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平津等地相继沦亡，中共中央召开洛川会议并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1937年8月，八路军一百一十五师首先渡过黄河开赴抗战前线，在配合友军作战的同时，首先开辟了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其后又开始着手开辟冀中、冀东抗日根据地，冀中、冀东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为华北地区的抗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冀中抗日根据地作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八路军在敌人心脏地区建立的一个重要的抗战堡垒。冀中是指界于平汉、津浦、北宁、沧石四条铁路干线中间的四方平原地带。这里物产丰富，人口众多，且处于华北敌军的心脏地带，如能在冀中创建根据地将控制日军赖以生存的四条铁路干线，并直接威胁着日军的三个军事、政治要点北平、天津和保定，对整个华北局势影响巨大。

冀中抗日根据地创建过程中，中共中央及中共地方党组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37年12月中旬，晋察冀边区反围攻斗争正在进行时，根据冀中平原日军兵力空虚的情况，毛泽东同彭德怀致电朱德、任弼时，提出：“由第一百二十九师和聂荣臻部各派一个支队到平汉铁路以东的平原地区游击。”并提出游击作战任务是：一、侦察情况。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发动民众与组织游击队。三、破坏伪组织。四、收集武器，扩大自身。电报要求“两支队出去须十分谨慎、周密、灵活，根据情况灵活地决定自己行动。”①冀中地方党组织按照中央的指示，立即要求党员干部一律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战。石家庄失守后，冀中地区党组织又提出“抗日”、“锄奸”、“剿匪”三大口号，并大力组织抗日武装，开展袭扰日军、打击日军运输线的斗争。

此后，中共中央出于对冀中抗日活动的重视，派出曾任红军团长的孟庆山到冀中组织抗日武装。孟庆山到达冀中后，担任中共保属省委军事委员，协助地方组织开办军事训练班，培养武装斗争的骨干，创建游击队等活动，



同时在高阳、蠡县、任丘、安新等地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孟庆山还与周围各县党员积极联系，恢复当地党组织，组织人民抗日武装。中共中央与冀中地方党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冀中抗日武装不断壮大，至1937年12月底，冀中地区人民抗日武装已经发展至两万余人，冀中地区的抗日活动蓬勃发展起来。

1937年10月11日，中共地下党员原东北军第五十三军六百九十一团团长吕正操，遵照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在梅花镇英勇抗击进犯日军后挥师北上，在晋县小樵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改称人民自卫军，部队发展到5 000余人。部队改编后，先后与中共保署省委、晋察冀军区取得联系，在中共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先后摧毁了深泽、安国、平安等县伪组织，并建立了抗日的县政权。11月初，人民自卫军攻占高阳县城，解决了伪保安团和保安队，缴枪1 000余支。人民自卫军在斗争中不断壮大自己，扩编为四个团又六个营，共3 000余人。

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人民自卫军主力在吕正操和孙志远的率领下，于1937年12月中旬开至平汉路西山区，接受晋察冀军区的正规军事训练。留在冀中的人民自卫军和中共地方党组织领导的其他武装力量，改编为河北游击军，由孟庆山任司令员，侯平为政治部主任，游击武装迅速发展到数万人。在此期间，中共冀中党组织针对冀中出现的各式各样的游杂武装，加大开展统战工作的力度，努力争取其加入抗日。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我军有选择地以地方党组成的武装为基础，编成3个游击师，各师领导干部多为高蠡暴动时期的共产党员，部队很快发展到近1万人。同时还加委和收编了12路杂色武装，共约2万人。”②

在收编杂色武装的同时，中共冀中区党组织还积极发动人民抗日武装，不断对日军侵占的城镇和铁路、公路沿线发动攻击。1938年2月，冀中部队夜袭日军清苑县东石桥据点；3月，冀中部队对盘踞在保定、望都、定县、安新、无极等县城之敌发动攻击。1938年春，冀中部队共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收复高阳和安新两座县城。1938年4月，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并肩作战，粉碎了日军第一次春春季扫荡，游击区得到了很大扩展。西起平汉路，东至津浦路，北至平津路，南达沧石路，整个冀中平原的广大乡村几乎都为抗日武装所控制。

随着冀中抗日武装队伍的壮大，迫切需要将庞大分散的抗日武装进行整编，以加强党对冀中部队的领导与指挥，提高战斗力。1938年5月，根据

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冀中主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并成立冀中军区，吕正操任纵队司令员兼军区司令员，孟庆山任副司令员，孙志远任政治部主任。辖第七、第八、第九、第十支队。1937 年 7 月整编工作基本完成。9 月，八路军第三纵队开辟了大清河北地区后，成立了八路军第三纵队独立第一支队兼冀中军区第五军分区，朱占魁任独立支队司令员兼第 5 分区司令员。至年底，冀中的人民抗日武装发展到近 10 万人。

冀中抗日武装的建立与发展，为八路军在冀中平原发动与组织人民群众，进一步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创建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8 年 4 月，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在安平县城主持召开了中共冀中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了冀中区党委的成员。此时，冀中游击区已经发展到包括 38 个县城在内的广大地区，各级战地动员委员会和抗日团体也纷纷成立。在中共建立的县级政权及地方抗日组织的基础上，1938 年 5 月，冀中区统一的政权领导机关——冀中行政主任公署正式成立，由吕正操任公署主任，李耕涛任副主任。至此，冀中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至 1938 年 10 月，冀中抗日根据地已发展到西迄平汉路，东至津浦路，北至北宁路，南至沧石路，共 44 个县、800 万人口的广大地区。聂荣臻曾对冀中抗日根据做出高度评价："冀中区作为晋察冀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开辟平原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提供了宝贵的经验"。[3]

在中共开辟冀中抗日根据地同时，中共中央为建立冀东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也在积极展开。冀东地区平原多，丘陵多，农业发达，矿产丰富，是东北与华北之间的咽喉要道，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因此中共一向重视发动冀中地区的敌后抗战活动。

1937 年 8 月，在中共中央于陕北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根据毛泽东关于红军可出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的提议，[4]确定了开辟冀东抗日根据地的总方针。

此后，中共北方局领导冀东人民暴动，创建了冀东抗日游击武装。1937 年 9 月，主持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召开会议，将河北省委一分为二：一、在天津的河北省委；二、在石家庄的平汉线省委。并派李运昌和胡锡奎到冀东，分别出任冀热边特委和京东特委书记，南北配合，在冀东和热河边界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5]晋察冀边区先派邓华支队开辟平西地区，为八路军挺进冀东建立可靠的根据地。接着又派宋时轮支队到平西，由邓宋两支



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准备挺进冀东，以配合武装暴动。

1938年5月，四纵队共5 000余人分两路出发。宋时轮率领的支队沿途作战，先后攻克南口、居庸关、昌平和延庆。邓华率领支队进入怀柔北部山区，冲破伪满蒙军的包围，曾攻占兴隆县城。四纵主力挺进冀东腹地后，先后占领了平谷、宝坻、蓟县、丰润、遵化、迁安，并向东南玉田、滦县、乐亭发展。冀东地区抗日武装经过半年的组织发动，日益壮大，同时在冀东创建敌后根据地的条件日臻成熟。冀热边特委趁驻冀东日军南调，兵力空虚之际，在四纵配合下，1938年7月，发起了冀东人民武装抗日大暴动。晋察冀军区各部为配合暴动沿平汉、平绥、石太三线分十路出击，以牵制敌人。在暴动高潮期，西起白河东至山海关，北跨长城内外，南到渤海之滨，冀东大地遍燃烽火。四纵和抗日联军驰骋冀东原野，先后攻克九座县城和冀东所有重要集镇，摧毁了当地政权，使日伪军陷入困难境地。冀热边特委在各地先后建立了11个县级抗日政权，以维持地方治安和为抗日联军筹款。

1937年8月底，四纵与抗联会师成立冀察热宁边区行政委员会，在去都山建立根据地计划失败后，由于四纵转战各地极需补充减员，抗联队伍庞大又缺少训练，加上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的情况下，决定留下少数部队坚持游击战争，大部撤到平西根据地整训，并准备于1938年再回冀东创建抗日根据地。在西撤中，由于队伍给养困乏，未经训练，不愿离乡，部队迅速减员，又连遭日伪军的阻击，到达平西和留下的抗联队伍总共3 000多人，但正是这些抗联部队和四纵留在冀东的三个支队，成为开辟冀东抗日根据地的骨干力量。

八路军主力和抗日联军西撤后，冀东抗日武装只有四纵留下的三个各有百人的支队和西撤受阻返回的抗日联军千余人，分散在冀东的西部、中部和东部坚持游击战争。当时，四纵的三个支部和抗联部队各自为战，未形成统一领导，同时，各地暴动时建立的抗日政权，也因地方干部随军西撤而解体，日伪军又卷土重来，群众斗争情绪低落，冀东武装抗日由高潮转入低谷。此时，正值日军攻陷广州、武汉后，停止战略进攻，全国抗战已从防御阶段转入相持阶段，日军回师华北，并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以军事“扫荡”为主要内容的“治安肃正”行动，日军的扫荡使坚持冀东游击战争的抗日武装处境艰险。

面对冀东地区抗日游击战面临的困境，中共中央给予高度关注并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指挥了冀东抗日游击活动。在西撤受挫后，毛泽东曾指出：

冀热察地区有许多有利条件，是可能坚持游击战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但是也有许多困难，要经过长期艰苦斗争，才能达到目的。[6]之后，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在平西成立，提出了巩固平西，开辟平北，坚持冀东的“三位一体”的战略任务，[7]重新打开冀东抗战局面。后来根据形势的变化和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不再大规模挺进冀东，不再发起第二次暴动，确定了“冀东的坚持与发展，主要依靠冀东的党，冀东的人民的艰苦斗争，由小股的多股的游击队发展成为大的游击队，由多块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发展成为大块游击根据地”，并将冀东抗联和八路军三个支队，统编为冀热察挺进军第十三支队，中共冀东地委改为中共冀热察区委冀东区分委，从此冀东有了党政军统一领导，形成了开创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新局面。

经过近一年半的坚持，八路军各游击支队在党和人民群众配合下，终于在日伪军反复的围攻和“扫荡”中，坚持下来，到1939年，冀东地区抗日斗争形势逐渐走出低谷。1939年初，冀东党组织决定开辟西部以盘山为依托的蓟（县）平（谷）密（云）地区；中部以鲁家峪为中心的丰（润）玉（田）遵（化）地区；东部以腰带山为中心的丰（润）滦（县）迁（安）地区的三块抗日游击根据地。经过半年的奋战，开辟出西部、中部和东部三块游击根据地。此后，冀中地区人民抗日武装不仅抗击了日伪军4 000多兵力的“扫荡”，而且配合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百团大战”，冀东各地抗日武装向北宁铁路沿线和各地据点的日伪军出击，使被日伪军分隔成两大块的游击区联结起来。

1939年7月，晋察冀边区冀东专署建立后，紧抓各级政权建设，成立抗日群众团体，推行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使根据地有了空前发展，建起了七个县级政权，辖村3 000个，人口110万。至此，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基本区已初步形成。此后，在冀东抗日根据地基础上，中共创建了冀热辽抗日根据地，与已经创建的北岳抗日根据地、冀中抗日根据地共同组成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华北敌后开辟的第一块抗日根据地，为华北抗战乃至整个敌后战场如何开展游击战、开辟敌后战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注释：

①毛泽东、彭德怀致朱德、任弼时电，1937年12月16日。

②④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回忆史料》



(2)，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第357页。

③《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2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192页。

⑥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冀东抗日暴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2页。

⑦萧克：《萧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273～274页。

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形成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创建之后，按照中央指示，一百二十师于1938年8月继续向绥远挺进，并于同年12月，创建了以大青山为依托的绥西、绥南、绥中三块游击根据地，逐步同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开辟了华北敌后抗日的新战场。

大青山位于阴山山脉中段“东至燕山，西与乌拉山接连，绵延三百余公里。山不太高，却颇为壮观。山峰间高度相差不大，一般在海拔二千米左右，最高不过二千三百米。”大青山地形十分特殊，山区内“纵横交错的深谷险壑，以突兀的悬埃峭壁构成黄河以北的天然屏障。”[①]除了地势险要，大青山地区战略位置也十分重要。这一地区处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外翼，距离晋西北腹地只有400公里，也是陕甘宁边区的北方门户，是华北通向大西北的咽喉要地。如果“开辟这块根据地，既可以粉碎日军西进宁夏、甘肃，分割大西北的企图，又可以与晋西北、晋察冀部队相互配合作战，扼制日军对我陕甘宁边区的进攻”[②]正是因为大青山地区对八路军及中共中央如此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初创工作取得一定成果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就提出建立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设想。

1938年5月14日，毛泽东专门致电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肖（克）指出：“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请你们迅即考虑此事。[③]按照中央的指示，一百二十师经过深入分析研究，于1938年5月16日，决定派出由第三百五十八旅七百一十五团和师直骑兵营一个连组成大青山支队，由李井泉任支队长兼政治委员，姚喆任支队参谋长，七百一十四团政委彭德大任支队政治部主任。[④]为了加强大青山支队的战斗力与政治力量，一百二十师还决定派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所属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和战动总会晋察



绥边区工作委员会的几十名干部随同大青山支队北上。第四支队约 300 人，其成员多为原山西省太原市成成中学的学生，很有生气，由成成中学原校长刘铺如任支队长。战动总会晋察绥边区工作委员会是 7 月在贵岚县组成的，由武新宇任主任，武达平、张晋勋、李维中、乔风山分别任组织、宣传、武装、动员分配部长，他们此次北上的任务主要是进行发动和组织群众抗日的工作。1938 年 7 月 29 日，在李井泉、姚喆指挥下，大青山支队、四支队和战动总会工作人员，共 2 300 多人，开始向大青山挺进。1938 年 9 月下旬，支队主力到达大青山地区，在归绥东 40 公里处的面铺窑子与杨植霖领导的蒙汉抗日游击队会师，初步完成了向大青山地区开进的战略任务。

大青山支队主力抵达后，为了组织群众抗日，赢得民众对我军的支持，建立抗日根据地，立即展开抗日游击战，向东突袭陶林城，歼敌一部。此后大青山支队又多次袭击日伪军，1938 年 9 月 14 日夜北攻乌兰花，歼敌百余名。同时二营一部于归（绥）武（川）公路上的蜈蚣坝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斗仅进行了 25 分钟，共消灭日军 80 多人，其中少佐军官 1 人，缴获机枪 9 挺、掷弹筒 5 具和一批枪支弹药。”⑤接着，第三营向绥西挺进，连克石拐子、萨尔沁和后窑子矿业公司，歼灭日军百余人，伪军 600 多人。10 月，初支队 1 营越过平绥铁路抵达苏勒图一带，与七百一十五团参谋长李文卿所率部队会合。至 1938 年末，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战斗，大青山支队横扫阴山几百里，在铁路以南建立了以蛮汗山为中心的绥南游击区，在铁路以北，归武公路以东，以大滩一带为中心建立了绥中游击区，在归武公路以西，从归绥到包头西接河套地区建立了绥西游击区，基本形成了包括 18 个市县在内的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

日伪军在接连遭到打击后，开始猖狂地报复，于 1938 年冬调集伪蒙军六七千人对大青山根据地展开扫荡。敌军在黑石旅团长率领下，分别从大同、集宁、归绥、包头一线出动，兵分三路，向绥南、绥中、绥西游击区发动冬季大扫荡，妄图消灭此地游击武装，摧毁刚刚开辟的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为粉碎日军扫荡，一百二十师利用山区的有利地形，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展开游击战。一百二十师主力避开敌人的锋芒，而以游击小组到处袭扰敌人。结果游击小组常常牵着敌人的鼻子来回转圈，弄得敌人整日东奔西窜，疲于奔命。八路军的出色表现，粉碎了敌人扫荡的同时有力敌打击了敌人，鼓舞了民众的抗日热情与抗战的信心。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大青山的民众中树立起了很高的威信，八路军通过实际行动让民众相信，共

产党领导的军队是真正抗日的队伍！有了八路军，就不会亡国了！为我军在大青山地区进一步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政权创造了条件。

八路军开进之前，原国民党绥远的省、地两级和大多数县政府的人员，早已逃到河套等地，乡村政权也被日军利用，变成了伪政权。为了逐步解决政权问题，在八路军军事上取得胜利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大青山地区的组织也进一步建立健全，并逐步建立起在中共绥远省委领导下的基层政权。1938年11月22日，中共绥远省委正式成立，白如冰担任书记，委员包括武新宇、刘瑞森、刘遂生、李井泉、赵通儒、于占彪、白成铭。绥远省委受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以大青山支队活动地区为中心，领导包括包头至大同和大青山至后套地区的抗日斗争。在此前后，绥蒙总动员会在绥中、绥东、绥西三个游击区内，设立了办事处，并建立县级动员委员会，行使财政职能。到1939年春，在中共的领导下，绥西、绥中、绥南分别成立了地区、县、区三级战动总会，代行抗日政权的职能，除了负责部队的物资供给，还领导游击队、青救会、农救会、妇救会等群众抗日组织。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的创建，标志着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形成。

1940年8月，八路军在武川西梁村召开了绥远各族、各界、各抗日民主党派的代表会议。会上决定成立察绥行政办事处，制定了察绥施政纲领，并作出了建立萨拉齐、武川、阳林、归武等九个县的民主政权的决定，把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推向了新的阶段”。[⑥]此后，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发展，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晋绥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

在一百二十师创建大青山根据地的同时，在山东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少数红军干部及地下党员依靠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开始了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尝试。

山东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坚持华北抗战的四大根据地之一，主要包括津浦路以东的山东大部地区和江苏、安徽、河南三省边界的部分地区，这一区域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山东是联结华北和华东的纽带，可以由此南下华东，北逼平津，且与晋察冀和太行根据地成鼎足之势。”因此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对坚持敌后抗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⑦]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可以追溯到1937年秋。1937年7月到8月间，平津相继失守后，日军分兵沿津浦路南犯渡过黄河，山东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韩复榘和国民党官吏纷纷逃跑，政权出现了很大空白。在此情况



下，以黎玉为书记的中共山东省委将坚持抗战的责任独立自主地担当起来，并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精神，发出“每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应该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山东各地人民的抗日武装起义风起云涌，先后举行了徂徕山、黑铁山、天福山、牛头镇、十字路、泰西、湖西、鲁西北、冀鲁边、苏鲁边等地武装起义，并组建了人民抗日武装，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为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日斗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38 年 5 月，徐州失守后，山东完全沦为敌人后方。为了加强山东的抗战力量，使之成为华北抗战的战略一翼与联结华中敌后战场的战略枢纽，中共中央决定派部队进军山东。1938 年 5 月，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向 115 师发出了入鲁的指示。接到命令后，一百一十五师立即组织了一支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准备向津浦路以东冀鲁边平原挺进，与那里的抗日武装会合，建立抗日根据地。挺进纵队以三百四十三旅政治部、直属队、六百八十五团二营和一百二十九师工兵连为基础，又从其他团抽调一部分骨干组成。7 月，挺进纵队组成，9 月 27 日，越过津浦路，跨进冀鲁边的边缘——乐陵县，在这里成立了冀鲁边军政委员会，揭开了挺进山东的序幕。

此后，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大了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的支持，1938 年 10 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派兵去山东”，进一步增强八路军在山东的力量。1938 年 11 月 25 日，中央军委指示八路军总部，令一百一十五师师部率三百四十三旅进入山东、淮北的新老黄河间，包括津浦铁路东西、胶济铁路南北的广大地区。按照中央的指示，一百一十五师政委罗荣桓和代理师长陈光率领一百一十五师师部及六百八十六团于 12 月由晋西北出发，向山东挺进。在挺进过程中，一百一十五师还积极展开抗日游击战，1939 年 5 月，在肥城以南的陆房地区粉碎口伪军 8 000 余人的九路围攻，歼日伪军 1 300 余人，取得得了梁山歼灭战的重大胜利。

在此期间，一百一十五师三百四十四旅和三百四十三旅的六百八十五团，分别进入鲁、豫、苏、皖地区。1938 年 11 月，三百四十四旅六百八十八团奉命由冀南转赴山东，进至馆陶、冠县、丘县地区，由陈赓统一指挥。部队到达这一地区后，于 12 月配合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部第十支队歼灭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王来贤部，创建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11 月初，三百四十三旅六百八十五团由晋西孝义出发，从安阳北越过平汉路，12 月底到达山东菏泽，转入苏鲁皖三省边沿微山湖西区丰县，进入湖西地区，首战崔

庄、韩庄，歼灭伪军王献臣部 800 余人。1939 年 4 月，六百八十五团击退了丰、沛、萧三县 4 000 敌军对湖西区的联合扫荡，继之击退萧（县）铜（山）敌人的七路进攻。部队扩大到 8 000 余人，创建了以丰县、沛县为中心的湖西根据地。6 月，六百八十五团东越津浦路，进入宿县、灵璧，粉碎了日伪军的七路合击，开辟了宿迁、睢宁、泗县、灵璧地区。战后留下一个大队坚持皖东北，大部兵力留津浦路西并向西发展进入亳县、鹿邑、拓城、商丘等地，与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新四军游击支队配合，开辟了以永（城）夏（邑）萧（县）宿（县）为中心的苏豫皖区。

与此同时，从 1939 年 5 月开始，一百一十五师师本部与六百八十六团主力，分批由泰西地区，东越津浦路，进入新泰、蒙阴、费县、泗水等县的边区，10 月进入费县南部的抱犊岗山区，并与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会师，拔除日伪据点多处，争取了一些地主武装保持中立，建立和巩固了以抱犊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从此，一百一十五师打开了发展鲁南抗日根据地的新局面。

1939 年上半年，一百一十五师主力各部纷纷开进山东各地，为创建抗日根据地展开游击战争，在山东站稳了脚跟。此后，一百一十五师逐渐将工作的重点转到建立基层政权方面，以便筹粮筹款，进一步发动群众，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1939 年 7 ~ 8 月间，一百一十五师各部在莱芜、新泰、蒙阴、沂水、临朐、东平、平阴、宁阳、长清、泰安等县先后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到 1940 年 3 月间，山东建立的民选现政权已有 40 多个。至 1939 年底，共建立了 90 多个县政府，一个行政主任公署，成立了山东省参议会，范明枢任议长。还成立了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黎玉任主任委员，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实际行使山东省政府的职权，至此创建民主政权任务基本完成。[8]

到 1940 年底，一百一十五师在山东已经创建了包括鲁西（含湖西）、鲁中、鲁南滨海、胶东、清河、冀鲁边等根据地，总人口达 1 200 万，面积达 3.6 万平方公里，并成立了省参议会和行使政府职权的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还建立了一个行政主任公署，14 个专员公署，95 个抗日民主县政府。在开辟根据地过程中，山东抗日武装力量也在不断壮大，一百一十五师由最初的 1 万余人已发展到七个旅，共 6 万多人。山东纵队也编为五个旅两个支队，共 5 万余人，加上各地的地方武装，山东抗日武装力量已发展到 12 万余人。



注释：

①董希真：《抗战在大青山》，《星火燎原》（抗战回忆录专辑），战士出版社，1981 年版，第 235 页。

②⑤李井泉等：《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八路军回忆史料》（上），解放军出版社，1989 年版，第 373 页，第 377 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第 78 页。

④《贺龙年谱》编写组：《贺龙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 220 页，1988 年版。

⑥姚喆：《大青山上红旗飘》，《星火燎原》（5），士出版社，1981 年版，第 196 页。

⑦梁必业：《一一五师在鲁南》，《星火燎原》（抗战回忆录专辑），战士出版社，1981 年版，第 271 页。

⑧徐向前：《忆在山东的一年》，《星火燎原》（抗战回忆录专辑），战士出版社，1981 年版，第 258 页。

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除八路军外，另外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新四军，抗战时期一直在长江两岸，日军的大后方坚持对日游击战。新四军的抗日活动牵制了日军相当部分的兵力，为中国人民最终赢得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支抗日武装最初是由活跃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

1935 年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湘、赣、闽、浙、鄂、豫、皖、粤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坚持对敌的斗争。同时，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也一直关注着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在西安事变后与国民党的谈判中，中共代表一直积极为南方红军游击队争取合法地位，1937 年 8 月，继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奔赴华北前线开展抗日战争之后，中共中央就留在南方八省活动的一些红军和红军游击队问题，与国民党地方当局继续展开了谈判。八一三事变后，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争取，国民党承认南方各省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江西省政府和有关专署成立了“招抚委员会”，同时国民党军队也陆续停止了对赣粤边各地红军游击队的进攻。但国共双方对一些具体问题，如谁任改编后的军队的军长等重要问题，迟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随着抗战形势日益严峻，国共两党就具体改编问题的意见也日趋一致。1937 年 9 月 28 日，蒋介石通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国民政府军委会于 1937 年 10 月 12 日颁布了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番号，并指示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等迅速编组部队，向华中敌后进发。中共也于同年的 12 月 28 日，批准了关于新四军编为四个支队和干部配备的具体方案。1938 年 1 月初，何应钦正式核定有关新四军的编制、薪饷及干部配备问题。不久，又批准了项英、张云逸、周子昆、袁国平、邓子恢等人分别担任副军长、正副参谋长、正副政治部主任的委令。

在国共两党上层谈判的同时，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和



驻军的地区性谈判也在进行。1937 年 8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对南方红军游击队作出专门的指示：一方面“在保存和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可以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同时，中共中央也提醒南方红军游击队“要严防国民党瓦解与消灭我军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在达成停战协议后，应抓紧时间，大力进行整训，防止国民党的收买、利诱、分化阴谋，以便在新的条件下为执行党的路线而奋斗。”[①]此后，中央关于南方红军改编谈判问题一再提醒红军指战员提高警惕，不能给国民党任何分化瓦解队伍的机会。1937 年 9 月 14 日，张闻天、毛泽东又专门发出指示，严肃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地方党容易陷入右倾机会主义，这已成为党的主要危险，请严密注意”。[②]

而此时，活跃于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虽然自红军主力长征后即被国民党封锁隔绝于穷山绝岭之中，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系，但是各游击队指战员一直关注国内形势，并通过所能找到的少量资料逐渐了解了中共中央的政治态度的转变。陈毅、项英领导下活跃在赣粤边油山一带的红军游击队在反围剿斗争的同时，就通过所能找到的少量的香港、汕头的华侨报纸以及国民党方面的报纸，初步了解到我党关于国共合作、联蒋抗日的政治主张和改编红军游击队为抗日队伍的基本态度，并根据当前形势和中共中央的决策联系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游击队改编的看法。项英起草的《中国新的革命阶段和党的路线》一文指出：中国革命已发展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阶段。在现阶段“国共合作必须严格遵守党中央所指出的原则，即在特区和红区中党的领导权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党的独立性和批评自由的保持；抗日战争的领导权的争取。游击队必须遵照党的路线来进行抗日合作，在上面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谈判；必须彻底转变对国民党的政治态度，力求公开半公开地开展群众工作，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并争取其中的领导权。”在项英领导下，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开始转变政治态度，争取合作抗日，并把红军游击队改名为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陈毅起草的《向赣南军政当局提出合作意见书》，具体阐述了红军游击队改编主要条件：要求国民党地方当局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言论行动的自由；释放政治犯；解散铲共团；重新组织抗日武装；红军游击队全部集中，组成独立抗日部队；保证游击队的给养；保护游击区群众的利益等。

八一三事变之后，项英、陈毅决定进一步作出合作姿态表明诚意，促进

改编工作早日完成。1937 年 8 月中旬，陈毅以个人名义，给大余县县长兼“江西省招抚委员会”副主任彭育英发出“快邮代电”，阐明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8 月 27 日彭育英亲书“感秘代电”专函，对中共项英、陈毅“历年奋斗，艰苦革命，于敬佩之余，精神大为感召，明确了解非有中共参加抗日之力量，决不能战胜日寇”，并派其秘书进入梅山游击区，将电函转送赣粤边特委，表示欢迎红军游击队前来洽谈国共合作事宜，并提出，希望红军游击队能派一负责人出山谈判，时间越快越好。接着，国民党第四十六师、国民党大余、南康、南雄、信丰、赣县等县长，又联署发出了《告中共同志书》的“快邮代电”，表示出对红军游击队敬佩之情以及愿与游击队代表谈判，共商北上抗日的具体事宜的愿望。赣粤边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地方政府通电通信为双方和谈奠定了基础。

1937 年 8 月，中共赣粤边特委首先派中共南雄县委书记去大余与国民党地方当局接洽谈判事宜。1937 年 9 月 6 日，陈毅和国民党大余县县长彭育英在梅岭脚下的钟鼓岩洞真观进行了谈判。中共代表提出了国共合作抗日七条协议：一、由彭德怀电请江西省第三、四、八行政区各县停止武装清剿；二、释放各县被扣押的共产党人；三、地方各界要化除对共产党的歧见，以利统一抗日意志；四、红军游击队的改编，视人枪多寡，编为正式国军，听候中央建制调遣抗日；五、红军游击队原有政训和军事指挥人员得予保留；六、湘鄂豫皖闽浙赣粤各省红军游击队的下山改编问题，由项英、陈毅负责；七、定于 9 月 11 日由彭育英陪同陈毅前往赣州军政当局。最后决定改编手续，克日实施。对于中共提出的条件，大余县县长表示，对陈毅所提的条件不敢擅自做主，请陈毅到赣州与江西省政府的代表商谈。

于是，陈毅又到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及 46 师的代表谈判。1937 年 9 月 8 日，陈毅代表中共赣粤边特委与国民党代表，在国民党池江区公署举行首次正式谈判。在赣州谈判中，陈毅重申了大余谈判的内容，并进一步提出：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红军游击队改为江西抗日义勇军，开赴前线抗日，但必须保持部队的独立性和共产党的领导，保持独立的建制；义勇军与八路军同等对待；保证游击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证抗日自由，共产党的一切活动不得限制；释放政治犯；游击区的保甲长实行民选；不得追缴租税和租债等。国民党谈判代表、江西省保安处参谋长熊滨提出九条改编意见，包括停止游击队的活动，停止打土豪，绝对服从政府一切命令，听候改编等。国民党方面开始并没有接受，其第四十六师代表甚至提出“无所谓



国共合作，这种说法英、美不习惯”。中共代表陈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当即质问他：“你代表谁？代表英、美吗？要是代表英、美，就没有资格和我谈判。我们的队伍要下山，你挡不住！中国有共产党，英、美也挡不住！”此后，双方经过艰苦的谈判最终达成协议：红军游击队按陈毅提出的办法，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部队集中后，暂照国民党保安团待遇提供给养。关于其他问题，国民党代表只同意报省政府作最后决定，并担保可以解决。在谈判期间，陈毅多次要求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国民党方面却借口国际关系影响，予以拒绝。

1937 年 9 月 24 日，陈毅又与项英一道，到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进行谈判，解决了国民党军队从游击区撤退，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在南昌建立红军游击队接洽处等六个问题。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9 月底，项英、陈毅在南昌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公开信》，要求各游击队立即集中，听候改编，为抗击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而战斗。

项英、陈毅在南昌与国民党谈判过程中得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博古、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等正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与国民党就国共合作抗日问题继续谈判。项英立即拟定电报稿，交保安处发往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并通过博古、叶剑英转电毛泽东、张闻天，报告了与国民党江西省当局谈判的情况。这是 1935 年春突围以来，项英、陈毅第一次向中央报告工作。

除大余谈判、赣州谈判外，南方其他地区的抗日游击队也在这一时期先后与本地国民党基层政权或当地驻军举行了谈判。1937 年 6 月，闽粤边红军游击队经与国民党第一百五十七师师长黄涛谈判达成协议，改编为粤军保安大队；7 月下旬，鄂豫皖边红二十八军与国民党豫鄂皖剿共督办公署和安徽省政府代表谈判达成协议，改编为鄂豫皖工农抗日联军；9 月初，闽西红军与福建省第六行署专员张策安等谈判达成协议，改编为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③]10 月中旬，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武汉行营和第五十师代表谈判达成协议，改编为抗日游击第一支队；11 月底，闽东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福建省当局谈判达成协议，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福建抗日游击队第二支队等。

在国共两党中央与地方展开谈判并初步达成协议之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开始与中共领导人接触研究关于新四军整编问题，1937 年 11 月，他专程赶到延安与中共主要领导人会面。在得到中共中央的认可和支持后，1937 年 11 月 13 日，叶挺以新四军军长的名义在武汉

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发表谈话，表明其抗战态度，接着又主持成立了新四军筹备处，开始于各地红军游击队联系。此时，红军南方游击队重要领导人项英也抵达延安，向中央汇报三年来游击战争的情况，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并号召全党学习南方游击队。[4]

1937 年 12 月，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叶挺、项英以及中共中央派到新四军的第一批干部赖传珠等人齐集武汉，12 月下旬，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成立。1938 年 1 月 6 日，军部迁至江西南昌的高升巷原张勋公馆，月底开始办公。[5]新四军军部转移至南昌，宣告新四军建制正式确立。

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下辖四个支队，共 1.03 万人，6 200 支枪。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参谋长胡发坚，政治（部）主任刘炎。下辖第一、第二团，共 2 300 人；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罗忠毅，政治（部）主任王集成。下辖第三、第四团，共 2 900 人；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参谋长赵凌波，政治（部）主任胡荣，下辖第五、第六团，共 2 100 人；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萧望东，下辖第七、第八、第九团，约 3 100 人。另外军部及其直属部队、机关 980 余人。1938 年 2 月 20 日，新四军命令江南各部游击队向皖南岩寺集中，从 2 月下旬到 4 月，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支队及军部先后抵达皖南地区，等待整编后开赴抗战前线。[6]

新四军成立后，为了统一领导华中地区敌后的党政军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分会，项英为分局书记兼分会书记，陈毅为军分会副书记，并在部队中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新四军奔赴抗战前线的同时，留下了一些领导干部和骨干力量继续坚持南方革命，并且在南昌、福州、龙岩、赣州、平江等地设立了新四军办事处、留守处或通讯处。抗战期间，这些机构在发动群众，沟通新四军前线与后方联系，为前线补充兵员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38 年初新四军改编完成后，新四军肩负起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与开展对敌游击战，支援正面战场的重要任务，立即开赴抗日战场，在华中大地涌现出一支抗日的劲旅、先锋。新四军在抗战期间牵制消灭了大量日军和伪军，为争取抗战胜利之日早日到来贡献着力量。

注释：

①《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298～301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③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闽西三年游击战争》，《星火燎原》(4)，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35页。

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47页。

⑤《新四军的前身及其组成与发展经过概况》，《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9页。

⑥张凯，陈辛仁，李清泉，潘启琦：《新四军军部创建时期的回忆》，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抗日战争回忆录》，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9页。

新四军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

国共两党就新四军整编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后，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在叶挺、项英率领下集中于皖南岩寺整编准备挺进江南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从1938年至1944年，新四军转战大江南北，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中国最富饶的华中地区，先后创立了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豫边、苏南、皖江、浙东八块抗日根据地，为敌后抗战的广泛开展创造了条件。

华中地区位于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主要包括江苏的绝大部分，安徽、湖北的大部分和河南、浙江的一部分，以及湖南洞庭湖北岸、江西的一小部分。作为连接中国北方和南方的枢纽，华中地区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北枕横穿中国大动脉的陇海铁路，南扼长江天险，是联系华北和华南两大根据地的枢纽，是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屏障；是争夺华南、发展华南的进军基地。"①华中地区地势平坦，河湖港汊众多，人口密集，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商业经济繁荣，工农业生产发达。新四军在华中创建不仅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同时也可以为抗日游击战提供充足的后勤补给。

1938年初，新四军开赴华中之时，该地区已经被日军所占领。同时，随着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撤走，华中地区社会秩序混乱，人民生活十分痛苦。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抗战形势以及改编后新四军的情况，决定改编后的新四军在皖南、皖北集中后，立即迅速开赴苏南、皖东敌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大胆地建立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以求得生根、发展和壮大。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致电项英、陈毅，提出：新四军"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础。如有两个支队，则至少以一个在茅山山脉，另一个则位于吴兴、广德、宣城之线以西策应。"②为了解除项英等新四军领袖对于平原地区开展敌后抗日游



击的顾虑。1938年5月4日，毛泽东专门致电项英，提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侦探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③]

东南分局高度重视中央的指示，项英专门组织东南分局、军分会的成员学习后，同时还将指示转发给各支队，并要负有进军苏南敌后任务的第一、第二支队认真研究执行。5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作出关于新四军具体行动方针的指示，提出："新四军正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的积极的深入到敌人的后方去，以自己灵活坚决的行动、模范的纪律与群众工作，大大的去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与团结各游击队在自己的周围，扩大自己，坚强自己，解决自己的武装与给养。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④]

遵照中央的指示，新四军各部立即向华中敌后挺进，实施战略展开。1938年4月，新四军在皖南岩寺集中，从1、2、3支队抽调一批团以下干部与一个侦查连组成先遣队，由粟裕率领，于1938年4月28日，由皖南挺进敌后，拉开了新四军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序幕。先遣队于1938年5月19日到达苏南镇江地区，"正式进入了江南战场"。[⑤]6月17日粟裕率先遣支队在韦岗伏击从镇江方向开来的日军车队，首战告捷，振奋了人心，鼓舞了士气。同年5月和7月，陈毅和张鼎丞分别率领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挺进江南，开展苏南地区抗日游击。1938年6月，罗炳辉率领第五支队挺进皖东，开辟皖东根据地。其后，1938年8月，谭震林率领新四军第三支队进入皖南，初步展开豫皖苏地区抗日活动。

1938年下半年，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大了新四军创建根据地工作的指导。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制定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抗战战略方针。会议还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将原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项英任东南局书记，从组织上保证了中央路线、方针的贯彻

执行。

为了加强对华中地区新四军的指挥，1939 年 2 月，新任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专程赶至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中央的精神，并与新四军领导人具体制定新四军的战略任务“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⑥]1939 年 12 月，刘少奇率领中原局机关到达淮南，领导华中地区的抗日斗争。刘少奇初到华中即主持召开了三次中原局扩大会议，明确了开辟敌后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任务。会议期间，刘少奇多次强调了政权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他形象地提出，有了兵就要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根据地；有了根据地就要建立政权，有了政权就可以筹粮、筹款、收税，部队也不用向“人家”（指国民党）讨饭吃了。刘少奇还阐述了新四军东进和北上的重要意义。[⑦]此后，根据刘少奇的建议，中共中央部署新四军一部由苏南渡江北上，八路军一部越陇海路南下，在华中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根据地。

从 1939 年到 1940 年，根据中央的指示，新四军积极行动，迅速在敌后建立了多块抗日根据地。1939 年初，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在金坛和芜湖周围地区取得一系列作战的胜利，巩固茅山根据地并为新四军以茅山为依托向北向东发展创造了条件。1939 年 2 月，第一支队一部向北挺进，4 月便控制了扬中和扬州以东之大桥一带沿江地区。5 月，第一支队一部向无锡、江阴、常熟、苏州、太仓等地东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随后又与中共上海党组织领导的常熟、嘉定、青浦等地抗日游击武装相配合，共同开辟了苏（州）常（熟）太（仓）和澄（江阴）锡（无锡）虞（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当年夏，第一、第二支队又开辟了太（湖）、滆（湖）地区。第一、第二支队东进北上推动了苏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与此同时，第三支队在皖南地区多次粉碎日伪的扫荡，有力地打击了伪军的嚣张气焰，保卫了皖南抗日阵地。

在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开辟苏南和皖南抗日根据地的同时，新四军第四支队及随后组建的彭雪枫游击支队也开进敌后，开展抗日斗争。1938 年 11 月，新四军第四支队一部挺进淮南铁路以东地区，随即与当地抗日游击队及东北军挺进团取得联系，共同在皖东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9 年初，驻在大别山地区的国民党军不断向皖东地区伸展，企图将新四军第四支队挤出皖东。中共中央针对这一形势，于 5 月派叶挺创建新四军江北指挥



部，由张云逸兼任指挥，徐海东任副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兼任政治部主任。与此同时，成立了以张云逸为书记的中共江北指挥部前委。随后对江北新四军进行整编，徐海东兼任第四支队司令员。以第八团为基础，成立了新四军第五支队，整编后，第四、第五支队分别活动于津浦路西和路东地区。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第四支队开辟了以定远东南的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第五支队开辟了以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游击支队在豫东初步打开抗日局面后，便于 1939 年初由杞县、太康、濮阳、鹿邑等地区向东挺进，以开辟商丘、亳县、永城等地区。1 月，游击支队在亳县以北之芦家庙歼灭伪军 300 余人。2 月，在杞县瓦岗地区，以伤亡 30 余人的代价，击退 2 000 余日伪军的进攻。5 月，游击支队主力进军淮上地区。11 月，游击支队改称新四军第六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至 1939 年底，第六支队发展到 1.2 万余人，使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打开了豫皖苏边的抗战局面。

至此，新四军在华中地区完成了战略展开，到 1939 年底，新四军在八路军南下部队的大力配合下，创建了苏南、苏中、皖中、皖东等多块抗日根据地。华中抗日斗争的形势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强劲势头。与此同时，新四军运用灵活的战术，多次阻击日军，打击伪政权，粉碎日伪军的扫荡，给予华中地区日军以有力打击。至 1939 年底，新四军同日伪军共交战 764 次，毙伤敌人 11 259 人，俘虏 751 人，还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和补给物资。⑧在打击敌人的同时，新四军队伍也有了很大发展，1939 年，新四军队伍由整编时的 1 万余人扩展到 5 万人。⑨

新四军在开辟抗日根据地开展对敌游击战过程中，也十分重视基层政权和党组织的建立和恢复。在苏南，1938 年 7 月 7 日，在新四军第一支队战地服务队发动群众建立的救国团体的基础上成立了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四县抗敌总会。8 月，在第二支队活动地区成立了江（宁）当（涂）溧（水）三县抗敌自卫委员会。此外还组织了抗战动员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从最初的统战性质的群众组织逐渐发展为半政权组织，对安定社会秩序，团结抗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根据地的逐渐创建，迫切需要建立健全党的组织机构。1938 年 7 月，在新四军第一支队活动地区，成立了苏南

特委，以吴仲超为书记，陈洪为副书记，下设丹南、丹北、江溧句、江当溧四个县委。在新四军第二支队活动地区成立了苏皖特委，书记谭启龙。在新四军第一、二支队特委党组织、抗敌总会和抗战动员委员会的领导组织下，各地群众普遍发动起来，为巩固抗日根据地贡献力量。

在皖中和皖东地区，党组织恢复和发展较早。新四军第四支队挺进之后，1938 年 7 月，皖东省委成立，书记刘顺元，组织部长李世农，宣传部长喻屏。皖东省委下辖淮海以南、淮南路以东地区，包括全椒、定远等县。另外，在河南竹沟、皖东根据地也建立了河南省委及其中共领导的基层政权组织。至 1940 年为止，在华中地区的各个根据地基本上党组织都已恢复并有所扩展，在党组织领导下的包括各界民众参加的基层政权也在逐步建立，为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长期展开对敌斗争创造了条件。

华中地区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以统帅华中地区的武装。为此，中共中央于 1940 年 11 月上旬决定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11 月 17 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海安成立，叶挺为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陈毅为副总指挥，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统一指挥陇海路以南之新四军、八路军等抗日武装。

到 1940 年底，新四军建立了皖中、皖东、皖东北、苏南、苏中、苏北、豫皖苏、皖南在内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在坚持全国持久抗战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实际上形成了对上海、南京、武汉、杭州等大中城市的包围，正是这些敌后农村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砥柱中流》，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 年版，第 53 页。

②《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48 页。

③④《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11 页，第 112 页。

⑤《苏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年版，第 62 页。



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5页。

⑦汪子珍：《刘少奇在苏中指导我们做群众工作》，新四军暨华中根据地研究会一师分会编《战斗在大江南北——新四军一师老战士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205页。

⑧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2册），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64页。

⑨张廷贵等：《中共抗日部队发展史略》，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503页。

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讨伐

自九一八事变日本大举入侵中国东北以来，驻扎在东北的日伪军及各级日伪政权即不断遭到东北抗日游击队以及各种民众自发抗日武装的打击。为加强统治，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经过长期准备、周密策划，于1936年初炮制出了“满洲国治安肃正计划”，妄图通过军事讨伐和政治镇压相结合的方式，彻底肃清在东北的共产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

此次日军所制定的“治安肃正计划”与以往的单纯军事扫荡计划有非常明显的区别，这是一个在“治安肃正”和“思想工作”的配合下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讨伐的系统长期的计划，此次计划预计三年完成，第一年度（1936年4月～1937年3月）“肃正”的重点地区为伪滨江、吉林、间岛、三江等省。第二年度（1937年4月～1938年3月），进一步加强第一年度所进行的地区的“肃正”工作，并为在全东北开展“肃正”工作做好准备。第三年度（1938年4月～1939年3月），对特殊地区给以“彻底的肃正”，建立在全东北的巩固的治安基础。

另外，在每一年度计划实施过程中又详细规定了具体的实施步骤。在军事讨伐正式开始之前，首先开展“民匪分离”工作，采用集团部落、保甲连坐、警备道路、经济封锁和“宣抚”等多种手段相结合进行“治本”工作。然后通过大规模的军事讨伐，集中围剿抗日武装来开展“治标”工作。在整个计划执行的过程中还特别突出强化警察、特务组织，实行法西斯统治，目标是从根本上“排除赤化思想”，镇压共产党、团组织和抗日反满团体。

“肃正计划”制定后，为配合军事讨伐，日军首先采取措施，实现所谓的“匪民分离”。正如日本关东军所宣称的那样，这一做法的目的：“在于使匪团和民众从地理上予以隔离。使散居在山间幽谷的民众集中到官宪给予彻底保护的地区，即把他们收容于官宪的监视之下。为了上述目的，按照保甲制度，10户以上为单位，实行集团部落，使匪团和农民完全隔离，以期



彻底完成所谓匪民分离工作。"[①]实际上就是要割断抗日部队与群众的联系，孤立抗日队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伪当局将东北的村屯划分为不同的区域，在抗日武装活动较少的一般村屯中，日伪当局主要是通过推行保甲法，组织"组委团"镇压控制抗日行为。而在抗联活跃的抗日游击区，日伪当局则全力推行"集团部落"政策，具体做法是：在日本关东军于伪军相互配合下，首先强行将中国居民驱赶至固定的地点居住，将分散的各村屯"归屯并户"形成集团部落，一般是 80 户到 100 户为一个集团部落，[②]然后将原来的村屯烧毁，变成无人区，并派治安队、伪军或日军驻扎。"集团部落"形成之后，于四周设有围墙、电网、深壕、炮台。同时还加强了对集团部落内部农民群众的监视和控制，例如经常进行户口调查，出入有门岗把守，检查"良民证"，还有"指纹班"核对指纹。日伪不准居民随便出入，也防止抗联进入。[③]集团部落周围还要修筑警备道路、架设警备电话线，加强日伪各部队之间的联系。这样"集团部落"就成了日伪统治压迫、监视人民的"集中营"和"人间地狱"。凡居民出屯，一斤粮、一两盐、一斤棉、一双鞋也不许带出，[④]市场亦不许买卖。否则便以"通匪罪"论处。从 1936 年开始大规模兴建集团部落，到 1936 年末，日伪已在东北的北部、东部与东南部等抗日武装活动地域建立了 3 261 个"集团部落"。1937 年以后，日伪又继续增建了更多的"集团部落"，据日伪方面统计，1937 年新建"集团部落" 4 922 个，1938 年新建"集团部落" 3 210 个，到 1939 年，东北"集团部落"达到 13 451 个。[⑤]集团部落大规模兴建后，抗日队伍无法隐藏在村民中，更无法得到所需的物资补给，同时大量无人区的出现也限制了抗日武装活动的范围，给抗日武装的活动带来了巨大影响。

在大规模兴建集团部落过程中，日本关东军也加紧了大讨伐的军事部署，并将治安肃正的重点区域定为伪三江、滨江、吉林、间岛四省和伪安东、通化两省各一部。计划三年内针对重点区域进行"东边道"、"三江地区"、"三省联合"、"三肇与嫩江"四次大讨伐，以彻底消灭抗日武装特别是东北抗联，但在实际执行时又将时间向后延长至 1941 年。

从 1936 年至 1941 年的四次大讨伐，是相互联系与交叉进行的。首先，日本关东军于 1936 年末至 1937 年进行了"东边道大讨伐"。日伪当局共调集了伪军 8 个混成旅和 1 个骑兵旅大约 2.7 万人对通化、辑安、临江等九个县实施讨伐，重点讨伐了在这一地区活动的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给东北抗联第一路军造成了不小的损失，第一路军第二军军长王德泰、第一军二师师长

曹安国等人牺牲。

1937 年 7 月，全国抗战爆发后，在驻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更加急于完成其“治安肃正”以及“巩固东北”的计划，以便抽调兵力进攻华北，最终实现其独霸中国的阴谋，日本关东军纠集大量的伪军开展长达一年之久的“三江地区大讨伐”。1937 年夏讨伐开始，日伪军在第四军管区司令官兼伪三江省省长于琛澂、讨伐司令部顾问北部邦雄的带领下，出动了关东军一个师团的全部，四个师团的一部、两个独立守备队各一部，另外还有配合日军作战的伪军 5 个旅、5 个团和兴安支队等，奔赴“满洲国东部地区，特别是东边道及东部三角地带，以及滨江、三江两省之松花江江北地区。”[⑥]此次讨伐的目标是活跃在三江地区东北抗联第三、四、八、九军。在军事讨伐的同时，日伪政府派出了由宪警组成特别工作队、特搜班、特设游击队等，进行策反、宣抚等肃正工作。

在此次讨伐过程中，日军频繁地围剿抗日军民，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酷。从 1937 年 9 月中旬开始，日军一方面强行逼迫农民在收获之后，将青纱帐迅速放倒，同时针对抗联队伍在秋收之后必定准备过冬粮食的经验，对粮食进行严格控制，并派重兵防守所有交通要道。1937 年冬，日军又组织了“七县联防”，对抗联围追堵截。在西丰、开源一带日伪军联合讨伐抗联第一军第三师，在重兵围剿下，第三师被迫转移，日军又在联军转移途中设立埋伏，以 1 000 多日伪军围歼 80 多人的小股突围部队，形势对抗联极为不利。与此同时，日伪军还调集了大量日军部署在联军可能突围之地，于是第三师政委周建华带队于清原突围时，再次遭遇 200 名敌军，周建华牺牲，第三师遭重创，被迫撤大苏河、南山城、柳木桥等地休整。

经过 1937 年冬季的大讨伐，抗联各部在缺衣少粮的情况下被迫持续作战，损失惨重。1938 年春青纱帐起后，日军才收缩至集团部落中休整，待到秋季再次出动。如此循环，到 1939 年春，第二期讨伐结束之时，活跃在三江地区的东北抗联各部均遭受了巨大损失，第三军部队人数大减，第四军军长李延平、副军长王光宇相继牺牲，第八军军长谢文东、第九军军长李华堂先后投敌，使第八军、第九军几乎瓦解。

在日伪军进行第二期讨伐的同时，仍有两万多名日伪军在东道边地区进行讨伐，使抗联第一军第一师被瓦解，第一军游击区面积大大缩减，1938 年初，第一军为了保存实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隐蔽于辑安老岭山地区。

为了彻底消灭抗联第一路军，第二期讨伐刚刚结束，第三期的联合大讨



伐立即着手准备。1939 年春，日伪军设立了伪军第八军管区，加强了对通化、间岛、吉林三省民众的控制，1939 年 10 月至 1941 年 3 月，司令官野副昌德率领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的 7 个大队，伪军 8 个旅、2 个教导队、3 个团，伪吉林、间岛、通化三省绝大部分县警察队、伪奉天、滨江、锦州三省的警察支援队等，共 7.5 万多人，对抗联第一路军开展了"联合大讨伐"。这次大讨伐给东北的抗日武装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特别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遭受严重损失，第一方面军瓦解，第二、三方面军遭受严重损失，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第一方面军指挥曹亚范、第三方面军指挥陈翰章、副指挥侯国忠、警卫旅政委韩仁和、第一路军副总司令魏拯民等相继牺牲。

不待第三期讨伐结束，1940 年初至 1941 年秋，关东军又开始了"三肇与嫩江大讨伐"，

1940 年初，日伪当局调集兵力对黑嫩平原，即北安、三肇及嫩江两岸地区的主要作战区域进行讨伐。日伪军分别在北安省和滨江省西部地区以及兴安省东部，龙江省北部地区对抗日游击队同时进行围剿，然后增加兵力，以东北抗联的游击根据地德都县朝阳山、通化县南北河和三肇地区为重点，进行大规模讨伐。重点讨伐东北抗联第三路军。并且在平原与山区联结处，安置了许多日本开拓团、青少年义勇军训练队，形成绵延千里的包围圈。[7]此次讨伐使第三路军损失惨重，指挥员冯志刚、赵敬夫、韩玉书等相继牺牲。

日本关东军从 1936 年至 1941 年的大讨伐，不仅使东北抗日武装遭到巨大损失，同时日军实行的所谓治安肃正的行动也给手无寸铁的东北平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日本实行"归屯并户"的过程中，大量农民由于不愿离开而惨遭杀害。即使是听从日军的安排到指定的集团部落居住，很多人也难逃一死。在集团部落内广大农民的生活极为悲惨，他们住的是马架子和地窨子，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加之传染病蔓延，每天都人有病死、冻死、饿死。据统计，1936 年仅通化县的集团部落传染病者即达到 1 132 人，其中 153 人死亡。金川县为 1 508 人，死亡 137 人，柳河县为 4 385 人，死亡 305 人。据不完全统计，至抗战胜利为止，整个东北因"归屯并户"而受害的约 500 万人，占当时东北人口总数的 1/7。[8]

在大讨伐的同时，关东军在伪军以及伪警察宪兵的配合下，还大量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制造了一起起骇人听闻的惨案。在这些讨伐区和其他地区，日伪当局还出动大量军警宪特，实行法西斯白色恐怖的所谓"特殊工

作”，连续不断地制造各种流血事件，搜捕与残害共产党员、爱国志士与民众，摧残与破坏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的组织与群众团体。

经过长达四年之久的大讨伐，从表面看日本关东军基本实现了其最初预定的目标。在此过程中，东北抗联蒙受了巨大损失，抗联重要的指战员与部队主力几乎损失殆尽，余部也不得不转移至苏联境内休整，与此同时，东北的中共党组织遭到破坏，大量抗战民众遭到迫害。但是，不屈的东北人民在斗争最为残酷的时刻也没有放弃民族解放的理想，继续同日本帝国主义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幻想通过大讨伐来实现“长治久安”最终也未能实现。

注释：

①〔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战史丛书·关东军》(1)，朝云新闻社，1969年版，第224页。

②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下)，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806页。

③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关于昭和十一年四月至昭和十四年三月警宪施行之满洲国治安肃正计划大纲》，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大讨伐》，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12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5页。

⑤[日]浅田乔二、小林英夫著：《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统治》，[日]时潮社，1986年，第217页。

⑥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大讨伐》，中华书局，1991年第1版，第215页。

⑦刘枫著：《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8页。

⑧伪治安工作委员会：《宣抚监察第二班报告》，1942年7月。



抗联第一路军及其抗日活动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抗日武装日益壮大，其中在东南满地区活跃着两支规模较大的抗日武装：以杨靖宇为首的抗联第一军和以王德泰为首的抗联第二军。抗联第一、第二军在积极开展对日斗争的同时逐渐加强了联系，1936 年两支抗日武装合并、改编为抗联第一路军。第一路军创建后，所属各部更加积极配合作战，更加有效地打击日伪军。

为创建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中共东满省委及东北抗联第一军、第二军主要负责人都作了大量的工作。1936 年 6 月，中共东满省委书记、第二军政委魏拯民率一个连 60 余人与杨靖宇的第一军军部会师于金川县（今辉南）河里地区惠家沟，初步讨论了两个方面军加强合作问题。并在同年 7 月，南满党的第二次代表会议后，召开了由东满党委与一、二军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河里会议，正式讨论两军合并整编的问题。此次河里会议由杨靖宇和魏拯民共同主持，会议主要讨论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以及新形势下东、南满党组织和抗联 1、2 军面临的任务和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现状和前途等问题。会议根据两地党和军队领导人对东、南满总的形势的共同认识和魏拯民与吉东党、军队负责人周保中等会晤时向中央提出的建议，决定首先将抗联第一、二两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建立第一路军总司令部。

整编后的第一路军由杨靖宇任总司令，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拯民任政治部主任。抗联第一路军下辖第一、二军。

第一军军长兼政委杨靖宇，政治部主任宋铁岩，参谋长宋光勋，秘书处长韩仁和，军需处长严骊顺，军医处长徐哲。一军警卫团团长许惜仁，政委安昌勋，政治部主任黄海峰。第一军下辖三个师，第一师师长兼政委程斌，政治部主任胡国臣，参谋长宋光勋，秘书处长李敏焕，军需部长韩震，一师下辖三个团和少年营、警卫连，五团划归三师后，留下的八、九连都归师部直接领导。第三团团长侯俊山，政治部主任李铁秀；第四团团长隋祥泰；第六团团长刘仁凤，政委李哲秀，少年营营长王德才。第二师师长兼政委曹国

安，参谋长李希敏。二师下辖一个团和少年营；第八团团长玄继善，政委赵成才。第三师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建华，参谋长杨俊恒，政治部主任柳万熙。第一军除以上三个师外，还有归后方领导的游击队和地方上的小部队、青年义勇军等部队。

第二军军长王德泰，政委魏拯民，政治部主任李学忠。二军军部设有教导团和少年营，教导团团长李兴绍。第二军下辖四个师，第四师师长安凤学，政委周树东，参谋长朴德范，四师下辖第一、第二、第三团。第五师，师长史忠恒，政委王润成，参谋长陈翰章。第五师下辖第四、第五、第六团。第六师政委曹亚范，下辖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团。在第一路军共领导的两个军，6个师中，实际上第一军主要领导第一、第三师，第二军则主要领导第二、四、六师，对第五师只做原则性的指导。[①]

另外河里会议还决定，抗联成立后，第一路军分成三部分，分头执行任务。具体部署是：第一军军部、第一师、第三师和第四师远征辽西热河内蒙地区，打通与关内红军及党中央的联系，扩大游击区，同时充分发动群众开展对日的游击战。第二军军部和第六师深入南满原第一军的游击区与第一军第二师配合，在坚持老游击区，同时开辟长白山游击区，为长期抗日战争打下基础，并呼应第一军西征。第五师受第五军领导仍留在东满绥宁地区坚持东满旧游击区的抗战。

按照会议部署，第一军军部在会议结束后立即从河里镇出发，向南活动谋求与第一、第三师会合以便传达贯彻河里会议精神和战略部署。杨靖宇在率部西征途中偶然得知南满伪军头目邵本良的动向之后，第二军军部在杨靖宇率领下在四道江埋伏下来，并于1936年8月4日成功地伏击了邵本良的给养队，毙伤俘日伪军50余人，日本指导官英俊杰雄被当场击毙，并缴获大批给养物资给养。1936年9月初，第一路军获得邵本良部要从柳河孤山子移驻八道江的情报后，再次伏击邵本良部。于9月11日在邵本良转移的必经之路——金川县寒葱沟又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将邵本良部押送的军用物资悉数截获，其中有许多服装和粮食。此役，邵本良虽然勉强逃脱，但因为屡次失败已经失去日本人信任，住进沈阳南满医院很快一命呜呼了。[②]歼灭邵本良后，第一军经过短期休息，研究了西征路线后，决定由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率领第一师由南路西征，军部主力在杨靖宇率领下，返回辑安、宽甸一带组织抗日游击活动，策应第一师西征。

此后，由宋铁岩率领的第一师师部及散团，少年营共400多人，由宽



甸、本溪交界处，分三路出发，计划从本溪、沈阳中间地带插入辽阳附近，越过南满铁路和辽河，直插辽西、热河地区。在西征过程中被日军发现，在与日军作战过程中遭受一定损失。师长宋铁岩考虑到敌人过多，无法前进，又损兵折将，决定分成小股部队返回老游击区。1936 年 9 月底，第三师返回宽甸、桓仁时只剩 100 多人，损失惨重。

按照第一路军干部会议的决定，在第一军第一师西征的同时，第二军军部领导第一军二师和二军六师在老游击区坚持斗争，开辟长白、抚松等县的游击根据地，牵制敌人兵力，分散敌人的注意目标，策应西征军的前进。1936 年 7 月，6 师一部先后在抚松县的松树镇、东西砬子和长白县二道岗等地进行战斗，毙伤敌伪兵四五十名，取得了一些胜利。第二军还发动了攻打抚松县城的战役，1936 年 8 月，第一路军副总司令、二军军长王德泰和一路军政委魏拯民率第二军军部、第四、六师主力 1 500 余人及共同作战的义勇军队伍 600 余人转移到抚松县西北部清江甸子、大苇沙河一带山区集结。1936 年 8 月 17 日，二军军部和金日成所率第六师及义勇军万顺、万军、李洪斌等部约千余人在王德泰、魏拯民指挥下进行了攻打抚松县城的重大战斗。攻城部队英勇奋战，占领了东山炮台和小南门外阵地，消灭了反扑的几十名伪军。此战虽因参加战斗的部分义勇军队伍不够坚决，城里内应发生变故等原因未能攻下城池，但却给予敌人以相当杀伤，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的气焰。抚松战斗之后，第六师在金日成指挥下挥师长白；王德泰、魏拯民的 2 军军部、第四师主力继续游击于抚松、安图县境。活跃在遂宁的第五师在陈翰章、王润成带领下，以宁安南湖头，房身沟一带为中心，与吴军留守处部队配合，经常以小部队形式四处游击，也取得了一定的战果。

第一路军成立初期，第一、第二军在总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积极开展抗日斗争。第一路军中只有第四师由于远在桦甸一带，联系困难，没有按照河里会议部署参加西征，而与二、六师在二军军部率领下转战长白、抚松、临江、通化，开展游击活动，策应西征部队。经过艰苦奋战，东南满地区形成了以抗联第一路军为中心的抗日斗争的高潮，第一路军在战斗中不断壮大队伍，至 1936 年末，抗联第一路军发展达到高峰，队伍人数达到 6 000 人，其中第一军 3 000 余人，第二军约 2 000 余人，而在第一路军统一指挥下的其他抗日武装则达到万人左右，广泛“活动于西起辽、沈，南达安乐（今丹东），北至长图铁路，东至鸭绿江地区，共约三十余县。”[③]至此，南满地区形成了强有力的抗日武装力量。

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的发展壮大与抗日斗争使日本侵略者惶惶不可终日，于是日本关东军炮制了所谓的“治安肃正计划”，从 1936 年 10 月开始对抗联进行了大规模的讨伐，针对日军的大讨伐。第一路军制定了相应的对策。1936 年秋冬，第一路军一方面积极准备给养，修盖密营，以躲避敌人的讨伐，另一方面在敌人集中兵力与联军活动地区实施讨伐之时，第一路军继续执行原定军事计划，再次组织 3 师从北路西征。

1936 年 11 月初，由 1 军 3 师组成的西征骑兵部队从兴京出发，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行军和英勇战斗，过清原，越铁岭，跨南满铁路，到达了辽河岸边。后因当年气候反常封冻较晚，又无渡船，队伍被阻于东岸。敌人又尾追进逼，西征部队只好绕道返回，此次西征，第三师遭受巨大损失，400 多人的队伍返回的只有百人左右。这次西征虽然没有实现与党中央建立联系的目标。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三师的西征的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扩大了抗联的影响，震动了日伪统治。特别是在敌人统治严密、我党我军基础薄弱的辽阳、营口一带扩大了影响。人民群众从抗日联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军队，也看到了光复失地的希望。

第二次西征失利后，抗联第一路军面对的形势更加严峻。日本为了巩固其侵华的后方基地，开始不断地大规模地讨伐抗日联军。其中 1937 年至 1939 年的针对抗联第一军的大讨伐使第一军损失惨重，南满游击区再次遭到严重破坏。第一军直属部队不得不离开本溪、宽甸、桓仁游击区，向辑安老岭的山区里转移。1938 年 5 月，魏拯民带领二军一部自临江转进辑安，在老岭的五道岗与杨靖宇部会合。杨靖宇、魏拯民指挥部队采取围城打援的办法，于 1938 年 6 月 12 日，在辑安县蚊子沟外围伏击敌军，一举歼灭号称“满洲剿匪一支花”伪军索景清旅三十二团的一个营，8 月又于长岗庙岭附近，伏击前来“围剿”的伪军索景清旅骑兵四十二团及步兵三十二团余部，伪军旅长索景清带领少数残兵败将跳下山崖逃跑。这次战斗中，毙伤敌人 60 余名，俘虏 30 余人，其中击毙日本指导官骑兵中尉西田重隆和步兵上尉高冈武治。

就在敌我斗争最为激烈的关键时刻，第一师师长程斌叛国投敌，并胁迫第一军主力一师部叛变，同时还向敌人供出了第一路军的组织机构和行动计划，使第一路军的处境更加被动。为了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第一路军领导人杨靖宇、魏拯民等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取消一、二军番号，改编成三个方面军和一个警卫旅，实行分区作战。抗联各部队指战员，临危不惊，不畏



艰险，主动出击，巧妙地打击敌人，依然取得了许多胜利。

抗联第一路军的顽强抵抗再次激怒了日本侵略者，1939 年 10 月，日本侵略者调集 7.5 万重兵，对活动在东南满地区的抗联一路军进行重点“讨伐”。日伪军针对抗联的战斗特点，制定了分割包围，追击围攻的战略和“狗蝇子战术”，日夜不停地进行搜查、追击；同时更残酷地推行“集团部落”和“三光政策”，英勇的抗联一路军指战员，在缺衣少食的条件下，与超出自己几十倍的敌人日夜苦战，部队减员日益严重。杨靖宇、魏拯民等领导决定部队化整为零，将各部队化成小分队活动，以利冲出敌人的包围。在突围的过程中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牺牲，抗日联军遭受巨大损失。

杨靖宇英勇牺牲后，部队在魏拯民的指挥下，几经周折之后，终于跳出了敌人“讨伐”的中心地带。6 月下旬，魏拯民率领军部警卫旅与第二方面军会合后，袭击了敦化哈尔巴岭车站和驻黄泥河子的伪警察部队，补充了一些给养。1941 年 3 月 8 日，因积劳成疾和食品、药品极度缺乏，年仅 32 岁的魏拯民不幸病逝。抗联一路军又失去一位优秀的领导者，部队活动更加困难。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的游击战争转入最为艰苦的阶段。但是部队的意志没有被打垮，抗联缩编后，开展小型游击战争，保存了一部分精华和骨干力量，进入苏联境内整训。在苏联整训期间不断派小部队深入中国抗联游击区进行游击战，直到 1945 年 8 月，抗日联军配合苏军重新进入东北，终于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东北。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从 1936 年成立至 1941 年转移整训，在东北坚持战斗四年多的时间，在克服了严酷的自然条件同时，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无数次的战斗，积小胜为大胜，给予日本关东军、伪军和各个伪政权以有力地打击，极大鼓舞了东北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同时，抗联第一路军在东、南满地区开展的游击战争，也有力地配合了中国抗日军队在关内的正规战争。正如毛泽东所说：“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未起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份力量。”④在开展抗日游击战的同时，以杨靖宇为首的第一路军还积极宣传中共的抗战路线与方针，在东北民众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37 年 7 月 7 日，全国抗战爆发，第一路军发表了《“七七”事变告东北人民抗日救国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鲸吞全中国的野心，号召东北人民动员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傀儡政府满洲国”。⑤鼓舞了东北

人民的抗战热情，大大提高了中共在东北地区的影响与威望。

正因如此，中共中央对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苦斗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38年11月，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给东北同胞的电文中称赞东北抗日军队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⑥1949年5月，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电文中再次指出抗联斗争是光荣的，称“此种光荣历史应受到党的承认和尊重。”⑦

注释：

①东北抗日联军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下），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676~679页。

②王传圣：《痛歼邵本良》，东北抗日联军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下），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568页。

③周保中：《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星火燎原》（4），解放军出版社，1961年版，第369页。

④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1版，第158页。

⑤吉林省档案馆编：《七七事变后吉林人民抗日斗争史料》，《兰台内外》，1995年第5期。

⑥《中共中央致东北义勇军及全体同胞电》1938年11月5日。

⑦《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7页。



抗联第二路军及其抗日活动

继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成立，1937 年 10 月，为了抵抗日伪军的“三江省大讨伐”，更加灵活地配合作战打击日军，中共吉东省委决定将原抗联第四军、第五军、第七军、第八军和第十军改编，成立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新生的抗联第二路军创建之初就面临极其严酷的对敌斗争环境。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进一步加大了对东北抗日武装尤其是抗日联军的讨伐力度，以巩固其在东北的统治。1937 年底，日军关东军对松花江下游地区进行重点讨伐，企图将抗联第四、第五军等部压缩包围于松花江下游、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之间的三江平原聚而歼之。为粉碎敌之围歼计划，加强对活动在吉林省东部地区抗联部队的领导，东北抗联第四、五、七等军主要负责人从 1937 年底开始积极筹划建立东北抗联第二路军。

1937 年 2 月 13 日，周保中初步草拟了建立抗日联军的草案即《东北抗日联军建立路军提纲草稿》，提纲中分析了日本侵略者对东北抗日游击活动所进行的日益残酷的镇压以及抗联各军所面临的形势，指出：由于各军自成系统，缺乏呼应配合，于开展游击战争不利。为加强各部间联系应筹建路军。对于这一问题，吉东地区的党组织也曾设想将抗联部队改编为四个路军，并提出：“集中军事领导作统一的进行”，现在是更迫切了，并认为“建立路军，为过渡到将来全东北抗日联军司令部所必要办法”。[①]同年 3 月 14 日，吉东党扩大会议又进一步研究了建立“路军”的问题。但由于这一时期敌人“讨伐”的加剧，领导干部不易集中，筹备工作一直拖延至 1937 年下半年才正式开始。

1937 年 9 月 29 日，周保中在方正县四道河子主持召开了吉东省委常委工作会议，会议首先分析了全国抗战爆发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形势，认为目前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不仅是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而且是为了牵制和打击敌人配合全国抗战，尽管目前形势对我们不利，

斗争环境也非常严酷，但是东北抗战与全国抗战是一体的，有全国抗战的支持，我们一定会胜利。在当前，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日伪，并防止被敌人各个击破，必须加强对吉东地区抗联部的统一领导、集中指挥，为此“路军决定理立”，[②]同时决定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筹备委员会”，并组建总指挥部。

1937年10月10日，中共吉东省委以“吉东抗日救国总会”的名义发布《关于筹备第二路军的通告》，宣布“务于最近期间完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之建立，是为至要。”正式宣告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的建立。第二路军由中共吉东省委领导，以第五军为骨干，以第四、五、七军为基础，联合第八、十各军和东北义勇军姚振山部、救世军王荫武部。[③]周保中任总指挥，赵尚志任副总指挥，崔石泉任参谋长。第二路军建立后主要活动于“中长铁路哈长段东侧，牡丹江流域，松江右岸，乌苏里江左岸地区，共约二十余县。”[④]

第二路军成立后，总指挥周保中立即着手对第二路军所属各部进行整顿，以适应路军指挥系统的需要，迎接新的对日斗争。为了加强四军的领导力量，周保中在1937年10月中旬的省委常委工作会议之后，调吉东省委委员、五军二师师长王光宇到四军任副军长，调勃利县委书记鲍林到四军军部帮助工作，第五军1师参谋长王城峰也调至四军。

1937年10月末，周保中又专门赶赴第五军进行整顿、缩编。11月初，周保中与王光宇达到宝清县第五军二师和警卫旅的前方指挥所，并检查了五师下江部队的工作后，召开了第五军军部干部会议。会议决定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同时对第五军进行整编。将第五军警卫旅改编为第五军第三师，李文斌担任师长，王效明任政治部主任，下编第八、第九两个团。同时对第五师队伍进行改造，将有吸食鸦片的人一律送到后方基地戒烟，对第五军干部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第五军军长为柴世荣，政治部主任宋一夫。经过整编，第五军的战斗力大为增强。

第四、五军整顿的工作刚刚告一段落，中共下江特委和抗联七军代表又来到宝清，要求吉东省委派人至饶河帮助整顿下江特委和七军领导机构。周保中在初步了解第七军了情况后，决定亲赴饶河主持部队整编工作。1937年12月31日~1938年1月5日，周保中以中共吉东省委代表身份指导召开了下江特委扩大会议，改组了下江特委和七军党委，并明确规定下江特委和七军党委受吉东省委领导。这次会议使下江党的组织和抗联七军党组织更加



健全和巩固。1937年下半年第二路军的创建以及整训工作，为加强吉东地区抗战力量，迎接新的、更艰苦的斗争作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抗联第二路军建立后，对敌斗争环境更加险恶，1937年冬，日本关东军针对第二路活动的主要地区——三江地区进行重点讨伐，同时出动的日、伪兵力达五六万人，妄图将三江地区抗日队伍“聚而歼之”。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中共吉东省委和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组织西征，冲破敌人封锁。早在1937年3月，中共吉东省委扩大会议在讨论吉东一带抗日斗争形势时就指出，抗联部队必须突破敌人的封锁包围，建立新的根据地，进行持久的抗日斗争。[5]但出于各种原因，在一段时间内未能将上述设想付诸实施。直至1938年初，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中共吉东省委再次提出，在敌人的军事“讨伐”日益加剧、经济封锁不断强化的形势下，联军远征计划不能一误再误，必须排除一切困难执行这一计划，以脱离敌人包围，并贯通南满及热河方面联军的联系，达到与内地抗战连成一气、呼应动作的目的。据此，中共吉东省委决定立即组织抗联第二路军的西征。

此次西征按照总指挥周保中的计划，首先将分散在松花江下游地区的第四、第五、第八军参加西征的部队，集结到依兰县刁翎，尔后南进越过绥芬河至宁安铁路，与第二军第五师会合，建立宁安、东宁根据地；此后，以绥宁地区为依托，越过老爷岭，向西部五常、舒兰等县伸展，恢复哈东游击区，再横越吉（林）敦（化）、延（吉）敦（化）铁路，视情况西进，并打通与东南满第一路军的联系。

按照预定计划，1938年初，第四军主力及第五军第二师分别由宝清、富锦、桦川等县向牡丹江下游的刁翎集结。因日军封锁加严，西征部队突破重重阻击，于6月下旬才集结完毕。29日，西征部队领导人在第五军后方基地莲花泡召开联席会议，根据日军在中东铁路牡（丹江）绥（宁）段沿线防守加严的情况，改变原定进入绥宁地区的计划，决定向西南舒兰、五常方向突进。7月2日，西征部队袭击牡丹江左岸三道通，突破日军封锁，尔后经四道河子、三道河子，越过老爷岭，在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艰苦行军150公里。8日进入苇河县境，12日，出敌不意地攻占苇河县东北楼山镇，毙伤俘日伪军140余人，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100余支及一批军需物资，炸毁桥梁和通信设施。楼山镇战斗后，日军即调集兵力进行围追堵截。西征部队再次调整部署：第五军第一师第二团、教导团返回刁翎地区后方基地；第五军第一师向横道河子进发，到老爷岭与第二军第五师会合；第四军第

一、第二师和第五军第二师等主力继续西进，经苇河、珠河向五常方向转移。13日，西征部队主力进入哈东地区，因地形不熟，误入延寿县境，多次遭日军堵截。7月底入苇河县境，与迷失方向的第五军第一师会合。8月初，西征部队主动出击，4日在南沟战斗中毙伤日伪军40余人。日军发现西征部队的行动后，立即从哈尔滨、长春等地调集日伪军3 000余人，在飞机的配合下，围追堵截。为摆脱日伪军追击，西征部队主力迅速离开中东铁路沿线，向五常方向转移，沿途因日伪军严密封锁，不断遭到日伪军追击，战斗连连失利，部队伤亡严重。8月下旬，第四、第五军远征部队随即在五常县冲河分开活动。此时，第四军仅剩百余人，隐蔽于五常县小山子附近的密林中。9月下旬被日军包围，突围中部队失散，60余人被俘，军长李延平、副军长王光宇牺牲。第五军第一、第二师于8月下旬向舒兰前进，夜间过牤牛河时与日军遭遇，两师相互失掉联系。突围后，第二师由五常东返宁安，后与第二军第五师会合，转战额穆、敦化一带。第一师则向依兰、方正地区折返。10月下旬，在林口县乌斯浑河柞木岗山下，被日伪军包围，损失一部，突围部队于11月初到达刁翎第五军后方基地。第二路军的西征至此结束。

西征部队出发以后，第二路军五军军部、四军团守部队和五、七、八军下江部队在周保中亲自率领下，转战于宝清、富锦、虎林、饶河等地，不断破坏敌伪铁路、集团部落，打击日伪军。1938年2月，第七军第三师与第五军第三师联合在宝清县双流河子阻击日军，打死日军200多人。[6]1938年8月下旬，周保中率第二路军总指探部人员离开宝清向勃利、依兰、方正方面移动。自1938年11月开始，第二路军在这一地区接连不断遭到日伪军的骚扰，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和五军军部的活动陷入困难之中。为了摆脱险境，总指挥周保中决定分东、西两路突围。11月31日，周保中率第二路军总指挥部直属部队第九军李华堂部、救世军王荫武部300余人西进，绕过日伪军据点，通过封冻的牡丹江，翻越张广才岭，于2月8日袭击方正县山元木场，又于2月10日击退日伪军的追击，但未突出日伪军包围，重返刁翎地区隐蔽待机。与此同时，第五军军长柴世荣率东路突围部队突破了乌斯浑河封锁线，但未能通过图们至佳木斯铁路，被追返回喀上喀。3月，日伪军集中6 000余人，分成10多个讨伐队，将牡丹江下游抗日游击区分片包围，轮流出击，企图歼灭抗日武装。使我抗联队伍遭受巨大损失。其间，第二路军作战37次，虽然消灭一部日伪军，但未粉碎围攻。2月30日，吉东省委扩大会议作出了突出重围，“重振旗鼓，收集联军各部，力加整顿，坚持斗争”



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周保中于4月15日率总部警卫分队90余人向东突围，在刁翎以东击毙日伪军30余人，5月7日到达宝清县兰棒山。同时，柴世荣和第五军政治部代理主任王克仁率部在穆棱站越过中东铁路东线。随后，第五军转移到宁安县镜泊湖附近，同第一路军第三军取得了联系。至此，第二路军全部突围成功，继续坚持战斗。

随着日伪军讨伐力度不断加大，1940年之后，抗联第二路军进入了极为艰苦的时期，一方面日伪军大讨伐已经给抗联造成巨大损失，另一方面由于"归屯并户"，致使抗联长时间得不到足够的给养，部队战斗更加艰难。"抗联部队成年累月在深山密林中愿营，粮食、服装极端困难，常常十几天甚至几十天断粮，靠野菜、山果、树皮、草根充饥。在零下40度的寒冬，部队战士仍然穿着单薄的衣服，篝火成了野营不可缺少的伙伴。"⑦在最艰苦的岁月中，抗联第二军战士仍然没有放弃取得胜利的希望。1941年前后，第二路军一部转移至苏联境内整训，并于1945年与第一路军一同重新回到中国境内抗击日军。

1937年10月创建的东北抗联第二路军，与第一路军相比武器装备及部队人数等方面都明显不足，但是第二路军将士在最为艰苦的环境中仍然坚持战斗，成为吉林省东南部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为抗战胜利贡献了力量。

注释：

①吉林省档案馆，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下），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223页。

②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5页。

③《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关于筹建抗联第二路军问题的通告》，第179~180页。

④周保中：《忆东北抗日游击战》，《星火燎原》（4），解放军出版社，1961年版，第369页。

⑤中共吉东省委执行部，《西征经过的通知》，1939年4月25日。

⑥李忠义：《宝清会合后的第一仗》，周保中等著，《密林篝火》，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108~112页。

⑦徐云卿：《忆东北抗日战争艰苦岁月中的周保中将军》，中共吉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回忆周保中》，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页。

抗联第三路军及其抗日活动

1938 年东北抗联活跃于三江地区的第三、六、九、十一军成功地突破了日军三江大讨伐的包围圈，由松花江下游转战至小兴安岭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为了加强抗联各军之间的配合，1939 年，在中共满北省委的领导下，第三、六、九、十一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由张寿篯担任总指挥。第三路军的建立，大大加强了各军之间配合作战的能力，为赢得反讨伐作战胜利创造了条件，同时第三路军的创建也标志着第三、六、九、十一军西进突围计划的胜利完成。

1936 年开始，日伪当局对三江地区展开大讨伐，企图切断松花江南北各抗日部队的联系，并对下江抗联部队形成了一种包围的态势。而此时，抗联第四、五、七、八、九、十一军各部均聚集在老爷岭东，十分容易被敌人围歼。针对这一危急情况，1937 年，北满抗联司令部即提出，该处聚集的抗联队伍应向西北远征，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并认为“这是我们的生命线”。[①]此后，中共北满省委多次讨论这一问题，并在 1938 年 5、6 月间连续召开的北满省委第七、第八次常委会上再一次提出，为了保存部队的实力，粉碎敌人各个击破的阴谋，继续开展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必须跳出敌人的下江包围圈，到老爷岭西、黑龙江平原开辟新的游击区，这“是北满抗日联军的主要生路”[②]为了突围并开辟新的游击区，会议决定组织北满抗联部队第三、六、九、十一军主力穿越小兴安岭向海伦地区远征，以开辟黑嫩平原的新游击区。会议结束后，抗联各该部立即开始执行西征计划。

此次西征是在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领导下，由李兆麟、金策、魏长魁、冯治纲等干部具体组织实施的。根据抗联第三路军政治委员冯仲云回忆：此次西征的计划是“越过小兴安岭的千山万水，爬过了重重叠叠的峰峦，而向小兴安岭的西部山麓远征”，为鼓舞士气，在出征前，抗联各部还提出了“到西荒去，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的口号。为了胜利完成这次西征的任务，抗联各部必须尽量减少与敌军遭遇次数，抗日联军各部的西征路线都选



择环境艰苦的无人区，“小兴安岭是人迹罕至的深山，只有浓密的森林，丛生着没人野草的数千里山地。大批军队通过了这样的地带，是非常困难的，历尽了千辛万苦，受尽了饥渴风霜之苦。这支强悍善战的第三路军，终于达到了目的地。”③1938 年末，西征军按照预定计划到达小兴安岭一带。

在主力部完成西征任务后，第三、六、九、十一军和北满临时省委主要领导人均到达海伦、通北一带。为了部署北满抗联新的斗争任务，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于 1939 年 1 月 28 日召开了第九次常委会，此次会议为筹建第三路军做了初步的准备。会议首先对过去一个时期内西征各部的对敌斗争进行了总结。会议指出，1936 年到 1937 年，北满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东北抗联 11 个军．除了第一军、第二军一部及第十军以外，均在松花江下游活跃着，并且获得了惊人的发展。但是，1938 年下半年以来，由于日本侵略者实施残酷的军事“讨伐”，抗联各军之间缺乏统一的领导和计划，致使我军受到重大损失。为了摆脱这种被动局面，北满抗联部队和吉东第二路军分别实施了西征转移，现在此次转移任务已经完成。对于西征之后的抗联部队的任务，北满省委提出了两个方面，“首先要把我抗日联军游击运动和民众运动配合起来，重新布置有战略意义的方向，并加强内部巩固，去克服局部性的不平衡发展，争取局部形势高涨”，其次，要克服与全国总抗战的隔离性，“加速东北反日游击运动由不平衡的、隔离的、局部的运动，立即变为全局性的运动。”④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第九次常委会提出了争取北满军事领导的统一，开辟新区，打通与南满抗联第一、二军的联系，加强党的领导等项方针。并号召北满全党同志团结一致，“突破艰巨的局面”，为实现新的斗争任务而努力奋斗。北满临时省委第九次常委会是北满抗联主力转移至黑嫩平原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统一了抗联各部主要领导人的思想，坚定了抗战信念，为以后开展黑嫩平原游击战，加强对各军统一指挥，创建第三路军打下了重要基础。

此后，在北满省委的领导下，在第三、六、九、十一各军主要负责人积极推动下，1939 年 5 月 30 日，第三路军在德都县朝阳山宣告正式成立，并发表了《第三路军成立宣言》。《宣言》首先回顾了组成抗联各路军的抗日斗争历史：“东北抗日游击运动，……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面，仍在东北各地，孤军转战各地，于兹六载有奇，幸而将士用命，同胞应援，虽未能逐强敌于境外，然竟不顾一切艰辛困难，拼热血头颅，进出于松江流域、龙

江广原及北满各地；缴取大批武装，消灭无数匪寇，摧毁日‘满’统治，解除同胞疾苦，使敌寇首尾难顾，日夜忧心。”接着，《宣言》分析了抗战全面爆发后东北抗战新形势，“现在我们东北的抗日战争，已不像从前那样孤军无援了，已经得到了全国军民抗战的直接援助，成为全国抗战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马将军占山已奉国府命令率挺进军同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游击军出关杀敌。”在此种情形下，抗联迫切需要加强统一指挥，然而却苦于没有统一的指挥机构，“过去北满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虽曾于民国二十五年领导与提携各军在北满开展了广大的抗日游击战争，建树了很多光荣的历史功绩，但尚未能成为北满反日游击运动中巩固的统一的军事领导机关。当此紧急关头，我们为了适应新的环境，更加巩固统一的新的军事指挥与政治领导，现在比任何时候都为重要和迫切。”在这样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我们三、六、九、十一各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及东北人民的一致要求和同意下面，在北满抗日救国总会的领导与指示下，并经国府批准，决定以三，六、九、十一各军为基础，继东北抗联一、二路军之后，正式成立第三路军。”紧接着，宣言还提出了第三路军成立后的决心和奋斗的目标，“我们决定以最大的精诚团结的热诚信心，忠勇和毅力，去和敌寇血战，站在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共同胜利的立场，以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协助、互相督促的精神，来配合呼应东北抗联第一、二路军和马占山将军挺进军及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游击军及东北其他一切反日队伍，响应国内总抗战，以积极果敢精神，来破坏日寇在东北之一切军政设施，截夺敌寇武装供给，领导民众斗争，争取东北抗日运动的新的开展。”⑤

《第三路军成立宣言》表现出了东北抗日联军为国为民不怕流血牺牲坚持抗战的坚定的决心，宣言的发表极大地鼓舞了抗联各部的士气。同时新成立的抗联第三路军指挥部还发表了致东北抗联第一、第二路军、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游击军和马占山将军挺进军通电等，表达了第三路军全体将士“以头颅和热血领导广大军民进行积极抗日斗争，争取全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的决心”。

抗联第三路军的编制情况与第一、第二路军基本一致，设总指挥、参谋长各1名，分别由张寿篯、徐享植担任。另外根据北满省委第九次常委会的精神，为加强对第三路所所属各部队的领导，决定在第三路军总指挥部下设立龙南、龙北和下江3个区域性指挥部。改编后的抗联第三路军主要活跃于海伦、油河、嫩江、克山、克东以及绥棱、庆城、铁力、绥化、木兰、东



兴、巴彦、肇东、肇州、肇源一带。

经过整编的第三路军各部在总指挥张寿篯的率领下，在小兴安岭西麓平原地带，抓住一切有利时机积极开展对敌斗争。1939 年 5 月，日本关东军制造了向苏联进行武装挑衅的诺门坎事件。日伪主力大部调集中蒙边境，龙江腹地嫩海平原地区敌人兵力相对减少。中共北满省委得到消息后，立即指示抗联第三路军迅速将山边游击战争转向平原地区，深入龙江腹地，狠狠打击敌人。接到命令后，抗联第三路军各部以小兴安岭为依托，进人平原地带，采取昼伏夜出、远距离奔袭等战术，集中兵力，攻击日伪据点及交通通讯设施。龙南指挥部所属独立 1 师在周庶范率领下，于 1939 年夏到达绥化东、庆城西一带游击，该师 1 团一部在团长韩玉书率领下坚持木兰一带活动，并进行恢复地方党和群众组织的工作。独立二师在铁力一带活动，袭击了关门嘴子警察所，缴获甚多。1939 年 8、9 月间，龙南部队派出一支精干骑兵深入拜泉、明水、青冈、望奎各地游击。

与此同时，龙北部队的活动也异常活跃，他们攻城镇、袭据点，勇猛杀敌。1939 年 9 月 18 日，龙北部队一举攻陷龙江重镇讷河县城，成为黑嫩平原游击战开始以来最为精彩的一仗，轰动了北满各地。此战击毙日军 10 余名，俘伪军团长、特务科长、伪警署长等多人，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 130 余支、匣枪 100 支、子弹三万余发、汽车一辆及大批棉被、给养等物资。此后，第二支队及龙北其他部队又在讷河、嫩江、克山、德都等县进行了一系列战斗，连续取得讷河县孔国村、克山县西城镇、嫩江县鹤山车站等战斗的胜利。这些战役的胜利对于刚刚进入小兴安岭地区开展抗日斗争的第三路军来讲意义非凡，正如中共北满省委在龙北高级干部会议上所总结的那样：我第三路军部队“在江省北部极端困难的斗争中，英勇地开展游击运动，……开辟了德、讷、嫩等县广泛的游击区，建立了初步的游击据点的后方，开始产生新的反日部队，建立了初步的地方组织基础，摧毁了相当有意义的镇站，使敌寇更加心寒胆战。”⑥

黑嫩平原游击战争的开展以及北满抗联部队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很快便引起了日伪统治当局的注意。从 1939 年冬开始，日军调集数千日伪军，加紧对活动在讷河、嫩江、德都、克山等县抗联部队的讨伐。在不断增强的军事压之力下，抗联第三路军各部均遭受极大损失。针对日伪的大讨伐，抗联第三路军展开了反讨伐的斗争。

1940 年秋，根据北满省委指示，抗联第三路军第三、九支队利用城镇

据点敌人力量相对空虚之机，于9月25日联合攻打了克山县城。这次战役，在我军几乎没有伤亡的情况下，给敌人以重创，并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物资，包括追击炮四门，步枪1 000多支，子弹数十万发，击毁日本汽车一台，俘虏伪军100多人。[7]此后，第三、六、九支队分头行动，采取灵活的战术积极打击敌人。

第三支队由王明贵、王钧率领，向大兴安岭地区进军，攻袭了北黑铁路线上的霍龙门车站。1940年10月下旬，三支队在巴彦旗一带发动群众，宣传抗日道理，受到蒙汉各族人民的拥护。同年冬，日伪当局调集伪兴安省千余兵力，对三支队展开讨伐，为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王明贵率队从扎敦河北上，于1942年2月越境入苏。

第九支队在边凤祥、郭铁坚的率领下，在北安、通北一带活动。1940年11月，九支队袭击了李殿芳等"集团部落"，夺取部分给养。此后，随着斗争环境日趋恶劣，部队减员很大，九支队又转移到通河一带活动。1941年2月，九支队一个大队攻克了孙家船后，不断袭扰北安、通北、海伦一带，在抗击日伪军过程中缴获了大量的补给物资。

第六支队在支队长张光迪、政委于天放率领下，战斗在拜泉、明水、海伦、绥棱一带。第十二支队由许亨植率领，于1940年上半年转战于木兰、铁力等地。下半年，该部深入三肇平原地带，于11月8日，攻袭了肇源县城。1940年秋冬，由于日伪军讨伐，各支队均有大量伤亡。[8]1941年，抗联第三路军六、九、十二支队主要在庆城、通北、克山、拜泉一带活动。同年冬，抗联处境更加艰难，为保存实力，六、九、十二支队主力进入苏境。六、十二支队各留一部由北满省委书记金策、第三路军总参谋长许亨植率领，继续在铁力、庆城、绥棱、巴彦、木兰、东兴等地坚持开展游击战。1942年8月，许亨植率小队在庆城青峰岭宿营时，遭伪军包围，不幸牺牲。留在东北的抗联小部队在金策领导下，一直坚持到1944年1月才奉命人苏，1945年，第三路军所属各部与第一、第二路军一起重回东北境内，成为打击日军的重要力量。

在东北抗战处于异常苦难的情况下，第三路军在黑龙江、嫩江地区坚持游击战，狠狠地打击了这一地区的日伪统治，在广袤的黑嫩平原上燃起了熊熊的抗日烽火，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总抗战，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表现了东北军民不甘当亡国奴，誓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统治的崇高民族气节。

注释：

①《赵尚志、张寿篯给祥的信》，1937年8月28日。

②《北满临时省委给张寿篯同志的信》，1938年9月6日。

③冯仲云：《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④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斗争历史文件汇集》第24集，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1990年刊印，第253~259页。

⑤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183~184页。

⑥《中共北满省委关于江省北部游击运动给寿篯同志并转龙北全体同志的指示信》，1939年11月25日。

⑦王明贵：《智取克山》，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659页。

⑧《中共北满省委员会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1941年10月)，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14~230页。

中国共产党推动少数民族团结抗战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国各民族人民共同进行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在这场全民族的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针对我国少数民族众多的国情以及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分裂中国的罪恶计划，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为广泛动员全国少数民族积极投身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汉族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由于历史上曾实行过民族压迫的政策，造成国内各民族之间，特别是汉族同少数民族之间的长期存在着矛盾与隔阂。国民党执政时期仍延续了这种错误的民族的政策。即使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也没有制定、实行有利于民族团结的政策，反而增加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隔阂。日本帝国主义正是利用了这种隔阂，不断地进行挑拨离间，利用过去大汉族主义对蒙古族压迫所造成的民族隔阂，实行"抑汉扬蒙"来挑拨蒙古族对汉族的仇视，提出"帮助蒙古独立自治"、"民族协和"、"日蒙联合"、"共存共荣"、"收复蒙地"、"共同防共"等口号，优容上层王公，并施惠拉拢下层，组织傀儡伪"蒙古政府"，同时加以军事的威胁与监督，以各种政治上的羁縻政策骗取蒙古族的信任，妄图实现长期统治蒙古族地区的目的。对于回族上层及民众，日本帝国主义"穿着提倡回教的伪装"，打出建立"大回回国"的旗帜，不失时机地进行鼓动和欺骗，在回族中进行挑拨分离的活动，以实现其分离、灭亡中国的目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计划是"华北自治，上海中立，分化蒙回，捣乱华中、华南"。[①]最终"分而治之"，灭亡全中国。

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分化各民族的阴谋，中国共产党从抗战爆发之初就把团结少数民族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积极争取团结各少数民族以实现中华各民族精诚团结、抗战图存的目标。1937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现时对国内少数民族的政策，首先和基本的应当是团结抗日"。并提出："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②]在整个抗战



中，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少数民族问题方面矢志不渝地遵循这一原则，并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方针，进而制定了相关的具体办法。

1937 年 10 月 16 日，刘少奇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中专门阐述了“民族政策”问题，文章强调在当前形势下处理好少数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在当前如果不实行正确民族政策，可能产生“少数民族在日寇的欺骗与利用之下来反对中国与汉人”的严重后果③。同时刘少奇在文章中还阐述了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具体办法：“抗日政府对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政策，应以团结各民族共同抗日，援助各少数民族自决，反对大汉族主义为原则。”同时，“邀请各少数民族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④

在争取民族团结的总方针下，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抗战形势，针对蒙古、回族等少数民族制定了不同的具体政策。为了争取蒙古族人民积极抗战反对日本侵略者，1937 年抗战刚刚爆发，中共就初步提出了关于处理蒙汉关系的方法，1937 年 8 月 12 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中就提出：“应该争取这些少数民族的动摇上层分子（如德王之类）到抗战中来。另外，中共也十分重视争取回族人民积极抗战，1937 年 8 月 19 日，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任务及在回民中组织民族性党派问题致谢觉哉电》指出：“回民中应组织民族性党派，可用回民抗日救亡协会一类名目进行。”⑤

1938 年，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日本加强了策动少数民族独立的阴谋活动，中国共产党为了粉碎这一阴谋，逐步完善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政策和方针。1938 年 9 月 29 日至 11 月 6 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明确提出，抗日战争中党的民族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是：“团结中华各族，一致对日。”毛泽东在会上详细阐述了这一方针政策：“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针对着敌人已经进行并还将加紧进行分裂我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诡计，当前的第十三个任务，就在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所谓长期合作就是长期的民族统一战线”其中也包括了“所有民族，从汉族到苗瑶弱小民族”。⑥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为了争取少数民族积极抗战的具体策略，不仅“允许蒙、回、藏、苗、瑶、夷、蕃等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的权利”，还要根据情况给予少数民族特殊政策，如允许各少数民族“在共同对日的原则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建立统一的国家”。⑦此次会上，

张闻天的报告也强调了，“我们的方针”是“争取少数民族，在平等的原则下同少数民族联合，共同抗日”。在同年 11 月 6 日通过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明确提出，全中华民族当前的紧急任务，是“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彝、蕃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⑧]

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的讲话及通过的决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方针的正式形成。此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对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争取和团结工作。

对蒙古族开展统战工作中，中国共产党考虑到蒙古下层民众对蒙古王公的信仰，特别突出了对上层的统战工作。1938 年，毛泽东等《关于建立大青山游击根据地及党的政策的指示》明确指出：“估计蒙民的民族意识，蒙民对王公的信仰，对德王仍应采取争取的策略，继续执行要求德王回头抗日的口号。”[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共提出对蒙古贵族一定程度的让步，1938 年 11 月 20 日，中国共产党在关于蒙古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对德王及自治政府，不宜简单提出反对的口号，应具体指明日寇侵略事实，善意批评德王错误，要求德王及伪组织内的王公平民回头抗日”。[⑩]同年 11 月 22 日，《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再一次强调：“在绥蒙中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无论蒙人汉人，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均占着极重要的地位，必须上层工作弄的好下层工作方易开展，特别是在蒙人中，不把上层弄好，便无法开展下层工作。”并提出“利用一切公开合法地位大刀阔斧的去做上层工作来与下层艰苦深入的一点一滴的群众工作相配合的”，来实现争取蒙古贵族抗战的目的。

1940 年 4 月 5 日，《中共中央关于绥远敌占区工作的决定》强调指出：“蒙古工作应当成为绥远敌占区党的中心工作之一”。为完成这项工作，一方面“应特别加强对蒙古的上层工作”，另一方面中共还提出了一项新的任务，即“推动进步的蒙古知识青年到伪政权伪蒙军及蒙古各阶层中去进行长期隐蔽的工作，取得上层分子的信任与地位”。[⑪]为了在少数民族工作中体现“仁至义尽”，中央还进一步提出了关于在蒙古族中工作避免关门主义倾向的问题，对于亲日以至降日的蒙古族人，一般地应采取耐心的说服与劝告，不轻易以“蒙奸”名义捉杀，即使有必要打击坚持降日的蒙奸，也最好经过蒙古人自己来进行。1940 年 7 月，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拟定了《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再一次提出：“争取伪蒙古军反正，争取



被日寇欺骗威胁参加伪蒙政府的王公”。

在争取蒙古族民众加入抗战队伍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十分重视回族与汉族之间民族关系的处理。1940 年 4 月，中央书记处批准的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文中深入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回民的分化政策，特别强调了大汉族主义压迫和日本帝国主义挑拨下回族问题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的严重性。提纲还明确规定了“争取回族的政策”，指出对回族：“我们一定要争取，要努力的争取，多方地争取，不但要争取下层，并且要注意争取上层。”鉴于回族问题的形势和党的工作的状况，党确定了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极力亲近和团结回族的上层到抗战方面来。在回族中下层中进行长期的深入的工作”。[21]

从 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至 1938 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了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总方针和具体办法，此后，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方针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将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以及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敌后抗战根据地中初步实践了这些理论方针，将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成为体现出新型民族关系的典范。

在陕甘宁边区，各少数民族，除和汉族人民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外，还可以在他们的聚居地区，建立少数民族自治区。1939 年 4 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参议会发布《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其中明确规定：“实行蒙回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与汉族平等权利，依据民族平等的原则，联合蒙回民族共同抗日”，“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之信仰、宗教、文化、风俗、习惯，并扶助其文化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提出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13]根据这些规定，边区政府在回族同胞较为集中的三边、关中和陇东专区，成立回族自治区、乡。在蒙古族聚居的地方又成立一个蒙民自治区。在少数民族自治区内，由少数民族自己选举区、乡长，管理自己区域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基层政权建设上，逐步成立民族自治政权，初步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

在文化上，边区政府帮助少数民族建立本民族的文化和教育机关，如伊斯兰小学、蒙回民族学院、抗日回蒙学校等，以发展民族文化教育，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截至 1944 年，边区一共创办八所伊斯兰小学，两所蒙族学校，还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创办了独立的民族学院。此外，还不断地用蒙回文字翻译各种抗日书籍，宣传民族团结抗战的思想理论。同时，边区政府还特别注意对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习惯的尊重。在延安曾先后成立蒙古

文化促进会和回民文化促进会。1939 年 6 月当成吉思汗灵柩途经延安时，延安各界一万余人举行盛大的祭典，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八路军总部代表滕代远及边区政府都参加了祭典。1940 年 4 月，延安成立了蒙古文化促进会，以后又修建了成吉思汗纪念堂和蒙古文化纪念馆。经毛泽东、朱德等发起，举行了成吉思汗的夏季公祭和纪念堂、陈列馆落成典礼，充分体现出中共对蒙古族人民的尊重。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回民救国协会（回协）、回族文化促进会，回协负责争取和团结陕甘宁边区的回族人民，建立了一座清真寺，毛泽东为清真寺亲笔书写了“清真寺”三个字，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尊重。[34]在中共民族团结、平等方针的指引下，陕甘宁边区处处洋溢着民族团结的和谐氛围。

此外，共产党领导下的其他各抗日根据地也认真地执行了团结抗日的民族政策，团结各少数民族抗战对敌斗争。1940 年 11 月 16 日通过的《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中特别规定：“边区各民族应相互尊重生活风俗及宗教习惯，在平等基础上亲密团结抗战。在民主选举中，应予回、蒙、满、藏同胞以优待，对其贫苦无以为生者，特予救济。”为团结少数民族，在选举边区县、区、乡的参议员或政府委员中特别注意推举少数民族代表。在 1941 年边区参政会的选举中，边区七名回族代表当选为边区参议员；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蒙族同胞那索滴勤盖和回族同胞马生福当选为边区政府委员，这些表明边区境内的少数民族同汉族一样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晋冀鲁豫边区同时制定的《晋冀鲁豫边区目前建设的主张》中，也强调了“边区所有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一律享有平等自由权利”的原则，并且特别强调“反对看不起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

另外，在内蒙古地区和四川、云南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中国共产党也同样采取团结争取少数民族的政策，对蒙古族、藏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在团结其民族中下层的同时也积极推动其民族上层加入统一战线。

总之，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并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和方针，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指引下，少数民族也逐渐放弃了对汉族的成见，以中华民族的民族大义为重，以各种形式参加或支持抗日战争，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贡献力量。

注释：

①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



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 572 页，第 563～564 页，第 551 页，第 555 页，第 595 页、第 596 页，第 619～620 页，第 608 页，第 591 页，第 611 页，第 646～647 页，第 652 页。

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 年 3 月第 1 版，第 328 页。

⑬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 4 卷），湖南教育出版社，第 469 页。

⑭周锡银：《抗战中的民族政策》，《民族》，1995 年第 7 期。

内蒙古人民的抗日斗争

内蒙古位于中国北部，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首要征服的地区之一，正如《田中奏折》中公然宣称的那样："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①因此，日本在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后，立即将侵略的魔爪伸向了内蒙古地区，妄图通过建立傀儡政权把内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为了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面对日军的入侵，内蒙人民纷纷行动起来展开了广泛的抗日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共的领导和帮助下，内蒙古人民展开武装反抗日军入侵的斗争。1932 年 4 月，内蒙人民在绥远成立"反帝大同盟"，还组织了农民抗日十人团；在热河、察哈尔成立了"蒙汉抗日同盟会"、"牧民抗日会"和"农民抗日会"等抗日组织。1933 年 2 月，在中共领导下的"蒙汉抗日同盟军事委员会"、蒙汉抗日同盟军、蒙古抗日联军成立。1933 年，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由蒙古族人率领的察哈尔蒙古民众抗日自卫军和绥远土默特旗的蒙古族地方武装骑兵团的部分官兵加入了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并参加了收复多伦、沽源、宝昌等对日作战战役。另外，中共在鄂尔多斯草原组建多支蒙汉抗日游击队，成立了蒙汉游击司令部。

除了积极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和组织外，蒙古人民还举行了自发的反抗投靠日本侵略者的"德王"统治的斗争。1936 年 2 月，德王百灵庙"蒙政会"的官兵，针对德王与日本勾结，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的阴谋，毅然举行了起义，扣下了德王的亲信，打开军械库夺取武器。在公开宣布脱离德王的蒙政会后，1 000 多名官兵离开百灵庙前往归绥参加了抗日。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加快了对内蒙古侵略的步伐，日伪军大举沿平绥线西进，占领了绥远和包头。在西进途中，日寇肆意屠杀和蹂躏内蒙人民，给内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此后，内蒙古西部大部分地区也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同时，对未沦陷区的蒙古民众，加紧进行其挑拨离间的政治阴谋活动，并利用挑拨、欺骗政策加以军事的威胁与监督，以期

达到其“以蒙治蒙”与长久统治绥察的目的。

在此民族的危急时刻，1937 年 7 月 8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蒙古工作的指示信》，指出蒙古民族团结一致，驱逐日寇出绥蒙、蒙汉联合抗日是绥蒙工作的方针。[2]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领导下，不甘沦为亡国奴的内蒙古人民举起了武装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旗帜。不断组织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抗日武装，抗击日军。

在归绥一带，由中共党员杨植霖和蒙古族中共党员高凤英发起组织的“蒙汉人民抗日游击队”沿大青山南路和归（绥）武（川）公路沿线到处袭击日伪军。这支游击队的创建过程十分曲折，最初是杨植霖在归绥附近动员了 18 名农民组成一支抗日武装，却不幸被国民党溃兵冲散。日军占领归绥后，1938 年杨植霖在家乡归绥城西动员了 6 名农民，重组了一个小游击队，并动员邻村大户张有聚带领 20 多人与其联合组成了抗日团，张有聚任团长，杨植霖任参谋长。抗日团成立后经过陶和气村进行了整编，不久与刘洪雄、高凤英领导的抗日武装联合，张有聚任队长，杨植霖任参谋长，高凤英负责政治工作，因为这支抗日武装中既有汉族也有蒙古族，因而被当地民众称之为“蒙汉抗日游击队”。游击队创建后，以大青山为依托，在大青山南麓、平绥铁路沿线及归（绥）武（川）公路两侧不断展开抗日游击战，打击日伪军。蒙汉抗日游击队曾在旗下营附近伏击敌人的火车，在归武公路袭击敌人的汽车，还曾夜袭归绥城北坝口子村伪警察所，并严惩了阻挠游击队征集物资的保甲团。游击队的抗日行动打击了投靠日寇的势力，鼓舞爱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游击队在与敌周旋中不断壮大，到 1938 年秋，队伍由原来的数十人发展为 200 余人的骑兵游击队。蒙汉游击队的抗日活动为八路军一百二十师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除了开展独立的武装斗争，内蒙古人民还积极支持八路军在内蒙古开展的抗日斗争。1938 年，八路军一百二十师深入位于绥远省中东北部的大青山区创建抗日游击武装过程中，许多蒙古族青年踊跃参加抗日武装。为了帮助抗日游击队在大青山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内蒙古民众踊跃捐献战马、马鞍等，武川县井儿沟农民张润喜冒着生命危险，进入日伪统治森严的归绥城，为骑兵队买回马鞍 200 多套。擅长骑术的蒙民主动教授八路军战士骑乘和驯养技术，甚至还有不少蒙、汉农牧民青年带着马匹前来加入抗战队伍。[3]在当地民众的大力支持下，1939 年，大青山支队由步兵成功地转变为骑兵，并且由骑兵队迅速发展为拥有三个团的大青山骑兵支队，成为一支强

大的抗日武装。1940 年夏，以蒙古族为主的蒙古抗日游击队正式成立后，积极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打击日寇，保卫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另外，在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建立后遭受日伪残酷围剿和讨伐的过程中，很多当地民众冒着生命危险支持八路军的对敌斗争，许多群众还主动给八路军传递情报，据大青山支队参谋长姚喆回忆："一次，有个要饭的老乡，听到日寇要袭击我们游击队的消息，饿着肚子，跑了几十里路，向游击队报告情况，结果游击队安全转移了，使鬼子的骑兵扑了个空。"④当地村民还冒险为八路军代为购买根据地紧缺的各种物资，武川县农民白生宝听说八路军由于没有石磨，只能吃整粒的粮食，便组织起 5 位村民背上 300 多斤的石磨，翻山越岭，把石磨送到八路军的后勤供应点。为了让八路军将士们安全过冬，当地群众自发组织捐献皮衣、棉衣、皮帽和毡靴等过冬物品。武归县农民张兰女和婆婆，为了让战士们早日穿上保暖的鞋，点着油灯熬了半个月，终于做出了八双纳帮牛鼻梁鞋。蒙汉各族人民还冒着生命危险，为我军传递消息，掩护八路军和游击队。一次，归凉游击队在乌兔沟村宿营，当地农民王才才发现敌情，为了让八路军安全转移，一口气跑了 30 里路，游击队安全转移，他却口吐鲜血晕了过去。1942 年，黄厚带领一个骑兵班在绥中侦察敌情时，遭遇日伪军，在村民罗罗的妻子掩护下战士们全部安全撤离，罗罗妻子经受严刑拷打却始终没有透露半点八路军的去向。住在卓资山以北红召的布音尔吉（俗称二喇嘛）及周围 40 多户蒙古族群众，与八路军、根据地建立密切关系，曾向八路军捐献 40 多匹马，并使红召成为八路军伤病员的秘密修养所。

八路军一百二十师中很多指战员都曾经在受伤或生病之时得到过当地百姓的照顾。1940 年冬，骑兵支队司令员姚喆换上了非常严重的斑疹伤寒，高烧达摄氏 40 度。由于战斗频繁，部队经常转移，只能将其安置在陶林北区大土城子一群众家里休养。在群众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了让姚喆早日恢复健康，蒙族群众将家中最好的油茶面、奶皮子给他吃，还主动侦察敌情，冒死转移保护，在当地群众的掩护和照顾下，一个多月后姚喆恢复了健康重新投入对敌斗争中。⑤

在共产党的团结抗日政策的影响下，一部分为日伪服务的蒙古族上层人士逐渐参加抗日斗争。伪蒙疆防共二师师长韩伍是土默特旗蒙古人。在奎璧、贾力更、李森等中共党员的宣传教育和影响下，反日爱国意识逐渐增强，经常为八路军大青山支队代购药品、马鞍等军需物资，掩护地下工作



者。1940年初，他奔赴大青山根据地，要求率部加入八路军。1940年5月，日伪派兵将防共二师包围、缴械，杀害20多名官兵。韩伍侥幸逃脱后，在大青山支队帮助下召集旧部组成游击队，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正是因为有了大青山地区民众的大力支持为后盾，八路军及其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才得以在大青山地区艰苦的条件下坚持长期的抗日斗争。蒙汉人民团结抗日，使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日益巩固发展，阻遏了日寇进攻大西北的战略企图。

在内蒙下层民众积极抗战的同时，内蒙的一些爱国的上层人士也举起了抗日的旗帜。日军侵占绥远大部地区之后，胁迫各蒙旗接受日伪统治，乌拉特西公旗（乌拉特前旗）石王福晋奇俊峰、东公旗额王福晋巴云英、茂名安旗奇王福晋额仁庆达赖等三女王相继加入抗战阵营。

奇俊峰是乌拉特前旗前札萨克石拉布多尔济的遗孀，因不甘附逆日伪政权，于1938年2月率卫队摆脱日伪控制投奔绥西国统区，奇俊峰的爱国行为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中央日报》还以醒目的标题作了报道，称奇俊峰是"第一个从日伪占领区投向抗日阵营的蒙旗王公"。1938年4月中旬，国民政府军政部任命奇俊峰为乌拉特前旗保安司令。5月，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又任命她为乌拉特前旗防守司令部司令，并授予少将军衔。防守司令部设在五原县城，每月由军政部发给银洋7 000元作军费。此后，奇俊峰在国民政府鼓励下将旗保安队扩编为600多人的武装，在绥远积极开展抗日斗争，其抗战业绩在河套地区蒙汉各族民众中广为颂扬，还曾获国民政府致电嘉奖慰勉。

乌拉特东公旗札萨克贝子额尔克色庆占巴勒遗孀巴云英，在七七事变日军入侵内蒙后，带领旗游击队百余人辗转旗境南部山区、包头北部等地大力宣传抗日，积极招兵买马，扩充组建、整编两个团的队伍，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并于1938年7月9日率领20多人辗转抵达五原县城参加抗日，受到国民党绥西警备司令、骑7师师长门炳岳的热烈欢迎与盛情款待。国民政府行政院、军政部及绥远省蒙旗指导长官公署致电慰问并予以嘉奖。其后，委任巴云英为绥境蒙政会委员、东公旗防守司令部少将司令、东公旗流亡政府护理札萨克代其幼子贡嘎色楞执掌旗政。乌拉特东公旗防守司令部暂设陕坝镇，配合傅作义的军队作战抗日。张治中将军视察后套时，曾接见巴云英，称赞她是蒙旗抗战典范，是"抗日英雄、坚贞不屈的蒙古族女杰"。1940年3月，奇俊峰和巴云英奉召赴重庆，受到蒋介石、宋美龄及国民政府各部门

要员的接见和款待，并应邀到重庆各团体、学校发表演说，宣传各民族团结抗日。

另外一位与奇俊峰、巴云英齐名的蒙古族抗日女英雄是茂名安旗齐王福晋额仁庆达赖，她在齐王被日本特务暗杀后，冒着生命危险摆脱日人控制，并倾其所有组织了一支抗日部队，抗战中一直战斗在抗战前线。[⑥]

此外，还有许多蒙古王公和伪政权中具有爱国思想的人士，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的感召下，为抗日部队提供马匹、粮食，运送枪支弹药和各种急需物资，为抗日战争胜利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总之，抗日战争爆发后，内蒙古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倾尽自己的财力、物力、人力投入到抗击日本侵略军中去中，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内蒙古人民的抗日斗争作为全国全民族抗战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为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注释：

①国难资料编辑社编：《日本大陆政策的真面目》，生活书店，1938 年版，第 1～58 页。

②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 545 页。

③④姚喆：《大青山上红旗飘》，《星火燎原》（5），战士出版社，1981 年版，第 192～193 页，第 191 页。

⑤李井泉等：《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八路军回忆史料》（上），解放军出版社，1989 年版，第 381 页。

⑥那木格若喜：《巴云英轶闻》、陈·阿拉坦巴根，《巴云英》，载乌拉特中旗党史办、史志办编印《乌拉特中旗史料》（第 2 辑），1988 年。



回族人民的抗日武装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沦陷，日寇长驱南下，大举进犯华北。面对日寇的大举入侵，回族人民和其他各民族一道拿起武器，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组织抗日武装，投入到抗日游击战争中去。

中国的回族是一个以小聚居和分散杂居为特点的民族，在全国各地都有回民居住，因此，在每个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地区，都有回族人民遭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统治和血腥屠杀，这就决定了在各少数民族中，回族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最为广泛，几乎在所有敌占区都有回族人民都拿起了武器，组织起抗日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

华北地区回民于1937年10月1日成立了津南回民抗日救国会，组织回民抗日救国军，打击日军。此后，各地回民武装纷纷建立，其中以冀中回民支队和山东渤海回民支队最为突出。

冀中回民支队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直接领导和帮助下建立、发展起来的一支回民抗日武装。1937年12月，回族民众在河北定县成立了“回民队”，1938年1月，“回民队”改为“回民干部教导队”，又合并孟庆山的“回民教导队”和献县东辛庄的回民教导队。7月，合编为“回民教导总队”，马本斋为总队长，下设两大队，总计400余人。这支抗日武装在初建时，虽然武器装备落后，但士气非常高涨，在总队长马本斋的领导下不断打击敌人。在1938年8月至11月的30余次的战斗中，破坏敌控铁路70多处，袭击敌人列车20多次，毙伤日军500多人。这些战役的胜利鼓舞了冀中各地回民的抗日斗争，回族青年纷纷参加这支队伍，部队很快发展到1 500余人。1939年“回民教导总队”改称“冀中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同时冀中军区派郭陆顺为政治委员，进一步加强了对这支队伍的领导和整编工作。经过整军，“回民支队”初步成为一支正规化、野战化的部队。在1939年日寇扫荡华北过程中，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在河间、青县、

沧县地区转战，给了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同时帮助“回民抗战建国会”组织伊斯兰小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另外在日寇对冀中根据地的扫荡中，回民支队与八路军主力纵队和贺龙、关向应率领的一百二十师协同作战，消灭日伪军，保卫了冀中敌后抗日根据地。

1940 年初至 1942 年 6 月，回民支队进入发展壮大的阶段，从潴龙河、滹沱河到子牙河、大运河，从石法路沿线至白洋淀北岸，回民支队的足迹遍于冀中平原，给日伪军以连续打击。在 1940 年的康庄战斗中，马本斋指挥部队围攻日伪军，经过半小时战斗，除六、七个伪军逃跑外，其余 50 余人全部被歼灭。这次战斗，缴获大炮一门，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两挺，步枪 60 余支，马 10 余匹及许多弹药。为了表彰冀中回民支队在此次战役中的出色表现，八路军冀中军区通报嘉奖马本斋同志，并授予回民支队“攻无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的锦旗。[①]

1941 年日寇对冀中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妄想消灭这支回民支队，但是一再扑空。敌人不甘心失败，竟于 1941 年 8 月包围了马本斋的家乡——献县东辛庄，抓走了马本斋的母亲，强迫马母给儿子写信诱降。马母大义凛然、严词拒绝：“杀剐存留，全凭你们，要我写信万万不能!”[②]为激励儿子抗日到底，这位英雄的母亲最后竟绝食而死。正是在这种视死如归的坚定的抗战精神的激励下，回民支队克服重重困难，转战冀中平原，继续英勇杀敌。

1942 年 5 月，马本斋率领部队转战至海边，巧妙地摆脱了日本侵略军的大讨伐。6 月，马本斋又奉命转移到冀鲁豫军区，并任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继续在范县一带坚持武装斗争。1943 年，回民支队调至陕北后，留下一个连在冀中坚持斗争，并发展成一个伊斯兰支队，后又在献县、河间一带与当地部分回民武装合并，建立了八分区回民支队，这支由回民组成的抗战队伍一直坚持对日作战直至抗战胜利。

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从成立到抗战胜利的六年多时间里转战于冀中平原、冀鲁边区和冀鲁豫边区，经历大小战斗 870 余次，消灭日伪军 36 700 余人。[③]攻克敌人碉堡、据点和破坏敌人的铁路、桥梁数百处，缴获大批枪炮、弹药和军用物资，创造了辉煌的战绩，成为插在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被毛泽东誉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④]

冀中回民支队创建的同时，在津南鲁北还活跃着一支强大的抗日武装



——渤海军区回民支队。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在中共冀鲁边区党委的组织下，孟村的回民与汉民联合组织起回民大队，由刘震寰任大队长，王连芳任政委，张文林任大队政治指导员。回民大队成立后立即得到了回族民众的大力支持，在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拥护下，部队不断壮大，不到一年时间里支队从几十人发展到上百人。为适应抗战需要，回民大队于1940年改编为回民支队。1940年8月1日，在沧县东南新县镇[5]，津南六分区回民支队宣告成立，刘震寰任支队长，王连芳任政委，支队下设四个大队，一个手枪队，1大队长李文学、政治指导员张文林，2、3、4大队长分别由张文和、李玉池、刘喜三担任，手枪队长由张九江担任。回民支队以青城县[6]为主要根据地，在沧县、盐山、青城、南皮、信阳、无棣、庆云、惠民8县打击日军。[7]

为了消灭这支回民抗日队伍，日本侵略军于1941年冬对冀鲁边区进行扫荡，对回民支队的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根据冀鲁边区党委指示，刘震寰率领回民支队指战员，根据平原地区的特点和敌强我弱的形势，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抓紧一切机会消灭敌人。1941年3月，刘震寰带领手枪队深入沧县捷地铁路大桥敌军炮楼，将该炮楼一个班的敌人全部俘虏，缴获12支枪，给敌人以很大威胁，甚至曾有段时间，铁路大桥夜间不敢通行火车。1941年8月1日，刘震寰亲自指挥手枪队战士化装成给敌人送瓜的村民，骗得守军开门后冲入盐新公路旧城伪军据点，击毙五人，俘虏20余人，缴获了20支枪、两门小炮，拔掉了旧城据点，切断了盐新公路。这次战役还得到了军区司令部的嘉奖。1943年春，手枪队长丁玉起率领精干队员，以送“军粮”为掩护，巧妙地全歼辛店伪军20余人，拔掉了伪军安在沧盐公路上长达五年之久的据点，还缴获30支步枪、5支手枪。渤海回民支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粉碎了日军的一次又一次扫荡，拔掉了敌人一个又一个据点，为扭转冀鲁边区的抗战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4年冬，冀鲁边区与清河区合并为渤海军区，回民支队也改编为“渤海军区回民支队”，刘震寰任支队长兼新清县县长，率部队活动在津浦路以东的新青、盐山、阳信、无棣、庆云、惠民、南皮等县。在刘震寰的带领下，回民支队由游击战逐渐转为进攻战，1944年2月，回民支队1、4、5大队围歼小山伪军据点外出之敌，歼敌40余人，缴获机枪一挺，使军民大为振奋。6月初，回民支队展开了夏季攻势，对苏基、岭庄等伪军据点进行

攻打，歼敌伪军200多人，缴获长短枪30多支，还缴获一挺“六联”机枪。[8]

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回民支队也逐渐壮大了武装，又组建了两个大队，战斗规模也逐渐扩大。1945年2月间，回民支队主动攻击齐家务、吕家桥大据点，消灭伪自卫团500多人，缴获长短枪600多支和一车子弹，俘敌200余人。1945年3月，1大队和碱北大队与400多敌人激战，打死打伤敌伪军40余人。同年4月，回民支队乘胜追击青城县伪自卫团，在北自来屯、朱里口三天打了两次胜仗，全歼敌人200余人，缴获一门迫击炮和三车枪支弹药。8月初，支队长刘震寰、政委李玉章率领4大队、5大队攻打无棣县城，俘敌70余人，缴获大量被服，政治部主任李子华带领1大队、6大队积极配合兄弟部队，先后解放了阳信、惠民两个县城，伪军全部投降。此后又解放了庆云、盐山、青城、沧县、盐山等八县。

从1940年建立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渤海军区回民支队，在渤海地区与日本侵略者、汉奸英勇作战100余次，攻克敌人大小据点40多个，歼灭日军、汉奸2 000多人，缴获长短枪2 600余支，机枪10多挺，各种炮20多门，其他战利品不计其数。回民支队也由初建时期的20多人，装备极差的队伍，发展壮大成为一支具有1 800人的抗日武装。

除了以上两支回民支队外，在全国其他敌占区还活跃着很多回民领导或以回民为主体的抗日游击队。以山东枣庄回民矿工为主的铁道游击队，活跃于枣庄一带和微山湖上，战功卓著，闻名全国。鲁中回民支队是以太西回民大队、益都回民大队、泰安王庄院回民营、章邱一带回民中队、分队合编的一支部队，主要活跃于泰山地区、沂蒙山区、益都等地。沂水县的伊光大队是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兵工厂的警卫部队，曾在保卫兵工厂、反扫荡的战斗中作出贡献。

在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广大回民在中共的支持下也组织了自己的抗日武装。同时，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关中分区成立的回民自卫军连，在抗战时期改为回民支队抗击日伪军。1941年，宁夏海固成立回民抗日骑兵团，由马思义任团长，西北局任命杨静仁为党代表。在其他地区还有山西的壶关回民游击队、长治县回民营、安徽定远县二龙乡清真大支队等等。

除中共领导的回民抗日武装外，还有回民自发的抗日武装。在河南，南阳回族群众自发组织“回族救国会”，建立抗日武装，运用“游击术”，采取“能打就打，打不了就跑”的斗争策略，不断消灭日本侵略者的“尾巴



部队”。在豫北博爱及商丘、洛阳等地都活跃着伊斯兰大队。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冀中、渤海两支回民支队以及其他地区的许多回族人民抗日武装，均在各敌占区积极抗击日伪军，表现出了回族同胞坚定的抗战决心。正如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在《告战区回教同胞书》中说的那样：“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全国回教同胞一致兴起，或执干戈以卫国家，或尽力捐助以裕军需，或主持正义以正舆论，或教育子弟以待复兴，在此民族国家绝续之交，无不思完成其历史之重大任务。凡所表现，不特博得国人之敬爱，国际方面之同情，足使我国回教同胞，引以自慰者也。”⑨总之，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我国回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一道，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注释：

①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编辑部：《回民支队史略》，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编辑部 1982 年刊印，第 17 页。

②《气壮山河，回民队长之母英勇殉国》，《解放日报》，1941 年 10 月 15 日。

③刘宝俊：《刘震寰和他领导的渤海回民支队》，《回族研究》，1991 年第 2 期。

④《民族英雄，吾党战士》，《人民日报》，1982 年 2 月 4 日。

⑤今属孟村回族自治县。

⑥今现黄骅市和孟村县。

⑦王连芳：《冀鲁边区（渤海）回民支队初创时期遇到的几个特殊问题》，《回族研究》，1991 年第 4 期。

⑧刘济民：《忆英勇善战的渤海回民支队》，《回族研究》，1995 年第 2 期。

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 1 卷第 11 期。

华侨港澳同胞援助抗日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作为全民族抗战重要力量之一的海外华侨与港澳同胞，迅速地聚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之下，通过各种方式援助祖国的抗日，声讨日军野蛮的侵略行径。华侨港澳同胞对国内的抗战各种形式的援助，成为国内人民抗日斗争巨大的经济和精神后援。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规模入侵华北、华中。身在海外的华侨与港澳同胞，听闻祖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鲸吞无比激愤，纷纷通过通电、宣言、游行集会等各种形式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呼吁所有中华儿女立即行动起来，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战。1937年7月13日，纽约工人保障会华人部、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等联名发表告同胞书，痛斥日本帝国主义强盗行为，向国民政府提出：为了保证抗战的胜利，便只有动员全国海陆空军援助华北；动员全国民众，实行武装民众；开放民权，予人民以言论、集会、结社等一切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救国人士；罢免政府中阻滞破坏抗战政策的亲日分子和启用一切抗日将领，“实行对内对外政策的彻底转变”。同时号召全体侨胞“共赴国难，予国内抗战运动以一切精神和物资上的援助”。[①]1937年9月18日，香港海员也举行集会，号召全国海员大联合，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团结抗战。

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动员华侨声援祖国抗战，各地华侨报刊纷纷开辟抗战专栏，报道祖国人民英勇奋战的消息，并不断发表社论、专论。

在欧美，抗战刚刚爆发，《救国时报》立即连续发表题为《全国奋起抵御日寇之新进攻》、《要求全国一致坚持抗战》等社论，并刊载抗战的专论和文章，号召各国华侨“真正团结和统一起来，从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诸方面，来长期地进行援助和参加抗战的各方面工作，来坚持我国抗战到最后的胜利”。[②]另外，纽约的《华侨日报》、《五洲公报》、《先锋报》、《大美晚报》、《新报》，旧金山的《世界日报》等华侨报纸，纷纷大量刊载宣传



救国文章，这些报导对于鼓舞各地华侨的爱国热情，加强海外华侨抗日救国的斗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南洋，华侨所办的宣传抗日报纸数量更多。仅在暹罗，由曼谷华侨创办的就有《曼谷日报》、《国民日报》、《新时报》、《中国报》、《华侨日报》、《华星日报》、《华声日报》、《民国日报》等众多报刊，这些刊物不断揭露日寇侵略暴行，歌颂祖国人民英勇抗敌的业绩，有的还登载抗战理论文章，介绍抗战常识，阐明团结一致、坚持抗战的道理，帮助海外侨胞提高对抗战的认识。为了激发侨胞的爱国热忱，很多华侨报纸还以大量篇幅报道各地华人华侨筹款的消息，表彰先进，激励后进，推动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

海外华侨还通过举行纪念活动、示威游行等方式进一步声援国内抗日。每逢祖国的重大事件纪念日和节日，如九一八、七七、八一三和元旦等，海外各地的侨胞都要举行纪念宣传活动。如：1937 年九一八事变六周年纪念日，海外各地侨胞都举行了纪念大会和其他形式的纪念活动。1939 年七七抗战两周年，旅菲各侨团为了加强抗战信念追悼祖国阵亡将士和死难同胞，救济伤兵难民，在菲律宾各地举行了大规模的纪念会和追悼会等等。

海外侨胞通过示威游行等方式表达对祖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支持则更为普遍。新加坡华侨从 1938 年元旦起的一个多月内就举行过五次 3 000 至 5 000 人参加的反日游行示威。美国芝加哥华侨曾举行 5.6 万人参加的盛大的反日游行，高呼口号，支持祖国抗战到底，场面极为壮观。旧金山妇女侨胞在日本驻美领事馆前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在示威游行过程中，华侨华人声援国内抗战的同时还积极筹款，激励侨胞救国捐输，推动了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

面对中华民族的危难，除了声援祖国抗战外，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还纷纷慷慨解囊，不断通过捐款和义卖等方式支援中国内地的民族解放战争。

捐款主要分为常月捐与特别捐两种，所谓常月捐是指每人每月固定捐献一定数额的款项支援抗战。在常月捐输方面，南洋华侨表现得十分突出。据陈嘉庚统计，从 1938 年 10 月 ~1941 年 12 月，南洋各国华侨平均每月实际捐输 734 万元。[③]在南洋华中又以菲律宾华侨常月为最多，全菲华侨常月捐保持在 70 万元的较高水平，平均每人每月捐五元。为了支援国内抗战，很多菲律宾华侨是将每月收入全数捐出，有人甚至超过自己的月收入。菲律宾归侨林季良回忆说："我在菲律宾作店员时，每月薪金是 4 元钱，菲律宾华侨为抗战募捐之款，平均每人每月 5 元，真是坦诚尽力，输财助战。"[④]

除了按月捐款，华侨港澳同胞还积极响应为援助抗战某种用途的特别捐，如航空救国捐、坦克车救国捐、救灾捐、寒衣捐等。1937 年 8 月，广东省掀起八一三抗日救国献金运动，香港同胞捐款百万。1941 年 8 月 14 日，印尼巴达维亚侨胞举行中国空军节庆祝大会，当场捐献 100 万元，以加强祖国空军建设。[5]1938 年 12 月，由夏之秋率领的武汉合唱团去马来亚各地为祖国筹集救灾等款项，该团于 1939 年“七七”在吉隆坡当场募得捐款 27 300 余元。

华侨还随时关注国内战况，凡是中国军队对日作战取得胜利，无论大小，各地侨胞都要捐集钱财，慰劳前线将士。1938 年台儿庄大捷，第五战区司令部每天都要收到海外侨胞的大量捐款和慰问电、慰问信。1941 年底，中国湘北战役胜利消息传来，仅纽约一地，即捐款 35 万元，由筹纳总会汇回国内，慰劳湘北中国官兵[6]。

在祖国抗战时刻，海外华侨时刻不忘祖国，甚至很多人将做寿、结婚的钱款省下捐给祖国。如菲律宾宿务省华侨一对新婚夫妇从结婚金中节省 3 000 元捐助抗战。他俩说：“日寇披猖，举国同愤，捐资抗战，义不容辞。”[7]1940 年马尼亚拉一位华侨 60 寿辰，特将祝寿费用一万元，悉数捐献祖国，作抗战受伤战士之用。[8]

除捐款外，义卖在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中也是十分普遍的募捐形式。在海外各地侨胞中间开展得很活跃，从团体到个人，从学生到各种职业人员均热心参加。为支援抗战，香港的瓜菜小贩举行义卖，连本带利，移作救国献金。香港九龙各业小贩相继响应，一时风邀云涌，极其热烈。他们在义卖物品的标签上书写“抗战到底”、“共挽危亡”、“救国多是劳工辈”等字样。宋庆龄曾赞誉道：“最近香港侨胞小贩牺牲血本，义卖献金，继以各行商贩的继续义卖运动，堪称先后比美的壮举”。[9]香港小贩同胞的义卖活动，在海外侨胞中间引起积极的反响。澳门同胞也冲破重重阻力，以表演、体育比赛、售物、服务、捐输等多种形式进行募捐筹款。从 1937 年至 1940 年，持续三年多，共进行大小募捐活动 100 多次，其中“澳救会”的筹捐工作做得最为出色，曾受到当时国民政府有关部门的赞誉。

海外华侨港澳同胞经济支持对国内抗战的作用是无可估量的，1941 年 1 月初，孔祥熙在《三十年来之我国财政》一文中说：“我国抗战已三年有半，财政金融基础仍异常巩固”，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海外侨胞有大宗汇款回国充实外汇”。可见华侨华人捐款对中国抗战的巨大支持作用。除了



募捐外，海外华侨、港澳同胞还通过积极认购国债，向祖国投资，以及把大量战需物资输送回国等方式在经济上支持国内抗战。

除了经济上的大量援助，一部分海外华侨华人在国家危难时刻冒着生命危险回国，与国内军民一同拯救民族的危亡，保卫祖国，保卫家乡。

马来西亚怡保埠一个侨团的书记，将他数年来储存的300余元，全数购买救国公债后，又将妻子交托岳父家，自己回国从军杀敌。旅缅华侨张瑞隆出资招募华侨青年160人，组成一个连，命名为缅甸华侨救国义勇军，在香港购置了一连人的武器装备和医药等，来到广州，编入张发奎所属第四军张德能部参加抗战。这支队伍随后调到上海，经短期训练，便参加淞沪血战，抗击日军。上海失守后该部撤至湖南，参加了长沙三次会战，表现十分英勇。马来亚华侨青年林大章回国参加抗战，“出入火线，不辞劳苦，送弹扶伤，昼夜不懈”。1941年5月23日，日军逼近阵地，情况危急，林大章取下烈士所遗枪弹，“以身自代，奋勇怒射，其后随军跃出阵地，冲锋前进，英勇无敌”。林大章的机智勇敢受到上级的嘉奖，《新华日报》对他的事迹进行了公开的报导和宣传。[10]

抗战期间有很多归国华侨飞行员把自己的热血洒向了祖国的长空，被称为“抗战英雄”的飞行大队长黄泮扬，在一次战斗中献出了生命。1940年5月18日，日机袭击成都，林日尊率领华侨空军中队驾机迎战，在空战中，他“忠勇杀敌，为国殉职”。回国参战的数万爱国华侨，成为全民族抗战取得胜利的一支重要力量。另一位“空中英雄”黄新瑞于1942年3月14日在成都之役殉职。是役，中国空军损失飞机四架，其中三架飞机的飞行员为华侨青年。

抗战期间，香港人民建立了以渔民为主的海上游击队，经常在海上袭击由香港岛、台湾驶往汕头的日本运输船只，1942年8月15日，海上游击队在大鹏湾黄竹角伏击为日军护航的海上挺进队，激战两小时，击毁日军帆船三艘。

与此同时，在祖国各地，都有活跃在抗战最前线的华侨港澳同胞组成战地宣传队、服务团、记者团以及救护运输伤员的救护队等等。抗战刚刚爆发，由澳门同胞组成的一批批抗日宣传队，即奔赴珠江三角洲、粤西、粤北山区等地宣传救亡，唤起民众同仇敌忾，一致抗日。澳门进步团体“澳门青年回国乡村服务团”和“大众歌咏团”等多次组织宣传队到中山、江门、新会、台山、恩平等地宣传抗日，与当地民众一起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8

年，由陈少陵、杨岭梅率领的“澳青团”和共产党员廖锦涛、沈文略等率领的“澳救会回乡服务团”共200多澳门同胞，先后到珠江三角洲、粤中、粤北等地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海外华侨归国参加抗战后勤服务的例子更多，有活跃在华北前线的华侨服务团，有出生入死担任战地采访的华侨记者团和救护、运输伤兵的华侨救护队有深入敌后的华侨战地服务团，有不辞劳苦为祖国抗战抢运物资的滇缅公路上的华侨机工。参战的华侨人数之多，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据广东省侨务委员会统计，抗战期间归国参战参军的粤籍华侨就有四万多人，其中南洋各地粤侨约四万人，美洲和澳洲等地约1 000多人。他们中许多人为抗战建立了卓越的战功，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九江战役中牺牲的菲律宾《华侨商报》记者张幼庭，是第一个殉国于抗日前线的华侨记者。菲律宾回国服务团16人在香港与越南华侨服务团40余人合组成华侨青年战地服务团，参加广惠战役，除阵亡及失踪外，仅余陈梁栋、许志成两人。[11]由16名华侨青年组成的新加坡华侨决死队回国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除吴志强一人外，其余皆死伤未归。华侨与港澳同胞回国参加抗战的爱国行为不仅支援了前线，鼓舞了军民的抗日斗志，更重要的是激发了更多国内国外中国人的爱国情怀，进一步推动了全民族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

海外华侨与港澳同胞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全力投入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之中，有效地支援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并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注释：

①《美国侨胞热烈援助国内抗战》，《救国时报》，1937年8月20日。

②《侨胞一致起来，援助抗战、参加抗战》，《救国时报》，1937年9月5日。

③陈嘉庚：《南侨回忆录》，岳麓书社出版，1998年版，第344页。

④《华侨抗战，功昭日月》，《华声报》，1985年8月13日。

⑤《巴达维亚侨胞空军节捐款百万》，《华商报》，1941年8月24日。

⑥《纽约爱国侨胞慰劳湘北战士》，《华商报》，1941年11月6日。

⑦《菲律宾侨胞新夫妇，节省婚费三千元捐献抗战》，《新华日报》，1938年3月17日。

⑧《菲岛侨胞陈某捐1万元》，《新华日报》，1940年3月15日。

⑨宋庆龄：《华侨总动员》，《宋庆龄选集》，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34页。

⑩《华侨青年林大章，从军杀敌建伟功》，《新华日报》，1941年7月19日。

⑪《华侨战地服务团牺牲大》，《华侨动员》第15期，第10页。

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思想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根据抗日战场的形势发展，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并在执行过程中不断丰富这一战略思想，使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胜利地实现了从十年内战时期的正规军和运动战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为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战争胜利贡献了力量。“独立自主游击战思想”最初是由毛泽东在八路军开赴华北战场前提出的指挥作战的总战略方针，经过实践检验最终确定为人民军队的抗战总方针。

1937年8月1日，毛泽东、张闻天在给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的电报中，首次提到：“关于红军作战原则”为“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这是中共首次提出在八路军作战中应当坚持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原则，就是说红军的作战行动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指挥。同时在作战形式方面，提出了分散作战的游击战原则。①

此时，毛泽东虽然提出了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但是由于刚刚提出，理论上并不完整，同时，一些中央领导人和军事将领对抗日战争战略方针问题还没有跟上毛泽东的认识而转变，因此在1937年8月初毛泽东提出游击战方针之后，对于作战方针问题党内军内仍然存在一定的分歧。为统一全党全军思想，毛泽东多次向党内及军内主要负责人说明抗战形势及采取独立自主游击战方针的必要性。8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电示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要他们在8月9日在南京召开的国防会议上就我军的参战问题向国民党提出如下要求：一、“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二、“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三、红军



“依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为中心，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另以一部向热冀察边界地区活动威胁敌后方”。四、“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在这里，毛泽东等除了重申红军在指挥关系、内容、作战形式和兵力使用方面应坚持的原则外，又提出了作战地域和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等内容。8 月 5 日，毛泽东、张闻天又致电朱德、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明确指出：关于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问题，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游击运动战，牵制敌人大部，消灭敌人一部的任务。这是在一定地区内协助正面友军作战，而不是“独挡一面”。我们事实上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故不宜以独挡一面的语意提出。[②]毛泽东的意见在党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 1937 年 8 月 11 日中共代表参加南京国防会议讨论会中，周恩来等人以毛泽东的意见为主导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

此后，毛泽东进一步丰富发展了独立自主游击战的思想。1937 年 8 月 22 日至 25 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代表政治局作的军事问题和外交（即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报告中将红军的作战方针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并对此作了详尽的论述。这个方针不仅正确地反映了中日战争的基本规律，而且正确地反映了敌我友三方面的关系。它的基本精神是：一、发动群众；二、开展游击战争；三、创造根据地。在讨论中，部分军队与中央领导干部提出了不同意见，提出：在抗战时期运动战虽然比国内战争机会减少，但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发动群众麻痹敌人，调动敌人是可能的。在胜利把握较多时，可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因而主张提“游击运动战”或“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

这种意见具有一定合理性，而且运动战与游击战在实际的战斗中很难明确地分开，所以大会最终作出决议，改编后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由于洛川会议召开时，前方战事紧张，红军亟待改编，对游击战战略方针问题还没有讨论透彻，洛川会议就结束了。

为统一党内的认识，保证战略转变的顺利实现，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就战略方针问题多次给党和军队的一些领导人发电，进一步阐述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方针的基本原则。

1937年9月12日，毛泽东专门致电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对基本原则的内涵作了较系统的说明。他指出："这一方针的基本原则包含：（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三）南京只能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毛泽东将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进一步具体化了。[3]但是由于党内军内对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方针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以致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战初期，执行这一方针出现了一定的偏差。

1937年9月中旬，一百一十五师到达晋东北的繁峙地区准备在晋察冀三省交界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当时主攻平型关的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五师团已前出广灵、灵丘、涞源一线，企图攻破平型关，直入繁衍峙、代县，会同由大同南下之敌夺取雁门关，然后进逼太原。阎锡山由于形势所迫，拟集中14个团在平型关以北与敌决战，并希望八路军参加。经过商谈，我军决定一百一十五师参加阎锡山拟定的平型关围歼日军的作战计划，一百二十师则在雁门关协同作战。9月14日，林彪电告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说他已将"三四三旅及师直集中大营，准备待敌仰攻大营东之平型关友军阵地时，我相机袭击敌之左侧后，歼敌一部，以扩大战果"。此电转报毛泽东后，毛泽东接连几次给八路军前线指挥员发电。在9月16日毛泽东致林彪电文中指出："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决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这个电报同时转发给了朱德、任弼时、贺龙、聂荣臻等。9月17日，毛泽东又发电报给朱德、彭德怀等，指出："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根据战局的发展，毛泽东在电报中还提出应改变"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并对我军的战略行动作了新的部署，指出："为战略上展开于机动地位"，"为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义勇军，创造游击根据地，支持华北游击战争，并为扩大红军本身起见"，拟"采取如下之战略部署：（一）我二方面军（指一二〇师）应集结于太原以北之忻县待命，准备在取得阎之同意下，转至晋西北管涔山等地区活动。（二）我四方面军（指一二九师）于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活动。（三）我一方面军（一一五师）则以自觉的被动姿势，即时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如敌南进，而友军来未能将其击退，则准



备依情况逐渐南移，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中”。[④]

后由于林彪等人坚持己见，9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表示同意林彪将一个旅暂时集中打仗，但同时指出：“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为了及时纠正我军战略方针在执行过程中的问题，毛泽东在电报中对山西战局和我军的战略方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阎锡山现在处于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中”，但“他的部下全无决心，他的军队已失去战斗力，也许在雁门关、平型关、沙河一带会被迫地举行决战，然而大势所趋，必难持久。不管决战胜败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走势，似乎还没有深刻认识，被暂时的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这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他指示彭德怀，要“从远处大处着想，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⑤]然而，八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仍在9月23日，向一百一十五师下达了侧击平型关之敌的命令，平型关一役胜利极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但是从战略思想上来讲，平型关战斗亦不尽符合中共中央与毛泽东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着轻敌速胜的思想。

为使“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能够全面贯彻，就在平型战斗的当天，即9月25日，毛泽东乃致电八路军前总：“不管蒋阎协助与否，目前红军不宜过早暴露”，要“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伺机在“敌之空处侧后，举行广泛的袭击战”，“贺师在晋西北之使用同此原则”。同日，毛泽东又电北方局主要负责人刘少奇、杨尚昆等，指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由于中共中央、毛泽东及时反复指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逐步为广大干部所接受。平型关战斗后，第十八集团军军委分会发布了《关于红军作战的方针、任务及担负地方工作地区划分问题》的训令，要求八路军各部“立即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

使敌陷入我群众和游击战争的围困中，断绝其后方通力合作，增加敌人之恐慌和疲惫，分散敌人兵力”。指出“只有这样才便于主力打击敌人，以致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1937 年 11 月太原失守后，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在浙江，国民党的战线已被击破，日寇正向南京和长江流域进攻。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已表现不能持久。”因此争取实现全面抗战是“一切中国人民的共同的迫切的任务。”⑥3 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负责人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八路军的当前任务是：“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进全面抗战的实现。

从此，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在华北各地广泛展开。一百一十五师除聂荣臻率少量部队留守五台山地区开辟晋察冀根据地外，师部率第三百四十三旅主力转向晋西南创建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第一百二十师则继续创建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第一百二十九师主力及第一百一十五师第三百四十三旅由正太铁路南下，依托太行、太岳山脉，创建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真正地实现了由十年内战时期的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

注释：

①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第 8 页，第 9～10 页。

③毛泽东：《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解释》，《人民日报》，1981 年 7 月 7 日。

④毛泽东：《关于敌情判断及我之战略部署》，《人民日报》，1981 年 7 月 7 日。

⑤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人民日报》，1981 年 7 月 7 日。

⑥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388、390 页。



游击战争的基本战略、战术

全国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果断地提出了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必须实行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并确定了“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迅速挺进华北，担负起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壮大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战略上配合正面友军作战的战略任务，并与正面战场相配合，构成对日军两面夹击的战略布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出师华北后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充分证明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所确定的我军战略方针的正确性。其后，随着战场形势的不断发展，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主要领导人及军队负责人对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等重要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系统的认识，并纷纷发表通电、讲话或撰写相关军事理论文章，阐述了游击战的基本战略战术，为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新阶段克服困难、抗击日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

1937 年 9 月抗战刚刚爆发，面对党内、军队对于运动战与游击战认识不明确的问题，以及部分军事领导人骄傲轻敌的情绪，毛泽东连续致电朱德、彭德怀等人，着重阐述了关于游击战的作战原则、游击战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几个问题。1937 年 9 月 12 日，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讲到“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应包括的四个重要原则：“（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三）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毛泽东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基本原则全面精辟的阐述，为八路军进军华北开展对日作战提供了正确的军事指导。

关于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毛泽东在 9 月 17 日的电报中指出：“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在 9 月 21 日

的电报中，他进一步阐述说："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①

日军占领平津进攻太原其间，毛泽东在致前线的电文中根据对前线形势具体分析，不仅预见了国民党华北战场即将溃败并明确指出："敌于太原，志在必得，此时部署应远看一步，"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根据这种设想，毛泽东改变原来的战略部署。命令一百二十师转至晋西北管涔山等地区活动；一百二十九师应于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地区活动；一百一十五师则以自觉的被动姿势，即时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并准备依情况逐渐南移，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中。

太原失陷以后，毛泽东于11月13日致前方同志电中指明："全国片面抗战已无力支持"，"正规战争结束，剩下的只是红军为主的游击战争了"；并再次强调"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并提示各部队发动民众，扩大自己，多打小胜仗，坚持华北抗战。

正是在毛泽东这些电报的指示下，八路军自觉地实行了军事战略的转变，纷赴敌后，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

在敌后游击战争蓬勃兴起之际，1938年，毛泽东又连续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战争和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名的军事论文，对抗日游击战争诸问题作了更系统、更完整的论述。

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首先把抗日游击战争放在战略的观点上来考察，高度评价了它的重大战略作用。毛泽东指出，一般地讲，游击战争对于正规战争只起配合作用，仅有战术问题，面无战略问题；但中国是一个处于进步时代的大而弱的国家，她为小而强的日本所侵略，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也就随之发生了。随着战争的长期性的发生，战争的残酷性也来了，因此建立根据地



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这些也超出了一般游击战争所具有的问题。由于这种种情况就决定了抗日游击战争应有的战略地位。"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而持久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②]谁若是忽视了它，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其次，毛泽东还具体地阐明了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为了使全党同志加深理解这个问题，毛泽东对我党领导的军事斗争作了历史的考察，并将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分成了四个战略时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前期，主要的是游击战争，在后期，主要的是正规战争。在抗日战争的前期主要的是游击战争；在后期，主要的将是正规战争。在四个战略时期之间，共存在着三个战略的转变：第一个，国内游击战争和国内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二个，国内正规战争和抗日游击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三个，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从军事战略的发展转变中，毛泽东深刻

阐明了从国内战争后期的带游击性的运动战转变为抗日游击战争这一战略转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他强调指出："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③]，要求全党同志充分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

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了过去党领导战争的经验，提出了适应抗日游击战争这一特殊情况的具体的战略战术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争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争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二、和正规战争相配合；三、建立根据地；四、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五、向运动战发展；六、正确的指挥关系。毛泽东提出的游击战的原则解决了抗日游击战中最中心的问题，为游击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再次，毛泽东论述了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他强调说明，由于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处于敌后的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是不能支持的。毛泽东进而具体地分析了建立根据地的可能与条件。他认为，以山地建立根据地最为有利；平地虽较山地为差，但是也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河湖港汊也较山地为差，但比平地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为大。总之，只要深刻懂得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彻底克服流寇主义思想，采取正确的方

针，就可以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使敌后根据地广泛地发展起来。

毛泽东关于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一系列论述，极大地统一和提高了全党的认识，有力地指导着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根据地的建立，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随着抗战形势的逐步发展，中共主要领导人及军事将领根据战场形势结合实际工作情况，也纷纷提出游击战战略战术新观点。

洛川会议之后，刘少奇于1937年10月16日发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文中明确指出："游击战争是今后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方式"、并具体分析了在华北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与胜利的可能，批判了对游击战争抱怀疑态度的错误论调。他说"今天华北人民的中心任务，是广大地组织与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广大的游击战争是华北人民抗日最有效的方式"，"游击队能够对付超过自己数倍的优势的敌人，并能打胜仗"。游击队要战胜敌人，除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外，必须充分依靠群众，得到群众的支持与帮助，执行代表人民利益与意志的各方面的正确政策，并有很好的政治纪律和军事纪律。为此，"必须建立能够在各方面执行正确政策的游击队，并且改造那些不能执行正确政策的游击队。应该建立巩固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并在这些根据地里建立有工作能力的领导游击战争的抗日政权。"为了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促进国民党旧政权的改造，文中还具体提出了抗日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农民土地政策、劳动政策、内务政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对外政策、关于群众运动的政策等等，[④]刘少奇阐明的各项具体政策，对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与巩固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上海、太原相继失陷，华北战场陷于严重危机的时候，周恩来于1937年11月16日，在山西临汾发表了题为《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的演讲。他深刻地分析了抗战形势与危机的根源。批判了国民党散布的失败主义论调，指出"坚持抗战必须以坚持华北战争为中心。华北抗战能持久，日寇将无法实现其全部阴谋。"周恩来还具体分析了在华北坚持持久战的有利条件，主要是"敌人的兵力没有可能统治全华北，不仅是乡村占不了，城市也占据不了太多"；"在地形上，持久战也是可能的"；"民众的条件是基本的"；"民众武装已有了初步的发展"；"八路军留在华北作战，也为推动和领导华北持久抗战的重要因素。因为八路军是红军改编的，他有着长期运动战及游击战的素养。他将要发挥在这方面的特长，来影响友军，来组织和领导广大民众齐来抗战。"周恩来断定："这一切有利的



条件，将决定着华北持久抗战的极大可能。这个抗战的性质，在极困难的时候，将以游击战争为主体，来坚持华北抗战。”他预言“这个游击战将有胜利的前途。它要在持久战中，壮大自己，武装人民，恢复许多城镇破坏敌人交通，消灭部分敌人最后得到全国生力军的参加，可以转到胜利的反攻，收复失地，驱逐日寇帝国主义出中国”。此外，周恩来还就游击战的战略战术问题行进了简单的阐述，“作战的战略战术要改变，要认识现在是野战，是运动战，是游击战，争人不争地”；“要建立各部队的后方，要有源源不绝的后方接济，在困难时也要独立自给。这样的军队是活的，是人民的，是革命的军队，这样的军队这样的指挥，便能坚持华北抗战到最后的胜利。”⑤

周恩来的演讲因其对抗日游击战争发展趋势的精辟论述及对持久战的前途的正确预见，在民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演讲，曾被当时听众“自动集资刊印数万份散发”，并称颂这个报告对目前抗战有重大的贡献。

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在抗战爆发后也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军事著作、论文，进一步丰富了游击战的战略战术理论。朱德于1938年初撰写的《论抗日游击战争》长篇军事论文，根据党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抗日游击战争的诸要素、抗日游击队的组织等问题，作了详尽的论述，并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作了具体的发挥。朱德提出，抗日游击战争与其他战争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点，“这就是它的最主要的作战要素是政治要素，这就是说，抗日游击战争主要的是政治战争。”文章还详细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指出，游击战术就是要求“迅速、秘密和坚决”，即以高度的灵活性、机动性、坚决果敢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抗日游击队在战役中的活动方式主要为：破坏敌人后方交通、仓库，袭击敌人飞机场；暴露敌人的企图；震恐敌人的军心；破坏敌人政权、恢复自己的政权；分散敌人兵力；破坏敌人的经济、给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⑥

1938年4月，朱德在《粉碎日军围攻的战役战术指示》中，详细阐述了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术，他指出：“应乘其进攻我军时，采取灵活的、运动的游击战术，在敌未进入利害循环变换线时，采取内线作战姿势，以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其一路，余路钳制之。如已进入我利害变换线内，则应由间隙中转入外线，袭击敌侧后，仍以各个击破之。”⑦1939年7月，朱德在《八路军抗战两年来的经验教训》中，强调“敌之任何一股前进时，我军应以小部，以一连或一营为单位，采取运动防御之姿势，配合本地自卫军、游击队，昼夜袭击，疲劳敌人，分散敌人，迷惑敌人主力，出敌不意，突然袭击

而消灭其一部。”为了粉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频繁扫荡，朱德提出了争取主动，趋利避害的机动作战原则。即：“小股进退，分支袭扰，集中主力，乘弱伏尾，昼伏夜动，声东击西，有意暴露，及时隐蔽，利害变换，毫不犹豫，拿定火色，转入外线。”⑧各抗日根据地按照这些原则应对日军的扫荡，取得了显著效果。

总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及军队将领，对于抗日游击战争所应采取的战略战术问题做了大量的系统的论述，极大地统一和提高了中共及其军队的认识，有力地指导了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为敌后战场的蓬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游击战争军事思想理论化系统化过程中，毛泽东的贡献尤为突出，正如日本军事评论家池田德躬所说：把游击战“加以系统化、战略化、普遍化的始祖，无论怎么说也是中国的毛泽东”。他称毛泽东是“现代游击战争之父，典型的实践指导者”。⑨

注释：

①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人民日报》，1981 年 7 月 7 日。

②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247 ~ 248 页，第 262 页。

④《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 81 ~ 87 页。

⑤《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 年 3 月版，第 550 页。

⑥《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30 ~ 68 页。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 459 页。

⑧《八路军抗战两年来的经验教》，《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 年版，第 385 页。

⑨《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年 3 月版，第 624 ~ 625 页。



游击战指挥原则及向正规战的转变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主要领导人以及军队主要负责人面对在更大范围、更大规模、更加复杂的条件下进行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迫切需要解决游击战指挥、游击战的发展趋势等一系列重要的军事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通过深入研究抗日战争作战规律，在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适时总结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指挥原则并对抗日游击战的发展趋势作出了科学的预测。。

在1935年12月23日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了作战指挥原则这一概念，“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提出：“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反对分兵主义，反对两个拳头主义”；“依情况决定指挥方法，统一决心下的分割指挥是容许的、需要的”；“拿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把今天联结到明天，把小的联结到大的，把局部联结到全体，反对走一步看一步。”[①]等等。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套适合红军的指挥原则，在此基础上结合抗日战争形势，毛泽东逐步提出了开展对日游击战指挥原则。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实施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经过近一年的实践，毛泽东针对抗日游击战争中部队行动分散、流动性大的特点进一步总结了游击战的指挥原则。在其1938年撰写的《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等文章中均对游击战指挥原则问题进行了精彩的论述，毛泽东所提出的游击战指挥原则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则。

首先，于战前通过各种方式，全面掌握敌我双方及各方面情况。毛泽东认为指挥作战要做到百战不殆、屡战屡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彼知己”。为了知己知彼，必须以一切必要和可能的手段，及时、全面、准确地掌握敌我双方及各方面情况。在《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中论述袭击作战问题时列举的侦察内容共四类17项。如，敌情方面主要包

括兵力多少、战斗力强弱、武器装备状况、配置情形、警戒程度、换班秩序以及有无相邻之敌、相邻之敌数量、可能增援的程度、机动速度、距离远近、通信联络情况、最低限度的增援时间、增援方向及道路状况等。还有作战地区的居民情况，作战地区的道路、隐蔽接近地情况等等。[②]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先之以各种侦察手段，继之以指挥员的聪明的推论和判断，减少错误，实现一般的正确指导，是做得到的。我们有了这个一般地正确的指导做武器，就能多打胜仗，就能变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

其次，掌握敌我双方详细情报基础上，指挥人员应制定周密计划、精心组织，争取立于完全的主动。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论文中反复强调了"事先应有尽可能的严密的计划"的思想，指出：战争要取得胜利，是不能离开它的计划性的。乱干一场的想法，只是玩弄游击战争，或者是游击战争的外行。不论是整个游击区的行动或是单个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的行动，事先都应有尽可能的严密的计划，这就是一切行动的预先准备工作。情况的了解，任务的确定，兵力的部署，军事和政治教育的实施，给养的筹划，装备的整理，民众条件的配合等等，都要包括在领导者们的过细考虑、切实执行和检查执行程度的工作之中。没有这个条件，什么主动、灵活、进攻等事，都是不能实现的。固然正规战争的计划性更大些，游击战争的条件不容许很大的计划性，如果企图在游击战争中实行高度的严密的计划工作，那是错误的；但依照客观条件允许的程度，采取尽可能的严密的计划，则是必要的，须知同敌人斗争是一件不能开玩笑的事情。[③]

第三，集中统一指挥，灵活机断行事。对于抗日游击战争中作战力量的使用，毛泽东特别强调要依据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的特点，集中使用、分散使用、转移兵力三者紧密结合。

毛泽东对于这一指挥原则的系统阐述始于 1938 年 5 月，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在指挥关系一节，毛泽东在文章中说：游击战争指挥关系的正确解决，是游击战顺利发展的条件之一。游击战争的指挥方法，须适应游击部队是低级武装组织和分散行动的特性。因此，游击战争的指挥原则，一方面反对绝对的集中主义，同时又反对绝对的分散主义，应该是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战略的集中指挥，包括国家对于整个游击战争的部署，各个战区里面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的配合行动以及每个游击



区或根据地里面对于全区抗日武装的统一指导。在这些方面应尽可能地求得协调、统一和集中。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指战役战斗的具体组织与实施等由各级指挥机关随时随地按照具体情况去做。概括而言游击战的指挥原则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毛泽东特别强调在指挥作战中力避两种情况发生“应该集中的不集中”和“应该分散的不分散”。应该集中的不集中，在上者叫做失职。在下者叫做专擅，这是任何上下级关系上特别是在军事关系上所不许可的。应该分散的不分散，在上者叫做包办，在下者叫做无自动性，这也是任何上下级关系上特别是在军事关系上所不许可的。只有遵循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指挥原则，才是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针。[4]

在毛泽东制定的指挥原则的基础上，刘少奇结合其负责具体工作的实际情况，将敌后游击战争一般的指挥原则进一步发挥。抗战相持阶段以后，刘少奇根据抗日战场上，同时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而又密切相关的战争——反“扫荡”的战争与反“摩擦”的战争的实际情况，变化了的新情况，适时地总结出了游击战争的两种不同的指挥原则。刘少奇说，对于反日寇“扫荡”的战争与反顽军“摩擦”的战争，须用两套不同的战法，须用两种不同的战略战术原则。“对日战争的指挥原则，应当是在战略统一指挥下独立自主的开展游击战争。”[5]因为在对日作战中，打击的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彻底消灭这一威胁中华民族生存的凶恶敌人，必须充分发动民众，因此，必须在战略统一下充分发挥战役、战术上的独立性、灵活性，各自为战，尽可能多地消灭敌人。具体战术是，在敌开始“扫荡”时，应采用阻击、分散、纠缠、夜袭、伏击等战法，阻滞敌人，掩护根据地民众实行坚壁清野、破路等行动；主力集中机动位置，选择有利地形，待机予敌一部或一路以歼灭，同时小部队不断袭扰敌人。这种军事上的分散、伏击和合击行动，必须在游击区指挥机关及首长的统一指挥下，充分发挥游击队高度的灵活性和独立自主的能力。当敌人合击与反复“扫荡”时，应避免与敌人决战，应该根据敌人向根据地扫荡的具体情况指挥作战“敌人较大的扫荡战役，总是分若干路向中心区合击，然后反复扫荡，再向据地撤回”。我们的应付办法是：“主力应切实避免与敌人作战，不要去企图阻止或打击敌之一路，而应分散向四周边区及敌占区行动，主动打击敌人空虚的据地及交通，或择地隐蔽，只留小部队在中心区游击周旋；待敌撤退时，主力再转回中心区。”[6]而对于反顽军的“摩擦”战争，刘少奇认为，既不能采取反“扫荡”战中的战略

上的统一与战役战术上的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也不能照搬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采用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法，应当是“在战略、战役以至战术上都要统一指挥，特别是在政策上，更需要统一”。⑦这是因为在反“摩擦”战争中，作战对象是国民党顽固派。我们同他们的矛盾和斗争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涉及到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不是单纯的军事斗争，而是具有复杂的政治斗争色彩，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往往对一个战役或战斗的指挥，既关系到军事上的胜败，同时也影响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这就要求不仅在战略上要统一指挥，而且在战役、战术上也要统一指挥。否则，将会因小失大，导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根据这一原则刘少奇在处理皖南事变的紧急关头，及时向中央建议对国民党实施“政治攻势，军事守势”的反攻方针。党中央和毛泽东接受了他的建议，改变了原拟政治上、军事上同时予以反击的决策。这就是从战略全局出发考虑的。刘少奇把反日寇“扫荡”的战争与反顽军“摩擦”的战争区分开来，提出两套不同的战法，两种不同的战略战术原则，这是符合实际的，是对毛泽东游击战争指挥原则的一个重要的补充和发展。

抗战全面爆发初期，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主要领导人不仅顺应国内形势提出游击战的指挥原则，同时对于游击战与正规战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毛泽东详细阐述了游击战在战略、战斗、战役三个方面对正规战的配合作用。在战略方面，“整个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和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都是战略上配合了正规战争。”与此同时，“游击战争还有其战役的配合作用。例如，太原北部忻口战役时，雁门关南北的游击战争破坏同蒲铁路、平型关汽车路、阳方口汽车路，所起的战役配合作用，是很大的。”另外，毛泽东论述了战斗方面的配合，“战斗的配合，即战场作战的配合，是一切内线战场附近的游击队的任务，这一项当然只限于靠近正规军的游击队，或临时从正规军派出的游击队。在这种场合，游击队应该依正规军首长的指示，担负其所指定的任务，往往是担负钳制部分的敌人，妨碍敌之运输，侦察敌情，充当向导等。没有正规军首长的指示时，游击队也应自动地做这些事。坐视不理，不游不击，或游而不击的态度，是要不得的。”游击战除了配合正规战外，还有必然向正规战转变。

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从两个方面详细论述

了游击战向正规战转变的原因及必然趋势。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一方面决定着敌后广大地区的游击队不能仅仅停留在游击战的水平上，而必须向运动战发展，才能完成所肩负的夺取最后胜利的占领任务。另一方面，游击队经过长期艰苦的战争锻炼，在配合正规战争的作战中，不断壮大了自己的队伍，提高了部队的素质和水平，又为游击战向运动战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必须明确地认识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才能坚持向运动战发展的方针，并有计划地执行之。例如五台山等处的游击战争，本是由正规军派出强大的支队去发展的，那里的作战虽然一般是游击战，但开始即包含了运动战的成分。随着战争的持久，这种成分将逐渐增加，这是今天抗日游击战争的长处。由执行游击战的游击部队向执行运动战的正规部队转化，须具备数量扩大和质量提高两个条件。前者除直接动员人民加入部队外，可采取集中小部队的办法；后者则依靠战争中的锻炼和提高武器的质量。集中小部队，一方面须防止只顾地方利益而妨碍集中的地方主义；另一方面也须防止不顾地方利益的单纯军事主义。提高质量，须在政治、组织、装备、技术、战术、纪律等各方面有所改进，逐渐地仿照正规军的规模，减少游击队的作风。一切正规军均有扶助游击队向着正规部队发展的责任。[⑧]

刘少奇论则结合了华北的抗战形势述了抗日游击战争将发展为抗日的正规战争，成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主要形式的观点。刘少奇指出：华北的游击战争在“继续扩大与胜利的过程中，将转变到以正规战争为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方式，最后驱逐日军出华北。”[⑨]他还进一步指出：“华北游击战争有重新转变为正规战争、驱逐日寇出华北的胜利前途”，这取决于“八路军若干倍的扩大”、“武装民众”等条件。因此，党要“集中全力动员群众，扩大八路军，建立游击队，争取友军”，“准备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和日寇作长期的艰苦斗争，争取游击战争胜利的前途。”[⑩]

抗战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抗战时期国内形势，站在战争指挥者的高度不断总结我军的作战经验，并进行理论阐述，提出了游击战的基本指挥原则以及游击战到正规战转变等重要的军事思想，这些军事理论的提出不仅解决了抗日战争的一系列方略性问题，而且系统地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作战指挥问题，而且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基本形成的作战指挥思想走向全面成熟。同时成功地指导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革命的抗日武装在敌后的游击战争。

注释：

①《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1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 418 页。

②③④《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39～140 页，第 240～241 页，第 261～263 页。

⑤⑥⑦⑨⑩《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 286 页，第 242 页，第 286 页，第 82 页，第 95 页。

⑧《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 259 页。



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论持久战

卢沟桥事变发生前，中国共产党就正确预见，抗日战争必将是中日之间的一场持久战。但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内仍有一些人宣传“亡国论”、“速胜论”的错误观点，为了澄清错误观点引起的思想混乱，中共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驳斥错误论断、宣传持久战。

抗战刚刚开始，国民党内就有些人宣传“亡国论”的悲观论调，他们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如果抗战，必会作阿比西尼亚”。1937年7月29日，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汪精卫在一次广播讲话中公然宣扬“亡国论”的观点，他说：“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它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便是能使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为抵抗侵略而牺牲。天下既无弱者，天下即无强者，那么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的目的也达到了”。[①]此后，当国民党政府决定实行抗战，全国形成轰轰烈烈的抗战局面的时候，各种“速胜论”的意见也随着产生了。抗战初期，有些人过低地估计了日本，甚至以为日本不能打到山西。淞沪抗战时，有些人认为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发生变化，苏联一出兵，战争就可解决。他们幻想依赖外援迅速结束战争。特别是1938年4月，台儿庄战役之后，“速胜论”一时间甚嚣尘上，1938年4月25日，《大公报》发表社论说：“现时的局势，就是抗战前途的重要关系，我们这一战胜利了，其有形无形的影响，就可以得到准决胜的功效”，“全军将士注意！现在就是准决战”。4月26日《大公报》又发表社论说：“这一战当然不是最后决战，但不失为准决战。因为在日本军阀，这一战，就是他们最后的挣扎。”

此时，不仅在普通民众中存在这种错误判断，台儿庄胜利也冲昏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的头脑，他们又大肆宣扬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新象征”，以为只要打几个台儿庄战役式的胜仗就能抵挡日本侵略军，无需动员广大人民进行持久战。这一错误论断的危害性很快显现出来。正是在盲目乐观情绪的推动下，蒋介石调集重兵组织会战准备与日军在徐州准决战，最终

失败，武汉危机接踵而至。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大出现的“亡国论”，却又乘机抬起头来。面对抗战初期“亡国论”与“速胜论”错误论调，中共领导人清醒地分析时局，并纷纷发表通电、宣言及讲话驳斥这两种错误论断，大力宣传“持久战”理论，以肃清“亡国论”与“速胜论”对抗日军民造成的思想混乱。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即开始认真探求抗日救国的路线、方针与斗争策略，逐步明确了以持久战取得最后胜利的战略总方针。早在 1937 年 4 月 12 日，朱德就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针对国民党的“速胜论”和党内某些人的急躁情绪，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思想。他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抗日战争不是一两次战争就能解决的，战争的时间必会长久，战线必定会很宽。”抗战全面爆发后，朱德对持久战观点进行了进一步阐述，1937 年 7 月 15 日，朱德在《解放》杂志第一卷第 12 期上公开发表《实行对日抗战》一文，通过大量细致的分析，批驳了战争刚刚爆发时流行的“恐日病”，提出持久抗战的观点。文章从日本的对外贸易、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财政收入、军费开支、军队兵员状况等多方面，列举了大量数据，说明日本各个方面的条件都无法支持长久的对华作战，在这种情况下“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问题是抗战”，中国只要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最后的胜利终会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当然，“抗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也许有着超出我们想象之外的困难，它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这需要我们动员与集中全国一切人力、智力、财力与物力以赴之！我们应该把握住抗战的胜利条件。”[②]此后朱德又利用抗战爆发后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国防会议的机会，于 1937 年 8 月 11 日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演说，进一步指出抗战的取胜之道是：“实行持久战，开放民主，动员民众，在敌后发动游击战争。”

在 1937 年 8 月 22 日至 25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上，朱德联系战场形势具体阐述了在华北坚持持久抗战的思想，进而指出：我们不能速决，希望持久战。如何进行持久战呢？主要是解决我们的中心与主导应该放在何处。[③]在他认为，八路军要争取在华北持久抗战这第一个前途，要在国民党军队还能抵抗时，及早布置工作来争取这个前途，即使友军都退下来，八路军也能在华北坚持。当然，也可能八路军被迫退出来，但是，即使出现这种局面，也要增加坚持的时间。朱德还在具体分析日军和八路军各自优势的基础上，认为八路军一定能够在华北坚持：“日本武器比较好，但



战斗经验缺乏，有可能打垮一些，捉一些。”而八路军善于打游击战争，“华北方面地势上也有可能发展游击战争”。[④]

朱德的上述思想和观点，得到了党内、军内大部分领导的认同，对洛川会议确定正确的持久战战略方针和作出相应的战略部署起到了推动作用。1938年，朱德在八路军总部出版的《前线周刊》上发表了专著《论抗日游击战争》，从战争所需的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条件等方面全面而详尽地阐述了怎样从战略高度上以及在具体战术上开展游击战争，“无数游击队的不断的动作，却是非常伟大的力量，象连续的滴水可以蚀穿石头，使敌人的交通迟滞、阻塞，企图暴露，军心动摇，汉奸政权也不稳固，兵力不敷分配，给养断绝，经济资源被破坏，有生力量被削弱。在军事活动的全时间内，所有的游击队配合主力军一齐动作起来，就和蚂蚁蛀蚀着朽楼一样，可以倾覆敌人存在的基础，影响到全面抗战的结局。”最终达成持久抗战并最终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目的。

1937年8月，周恩来在洛川会上报告南京谈判、上海抗战、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国防、外交等情况时指出：对形势要有持久战的估计，要继续推动国民党抗战，要加强全国群众运动的发动。[⑤]此后，周恩来还曾多次在不同场合阐述其持久战观点。

洛川会议后，周围恩来即于9月以中央代表的名义赴山西抗战前线。周恩来在山西直接领导抗战，虽然只有短短的80天，但他对抗战战略方针的探索，对发展和丰富毛泽东军事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1937年11月16日，周恩来针对上海太原失守后国内抗战的危急形势，公开发表了《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一文，具体阐述了华北持久战的方针。文章从分析目前国内抗日战场危急形势出现的原因入手，指出，“在上海、太原相继失陷后”，华北出现危机形势，主要表现是沦陷区“汉奸政权的活跃”、“投降主义的生长——亲日派的活跃”、“特殊化思想增长”、“失败主义情绪的发生”，针对危急形势，周恩来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要为消灭这一切现象与克服这一切危机而奋斗，而战斗到底。要如此，就必须坚持抗战到底。只有全民众起来抗战，抗战才能持久；只有坚持抗战，才能得到国际友邦的赞助，才能拒绝任何不利于我们的调停，才能最后战胜敌人。”周恩来结合华北形势，具体提出：“坚持抗战必须以坚持华北战争为中心。华北抗战能持久，日寇将无法实现其全部阴谋。”并具体分析了华北能够持久抗战的原因：敌人的兵力没有可能统治全华北，不仅是乡村占不了，城市也占据

不了太多；华北特别是山西的山地最便于我活动、存在与扩大；人民群众的反抗和民众武装，根据地的发展；八路军坚持在华北作战推动和领导华北持久作战。“这一切有利的条件，将决定着华北持久战的极大可能。这个抗战的性质，在极困难的时候，将成为以游击战为主体，来坚持华北抗战。”[⑥]由此可见，周恩来不仅比较早地明确提出持久战的思想，而且分析了能够持久作战的原因以及持久战与游击战的关系，进一步丰富了持久战理论体系。

与此同时，时任八路军副总指挥的彭德怀对于在抗战中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也提出了极为深刻的见解。1937 年 11 月，彭德怀发表了《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的著名演说。他在演说中抨击了“弱国牺牲论者”、“恐日病”者的“亡国论”和“急性病”者的“速胜论”；论证了以持久战争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客观必然性，并论述了实行持久战所应该采取的战略战术。

彭德怀首先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抗日战争必须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并对这一结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这是由敌我双方对比的全部因素决定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我们是异常弱小的。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想拒止敌于国门外，固不可能，就是要一下子把入侵的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也是一个极艰苦的斗争。因此，从持久战中去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已成为唯一正确的公论了。”彭德怀进而提出，中国经过持久抗战，最后必然取得胜利。他对中日两国战争结果的重要因素进行了详细分析：“伟大的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灿烂光辉的历史，有着高度的文化，有着不愿当亡国奴的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有着无量的蕴藏着的资源，有着充分的条件，在持久抗战中迅速改变自己的劣势地位为优势地位，必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具体说来，在政治上，中国民众在抗战中，将会很快地凝固起来，形成钢铁一般的力量。在经济上我国是一个原料丰富的国家，只要执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国民经济自能自给而有余”。在军事上，能通过改良军工企业，争取外援，在战斗中缴获敌人武器等途径来提高自己的装备水平。在国际关系上，我国是得道多助。日本方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存在一些严重的不足和缺点。在政治上，由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其工商业必然因战争影响而萧条，人民的负担加重，生活日益恶化，因此，人民反战情绪高涨，广大劳动群众、士兵和中产阶级的不满，必将形成伟大的力量，反对战争。因而，日本在持久战中，不但不会团结和增长自己的力量，而只会逐渐削弱自己。在经济上，日本“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国家，国内的天然资源极其缺



乏"，因此，"战争愈持久，敌人愈困难"。在国际关系上，日本侵略中国是失道寡助。"敌人在侵略中国的问题上，已经引起了不少国家的反对，而形成外交上的孤立地位"。而且随着战争的延续，其国际地位会每况愈下。如何获得最终胜利问题，彭德怀提出，持久战是我国获得战争胜利的唯一途径：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要坚持抗战，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需要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做出极大的努力。"胜利的前途也不是从天而降的，而完全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这种努力是要实行正确的持久战的战略战术和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日战争。[⑦]

抗战爆发初期，中共领导人及军事将领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先后提出了中日战争是持久战的正确论断，为批驳"速胜论"、"亡国论"错误倾向，确定抗日战争的总战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此后，毛泽东在总结中共持久战理论的基础上发表的著名的《论持久战》一书，对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作了系统的论述和高度的理论概括。从此，持久战思想成为指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战的科学指导思想。

注释：

①《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5～176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157页。

③④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4日。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78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

⑦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37页。

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领导人及军事领袖纷纷发表演讲、文章，批评“速胜论”与“亡国论”的错误观点，宣传持久抗战的理论，这些关于持久战战略思想的积极探讨，为毛泽东全面系统阐明这一战略方针，做了必要的准备。正是在这样的集体探索中，经过10个月的抗战实践，逐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持久战的科学理论。经过毛泽东的全面概括、整理及进一步阐述，最终形成了著名的《论持久战》一文，对持久战的一系列问题做出了最系统、最完整、最深刻的论述。

早在1936年7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就初步提出了持久战思想。毛泽东在回答抗日战争要延长多久问题时曾说过，这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除了主要地看中国自己的力量之外，国际间所给中国的援助和日本国内革命者的援助也很有关系。如果国内、国际许多必要的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其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毛泽东根据对中日两国特点的初步分析，根据过去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对抗日战争的发展当时就提出了这样的科学预见。[①]

1937年8月，在陕北洛川召开的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党中央就确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朱德、张闻天、彭德怀、周恩来等也都先后对我党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作过一些说明和解释。国民党著名将领蒋百里在其《国防论》一书中也曾提出过持久战思想：即“苦撑待变、以空间换时间等待英美援助、以战胜日本”。但上述思想并不系统，也欠深刻，并没引起国人应有的注意和重视。为了进一步澄清党内外在抗日战争问题上的种种错误思想，系统地阐述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指明抗日战争的发展道路，毛泽东深入研究了中日两国基本情况及世界形势，最终形成了《论持久战》一文。该文是毛泽东在1938年5月26日~6月3日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所作《论持久战》的讲演基础上，经进一步整理，在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建



议下，《论持久战》被油印成册，在党内传阅。

《论持久战》全文共 120 节，分为 21 个问题归结为两大部分。其中，前 9 个问题为一部分，主要批驳了亡国论、速胜论，说明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为什么最后胜利是中国的；后 12 个问题为另一部分，主要说明持久战的战略战术、政治问题等等。在《论持久战》一书中，毛泽东正是从客观地、全面地分析战争的中日双方出发，揭示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规律，指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道路。

文章开篇，毛泽东首先批评“亡国论”与“速胜论”主观的和片面的错误论证，并通过中日双方四个方面的特点来论述这一观点。

第一，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强国；敌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上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这些方面部显得不如敌人。这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必然性和中国抗战不能速胜的基本依据。

第二，日本的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因此，中国战争的进步与正义和日本战争的退步与野蛮决定了中国必胜，日本必败。毛泽东指出：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冒险战争，是由于它内外矛盾激化而导致的；由于日本的退步性，加上它又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这一特点，就产生了它的战争的特殊的野蛮性。“日本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是日本战争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与此相反“今日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虽不如日本之强，但在中国自己比较起来，却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中国今天的解放战争，就是在这种进步的基础上得到了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可能性。中国是如日方升的国家，这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状态恰是相反的对照”。

第三，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消耗。而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这是中国能够坚持持久战，日本必败和中国必胜的另一个主要依据。

第四，在国际上，日本失道寡助；中国得道多助。毛泽东说：“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力量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但将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这是日本必败和中国必胜的另一依据。

以上四个方面构成了中日战争的主要决定因素，由此看来，中国占据主要优势，但也存在劣势，“亡国论”与“速胜论”都是由于没有综合分析这些因素而得出错误结论。“亡国论”者只看见敌强我弱这一特点，把它夸大起来，作为全部问题的论据，而看不到其他的特点。“速胜论”者忘了敌强我弱这个矛盾，而夸大了其他特点。因此，结论都错了。正确的结论应该是：中国既不会亡国，也不能速胜，只有经过持久战，才能达到最后的胜利。

中日双方矛盾的各种因素，是在比较中存在，在斗争中发展的。由于敌强我弱这一特点，在战争的一定阶段上，敌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我则遭到一定程度的失败，这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中日都只限于这一定阶段内、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不能超过而至于全胜或全败。因为日本原是相对的强，中国原是相对的弱，就是说，日本虽强，但为其他不利的因素所减杀；中国虽弱，但为其他有利的因素所补充。加以战争过程中中国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更加不断地变化了敌我强弱的对比。因而，敌我只限于一定阶段、一定程度的胜或败，造成了持久战的局面。

随着战争的继续发展，中日特点在竞赛中继续消长变化着。正如毛泽东所说：“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其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是：中国能运用正确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策略，竭尽最善的努力，将促使敌人不断向下变化，即战争越来越使其军民厌战，兵源枯竭，军费困难，经济危机加深，国际上也越来越孤立；我们则向上变化，即战争越来越广泛地动员起群众，人民军队日益壮大，日本只能占领少数点和线，中国则控制广大的面，兵源、物资丰富等有利条件日益发挥其作用，而且国际上也愈来愈多助。这种敌向下、我向上的变化，随着量的积累，达到一定阶段时，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即使敌强我弱的对比发生转化，使中国得到最后的胜利。

基于以上分析，毛泽东将抗战整个过程分成三个阶段：一、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二、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即战略相持阶段。三、敌之战略退却，我之收复失地的战略反攻阶段。

在第一阶段中，由于敌强我弱的特点，敌人大举进攻，占领许多大城市和交通线。这是敌人暂时的局部的向上变化。但由于我乘敌后空虚，广泛开



展游击战争，建立许多根据地，威胁到敌之占领地的保守，使敌军力、物力遭受很大的消耗，士气屈靡、人心不满、财政竭蹶、国际舆论责备等向下的变化也开始出现。此阶段中，我虽遭受颇大的损失，但同时却有颇大的进步，这种进步就成为第二阶段继续抗战的主要基础。

敌我相持阶段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也将是最残酷和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毛泽东提醒全国军民，对这一阶段的严重困难要有充分的准备。

这一阶段存在的问题："经济困难汉奸捣乱"，"我们内部，因大城市的丧失和战争的困难，动摇分子将大倡其妥协论，悲观情绪将严重地增长"。为此，党在这一阶段，必须动员全国民众，齐心一致，绝不动摇地坚持战争，把统一战线扩大和巩固起来，排除一切悲观主义和妥协论，提倡艰苦斗争，实行新的战时政策，熬过这一艰难的路程。在这一阶段，广大的游击战争和人民抗日运动，将疲惫和大量消耗敌人，促使其财政更加困难，人心更加不满，士气更加颓靡，国际上更感孤立，沿着向下的方向继续发展。而我们在坚持持久战中，渡过难关，积蓄力量，将逐渐向上发展，那时中国将脱出劣势，日本则脱出优势，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优劣相反的地位。这就为战略反攻作好了准备。

在第三阶段，中国的战略反攻阶段中，主要地依靠中国自己在前阶段中准备着的和本阶段中继续生长着的力量，但还需要国际力量的援助。毛泽东对此作了生动的描绘："如果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他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日本人民运动也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那就是敌人死亡之时了。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打倒之日，必是这个天罗地网大体布成之时。这丝毫也不是笑话，而是战争的必然的趋势"。

毛泽东在论证了中国抗战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和持久战三个阶段的发展规律之后，又进一步阐述了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争取最后胜利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文章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第一，取得战争的胜利最重要的是发挥主观能动性。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条件，然而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

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

其次，实施持久战总方针所应采取的具体作战方针与原则。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目的，是战争的本质，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抗日战争的各级指导者，不能离开中日两国之间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去指导战争，也不能离开这个战争目的去指导战争。在抗日持久战三个阶段的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战略进攻和战略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外线的速决进攻战”与“内线的持久防御战”是相反的，然而，又恰是实行持久战的最好方针。实行这个方针，在主观指导上要加强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用分散兵力的原则。在战役的指挥关系上，对于前者，用集中指挥的原则；对于后者，用分散指挥的原则。这些，就是抗日战争战场作战的基本方针。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第三，要进行持久战，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还必须加强军队的建设，发展壮大人民的武装。军队要实行政治工作三大原则：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的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因此，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②]

毛泽东《论持久战》对中国抗战局势及抗战前途异常清晰而符合实际的判断，回答了人们最关心而一时又看不清楚的问题，因此一经发表立即在党内外甚至国内外都曾引起强烈的反响。《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



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3]一位外国记者在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后评论说：“不管他们对于共产党的看法怎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一般轮廓。”[4]

总之，毛泽东《论持久战》科学地论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阐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使持久战理论系统化，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全国、全军和全国人民，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广大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注释：

①毛泽东：《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手稿，1937年10月。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2～447页。

③程思远：《我的回忆》，华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页。

④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9年8月4日。

日本发布《国家总动员法》

1938 抗战即将进入相持阶段之前，日本即已面临从物资到兵力的全面紧缺，为实现其侵略野心，日本决定孤注一掷，倾全国之力对华作战。为了调动全国的人力和物力投入到侵略战争中，1938 年 4 月 1 日，日本政府正式公布了《国家总动员法》，并于 5 月 5 日由天皇发布敕令生效。该法颁布后，日本逐步走上了对战略物资、金融各部门甚至国民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纳入国家统制范围的道路。

日本颁布《国家总动员法》，主要目的为了解决日本即将进入的持久对华作战准备必要的战略物资问题，同时动员全国的人力。1937 年日本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并制定了“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侵略计划，从 1937 年 7 月 ~ 1938 年初，日军在战场上接连获胜，已经侵占了中国华北、华中大片领土，在历次战役均获胜利之后，日军却没能实现其速战速决计划，反而陷入了长期持久对华作战的泥潭。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虽然作战不利，接连丢失大片领土，但是直至日军占领南京，中国政府仍未屈服。就在日军侵占南京之后，1937 年 12 月 16 日，蒋介石公开发表了《告全国国民书》，表明了继续抗战的决心。日本由此意识到“攻占南京只是中国问题之序幕，真正的持久战则自今日始”。[①]中国政府发表此声明后，日本于 1938 年 1 月下旬，“决心切实按全面持久战指导战争”，并以“截至 8 月前，绝对不发动新作战为原则”[②]进行了部署。同时，日军的华北、华中广大占领区形势也不稳定，重点控制的城市与铁路（即所谓点和线），亦时常受到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打击，不得安宁。[③]而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中国，还有巨大的抗战潜力。日本从 1937 年末至 1938 年初已经意识到战争向持久长期战发展的趋势，此时，日本投入中国战场的兵力一增再增，至 1938 年初已经达到 16 个师团，约 70 万人。[④]抗战相持阶段到来之前，日本已经动员了最大的力量，历年储存的战争物资也即将告罄。日本要获得持久战争胜利就必须贮备大量的物资，此时在国际上已经陷于日益孤立的不利境地，无



法从继续从海外获得进口战略物资的日本，又面临从物资到兵力的全面紧缺，无奈之下，日本政府决心通过全面的全国战争总动员，解决战争对人力、物力的大量需求，遂将整个国家纳入战争体制。

在1938年《国家总动员法》颁布前，由于日本自近代以来就曾多次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因此也曾多次颁布过旨在建立国家战时统制的法案，实现战时的总动员。早在1918年日本就制定了“军需工业动员法”将军事产业纳入国家统制的范围，此后，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逐渐将国民经济乃至整个国家生活纳入到统制范围内。1930年，在军部，特别在陆军的推动下，由内阁资源局起草的《总动员基本计划纲要》在阁僚会议上通过，同时，“关于战时法令的准备事项”也被提了出来，资源局将《暂定总动员计划》改为《应急总动员计划》，以确保战时军需品供给。这是日本确立总动员体制的重要步骤。

九一八事变爆后，在陆军省的大力推动下，资源局初步拟定出总动员法起草方针，还制定了“资源统制运用法”的基础方案作为“总动员基本法”。此后，总动员法案的准备工作就以资源局为中心着手进行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这一进程大幅度加快，在资金方面，制定了全面统制经济的《临时资金调整法》，在物资方面，制定了全面统制经济的《进出口商品等临时措施法》，制定把重要工厂、企业置于国家管理之下，为了战争全面动员军需工业的《使军需工业动员法适用于支那事变的法律》等，由于这种全面性动员，迅速地加强了经济方面国家的统制。

为实现全国总动员，1937年10月，资源局与企划院合并设置了企划院，其中新成立的企划院第一部负责拟定《国家总动员法》。1937年末，企划院对“国家总动员法案”进行了最后的准备工作，政府有关人员（第一届近卫内阁）也发表谈话，暗示作为法案可正式向议会提出，直至1937年11月，报纸也透露了“国家总动员法案纲要”的部分内容。

以此为基础，在1938年1月的第七十三届议会上，近卫内阁提出35亿日元的一般会计预算和将近50亿日元的临时军事费预算，与此同时，为了完成国家总动员体制，还提出了国家总动员法和电力国家管理法等统制法。

国家总动员法案一经提出，立即遭到来自众议院各政党和贵族院各派的严厉批判，提出该法案是“基于独裁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是“无视宪法的、过于广泛的委任立法”等等。对此，政府向议会方面做工作，争取得到谅解，并于同年2月18日，决定进行修改。删掉了原提案中关于禁止

"集会"和"群众运动"，以及停止报刊发行等条款。第二天便向众议院提出了"国家总动员法案"。在众议院内，民政党的斋藤隆夫、政友会的牧野良三等议员，提出"这是前所未有的广泛委任立法，政府必须深刻反省"。这是"以非常时期为名，侵犯天皇大权的法案"等严厉的指责，但结果未能抵得住军部的压力，法案在众议院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引人注目的是，在众议院进行审议时，当时唯一标榜社会主义政党的社会大众党，却强烈地主张实施该法案。在贵族院，对该法案的意见虽然并非完全一致，但在大部分议员表示同意后以多数通过。

经过一段波折之后，1938 年 4 月 1 日国家总动员法正式公布。近卫首相为了缓和国会的批评气氛，曾经在贵族院秘密委员会上说："本法并不是要直接适用于支那事变"。但是，一经国会通过之后，首相就轻易地推翻了他讲过的话，仅仅在一个月之后的 1938 年 5 月 5 日，总动员法就付诸于实施，当日还公布了有关的勅令，该法颁布后，明治宪法也成了一纸空文。

日本《国家总动员法》是日本国政府在战时，为达成国防之目的、统制运用人力及物力资源，得将国家全部力量作最有效发挥而制定的法律。它将科技、文教、新闻报道、工业、交通运输、金融贸易等都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其后又根据此法颁布了各种统制法令，将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纳入国家统制范围。

该法于 1938 年 4 月 1 日颁布，历经多次修订，共 50 条，第一条规定国家总动员法的主要内容，"本法所称'国家总动员'系指于战时（准战争之事变也包括在内，下同此）为达成国防之目的，以最有效方法，发挥国家全力，统制及运用人的物的资源之谓。"

第二条、第三条详述了该法所称的九类"物资总动员"与九类"业务总动员"的内容：国家总动员的物资是指，"（一）武器、舰艇、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二）国家总动员上必要之被服、食粮、饮料及饲料；（三）国家总动员上必要之医药品、医疗机械器具及其他卫生用物资及家畜卫生用物资；（四）国家总动员上必要之船舶、航空机、车辆、马匹及其他运输用之物资；（五）国家总动员上必要之通信用之物资；（六）国家总动员上必要之土木建筑用物资；（七）国家总动员上必要之燃料及电力；（八）前各项之物资之生产、修理、配给保存等所需的原料、材料、机械器具、装置及其他物资；（九）除前各项所列之物资外，以敕令指定之国家总动员上必要之物资。"国家总动员业务是指：（一）关于物资总动员之生产、修理、输



入、输出及保管之业务；（二）关于国家总动员上之必要运输或通信之业务；（三）关于国家总动员上之金融业务；（四）关于国家总动员上之卫生、家畜卫生及救护之业务；（五）关于国家总动员上之必要之教育训练之业务；（六）关于国家总动员上之试验研究之业务；（七）关于国家总动员上之情报及启发宣传之业务；（八）关于国家总动员上之必要之警备业务；（九）除前各项所列者外，以敕令指定之国家总动员上必要之业务。"

另外，《国家总动员法》还规定了"政府于战乱之际，于国家总动员上有必要时"所拥有的各种权力，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的绝对控制力：如第四条规定"政府于战乱之际，于国家总动员上必要时，依敕令所定，得依法征用帝国臣民，使其从事于业务总动员"；第五条规定"政府于战乱之际，于国家总动员上必要时，依敕令所定，得使帝国臣民及帝国法人或其他团体，协助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所举行之业务动员。"另外该法还规定了，政府征用之物，如不需要用时，自征用起10年内得以标售，或使其原所有人或旧权利者，或其一般继承人优先承购之；限制或禁止事业设备的新设，扩充，或改良；命令帝国臣民及使用或雇用帝国臣民者，申报有关帝国臣民之职业能力事项，并得检查帝国臣民的职业能力。除了对人力、物力的绝对控制外，总动员法还规定了政府在其他方面的绝对控制力，如第二十条规定"政府于战乱之际，于国家总动员上必要时，依敕令所定，对于新闻报纸及其他出版物之登载，得限制或禁止之。"⑤

国家总动员法将国民的经济和生活全部置于国家统制之下，将议会的统制权限委任给政府，它完全否定了明治宪法的议会制度。该法将所有产业都纳入了统制对象。国家总动员法的主要内容是对劳动力、生产手段以及金融的统制。在劳动力统制上，有征用国民从事总动员运动，自由雇佣、解雇和制定劳动条件的权利。在生产手段的统制上，作为对物资供求的统制，有使用和征用事业设备、土地、矿业的权利。在金融统制上，作为对资金的供求统制，有变更资金、处理利润和投资的权利。另外，总动员法又限制、禁止劳动争议，对言论进行统制。

《总动员法》给了政府以绝大的权限，从资本、劳力、物资以至出版等所有一切方面，都能随时无条件统制或动员。当它在议会表决时，近卫首相虽曾言明"在中国事变中不直接行使"，但两个月后，其中一部分已经实施。1938年7月实施了其中第六条，将工人的雇佣、工资、劳动时间等都置于国家统制之下。即不是由每个资本家，而是由国家权力来强制剥削，以

保障垄断资本的最高利润，日本经济上的法西斯体制，因此进入了新的阶段。

此后，在《国家总动员法》带动下，日本政界自上而下的动员、统制逐步全面铺开。1939 年经济统制升级，统制对象从资金、物资、生产、军需产业扩大到一般工厂，企业、设施、土地以及物价、工资，分红和地租。人力统制从局部范围扩大到一般国民，1939 年颁布《国民征用令》，1939 年 12 月起，政府从木炭开始，相继对棉织品，砂糖、火柴、鸡蛋、大豆、豆油、粮食等实行配给。对于日本而言，《国家总动员法》把人力、物力的动员、统制广泛授权政府，严重削弱了议会仅有的立法权。充分表现出日本政府对华作战的决心，同时也预示了 1938 年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更加艰苦的时期。

注释：

①②③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 458 页，第 412 页，第 66 页。

④（日）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通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 3 卷，日本朝日新闻社，1963 年版，第 41 页。

⑤北京大学历史系：《亚非现代史参考资料》第 1 分册，北京大学历史系内部参考，1962 年版，第 315～317 页。



敌后游击战争进入新阶段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仅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而且广泛展开了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等一批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以此为依托展开了广泛的敌后抗日游击战，袭扰了敌人的后方并牵制了日军大量的兵力，为抗日战争作出巨大贡献。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武汉后，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正面战场形势以及日军对华侵略方针的重大转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已经把游击战争从山地发展到了平原。从1938年5月到10月，八路军、新四军相继向平原地区实施战略展开，敌后游击战争有了广泛的发展，各抗日根据地迅速扩大，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敌后抗日战争打开了新局面。

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中国战场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正面战场仍然显现出节节抵抗、节节败退的形势，但是在历次战役中也消耗了大量的日军有生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敌后根据地的相继建立使日军的后方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经过我国军民15个月的奋力抵抗，日军的兵力已大量消耗。随着抗日战场的扩大，战线的延长，日军的兵力越来越分散；同时由于军费支出的剧增，租税的加重，使日本国内人民厌战的心理日增；战争的长期化使其军事进攻的锐气大受挫折，日军上下“都有泥足深陷之感”，各种矛盾明显地暴露出来。这些因素迫使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考虑以攻占广州和武汉为其战略进攻的终点。日本最高军政当局，在“关于攻陷武汉后国民活动的通知”中，也不得不承认：“攻陷汉口不是搞狂欢的问题，而是要宣扬应付新阶段的精神准备。汉口之陷落并非事变之终点”，“因此要避免召开使人感到事变结束的战胜庆祝会”。[①]此后，日本政府在侵华总方针不变的前提下，对其前一阶段的侵略方针进行调整并开始制订新的侵略方针。1938年11月，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制定了《陆军作战

指导纲要》，规定今后的“作战方针”：“是确保占据地区，促进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态势，扑灭残余的抗日势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纲要”规定华中方面，参加武汉会战的部队除在安庆上游留下六个师团基干兵力外，“其他主要调往华北方面”；“在华南方面，逐步以守备部队接防，其他主要调往华北方面”。[②]

1938 年 11 月，在华北方面军增设第十二军，并陆续从华中调来第十、第二十七师团，从华南调来第五师团，并从日本国内增派大量兵力编入华北方面军战斗序列。这样，至 1939 年上半年，敌军在华北的兵力已达 18 个师团又 14 个旅团，即由武汉陷落前的 30 多万人增加至 60 余万人，约占全部日本侵华兵力的半数以上。为了适应其战略转变，1939 年 9 月，敌在南京设立了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华北、华中、华南的日军。大量增兵的同时，日军驻华北方面军开始大力讨伐中共华北敌后根据地与抗日武装。1939 年 1 月 ~ 1940 年 3 月，分 3 期进行所谓“治安肃正”。1939 年 9 月，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指示实行由敌华北方面军新任司令官多田骏提出的“囚笼政策”，妄图消灭我抗日军民。为实行这种“囚笼”政策，日军大事修筑铁路、公路、据点、碉堡。从 1939 年 ~ 1940 年，敌在华北修复铁路 1 870 公里，公路 15 600 公里，新筑碉堡、据点 2 749 个；1940 年的碉堡、据点较 1939 年增加四倍。在公路上每隔十余里、在铁路上每隔二三里便设一据点；在湖泊地区则挖掘新的河沟，把我根据地分割成不相联结的若干小块。敌人利用“囚笼政策”，实行“分区扫荡、分散配置、灵活进剿”，以绝对优势兵力“捕捉”我游击队的所谓“牛刀子战术”，“涸泽而渔”的所谓“掏水战术”，集中一路优势兵力深入急袭我中心地区的所谓“单刀直入”战术，妄图以此来消灭我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巩固其占领区，给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早在相持阶段到来前就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游击战军事理论，因此日军的治安肃正没有给我军敌后游击战带来太大的损失。

对于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游击战的重要作用及采取的战略战术，中共早有准备。1938 年，中共主要领导人根据战场形势变化及近年来中共开展敌后游击战的经验总结形成了一套游击战的军事理论，并提出了“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以及创建根据地及人民战争的理论，“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的指挥原



则，[③]不仅实现了八路军从土地革命时期向游击战的转变，而且为进入相持阶段到来的敌后游击战提供了军事理论的准备。

还在广州、武汉战役进行期间，中国共产党根据战争形势的重大变化迅速提出新的对策。中共中央为此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做了著名的《论新阶段》的报告，报告全面分析了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游击战将面临一定的困难，日军将于“一定时抽兵进攻游击战争，企图巩固其占领地，使中国反攻困难。”在今后我军的任务“在于广大地发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创立许多根据地，巩固已有的根据地，用以缩小敌之占领地。”为了顺利完成这一任务，必须从以下十个方面开展工作“第一，必须广大地发展一切敌人后方地带的游击战备并创立多数的游击战争根据地，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根据地。第二，必须依照华北榜样，留置或派遣足够数量之正规军队于敌后各个战略区域，作为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的骨干。这些军队应该逐渐学会游击战术，加强政治工作，发展民众运动，创立根据地，并帮助敌后民众游击队与游击战争逐渐提高到正规军与正规战争的道路上去。第三，一切战区与敌人后方，必须发动所有男女人民卫国保乡的热忱，除动员他们大批加入脱离生产的游击队与补充留置敌后的正规军而把他们组织到半军事性质的抗日人民自卫队中去。抗日人民自卫队的组织，应成为一切战区与敌人后方的普遍与经常的民兵制度，他们是不脱离生产的。第四，必须协助人民组织广泛的游击队。这是脱离生产的，各县各区都应该有，成为袭击敌人保卫地方的普遍的小队伍。第五，必须建立游击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加强其军事政治文化娱乐的教育，用以提高其战斗力。第六，必须建立游击部队中正确的军事政治制度，实现官兵的平等待遇，经济公开。第七，改造土匪部队，使他们走上抗日；肃清我军后方的及被敌利用的土匪。第八，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重要问题，一方面，大后方可能的接济他们；又一方面，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第九，依照敌情与我之战略需要，重新划分敌后各地作战区域与行政区域，使之适合新的战争情况。第十，必须依照战略需要，统一敌后各部队与行政区之领导以便集中抗敌力量，消除内部矛盾；但应反对互相吞并的军阀行为。”关于八路军、新四军今后的任务，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在游击战争充分发展了的地区，如华北，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了的基础，以准备新阶段中能够战胜敌之残酷进攻，坚持根据地；在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的或

正在发展的地区，如华中，主要方针是迅速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后游击战争发展困难。据此，会议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战略任务。[4]

广州、武汉刚一陷落，1938 年 10 月 28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广、汉失守后给各级党部的指示》，及时地向全党指出：“广州失陷武汉不保，使抗战形势起了新的变化。……目前抗战形势，一方面是困难加多，一方面是抗战力量更加团结，统一战线是更多进步。目前的任务，就是克服困难，团结全国人民力量，继续抗战，停止日本的进攻，以准备将来我们的反攻。”中央号召：“共产党领导下之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及一切团体应成为坚持抗战、克服困难、精诚团结、艰苦奋斗的模范，以言论与行动来影响全国”。

1939 年 5 月 31 日，周恩来在重庆发表的广播讲话《二期抗战的重心》中，又具体地向全国人民指出：“二期抗战的重心是在敌后”，“争夺敌后的方针便是广大发展游击战争，也可以说是展开敌后的全面战争。“假使我们在敌后创造出一、二十个游击根据地，每一个根据地象五台山、中条山一样牵制敌人四、五万，则二十个根据地，我们可以牵制敌人侵华的全部兵力。……我们如能牵制敌人向后，而又消耗极大，则变敌后为前方，积小胜成大胜的战略方针，可完全达到成功，争夺敌后的任务，也可完成大事……二期抗战一定可进入有利于我的相持阶段，以争取最后反攻的到来。”

1939 年 6 月 10 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更深刻地分析了武汉失守后抗战形势的特点，阐明了日本诱降政策的历史发展，指出了反对国内国际投降主义的迫切性和严重性。他说当前的形势“更加困难，就是敌人之外，还加上投降叛变。更加进步，就是经过各种形式的斗争（包括战争），抗日的国民党继续同共产党合作，国民党便能更加进步。”他号召全党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使“大半边天都黑了，剩下共产党抗日，我们也要干下去，也能干下去。这样干个三年五年唤醒人民吸引友军，又逐渐形成新而大的抗日阵线，我们就成抗日救国的核心与领导力量”。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前后，朱德、刘少奇、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贺龙、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左权等党和军队的领导同志，也都纷纷著文，总结抗日战争经验，指导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坚持发展抗日游击战争。



1939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目前时局及八路军新四军之任务指示》，指出："华北八路军与江南新四军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工作尤其是巩固新部队。而在华中方面，中心任务是在发展。""在抗日根据地方面，应注意加强那些能够持久的山岳地区的工作，而将不易在平原地区持久的某些部队及地方的干部，及时地调到山地去。在我部队与友军杂居的地区中，除加强联络工作及提高自己之警惕外，还应进行准备自己的根据地的工作，以求在情况变化时我们仍有依托。"同时强调要加强财政经济方面的工作，保证我军物质供给之自立而不依靠他人。⑤

从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敌后抗日军民投入了艰苦的反扫荡斗争。从1938年6月到1941年5月，在华北的八路军对敌进行大小战斗15 139次，在华中的新四军对敌进行大小战斗4 967次，合共20 106次。其中，华北战场的战斗特别频繁而艰苦。仅抗战的第二、第三年，敌军千人以上的扫荡就达109次，使用的兵力在50万人左右，其中一万人到二万人的扫荡有七次，三万人以上的有两次，六万人以上的有一次。

从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到1940年8月百团大战之前，将近两年时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获得迅猛发展，进而导致中国抗日战争总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敌后战场成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之所以会出现这个重大变化，原因有两个：其一，日军政策的转变。广州、武汉失守后，日军被迫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而采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将军事打击的主要对象由国民党转为共产党，集中主力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这就使抗战的主要责任客观地、历史地落到了敌后抗日军民的肩上。其二，国共两党在两个战场采取了不同的战略指导。国民党从一开始就推行片面抗战路线，进入相持阶段后又增加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这必然导致国民党抗战力量的削弱和正面战场地位的下降。与此相反，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制定和推行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使抗战力量空前壮大。到百团大战前，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近50万人，根据地面积达到数十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一亿多。

注释：

①②《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2分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

版，第35页，第69~70页、第63~68页。

③《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624~625页。

④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文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166~167页。

⑤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4页。



日伪军对冀中进行五次围攻

1938 年 10 月，日军侵占广州、武汉后，被迫转入持久战阶段。此后，日军逐渐将进攻重点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其中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所属的冀中地区成为日军进攻的重点区域之一。1938 年 11 月～1939 年 4 月，日军华北方面军以第二十七、第一百一十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八旅团及伪军各一部，共约 2.6 万人，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相继发动了五次围攻，企图消灭或驱逐八路军。日军虽然占领了冀中区所有县城和大部乡镇，但是仍未能达到全面控制冀中平原的目的。

1938 年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日军逐渐将兵力向敌后转移，以“确保其占领地区治安”实现以战养战的目的，最终取得长期持久对华作战的胜利，为实现这一目标，大本营调整军事部署，将大量兵力调至华北，制定了华北“治安肃正计划”。1938 年 11 月 29 日，日军大本营下令，将三个师团调回华北，1939 年初，又将新成立的 11 个警备师团和 14 个独立混成旅团，调至中国关内战场，其中五个师团和八个独立混成旅团部署在华北，大大加强了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力量。

在集重兵于华北同时，1938 年 12 月 2 日，根据大本营命令，新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杉山元大将制定了 1939 年在华北的“治安肃正”根本方针，力图通过日军的“威力肃正”和以威力支持下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确保目前所占的华北地区之安定”。[①]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治安肃正”方针是：通过讨伐作战，全部摧毁根据地，同时彻底进行高度分散部署兵力，随后即依靠这些分散的据点，对匪军反复进行机敏神速的讨伐，使残存匪团得不到喘息时间和安身处所。”[②]据此，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于 1939 年 4 月 20 日制定《治安肃正纲要》，作为治安肃正计划的详细指导计划。

根据大本营的计划，从 1938 年 9 月广州、武汉失守之前，日军已经开始对晋察冀北岳地区进行清剿。1938 年 9 月，日军驻华北军一百一十师团、109 师团、二十六师团，独立第 2、3、4 混成旅团共计五万多人进攻五台和

晋西北山区，八路军一百一十五师英勇抗击，此次围攻计划没能达到消灭八路军主力目标。

日军对北岳山区进攻失败后，迅速调整兵力部署，将讨伐的目标转向了冀中地区，此次对晋察冀地区的扫荡计划是：在华北，首先扫荡平原，然后指向山地。对冀中平原的扫荡，日军首先组织了五次战役围攻和三次分区扫荡，与此同时还组织了200多次小规模的战斗，以肃清中共领导的分散于各地的主力部队和抗日游击队。

日军选择冀中为重点进攻目标主是出于多方面考虑，首先，相对于地形复杂的山区，日军机械化作战在冀中平原更有优势。冀中平原，交通便利，公路铁路网密集，各县城之间还可通汽车，村与村之间道路纵横交织，田间小路又极多。日伪军凭借其汽车、装甲车、骑兵和自行车等易发起进攻。而且，各县城的坚固高大城池有助于日军据守、进行休整、运兵等军事行动。其次，“冀中平原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冀中平原，是处在日军最后方的游击根据地，给予日军重要的根据地北平、天津以及三大交通线北宁、平汉、津浦的威胁最大”，同时“冀中平原和晋察冀边区的基本地区山岳地带，在战略上有着不可分离的互相依存作用”，[③]日伪军一旦占领冀中平原地区将对北岳地区形成极大威胁。第三，冀中平原物产丰富。日军进行治安肃正一方面出于巩固其后方的军事目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实现以战养战的目标，掠夺人力、物力、攫取资源。而冀中平原丰富的资源恰可满足日军的这一需求。正是由于以上原因，日军侵占武汉以后，对晋察冀实行迅速肃清平原，然后转入山区的方针。

为达到治安肃正目的，日军华北方面军详细分析了日军于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分布情况并提出：从兵力及治安情况看来，日军实际上实力所及只限于重要城市周围及狭窄的铁路沿线地区，仅仅是“点和线”，其他大部分是抗日武装的占领区。“为了保证安定，仅保持‘线’的占领无何意义。必须保持‘面’的占领，使华北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都能独立经营，尤其是应该承担开发和获得日本国内扩大生产所需重要资源的重任。为实现这一目标日军就必须积极进行肃正作战，实现包括各要地在内的‘面’的占领。”[④]日军即以此分析为基础制定了华北治安战的基本原则：“彻底进行高度的分散部署兵力，随后即依靠这些分散的据点，对匪军反复进行机动神速的讨伐，使残存匪团得不到喘息时间和安身处所。”[⑤]

1938年12月下旬，日军华北方面正式下达了围攻冀中地区的任务，为



完成此次作战任务，日本方面派出了由桑木崇明率领的一百一十师团及本间雅晴率领的二十七师团，从兵力上来讲，一百一十师团有 12 个步兵大队，16 个特种兵（骑、炮、工、辎重兵）大队。第二十七师团，包括九个步兵大队，12 个特种兵（骑、炮、工、辎重兵）大队。另外还有日军混成第八旅团及伪军各一部，总人数达 2.6 万余人。此次扫荡的日军的具体部署是："第一百一十师团，以主力肃清京汉路东侧地区，以其一部掐断通向京汉路西侧山地的要冲，协助第一军对山地的封锁。"；"第二十七师团，以主力肃清津浦西侧地区之敌，以一部于津海道[6]南部的津浦路东侧地区，支援该方面的第十二军的行动"。[7]

作战前，桑木崇明向日军训话时曾说："本师团依照华北方面军的讨伐肃正为指针，迅速地肃清平地，而后指向山地方面，务在繁茂期以前，彻底地肃清山地，毁灭其根据，铲除其祸根。"同时桑木崇明要求："各部队长官应熟识目前之情况，积极地肃清平地，以能按期达到肃清山地之目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从 1938 年 11 月至 1939 年 4 月，在五个月的期间内，日军对冀中地区连续发动了五次进攻。

日军第一次围攻始于 1938 年 11 月 12 日，日军以第一百一十师团主力一部及伪军 6 000 余人，以北平、天津为基点，向冀中根据地大清河以北之平、津、保三角区的固安、永清、新城、霸县、雄县等地区进行四路围攻，此次战役的作战目标是"将大清河以北抗日武装力量一举驱逐到大清河以南，或消灭在大清河以北地区"。第一次围攻历时 26 天，日军与冀中军区第五军分区主力独立第二支队共作战 29 次，日军占领上述五座县城，日伪军共伤亡 600 人，伪军被俘 1 000 余人。

1938 年 12 月 21 日，日军对冀中地区发动第二次进攻，日军第一百一十师团直属部队，以保定为基点，出动 1 500 余人，进犯安国、博野、蠡县，与冀中军区第二军分区部队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大队激战 23 天，大小战斗共达 22 次，1939 年 1 月 24 日，第二次进攻结束时，日军仅占领了安国、博野、蠡县三县，但未能对活跃于这一区域的抗日武装造成重大打击。在此次围攻过程中，日军也付出了伤亡 300 余人代价。

1938 年 12 月 30 日，日军第二十七师团与第一百一十师决定展开对冀中抗日武装的联合作战，两师团分别以（北）平大（名）公路，即安国——任丘——河间——衡水一线以东、以西地区为主战场。1939 年 1 月 25 日，两师团各出动一个联队，配合以伪军，总兵力达 7 000 人，配以飞机、

大炮分别从保定、沧州出动，向潴龙河以东，子牙河以西，滹沱河以南河间、肃宁、任丘、大城地区，进行五路围攻。此役作战目标为将中共领导下活跃在“子牙河以东、以北和滏阳河以东地区的部队，压迫到子牙河以西和以南的三角地区，便于捕捉而消灭之”。中国方面参加此役的抗日武装除冀中军区部队外还有八路军第一百二十师主力，此次战役历时10天，日伪军占领了献城等重要城镇，但未对抗日武装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同时日军遭受相当损失，伤亡440人。

2月5日，日军对冀中地区发起第四次进攻，企图肃清滹沱河以南地区八路军一百二十师主力部队。日军第一百一十师约2 000余人，还出动了大量的坦克、装甲车，日军分别从安国、博野、蠡县出动，向中南部饶阳、武强、深县地区进攻。此役，日军攻占饶阳、武强、深县三城。

3月18日至4月初，日军乘八路军主力部队正在肃宁东南窝镇一带休整之际发动了第五次围攻，妄图一举消灭八路军一百二十师主力。此次战役，日军出动了第一百一十、第二十七师团共7 000余人兵力，分七路合集大城、文安、任丘、肃宁地区，虽未能剿灭一百二十师主力，但却占领肃宁县城，3月23日，日军再次由河间分路出动，一部北进，控制了河间、任丘一线，从西面压迫八路军一百二十师，另一部日军向东北直逼卧佛堂。东面津浦线上青县、马场的日军也配合作战向大城方向牵制一百二十师，同时大清河以北日军沿河控制渡口防止八路军主力北进，此次战役日伪军一度联合将一百二十师和冀中军区部队、机关四面包围，但当日晚一百二十师各部即成功分散突围，至4月初，日军未能实现其剿灭一百二十师主力之战略目的，但占据大城、文安、任丘、肃宁各城。

日军的五次进攻，总战略目标在于以攻势作战掩护其分散配置，抢占要点，修筑碉堡公路、建立封锁线，以期达到控制“面”的目标。截止日军第五次进攻，日军占领了冀中区全部县城及重要村镇，并建立了百余据点。日军还以大据点（如保定）为中心，四周设卫星小据点，并以放射状筑汽车道路，纵横其间；再在小据点之间完成环状道路，将各据点向外扩张。此时，中共领导的军队无论处于冀中何处，距敌平均只有15公里左右，日军初步实现了其分割包围以点控面的目标，日军密集的碉堡与封锁线给冀中抗日武装造成巨大困难。

同时，日军冀中五次围攻也给冀中人民带来巨大灾难。至1939年4月，日军五次围攻结束，冀中36个县的县城均为日军所占，设治安维持会与县



长。冀中大部分地区被日军或日伪政权所控制，日军所到之处中国人民流离失所，民不聊生。[⑧]

扫荡其间，日军还在冀中到处杀人放火，1939 年 5 月在冀中饶阳县常刘村的战斗中，日军一日间烧遍七个村庄，中国民众也惨遭荼毒。同时，日军在山西开始实行有系统的破坏性的扫荡战，到处破坏民间所有的生产工具，甚至连最原始的手工纺织机，也不予放过，以破坏游击区的经济基础，日伪军的五次扫荡给冀中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五次进攻后，日军在冀中地区也面临新的问题，其分散配置的结果造成日军兵力分散，军队机动性减弱。在此形势下，日军不但无力遏制游击战争的发展，反而有利于抗日武装打击其弱点。同时由于多次扫荡作战，日军也消耗了大量有生力量，导致第五次围攻后，日军在冀中再无大规模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八路军一百二十师在当地民众配合下，经历了五次围攻后于 1939 年 4 月与日军展开齐会战役，沉重打击了日军，巩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而日军五次围攻及其后的扫荡被粉碎后，按照其既定方针将扫荡重点转入山区，以实现其“治安肃正”的目的。

注释：

①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 474 页。

②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 2 册，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 1041～1051 页。

③《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 年版，第 215 页。

④⑤⑦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史料：《华北治安战》（上），天津市政协编译组编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年 9 月版，第 108 页，第 109 页，第 117 页。

⑥日军将河北省 8 个道（保定、正定、冀东、渤海、燕京、津海、顺德、冀南道），津海系津浦路以东各县。

⑧袁旭等编：《第二次中日战争纪事》，档案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72～189 页。

一百一十五师薛公岭战斗

薛公岭战斗是日军侵占汾阳初期，当地人民配合八路军打击敌人、阻止其西进侵犯延安的重大伏击战。1938 年日军进攻广州武汉的同时，华北方面的日军也积极行动，妄图攻克西安与中共陕甘宁根据地，实现其占领大西北的计划。为粉碎日军进犯，配合八路军留守兵团保卫陕甘宁边区，八路军一百一十五师主力于晋西南汾离公路附近地区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1938 年 9 月取得薛公岭伏击战胜利，有力了打击日军运输线，保卫了陕甘宁边区的安全。

陕甘宁边区位于六盘山以东，长城以南，黄河以西，泾水以北地区，地处黄土高原。作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所在地，全国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已成为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政治指导中心，是领导敌后抗战和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的指挥中枢和总后方，边区辖神木、府谷、靖边等 23 县，面积达到 12 万余平方公里，在红军主力整编开赴华北抗战前线后，为了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安全，中央军委于 1937 年 11 月 17 日，将府谷至宜川的黄河千里河防划分为三段，成立三个河防司令部作为留守兵团驻当地军事指挥机构，同时加强了陕甘宁边区防务。

1938 年，日军在占领华北后，继续向西向南推进，先后占领了上海、南京、山东等地。在与国民党军队正面作战同时，为加强其占领区的安全，日军逐渐增加了华北等占领区的兵力，并向共产党敌后抗日根据地发起进攻。1938 年 2 月，日军侵占了黄河两岸的偏关、河曲、保德、碛口、军渡和府谷，直接威胁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安全。为保卫陕甘宁边区，1938 年 7 月 8 日，毛泽东急电一百一十五师，命令：一百一十五师第三百四十三旅仍以对同蒲、太（原）军（渡）两路大肆破坏，妨碍敌渡黄河为主要任务，并协助地方发展游击队为辅助任务。[①]遵照中央指示，一百一十五师第三百四十三旅由灵石、孝义地区进至通向军渡的汾离公路和同蒲铁路介休至灵石段沿线地区，伺机打击敌人。[②]据此，陈光、罗荣桓率部由吕梁山区向



汾（阳）离（石）公路以南及介（休）灵（石）铁路沿线开进，展开了交通破袭战，给日军以有力打击。

1938 年 9 月上旬，日军华北方面军为策应华中方面军进攻武汉，在第二十师团沿同蒲铁路南犯的同时，以第一百零八师团一部沿汾离公路西犯，先后占领离石、柳林，进逼军渡、碛口，并且不分昼夜地炮击河西守卫河防的阵地，直逼陕甘宁边区。面对这一危急形势，中央军委与八路军总部进行紧急部署。1938 年 9 月 11 日，毛泽东、朱德专门致电一百一十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等通告敌情，同时进行了战略部署，“据悉离石现有步、骑、炮混成编之敌约四千人，有进扰绥德威胁延安之可能”，“望子华即率有力支队进击柳林西北地区，扰击敌之侧后背并破坏其敌后方交通，陈、罗、周、甘同时亦应派就近部队兼程向该敌侧后相机予以打击，并积极破坏和截断其后方联络线，以配合河西我军阻敌西渡。”③八路军军总部也电令一百一十五师，要求其坚决拖住敌人，保卫陕甘宁边区。

根据中央的命令，一百一十五师代师长陈光和政治委员罗荣桓立即命令一百一十五师六百八十六团立即北插汾离公路，务求切断山口的补给运输线，配合边区河防部队，粉碎其西渡黄河的阴谋，以保卫边区，拖住敌人，实现“保卫延安，巩固晋西北根据地”的战略意图。曾经在平型关大捷、广阳伏击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一百一十五师六百八十六团此时正活跃在晋东南地区，接到师部命令后，团长杨勇立即率领六百八十六团挺进至汾（阳）、离（石）公路，并着手进行战前准备，搜集敌军情报，选取有利地形，待机打击日军。

1938 年 9 月 14 日，一百一十五师得到前方情报称：108 旅团北路敌人的先头部队已侵占了军渡一线，同时，指挥此次行动的敌 108 旅团旅团长山口少将，已经率其指挥机关进驻离石，并在汾阳城内集中了大批弹药、粮食和渡河器材等物资，随时准备起运，这一系列情况充分说明日军将在近期有大规模军事行动。为挫败日军企图，第一百一十五师代理师长陈光、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率领下第三百四十三旅在汾离公路三次伏击敌人，切断敌军运输线，给予敌人以有力打击，其中第一役发生在汾阳与离石交界处的薛公岭。

薛公岭，位于吴城镇以东，汾阳市与离石区交界处，周围峰峦重叠，沟壑交错。汾离公路顺着山势，由东蜿蜒向西，经过薛公岭一段陡坡后，伸入岭西的沟凹地。公路两旁，茅草、蒿草、灌木，漫山遍沟，足有半人多高，有利于部队伏击。此地形对我军十分有利：公路盘旋，两侧山高林密，十分

有利于八路军隐蔽，而一旦交战，日军难以展开，势必会窝成一团，甚至连看都看不清究竟是“哪里打枪”。也正因为这种地形，早已经吃过八路军不少苦头的日军，此次表现得特别小心。在运输时，前有尖兵连，后尾留有掩护分队，以保障主力的安全。行动前，在公路两侧到处设据点、筑碉堡，在薛公岭之役，我军选定伏击的公路北侧山头制高点上即有一座日军修筑的碉堡。六百八十六团在实地勘察前制定作战计划之时，首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如何拔掉敌人的碉堡，如果提前拔掉碉堡，就会“打草惊蛇”，伏击计划很难实行，如果在沟里埋伏部队的同时，也在碉堡后边的山凹里埋伏一个连，战役开始后以便伏击汽车，一边拔掉碉堡，敌人两头挨打，互相不能支援。但经过实地考察，碉堡周围又无适合埋伏地点，这一计划无法实施。最后，根据排击炮连连长吴嘉德的建议制定了最后的行动计划。六百八十六团伏击战开始后首先用迫击炮轰掉敌人碉堡，掩护部队进攻，然后全团对日军发起进攻。

作战计划基本确定后，前方传来情报，日军在 9 月 14 日将有一支汽车运输队经过我军预定伏击地点，于是在 9 月 14 日拂晓，第六百八十六团趁晨雾弥漫之机，绕过日军碉堡，悄然进入吴城镇东南之薛公岭附近设伏地域，主力置于公路南侧，一部置于公路北侧。全团的战士工作极其出色，就连站在远处的杨勇拿着望远镜也只看见了摇曳的蒿草和灌木，没有发现任何破绽。

我军伏击准备工作完毕后，即密切关注日军动向。7 时左右，我军接到活动在汾阳城附近的侦察员通过各村情报站的报告得知：日军的汽车运输队已经离开汾阳城，两个小时后，日军的汽车队到达了距离薛公岭五公里多的王家池，并自此进行了简单的整修，为汽车加了水加了油，半小时后由王家池出发。据守王家池的日军，还派出了一队巡逻兵作向导，掩护汽车通过薛公岭。很快日军便行至东山附近，因这一地区地形复杂，日军先将汽车停于山脚，并派出巡逻队向前搜索，只见“日军士兵持枪哈着腰，成战斗队形沿公路缓缓前进。待进至那四条山沟附近时，一面虚张声势地咋呼着，一边用机枪、步枪四处盲目射击。但是，也许是他们近一段时间内一直未在此地发现过什么情况的缘故吧，他们并未真正仔细搜索。当搜索行动结束之后，便稀稀拉拉地朝碉堡走去，一边走，一边还‘哇啦哇啦’地扯起嗓子唱歌。”[④]侦察队草草搜索后，释放两枚信号弹通知汽车运输队，随着“叭！叭！”两发信号弹升上天空，日军才重新发动马达，10 时许，由汾阳西进的



200名日军分乘21辆汽车终于驶入我军伏击区，就在此时，六百八十六团抓住战机，团长杨勇立即向炮兵下达了开炮的命令，该团追击炮连发连中，迅速歼灭控制碉堡之敌。与此同时，第六百八十六团以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实施猛烈的火力突击，顿时日军乱作一团。第六百八十六团趁势冲向公路，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格斗，“狭窄的路面上，着了火的汽车‘呜……呜……’地挣扎着、相互挤接着。车上的敌兵，有的跳下车与我搏斗，有的趴在车厢里射击。他们还企图顽抗，但这已经无济于事。”[⑤]整个战斗不到一小时，200多名日军除三名投降外，全部被歼灭。

薛公岭战斗打响后，近在咫尺的王家池之日军即向汾阳告急求援，但电话线早已被截断，出兵增援又恐遭伏击，无奈之际遂向薛公岭之群山进行长达数小时的盲目炮击直至深夜。翌日，驻汾阳的日军出动上千名兵力，到薛公岭收尸。驻守各据点的日军也四处寻找一百一十五师广阳团（六百八十六团代号）决战，但他们所到之处，不见我一兵一卒，只收回了日军200余具尸体。

正当日军到处寻找我军决战时，远在黄河边上的山口少将，因为得不到后方支援，粮秣和弹药极度缺少，只好派人出来抢粮。那些被派出来抢粮、抢船的日本兵到处受到游击队的袭扰，最后山口不得不命令部下固守待援。

薛公岭战役后，一百一十五师一鼓作气，又于汾离公路油坊坪、王家池两次成功伏击日军。9月17日拂晓，八路军第一百一十五师又以第三百四十三旅补充团，冒雨进至汾离公路上的吴城镇以西油房坪附近设伏。这时，日军正载着通信、渡河器材，分乘约20辆汽车，从汾阳出发，在坎坷不平的泥泞公路上颠簸前进。待日军进入我伏击地域后，补充团迅速出击，歼灭日军100余人，击毁汽车9辆。从而，取得了第三百四十三旅在汾离公路连战皆捷的胜利。日军第一百零八师团遭第三百四十三旅连续打击后，其汾离公路运输线时常被切断，遂于9月19日由离石东撤。根据这一情况，八路军第一百一十五师以第三百四十三旅为主力，于9月20日拂晓进至汾离公路上的王家池附近设伏。王家池一带，山高路窄，筑有日军据点。上午9时许，日军800余人，前拥后挤，进入第三百四十三旅伏击地域。随着一声冲锋号起，喊杀声震荡着山谷。在第三百四十三旅猛烈冲杀下，将日军分割成几段，经过两个小时激战，将其全部歼灭。王家池伏击战不仅歼敌近千名，同时108旅团旅团长山口少将也在马蹄下丧生，这一胜利震动了汾阳、太原之敌。

至此，八路军一百一十五师在汾离路取得了三战三捷的骄人战绩，三次战役共歼日军 1 200 余人，击毁汽车 30 余辆，俘获日军 19 人，缴获枪炮 560 余支。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独立指挥作战的胜利，是驻晋绥边区的游击队和汾阳民兵、群众支持和配合八路军作战的胜利。其中，汾离三捷的第一役——薛公岭战役的胜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及深远的影响。此役是八路军出师汾离公路的第一役，此次战役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八路军一百一十五师的士气，尤其是打击了日军的交通运输线，为后两次伏击战的胜利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同时，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敌后战场面临极大困难的时期，一百一十五师连续作战并取得胜利也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士气，使全国人民看到在抗战最为艰苦的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仍然坚持打击日军，极大提升了八路军及中共的威望。

同时，八路军一百一十五师主力挺进吕梁山后，积极展开独立自主的游击战，连战连捷粉碎了日军多次对黄河防务的进攻，从而配合了八路军留守兵团，保卫了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直至日本投降之前，日军再也没有从山西越过黄河天险一步。

注释：

①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252 页，第 259 页。

②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 2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07 页。

④⑤杨勇：《吕梁三捷》，《星火燎原》（5），解放军出版社，2009 年版，第 173 页，第 173 页。



山东地区战蓬勃发展

1938 年 10 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东敌后游击战面临着新形势的考验，为保证山东地区抗日游击战的持续发展，中共不断加大对山东地区敌后游击战的领导，同时将一百一十五师主力开赴山东。此后，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与山东军民的大力配合下，山东地区游击战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共领导的山东敌后游击战一度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一方面日军集中兵力扫荡后方，采取了旨在消灭华北抗日武装力量的治安肃正行动，另一方面，国民党在敌后不断制造与中共所领导抗日武装间的摩擦。

1938 年 10 月，日军侵占广州、武汉后，仍未能达到其逼迫中国投降的目的，于是逐渐改变其侵华方针，将兵力转移到后方执行军以执行治安肃正计划。从 1938 年 11 月开始，日军不断增强在山东的兵力，1938 年 11 月 19 日，日军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编成后，将司令部设于济南，并不断扩充该军，将 1938 年 7 月新编成的第二十一师团及原驻山东的第一百一十四师团、独立混成第五旅团军划归该军指挥。1939 年 1 月，第五师团由华南重返山东后，亦隶属该军，驻山东东部地区。4 月，又将第三十二师团编入第十二军，驻兖州、济宁、邹县、滕县一带。除此之外，在渤海湾一带还驻有华北方面军直属第二十七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七旅团，在山东南部徐海地区驻有隶属于华中方面军第十三军的第十七师团。至 1940 年，日军在山东及其周边地区的总兵力约 3.6 万人，伪军达 8 万人以上。此时，全省 105 个县中，建立伪政权的县达 103 个。[①]日伪军大量增兵后，为确保其占领区特别是交通运输线及战略资源据点，多次扫荡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袭击山东地区各种抗日武装，屠杀抗日军民，日军所至之处生灵涂炭、哀鸿遍野。

日军增兵的同时，国民党也趁机加强对山东控制，并不断制造与中共领导军队的军事摩擦。1938 年 11 月，国民党南岳军事会议决定重新部署山东

的军事力量，在山东和苏北成立鲁苏战区，任命于学忠为总司令，沈鸿烈、韩德勤为副总司令，并由沈鸿烈兼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下辖第五十一、五十七、八十九军及山东、苏北境内的各游击战和保安部队。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先后设立了鲁西、鲁北、胶东三个行辕和17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当时国民党部署于山东的军事力量主要支柱是吴文化的新编第四师和杨焕彩的海军陆战队，此外还有省属和县属的保安部队共有10万余人。此后，国民党为与中国共产党争夺山东，继续向山东增兵并不断制造军事摩擦。“1939年春，国民党于学忠部两万余人先后进入山东，占据沂山鲁山莒县日照、临沂费县等重要山区；国民党沈鸿烈部也由鲁北进入鲁中地区，抢占了沂鲁山区的要点，并积极与我摩擦。”②于是，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被迫处于对日对国民党军队两线作战的艰苦境地。

面对山东抗战出现的暂时困难，中共中央为巩固山东抗日根据地，继续发动山东民众争取抗战胜利，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

进一步加强了对山东地区党委的领导。1938年5月，中共中央派郭洪涛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随后，中央决定将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郭洪涛继任边区省委书记。边区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要大量发展山东抗日武装，建立民主政权，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使山东成为八路军在敌后的一个战略基地的指示，制定了发展山东游击战争的规划。

此后，为进一步加强山东抗战力量，中共中央及时派八路军主力一部来山东。1938年5月19日，毛泽东电示十八集团军总部及中共中央长江局，指出：“山东方面已开展起游击战争，那边民枪极多，主要派干部去，派一两个营作基干更好。”7月，八路军一百一十五师第五支队和一百二十九师津浦支队挺进冀鲁边区，加强了该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改变了该地区的局面。9月，萧华率一百一十五师三百四十三旅机关部分人员到达冀鲁边区，组成了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开辟与扩大了以乐陵、宁津为中心，包括沧县、盐山、庆云、南皮等县的平原抗日游击根据地。在9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派兵去山东。”12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一百一十五师主力挺进山东。12月下旬，一百一十五师三百四十三旅六百八十五团到达湖西地区。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中共山东分局由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称，郭洪涛、张经武、黎玉为委员，其中郭洪涛任书记。③12月27日，八路军山东纵队宣布成立，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为政治委员。各地抗日队伍改编为10个



支队和三个团，共2.45万人，另有一万多人的地方武装。[4]山东纵队机关对山东各地的抗日起义武装实行统一领导。此后，山东纵队与相继来鲁的一百一十五师主力一起，肩负起开辟和坚持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重任，更广泛深入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在冀鲁边区，日军为围歼刚到此地的八路军一百一十五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等部，于1939年1月，从山东、河北两省调集日伪军两万余人，向八路军驻地盐山、庆云、乐陵等地分进合击。为避敌锋芒，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决定化整为零，与日伪军迂回周旋，捕获战机歼灭敌军。从1月到5月，八路军共歼灭日伪军1 100余人。此后，鲁南边区党政军民又多次粉碎日伪军扫荡。

在湖西地区，从1939年1月起，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深入动员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至4月，支队迅速发展到8 000余人，开辟与扩大了以丰县、沛县为中心的湖西根据地。1940年6月，苏鲁豫支队大部南下华中，八路军一百一十五师黄河支队奉命挺进湖西，开展游击战争，领导山东军民多次粉碎日伪军扫荡，巩固并发展了根据地。

在鲁西区，当地武装在中共鲁西特委领导下，初步创建了抗日根据地。1939年3月，罗荣桓、陈光率领部下在郓城县的樊坝发起战斗，毙伤俘伪军800余人，并生俘伪军团长刘玉生，大大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抗日热情，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战后，罗陈大部主力东进，杨勇、张国华等率部分主力留在当地，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扩充部队，创建运西抗日根据地。5月11日，5 000余日军及一部伪军突然将八路军第一百一十五师师部，第六百八十六团、津浦支队、山东纵队第六支队等部及中共鲁西区委、泰西特委等党政机关3 000余人包围在陆房一带，危机形势下，八路军在陈光的指挥下，各部队和党政机关于次日晨均从敌军间隙中突围成功，安全转移到东平县东部。此次战役毙伤日军大佐联队长以下1 200余人。[5]此次战役是八路军一百一十五师入鲁后与日军进行的首次大规模作战，以少胜多极大振作了士气。1939年8月2日，独立旅一部在梁山设伏，在陈光、罗荣桓的指挥下，全歼进犯此地的日伪军400余人，击毙日军少佐大队长长田敏江以下300余人，俘虏日军24人。创造了八路军与敌数量相等而装备低劣条件下全歼日军一个大队的模范战例，受到八路军总部的表扬。在此期间，刘伯承率领的部分主力部队和当地武装在鲁西北地区相互配合，协同作战，灵活机动地抗击日、伪军，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在鲁南地区，到 1939 年 1 月，山东纵队一部和鲁南人民抗日武装初步开辟了抱犊崮山区东部及东南部的活动基地，并成立了中共鲁南特委。为了扩大鲁南抗日根据地，从 5 月下旬起，第一百一十五师主力分批先后到达鲁南，发动群众，扩充武装，开展抗日斗争，先后建立了津浦路东支队、运河支队、鲁南支队等武装。1940 年 2 月 14 日，第一百一十五师向盘踞在白彦地区与日伪勾结拥有数千反动民团的大恶霸孙鹤龄部发起攻击，经过两天两夜激战，消灭孙鹤龄部 1 000 余人，解放了白彦地区。日军为夺回白彦，连续三次出兵进犯，均被第一百一十五师击退，且被歼灭 800 余人。白彦争夺战的胜利，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并为向天宝山区的发展扫清了道路。4 月 14 日，8 000 余名日军及部分伪军向抱犊崮山区进行大规模扫荡，第一百一十五师和地方部队对敌作战达 30 多次，毙伤日、伪军 1 000 余人，至 5 月上旬终于粉碎了这次扫荡，保卫了以抱犊崮为中心的鲁南抗日根据地。在八路军各部大力支援下，山东纵队也在各地广泛展开抗日游击战。

在鲁中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二、四支队等部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巩固与扩大了泰山区、沂蒙山区两块根据地，使之成为一片。1939 年 1 月至 7 月，共进行大小战斗 70 余次，歼灭日、伪军 2 000 余人，其中 1939 年 6 月 1 日至 7 月 14 日粉碎日伪军两万余人的规模最大的扫荡。为粉碎此次扫荡，山东纵队各部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机动灵活地与敌人周旋。山东分局机关、山东纵队指挥部率特务团在沂蒙山区坚持内线作战，第一、二、四支队到外线打击敌人。在一个半月的反扫荡中，各支队多次避开敌人合围，与敌作战 20 余次，歼敌 1 000 余人。此后晋中地区抗日武装于 1939 年 10 月，1940 年 3 月、5 月、9 月、11 月，又进行了数次较大规模的作战，累计毙伤日伪军 1 800 余人。

日军在扫荡鲁中地区的同时也扫荡了鲁东南地区，6 月 11 日，日军侵占莒县县城，15 日日军 100 余人在石臼所登陆，进攻日照沿海一带，面对日军的打击进攻，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避其锋芒，并抓住战机消灭小股敌人。在 1938 年 6 月 30 日特委机关与日军的遭遇战中，由高克亭、谢辉指挥的特委直属队歼灭日伪军一部，成功掩护了特委机关的转移。1939 年 1 月，山东纵队第二支队与国民党诸城、胶县的地方部队成立了诸胶抗日联军指挥部，相互配合，共同抗日。

清河区，在中共清河特委的领导下，山东纵队第三支队等部队与于日伪军展开了殊死搏斗。1939 年 1 月，日军为“确保胶济线”的安全，在胶济



铁路沿线不断增设据点，同时打通了新店到广饶城北石村的辛石公路，相继占领了广饶、寿光、博兴等县城及重要村镇，并在1939年2月出动3 000余名日伪军对清河区进行大扫荡，致使该区县城全部沦陷，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身处险境，坚持战斗。1939年2月，第三支队第十团在临淄岳家庄伏击日军汽车运输队，击毁汽车七辆，毙伤敌近百人。3月，第十团在胶济铁路破袭战中，炸毁日军火车三列，拆走大批钢轨，使日军的铁路运输中断了一个多月。1940年9月21日，第三支队在高苑县魏家堡设伏，一举全歼日军一个小分队，炸毁汽车两辆，被迫地撤出了数个据点。此战之后，一个横跨小清河南北直至鲁北沿海、黄河入海口的清河区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

在胶东地区，面对1939年1月日军对八路军黄掖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山东抗日纵队第五支队和地方武装在当地民众配合下，先后作战10余次，毙伤日伪军200余人，俘虏70余人，缴获枪支100余支，给予进犯之敌以沉重打击。此后，第五支队继续坚持战斗，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山东纵队第五支队等部广泛展开了游击战争。仅1940年9月~12月，八路军胶东部队共作战935次，毙伤俘虏日伪军1.2万余人，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保卫了抗日根据地。

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面对日益严峻的抗战形势，山东军民在八路军各部的大力支援下大力发展山东抗日游击战，并不断开拓新的抗日游击区及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及山东人民的抗日活动牵制了日军部分兵力，为中国争取抗战转入中华民族的战略反攻阶段创造了条件。

注释：

①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山东地方史》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1页。

②罗荣桓：《谈山东抗日战争》，《八路军回忆史料》（上），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页。

③黎玉：《山东人民武装起义与山东纵队的建立和发展》，《八路军回忆史料》（上），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32页。

④⑤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山东地方史》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7页、第268页，第63页。

晋察冀边区成为模范抗日根据地

1937 年 10 月，平型关战役结束后，根据华北战场的形势变化及洛川会议确定的“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方针，聂荣臻率领一百一十五师开创了八路军进入华北抗日前线后创立的第一个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 年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基础上成立的晋察冀边区政府，因其为抗战中坚持华北抗战和争取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的重要贡献，被中共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晋察冀地区包括当时的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辽宁五省各一部分。位于同蒲路以东，津蒲路以西，正太（今石太）、德石路以北，张家口、承德以南广大地区。这一地区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正如时任一百一十五师副师长聂荣臻分析：晋察冀地区“位于平汉、平绥、正太、同蒲四条铁路之间。如果我们在这里成功地创建一块抗日根据地，就会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直接威胁北平、平津、保定、石家庄、太原、张家口等敌人的战略要点。创建晋察冀根据地，有着重大和深远的战略意义。它可以打击和摧毁汉奸组织，使丧心病狂的民族败类不能巩固其统治，……它不仅今天配合全国军民进行战斗，以籍制日本侵略军的进攻，而且在将来会成为反攻敌人的最前线的有力阵地。”①

晋察冀根据地初创时划分为北岳、冀中、平西、冀东、平北数区，后来逐步发展为有 80 万平方华里、2 500 万人口、108 个县分的重要根据地。边区境内，北岳恒山和五台山雄峙于西；松岭山脉、努鲁儿虎山脉延伸于冀北、热南；平汉路以东之冀中区为一望无垠的平原；平汉路以西之北岳区为险要的山地；冀热辽区为山地与平原交错地区。复杂的地理条件，使山地与平原互为依辅，为我抗日军民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提供了有利的地形。

另外，晋察冀地区群众基础较好，早在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在李大钊等人的组织领导下，一些城市和农村就建立了党组织，并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高君宇、蔡和森、刘少奇等人也在这里从



事过革命活动，在当地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有利于中共在该地区发动民众。

正是出于晋察冀地区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及建立根据地的优势等方面的考虑，早在平型关战役前，1937年9月20日、21日，毛泽东在给八路军指示中，就提出：五台山脉应使之成为重要的游击区域之一，现在就宜加紧准备，以适时转向群众工作。[②] 遵照中央指示，八路军第一百一十五师出师华北后以主力配合国民党军作战的同时，由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率领师政治部机关、骑兵营、教导大队和第六百八十六团第六连组成的工作团，东进晋察冀边北岳区的阜平地区，发动和组织群众。平型关战役后，中共中央、八路军总指挥部命令八路军一百一十五师分兵两路，由副师长聂荣臻率领一百一十五师一个独立团、一个骑兵营等共2 000余人，于10月下旬以五台山为中心，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核心地区是以五台山为中心的北岳地区，同时这一地区也是一百一十五师最先进驻的地区。1937年10月，一百一十五师五台山分兵后，聂荣臻领导下的杨成武独立团向雁北、察南挺进，在当地党和群众的支援下，于1937年10月10日一举攻克了河北省的涞源县城；10月16日又收复了山西省广灵县城和紫荆关；10月23日攻克灵丘县，10月26日复克察南的蔚县；继而收复龙华，攻克易县。仅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独立团就先后收复了晋察冀三省边界上的七座县城，开辟了以蔚县、涞源、广灵、灵丘为中心的抗日游击区，打开了晋察冀地区北部的局面。蔡顺礼、刘云彪的骑兵营翻越太行，活动于阜平、曲阳、行唐一带，10月18日克复曲阳城；24日收复定县，继而又收复行唐；11月11日克复满城，保卫了唯一没有被日寇侵占的阜平，从而开辟了以阜平为中心的冀西游击区。在太原失守前后，聂荣臻便派赵尔陆、舒同等同志带领一批军政人员，开赴五台、定襄、繁峙、代县、崞县等地，组织抗日游击队，摧毁伪政权，配合宋劭文、胡仁奎的抗日活动，于1937年11月，开辟了以五台为中心的晋东北抗日游击区。从而创建了北岳区抗日根据地。第三百四十三旅副旅长周建屏率领工作团活跃在正太路以北的平山、井陉一带组织农村游击队，打开了晋察冀南部的局面。打开局面后，各地区地方党委开始大力发动群众，开展建立基层政权和组织游击队的工作。在晋东北，宋邵文以山西第一区政治主任公署主任的合法身份向晋东北、雁北18县派出县长，建立各县救国会。在冀西，地方党组织在八路军工作团与部队的协助下，普遍组织了半政权性质的战地动员委员会，并成立了抗日义勇军、自卫军、游击队等抗日组织。到10月下

旬，以五台、阜平、平山等地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

晋察冀边区形势的迅速发展，抗日武装不断壮大，建立统一军事指挥机构的条件成熟。1937 年 11 月 7 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在山西五台正式成立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唐延杰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军区下辖四个军分区：第一军分区由杨成武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所辖地域为雁北、察南、平西、平汉路保定至北平段以西的冀西地区；第二军分区由赵尔陆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所辖地域为晋东北和太原以北的晋北地区；第三军分区由陈漫远任司令员，王平任政治委员，所辖地域为平汉路保定至新乐以西地区及路东部分地区；第四军分区由周建屏任司令员，刘道生任政治委员，所辖地域包括平汉路新乐至石家庄以西和正太路石家庄至寿阳以北地区。各军分区辖区以及游击区的划分，有利于根据地的开辟和进一步发展。为了使军区领导机关处于适中的地理位置，11 月 18 日，晋察冀军分区司令部由山西五台迁至河北阜平县城。中共晋察冀省委也于 11 月正式成立，由黄敬任省委书记。晋察冀省委按军分区的领导范围，先后成立晋东北、雁北、直西、冀察边四个特委，各县成立工委或县委。地方党组织与各军分区密切配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立与发展，对日军构成巨大威胁。为消除其后顾之忧，1937 年 11 月 24 日至 12 月 21 日，日军第五、第十四、第一百零九师团及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各一部共两万余人，在飞机、坦克配合下，从平汉、平绥、同蒲、正太四条铁路线出发，分兵八路，大举围攻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企图一举摧毁这个刚刚诞生的敌后抗战堡垒。面对猖狂进犯的日军，边区军民在聂荣臻的指挥下，以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避敌之长，击敌之短，经过近一个月的作战，于 12 月 21 日彻底粉碎了日军的围攻，迫使敌军撤回到原驻地。在这次反围攻作战中，边区军民共歼敌 2 000 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军用品，边区辖地发展到 30 余个县，部队发展到两万人。日军除占领了根据地边缘地区的几座县城外，别无所获。首次反围攻作战的胜利，使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华北敌后奠定了基础。

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迫切需要建立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此时一百一十五师深入五台地区，“要抗日，要发动群众，要稳定社会秩序，没有一个统一的抗日政府做依靠不行。同时，部队大量扩充，要吃饭，要穿衣，急需解决财政问题，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很难办



到。"[③]当时的晋察冀边区，除了五台、盂县以外，国民党各级政权机构已经土崩瓦解，在山西晋东北18个县中，除了五台县县长宋劭文和盂县县长胡仁奎两位还"坚持他们的工作外"，其他各县县长已经逃得无影无踪。[④]社会秩序一片混乱，汉奸土匪趁火打劫，老百姓惶惶不可终日。因此，八路军在粉碎了敌人八路围攻后，为了打击汉奸政权，团结一切抗日爱国力量，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导下，经过晋察冀军政民领导人的协商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同意，12月5日在阜平成立晋察冀边区临时政府筹备处，全面开展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和边区政府的组织、筹建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积极筹备，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河北省阜平县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140多名，代表着边区部队和39个县的1 200万人民，大会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财政、经济、文教、民运等决议案以及大会宣言和向全国的通电，选举产生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即边区政府）。推举聂荣臻、宋劭文、刘奠基、吕正操、胡仁奎、张苏、李述庸、孙志远、楼凝先为边区行政委员会委员，宋劭文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边区行政委员会下设民政、财政、教育、实业和秘书诸处、厅，委员会成立后相继颁布了《晋察冀边区县政府组织大纲》、《晋察冀边区政治主任公署组织法》、《晋察冀边区村镇公所组织法暨区长、村长、镇长、闾邻长选举法》及《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为边区各级政权的建设、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提供了法律依据。随着晋察冀边区委员会及各级民主政权的建立，晋察冀根据地巩固并发展起来。1938年1月3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行政院承认并批准了晋察冀边区委员会及委员人选，晋察冀边区公开合法化。

晋察冀边区的成立进一步增强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力量，为更加有力地打击日军创造了条件。1938年春，晋察冀军区成立后，八路军一百一十五师乘日军华北驻军主力南下作战，华北后方空虚的有利时机，从1938年2月至4月，八路军主力部队、游击队以及各种抗日武装相互配合，到处袭扰敌人的铁路、公路、交通线和沿线敌据点，收复部分县城，破坏了敌人的交通线和电厂，给日军重要设施及日伪政权以有力打击，根据地进一步扩大，政权更加稳固。中共领导抗日武装的壮大及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引起了日军的惊恐不安。1938年9月底，日军集中第二十九、第一百零九、第一百

一十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二、第两两个旅团共五万余人，由平汉、正太、同蒲、平绥四条铁路线同时出发，兵分二十五路大举围攻晋察冀北岳山区根据地。10 月 3 日占领五台，10 月 6 日侵入阜平城。八路军一百一十五师沉着应战，部分部队采用游击战术与敌军周旋，主力部队则跳出合围圈，在敌供应线侧翼打击敌人的运输队及掩护部队，大量破坏道路、桥梁。同时，八路军总部急调八路军第一百二十师三百五十八旅和三百五十九旅的配合保卫晋察冀根据地，一百一十五师、一百二十师经过 48 天的艰苦奋战，共作战 136 次，毙伤日军 5 200 余人，俘日军七人，缴获大量枪支和其他军用物资，彻底粉碎了敌人摧毁晋察冀边区的阴谋。此次反围攻的胜利，标志着晋察冀边区已成为敌后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在开辟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北岳根据地的过程中，八路军一百一十五师还逐步开辟了冀中、冀东抗日根据地。这样，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从 1937 年 10 月开始创建，到 1938 年 10 月，已经建成党政军组织机构较为完整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据统计，到 1938 年 10 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展到包括晋察冀（北岳）、冀中、平西、冀东的 72 个县，人口 1 000 余万的广大地区，共产党员增至八万余名，正规部队 15 万余人，从而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晋察冀根据地因在开展敌后游击及创建民主政权发动民众等方面的卓越成就，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赞扬。1938 年 10 月 5 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致电聂荣臻和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指出："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这不独坚持华北抗战中已经和将要尽其重大的战略作用，而且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⑤被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誉为"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⑥"华北抗战的堡垒"；其经验"足以成为各地如何唤起民众以密切配合抗战的模范"；⑦是"沦陷区民众抗日斗争的导标"。⑧

注释：

①《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 年版，第 368 页。

②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203 页。

③《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晋察冀抗日根据



地》第2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页。

④李公朴：《华北敌后——晋察冀》，三联书店，1940年版，第9～12页。

⑤《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1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版，第199页。

⑥⑦《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6页，第369页。

⑧袁伟主编：《毛泽东军事活动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362页。

王明错误及领导职务的解除

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建立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内部分干部由于对国共合作后国内政治形势认识不清而产生了右倾错误思想，其中以王明的右倾主义错误影响最大，这一错误的产生一度给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造成巨大损失，1938 年六届六中全会对王明的错误作出了处理，并在及时清除了这一错误带来的思想混乱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统一战线内独立自主原则。

1937 年 8 月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两党关系上，在统一战线中，强调实行既统一又独立的政策，对国民党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在维持统一战线的前提之下，强调保持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并力争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但是，1937 年 11 月由苏联刚刚回国的王明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大肆宣传其右倾错误思想，一度给中国革命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王明右倾主义错误的出现与抗战爆发后苏联政府及共产国际对国共两党态度的转变密切相关。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让中国拖住日本，从而减轻苏联压力，1937 年 8 月 21 日，国民政府代表王宠惠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共同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此后，苏联政府在抗战期间对国共两党的基本态度是把中国抗战的成败主要系于国民党身上。斯大林认为，蒋介石政府由于有了英、美和苏的援助，即使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也能拖住日本。在国共问题方面，斯大林很担心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政策会造成统一战线的破裂，以致中国牵制不住日本，致使苏联陷于两面作战的境地。因此，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要求中国共产党绝不能破裂统一战线，应当服从蒋介石的统一指挥。

因此，抗战全面爆发之初，共产国际即派王明回国加强中共对共产国际政策的贯彻，以避免毛泽东的独立自主原则影响蒋介石的抗战。故而，王明回国之初，在 1937 年 12 月 9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即 12 月会议）上，



便迫不及待地推行共产国际的新政策，反对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

王明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报告主要论述了四个月来抗战的经验教训，以及如何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和如何巩固统一战线等问题。报告中，王明在关于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意见，但在如何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主义观点。并对四个月以来中共中央统一战线方面的许多正确的观点和政策提出了批评。王明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共中央过去对国民党的根本转变认识不足，估计不够。同时，王明还反对毛泽东同年 11 月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对抗战初期许多重大问题所作的切中要害的科学论证。同时他指责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和解决民主与民生问题。王明说："过去提出国民党是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广大人民来帮助抗战。不要提得这样尖锐，使人害怕。"他还说："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者。"

另外，王明还抹煞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认为国民党是抗战的领导者，否认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否认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进而提出了系统的右倾主义错误理论。王明说："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把自己的行动局限于国民党蒋介石所允许的范围内，强调"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甚至提出根据地不应成立人民政府，不应提对包容着汉奸与亲日派的旧政府机关进行改造的要求。他反对放手发动和武装群众，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和人民军队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①]由于以毛泽东等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抵制，12 月会议上，王明的意见并没有形成决议，但刚刚回国的王明在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为后来王明继续宣扬其右倾错误思想创造埋下了隐患。

12 月会议结束后，王明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赴武汉与国民党谈判，协商国共两党合作事宜。1937 年 12 月 23 日，中共长江局在武汉成立，仍在武汉的王明临时担任长江局书记负责领导长江局工作。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王明除负责长江局的全面工作以外，还与国民党上层人物、武汉各界以及国外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宣传了中国共产党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为恢复和发展长江流域党的组织、与国民党协商统一战线中的一些问题，向国内外扩大宣传我党的主张，做了一些有益工作。但是，王明在武汉期间也宣传和贯彻了他的右倾主张，在很多方面犯了严重错误，从而给长江局的工作以至党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1937 年 12 月 25 日，王明在汉口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宣言从根本上否定了国共两党两条抗战路线的区别，片面强调“国共两党方面不仅都有了更加精诚团结必要的认识，而且都有了更加亲密合作的决心”，并在党中央早已发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后，又提出了六大纲领，继续强调要建立一支“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国防军队。[②]

12 月 27 日，王明又撰写了《挽救时局的关键》一文，提出：“目前挽救时局的中心关键，在于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更加团结”，“团结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唯一正确方案，便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该文突出地宣扬国民党同共产党一样也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说国民党中“没有什么法西斯蒂派”，蒋介石等是“坚决领导抗战的人物，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应解除一部分人误认“国民党内某部分人为，‘法西斯蒂派’的误解”，完全否认国民党内法西斯势力的存在、甚至把他们都说成是“优秀青年”。[③]

在这种认识下，王明对于党中央采取的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展革命力量的方针表示异议，深怕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引起蒋介石的不满。

同一天，王明在汉口抱冰堂对广西学生军作了题为《抗战中的几个问题》的讲演，再一次提出要求抗日救国的群众运动的统一，“诚恳亲切地与当地党政军各界社会团体的合作，取得合法的地位”。[④]主张把群众运动统统置于国民党的领导管制之下。[⑤]

1938 年 1 月，王明在武汉大学作了《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讲演，除了继续强调必须建立统一的政府、统一的军队以及统一的民族组织以外，进一步阐述了他关于民主、民生和游击战问题上的错误主张。他说：“目前我们把民族问题提高，对外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对内民权和民生不是主要问题，而是附属于抗日问题的。”并说：“在对内的问题上，现在也有一种恶倾向，就是先问民主自由够不够，然后再谈统一战线。这是不对的。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之外没有其他的条件。”“抗日的就是友，不抗



日的就是敌，其他问题在抗日中慢慢解决，民生民权问题不是不谈，而是在抗日的总题目下谈，不能妨碍统一战线。”[6]不适当地解决民主民生问题，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调动不起来，抗日的胜利就很难保障。王明在这里借抗日来贬低解决民生问题的意义，显然是错误的。王明还进一步贬低游击战的作用和意义，他说：“我们相信没有统一的正规国防军队决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大家都在喊游击战，好像有了游击战什么都不成问题似的，其实单有游击战，没有与正规军的配合，是不能有决定作用的，将来与日本帝国主义最后决战必须是强有力的正规军。”

王明还公开反对中共创建抗日根据地以及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等工作的开展，1938 年 1 月 10 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召开，民主选举产生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并从延安发出了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通电。王明等在武汉收到这一通电后，立即于 1 月 28 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请转告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刘少奇，提出：“关于我军在华北驻区应遵守形式上维持原行政权形式……此次所采取之已成事实方式，通电逼蒋阎承认，对全国统一战线工作，将发生不良影响”；“通电不从临汾发出，而从延安，更增加对国民党之刺激”。接着他们提议：“最好不用边区名称”。完全体现了王明所宣称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观点”。

1938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1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报告，把右倾投降主义的观点在军事上加以发挥，提出“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军队上，指望通过外援组建几十个最新式装备的师作为统一的军队的骨干，要求建立真正统一的革命军，将其原来提出的“五统一”发展为“七统一”，即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王明的错误观点遭到了毛泽东、张闻天、任弼时等人强有力的驳斥。

但王明本人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这一观点的错误，1938 年 3 月 11 日王明回到武汉后又公开发表了《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一文，将右倾主义冒充为党中央的路线而大肆宣扬，造成了极坏的影响。除此之外，王明在武汉主持长江局工作期间，极力贯彻右倾投降主义主张，甚至无视中央组织纪律，擅自发表错误主张。1938 年 3 月 21 日，未经中央同意，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并将其送交国民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王明还热衷于和国民党上层分子结交，过分强调群众组织取

得合法和统一，致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汉地区三个先进群众组织青年救国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蚁社被迫解散，王明还下令解散七里坪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和汤池训练班。主张公开发展党员，甚至要党组织公开，给中共国统区工作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在军事问题上，要巩固统一的军队，服从国民党、国民政府的统一指挥；在群众工作上，要求得合法和统一；在战略方针上，要以运动战为主，不能以游击战为主；在当时的工作重心上，要集中力量保卫大武汉，用不着去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正是由于王明在主持长江局工作期间未贯彻中央关于在长江流域及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致使长江流域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受到了损失，使党未能在1937年冬至1938年春在华中敌后更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

总之，王明从1937年11月回国至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被解除职务期间，在坚持抗战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发表了一系列比较正确的主张，但是在如何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却犯了系统的右倾错误，这些错误在党内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造成了党内思想混乱。鉴于王明的错误，中共中央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对王明的问题进行了处理。大会批评了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通过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并从组织上作了调整。会上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分别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原局，将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王明留延安工作，从而结束了王明对长江局的领导，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思想的影响。

注释：

①③周国全，郭德宏：《王明年谱》，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93页，第95～96页。

②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50页。

④《陈绍宇救国言论选集》，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页。

⑤《新华日报》，1938年1月20日。

⑥《王明言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内部版，第558～559页。



毛泽东的独立自主原则

1937年8月，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建立后，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面对统一战线内部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很快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并以此为理论依据克服了王明右倾主义错误，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卓有成效地建立与发展了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发展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限制，放开手脚，壮大人民武装力量，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初步基础。

中共的独立自主原则，是指在统一战线中，实行既统一、又独立的原则，对国民党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式，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保持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实行自己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斗争；在军事方面，坚持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同时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实质上就是力争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中共独立自主原则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后，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下经过曲折的过程最终确立的。

早在1937年5月，毛泽东曾提出过“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就是“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民主）权利”，“各党必须有相对的独立性，即是说有相对的自由权”。[①]这可以说是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立自主思想的萌芽。1937年8月1日，毛泽东和张闻天鉴于新四军改编过程中出现被国民党军队瓦解的“何鸣事件”，发布了《关于红军作战原则的指示》，其中提出了红军作战中必须坚持的一项原则是“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独立自主原则。[②]在1937年8月22日～25日的洛川会议上，经毛泽东大力推动，会议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中，明确提出，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国共两党的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而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就是实行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全面抗战路线。

洛川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于 8 月 27 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座谈会上，毛泽东具体表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原则的思想。毛泽东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国民党有计划地从各方面影响和吸引共产党及红军，我们要提高政治自觉性。要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跟随我党走。两党之间互相吸引的问题，要在斗争中解决。在发言中，毛泽东还特别强调：统一战线建立后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要注意在党内加强教育。

针对洛川会议以后，党内的一批军事干部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等问题认识不清的情况，毛泽东多次致电军队主要负责人详细阐述军事上独立自主的原则，在 1937 年 9 月 12 日致彭德怀电，9 月 16 日致林彪电，9 月 21 日致彭德怀电，9 月 25 日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电。同一天致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电等一系列指示中，反复强调了我军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能采取运动战的方针，提出以我党目前领导的军事力量决不可与日军打阵地战、运动战，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放手发动群众，通过山地游击战，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发展和壮大革命势力等工作上面。1937 年 11 月 15 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中指示：“目前山西工作原则是‘在统一战线中进一步执行独立自主’。”强调“‘独立自主’之实行，须比较过去‘进一步’这是完全必要的。”③在毛泽东大力倡导详细解释后，独立自主原则逐渐被大部分领导干部接受并成为指导我党处理政治、军事问题的重要指导原则。

但是，中共在统一战线内强调独立自主开展政治、军事斗争的情况却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并提出了反对意见。1937 年 9 月下旬，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专门致电中共中央，提醒在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问题上，要提出适当的要求与口号，不要太高太左，不要设想另外建立各党派联合的政府；要树立国共长期合作的思想，以三民主义为基础，不要作一时的打算和提出社会主义的目标。对国共合作要坚持“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原则，不要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④在共产国际压力之下，1937 年 10 月初，中共中央在原则上接受了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不再强调独立自主原则。但是，随着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意识削减，党内外便出现一些混乱的情况。1937 年 10 月，上海、西安相继发生国民党压迫抗日救亡运动，企图包办民众组织以排斥共产党，由于我党过度强调统一战线而忽视独立自主原则，导致部分干部对这一事件采取了消极退让态度，给中共组织造成一定的损失。这些情况立即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他提醒全党注意：“民族资产阶级的影



响，在部分左倾领袖及党员中是在增长，主要表现是在对国民党的投降”。[⑤]在同年的11月12日，毛泽东再次系统地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原则的必要性、重要性，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⑥]至此，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已经牢固地确立起来。

但是，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原则，与共产国际的右倾方针发生了尖锐的对立，并再次遭到共产国际的干预。1937年8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召开专门会议，研究中共政策转变问题。会上，季米特洛夫着重强调，由于共产党力量弱小，因此在国共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领导谁的问题，应提出“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⑦]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的右倾方针，共产国际派王明、康生回国。从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到1938年“三月政治局会议”，仅四个月的时间，便形成了以否定独立自主原则的王明右倾主义错误路线，致使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受到了影响。在此期间，毛泽东一直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并与王明的错误观点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在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的政治局会议上，尽管受到王明右倾主义错误的影响，党内思想一度出现混乱，但毛泽东于11日、12日在会上的两次发言，仍然坚持强调了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重要意义，毛泽东说：统一战线的总方针要适合于团结御辱，在统一战线中，“和”与“争”是对立统一的。八路军与游击队是全国军队的一部分，但是要在政治工作上、官兵团结上、纪律上、战场上起模范作用。过去我们反对国民党派大官来是必要的，因为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要派大批人来侮辱和破坏红军，应该拒绝。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降到国民党方面去。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独立自主，对敌军来说我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总的一句话：相对集中指挥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的政治局会议上回忆这段历史曾说：“十二月会议上……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⑧]正

是因为毛泽东等人的坚持，王明的右倾错误理论虽然对党的工作正常开展产生了干扰，在党内并没有取得统治地位。

1938 年 3 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再次大力提倡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在大会的发言中说，“我同意要争取外援，但主要是靠自己，强调自力更生。”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为争取国民党继续抗战，合作形式将来可采用民族联盟或共产党员重新加入国民党，但是要保证共产党的独立性。[9]

1938 年 3 月 25 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书记处起草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并不顾王明的反对，再次公开提出了民主与民生的正义要求。5 月，毛泽东再次公开强调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作用，强调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独立自主原则。与此同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又主动地加强了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促使共产国际领导人加深对中国情况的了解，并自觉改变其右倾方针。在共产国际进一步了结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及改变其右倾指导方针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重新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

1938 年 9 月 29 日至 11 月 6 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的会议总结，着重重申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他说：“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他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说：“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么，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为抗日战争全面胜利，中国共产党必须贯彻独立自主原则并采取灵活的策略。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及会议通过的最终决议标志着统一战线内独立自主原则的最终确立。

抗日民族统一战的独立自主原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艰苦、持久的抗日战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的有力思想武器，对中国政治形势



及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巨大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正是遵循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中国共产党才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增强了全党的团结，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对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阐述，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与独立性、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科学地结合起来，既注意了统一性，以便团结对敌，又注意了区别性，以免受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同化，从而正确地指导了抗日战争。

此后，中国共产党继续执行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各抗日根据地放手发展抗日力量，逐渐于敌后形成了全民抗战的形势，为坚持全国抗战局面，渡过难关，直到争取抗战最后胜利，打下了基础。

注释：

①⑥《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39 页、第 524～525 页，第 394 页。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 年版，第 293 页。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 年版，第 381 页。

④杨云若等著：《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 427 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 31 页。

⑦周文琪等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330 页

⑧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 年 11 月 13 日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1938年9月，中国抗日战争已经处于重大变化的紧要关头，中国军民经过15个月的抗战实践，国共两党的两条不同抗战路线孰是孰非已经非常明显。为总结抗战15个月以来的工作，确定抗战即将进入新阶段的方针、政策，批判和纠正王明右倾主义错误观点，1938年9月29日~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桥儿沟举行了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参加此次会议的代表共56人，其中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12人，即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项英、王稼祥、陈云、刘少奇、康生、彭德怀、王明、博古；中央委员五人，即关向应、张浩、杨尚昆、李富春、李维汉；中央各部门及全国各地代表40人，即吴玉章、林伯渠、张文彬、谢觉哉、徐特立、滕代远、萧劲光、谭政、罗瑞卿、林彪、贺龙、邓小平、彭真、高自立、朱理治、罗荣桓、徐海东、程之华、高文华、曾山、高岗、贾拓夫、郭述申、刘子久、柯庆施、潘汉年、冯文彬、孟庆树、曹轶欧、肖克、成仿吾、李昌、李六如、涂振农、杜理卿、宋一平、谭余保、王首道、陈刚、杨松。[①]大会决定由12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组成主席团，李富春任秘书长，杨松、王首道、陈刚担任秘书，六中全会成为1928年六大召开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六中全会首先由张闻天致开幕词，其后由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对于中共一年来工作成绩进行了充分的肯定，高度评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我党政治路线的正确性，进而提出：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正确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领导，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毛泽东在会上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战争和战略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的会议总结。毛泽东的发言全面总结了抗战15个月来的工作，分析了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将转入相持阶段的新形势。毛泽东指出：由于敌强我弱，敌是优势，我是劣



势，敌是帝国主义国家，我是半殖民地国家，所以要战胜敌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中国的进步；日本的困难；国际的援助。毛泽东通过综合分析，提出从目前抗战各方面形势分析，中日之间战争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当前中国已有的进步还不够，必须力求更大的进步。

毛泽东在发言中详细阐述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特别指出了对于国共两党在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的矛盾应该正确对待科学处理，不应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处理统一战线中存在的政治问题与工作问题，而应该站在科学的基础上，采取恰当的政治政策与工作态度。在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各种问题中，首要的是处理好国共的关系。关于处理国共关系，既要重视与国民党的合作关系，同时也要坚持一定的原则。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要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赞助友党友军的巩固与扩大时，也必须巩固与扩大我党我军。不能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所需必要的机制，而是要在合作和统一中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同时要坚持自身原则。这才能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因此，“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是错误的。

另外，毛泽东还着重阐述了抗日游击战中的战略问题，论述了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毛泽东提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因为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国内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的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没有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罢工的合法权利。因而“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认识这一点，对于今后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是有益的”。[②]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③]由于抗日战争的特殊环境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殊性，共产党应该看到掌握兵权，组织军队的极端重要性。“共产党员不争个人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④] 毛泽东的发言中在此强调了我党于政治上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在军事上坚持掌握抗日武装并争取统一战线内部处于主动地位的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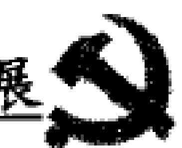
会议还听取了张闻天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王明作共产党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和《目前抗战形

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项英作关于新四军工作的报告，朱德作关于华北八路军工作的报告，周恩来作了中央代表团工作的报告，陈云作关于青年工作的报告，刘少奇作北方局工作报告和关于党规党法的报告，张浩作关于抗战中职工运动的任务报告，彭德怀、博古、贺龙、杨尚昆、关向应、邓小平、彭真、罗荣桓、林柏渠、吴玉章等报告各方面和各地区的工作情况，并围绕总结抗战15个月的经验发表意见。

针对王明的会议报告与会代表就统一战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严肃批判了王明右倾主义错误，批评其对国民党消极让步、否定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等错误。肯定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明确了实行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一、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提出和制定，要独立自主；二、冲破国民党的束缚和限制，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尤其是建立人民抗日政权和扩大人民军队上，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去做。三、必须不断地批评和揭露国民党在抗日过程中的妥协投降，以及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势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就是坚持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不犯右倾主义错误，为最终争取抗战胜利和民族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

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全会确定：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的合作来支持长期抗战；重申了全党必须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继续执行“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强调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充分重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毛泽东等领导人全面阐述了正规战与游击战，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关系，提出“游击战争虽在全体上居于辅助地位，但实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5]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抗日过程中的军事战略，并强调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毛泽东等领导人全面阐述了正规战与游击战，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关系。

关于如何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问题，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详细列举了我党应采取的措施：高度的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持抗战到底，克服悲观失望情绪，反对妥协投降；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亲密合作，反对一切分裂企图，反对任何汉奸傀儡政府；提高主力军的战斗力，保卫西南西北，



停止敌之进攻；广大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创立和巩固更多的抗日根据地，缩小敌之占领地区，并配合主力军作战；提高军事技术，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准备反攻实力；实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政治，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发挥抗日政权的最大效能；扩大群众运动和发展民众团体，动员民众积极参加抗日战争；改良民众生活，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与生产热忱；实行新的战时政治经济政策，渡过战争难关；实行国防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集中一切力量反对日本侵略者，加紧国外宣传，力争国外援助；建立中日两国与朝鲜、台湾等人民的反侵略战争的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日本法西斯；团结中华各民族，共同抗日图存；厉进锄奸运动，巩固抗战前线和后方；发展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强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长期抗战。[6]

全会还强调了党员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共产党要肩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就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共产国际的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以此为理论武器反对思想上、工作上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和机械主义，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认真地、系统地、理论联系实际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会灵活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同时提高我党战斗力量，并加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同时鉴于右倾主义者违反组织纪律的错误及张国焘的叛党行为，全会决定加强党的组织建设，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组织建设方面的决议，规定了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及各级党委、各级党部工作的任务、职责范围和纪律，强调每个党员都必须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规定中央委员如果没有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及中央书记处的委托，不得以中央名义向党内党外发表言论与文件，不得在中央委员会以外对任何人发表与中央委员会决定违反的意见，不得有任何相违反的行动。

全会还根据党的任务及在长江流域的工作情况，决定对党的组织作相应的变动。撤销长江局，成立南方局，由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董必武为副书记，领导长江以南党的工作和国民党大后方的统一战线工作；另组中原局，由刘少奇任书记，领导长江以北华中地区的抗战工作；将东南分局改为东南

局仍由项英任书记，继续领导新四军军部和苏南、皖南的抗日斗争；充实北方局，由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组成北方局常务委员会，杨尚昆任书记。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的重要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的会议，此次会议的召开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主义的错误，加强了党的团结，全面地阐明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规划，为全党的行动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党的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也为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迎接抗日战争的新阶段，进而争取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注释：

①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 年版，第 330 页。

②③④⑤《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544 ~ 545 页，第 534 页，第 546 页，第 552 ~ 553 页。

⑥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选集》第 11 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 751 ~ 752 页。



国民党进行武汉保卫战

武汉保卫战史称武汉会战（日本方面称之为武汉攻略战），是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为抗击侵华日军进攻，从而聚集大量部队，在长江南北两岸、横跨河南、湖北、安徽、江西四省数千里内，组织实施的一次防御战役。该战役于1938年6月上旬开始，至10月下旬结束，共进行了四个半月，中国方面动用兵力达100万人，是整个抗日战争中时间最长、兵力最多、战斗地幅最广、伤亡最大的一次作战。

日军在发动卢沟桥事变时曾扬言，三个月解决“中国问题”。但随着日军在华进攻的不断深入，受到中国军民的奋勇抗击，被牵制兵力越来越多，消耗甚大。到1937年底，抵达中国的日军已逾16个师团，占其陆军总兵力的2/3，这与其速战速决的作战计划大相径庭。为摆脱这种局面，日军在占领南京后，就开始研究攻占汉口的作战。1938年春，随着徐州会战的进行，日本陆军部做出了“秋季进行汉口作战”的决定。1938年6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正式作出了攻占汉口的决定。从战略层面上来看，日本计划攻占武汉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通过这一作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的大半”，“从历史上看，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统治中国”，“只要控制中原，实质上即能统治中国”；[①]另一方面，“只要国民政府还盘踞在汉口，汉口就是主要以西北各省为其势力范围的共产军和主要控制着西南各省的国民党军之间的接合点，和两党合作的楔子”，“所以，首先为了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攻下武汉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占领了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地区的联系，并可能产生两党的分裂。”[②]于是，1938年6月24日，日本五相会议遂决定：“集中国力直接解决中日事变，本年度以内达到战争目的。”[③]根据这一决定，日军在占领徐州后，迅速集结了两个军共14个师团总计35万余人、各型舰艇140余艘以及各型飞机500余架，投入了开战以来最强大的兵力，由华中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大将任总指挥，沿长江、大别

山区分别西进，企图在短时间内攻占武汉，迫使国民党政府投降。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东缘，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极为便利，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方面，北有桐柏山，西有大巴山、巫山，南有湖沼相连洞庭湖区，东则有幕阜山、大别山钳住长江咽喉；水路方面，长江大动脉横贯东西，溯汉水而上可达西北；陆路方面，武汉北以平汉线连接郑州，南以粤汉线相接广州，屏障西南。正是因为此处地理位置过于重要，1937 年 12 月，日军侵占南京后，国民政府虽然西迁至重庆，但国民党党政军各重要机构和蒋介石、汪精卫及各党各派领袖、文化界知名人士、驻南京的各国使馆人员等重要人物都在武汉，此时的武汉，实际上成为了全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可谓陪都重庆之外的“战时首都”。因此，对于国民政府乃至于全国战局来说，“目前的大武汉，政府要用绝对的力量来加以保卫。”④

然而，在国民党内，“速胜论”与“亡国论”之争混淆舆论，严重影响了中国全民族对日抗战的进行。徐州失陷后，“速胜论”销声匿迹，“亡国论”又迅速抬头。在这种背景下，为肃清“速胜论”与“亡国论”，1938 年 5 月 26 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著名演讲，正确指出了中日战争的发展规律，坚定了中国军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为加强统一战线，动员民众参加抗战，配合国民党保卫武汉，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也不断宣传保卫武汉的方针。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武汉地区民众抗日救亡热情空前高涨，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云集武汉，与武汉青年一起，先后组织了武汉青年救国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工人抗日自卫队、战地服务团等数十个抗日救亡团体，不断向社会各界宣传和动员保卫武汉。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对武汉保卫战的舆论宣传，积极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极大地鼓舞了国民党和各界民众的抗日热情，打击了“亡国论”的反动气焰，为推动国民党抗战，尤其是促使国民党政府积极组织武汉保卫战起了重要作用。

在全民族对日抗战热情不断高涨的背景下，面对日本的狼子野心，1938 年 6 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了“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作战方针。方针规定：“守备华南海岸及华东华北现阵地，并积极发展游击战争，妨碍长江下游航运，牵制和消灭敌人；另以有力一部支援马当要塞，在鄱阳湖以东迎战敌人，阻止其溯江向九江集中；在武汉外围布置主力军，利用鄱阳湖及大别山之地障与长江两岸之丘陵、湖沼作持久战，



特别把重点放在外翼，争取行动上的自由，预期可与敌人的主力作战，四至六月，予敌以最大之消耗，粉碎其继续攻势之能力。"⑤依此可见，国民党保卫武汉的战略构想是：中国军队于华中地区，运用第五、第九两战区兵力，以粉碎敌人继续进攻的能力，重点防御江南地区，节节抗击敌向武汉的进攻，消耗敌军。⑥

依照这个作战方针，中国军队将防御的重点放在了武汉外围：一、部署重兵坚守马当要塞，阻敌于鄱阳湖以东，防其溯江西犯；二、将主力军部署在武汉外围，利用鄱阳湖和大别山以及长江两岸丘陵湖沼等有利地形进行阻击。国民政府军委会为适应作战局势，于 1938 年 6 月中旬新编第九战区，同时决定以第五、第九两个战区所属部队作为保卫武汉的主力，兵力部署如下：以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7 月中旬至 9 月中旬由白崇禧代理），下辖第一兵团、第三兵团和第二十一、二十六、二十七集团军共计 23 个军，防守武汉以北的大别山区，其中孙连仲指挥第三兵团防守商城、麻城、信阳、潢川等地，李品仙指挥第四兵团防守黄梅、广济、浠水、黄陂等地，第二十一、二十六、二十一集团军防守大别山东麓；以陈诚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下辖第三兵团、第四兵团、武汉卫戍部队和江防守备部队共 27 个军，防守鄱阳湖西岸和武汉以东地区，防止敌人突破防御阵地，其中薛岳指挥第一兵团防守南昌至德安附近鄱阳湖西岸一线，张发奎指挥第二兵团防守九江以西的马头镇、鄂城、武昌、咸宁等地，武汉卫戍部队固守武汉核心地区，江防守备部队防守马当、彭泽等要塞。此次战役由蒋介石亲自坐镇总指挥，投入兵力总计 14 个集团军、近 50 个军，近 110 万人，作战飞机约 200 架，舰艇 40 余艘。

1938 年 6 月 12 日，日军攻占安庆，为日军大举进攻武汉建立了补给基地，武汉保卫战的序幕由此拉开。"日军进攻武汉分两个方向。一、以第 11 集团军沿长江及其沿岸地区向西进攻武汉。此为日军主要进攻方向。二、以第 2 集团军自合肥地区西进，沿大别山北麓西犯，然后沿平汉铁路地区南下进攻武汉。中国第五、第九战区部队从 6 月到 10 月底同日军展开一系列的防御作战。"⑦徐州会战后，日军以三个师于 6 月初沿陇海路西进，攻陷开封，并意图夺取郑州后沿平汉路南取武汉。为滞敌西进，国民党政府于 6 月 9 日决开黄河花园口大堤，使日军进攻郑州的计划受挫。于是日军遂改变部署，以主力沿长江、一部沿大别山北麓西进。

安庆陷落后，第 27 集团军一面继续阻敌，一面将主力向太湖方向转移。

6月13日，日军第六师坂井支队占领桐城。6月14日，坂井支队得知波田支队已攻占安庆，遂奉命改变进攻方向，进攻大别山防线的前沿阵地潜山县。6月18日，坂井支队攻占潜山县，此后，坂井支队沿长江北岸、大别山以南的狭长地带向西进击。安庆、潜山的陷落直接威胁着南京和武汉之间的第一道屏障——马当。马当素为军事要地，京沪沦陷后，国民政府为阻止日军西进，确保武汉的安全，在马当从江心横贯两岸构筑一拦河坝式的阻塞线。马当要塞由德国军事顾问设计，耗资无数，坚固异常，是阻拦日本海军的坚固堡垒，蒋介石对其寄予厚望。日本海军首先试图从江上打开通道，无奈水雷、沉船和人工暗礁太多，而且扫雷艇在守军的炮火下也无法扫雷。见江上行不通，日军就改为陆路迂回进攻，6月24日，日军波田支队向马当进攻，6月26日，波田支队在海空火力支援下实施登陆作战，守军江防总司令和第十六军军长命令第一百六十七师增援马当要塞，但一百六十七师师长薛蔚英贻误战机，迟迟不能率部到达，当日波田支队即攻占要塞。日军占领马当要塞后，6月29日，攻占彭泽县城，湖口告急。7月4日夜，湖口失守，自此，九江重镇彻底失去了屏障。湖口沦陷后，日军以波田支队、第一百零六师团、海军陆战队约一个旅、第3舰队为主力积极准备向西继续进攻，中国第九战区则以第一兵团部署于鄱阳湖西岸，策应九江方面防御，以第二兵团部署于星子、九江之线。7月23日零时，日军波田支队成功登陆姑塘，并于24日与第一百零六师会攻九江，25日晨日军发动总攻。7月26日晚，第二兵团因伤亡过大而弃守九江，九江陷落。

在长江北岸，日军占领安庆、潜山后，打开了沿长江北岸西进的通道，日军精锐第六师在海空火力支援下，从大别山南麓及长江北岸间大举西犯，直接威胁武汉。8月2日，日军第六师占领太湖城后，又攻占宿松，与第三师汇合，进逼黄梅，第六十八军与日军激战3日后退出黄梅城。9月6日，日军突破田家寨、笔架山阵地，9月9日，日军攻占广济，直接威胁田家镇要塞。9月17日，日军第六师与第三师一部集中兵力南下广济，攻击田家镇，9月28日，日军海军增援部队到达田家镇长江水面，日军第六师与今村支队（日军第六师为攻占田家镇，适应山地进攻需要而组建）在海军支援下，进攻田家镇，29日，攻占田家镇炮台，中国军队被迫退却，田家镇陷落。日军第六师攻占田家镇后，因伤亡惨重，至10月17日才休整补充完毕，其后继续西进，于10月22日占领上巴河，24日晚攻占黄陂，并于25日首先攻进武汉。在长江南岸，日军第11集团军以第二十七、第九、第一



百零六、第一百零一师为主力发动进攻。8 月 24 日，日本第九师攻陷瑞昌，9 月 7 日，日军第九师、波田支队协同海军陆战队强攻马头镇要塞，于 14 日陷落马头镇，其后日军施放毒气，于 24 日攻占富池口，中国军队伤亡惨重。9 月中旬，日军第二十七师从瑞昌向德安推进，至 10 月 5 日，占领箬溪。10 月 27 日，日军第二十七师会同第一百零一、一百零六师攻占德安。11 月 1 日，日军第一百零一师攻占永修。至此，庐山、德安地区的战役才告一段落。

8 月 20 日，集结于合肥地区的日本第 2 集团军下达作战命令，决定分南北两路作战。8 月 27 日，日军第 2 集团军发动进攻，28 日，日军第十师攻占六安，向固始推进，29 日，日军第十三师攻陷霍山，向商城推进。9 月 2 日，日军第十三师攻占叶家集，当夜强渡史河，进攻富金山。9 月 12 日，在伤亡巨大的情况下，日军第十师、第十三师攻陷富金山。9 月 16 日，日军第十六师攻占商城。10 月 25 日，日军第十三师、第十六师占领麻城，然后沿宋埠、黄安（今红安）、河口镇向武汉推进。向固始、潢川、罗山、信阳进攻的北路日军第十师，于 9 月 4 日渡过史河，6 日进攻固始，中国守军第七十一军第一百八十一旅抵抗一天即撤退，固始失陷。9 月 19 日至 20 日，日军相继攻占潢川、光山、罗山等地，逼近信阳。10 月 2 日，在久攻信阳无功的情形下，日军第 2 集团军令第三师从光山出发，策应第十师进攻信阳。10 月 11 日，日军第三师到达信阳北侧，切断了平汉铁路交通线，与此同时，日军第十师冈田支队于 10 月 11 日到达信阳东面，第十师主力到达信阳南面，协同第三师一起三面包围信阳。10 月 12 日，日军在优势炮火和坦克掩护下攻占了信阳，随后沿平汉铁路南下，协同第 11 集团军进攻武汉。

其时，广州已于 10 月 20 日沦陷，粤汉线亦已被日军切断。武汉既陷入日军东、南、北三面包围之中，其战略上的重要地位即已失去。为保存实力以进行长期抗战，国民政府军委会于 10 月 24 日下令放弃武汉。10 月 26 日，日军第六师占领汉口，波田支队占领武昌。10 月 27 日，日军第一百一十六师与第六师占领汉阳。至此，武汉陷落，武汉保卫战宣告结束。

武汉保卫战的失败是中国抗战中的一大挫折，其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和基本原因之外，其主观原因是由于国民党政府推行片面抗战路线以及实施错误的作战方针。但是，武汉保卫战的成绩同样也是显著的。国民党政府在正面战场组织的武汉保卫战，从日军攻占安庆开始到武汉失守为止，历时四个半月，沉重地打击了日寇，极大地消耗了日军的

有生力量，打破了日本妄想迅速攻占武汉以迫使中国政府投降，早日结束战争的计划；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如燎原之火，大片失地得以收复，抗日根据地纷纷建立，日军大量兵力遭受钳制。正是由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和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战场的相互配合，日本才不得不重新调整对华战略，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以主力回师占领区对付中国共产党的游击战争，这就意味着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的彻底破产，中国抗日战争由此从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注释：

①（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86页。

②（日）木户日记研究会：《木户幸一关系文书》，东京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324～326页。

③④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24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2页，第46页，第92页。

⑥蒋纬国总编著：《抗日御侮》第6卷，黎明文化事业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206页。

⑦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4月版，第189页。



日军调整侵略方针　实行“治安肃正”和“囚笼政策”

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保卫战结束，在近 16 个月的战争中，日军虽在中国战场上一路推进，占领了中国大片国土，但随着战区的扩大，战线的延长，使得日本当局欢欣鼓舞之余，更为骑虎难下的境地深感忧虑。特别是长期战争的巨大消耗和急剧扩大的战争规模，严重导致日本“国力穷困”。仅 1937 年 7 月 ~ 1938 年 3 月间，日本政府追加临时军费 74 亿，是 1936 年预算总支出（22.82 亿）的三倍多。①与此同时，日本外贸进出口值大幅下降，民需和经济建设困难犹加，经济危机日益严重。所有这些原因，迫使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考虑以攻占广州和武汉为其战略进攻的终点。抗日战争由此转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当然，这并不是一个日本当局乐于看到的状态。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初，大力鼓吹“闪电战”，企图以“速战速胜”的战略方针，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摧毁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和战争意志。然而近 16 个月的战争非但没有达到其战争目的，反而将自己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彻底破产。就连日本最高军政当局，在“关于攻陷武汉后国民活动的通知”中，也不得不承认：“攻陷汉口不是搞狂欢的问题，而是要宣扬应付新阶段的精神准备。”“汉口之陷落并非事变之终点”，“因此要避免召开使人感到事变结束的战胜庆祝会”②。

在中国战场的尴尬局面同样使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明显激化，迅速分化成“强硬派”和“温和派”两大阵营。所谓的“强硬派”主张以武力为主，“速战速决”征服中国，而所谓的“温和派”主张以政治诱降为主，逐步蚕食、控制最后吞并中国。在此之前，“温和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就认为：“把 4 亿中国人比作埃塞俄比亚人”，这是“犯了大错误”，“撤销对蒋政权的承认会使它陷入极端绝望的境地，它将会拼死地同日本作困兽之斗。

这样，不管我们是否摧毁了它，结果都会使中国长期分裂……即使在长远的将来它也还会是一个消耗帝国力量的无底洞"；"长期战争意味着有灾难性后果"[3]。而此时，日本朝野舆论也普遍认为，战争已经被拖入长期的持续的消耗战之中，单凭武力不可能征服中国。因此，日本政府被迫对其侵华方针作出重大调整，以拔出其陷于中国战争深潭中的泥足。

在政治方面，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于1938年11月3日发表《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强调日本"并无征服中国之心"，号召国民党政权改弦更张，加入"建设新东亚"的事业。声明中说："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这次征战之最后目的，亦在于此。""此种新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希望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的结合。""帝国所希望于中国的，就是分担这种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4]11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了《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进一步提出："日满华三国应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理想之下，作为友好邻邦互相结合、并以形成东亚和平的轴心为共同目标。"[5]12月22日，日本政府又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公开宣布"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声明还宣称："日本不仅尊重中国的主权，而且对中国为完成独立所必要的治外法权的撤销和租界的归还，也愿进一步予以积极的考虑。"[6]当然，声明同时也对蒋介石当局提出了相当的条件，要求其承认"满洲国"并与其建立外交关系；与日方签订日华防共协定；实现经济提携，承认日本臣民在中国内地有居住、营业的自由，特别在华北和内蒙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向日本提供便利。

军事方面，1938年11月，日军陆军部制定了《陆军作战指导纲要》，这份《纲要》指出：

第一：方针确保占据地区，促进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态势，扑灭残余的抗日力量。

第二：一般指导要领

一、确保蒙疆地区的重要部分和华北、华中东北地区的现有占据地区；促进其恢复治安；支援亲日政权日趋巩固和发展。在这些地区，要使担任警备的部队尽可能固定，驻扎密度要高，以便于迅速恢复治安。又，在这些地



区，要对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伪军）给予指导，使之在军的领导下协助维持治安。

二、在武汉地区配一个作战军，使之控制江湖方面的敌主力部队。该作战军应适时对聚集之敌给以反击，挫败其抗战企图。但要避免战局的扩大。

第三：对各方面的作战指导

一、华北方面

要专心确保占据地区并使之安定，特别要首先迅速恢复河北省北部、山东省、山西省北部及蒙疆等重要地区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按需要可在占据地区内，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作战。

二、华中方面

1. 要确保庐州（合肥）、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占据地区的安定，特别要首先恢复上海、南京、杭州间地区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

2. 配置在武汉地区的作战军，要以武汉三镇及九江为根据地，协同海军确保从岳州下游扬子江的交通。大概以安庆、信阳、岳州、南昌间地区为作战地区，粉碎敌人的抗战企图。

三、华南方面

以切断敌之补给为目的，配置最低限度的兵力，以广州、虎门为根据地。大概以惠州、从化、清远、北江、西江间地区为作战地区，粉碎敌人的抗战企图。[7]

根据这一作战纲要，日军自攻占武汉后便开始调整部署。1938 年 11 月，日在华北方面军增设第十二军，又陆续从华中调来第十、第二十七师团，从华南调来第五师团，并从日本国内增派大量兵力编入华北方面军战斗序列。至 1939 年上半年，日军在华北的兵力已达 18 个师团又 14 个旅团，即由武汉陷落前的 30 多万人增加至 60 余万人，约占全部日本侵华兵力的半数以上。为了适应新的战略需要，1939 年 9 月，日军在南京设立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以西尾寿造上将为总司令，前陆相坂垣征四郎中将为参谋长，统一指挥华北、华中、华南的日军。

在经济上，日本陆军省、陆军部 1939 年 3 月 30 日制订的《从战争指导观点出发处理目前各案件的准则》中，明确提出："在华北要进行重要地区的开发工作，在华中要依靠多种措施吸收现存的物资，在华南要获取特种物资。要使现地兵团为了军的生存而保持长期持久的自给态势"。[8]根据这一准则，侵华日军通过就地在占领区内进行"自主的建设"，从而实现长期自

给，以解决其长期战争的物资需要。这即是著名的“以战养战”政策，成为日军调整侵略方针后的一项重要内容。

为了实现上述侵略方针，1938 年 11 月，日本内阁建立了所谓“兴亚院”，由首相任总裁，外相、藏相、陆相、海相任副总裁，统一“处理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事务”。“兴亚院”在北京、张家口、上海、厦门分别设置了四个联络部，以加紧对其占领区域的政治统治、经济榨取和奴化教育，成为贯彻日本新的侵华方针的工具。

通过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日军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进行的一系列的战略方针调整，是将以武力进攻为主的“速战速胜”方针逐渐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战略方针。政治上，日本方面加强了对国民政府的诱降活动，抛出种种促使国民政府对日妥协的诱饵，企图通过挑拨并利用中国内部的各种政治、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和矛盾，迫使国民政府放弃抗日的立场，并与其在反共方面达成共识。军事上，日方的战略部署也由与国民政府对峙的正面战场逐渐向中共在敌后方的根据地转移，视中共为最大之敌人。而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日军在这一阶段的战略性调整中，无论其政策如何改变，其坚持灭亡中国的基本方针是不会动摇的。

在这样一个调整战略方针的大背景下，自 1938 年秋季起，日本军部便下达了准备对华持久作战的计划，并将中日战争的主战场开始北移至华北区域。至 1939 年初，除东北地区以外，日军占领中国领土总面积为 136 万平方公里，其中华北区域包括蒙疆地区即有 97 万平方公里，加上陇海（苏北、豫北 43 县）地区的八万平方公里，华北占领区域达 105 万平方公里。华北区域盛产农产品，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在地理上连接东北与华中，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日本军部为了巩固在华的统治，在武力威慑无法达到目的的情况下，便逐步推行一种屠杀与奴化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对其占领区，加紧扶植和建立伪政权，实行经济压榨和奴化教育；对敌我争夺的游击区，推行所谓“治安肃正”，以军事上的“肃正作战”与政治上的收买汉奸相结合，并加紧经济的掠夺；对中共在敌后的根据地，则疯狂地进行扫荡，屠杀抗日军民，妄图消灭中共和根据地政权。

1939 年 1 月，华北方面军决定进行“治安肃正”，至 1940 年 3 月间共分三期进行。基本方针为：（1）肃正作战：扫荡中共武装，彻底摧毁各根据地；（2）强化治安：在“宣抚”同时，建立县政、县乡自卫组织，建设道路、通信设施，恢复贸易及运输业等。[9]经过对冀中、鲁西、晋东、太行

山脉、晋南、晋北、苏北、鲁南、鲁东、蒙疆等地大规模扫荡作战，日军不仅分散部署兵力，扩大了治安区，占领地也由主要铁路线附近向两侧扩大，冀、鲁及新黄河以东的豫、皖各省及苏北地区，基本被日军控制，国共军队被压缩至山西省境及鲁东地区。这期间“肃正作战”主要对象是“国民党系统的军队，但共产军也成为必须注意的势力”。1939 年 3 月 30 日，敌华北方面军在“治安肃正纲要”中进一步规定，所谓“肃正作战”，“重点专以敌人的游击战术为对象给予完全封锁。因此，以奇袭、快速奔袭作为作战指导的基础。”“然而，敌人尤其是中共军积极地在研究日军的战术，钻日军的空子，巧妙地采取游击战术，绞尽脑汁利用我方粗心大意造成的机会。”同时，日军在“治安地区和兵力相比已扩大到最大限度，各部队的分散已达顶点，根本的教育训练已遭受到几乎最大牺牲的状态，”因此“就不能轻视中国方面武装团体的利用价值”。[10]根据“治安肃正纲要”，日军开始最大限度地整备自卫团、县警备队、铁道警务机关、水路警备队、汽车路警备队、重要工厂警备队、事业场所警备队、治安军。总之，所谓“治安肃正”，就是敌人为了支撑长期侵略战争，以保持和扩大其占领区域为目标而采取的一种军事征服与政治镇压相结合的侵略方针。

为了达到其“肃正作战”的目的，1939 年 9 月，日军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指示实行由敌华北方面军新任司令官多田骏中将提出的“囚笼政策”。多田骏曾任华北驻屯军司令，是日本侵华日军中有名的“中国通”，他上任伊始便提出“囚笼政策”以对付八路军，具体办法就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然后以封锁沟、封锁墙为辅助，建立起联系紧密的交通网，以此向中共抗日根据地形成网状的“囚笼”，逐渐实施压缩包围，以此束缚八路军、新四军的机动性，限制游击队的活动范围，便于日军采取奇袭手段进攻八路军，然后采取“分区扫荡、分散装置、灵活进剿”的战术，同“清乡”与“蚕食”相结合，达到摧毁敌后抗日根据地，消灭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的目的。以冀中平原为例，至 1941 年底，日军在冀中 5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将 8000 余个村庄以点、碉、沟、路、墙筑成了 2670 个网眼，据点周围碉堡成群，铁路、公路沿线岗楼密布，点、碉、路、沟互相连接，密如蛛网，把冀中平原根据地分割成为若干不相联结的小块，分区逐块建立了“准治安区”和“治安区”，使我冀中根据地缩小了近三分之二，冀中平原竟陷入“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的恐怖世界。

在日军密如蛛网的封锁下，中共领导的各根据地被分割成大小不等、支

离破碎的块状，使华北各根据地财政经济日益困难，部队伤亡十分严重，给八路军的生存带来了严重的困难。

注释：

①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解放军出版社，1991 年版，第 408 页。

②⑦⑧⑨⑩（日）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 2 卷第 2 分册，《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35 页，第 68 ~ 70 页，第 63 页，第 109 ~ 110 页，第 154 ~ 156 页。

③（美）约翰·亨·博伊尔：《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上册，中华书局，1978 年版，第 97 页、第 106 页

④⑤⑥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 ~ 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 278 ~ 279 页，第 281 页，第 288 ~ 289 页。



发展和巩固晋察冀边区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敌后创立之后，经过一年来的战斗，有了很大发展，成为华北敌后战场上一座坚强的抗日堡垒。然而，日本侵略者开始推进“治安肃正”的计划后，在华北“为了防共，并应造成军事上及政治上的特殊地位”，“方面军以确保安定为一切工作的根本，以肃正作战为指导作战的准绳。”[①]根据这个指导思想，日军在军事方面，以“分割”、“封锁”、“扫荡”三者相结合，采用“分散配置、分区扫荡、灵活进剿的牛刀子战术”，向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轮番扫荡，企图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控制平原、封锁山地，尔后向山地进攻，以各个击破抗日部队，摧毁抗日根据地。日军对于游击战的封锁和打击，使晋察冀边区的有生力量遭到严重破坏，根据地也逐渐缩小，一些重要的城镇在日军的疯狂围攻下被逐渐蚕食，使晋察冀边区陷入了日军的四面包围之中。

除此之外，由于日本侵略政策的调整以及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的迅猛发展，使本来就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摇摆不定的蒋介石集团开始向反共倾斜。1938 年 10 月，蒋介石在湖南长沙和南岳召开了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派 60 个师进入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还决定成立战地党政委员会，负责指导敌占区的游击战争，并由各省政府主席兼游击队司令，对敌后游击队进行整理，开始在抗日的口号下公开限制共产党和革命力量在敌后的发展。由此可见，在日军的围攻和国民党方面的限制之下，晋察冀边区的发展可谓困难重重。

鉴于此种情况，1938 年 9 月 29 日 ~ 11 月 6 日，中共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10 月 5 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在《致晋察冀边区电》中指出；“边区党委所执行的坚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并在这个方针下，依靠全党全军的努力，已经创造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这些都在华北抗战中已经和将要尽其极重大的战

略作用，而且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和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希望你们继续坚持统一战线的方针，动员一切力量，担负灵活的游击战与运动战，进行坚壁清野，准备长期战斗，镇压汉奸日探，粉碎敌人的进攻，……长久保持晋察冀边区是最进步的模范的抗日根据地，作为将来进攻日寇最好的前进阵地。”[②]1938 年 10 月 12 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王稼祥、刘少奇发出的《关于坚持华北持久抗战的指示》中指出：估计华北将转向严重与艰苦的战斗环境，敌之进攻晋察冀边区．不过是敌人全面扫荡华北毒计的开始。11 月 6 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政治决议中指出：武汉沦陷后，中日战争正在进入相持阶段，党的任务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发展敌后方的游击战争，建立和巩固更多的抗日根据地，缩小敌之占领区”。[③]在这次会议中，中共中央不仅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及其经验给予了全面的肯定与评价，而且针对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这一新变化，对晋察冀边区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新的指示。

根据六届六中全会的指示，为了完善晋察冀边区的组织建设，更好的巩固和发展晋察冀边区，中共中央对于加强战区和敌后工作的统一领导，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早在 1938 年 11 月，中央政治局即发出《关于北方局及分局委员的通知》。通知中决定：成立晋察冀分局，以聂荣臻、彭真、关向应、程子华为北方局晋家冀分局委员，彭真兼分局书记。发展至 1939 年 1 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晋察冀分局，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北方分局代表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对晋察冀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实行全面领导。以聂荣臻、彭真、关向应、程子华为委员，彭真任书记，刘仁为组织部长；李常青任宣传工作委员会书记，肖明为副书记；同年夏，姚依林任分局秘书长。随后又成立社会部，许建国（杜理卿）任部长，陆平任分局青委书记。此时，分局下辖晋察冀区、冀中区、冀热察区三个区党委。晋察冀区党委书记由刘澜涛担任。冀中区党委书记为黄敬。冀热察区党委书记为马辉之，领导平西、平北与冀东党的工作，以及北平、天津、唐山等敌占区大城市党的工作。[④]北方分局的成立，统一和加强了晋察冀边区党、政、军与群众工作的领导，使晋察冀、冀中；冀热察三个战略区之间的斗争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为巩固和发展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北方分局成立后，晋察冀边区于 1939 年 1 月在平山县蛟潭庄召开了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会议指出：抗日战争处于第一阶段至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中，敌人已开始扫荡华北，首先向边区开刀。目前，边区党的任务是努

力巩固根据地，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进攻。为此，要巩固边区党的组织，加强部队军事整训，深入开展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财政经济建设，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迎接更加艰苦复杂的敌后斗争。⑤而关于努力巩固根据地和广泛发展游击战争，会议指出，要根据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的战略指导方针，进一步树立坚持持久的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并要正确认识和对待巩固与发展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1938年5月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这种巩固，是支持长期战争所必需，也是向前发展所必需的，不巩固就不能有力地向前发展。只知道发展忘记了巩固的游击战争，经不起敌人的进攻，结果不但丧失了发展，且有危及根据地本身之虞。正确的方针是巩固地向前发展，这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好办法。"⑥

为了完成"巩固华北"的战略任务，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决定，八路军第一百二十师主力挺进冀中，协同当地军民更加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发展人民武装力量，通过对日军的军事打击，以巩固和扩大晋察冀根据地。

1938年11月24日，毛泽东、王稼祥电示八路军总部、晋察冀军区、第一百二十师：估计今后华北形势的进展，冀中区的中心任务是巩固现有部队，依靠群众力量，坚持长期游击战争。为完成以上任务，决定派程子华去冀中任第三纵队政治委员，贺龙、关向应率一百二十师一部去冀中，争取扩大该师。贺龙、关向应到冀中后，第三纵队则归其指挥，惟建制系统仍属晋察冀军区管辖⑦。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程子华从延安出发经晋察冀军区于1939年1月8日到达冀中，就任八路军第三纵队政治委员。12月2日，朱德、彭德怀电令贺龙、关向应率第一百二十师主力挺进冀中，统一领导冀中区各部队。于是，贺龙、关向应率一百二十师直属队、第三百五十八旅七百一十六团、独立第一支队，于12月22日从岗县出发挺进冀中。第一百二十师主力冒着严寒风雪，冲过日军的数道封锁线，于1939年1月25日到达河北省高阳县惠伯口地区，与冀中军区领导机关会合。一百二十师主力东进后，以留下的第七百一十四团、警备第六团等部队为基础，组成新三百五十八旅，彭绍辉任旅长，罗贵波任政治委员，坚持晋西北的抗日斗争。

1939年1月25日，贺龙、关向应召集会议，向冀中区主要领导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共同确定了当前军事斗争方针，决定一百二十师以主力部队担负主要战斗任务，同时组成新的支队，与冀中各军分区部队相配合，深入

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作战。为了统一领导冀中的斗争，便于协同作战，2 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决定，第一百二十师和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的领导人组成军政委员会和冀中区作战总指挥部。军政委员会由贺龙、关向应、黄敬、吕正操、程子华为委员，贺龙任书记。作战总指挥部由贺龙、吕正操任正、副指挥，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在冀中区作战总指挥部的决策与领导之下，一百二十师主力与冀中部队协同作战，打退了日军的多次围攻与扫荡，粉碎了日军企图蚕食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企图，消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鼓舞了军民抗战的决心，并为晋察冀边区赢得了一个稳定的环境，对于发展和巩固根据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晋察冀边区，除了冀中地区之外，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北方局也十分重视发展冀热察地区的游击战争，以及平西、平北和冀东抗日根据地的开辟。1938 年 11 月 25 日，毛泽东、王稼祥、杨尚昆致电朱德、彭德怀、聂荣臻：估计冀热察区的军事政治环境，有许多有利条件是可能坚持游击战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但亦有许多困难。因此决定成立第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派萧克前往工作，并成立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及地方党政工作。11 月 26 日，八路军总部任命萧克为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在晋察冀军区领导冀热察挺进军，担负继续开辟平西、平北和冀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1939 年 2 月 7 日，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以第四纵队为基础，在平西的野三坡正式成立，由萧克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程世才任参谋长，伍晋南任政治部主任。根据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的决定和晋察冀军区的部署，1939 年 3 月，冀热察区党委在平西斋堂召开了全区党员代表会议，会议确定了“巩固平西抗日根据地，开展冀热察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分析了冀东抗日大暴动后的形势，决定在青纱帐期间，挺进军挺进冀东，发动第二次武装暴动，重新打开冀东抗战局面，从而实现建立冀东抗日的游击根据地的战略计划。

根据这一战略计划，从 1939 年 2 月到 6 月，借日军发动扫荡之际，挺进军选择有利地形，诱敌深入，经 50 多次战斗，毙伤敌伪军 2 000 余人，终将敌人赶出平西根据地。到 1939 年，平西根据地已发展至东北靠平绥路，北迄张家口，南接紫荆关的广大山区。在反扫荡胜利的基础上，挺进军越过平绥线，开辟了平北游击区，在明十三陵一带展开了游击战争。

在冀东地区，由于日军统治严密，我军民斗争亦十分困难。冀东地区抗日游击队在日军大规模扫荡的严重形势下，化整为零，分散坚持，在有利条件下，不断打击日军。自 1938 年至 1940 年，我军进行了 300 余次战斗，计



毙、伤敌人1 000余名。在遵化、丰润、滦县、蓟县、平谷、密云及热南的几个县，开辟了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先后建立了5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

晋察冀根据地军民反扫荡作战的胜利，使得晋察冀边区得到不断巩固发展，到1940年7月，边区政府已辖有两个政治主任公署，九个专员公署，75个县政权，较之1938年1月边区政府成立时，人口增加了200万，抗日的县政权增加了36个。到1940年底，晋察冀边区已发展到同蒲路以东，正太、德石铁路以北，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拥有北岳、冀中、冀察热三个行政区、1 500余万人口的华北最大的抗日根据地。而其对于抗战之影响，正如朱德所言："晋察冀边区的创造、巩固与发展，对于我国的抗战，有着重大而深切的意义：首先它给全国军民以坚持敌后抗战之信心与模范的榜样，同时它给日寇以无穷的打击与深痛的隐忧；再有，它给汉奸伪组织予以无情的扑灭与摧毁，使丧心病狂之败类不无顾忌，使敌后伪政权难以组成，及无法巩固其统治；还有，它也给全世界先进人士以正确的启示，在国际人士面前宣告：中华民族是不可辱的，因而增强了我国之外援。凡此种种，它起着在今天配合全国军民之英勇战斗，去停止敌之进攻；在将来配合全国主力之出击，成为反攻敌人之最前线有力阵地之伟大作用。"⑧

注释：

①（日）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7页。

②谢忠厚，肖银成：《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改革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页。

③《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003页。

④谢忠厚，肖银成：《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改革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页。

⑤《北方分局党代大会的成功与实现大会的决议而斗争》，载《战线》第14期。

⑥《抗日游击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26页。

⑦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综述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33~234页。

⑧聂荣臻：《模范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八路军军政杂志社，1939年5月1日版，第6页。

冀中军区三次反扫荡，日本“名将之花凋谢”

日本华北方面军在“治安肃正”计划制定后，在军事方面确定了以“分割”、“封锁”、“扫荡”三者相结合的战略战术向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轮番扫荡。从1938年11月到1940年底，华北日军出动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达到109次，使用兵力在50万以上，给根据地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和破坏。因此，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扫荡和反扫荡便逐渐成为日军与中共在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斗争的中心内容，而反扫荡则成为抗日游击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

在晋察冀根据地，日军首先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冀中区。冀中区地处平原，面积广阔，河流纵横，交通便利。它介于平汉、津浦、石德铁路之间，西邻太行山，东临渤海之滨，南与冀南接壤，北连冀东，并威胁着北平、天津、石家庄和保定等大城市及日军所掌握的几条铁路线，地理位置与战略位置都极为重要。

1939年10月初，日军向晋察冀根据地腹地发起了疯狂的冬季大扫荡。在冀中区，日军从10月8日开始至12月底，连续制造了三次分区扫荡，妄图消灭军区部队主力，摧毁根据地。第一次是从10月8日~23日，日军出动6 000余人扫荡大清河北地区；第二次是从12月3日~7日，日军以1 500兵力扫荡正定、新乐、无极、深泽地区；第三次从12月16日开始到12月底，日军使用1.3万余人，分三个区域扫荡：一个是滏阳河左岸以西以北和滹沱河两岸地区，包括深县、武强、饶阳、安平、蠡县、肃宁、束鹿等县；另一个区域是滏阳河、子牙河右岸以东以南地区，包括河间、沧县、献县、交河、阜城、武邑、衡水、景县等；再一个区域是扫荡大清河以北地区，包括新城、霸县、雄县、水清、固安、安次等县。[1]

在前几次的反扫荡斗争中，我军已充分积累了平原游击战的斗争经验。

冀中平原日伪据点稠密，铁路公路纵横交错，十分利于日军的突袭和合击。因此，我军在进行反扫荡的斗争中，基本方针就是避免在敌人的分进合击点上、扫荡面上和包围圈内作战，利用我军组织精干、行动灵活的优势，将主力部队调到点、面、圈以外，突击敌人的侧背或运输线，同时以伏击和袭击疲惫敌人。在第一次分区反扫荡中，冀中军区部队以灵活的游击战术，先后在新城等地进行七次战斗，给日伪军以大量杀伤，日伪军被迫于20日转入"驻剿"。第二次日伪军由石家庄至定县一线出动，向正定、新乐、无极、深泽四县县城之间地区进行扫荡，企图寻找冀中军区主力作战。冀中军民积极袭击平汉线之敌，不断以小部队从侧后袭击，并炸毁铁路桥梁和列车等，经五天战斗，终将日军击退，有力配合了平汉路西的反扫荡战役。第三次反扫荡战斗中，冀中军区以一部兵力牵制和迷惑日伪军，主力适时跳出合击圈，在外线从侧后打击日伪军，袭击其守备薄弱的据点和交通线，多次取得作战的胜利。16日，第七支队第二十一团在深县、武强间设伏，毙伤日伪军60余人。22日下午，第六军分区一部于阜城一带伏击日伪军，激战六小时，毙伤其百余人。同日，第十军分区第三十二团一部乘平津铁路沿线敌兵力空虚之机，猛烈袭击廊坊车站，不顾日伪军施放的毒气，英勇作战，全歼守军。25日，日伪军600余人进攻霸县地区，第三十二团一部连续组织反击，毙伤日伪军200余人。特别是27日在雄县的神堂，冀中军区第二十七团900余人与敌3 000余人激战八小时，毙伤日伪军400余人，击落飞机一架，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至12月底，冀中区冬季反扫荡斗争，共与敌作战60余次，毙伤日伪军7 500余名，挫败了日军大规模的冬季大扫荡。

日军本次在晋察冀边区的大扫荡计划，在冀中区展开的同时，也在平汉路西基本区疯狂地推进着。1939年9月下旬，日军1 500余人由灵寿北进，企图奔袭晋察冀边区的后方重镇陈庄。由冀中西返途中的一百二十师主力在晋察冀边区部队配合下，集中六个团的兵力，利用山区有利地形和群众条件数次伏击、阻击日军，在运动中歼灭了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所部1 200余人。10月25日～12月8日，日军纠集两万余兵力，对北岳区进行冬季大扫荡。11月3日，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在涞源县雁宿崖西北设伏围击日军，经过一天激烈的战斗，我军全歼日军500余人。雁宿崖歼灭战后，有着"山地战专家"之称的"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长官兼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恼羞成怒，于11月4日亲率日军1 500余人由涞源

急进雁宿崖进行报复性扫荡，企图寻找我军区主力进行决战。日军一路行进，在雁宿崖扑空后追击至据涞源城东南20公里的黄土岭村。11月7日，晋察冀边区第一军分区在一百二十师特务团的配合下，将阿部规秀重重包围，日军伤亡惨重。至8日战斗结束，日军在此次扫荡中计损失900余人，阿部规秀中将也被炮火击中，当日毙命。这是抗战以来，八路军击毙的日军最高级别的指挥官。北平与东京的报纸都登载了这一消息，一时间沸沸扬扬。晋察冀边区特为击毙阿部规秀的炮兵部队颁发嘉奖令，予以表彰。此次战斗的胜利，使全国上下均为之振奋，纷纷来电祝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也致电八路军朱德总司令予以嘉奖。日军方面则是一片悲鸣之声，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多田骏在给阿部规秀的追悼挽联上写道："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我军在黄土岭战斗的胜利，在日军内部引起了极大的恐慌，沉重地打击了日军在华进攻的嚣张气焰，终结了其在晋察冀边区的第二次大扫荡。

日本华北方面军面对屡次扫荡的失败心有不甘，一直伺机准备疯狂的打击报复。1940年春，日军华北方面军以第一百一十、第二十七师、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及伪军各一部，共计3.7万余人，采取军事进攻、政治欺骗、经济破坏等手段，再次对冀中地区展开了"全面扫荡"，企图消灭或驱逐该地区八路军部队，摧毁抗日根据地，实现"由点线扩大到面的占领"。

2月21日，驻定县、安国、高阳等地日军千余人集结于安国城，组成步兵、骑兵、炮兵混合的轻装挺进扫荡队，对滹沱河两岸地区进行"挺进扫荡"，为即将发动的春季大扫荡作战役性侦察。紧接着，3月17日，日军以第一百一十师为主力，分别由高阳、蠡县、安平、武强、河间出动，向滹沱河以北、潴龙河以东、子牙河以西地区实行"分区扫荡"。在冀中区军民的配合打击下，日军的"挺进扫荡"和"分区扫荡"均遭到粉碎。

4月上旬，日军三万余人、伪军6 000余人开赴冀中，连续进行了50天的"全面扫荡"。这次"全面扫荡"是在冀中四个地区同时进行的。一、在大清河北地区，日军出动3 000余人，由平汉铁路、津浦铁路分别进至固安、雄县、霸县、永清之间地区实行合击，23日，北进扫荡涿县东部平景一带，28日又南返加修公路、增设据点。二、在唐河及潴龙河流域，完县、蠡县、安国等县的日伪军1 200余兵力配合各县守备队向保定、定县地区第

九军分区部队连续分路合击。此后，日伪军在潴龙河两岸地区反复“搜剿”。三、在子牙河流域，日伪分成三路进行扫荡。一路以景河为中心，封锁子牙河口；一路以窝北为中心，向四周扫荡；一路以商家林东部及任丘、河间之间地区为扫荡地域。四、在沧石路沿线，日伪军驻沧石路沿线东长寿、藁城、晋县、安平等地千余人，对晋县、深泽、深县之间地区进行合击，下旬，东返扫荡深泽、安平、饶阳、武强地区，配合子牙河流域的作战。

针对敌人扫荡特点，我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治委员程子华指挥五个军分区、15 个主力团和回民支队以及区县武装，在人民群众配合下，采取分散活动，避敌锋芒，适时跳出合击圈、相机集中歼敌，以及坚壁清野，发动群众锄奸等策略，从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展开反扫荡斗争。此外，冀中区军民还积极开展了交通破袭战，人民群众在部队的掩护下，积极参加交通战。据不完全统计，仅在 4 月 10 日至 5 月底，冀中人民发动的大型破路就有 20 多次，破坏路基 200 多公里。[②]交通战的展开，阻止了敌人的运输，对反扫荡战役的胜利起了一定的作用。

5 月 28 日后，各路日伪军陆续撤回原据点。至 30 日，冀中军区部队的春季反扫荡作战结束。在这次反扫荡中，冀中军区部队共与敌作战 216 次，毙伤日军 3 000 余人，伪军 400 余人，俘日军三人、伪军 60 余人，缴获轻重机枪 10 挺，步枪 800 余支，毁敌汽车 14 辆，飞机一架，[③]先后组织 10 万群众破路 20 余次，破坏公路 200 余公里，彻底粉碎了日军的春季扫荡。

1942 年春，日军为实现其“确保华北，首先确保平原”的作战方针，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之冀中区进行全面蚕食，沿交通沿线和抗日根据地边缘修建据点、碉堡 1125 处，并逐步“向心推进”，切断冀中区与北岳、平西、冀东各区的联系，使冀中区陷于孤立，根据地面积大为缩小。4 月初，日军华北方面军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扫荡部署。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调集其直辖部队四十一师团和独立第九旅团的主力，以及一百一十师团、二十六师团、独立第七旅团各一部，共五万余人（不包括伪治安军和警备队在内），另有二十七师团和第 29 独立飞行队配合。从 1942 年 5 月 1 日到 7 月 1 日，对冀中进行“十面出击”、“铁壁合围”大扫荡，妄图围歼冀中我军，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

5月1日，日军开始为期10天的第一阶段扫荡。敌以第一百一十师团、第二十六师团、独立混成第七，九旅团一部及骑兵第十三联队分别向潴龙河、滹沱河以北地区，石德铁路以南地区扫荡。随后，从边缘地区逐步增加据点，向冀中的深（县）、武（强），饶（阳），安（平）等县中心区压缩，以求聚歼冀中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针对敌人的压缩、封锁和合围，冀中军区除留部分基干团配合地方部队，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外，主力转向外线配合县、区游击队袭击、伏击敌之据点和交通线，策应内线部队的反扫荡斗争。10日，冀中警备旅第一团第二营，在深县护驾池遭到敌4 000余人的围攻。虽经顽强抗击，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但由于敌已完成对深，武、饶、安。献（县）中心区的包围圈，八路军未能突破敌之压缩包围，部队大部被迫退向根据地的中心区，陷入被动局面。

第二阶段从5月11日开始至6月初结束。日军将其部队分为“封锁部队”与“扫荡部队”，形成所谓“铁环阵”，对冀中中心区实行分割、清剿。敌人每次合围，都是在飞机配合下，采取多梯队、多层次、大纵深的部署，进行“拉网”，逐步搜索推进，企图迫使八路军主力部队难以机动和转移。在日军的“拉网扫荡”中，冀中领导机关仍然坚持在中心区指挥战斗，主力部队大部突围至滹沱河以北地区。坚持内线斗争的部队，化整为零，以排、连为单位与民兵、群众相结合，开展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等多种作战方式，顽强地同敌人进行斗争。

第三阶段，自6月初开始到月底结束。这一阶段，冀中根据地中心区已被日军控制，转入全面清剿。根据冀中区斗争形势的变化，八路军总部曾于5月中旬发出指示：为了长期坚持冀中，某些地区要改变斗争方式，减少损失，一部分主力部队，与其被迫撤退，不如先机转移山区。[④]冀中区党委和军区依照上级指示，决定只留部分基干团与民兵一道坚持反清剿斗争，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均转移到外线邻区。第十七、十八和第二十九团先后由无极以北和定县以南地区冲破敌之重围，转至北岳区。8日夜，第二十二团和警备旅第十团等部亦向外线突围。12日，冀中领导机关和军区率第二十七团和第二十八团两个营从中心区转至冀南的南宫、威县之间的掌史村，被敌伪军1 300余人包围，该部依托临时构筑的工事与敌血战，共毙伤敌伪军300余人，于当夜突围成功，转入晋冀鲁豫根据地。



冀中区党委、冀中行署和冀中军区及其主力部队转移后，平原上的抗日战火并没有熄灭。留在冀中的地方武装、游击队和广大群众，仍坚持抗战在极端残酷的斗争环境中，逐步成功地转变了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他们广泛的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使侵略者无安宁之日，并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巧妙地应付敌人，掌握其动向，掩护游击队和抗日群众的活动，为冀中区的重新恢复创造了条件。[⑤]

注释：

①②③谢忠厚，肖银成：《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改革出版社，1992年版，第148页。

④⑤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8月版，第424页，第426页。

晋冀鲁豫根据地

晋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是按照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以八路军一百二十九师为主创建的。首先，以太行山脉为依托，创建了包括太行区、太岳区在内的晋冀豫区；然后，扩展到河北南部，建立了冀南区，并开辟了包括冀南、冀鲁豫边界地区在内的冀鲁豫区。因此晋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实际上包括晋冀豫和冀鲁豫两个战略区。晋冀鲁豫边区根据地，横跨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四省。西有太行山、东有泰山两大山脉为依托，中间为冀鲁豫大平原。位于德石、正太、同蒲、津浦铁路之间，为华北与中原、华中联结的战略要地。

1937 年 10 月下旬至 11 月上旬，为阻击由石家庄沿正太路西进之敌，一百二十九师三百八十六旅一部及师主力相继进至正太路南侧，协同一百一十五师积极作战，连续取得多次胜利。在此同时，部队即与当地党组织建立联系，派遣游击支队开展游击战争。11 月中旬，一百二十九师遵照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逐渐向晋东南实行战略展开，开始了以主力部队创建根据地的工作。

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论述根据地建立过程时指出："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是要有一个抗日武装部队，并使用这个部队去战胜敌人，发动群众"。[①]根据地的问题，"首先就是武装部队的问题"。一百二十九师及第 18 集团军总部进入晋东南地区以后，一面令各团以营或连为单位，进至平汉路、正太路沿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一面抽调大批干部和一些连队，分散到太行山的广大地区发动群众。于是，这些地区群众性的抗战活动开始发动起来，创建根据地的工作初步展开。1938 年 1 月 18 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邓小平接任一百二十九师政治委员。邓小平到职后即于 2 月 5 日、6 日在山西省辽县召开该师团以上干部会议，部署实行战略展开、开展游击战争和开辟根据地的工作。[②]会后，奉邓小平和一百二十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之命，一百二十九师 368 旅补充团南



下，协同赵（基梅）涂（锡道）支队开辟太行山南部地区及道清铁路沿线工作。2月9日，一百二十九师教导团一部组成了一百二十九师游击支队，开赴定和公路以东、正太铁路以南、平汉铁路石家庄至内邱役以西的冀察交界地区活动。2月10日，一百二十九师368旅七百七十一团和教导团各一部组成先遣支队，活动地域为辽县以东，平汉路邢台、磁县段以西及漳河以北的冀豫交界地区。2月17日，七百七十一团和教导团各一部组成一百二十九师独立游击支队，前往白晋公路以东，漳河以南、平汉路以西的太南地区活动。据统计，从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前后，到1938年4月，邓小平和刘伯承、徐向前有步骤地分遣了一百二十九师2/3的兵力，到太行、太岳、冀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

1938年2月，晋冀豫省委在辽县召开活动分子会议。中共北方局驻晋冀豫代表彭真提出尽快创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和发展党的组织的任务。3月中旬，邓小平等一百二十九师首长与李雪峰、彭涛等，召集开辟较早的晋冀豫区的辽县、和顺、昔阳、平定、井陉、元氏、赞皇、临城、内邱、邢台等10个县的区委以上干部会议，讨论和研究如何尽快创建抗日根据地，推进各项工作的开展。邓小平还与北方局代表彭真等人，帮助、指导冀豫晋省委恢复和建设了中共晋冀边特委、冀豫边特委、晋东南特委、晋豫边特委和太岳特委。③到1938年6月，晋冀豫地区党员即由当年2月的千余人发展到一万人，大大加强了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奠定了创建根据地的组织基础。

1938年2月，山西三万日军分别沿平汉、道清、同蒲等铁路线向晋南、晋西发动进攻。为了有力地配合正面战场作战，钳制向晋南进攻的日军，一百二十九师奉18集团军总部之命向正太路出击。2月22日，一百二十九师368旅在井陉、旧关间的长生口设伏，歼灭井隆出援旧关之敌130余人，并乘胜攻入井隆。长生口战斗后，第一百二十九师为打击和削弱侵入晋东南及占领长治的敌人，策应晋西一百一十五师主力和一百二十师作战，以牵制日军向黄河防线的进攻，于3月回师晋东南，在邯长公路以北集结，待机歼敌。3月16日，一百二十九师一部袭击黎城，主力于黎城至潞城间的神头岭设伏，歼灭潞城出援之敌千余人。同月底，一百二十九师在涉县响堂铺地区设伏，歼敌170余人。这便是抗战初期华北敌后广为人知的八路军三战三捷。

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伏击战的胜利，使日军深感后方的严重威胁，于是决心驱逐和消灭晋东南中国军队。1938年4月初，日军以第一百零八

师团为主力，纠集十六、第二十、第一百零九师团及酒井旅团各一部，共三万余人，分九路向晋东南分进合击。[④]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指挥第二战区东路军，奋起展开反围攻斗争。4 月 16 日，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指挥一百二十九师主力和一百一十五师三百四十四旅，在武乡乐村一带，以优势兵力截击来犯之敌一路，歼灭敌第一百零八师团第一百一十七联队 2 200 余人。[⑤]此后，各路敌军纷纷撤退，东路军奋勇追击，收复晋东南 18 座县城，将敌人赶出晋东南。4 月下旬，晋冀豫军区正式成立。以粉碎敌人九路进攻和晋冀豫军区成立为标志，"形成了晋东南根据地的局面"。[⑥]

1938 年 4 月 21 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致电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指出："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面深入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的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也是可能的"。应即在河北"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在收复的地区应立即建立政府"。[⑦]邓小平和刘伯承、徐向前当即研究决定由徐向前率领一百二十九师三百八十五旅七百六十九团、一百一十五师三百四十四旅 689 团和一百一十五师第五支队，东进冀南，并指挥在此之前到达冀南的一百二十九师挺进支队、骑兵团、东进纵队等部，发展冀南平原游击战争。在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的领导下，冀南平原的抗日游击战争发展很快。到 1938 年 7 月初，中共党组织和一百二十九师东进部队，收编组织了数万武装，建立了 30 多个县抗日政权，成立了冀南军区和半政权性质的冀南军政委员会。1938 年 8 月，冀南 50 余县的军政民代表齐集南宫，选举产生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全区的政权初步归于统一。到 1938 年 9 月，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县份已达 51 个。同时，又成立了冀南的工、农、妇女抗日救国会，统一了全区群众团体的领导机构。至此，冀南平原抗战的局面逐步打开，以南宫为中心，西跨平汉铁路，东抵津蒲铁路，北至沧石公路，南跨漳河的冀南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

在指导冀南根据地军民斗争的同时，1939 年 1 月中旬，邓小平自冀南到达鲁西北，代表北方局整顿鲁西北党组织。撤销了鲁西、泰西、鲁西北三个特委，将三个特委合并，成立鲁西区党委，加强了党对鲁西北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为继续开展鲁西北的抗日斗争奠定了良好基础。以后该地成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组成部分。

1938 年 1 月，先到冀南的挺进队由冀南向津浦路推进，得到鲁西北地方党组织的帮助，发展为津南支队；后与津南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抗日义勇军



第三十一支队会合。秋后，肖华等率部进入冀鲁边地区，统一了指挥，建立了东临渤海、西至津浦路、北接津沽、南滨黄河旧道的冀鲁边抗日游击区。在冀鲁豫三省交界地区，地方党组织具备一定的基础，创立了民兵第二路第四支队。1938 年夏，刘伯承率三百八十六旅一部与一百一十五师三百四十四旅，依托太行山，出击平汉路南段、道清路西段。8 月下旬，一百二十九师开辟了漳河以南地区，之后继续南进，至 9 月下旬，基本肃清了平汉路以东、漳河以南、卫河以西近百里的土匪和伪军，建立了安阳、内黄、汤阴三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组织起三支游击队，奠定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发展的基础。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对我敌后根据地的迅猛发展更加恐慌，不断增加周围的兵力配置。特别是对于晋冀鲁豫周边，日军的扫荡尤为频繁和残酷。在 1939、1940 年两年中，敌人对这个地区使用兵力万人以上的大规模进攻达 10 次之多，[8]其进攻的重点便是冀南和晋东南。

冀南是日军为实施其“先控制平原、后进攻山地”的方针所选择的第一个目标和重点。日军在 1938 年 11 月 15 日至 30 日，就以 3 000 余人向冀南进行了第一次扫荡，后采取稳步推进战术，向我军不断压缩，每占领一城镇要点后，即留置守备部队，修筑工事，建立伪军和伪政权，并大肆烧杀。到 2 月 9 日，日军已经占据了冀南中心区的各个县城。但我军一百二十九师已将主力分为几个集团，结合地方部队分区活动，寻机歼敌，并巧妙运用兵力，打了一个漂亮的香城固歼灭战。日军寻歼我军主力的企图落空，却遭到我军打击，于是在占领所有县城以后，分区反复进行扫荡，大肆烧杀，使我军在冀南平原面临的斗争环境日趋艰苦。为了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冀中军民发挥聪明才智，齐心协力挖掘无数条纵横交错、村村相通的道沟，既削减了敌人的机械作战能力，又可作为我军民的隐蔽掩体来阻击敌人，初步改变了平原的作战地形，使我军能灵活机动地开展游击战争，给予日军多次打击。

1939 年 7 月至 9 月，敌人集中约 13 万人的兵力，对晋东南根据地举行了第二次“九路围攻”。事先，日军作了周密的部署，采取谨慎的方针，决定以南、北两正面为主攻战线，东西两侧为策应，逐步向晋东南根据地的中心腹地压缩推进。从 7 月初开始，日军以优势兵力沿铁路、公路交通线推进，相继攻占我晋东南 20 余县县城。在对根据地的争夺战中，我军与日方激战逾月，歼敌无数，粉碎了日军企图消灭我军主力和对晋东南根据地的扫荡计划。但经过这次战役后，日军打通了邯长公路，并开始修筑白晋铁路，

将晋东南根据地分割为太行、太岳两区，通过“囚笼政策”对我军根据地进行封锁打击。为了打退日军的疯狂扫荡，我根据地军民在斗争中不断摸索，创造出交通破袭战，通过破坏日军的铁路、公路交通，配合伏击、阻击战斗，对日军的“囚笼政策”进行拖延或破坏，巩固了我军的敌后根据地。

经过两年的作战，我根据地的抗日军民不仅打破了日军频繁残酷的扫荡，而且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1940 年 4 月，成立了冀鲁豫军区。6 月，建立了冀南军区、太行军区和太岳军区。1940 年 4 月 11 日 ~26 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在黎城召开太行、太岳、冀南地区的高级干部会议，正式宣布成立太行军政委员会，以邓小平为书记，统一领导太行、太岳、冀南三区。[⑨]8 月 1 日，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以杨秀峰为主任，作为过渡性质的全区统一政权组织。至此，晋冀豫根据地正式形成。1941 年 3 月 18 日，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决定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提议，邀请党政军各界组边区临时参议会、筹委会，在管辖范围内进行选举议员的活动。同年 7 月 7 日，晋冀边区临时参议会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桐峪镇开幕，参加会议的包括冀南、太行、太岳和冀鲁豫四个地区的参议员。临参会选举 15 位委员组成边区政府。[⑩]7 月 9 日，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建议，会议同意将鲁西 33 个县划为本区，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改名为晋冀豫边区参议会，成为边区的最高权力机关。[⑪]

至此，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已发展到西起同浦路，东至津浦路，南临黄河，北抵石太、石德路的广大地区，拥有 10 万部队和 2 000 万人口。这一重要根据地的开辟，对于坚持华北山地与平原敌后游击战争，发展人民抗日力量，控制华北及中原的战略要冲，具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它在军事上直接威胁着侵占华北和华中地区的日军，成为我军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依托；以其有利的地理形势，牵制和打击了华北日军的有生力量；以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有力支援了全国其他抗日战场的对敌作战，从而成为国民党中原与西北的有力屏障。在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巍然屹立于敌后，是中共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所创建的一块最大的根据地，是华北抗战的主要战场之一，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重要地位，为坚持和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

注释：

①《抗日游击的战略问题》，1938 年 5 月，《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

民出版社，1991 年 6 月版，第 423 页。

②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共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 405 页。

③⑪吕花莲：《晋冀鲁豫边区腹心地——涉县之光》，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38 页，第 241 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 190 页。

⑤《中国现代史资料汇编》，文化资料供应社，1978 年 8 月版，第 423 页。

⑥邓小平：《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载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 年 5 月出版，第 34 页。

⑦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04 页。

⑧龚古今，唐培吉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上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 年 11 月版，第 328 页。

⑨《邓小平大辞典》编委会编：《邓小平大辞典》，红旗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242 页。

⑩刘连元主编：《冀南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1 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年 12 月版，第 66 页。

一百一十五师挺进山东

山东位于黄河下游，地处南北交通要冲，且为华北的海上门户。我军开辟的山东根据地，南接华中，北连平津，与晋察冀和晋冀豫根据地成鼎足之势，对坚持敌后抗战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山东各地在中共山东省委及各地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相继建立了抗日武装力量，并于 1938 年 12 月成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八路军山东纵队是一支在没有得到八路军主力直接支持的情况下，由中共地方党组织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举行武装起义而创建发展起来的武装力量，并初步开创了许多抗日游击根据地。然而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的沈鸿烈是个十足的顽固派，对我军抗日力量的发展进行多方的限制和破坏，在此种情况下，1938 年 4 月，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在赴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时，请求党中央派八路军一个主力团来山东支援革命，毛泽东当即表示："看来还要多去一些"。[①]

1938 年 5 月，八路军 115 师接到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关于派遣部队入鲁的指示后，首先组织了一支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向津浦路以东冀鲁边平原挺进，与那里的抗日武装会合，建立抗日根据地。挺进纵队以三百四十三旅政治部、直属队、六百八十五团 2 营和一百二十九师工兵连为基础，又从其他团抽调一部分骨干组成，肖华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克明任参谋长，符竹庭任政治部主任。7 月，挺进纵队组成，并于 9 月 27 日，越过津浦路，跨进冀鲁边的边缘——乐陵县，成立了冀鲁边军政委员会，揭开了挺进山东的序幕。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停止对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施之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把打击的重点指向华北的八路军。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逐渐走上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道路，山东根据地处于敌伪顽夹击之中，形势日趋严峻。为了坚持和发展山东的抗战，使之成为华北抗战的战略一翼与联结华中敌后战场的战略枢纽，中共中央决



定再次派遣部队进军山东。

1938 年 11 月，三百四十四旅六百八十八团奉命由冀南转赴山东，进至馆陶、冠县、丘县地区，由一百二十九师三百八十六旅旅长陈赓统一指挥。部队到达这一地区后，于 12 月配合山东省第 6 区游击司令部第十支队歼灭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王来贤部，创建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1938 年 10 月，一百一十五师第三百四十三旅第六百八十五团奉命由晋西南出发前往山东省湖西地区。11 月 25 日中共中央致电彭德怀，继续向山东派遣八路军主力部队："以陈、罗率师部及陈旅主力（两主力团）全部去山东、淮北为宜。……陈、罗开山东时，拟分布于新、老黄河间广大地区，包括津浦东西，胶济南北在内。"[②]八路军总部遵照中共中央的这一指示，于 12 月 2 日电令陈光、罗荣桓："一一五师直及三四三旅之五、六两团，由你们率领开赴新、老黄河间苏鲁皖地区内开展工作。六八五团拟于本月十日以内由此先行出动，陈、罗率师直及六团，应即先开晋东南总部附近。"[③]1939 年 1 月，六百八十五团与山东纵队挺进支队合编为八路军苏鲁豫支队，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七大队。同年 2 月，争取了沛县伪军一部反正，编为独立大队。至 4 月，击退了丰、沛、萧三县 4 000 敌军对湖西区的联合扫荡，继之击退萧（县）铜（山）敌人的七路进攻。部队扩大到 8 000 余人，创建了以丰县、沛县为中心的湖西根据地。5 月，苏鲁豫支队留第四大队坚持湖西斗争，支队率主力南下，越陇海路进入萧县、永城、夏邑地区，与萧县地方武装合编。6 月，支队东越津浦路，进入宿县、灵璧，粉碎了日伪军的七路合击，开辟了宿迁、唯宁、泗县、灵璧地区。战后留下一个大队坚持皖东北，大部兵力留津浦路西并向西发展进入亳县、鹿邑、拓城、商丘等地，与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新四军游击支队配合，开辟了以永（城）夏（邑）萧（县）宿（县）为中心的苏豫皖区。7 月，苏鲁豫支队将所属部队编为三个大队：1 大队坚守皖东北，2 大队调鲁南抱犊崮山区，3 大队则于 9 月回湖西开展工作。

为了增强山东的抗日骨干力量，1938 年 12 月，一百一十五师奉命除留第三百四十三旅补充团与晋西三个游击大队编为独立支队，坚持晋西斗争外，其余由代理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率师部及第三百四十三旅第六百八十六团由晋西出发，跨过同蒲、平汉铁路，向山东挺进，于 1939 年 3 月初到达鲁西地区。一百一十五师到达鲁西地区后，为了迅速打开抗战局面，第六百八十六团于 3 月 4 日向郓城西北的樊坝伪军据点发起攻击，全歼伪军

一个团共800余人，并击退日军100余人的增援。樊坝战斗后，一百一十五师决定以第六百八十六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杨勇率领三营及师直两个连留在运河以西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部队的影响。一百一十五师师部及六百八十六团主力继续东进，至泰西的东平、汶上、宁阳地区，与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会合，协助当地党组织建立抗日政权，瓦解了有一万名徒众的反动"红枪会"，拔除了伪军沿汶河西岸的日伪军据点，为扩大抗日武装和建设抗日政权铺平了道路。

八路军一百一十五师进入鲁西的战略举动引起了日军的注意和防范。1939年5月，山东日军最高指挥官、第十二军司令官尾高龟藏亲自指挥从济南、泰安、兖州、东阿、汶上等地纠集的5 000余兵力，兵分九路向泰西地区进行扫荡。一百一十五师师部及直属队、第六百八十六团、津浦支队、冀鲁边第七团、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中共鲁西党委、泰西特委等共3 000余人被包围在肥城东南陆房一带，情况万分危急。一百一十五师首长随机应变，决定以少量兵力在正面阻击与钳制敌军，其余部队和党政机关于10日夜晚突围转移。然而当日夜里，只有对本地较熟悉的山东纵队第六支队秘密跳出敌人的包围，其余各部均受阻。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一百一十五师各级指挥员沉着冷静，机智果敢地指挥部队顶住敌军的数次冲击，牢牢守住了陆房村阵地，为再次突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11日晚22时许，被围之八路军部队及党政军机关在一百一十五师的统一指挥下开始实行分路、轻装、隐蔽突围，至12时拂晓前全部安全地转移至东平以东地区。本次战斗，八路军共毙伤日军大佐以下1 300余人。八路军及地方党政干部伤亡360人。在陆房突围浴血奋战的八路军的英雄行为振奋了全中国，连蒋介石也致电八路军总部，表示"殊堪嘉慰"④。陆房突围战斗的胜利，为八路军坚持山东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保存抗战骨干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随后，一百一十五师在运西和泰西地区一面坚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一面协助当地中共党组织和抗日政权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努力争取了郓城、鄄城、汶上等地的国民党保安武装共同抗日。在一百一十五师不断的积极活动中，抗日根据地也得以巩固与扩大，运西和泰西两块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并由我军控制了津浦铁路以西、运河两侧、黄河以南的三角地区。在此期间，留运河以西地区的第六百八十六团第三营扩编为师独立团，师直两个连扩编为游击第七支队。1939年7月，师独立团和游击第七支队合编为师独立旅，杨勇任旅长兼政治委员。



运西、泰西抗日根据地的扩大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令山东日军深感威胁，寝食难安，遂于7月下旬从津浦线抽调第三十二师团1个大队及炮兵和一部伪军共400余人，由汶上进至梁山一带，企图对我八路军实施打击。一百一十五师得到消息后，立即命令师特务营、骑兵连和独立旅第一团第三营在梁山附近设伏。激战至8月3日，日军在炮火掩护下向汶上地区突围，八路军跟踪追击，歼敌大部。此次战斗，八路军共歼敌300余人，俘敌24人。

梁山战斗后，一百一十五师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关于乘敌大举扫荡鲁南之际，速向津浦路以东、胶济路以南的山区挺进，建立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指示，除了留陈光、罗荣桓率少量参谋人员和两个连队在泰西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外，一百一十五师师部六百八十六团、新扩编的特务团、随营学校分别进入鲁南的滕（县）峰（县）费（县）边区，与山东纵队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会合，拔除日伪据点多处，争取了一些地主武装保持中立，建立和巩固了以抱犊崮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同年9月4日，八路军总部致电一百一十五师，指出泰西肥城山区甚小，主力应转移至鲁南泗费临地区。陈光、罗荣桓遂率剩余机关人员和两个连队开始向鲁南转移。待一百一十五师抵达鲁南抱犊崮山区后，立即开始向南控制郯（城）码（头）平原，以打通与华中的联系，继而向西打通与湖西区的联系，向北联结鲁中区，向东发展滨海地区，努力开创以抱犊崮山区为中心的鲁南抗日根据地。

1940年初，一百一十五师为统一鲁南地方武装的领导，将地方武装分别编为边联支队、沂河支队、尼山支队；将争取的地方实力派武装编为峄县支队、鲁南运河支队。为扩大鲁南抗日根据地，师部率主力一部由南向北推进，于2月14日攻克鲁南山区中心要地白彦镇，3月间连续击退了日伪军对白彦镇的三次进攻，歼其800余人。随后，一百一十五师部又粉碎了日伪军8 000余人对抱犊崮山区的大扫荡，并讨伐了伪军刘桂棠部，开辟了天宝山区。1940年3月，一百一十五师独立旅与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五支队合编，恢复第三百四十三旅番号，杨勇任旅长，肖华任政治委员。4月成立了鲁西军区（机关由第三百四十三旅旅部兼），肖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时，鲁西、鲁南主力部队进行整编：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五支队与山东纵队第六支队（3月调归第一百一十五师）合编为运河支队，原师独立旅第一、第二团与鲁西游击第八支队合编为黄河支队，以上两支队属第三百四十三旅

（鲁西军区）建制；在鲁南地区的苏鲁豫支队第二大队扩编为东进支队，第六百八十六团与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七团合编为鲁南支队。6 月，苏鲁豫支队第三大队由湖西调往华中，将黄河支队调入湖西地区坚持斗争。6 月下旬，肖华调任师政治部主任。7 月，陈士榘率师独立支队由晋西到达鲁西，参加了讨伐石友三部战役。同月，成立鲁南军区。至此，一百一十五师进军山东的工作即告全部完成。

1940 年 8 月 8 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就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离鲁赴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八路军第一百一十五师与山东纵队的关系作出指示，要求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纵队、一百一十五师的指挥机关靠拢，以便统一领导；一百一十五师师部与山东纵队指挥部各保持自己的番号；一百一十五师有帮助山东纵队正规化之责任；陈光、罗荣桓参加中共山东分局为委员，实际上统一军事领导；朱瑞多负山东分局责任，统一党、政、军工作的领导。9 月，桃峪会议后，八路军第一百一十五师根据八路军总部的要求，将师直属队、第三百四十三旅和鲁西、鲁南以及湖西、冀鲁边等地的部分地方武装，统一整编为六个教导旅，共计 18 个团，7 万余人。1941 年 1 月，八路军第一纵队番号撤销。9 月 13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电示陈光、罗荣桓、黎玉等，为保障华北、华中联系，必须加强山东。并决定：山东纵队归一百一十五师首长指挥，配合作战；将山东纵队军政委员会和一百一十五师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罗荣桓出任书记。[5]随后，山东军政委员会决定，八路军第一百一十五师与山东纵队建立统一指挥机关。从此，山东全省各部队的军事指挥走向统一。

1941 年，山东敌后抗战进入极其困难阶段，一百一十五师与山东纵队相互配合，依靠广大群众展开了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的斗争，并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打退了日伪以及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保护和巩固了山东根据地的有生力量和群众基础。八路军一百一十五师主力部队的到来，为全面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增添了一支骨干力量，使中共抗日武装与日伪顽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山东各抗日武装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骨干作用。这对于增强山东的抗日实力，巩固与扩大山东抗日根据地，坚持山东抗战均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到抗战胜利结束时，山东抗日根据地（1944 年 12 月改称解放区）已拥有 2 400 万人口，1 215 万平方公里的



土地；部队发展到约27万人，民兵50万人，成为华北解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坚持全国抗战到底的重要战略基地。

注释：

①《罗荣桓传》编写组：《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页。

②③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56页，第265页。

④《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2期。

⑤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695页。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我党领导人提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指出：“为了准备转入新阶段，应把敌后游击战争大体分为两种地区。一种是游击战争充分发展了的地区如华北，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了的基础，以准备新阶段中能够战胜敌之残酷进攻，坚持根据地。另一种是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开始发展的地区，如华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地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困难。”[①]其次是华中地区有发展的空间。1939 年 4 月 12 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听了刘少奇关于华中工作的报告后指出：“六中全会决议发展华中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敌人准备大举进攻华北，派大臣及大将到华北部署大的进攻，将来趋势我们经济更困难，部队也将缩小，地区也将缩小。现在全国共产党与游击战争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华中。”再次是华中地区战略地位重要。为此，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于 1939 年 6 月 22 日发出指示：华北八路军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巩固，“而在华中方面，中心是在发展。”[②]

除了日军回师占领区外，正面战场压力减轻的国民党军，吸取了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大发展的教训，也开始注意敌后地区的控制，多方限制新四军向划定地区范围以外发展。

为了巩固我军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现“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避免王明右倾主义投降错误路线的影响，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以王明为书记的中共中央长江局，而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代替对新四军的指导。而后，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1938 年 11 月，中央政治局批准以刘少奇、朱瑞、彭雪枫、郑位三等组成中共中央中原局。刘少奇任书记，主要负责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的抗日斗争。中原局的成立，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起了重要作用，对华中敌后抗战的发展起了决定作用。它使华中这一广大地区从根本上摆脱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影响，为推动华中工作转变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1939年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驻地，向新四军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央关于向华中敌后发展的指示，统一新四军领导干部的思想。3月，周恩来在新四军军部干部大会上发表了《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讲话提出："我们在江南敌后地区确定发展的方向，有三个原则：（1）那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那个地方发展。（2）那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3）那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③]周恩来特别强调，新四军"愈向敌人的后方，愈能得到发展的机会。"经周恩来与新四军领导人项英共同商议，确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发展方针，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39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批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之后，进一步指示新四军，即刻部属在华中的大发展工作。中央要求东南局和新四军须顾及全国形势和发展华中的重要性，不失时机地抽调力量增强华中；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为中心，统一指挥江北部队，发展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的指示中说："在华北则过去已有大量发展，现在中心任务是巩固工作。因此，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④]因此，华中被看做是今后我党发展的主要地区。

根据党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以及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1938年6、7月间，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进入到苏南，展开于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和江宁、溧水、高淳地区，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根据地。第三支队进入到皖南前线，开辟了皖南根据地。第四支队进入皖中后，于10月下旬创建了皖中根据地。河南省委于1938年夏在豫东地区组织起两支游击队，10月，编成新四军游击支队，活动于豫东的睢县、杞县、太康和夏邑、永城、肖县地区，初步打开了豫皖苏边区的局面。1939年5月3日，新四军军长叶挺由皖南来到江北新四军第四支队驻地安徽庐江，亲自部署新四军江北部队的东进工作。5月5日，在叶挺的主持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正式成立，以张云逸为指挥，徐海东为副指挥，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兼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成立了以张云逸兼任书记的江北指挥部前委。成立后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共辖三支部队：第四支队第七、第九、第十三三个团，共4 000人；第五支队第八、第十、第十五三个团，共2 000人；江北游击纵队第一、第二两个大队，共1 000多人。[⑤]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后，在指

挥部的统一指挥下，经过整编后的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立即分赴津浦路两侧，开展游击斗争，着手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第四支队在路西开辟了以定远藕塘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第五支队越过津浦路，在路东开辟了以来安东北半塔集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为创建皖东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并给敌之津浦线交通构成了严重威胁。

1939 年 12 月，日军为巩固其后方，集结 2 000 余兵力向津浦路西的周家岗、大马厂、古河等地进行扫荡，妄图驱逐我皖东抗日力量，新四军第四支队利用山地有利地形，以阻击、伏击相结合的战术，给予扫荡之敌人以打击，粉碎了敌人扫荡皖东的企图。1940 年 4 月，为了进一步展开津浦路两侧的抗日斗争，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决定，撤销安徽省委，分别成立津浦路东、路西两个省委及联防办事处、联防司令部。[⑥]并在两区中先后建立起各级抗日政权机构、群众团体和自卫队武装。至同年 8 月底，全区地方武装已达 9 000 人，不脱离生产的人民自卫军发展到近 10 万人。皖东根据地的发展对日军造成了极大威胁，8 月下旬，日军第十五、第十七师团及伪军一部共万余人对我津浦路东根据地进行大举扫荡。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决定，留第四支队坚持路西，防止桂顽袭击，以进入淮宝地区的第五支队等部在外线策应，以第十四团及独立 1、独立 2 团等部留守路东，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从 9 月 5 日 ~17 日，我军经 65 次大小战斗，毙伤敌伪 600 余人，[⑦]胜利粉碎了日伪的扫荡，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为打破日军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统一江南各部的指挥，1939 年 11 月，第一、第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成立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统一领导第二团、第四团、新三团、新六团、“江抗”、丹阳游击纵队及全区地方武装。江南指挥部成立后，立即整编部队，部署北进，将活动于苏、常、太地区的“江抗”主力与丹阳游击纵队合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辖四个团，在管文蔚、叶飞领导下，渡江北上，开展游击战争。由苏南渡江北上的第二支队第四团两个营，在陶勇的领导下进入苏皖边之天长、六合、仪征一带活动，并与新四军挺进纵队一部合编，成立苏皖支队。同时，成立苏皖区党委，负责领导苏皖、苏南、苏北三个特委。

1939 年，皖南新四军部队共进行作战 200 余次，并进行了 5 次繁昌保卫战。1940 年 4 月，日军第十五、第十七、第一百一十六师团等各一部，共万余人向皖南进行大规模扫荡。4 月 26 日，芜湖之敌 5 000 余人进占南陵，然后分两路向我第一、第三团防地进攻。我军分别在父子岭、何家湾痛



击进犯之敌，各歼敌300多人。第三支队在繁昌地区积极阻击敌人连连得胜。在这次历时十天的反扫荡斗争中，我军作战十多次，歼敌900余人，取得了重大胜利。10月初，日军又调集万余人向皖南大举扫荡。其一路5 000余人向新四军军部驻地云岭猛扑。我军在叶挺军长的指挥下，与敌人展开激战，胜利保卫了云岭。10月9日，我军收复了数日前被国民党军队放弃的泾县县城，极大地提高了新四军的声望。

为增强华中抗战力量，1939年5月21日，党中央即指示八路军向华中发展。“苏鲁豫支队应视情派一部兵力和地方干部去徐州东南之宿县、灵璧一带活动，对苏皖边进行战略侦察，以便南与周骏鸣部、西与彭雪枫部取得联系。”根据以上指示，苏鲁豫支队立即由鲁西南出发，向徐州东南地区挺进，并以一部进入皖东北地区，开辟了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同年9月，新四军游击支队在豫皖苏地区配合地方党组织开展根据地建设的各项工作，使萧、宿、永、夏为中心的豫、皖、苏平原游击根据地得到了巩固。10月，经中共中原局批准，豫皖苏省委改为豫皖苏边区党委，并先后建立了萧县、亳县、永成、夏邑、杞县五个县政权。与此同时，由于抗日武装的发展，游击支队力量得到迅猛发展。1939年底，经中共中央批准，游击支队改称新四军第六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吴芝圃任副司令员，张震任参谋长，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团，四个总队，成为一支拥有万余兵力的抗日队伍。[8]

1940年3月16日，根据第一次反共高潮后的政治形势，毛泽东指示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目前斗争重心应移至淮河流域。此时国民党正在向皖东及豫皖苏两区压迫，企图切断八路军与新四军联系。故毛泽东提议调三百四十四旅至陇海路、淮河间，协助彭雪枫部创立根据地。1940年5月，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二纵队三百四十四旅和新二旅主力五个团、1.2万余人，由冀晋豫边区南下。6月下旬越过陇海路，在涡阳之新兴集与新四军第六支队胜利会师。同时，苏晋豫支队也根据中原局的指示由丰县一带出发，于7月初到达皖东北泗县地区。6月底，八路军三百四十四旅与新四军第六支队等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8月，中原局对部队进行整编，以新二旅、苏鲁豫支队等部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辖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共九个团、两万人左右，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执行东进任务；以三百四十四旅与第六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辖第四、第五、第六旅等部共9个团、1.7万余人，仍由彭雪枫任司令员，

执行坚持豫皖苏边区和向西防御任务。[9]

在豫鄂边地区，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部署，撤销了河南、湖北两省委，成立豫鄂边、鄂豫皖、鄂中、鄂西北等区党委，并作出决议：“鄂东、豫南、鄂中敌占区域是今天党开展华中游击战争最重要的地区之一。创建坚强的游击队伍，建立鄂东、豫南、鄂中抗日根据地，并使之逐渐打成一片，这是今天鄂豫皖、鄂豫边以及鄂中三个区党委最主要任务。”[10] 1939 年初，中原局决定派李先念率部南下，向豫鄂边区敌后挺进。6 月，陈少敏率信阳挺进队在安陆与李先念部会合，随即将部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任政治委员（不久由陶铸代），辖四个团。7、8 月，部队发展至六个团，此后在鄂中深入发动群众，打击日伪势力，连续进行了京山新街战斗、西山战斗和大山头反敌扫荡战等对敌作战，极大地振奋了鄂中民众的抗日斗志。[11]由于部队发展壮大，1939 年 11 月，鄂中、鄂东、豫南区的党和军队负责人在四望山召开会议，决定：撤销豫鄂边、鄂豫皖、鄂中三个区党委，成立新的豫鄂边区党委，统一领导边区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并将鄂中、鄂东、豫南之新四军部队统一改编为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1940 年 1 月改称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朱理治、参谋长刘少卿、政治部主任任质斌，下辖六个团和三个总队，共约 9 000 人。[12]同时，成立了以朱理治为书记的中共纵队委员会，作为该部队党的最高领导机关。

豫鄂边区党和军队的统一，极大地推动了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日军攻占襄樊、宜昌后，中原局决定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向襄河以西敌后发展，以巩固扩大鄂中阵地。中共中央进一步作出指示，要求挺进纵队“努力扩大自己，务求在一年内扩大到四万人，主要的发展方向是路东（指平汉铁路以东）”[13]据此，纵队以主力转向大洪山方向，再逐步向襄河以西发展。1940 年 6 月，挺进纵队先后控制了安陆以西的白兆山和坪坝等地，对日军构成严重威胁，并粉碎了日伪对鄂中的频繁攻击，巩固了鄂中抗日根据地，豫鄂边由此进一步巩固扩大，逐步成为华中敌后坚强的抗战堡垒。

1940 年 10 月 10 日，新四军苏北部队前锋与八路军第五纵队先头部队会师于东台县白驹镇。随后，在海安成立了苏北行政委员会，建立了抗日政权，开辟了苏北抗日根据地。11 月 7 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黄克诚同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正副指挥陈毅、粟裕在苏北海安会晤。17 日，根据中央决定，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海安成立



（不久迁到盐城），叶挺、陈毅分任正副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新四军与八路军。至此，华中新四军和华北八路军胜利会师，华中、华北两大战略区之间已连接起来，新四军东进北上的战略任务胜利完成。

从武汉失守到1940年底，是新四军在华中展开、巩固、发展的关键时期。新四军江南、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坚决贯彻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制定的“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据统计，此间华中新四军对日伪军作战2 400余次，歼敌、俘敌（包括伪军）五万余人，缴获枪支1.4万余支，轻重机枪540余挺，各种炮30余门，并在华中敌后建立了苏北、苏中、苏南、皖东北、皖东、皖中、皖南、豫皖苏、鄂豫等抗日民主根据地，总面积120余万平方里，人口6 000余万。同时新四军已创建了皖东、皖东北、豫皖苏边、苏中、苏北等抗日根据地，扩大了苏南、皖中的抗日游击战争，新四军由两万余人发展到九万余人，并实现了新四军与八路军在苏北的胜利会师，基本完成了六届六中全会赋予的发展、巩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注释：

①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1938年第57期。

②《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目前我军任务的指示》，1939年6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28页。

③周恩来：《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周恩来选集》（上），第105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

④中央书记处：《中央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193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26页。

⑤⑥⑦⑨何理：《抗日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204页，第210页，第210页，第211页。

⑧张宪文：《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02页。

⑩《中共中央中原局关于创建鄂东、豫南、鄂中抗日根据地的意见致刘少奇电》（1939年9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编，《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551页。

⑪李先念：《一年来鄂豫边区抗日游击战争》（1941年3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588页。

⑫《刘少奇、张云逸、徐海东、邓子恢关于李先念部近况致中共中央书记处并项英电》（1940年1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557页。

⑬《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豫鄂挺进纵队工作方针的指示》（1940年5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559页。



黄桥决战

1940年7月8日，陈毅、粟裕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主力部队从江南北渡长江，抵达苏北。7月12日，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兼政委，粟裕任副指挥兼参谋长。

在抵达苏北后，对于以何处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问题，讨论了三种方案：一、扼守扬州、泰州地区，二、北进兴化，三、东进黄桥。最后认为，扬州、泰州是中间派李明扬、李长江的腹地，地区比较狭小，如果向外发展，势必将与两李发生矛盾，于抗战不利；兴化则是顽固派韩德勤的指挥中心，周围都是水网，对我军进出十分不利，且地域偏西，对日寇威胁不大；而黄桥位于泰州东南，处于靖江、如皋、海安、泰县、泰兴等县的中心，以黄桥为中心建立根据池，便于向南通、如皋、海安、启东发展，而一旦控制了这些地区，苏北的新四军便可以与江南新四军相呼应，控制长江通道，威胁日寇和切断韩德勤部与江南冷欣部的联系。因而，陈毅、粟裕决定部队东进黄桥。

7月25日，苏北指挥所所属部队按计划开始东进，采取远道奔袭和各个击破的战术，直指黄桥。韩德勤得知消息后，即刻令何克谦率保安第四旅由黄桥及其以南地区向北攻击，同时命令陈泰运率税警团由曲塘南下至北新街一带，妄图南北夹击，消灭我军于运动之中。陈毅、粟裕对此次战役早已成竹在胸，新四军东进到北新街以南，粟裕突然命令部队掉头向北，击溃陈泰运两个团，歼灭一个多营，尔后释放了俘虏的官兵，并归还了缴获的部分武器，以此警告陈泰运一致抗日，不要对内摩擦。在对付陈泰运的同时，陈毅、粟裕命令第二纵队攻占黄桥以北及东北的蒋垛、古溪、营溪，第一纵队攻占搬经，截断何克谦的退路，第三纵队趁机攻占黄桥及其以南地区。7月29日，我军占领黄桥，自此展开了有声有色的根据地建设。

对于我军进占黄桥，创建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韩德勤感到莫大的威胁。在军事失利之后，他表面与我军达成协议、划定防区，协定韩

部驻姜堰、曲塘一线，不再南下；新四军驻黄桥、蒋垛、营溪、花园桥一带，不再北进，实际上却在暗中调动兵力，调整部署，妄图消灭新四军于立足未稳之时。对此，新四军领导人看得非常透彻。8 月 15 日，粟裕在向中共中央和叶挺、项英、刘少奇的报告中，提出了对付韩德勤的部署：（一）派 1 纵队（即管文蔚、叶飞部）全部即东进如皋以东南及南通以北攻石港，以截断省韩与上海之交通，使海门、启东全入我手；（二）2、3 纵队主力及直属队仍控制于黄桥至如皋之线，加紧江北地方工作及本身扩训；（三）为集中力量以对付不可避免之省韩的进攻，决将张道庸（即陶勇）全部东移，而将塘头、宜陵地区暂放弃并借此为争取二李之中立；（四）今后与江南交通已由江上另新建路线，正在开始。[①]陈毅报中共中央和刘少奇的电报也建议，八路军和新四军 5 支队迅速推进到运河以东支援，同时表示："我们亦积极准备单独解决决战任务。"[②]为加速根据地建设，准备还击韩德勤的进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军分会于 8 月 20 日下达了《对于创建黄桥大根据地的指示》，着重指出："目前的工作任务是：积极充实主力，严格整训部队，努力民众运动，建立民主政权工作的基础，随时准备迎接反扫荡、反摩擦的胜利。"[③]

1940 年 8 月 21 日，韩德勤在东台下达了分左右两翼向黄桥地区新四军进攻的作战命令。9 月 3 日，韩军分两路南犯：以李明扬、李长江、陈泰运等部为右路军，集结于姜堰地区；以第八十九军的第一百一十七师（无第一旅）、独立第六旅（无第一营）、保安第一旅（无第二营）为左路军，集结于曲塘、吴家集、海安地区。陈毅和粟裕商量采取了正确的作战方针，一方面严守自卫立场，坚持不先放第一枪；另一方面逐步收缩，诱顽敌左翼深入新四军防区，再集中力量予以各个歼灭。9 月 6 日，韩部左路军一部在营溪以南向我军发动试探性进攻，我军被迫反击，予顽军以重创，余顽回窜姜堰、海安一线。此次战后，我军全部释放了被俘的保 1 旅副旅长以下 1 500 余人，此举使该旅旅长薛承宗大为震动，在此后的黄桥决战中，该旅保持了中立。

营溪之战受挫后，韩德勤改取"堡垒推进"的方针，即令其驻姜堰的保安第九旅张少华部严密封锁新四军军粮食来源，并强令李明扬、陈泰运部步步紧逼，企图将我军压缩在沿江狭小地区，勾结伪军进行夹击。长此以往，形势对我军极为不利。为了摆脱困境，苏北指挥部决心以第二、第三两个纵队，全力攻取姜堰，并以第一纵队在白米、马沟一带打援。经过一昼夜



的激战，9 月 13 日，我军攻克姜堰，歼敌千余。此时，我军再次呼吁韩德勤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但韩德勤却提出以我军退出姜堰为条件实现停战。为争取停战，团结抗日，我军当即决定同意韩德勤提出的条件，并于 9 月 30 日撤出姜堰，交由“二李”和陈泰运部接管。粟裕在后来回忆这一段尖锐复杂的斗争时说：“我军自攻取黄桥到让出姜堰，把军事仗与政治仗结合得十分巧妙。尤其是姜堰，如不夺取，便没有让出的文章可做。而让出姜堰，对我是‘一举三得’，既揭露了韩德勤积极反共、破坏抗战的罪恶阴谋，在政治上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极大同情，造成我党我军完全有理的地位；又加深了苏北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之间的矛盾；还使我适时集中了兵力，在军事上对付韩德勤部的进攻处于有利地位。这些处置都是陈毅同志对党的斗争策略的杰出运用。”④

1940 年 9 月 30 日，新四军信守诺言，全部退出姜堰。就在同一天，韩德勤电令所属各部“务集中力量”，对新四军“包围而歼灭之”，企图先以优势兵力，聚歼黄桥地区我新四军，尔后回师北上与八路军较量。决战黄桥已经无可避免。陈毅、粟裕向中共中央报告称：“韩之进攻企图已极明显，一周之内大战必爆发。”“部队已积极准备作战，以独立作战为原则”。⑤然当时前来支援的八路军南下部队和新四军第五支队尚未到达，我军全部人员仅 7 000 余人，其中战斗人员不过 5 000 余人，与韩德勤的三万余人相较，实属绝对劣势，要打赢以少胜多的歼灭战，不仅需要作战部队的军事素质，更需要发挥灵活机动的军事指挥艺术。苏北指挥部遵照中共中央、中原局关于在战役指导上采取后发制人的方针，歼韩顽主力于黄桥地区，以解决苏北问题的指示，决定采取以黄桥为轴心，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以第三纵队坚守黄桥，以第一、第二纵队隐蔽集结于黄桥西北的顾高庄、横巷桥一带，待机出击，歼灭来犯的韩德勤部于运动中。同时，政治部印发了军分会和党代表的《敬告指战员同志书》，反复强调打好这一仗的政治、军事意义，号召全体同志为打败顽军的进攻而战。

10 月 1 日，韩德勤调集 26 个团，组成左、中、右三路向黄桥扑来。中路是进攻的主力军，以其嫡系部队第八十九军和独立第六旅组成，分别经营溪、古溪和祖师庙，从北面、东面进攻；右路是李明扬、李长江和陈泰运的部队，左路由第一、第五、第六、第九、第十保安旅组成，分别掩护其主力中路军之两翼，从西面、南面助攻黄桥。抗战以来，全国规模最大的反摩擦战役开始了。

10月3日，顽军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下令所部攻击前进，按照陈毅、粟裕的部署，新四军第二、第三纵队派出的各个营、连开始节节阻击，以打乱89军的进攻节奏。4日凌晨，第八十九军三十三师向黄桥东北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我军第三纵队在正面坚决阻击，第一、第二纵队埋伏于高桥至黄桥间伺机出击。下午3时，翁达率独立第六旅经高桥从北面进攻黄桥。粟裕亲临黄桥北门指挥，采取“黄鼠狼吃蛇”的战法，当翁部先头部队接近黄桥，后尾脱离高桥时，即令第一纵队分四路插入顽军独立第六旅行军的纵队，迅速出击，将其切成数段，并分割包围。经过3个小时激战，独立第六旅被新四军全部歼灭，旅长翁达自杀身亡。与此同时，第二纵队经八字桥直插分界，切断进攻黄桥的顽军之退路，这时第三纵队也由黄桥正面出击。至此，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将顽军第三十三师及第八十九军军部包围于黄桥以北地区。接着，我军以第一、第二两个纵队夹击顽军第三十三师，歼其主力于小二房庄。尔后，我军向东全力围攻野屋基附近的第八十九军军部和第三百四十九旅。战至6日晨，顽军第八十九军军部及第三百四十九旅大部被歼，李守维妄图渡河逃窜，失足落水，淹死在八尺沟河中。另外，增援第三十三师的顽军预备队在营溪也遭到我军阻击，被歼大半，残部向海安方向溃逃。我军乘胜追击，占领海安。韩德勤见大势已去，遂率残部向兴化逃窜。

至此，黄桥决战胜利结束，我军共歼顽军主力12个团，保安第十六旅全部，保安第三旅、保安第五旅各一个团，共计1.1万余人。其中第八十九军中将军长李守维、独立第六旅中将旅长翁达及旅、团长数人毙命，俘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九十九旅旅长苗瑞林、一百一十七师参谋长等师、旅、团军官十余名，下级军官600余人。据不完全统计，主要缴获有长短枪3 800余支，轻、重机枪189挺，山炮三门，迫击炮59门，还有大量弹药和军需物资。[6]

黄桥决战的胜利，使新四军的发展出现了根本的转机。战后，粟裕在海安西寺干部会上作了《黄桥战役总结》的报告，深刻指出这次决战胜利的意义：“首先，解决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使中国最进步、抗战最坚决、革命最彻底的八路军、新四军会合起来了，能够互相取得更好的配合和更多的发展；使苏北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华北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连成一片；不仅奠定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础，而且使华中革命势力取得第一步的优势，也就是增加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有利条件。这是第一等的重要意义。”



“其次是，造成了我党我军在苏北抗战的领导地位。”“第三，大大发挥了统一战线的威力，获得了丰硕成果。”“第四，使韩德勤最终丧失了单独向我们进攻的能力。”“第五，解决了抗日的后方问题。”⑦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也高度评价黄桥决战“有伟大的决定意义”。

注释：

①②《粟裕传》编写组编：《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 年 8 月版，第 239 页，第 241 页。

③④⑥粟裕：《粟裕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 年 8 月第 2 版，第 175 页，第 177 页，第 186 页。

⑤《陈毅、粟裕关于韩德勤的进攻企图及我之斗争策略致毛泽东等电》，1940 年 9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 年版，第 635 页。

⑦孙克骥：《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 年 7 月第 1 版，第 57～58 页。

刘少奇南下华中

1938年11月9日，为了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了《关于中原局委员会的通知》，“决定以胡服（刘少奇）、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中央中原局委员，以胡服兼中原局书记。所有长江以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概归中原局指导。”[①]刘少奇接受了新的任命后，随即带领朱理治、李先念、郭述申等几十名干部，于11月24日离开延安，日夜兼程奔赴华中前线，开始了他南下华中的第一行。

刘少奇等人从延安出发，途经西安，绕道潼关，先于1938年11月28日到达渑池八路军兵站。12月20日，豫西特委在渑池兵站召开特殊会议，刘少奇在会议中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的主要精神和重要意义，并连续做了多场报告。他明确指出，“沦陷区党的任务是建立党的组织，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游力战争，创建根据地；未沦陷区党的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积蓄力量，准备游击战争和支援敌后抗战。从而在思想上、组织上基本纠正了王明投降主义错误。”[②]在刘少奇的指示下，豫西地下党开始积极组织武装力量，大力发展党的力量，自上而下建立各县党的组织，准备在日军侵占豫西时开展抗日游击战。在此次会议结束时，在刘少奇的亲自主持下，对豫西党组织做了重大的调整，取消了豫西特委，成立了豫西省委，并在几个中心县委的基础上建立地委。刘子久任省委书记，席国光任组织部长，郭晓棠任宣传部长，王志杰任统战部长，刘向三任军事部长，吴祖贻任青年部长，吴应先任妇女部长，并建立了洛阳、新密、宜洛、伊鲁和陕灵五个地委。[③]紧接着，在刘少奇的领导下，豫西省委又开办了党员训练班，训练党员干部。训练班共办了两期，每期三四十人，三个星期一次，向抗日根据地输送了大量的党员干部和知识青年，对以后开展豫西地下党的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

1939年1月28日下午，刘少奇抵达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到达竹沟



后，刘少奇立即和竹沟地区的中共河南省负责人王国华、周骏鸣等同志及提前到达的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汇合，开始着手组建中原局机关。不久，中共河南省委也迁驻竹沟，竹沟遂成为中原抗战的领导中心。刘少奇坐镇竹沟，开始指挥华中地区抗日武装斗争。在刘少奇与中原局的领导下，我党在华中地区扩大了武装力量，逐渐打开了敌后抗战局面，并开创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大批青年投身到竹沟和华中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参加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投身到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增强了我党的新生力量。竹沟成为我党在中原地区发展的重要阵地和战略支撑点，被称为华中地区的“小延安”。

刘少奇在竹沟运筹帷幄，夜以继日地工作。在返回延安之前，他还在竹沟召开一次重要会议。会上，他再次分析了当时的抗战形势，并指出：在这几个月的相持阶段中，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对国民党当局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日军的主要军事力量转向敌后对付八路军、新四军。……大家要提高警惕，准备对付国民党对我党我军的挑衅举动，继续大力发展我军在敌后的武装力量，加强团结各阶层的力量，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既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又要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党我军的挑衅和进攻。④他的讲话为以后豫南、豫中抗日武装的统一，开展中原地区的反摩擦斗争指明了方向。

1939 年 3 月 18 日，刘少奇奉命回延安开会，结束了他南下华中的第一行。

1939 年 9 月 15 日，刘少奇率徐海东等 40 多名干部，再次离开延安南下，开赴华中。此时的华中，由于受错误思想的指引以及战略决策的失误，新四军发展缓慢，并在战略上处于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分割包围之中，情况万分危急。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8 月下旬，在延安连续召开四天的会议，集中讨论新四军和东南局的工作，决心加快发展华中抗战的步伐，并将这一重任，委托在刘少奇的身上。9 月 21 日，刘少奇一到达竹沟，便抓紧时间听取各方面的汇报，以全面了解党政军的情况以及财政经济工作。之后，根据党中央指示和中原地区顽固派咄咄逼人的局面，刘少奇决定将中原局撤离竹沟，将中原局工作重心移向皖东敌后。10 月 9 日上午，刘少奇周密部署中原局主动实行战略转移之后，率领中原局及徐海东、刘瑞龙在内的干部大队、教导队学员等 300 余人离开竹沟。10 月 12 日，刘少奇向中央书记处报告了对豫鄂边根据地的工作布置。他在分析豫鄂边区形势时明确指

出："竹沟环境甚为严重。顽固分子在竹沟周围布置了反对我们的特务工作。五战区有命令给汝南八区行政专员，通缉朱理治，要相机拿获法办。"对于此间工作我拟作下列布置：一、由理治率竹沟大部工作人员及武装、教导队去信（阳）应（山）随（县）桐（柏）交界之四望山（该地已成为我们一小根据地，能自筹给养），集中注意力建立敌后地区工作。主要任务是巩固现有部队，创造根据地，筹措给养。二、竹沟留守处缩小，主要办理后方勤务及交通。三、调刘子久来竹沟主持河南省委工作。[5]根据中原局和刘少奇的既定部署，11 月中旬，朱理治、李先念、陈少敏在信阳四望山召开豫南、鄂东、鄂中党和部队负责人会议，讨论了党和部队的全面统一问题，建立了豫鄂边区党委。会议决定豫南、鄂中抗日武装统归边区党委领导，将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编为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委。成立了军政委员会，朱理治任书记，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刘少卿为委员。

11 月 6 日，刘少奇等人到达新四军游击支队驻地皖北涡阳县新兴集。到新兴集以后，刘少奇听取了彭雪枫关于豫皖苏工作的汇报和吴芝圃、张震、肖望东的补充汇报。在汇报中，刘少奇作了一系列重要的指示。他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十分强调深入敌后，开创华中抗战的新局面。他强调，华中对敌作战的方针，应背靠大海，求得后方，向内发展，扩大抗日武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关键是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在刘少奇的指导和关怀下，华中地区的豫皖苏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很快成立了豫皖苏边区参议会，并召开了豫皖苏边区各界人士代表大会，组成了豫皖苏边区政权的最高领导机关——豫皖苏边区联防委员会。同时，也健全了豫皖苏边区党委，在组织上充实和加强了华中地区的抗日领导力量。

1939 年 11 月 19 日，党中央发出江北新四军向东海边发展的指示："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地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不到海边，决不停止。"[6]为尽快实施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刘少奇在豫皖苏边区停留不到一个月，便启程赶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12 月初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皖东定远县藕塘镇黄村。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中原地区实际状况，1939 年 12 月中旬至 1940 年 2 月，刘少奇在皖东定远县先后召开了中原局的三次会议，讨论了华中的发展方向，根据地的建设，发展人民武装和统一战线等问题，并决定在华中实施向西防御、向东发展，既有理也有利，解决了苏北问题后，我军即可背靠山东，凭

江据海依托水网，开展华中抗战。在进一步分析了华中的形势后，刘少奇说："我们有六大宝：一是抓武装、二是抓政权、三是抓发动群众、四是抓财政经济、五是抓发展党、六是抓培养干部。"⑦这六大宝的总体思想，实际上就是要建立巩固抗日根据地。同时，他还建议中央派八路军一部南下，新四军主力北上，大力发展华中，使华中华北两大根据地连成一片，八路军、新四军相互支援。1940 年 1 月初，刘少奇同张云逸等同志将豫南、鄂中、鄂东部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游击纵队。整编后的豫鄂挺进游击纵队的主力挥戈东进，创建鄂东抗日根据地。2 月 7 日，中原局向彭雪枫、江华、金明发出《关于建立苏北、皖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及党的组织，必须独立去发展自已的力量，独立自主的去组织游击队、自卫队和民众。"3 月 28 日，刘少奇又写信给张爱萍、江华、刘瑞龙等人，提出了建立皖东北的方针和政策，以巩固皖东北蓬勃发展的抗战局势。1940 年 3 月 29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目前华中军事策略的指示，指出：华中之皖东、淮北、苏北成为顽方必争之地，目的在隔断八路军、新四军的联络，陷新四军于危境。同时指出，新四军在华中武装摩擦斗争中应当注意，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共产党手中，陈毅部应当立即向苏北发展。这一指示，坚定了中原局和刘少奇巩固皖东，发展苏北的信心和决心。

发展苏北的战略确定以后，江苏北部就成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发展的主要目标，新四军和八路军从南北两面向苏北发展，特别是新四军陈毅部渡江进入苏中地区（即苏北地区南部）以后，与韩德勤的冲突日趋尖锐。顽固坚持反共立场的韩德勤指使所部，不断挑起摩擦，在刘少奇的领导下，新四军先后在半塔集、郭村等战斗中打败了韩德勤所部，并在黄桥决战中大获全胜，使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出现了新局面。10 月 10 日，北上的新四军和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的先头部队，在东台白驹镇狮子口胜利会师，使苏北、苏中等根据地联成一片，八路军新四军互为依托，奠定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坚实基础。"它打通了华北、华中的联系，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把八路军、新四军限死在黄河以北的阴谋，改变了一年前华中新四军遭受分割包围的微弱地位，使华中形势根本改观。"

然而就在新四军在华中发展得有声有色的时候，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席卷而来，使得皖南新四军军部危在旦夕。皖南事变后，叶挺被俘，蒋介

石下令取消新四军，为了挽救皖南新四军于危难，刘少奇、陈毅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皖南事变后的工作部署，建议在苏北成立新军部，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任政委。1941 年 1 月 25 日，新四军重建军部大会在盐城召开，刘少奇在会上讲话，号召全军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做好准备，随时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随后重新整编军队，讨论了新四军今后的任务并做了具体部署，提出了“建设一个正规化的党军”的要求。

中共中央为了适应华中形势，加强对整个华中地区党和军队的领导，决定将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成立华中局，同时成立中央军委华中军分会。刘少奇被任命为华中局书记兼华中军分会书记。6 月初，中央军委华中军分会扩大会议召开。刘少奇同陈毅分别在会上作了建军工作的报告，会议全面地总结了新四军的各项工作，系统地论述了建军工作的重要性，全面制定了建军工作计划，进一步提高全军的政治、军事素质；号召全军为建设正规化的党军而奋斗。1942 年 1 月 25 日至 3 月 5 日，刘少奇在阜宁单家巷主持召开了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会上，刘少奇做了《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总结了华中地区三年来的斗争经验，布置了今后的工作任务和发展方向。而此次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奉命离开华中，转山东，过冀鲁豫边区，最后经陕西回到延安工作。

刘少奇在华中三年多的时间里，曾担任过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新四军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政委，新四军政委，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中共新四军分会书记，兼任华中局党校校长，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院长等许多重要职务，他对华中抗战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也可以说是十分重大的。陈毅曾经说过：“少奇同志在华中局势危急时刻，于 1939 年年初到华中，组建中原局，并担任中原局书记，统帅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皖南事变后，担任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少奇在华中工作虽然只有三年时间，但这三年，是血雨腥风的三年，是不平凡的三年，几乎日日夜夜都在战斗，以他的雄韬伟略，为发展华中根据地和新四军作出了杰出贡献。他的功绩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圆满完成了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1939 年年初，少奇肩负发展华中的重任，离开延安到华中，……组建了李先念的独立游击大队，向豫鄂边挺进。这支部队，在不到半年时间内，迅速发展为拥有六个主力团的游击兵团。现在这个游击大队改编为新四军五师，拥有 1.5 万人，已在黄安、应



山、京山、天门、荆门等广大农村立足生根，部队发展数量多质量高。这时候淮南和淮北，已有四支队、五支队、六支队和黄克诚的第五纵队。由于项英的错误影响，这四支部队步伐不一致，各有各的主张，刘少奇在定远县藕塘集召开中原局扩大会议，提出了‘东进，东进，再东进’的战斗口号，把发展苏北作为战略任务完成。今天苏北抗日根据地已初具规模。

第二，少奇提出反摩擦斗争的思想，巩固和发展了华中根据地。少奇同志说，国民党顽固派是新四军东进的障碍，要东进就要反摩擦。1940 年 5 月，少奇领导江北指挥部在定远和半塔，一举击败李品仙和韩德勤的夹攻，坚持了津浦路东、西两侧阵地，为建立苏北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第三，提出了正确处理皖南事变的斗争策略。……党中央接受了少奇同志的建议，稳妥地处理了皖南事变，既从政治上打击了蒋介石，又在军事上发展了八路军、新四军力量。

第四，用先进的理论武装了华中党组织。少奇同志担任华中党校校长，倾注全部心血于党的教育事业上。……写出了《人为什么犯错误》、《人的阶级性》、《论抗日民主政权》、《论党内斗争》等不朽的著作，并在党校演讲，用马列主义，提高了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⑧

陈毅对刘少奇的评价可谓全面而中肯。在华中敌后三年多抗日游击战争中，刘少奇临危受命，肩负重任，在斗争环境异常恶劣的情况下，仍旧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和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巩固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

注释：

①③④⑤⑥⑧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确山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著：《刘少奇主持中原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年 8 月版，第 2 页，第 9 页，第 50 页，第 87 页，第 112 页，第 300 页。

②⑦刘爱琴：《我的父亲刘少奇》，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 年 11 月版，第 111 页，第 124 页。

八路军、新四军转战苏北

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至11月举行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1939年5月，中共中央在致八路军总部的电报中指出，今后八路军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华中。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国民党阴谋策划第二次反共高潮暗流涌动，华中的战略地位越来越凸显出来。因此，为了壮大我军力量，坚持持久抗战，粉碎国民党顽固派排挤、压迫我军的图谋，我军开始大力发展华中根据地。

为加速发展华中，1939年11月底，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抵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此时，在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仍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和包围，面临着在沿江狭长地带被分割歼灭的危险。为避免摩擦扩大，维护统一战线，保存我军有生力量，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亟需向外发展。在何处开辟新的根据地，寻找新的战略支撑点就成为新四军迫在眉睫的问题。12月19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并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军分会书记项英，提出：皖东在武汉失守前后完全有可能建立相当完满的根据地，但现在时机已失。目前在皖东只能求得某种有限度的发展，而大有发展希望的地区是江苏北部，应集中最大力量发展苏北。[①]在随后的三次中原局会议上，刘少奇主持讨论了华中的局势，深入研究了发展华中的战略方向问题，认为向西发展受国民党军第一、第五战区限制，且容易引起中间势力的疑惧，政治上不利。而向东发展，开辟苏北，政治上有理，军事上有利。而苏北地区已成敌后战场，国民党的驻扎部队仅有韩德勤部，同时，苏北地处陇海路以南、运河以东、大海以西，毗邻山东，在战略上可与八路军互为依托，相互策应，有利于我军在华中地区的发展。据此，中原局会议确定向东发展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刘少奇一并向中共中央提出八路军一部南下，江南新四军主力北上，大力发展苏北的战略建议。

194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刘少奇关于全力发展苏北的意见。13日，刘少奇又向中共中央和项英提出进军苏北的具体建议，但项英



对此却不同意。1940 年 1 月 14 日，项英致电中央军委，认为华中南部各省在政治与群众基础上均有利于我，在战略上发展北部必须有南部配合，因此中原局和刘少奇要求皖南部队北渡不仅是困难的，而且是危险的，应按战略要求努力发展与增强皖浙赣等地的工作。为说服项英接受向东向北发展的方针，中共中央于 1 月 19 日致电项英，指出：新四军向东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时又取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华中是我目前最好发展的地区，在蒋介石尚来公开投降和继续抗日反共的形势下，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应在现地力求发展。

1940 年春，针对国民党政府企图把八路军、新四军纳人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军防区的险恶用心，中共中央作出八路军一部分主力南下，新四军一部分主力北上，控制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地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打开华中抗战局面的战略部署。为使项英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1940 年 5 月 4 日，毛泽东起草了发给东南局的关于《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重要指示（又称“五四指示”），强调指出：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不论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不论在江北或江南，不论在平原地区、山岳地区或油田地区，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决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同时明确指出，对国民党顽固派必须实行针锋相对的政策，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振奋精神，发扬勇气，团结干部，扩大力量，巩固党和军队，才能争取团结中间派。[②]

1940 年 5 月 5 日，中共中央致电八路军领导人指出：“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在可能全国性的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不入中原，故华中是我最重要的生命线。”[③]6 月上旬，国民党顽固派要求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统统撤往黄河以北，企图将我军全部挤出华中地区，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即刻电令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迅速南下，协同新四军发展与巩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八路军总部令第二纵队政治委员黄克诚率领第三百四十四旅、新编第二旅共 5 个团 1.2 万余人，于 6 月下旬抵达豫皖苏边区，与新四军第

六支队会合。根据中央军委6月27日的指示，上述两支部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活动于津浦路以西、陇海路以南，以对日寇作战，巩固豫皖根据地，扩大与整训部队为中心任务。”之后不久，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也越过陇海铁路抵达泗县。根据苏皖地区的斗争形势，刘少奇提出了“向东发展，向西防御”的战略指导方针，希望在大体解决苏北问题后，再进一步向西解决皖东、皖北的问题。为了实现该战略方针，黄克诚率一部到皖东北，协助巩固与扩大根据地，做好了东进苏北的准备。同年8月，留在豫皖苏边区的部队重新进行了整编，由八路军第三百四十四旅（无六百八十七团）与第六支队（无第四总队）整编为第四、第五、第六旅及直属队，由彭雪枫任整编后的第四纵队的司令员兼政委，张震任参谋长，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共9个团，计1.7万余人。随后，刘少奇电令黄克诚率部东进皖东北，研究苏皖地区我军各部队的统一编制、统一指挥问题。遂决定将淮河以北、津浦路以东所有我党领导的武装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第五纵队下辖三个支队，每个支队辖三个大队（团），共两万余人。第一支队由苏鲁豫支队编成，由彭明治任支队司令员；第二支队由新二旅之五团、六团和三百四十四旅之六百八十七团编成，支队司令员田守尧；第三支队由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和新四军第六支队之第四总队编成，支队司令员张爱萍。

部队的整编工作结束后，黄克诚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八路军到华中后，坚决争取控制全苏北”的指示，随即着手部署开辟苏北地区的工作。第五纵队第一支队已于8月初渡过运河，先期进入淮海区，进占沭阳、淮阴地区；9月，在高沟、杨口地区粉碎日伪军两次扫荡，开辟了淮海区的抗日局面。随后，第二支队第四团及第三支队也相继挺进淮海、盐阜地区，建立了沭阳、泗阳、宿迁、淮阴、涟水、东海等县抗日民主政权，地方武装亦发展到4 000余人，初步开辟了淮海抗日根据地。而第五纵队的第二支队主力，则留在皖东北坚持斗争，并配合新四军第五支队开辟了淮（安）宝（应）地区，沟通与皖东地区的联系，粉碎了日军对淮南津浦路东的扫荡，攻克淮河北岸小柳巷伪军据点，并乘胜渡河南进，直逼津浦路上的明光车站。随后，该支队又在淮河北岸双沟一带击退敌千余人的进攻，坚持了皖东北地区，保持了与皖东区、淮海区的联系。



与此同时，陈毅根据中共中央的“五四指示”，立即调集主力，部署渡江北上，执行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就在在江南指挥部准备渡江北上时，江北的形势发生了变化。盘踞于苏北泰州地区的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军李明扬、李长江两部，在韩德勤的挑拨、拉拢与威胁下，由中立转向军事反共。新四军挺进纵队（无第四团）在郭村打响了自卫战，为新四军东进黄桥，打开苏北敌后抗战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1940 年 7 月，陈毅、粟裕率部分新四军主力北渡长江后，将先期北上的部队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合编成立第一、第二、第三纵队，改称苏北指挥部，并进驻黄桥地区。韩德勤趁我军立足未稳，调集重兵准备南犯，企图将我军在黄桥一带彻底消灭。面对韩德勤重兵来犯的局势，苏北指挥部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决定采取严守自卫立场，以退为进，后发制人的方针，以表明我团结抗战的真诚愿望。然韩德勤部仍旧步步进逼，企图将我军压缩在沿江狭小地区，尔后勾结伪军进行夹击。陈毅将战事不可避免之态势报告于中共中央，并请求 4、5 支队及八路军南进支队的增援。10 月 4 日，中共中央就此发出指示：“韩德勤又大举压迫我军……八路军不能坐视。”“黄克诚部主力决心于本月四日开始行动，南下阜宁，并拟向盐城挺进，增援陈毅”。“我们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④遵照中央指示和陈毅同志电令，黄克诚于 10 月 4 日率八路军第五纵队主力兼程南下，突破了国民党的盐河、旧黄河等防线，在战略上对进攻黄桥的韩德勤部造成南北夹击之势。仅六天时间，新四军即取得黄桥决战的胜利。

1940 年 10 月 10 日，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第一团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 2 纵第二团在白驹镇狮子口胜利会师，完成了打通华北、华中联系的通道和打开苏北抗战局面的任务，粉碎了国民党妄图把我军限死在黄河以北的阴谋，为确立我党我军在华中敌后抗战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标志着人民军队开辟苏北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基本完成。而苏北根据地的开辟，是实现中共中央“发展华中”战略目标的关键一环，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而且对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乃至在解放战争初期确立有利的战略态势都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注释：

①②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卷抗日战争时期》，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221页，第221页。

③《华中是重要的生命线，黄克诚部和彭吴支队应趁目前时机南下，配合华中各部建立抗日根据地——毛、王致彭、黄、陈，罗、彭、胡》，1940年5月6日，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苏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第34页。

④黄克诚：《黄克诚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341页。



华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1938年秋，日本侵略军为了切断中国海上对外联络线，封锁华南海口，阻止国际对中国的援助，以达到其速战速决占领全中国的目的，悍然调集三个师团、一个飞行团，在海军支援下，于10月12日以主力在惠阳大亚湾登陆，沿坪山（今惠东）、惠阳、博罗、增城向广州突进；另派一部溯珠江而上，配合主力夺取广州。当时，在广州一带的国民党守军约五万人，与日军交锋仅仅10天便溃不成军，纷纷撤退。10月21日，广州沦陷。广州失陷后，国民党军退守清远、新丰一线与日军对峙，广州外围和广（州）、九（龙）铁路两侧地区相继被日军占领。1939年2月10日，日军在海南岛登陆，进犯文昌、安定等地；6月，以万余兵力入侵潮汕，21日侵占汕头。从此，广州，汕头等大片华南国土陷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直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

中共中央对于开展华南地区的抗日斗争十分重视。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便派遣廖承志、潘汉年和张云逸到香港、广州组建了八路军办事处，同时，又指派张文彬到广东改组临时南委，正式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指导和帮助广东各级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为在广东地区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打下了基础。1938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撤销，成立了以张文彬为书记的中共广东省委。省委在广东一边大力发展党组织，一边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把工作的重点从城市转向农村。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广东地区的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到1938年10月，中共广东省委领导的党员已有万余名，其中海南岛地区有5 000名，广州、香港地区有2 500名、潮梅地区有2 000余人，其他各地有几百名。[①]在日军于广东登陆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电示广东省委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在东江敌占区开拓游击区”。11月1日，中共中央又致电广东省委：“广州沦陷后，广东党组织必须在广州及其他敌人占领的地区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在东江、海陆丰等地建立抗日根据地，并利用政府的命令到处组织自卫军，发展人民抗日武装。”根据华南地区的形势，中共广东省委于1939年1月召开了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会上，张文彬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根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战略方针，确定广东地区党组织的基本方针和任务是：动员组织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在长期的抗战中发展力量，使党逐步成为在华南地区最后战胜日寇的决定因素，同时决定以东江、珠江三角洲和海南岛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重点地区。

地处珠江江口的东江地区，包括东莞、惠阳、宝安、增城、博罗等县，广（州）九（龙）铁路纵贯其中，是日军从海上登陆广州、侵犯华南的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军占领这一地区，就能控制广九铁路，封锁珠江口，切断中国南方海上的主要交通线。10月13日，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广东省委要在东江日军占领地区后方开辟游击区。根据这一指示，省委委员、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会同东南特委和香港海员工委，派香港海员工委书记曾生等带领一批共产党员和抗日青年到惠阳县坪山圩，成立中共惠（阳）宝（安）工作委员会，领导组建抗日武装，开辟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12月2日，惠（阳）宝（安）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成立，曾生任总队长。总队成立后，于12月7日收复了惠阳县淡水镇，在这里成立了东江地区第一个抗日政权——惠阳县第二行政委员会，拉开了创建东江抗日根据地的序幕，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了条件。1939年1月，成立了东（莞）宝（安）惠（阳）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王作尧任大队长。以上两支抗日武装，成为东江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队伍。后为了取得合法的地位，曾生等与国民党在惠州的第四战区游击纵队指挥所取得联系，将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和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分别编为第四战区游击纵队指挥所第四游击挺进纵队直辖第二大队（简称第二大队）和第四战区游击纵队指挥所第5游击挺进纵队新编大队（以下简称新编大队）。改编后，部队虽接受国民党军的番号，但仍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在东江地区独立开展游击斗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和对敌斗争的胜利开展，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波及华南，广东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进一步加剧。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于5月8日致电廖承志，指出：目前全国的形势是拖的局面，国民党不易整个投降．国共合作也不会轻易分裂，但也不易好转。我们必须大胆坚持敌

后游击战争，同时不怕摩擦，才能生存和发展。根据以上指示，第二大队和新编大队余部于8月上旬返回宝安县上下坪村。9月，中共东江特委和东江军事委员会在特委书记尹林平主持下，在上下坪村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央“5.8指示”，总结了5个月来的斗争和东移海陆丰的经验教训，确定了今后行动的方针是：第一，坚持在东、宝、惠地区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第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国民党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军事进攻，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第三，在组织上坚持独立自主，不受国民党的限制，在斗争中大胆发展壮大自己。[②]会议决定去掉国民党军队番号，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新编大队改为第三大队，队长曾生；第二大队改为第五大队，队长王作尧。尹林平兼两个大队政治委员，梁鸿钧任军事指挥。这次会议，使处在困境中的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转向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阶段。会后，第三大队70余人于10月初挺进东莞县大岭山客家洞地区，开辟大岭山抗日根据地；第五大队30余人在宝安县阳台山创建抗日根据地，打下了东江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珠江三角洲的番禺、顺镕、南海、中山等县位于广州外围。广州沦陷后，中国共产党在这些地区的组织立即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其中较有影响的是以吴勤为司令的“广州市郊游击第二支队”和中共南（海）、顺（德）工委负责人林锵云领导的游击队。吴勤在大革命时期为中共党员，后脱党，但与在广东公开活动的共产党领导人廖承志仍有联系。吴勤在广州失陷后的第二天，建立起了广东人民抗日义勇队。时任广州市市长曾养甫以西江八属总指挥名义，将广州市郊各县游击队编为七个游击支队，任命吴勤为第二支队司令。吴勤征得廖承志的同意，接受了委任，将部队编为广州市郊区游击第二支队（简称广游2支队）。后经过整编，广游2支队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部队，活动于顺德、番禺南部。顺德游击队是利用国民党挺进第三纵队部属的名义成立的。部队成立后，于1939年5月袭击驻守顺德县城的日军，因此在顺德地区颇有影响。除以上两支游击队外，1940年3月，中共中山县委从全县各区成立的自卫武装中挑选出一部分，以抗先队员为骨干，组成中山抗日游击队，欧初任队长。

为了加强对珠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1940年3月，中共中央指示广东省委，要求对曾生、吴勤等游击队加强领导，在精神和物质上给予支持援助，使他们尽可能扩大，帮助他们依托有利地形建立根据地。1940年

夏，广东省委对当地的党组织进行了整顿，将南顺工委改为中共南顺中心县委，健全了组织机构。廖承志还从香港选派了一些党员干部到珠江三角洲开展工作。南顺中心县委成立后，决定以顺德县城附近的西海村为基地，建立西海抗日根据地。同时，在军事上，广东省委将林锵云领导的顺德游击队编为广游2支队独立第一中队，作为第二支队的骨干充实部队的力量。1940年10月，广游2支队独立第一中队进驻西海，成立了广游2支队司令部。同年冬，为加强党的领导，在西海成立了南番顺抗日自治委员会，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发动各界群众共同抗日。1941年春，广游2支队在西海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西海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成为珠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基地。

海南岛地处中国南疆，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这里组建了中共琼崖特委。抗日战争爆发后，琼崖特委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国民党当局经过一年多的谈判，达成了团结抗日的协议，并于1938年12月5日在琼山县云龙圩将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简称独立队），由冯白驹任队长。改编时约300人，编为三个中队。1939年3月，为了适应部队迅速发展的形势，独立队改称独立总队，仍旧由冯白驹出任总队长，下编三个大队。独立总队成立后，立即将部队分到各地开展游击战争，开辟创建根据地。中共琼崖特委和总队部根据敌人占领重要城镇、港口和交通要道的特点，将第一、第二大队部署在琼山、文昌地区，将第三大队部署在澄迈、临高、儋县、昌江、感恩地区。从1939年2月至年底，第一、第二大队在琼文地区作战70余次，歼日军800余人，开辟了琼文抗日根据地。

1940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指示琼崖特委："冯白驹与琼崖特委应以全岛为对象，扩大发展党，发展武装，发展民运，设法争取各县政权，不顾国民党的任何阻碍，坚决组织全岛人民的抗日战争。""要把琼岛创造为争取九百万南洋华侨的中心根据地，创造为党在南方发展扩大影响的根据地，创造为培养干部的根据地"。[③]中央的指示，指明了海南岛抗日根据地发展的方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39年1月下旬，中共琼崖特委及总队领导机关率特务大队向纱帽岭地区转移。2月中旬，转移部队抵达美合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1940年11月7日，海南岛的国民党军队进一步制造摩擦，集中3 000余人向美合抗日根据地发起进攻。琼崖特委一边积极准备保卫根据地的战斗，一边将情况报告中共中央。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对琼崖工



作的指示》，要求动员一切抗日力量，给反共顽固派武装反共行为以坚决的打击。23 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冯白驹："顽军有向你们进攻可能，你们应从军事上政治上加紧准备粉碎其进攻，其方法是待其进攻时集中主力，打其一部，各个击破之。"④12 月 15 日，国民党军队向琼崖特委和独立总队部所在的美合村分五路包围，发起总攻。独立总队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出美合，向琼山、文昌地区转移，于 1941 年 1 月进至琼山县树德乡。3 月，国民党军保安第七团再次向独立总队发动进攻，独立总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坚决实行自卫反击；6 月，独立总队又粉碎顽军 3 000 余人对琼山文昌根据地的进攻。此后，第一、第二支队向琼山县甲子乡挺进，继续巩固和扩大琼文根据地。到 1941 年底，海南岛上已建立起文昌、琼山、琼东、乐万、澄迈、临高、昌江等县抗日民主政府。琼崖抗日根据地已经建立起来，并在抗日反顽的斗争中逐步巩固、发展。

华南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打退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多次进攻，创建了东江地区珠江三角洲和琼崖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华南敌后战场，为坚持抗日战争，壮大人民革命力量，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以至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胜利，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 1944 年 7 月中共中央军委给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的贺电中指出："你们在华南沦陷区组织和发展了敌后抗战的人民军队和民主政权，至今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的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为坚持敌后抗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田酉如著：《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北京出版社，1995 年 07 月第 1 版，第 296 页。

②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卷抗日战争时期》，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年 7 月版，第 246 页。

③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 年 12 月版，第 266～267 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 228 页。

日本召开“五相会议”调整对华政策“远东慕尼黑阴谋”

徐州会战后，日本虽然取得了局部胜利，但却远非日军所期望的那样，获得“速战速胜”战略的成功。徐州会战不仅没有使中国政府屈服，相反，却使日军本身的实力被进一步消耗，其在华北的兵力大为减弱，迫使日本政府的侵华战略从“速胜”向持久战的方向转化。另外，这次会战也导致日本内部早已产生的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所有的形势都逼迫着近卫内阁，促使它考虑调整对华政策。

1938 年 5 月，近卫决定改组内阁，由主张协调对英美关系和更加注重诱降政策的预备役大将宇垣一成出任外相，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出任陆相。26 日，近卫公开发表了加强内阁的意见，期望通过改组来加强内阁的领导权。6 月 10 日，又正式设立了能够决定国家重大决策的五相会议制度。[①]改组后的近卫内阁，重新对国民党政府伸出诱降触角。6 月 23 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认为攻占徐州之后，结束战争的“前途尚辽辽”，当务之急是“确立官民一体长期持久战之战时体队以对应时局”，并提出了十项加强国防、维持国民经济之措施。第二天，五相会议作出了两项尽早结束事变的方针：“一、集中国力解决中国事变，大概于本年内达到战争的目的为前提，使对内对外各种措施一切适应于此。二、第三国的友好调停，不妨根据条件予以接受。”[②]

在当时的近卫内阁看来，只有国民政府停止抗日活动，侵华战争才可以顺利结束。因此，近卫内阁将对付国民政府的策略放到了对华新政策的首位。7 月 8 日，五相会议就国民政府是否屈服的两种情况，决定了《中国现中央政府屈服时的对策》与《中国现中央政府不屈服时的对策》两套决策方案。《中国现中央政府屈服时的对策》中对国民政府是否屈服列出了四项具体判断标准：“一、合并或参加建立新中央政权；二、与上述情况相配

合，旧国民政府改变名称或改组；三、放弃抗日容共政策，采用亲日满与反共政策；四、蒋介石下野。”[③]国民党政府只要接受上述条件，日本就“承认其为一个友好政权”，并以其为“对手”，否则“不谈停战等问题”。而根据《中国现中央政府不屈服时的对策》，如若国民政府不屈服，日本将集中国力，“以作战、内政、外交、经济、策略、宣传等国家的一切努力”，“占领足以控制中国大局的重要地区”，促使中国政府“自行崩溃或放弃继续作战的意志”。同时，加强政治攻势，扶植亲日反共势力，促使抗日阵营内部瓦解。当“占领重要地区后，中国现在的中央政府仍不投降时，帝国今后不用直接急于以武力解决事变，主要运用政略和策略，更加促进新中央政权的扩大和加强。同时，在政治、外交、经济和思想上，逐渐压迫中国现在的中央政府，促使中国现在的中央政府毁灭。”[④]这一对策的基本精神，虽与以前制订的灭亡中国的政策相一致，但不再以军事进攻作为灭亡中国的唯一手段，同时也开始注重于政治攻势，以促使国民政府自行灭亡。

上述两项对策是日本政府企图在年内结束对华战争的具体步骤。它反映了近卫内阁期望通过国民政府的屈服以及早结束对华战事的迫切心情。为了加强对国民政府的压迫措施，促使其及早投降，1938 年 7 月 12 日，五相会议作出《关于适应时局之对华策略的决定》，以“使敌人丧失抗战能力，并推翻支那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为总方针，企图从五个方面来分化和压迫国民政府：“（一）起用支那的第一流人物，削弱支那现中央政府和支那民众的抗战意识，同时酝酿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的趋势。（二）促进对杂牌军的拉拢归顺工作，设法分化削弱敌人的战斗力。（三）利用和操纵反蒋系统的实力派，促使在敌人中间建立反蒋、反共、反战的政府。（四）推进回教工作，在西北地方划定由回教徒形成的防共地区。（五）设法造成法币的崩溃，获取支那在国外的资金，从而在财政上使支那现中央政府自行垮台。”[⑤]这些谋略方案，是日本政府对蒋政权政治攻势方针的具体化，是日本下阶段侵华政策的总原则。

7 月 15 日，五相会议制订了《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决定在攻占武汉以后，立即着手建立“新中央政府”。在《方针》中，日本对这个“新中央政府”寄予极大的希望，希望使它“不限于只成为处理这次事变的中国方面当事人，并使它成为解决日、华两国过去因各种矛盾失和，而确立从大处着眼的善邻基础的中国政府”。而这个新政府的建立，“主要使中国方面执行，而帝国则在内部从中斡旋。其政治形态采用分治合作的原

则。”[⑥]然而建立一个傀儡政权仅仅是日本侵华战略中的一环，充分利用这个政权为日本的侵略利益服务，才是近卫内阁的根本目的。在确定上述方针四天之后，7月19日，五相会议又炮制了一份《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纲》，从军事、政治、外交、经济、交通、文化、宗教与教育等各个方面，对这个未来的政权提出了具体要求，企图采取“收揽人心”、“恩威并施”等各种手段，来实现日本的国防国策。[⑦]这种以表面独立，实际上却完全由日本一手控制的傀儡政权来统治中国的政策，成为日本从战略进攻向战略相持阶段转变过程中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方针。

从以上五相会议制定的一系列详尽的对华政策中可以看出，近卫内阁已经认识到，期望早日达到解决中国事变的希望是不大的，因为在日本国内外都出现了战争将长期持久的趋势。因此，与最初以军事进攻为主的“速战速决”方针不同，自此以后，政治诱降成为日本对华政策的主要部分。然而近卫内阁对华政策的变化并未对日本因侵华战争长期化而导致的内外危机的加深和内部矛盾的激化起到丝毫的缓解作用，1939年1月，近卫内阁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被迫下台。继任的平沼内阁继续执行前任的对华政策，进一步诱降国民党政权，但仍无力结束战事。处于困境的日军贸贸然发动的侵苏行动，在诺门坎遭到了惨败。8月28日，平沼内阁下台。新上台的阿部信行进而调整了对华政策，在9月13日发表的政纲中明确提出：“政策的核心在于处理中国事变……以期实现日中的新关系”。[⑧]此时的日本，想乘欧洲局势的突然变化，暂时缓和同美、英、苏的关系，集中力量结束侵华战争，实现独霸中国的目标。而由此种态度，便衍生出了英美等国对华的“远东慕尼黑阴谋”。

应该说，自抗战以来，英美的远东政策就带有绥靖色彩。美国政府基本采取所谓的“孤立主义”，在“中立”和“不干涉”的政策下，对日本的对华侵略采取纵容态度。而英国政府虽然在口头上对中国的抗战表示同情，并于1939年3月提供给中国500万英镑的借款，但其基本倾向仍然是与日妥协。早在1938年6月，因日本进攻武汉、广州给英国的利益造成巨大损害，英日矛盾逐渐尖锐化，于是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与日本外相宇垣进行了谈判。然而英国此时仍没有与日本抗衡的打算，而是在会谈时提出，如果日中双方愿意，英国可以出面对日中冲突进行调停。

自从1938年9月英、法、德签订慕尼黑协定以后，英美就积极地开展外交活动，筹划远东慕尼黑阴谋，企图通过对日让步，以牺牲中华民族的根



本利益，破坏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为代价，换取其在中国和亚洲的权益。1938 年底到 1939 年上半年，英国驻华大使卡尔频繁奔波于上海、重庆之间，多次同蒋介石密谈，劝说国民党政府同日本进行和谈。1939 年，英美通过报纸大量散布关于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以“和平解决远东冲突”的论调。

日本政府鉴于英美等国的态度，在推行以军事为后盾的强硬外交中更加有恃无恐。在 1939 年 1 月 19 日召开的五相会议中，围绕着日德军事同盟问题，作出以下决议：“以苏联为主要的敌对国，必要时也可以把英法当做敌对国，但这种情况下是否进行武力援助，必须根据情况来决定。关于这个同盟的缔约，对外只说是防共协定的延长。”正是由于这一背景，华北日军于 6 月 14 日开始封锁天津英法租界，爆发反英运动。针对于此，延安《新中华报》社论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反英运动的本质是“诱惑英国出面进行所谓调停中日战争，经过英法各国，来压迫中国政府赞成‘远东慕尼黑’会议的召开；压迫英法各国，来诱导中国向敌投降，这是敌今天封锁英法租界的症结所在。”[⑨]果不其然，1939 年 7 月 15 日，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与日本外相有田在东京开始谈判。22 日，双方签订《有田——克莱琪协定》。24 日，英国政府公开声明：“英国政府完全承认正在大规模战争状态下之中国实际局势，在此局势继续存在之时，英国知悉在华日军保障其自身安全与维持其统治区治安之目的，应有特殊之要求；同时知悉凡有阻止日军或有利日军敌人之行动与因素，日军均不得不予制止或消灭之；凡有妨害日军达到上述目的之行动，英国政府均无赞助。英国政府将就此时机，对在华之英当局及英侨说明此意，令勿采取此项行动与措施，以证实英国在此方面所取之政策。”[⑩]这一协定是英国牺牲中国主权与日本妥协的产物，是英国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的重要表现。

欧战爆发以后，英国政府已无力更多地顾及远东，因而更希望对日妥协，以保护其在远东的利益。1939 年 9 月 7 日，英国副外交大臣巴特勒在下院发表演说表示愿意与日本恢复谈判，并且训令驻日大使恢复谈判。会谈结果，英国在上海公共租界问题做出了让步，并撤退了大部分驻华的英国军队。法国也采取了与英国相同的步调。美国也不甘寂寞，1941 年的每日密谈堪称是“远东慕尼黑阴谋”活动中一次最大的肮脏交易。1941 年 2 月 17 日，罗斯福总统亲自接见日本驻美大使，表示了两国改善关系的愿望。他说：“太平洋上有的是地方，大家都能发展”，罗斯福的意思非常明显，即

日本只要不影响美国利益，可以在中国及广大太平洋地区任意扩张，美国政府也不会反对。4 月 8 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又向日本提出一个“美日谅解方案”，其中有关中国问题的内容大大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和主权，如承认“满洲国”、恢复“门户开放原则”以及承认汪、蒋两个政权的合法性并使之合并等。面对日美勾结的严重局势，中共中央发表严正声明，指出这是一个“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11]尽管在这次密谈中，美国已大大满足了日本的欲望和要求，但最后仍未达成一致。因为此时的日本，已与德、意结成法西斯军事同盟，加之德国“胜利进军”形势的鼓励，遂决定单独采取南进政策。

1941 年 12 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的“远东慕尼黑阴谋”最终宣告破产。

英美帝国主义的“远东慕尼黑阴谋”给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远东慕尼黑阴谋”和英美对国民政府的劝降活动，是一度造成中国抗战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引起了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对日态度上的严重动摇，助长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反共、妥协倾向的发展。蒋介石甚至表示欢迎“远东国际会议”的召开，认为其是有益于中国的，是“复兴中国的步骤”。幸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号召之下，中国人民坚持了长期的抗战，并在内部存在着斗争和对立的情况下，保持了全民族的抗日斗争，最终促使了“远东慕尼黑阴谋”的破产。

注释：

①③（日）堀场一雄：《中日事变战争指导史》，原书房，1937 年版，第 166 页，第 173 页。

②⑦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 269 页，第 272 页。

④《日本外务省档案》IMT357 号：S491 号（微缩胶卷）。转引自黄美真、张云编，《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 2 月第 1 版，第 88 页。

⑤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 231～232 页。

⑥《日本外务省档案》IMT357 号：S491 号（微缩胶卷）。转引自黄美真、张云编，《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2 月第 1 版，第 90 页。

⑧（日）小山弘健，浅田光辉：《日本帝国主义史》，三联书店，1961 年版，第 175 页。

⑨何理：《抗日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 7 月版，第 147 页。

⑩《群众杂志》第 3 卷第 12 期，第 324 页。

⑪《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1941 年 5 月 25 日，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66 年 9 月版，第 762 页。

国民党南岳军事会议

武汉会战后，日军对华军事攻势已达到极点。面对优势装备的日军进攻，在片面抗战路线指引下的国民党军队实行消极防御的战略，节节抵抗，结果全线溃退，军事上陷于被动。与此相反，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经整编后迅速开赴敌后战场，广泛发动游击战，敌后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这不但给日军后方造成巨大威胁，迫使日军转移军事重心，抽身正面战场，也使国民党方面对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游击战争刮目相看，重新审视。

为适应新的战争形势，国民党于1938年11月、1939年10月、1941年11月、1944年2月先后在湖南南岳召开了四次军事会议，其中尤以1938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最为重要、意义最为重大。它不仅检讨了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胜败得失及其经验教训，而且制订了国民党第二期抗战的战略方针，对国民党第二期抗战乃至整个抗战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一般意义所言的南岳军事会议，即指1938年11月第一次召开的南岳会议。

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为及时调整抗战的战略部署，蒋介石在南岳主持召开军事会议。除军委会主要委员外，第3、第9战区的总司令、军团长、军长、师长等一百余人出席，中共中央的代表周恩来和叶剑英也应邀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是为了检讨第一期抗战得失，指示第二期抗战方针，提出“整军建军”方案，重新划分战区，调整指挥系统。

在会议期间，蒋介石共作了五次训词。25日的开幕式上，他修正了过去南京失守为第一期，徐州撤退为第二期，保守武汉为第三期的抗战时期划分，阐述了他对抗战全过程重新认识的基本构想，提出了将中日战争划分为第一第二两个时期的理论。他依照这次抗战预定的战略和政略，划分武汉撤退、岳阳失守前的抗战为第一期，之后的抗战为第二期。“在第一期战斗过程中，从军事上说，我们虽然失了许多土地，死伤了许多同胞，就一时的进退看，表面上我们是失败了，但从整个长期的战局上说，在精神上我们不但



没有失败而且是完全成功……今后他（日军）再不能有更多的兵力使用到中国来，而且他已经派到中国境内这许多部队，随战区之扩大而力量分散，且已疲敝不堪，没有什么大的战斗力量。……我们过去虽遭受了挫失，但我们的挫失，客观上也只是到此限度为止，从今以后，由于作战经验的增加，战略部署的完成以及军费的增加和敌我实力消长士气盛衰的对比，我们胜利的把握和信心，一天一天提高起来……这也就是证明敌人今后决不能消灭我们的军队，亦就不能消灭我们的国家，反之，我们的力量，最后一定可以打破敌人，消灭敌人，以求得我们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复兴。……第二期抗战，就是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①]同时，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蒋介石对今后的战略方针也有所调整，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精神重于物质"、"训练重于作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②]的抗战方针，并希望各将领将以往抗战所得的经验和教训，尽量贡献出来，殚精竭虑，研究改进，形成具体方案，以便会后切实执行，完成抗战救国之使命。

在会议中，蒋介石听取了各部队首长及参谋长的作战经过报告及分析，并在总结中列举了中国军队的 12 个缺点，如"士兵逃亡不能防止；指挥所至，民众逃避，谎报军情，不负责任；指挥官能力缺乏；不能贯彻命令，不能达成任务；逃避命令，规避责任，自私自利，贪生怕死……"[③]等等。在蒋介石看来，这 12 大缺点就是国民党军队在初期抗战中失败的原因。这些缺点不仅影响国民党军队官兵的精神和士气，而且影响民众的精神和斗志，影响着国民兵役的前途。同时，蒋介石还特别提出克服缺点的 11 项措施："注重学习，提倡研究，整顿军纪军风，发扬官兵的企图心，建立彻底统一的国军"等 11 条事项。[④]他认为这 11 条措施，是克敌制胜的秘诀，要求各位高级将领依据各部实际情况精心运用，提高士气，收揽民心。此外，蒋介石指出，"敌军能勇往直前，不顾前后左右之攻击，有誓死达成任务的坚决精神；敌人富有研究能力与仿效性，对于情报之搜索分析，尤为擅长；敌军官兵有贯彻命令之精神与习惯……"[⑤]等九大优点，要特别分析，注意效仿，并提出了"废人利用、废物利用、废时利用、废地利用"的四句作战口号，要求贯彻到底。

此次会议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整理军队，建立军队"。[⑥]在会上，蒋介石进一步提出整顿改进军队的十项举措："第一，要注重学习、提倡研究过去战争失败和不能扩张战果的原因；第二，要整理各级指挥部与司令部，使

之健全改进；第三，要注意通讯联络，不使有一刻中断；第四，对于部队接防、移防的手续与监督的办法，应由军令部逐项具体规定，通令施行；第五，对于两个部队衔接地区与薄弱点，应有预防的办法；第六，全战区的各友军，应不分彼此，大家共同负起整饬军风纪的责任；第七，各部队长官应限期赶造战斗详报，如期呈核；第八，部队教育，应特别注重发扬官兵的企图心；第九，各部队要严明赏罚，部队经费应及早清算报销，明白公布；第十，充实完备各部队后方勤务所需的员兵，紧缩经费要求，充实力量要求，减低军官阶位，并打破分别彼此界域的落伍观念，建立彻底统一的国军。"⑦蒋介石还要求分三期轮流整训全国部队，每期整训4个月，一年之内全国军队整训完毕。即以全国现有部队的三分之一配备在游击区域——在敌军的后方担任游击，以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抽调三分之一到后方整顿。第一批整训完毕，仍调回前方作战或担任游击，换调第二批到后方整顿，每批整顿四个月，一年之内将全国军队全部整训完毕。

同时，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及新的战略方针的要求，会议对国民党的指挥系统做了新的调整，重新划分了战区，规定了各自所管辖的兵力和范围。调整后的部署为："一战区：豫北及皖北，司令长官卫立煌，辖12个步兵师，1个步兵旅，1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特种部队未列入，下同）；二战区：山西及陕西东北部，司令长官阎锡山，辖32个步兵师，14个步兵旅，5个骑兵师，3个骑兵旅；三战区：苏南、皖南、浙闽两省，司令长官顾祝同，辖22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四战区：两广，司令长官张发奎，辖18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五战区：鄂豫皖三省交界处，司令长官李宗仁，辖3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八战区：甘肃、宁夏、青海、绥远，司令长官朱绍良，辖6个步兵师，9个步兵旅，4个骑兵师，4个骑兵旅；九战区：赣西、鄂南及湖南，司令长宫陈诚（薛岳代理），辖52个步兵师；十战区：陕西，司令长官蒋鼎文，辖9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鲁苏战区：苏北及鲁南，司令长官于学忠，辖7个步兵师；冀察战区：河北及察哈尔，司令长官鹿钟麟，辖5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⑧会议还决定设立战地党政委员会，直属军事委员会，在各沦陷区设分会，负责战地党务与政务，发动群众对敌进行政治、文化斗争；并撤销广州、西安、重庆行营，设桂林、天水行营，以统一指挥南北战场作战。

此外，南岳会议还重新定位了游击战。在27日会上，蒋介石发布的《第二期抗战要旨》20条，其中一条即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南岳军事



会议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根据会议精神制定了《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具体要求："国民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之控制与扰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10]这一方针包含了三层意思：第一，正面战场"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即要求改变抗战初期以阵地战为主的单纯防御方针，以主力部队在正面战场上作"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这种攻势可谓是一种反"伺机进攻"，它在空间上只能是局部的，在时间上要把握有利战机，在获得一定战绩后仍应回到巩固防御上来。第二，"策应敌后之游击部队，加强对敌后方之控制，化敌人后方为前方"。在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敌后战场成为重要战场的形势下，国民党开始重视敌后战场和敌后游击战，决定采取"游击战术与正规战术并重"的方针，并特将敌后鲁苏与冀察两地划为游击战区，统一指挥该地区的正规部队与游击部队。第三，"抽调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国民党军队经过第一、二期整训，部队战斗力确有所恢复和提高，从而为 1939 年的"冬季攻势"准备了条件。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这一举措确也包含着国民党有意让共产党军队同大量日军作战，借以限制、削弱中共力量的企图。

南岳会议正处于由防御向持久抗战阶段转变的过渡时期，会议所提出的方针和形成的决议，对整个抗日战争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岳军事会议提出的第二期对日战争战略决策，标志着国民政府完成了从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阶段的过渡。国民政府及时抓住战略形势的转化，分析了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之后敌人的不利形势和抗战的有利条件，号召全国将士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继续坚持奋战，极大地促进了全国军民的抗战斗志。特别是经过这次战略调整和规划，国民政府在敌占区的游击战争发展到最高潮，其敌后游击部队成为一支重要的牵制和打击敌军的抗战力量。

然而不幸的是，在执行过程中，这些方针政策并未能贯彻始终，自然也不能改变国民党在军事上的被动局面，相反，在国民党反共倾向逐步加剧的情况下，第二期抗战方针的内容发生了质的变化。国民党军队在整训结束后并未都按计划投入正面战场或敌后游击区而是把大量装备精良，战斗力强的部队置于远离抗日战场的大西南大西北，名为整训，实则保存实力，被派往敌后作战的部队逐渐成为与中共抗日武装摩擦的主力，与共产党争地盘，袭击共产党军队。这就走上了一条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之路，整训部队成了保存

实力、消极避战的代名词。

综上所述，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从总体上考察还是比较积极和进步的，应该给予肯定。但是由于国民政府既定的片面抗战路线不变，又只采取消极防御的办法，虽也提出了依靠民众发动民众的口号，但又未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因此随着形势的继续变化，两个月后国民党即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限共、防共、溶共”方针，南岳会议所制订的较为积极的军事方针在执行过程中逐渐偏离预定轨道，完全丧失了原有的进步性。

注释：

①蒋介石：《第一次南岳军事会开幕训词》，《总统蒋介石思想言论总集》第15卷，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485—487页。

②⑤⑥⑦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172页，第1190页，第1195页，第1184—189页。

③王桧林：《中国现代史》（上），北京：高教出版社，1989年版，第347页。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二十四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3页。

⑧蒋纬国总编著：《抗日御侮》第6卷，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3—4页。

⑨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页。

⑩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1)，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印，1981年版，第568页。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反共方针

1939年1月21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重庆开幕。在本次会议上，国民党方面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通过了“整理党务”的决议案，并设立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次会议的召开，是抗战时期国民党改变政策，逐渐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的重要标志，是其对内对外政策向退步、消极方面具体转化的体现。

在五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前，国际国内形势悄然发生着变化。日本的国内危机以及在中国战场遭遇的抵抗，使其兵力明显不足，不得不放慢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决定对华处理的总方针是“以攻占汉口、广州为行使武力时期，今后自主指导新中国建设，切戒急躁。为此，目前应以恢复治安为根本，其他各项施策都应与此相适应。消灭残存抗日势力的工作，虽然继续进行，但主要应以武力为背景，结合运用谋略，攻略。”[①]这说明日本的政策重心已经由军事战略转向政治谋略，对国民党的态度也由原来的军事打击为主，转而成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企图在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压迫下，通过政治外交，解决“中国事变”。由此，也就标志着抗日战争已经由战略防御阶段转而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这便使蒋介石可以暂时从抗日事务中脱身出来，思考当下的国内形势，也由此而得出结论：“目前急患不在敌寇”，而在于“共产党之到处企图发展”。

由此可见，五届五中全会上反共方针的制定并不是一时兴起而为之，恰恰相反，这个“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是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深思熟虑才诞生的。早在五届三中全会上，国民党内对于中共的嫌隙便暴露无遗。其中通过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中提出：中共极力促成的国共合作是“于穷蹙边隅之余，倡输诚受命之说”，所以国民党内的许多将领

一再提醒蒋介石，对共产党不应不防，甚至要求恢复原来的剿共政策。这种对中共的敌视心态在国民党将领与蒋介石往来的电文中也体现得很明显。在他们眼中，中共的行动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在将来能取国民党而代之。陈诚在1937年2月15日给蒋介石的电文中就认为："今日赤匪之要求，为目前计，固不能不虚与委蛇，但考其要求之用意，仍非出自诚心，不过假借特区名义，名正言顺，整顿充实，一俟坐大，伺机反噬，亦即所谓'不战而屈我'阴谋，手段原自高人一等。"他要求"当以八九年来一贯之国策为重，而以苟求一时表面之安定为轻"。[②]而蒋介石本人也在1938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回顾这一年时写道："共党乘机扩张势力，实为内在之殷忧"。在此类情绪的影响之下，国民党内的防共反共政策开始初露端倪。1938年11月29日，国民党军委会开谈话会讨论的四个问题中有两个就与中共有关，其一为冀察战区苏鲁战区等人选，一为八路军游击区域问题。[③]1939年1月8日召开的行营防空会议，提出要"取消晋冀察边区行政组织"，当时已有"今察冀已有主席应即取消"的决议。[④]实际上，自1938年冬起，国民党的反共限共活动就不断加剧，在国统区内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国民党在敌后成立鲁苏和冀察两个战区司令部，增派一些部队和游击武装到敌后，虽名为牵制日军，实际上主要是限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

在此背景之下，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于重庆召开了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此次会议共开预备会一次，大会七次。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共155人。蒋介石在会上致开幕词，并做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报告和《整顿党务之要点》的演讲。会议通过了《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对于军事报告之决议案》、《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大纲案》等决议案，以及《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宣言》。

在开幕词里，蒋介石就为五届五中全会定下了主旨，就是要"整理党务"和研究"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他提出，以后之奋斗"实为决定我民族存亡兴替之关键"，故要"爰就内外事实，详悉检讨"，"举凡前方、后方，尤其在被占区域或邻近战区之军民，一切思想行动，苟不能严加反省，严加检举，严加改正——而我民族亦将不免于覆亡"，因此，他要求要"在最高统帅领导之下，绝无保留，绝无犹豫，勇往迈进"。[⑤]蒋介石在党务报告中批评了国民党内部的"惰性"、"虚伪"、"散漫"、"迟滞"等不良习气，提出要以"三民主义党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与"智仁勇"的



"党德"来强化国民党的基础，因为近来抗战形势日趋有利，国家危险已经过去，国民党的使命却日益艰巨，"华北各地共产党的竟起"，使国民党处于艰险的环境中，长期下去，将会出现党国消亡的结局。"到了现在，本党差不多是奄奄一息，沉寂无声，一般民众不仅对党无信仰，而且表示蔑视"，"我们现在要振兴本党，领导革命，第一根本要务，就是要树立党基，巩固党基"，以"恢复党誉"。⑥在会议通过的《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蒋介石亦明确表示："吾人既深切明瞭今后责任之重大，即须使本党之基础更加稳固，而本党之基础实建立于党魂、党德、党史与党纪之上。凡我同志应首先坚定其信仰，振奋其志气，发皇党魂，砥砺党德，光大党史，维护党纪，以充实凝固本党之精神。"⑦而对于中共的态度，蒋介石指出："对中共是要斗争的"，"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大会通过的党务问题决议案提出："今后本党应力求在乡村社会力量之发展。过去本党组织仅偏重城市而忽略乡村，致广大之农民群众易为异说所乘；""今后本党应着重革命理论之宣传与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从流布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后方，尤应特别注意。"⑧

由此，五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处理国共关系的问题上，明确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1 月 28 日，大会通过了《拟请通饬全国举行"国民抗敌公约"案》。在该案中，全国人民均要举行"国民抗敌宣誓"，"服从最高领袖蒋委员长之领导，尽心尽力，报效国家"。宣誓人"并代表全家宣誓遵守抗敌公约"，"如有违背，甘受政府最严厉的处罚与民众的裁判"。⑨这实际上是以抗战为名，强迫全体国民对蒋介石的宣誓效忠，通过对全民的控制，从而达到遏制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发展的燎原之势。此外，会议还决定设立专门的反共机构——"防共委员会"，以加强与共产党做积极的斗争。随后，国民党又陆续制定和秘密颁行《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共的纲领性文件。其中，由蒋介石亲自提议并在会议上获得通过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明令限制共产党的第一个具体的纲领性文件。该办法称："共产党在本党权利所及之区犹能猖獗活动长足发展，考其原因虽非一端。而本党组织工作之不健全而予人以可乘之机实为主要因素。目前共产党控制下之陕北，彼能无论男女老幼悉纳于各种组织中，而由该党分子予以切实之领导与控制，遂造成今日形同铁桶之陕北特区，不但外人不易轻入，即入亦难立足，更无论有所活动。"⑩遂要求加强保甲编制，使每一保甲长均能兼尽政治警察之任务，并能

领导所属人民一致防制异党之活动；在异党活动最烈之地区，应实行联保连坐法，使人民不敢受异党分子利用；对假借共产党或八路军与新四军等名义擅自组织武装队伍者，当地驻军得随时派兵解散；如发现有宣传阶级斗争，鼓动抗租、抗税、罢工、罢课、破坏保甲扰乱治安者，无论其假借任何名义，应一律依法制裁；规定各地党部密饬全体党员，注意以启迪其警觉性，并饬令经常调查异党之组织活动情形报告党部，以作随时应付之根据。该办法颁布后，国内政治局势顿时恶化起来，对此，毛泽东认为，《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是破坏团结的种种罪恶行为的根源"，"《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11]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是国民党在抗日战争开始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这次会议确定了国民党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的内政和外交方针，表明国民党的政策重点开始由对外转向对内，由抗日转向反共。此后，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日益向着退步、消极和反动的方面转化。正如周恩来所说：（五届五中全会）"是一个帽子"，"有了这个帽子，底下就有了三次反共高潮"。[12]本次全会也成为抗战期间蒋介石对中共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转折点。在五届五中全会以及其后国民党的政策表明，国民党虽未决心消灭中共，但已然开始对中共的势力进行全面的削弱，严重地限制了中共的发展。如果说五届五中全会前国民党防共和限共只是在部分范围内，以零敲碎打、不系统的方式进行，而在五届五中全会后，则是在全国范围内，以全面、系统的方式进行，并已成为国民党在制定战略方针中一项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注释：

①（日）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9页。

②《陈诚总司令上蒋委员长陈述陕甘善后问题之意见电》（1937年2月15日）。

③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徐永昌日记》第4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430页，第2页。

⑤⑦⑧⑨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546页，第551页，第553～554



页，第569页。

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207～1218页。

⑩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册（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338页。

⑪《必须制裁反动派》，1939年8月1日，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77页。

⑫《论统一战线》，1945年4月30日，周恩来，《周恩来政论选》上册，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466～468页。

汪精卫集团粉墨登场

伴随着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本就在中共和全国民众的压力下坚持抗日的国民党，又开始出现了动摇与妥协倾向。蒋介石曾一再表示："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仍然希望与日本谈判，只要日本恢复事变前的状态，就可实现"和平"。①

以此为基础，1937 年 11 月，在日本的授意之下，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国民政府转达了日本方面提出的和谈条件，试图调停中日战争。11 月 20 日，蒋介石会晤陶德曼，并对其表示，同意以日本的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12 月 6 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常委会议，决定接受陶德曼调停，实现"中日和平"。但是，由于日本在攻陷南京之后，对和谈的条件不断加码，使蒋介石深感不能承受之重，导致谈判破裂。1938 年 1 月 16 日，近卫首相发表了日本政府的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真正能够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18 日，近卫又发表了一项"补充声明"："所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较之否定该政府，更加强硬。"②接着日本即在北平成立了以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也在 18 日发表宣言，声明维护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不承认一切伪组织。至此，调停宣告失败。但在此之后，国民年政府与日本的秘密接触并未停止，而是从官方谈判转为半官方接触。1938 年初，兼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的周佛海，经过蒋介石批准，派高宗武、董道宁等人到上海、东京、香港等地秘密活动，与日军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谋略课长影佐帧昭、中国班长今井武夫等人取得联系。不久，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也通过秘书乔辅三，与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建立秘密联系。但是，终因双方在利益诉求上存在严重冲突，秘密交涉也陷入僵局。而正是这种局面，使得汪精卫集团如跳梁小丑般跃上了中日和谈的前台，并导致其投敌叛国。

汪精卫时任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长

期以来，以其为代表的亲日派和与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在国民党内部勾心斗角，互相倾轧。自抗战开始，汪精卫就反对国民政府改弦更张，进行国共合作，达到全民族共同抗日，而是主张继续实行十年内战时期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降日政策。另外，以周佛海为中心的一部分主和派，以南京西流湾八号周佛海的私宅为据点，成立了一个除了周佛海，还有胡适、熊式辉、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等人组成的低调俱乐部，极力鼓吹“战必大败、”抗战必亡“的”消极论调，认为所谓的坚持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不过是“空中楼阁”，是“唱高调”，是不说“老实话”与不“负责任”的表现。1937 年底，国民政府西迁之后，汪精卫、周佛海等又在汉口成立了一个以“低调俱乐部”为核心的“艺文研究会”，企图以进行文化宣传为幌子，来“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抗共产党的笼罩”，并且“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③]不仅如此，汪精卫还就对日妥协向蒋介石施加压力。从八一三淞沪抗战至南京失守的四个月中，他给蒋介石写了十多封信，并多次找蒋介石面谈，劝蒋与日本“停战议和”。周佛海也通过知名学者胡适、青年党的左舜生、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励以及《大公报》的张季鸾等人，先后向蒋介石“进言和平”，[④]但终未被蒋介石采纳。1938 年陶德曼的调停失败之后，汪精卫从对蒋介石的劝降，转而亲自与日秘密联系，进行投降活动。而这种演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日本对华诱降策略的变化。

1938 年 6 月 23 日，受汪精卫、周佛海的秘密指派，高宗武东渡日本，试探日方对汪精卫的态度。在东京逗留的一个星期中，高宗武在影佐祯昭的安排下，先后会见了首相近卫文麿、外相有田八郎、陆相板垣征四郎等日本军政要员并进行了会谈，7 月 9 日回国。高宗武此次私自赴日，得到的是日本方面欲拉蒋介石“下马”，另推汪精卫上台的策略。[⑤]陆相板垣还根据高宗武的要求，出具了“日本政府愿以汪兆铭（即汪精卫）为和平运动中心”的保证函。7 月 15 日，日方《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出台，提出：尽快先使临时及维新两政府合作，建立联合委员会，并使蒙疆委员会与之联合。以后逐渐吸收各种势力或与其合作，以形成真正的中央政府。如果国民政府改组或蒋介石下野也把它作为一个成员，参加中央政府的建立。这一方针实际上是“扶汪倒蒋”的序曲，一方面以此给国民政府形成压力，另一方面对汪精卫抛出了合作的橄榄枝。10 月下旬，代替高宗武与日方联络的梅思平，从香港飞回重庆，转告汪精卫：“日本希望汪脱离重庆，另组政府，与日方谈判和平条件。”随后，汪精卫与其骨干分子周佛海、陈公

博、陈璧君（汪之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陶希圣及梅思平等人，多次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绕开蒋介石，直接与日本勾结，并派高宗武、梅思平继续与日方谈判。11 月 3 日，日本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表示“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宣称日本所希望于中国的，是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⑥此声明改变了第一次近卫声明中“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看似是向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诱降，实际上则是为了启用汪精卫。

在武汉失守和日本第二次近卫声明以后，汪精卫集团便加快了叛国投敌的步伐。1938 年 11 月中旬，汪精卫派出的代表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等人，在上海东体育会路 7 号一所取名“重光堂”的房子里举行秘密谈判，史称“重光堂会谈”。11 月 20 日，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其主要内容有：一、日华两国缔结防共协定。二、中国承认满洲国。三、中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本土有居住、经营自由；日本答应废除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在中国的租界。四、在平等互惠的原则基础上进行经济提携，承认日本的优先权，特别是在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予日本以特殊的方便。五、为了这次事变，中国应赔偿在华日侨的损失，但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六、本协定规定以外的日本军队，自日华两国恢复和平后，立即开始撤退（于两年内完成）。双方商定：上述协定一旦公开发表，汪精卫等即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准备成立新政府，并建五至十个师的军队。⑦11 月 27 日，梅思平由香港返回重庆，将《日华协议记录》交给了汪精卫。汪连忙召集周佛海、陈璧君，并电邀陶希圣、陈公博，“由成都到重庆共同商议”。经过连日秘密讨论，汪精卫集团最终表示对协议没有异议。至此，汪精卫集团降日卖国的行动计划，就最后形成了。

按照与日本方面的密谋，汪精卫于 1938 年 12 月 18 日以“赴成都军官学校讲演”为名，与陈璧君、曾仲鸣（汪之秘书、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乘飞机逃出重庆飞往昆明。20 日，汪等人会同先期到达昆明的周佛海、陶希圣等，飞往越南河内。随后，陈公博等人也相继逃往河内。22 日，日本政府为策应汪精卫出逃，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声称：“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同谋求实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⑧29 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公开表示对近卫三原则的赞同，并劝诱国民党当局“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至



此，汪精卫集团走上了公开叛国投敌的道路。

1939 年 2 月初，高宗武由香港到达河内，与汪精卫密商与日合作的具体方案。经过商议，汪精卫提出如下方案：

“第一方案：日本和蒋介石妥协

本案对收拾时局最宜，只要日本承认便可。本人和蒋介石在政治上虽不能共事，但个人将尽最大的努力促成之。

第二方案：以王克敏、梁鸿志、吴佩孚及其他实力派负责中国的统一，如果认为可以，自己则以在野身份加以援助。

第三方案：如果日本认为以汪兆铭为收拾时局最恰当的人，则要求；（一）由他以国民党的名义组织反共救国同盟会，再建民族国家的政治运动和重新建设军事；（二）在日军迫近西安、宜昌、南宁时，再次发表声明，宣布由他收拾时局，担当实现和平的负责人，并号召西南各将领通电响应；（三）与日本当局会见，发表共同宣言，（四）以十月十日为期，在南京组织新国民政府，同时马上取消临时、维新两政府；（五）与日本协商借款两亿元，在此以前，每月需要三百万元左右的活动经费。”⑨

2 月下旬，高宗武抵达东京，向日本政府送交了汪精卫提出的方案，并与影佐祯昭讨论了汪伪政权建立的具体办法。

1939 年 4 月 25 日，汪精卫等人在日军的严密保护下离开河内前往上海。5 月底，汪精卫访问东京，与日本磋商成立伪政权事宜。8 月 28 日，汪精卫集团纠集 240 余名所谓代表，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解除蒋同志总裁之职权”，成立了以汪精卫为“主席”的伪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确定了以反共、调整日中关系、恢复两国邦交为主要内容的政策。1940 年 1 月下旬，为了筹备成立伪中央政府，汪精卫与北平、南京的汉奸头目王克敏、梁鸿志以及伪蒙疆联合政府的李守信等，在青岛举行会谈，商定取消南京“维新政府”，北平“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新老汉奸合流，共同组织日本卵翼下的伪中央政府。

1940 年 3 月 30 日，准备良久的汪伪国民政府终于在南京粉墨登场。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长，陈公博任立法院长，温宗尧任司法院长，梁鸿志任监察院长，王揖唐任考试院长，褚民谊任外交部长，周佛海任财政部长等。当天，伪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政府政纲》和《还都宣言》，宣称对外方针“与日本共同努力，本于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之原则，以扫除过去之纠纷，确立将来之亲善关系”；对内方针“完成实

现国家之建设"，以反共为主要任务。同时还煞有介事地要求重庆军政人员"务于最近期间回京报到"，并宣布"全国以内，只有此唯一的合法中央政府。重庆方面如仍对内发布法令，对外缔结条约协定皆当然无效"。[10]

汪精卫集团的投降活动给中国的抗日战争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一小撮民族败类为虎作伥，认贼作父，直接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一大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分裂和动摇，造成了投降反共的危险。但同时，汪精卫的公开投敌和建立伪国民政府，客观上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主和派"及当时的"和平"空气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为蒋介石向日本的妥协造成了一定的障碍。

注释：

①《蒋介石在庐山的谈话》，1937年7月17日。

②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原书房，1978年版，第385～386页。

③《陶希圣至胡适信》（1938年12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第397页。

④周佛海：《中日事变秘闻：我的斗争记》，1940年12月1日，周佛海，《周佛海日记》（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27～1231页。

⑤邵铭煌：《高宗武战时私访日本探和密档——东渡日记、会议记录、个人观感》，《近代中国》第129号，1999年2月。

⑥魏宏运：《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4抗日战争时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593页。

⑦何理：《抗日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153页。

⑧复旦大学历史系：《1931－1945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第288页。

⑨（日）《渡边工作（第二期计划）》（1939年9月），日本外务省档案，S491号。转引自黄美真、张云，《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138页。

⑩黄美真，张云：《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821～822页。



抗战期间的中日和谈

1939 年 9 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美等国为了维护其在远东地区的利益，策划推行“远东慕尼黑阴谋”，企图以牺牲中国为代价，谋求与日本的暂时妥协。因此日本“在国际新形势下的政策是专力进攻中国，企图解决中国问题，以备将来扩大其对国际的冒险行动”[①]。为了迅速灭亡中国，日本在此期间，进一步加紧对蒋介石的诱降，使国民党停止抗日，实现“和平”。在英美的压力和日本的诱降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出现了抗战以来最严重的动摇。他们暗地里积极指派代表，同日本进行“和平密谈”，谋求在某种条件下对日妥协。

日军侵占武汉前后，国民党军政要员曾通过多种渠道与日本进行秘密接触，借以试探日本对华的和谈要求。此时的汪精卫虽然已经对日示好，但在日本军部中，仍有一部分人认为：“要解决陷入泥潭的事变，‘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非得和重庆直接谈判不可’”。[②]于是，1939 年 11 月底，日方派铃木卓尔中佐以日本驻香港武官的名义到达香港，开展“对重庆停战和平工作”。12 月 27 日夜，铃木卓尔与自称为宋子文之胞弟的“宋子良”（实际上是由军统特务曾广冒名顶替）会面，从此开始进行为正式的和平谈判而举行的预备会谈，讨论和平条件。“宋子良”一方面传达了重庆方面“继续进行抗战的真意”，同时，也转达了重庆方面“关于收拾时局的意见”：

1. 日本如尊重中国之名誉与主权，则需有和平的准备，希望在承认新中央政府以前即进行协商。
2. 中国希望美国等第三国从中调停。
3. 在谈判前休战，希望日本提出撤兵保证。
4. 请日本相信国民政府镇压共产党的抗日行动。
5. 希望日本避免干涉国民政府进行改组等内政。[③]

另外，“宋子良”还转达了“中国方面对日本的质疑”，但铃木对此却“毫无回答的准备。”1940 年 2 月 16 日，今井武夫从香港返回南京后，日本

方面才指示："可援用去年秋季要求汪方的条款，作为谈判的条件"，并将对重庆国民政府的工作命名为"桐工作"。[④]这样，就为日蒋之间在香港的密谈奠定了基础。

1940 年 3 月 7 日，香港密谈正式开始。参加此次谈判的日方代表为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臼井茂树以及上述参与前期磋商的铃木卓尔和今井武夫；中国方面则派出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原驻德参赞、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由军统特务曾广顶替的"宋子良"，以及联络员张治平。

在 3 月 7 日晚上的会谈中，国民政府代表首先转述了蒋介石提出的三项原则："由重庆启程前，蒋介石特别强调了以下三点：一、必须得到日军撤兵的保证；二、明确日方的和平条件；三、要在绝对秘密中会谈。上述三项，务希日方委员予以协助。"[⑤]随后，日方代表先后提出其要求的"和平条件"：承认满洲国；在停战的同时，宣布放弃容共抗日政策；日中两国签订防共协定，日军在蒙疆及华北驻扎必要部队；日中在华北及长江下游进行经济合作，在华北重要资源之开发利用方面，给日本以特殊方便；与汪精卫合作等等。在谈判中，关于中国停止抗日、中共缔结防共协定以及经济合作等方面，日中双方均达成了一致。而导致双方意见分歧的主要是三个问题，即"承认满洲国"、"在中国特定地点驻扎日军"和与汪精卫合作的问题。对于是否承认伪满洲国一事，国民政府实际上只是不愿公开承认，而对其采取默认的态度。因为"满洲国"已是既成事实，纵使不触及此问题，对日本也不会有任何真正的损害。如果一旦承认的话，在国内将会遭到强烈的反对，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在国民党内部的旧东北系和旧西北系等派系中的强硬派，难免会引起国民党的分裂，造成国内大乱。因而对此问题以暂不着手为宜。关于驻兵问题，国民政府对于内蒙地区的特殊化，原则上可以承认，但对部分日军驻兵华北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其所持的意见是，万一两国在国防上有必要时，可在一些地区"延缓撤兵"，以免引起舆论的反对。而最后一个与汪精卫合作的问题，国民党方面表示，由于汪精卫叛逃使得反汪已经成为全国性的运动，与其合并实在是难以进行，希望日本方面可以将其作为中国的内政问题妥善加以处理，而非实现中日和平的条件。

由于在上述三个重要问题上存有分歧，会谈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结果。3 月 9 日，日方将自己起草的备忘录交给中国代表修订，并建议双方代表在修订后的备忘录上签字。然而蒋介石于 3 月 10 日上午发给中国代表的训令中表示不要签字，并根据训令提出了新的和平意见，对日方在备忘录中提出的



部分内容加以修改或否定。3 月 10 日晚会谈后，中日双方以相互领受对方意见的形式暂时休会。

4 月 11 日，“宋子良”从重庆返回香港，表示重庆政府已决定了成熟的方案，要求再开预备会议。5 月 13 日，在九龙半岛旅馆，章友三、“宋子良”和今井武夫、铃木、坂田举行会谈。在会谈中，章友三说：“当前和平的难题是中国承认满洲国的问题，与部分日军驻兵问题，这可以暂放它一放，留待日华恢复和平后，再谈判解决。……因此，只要秘密预备会议日华双方取得一致意见，日华两军即可停战。同时，重庆政府将发表反共声明。”因此，他提出：“希望在六月上旬仍由上次的原班人马在澳门举行第二次会谈”。[⑥]今井武夫则提出举行蒋介石和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总参谋长坂垣征四郎的高级会谈。但是这个提议遭到了中方代表的一致反对。他们认为，高级会谈一旦召开，不管成功与否，都会给共产党及其他主张坚决抗战的人造成反对蒋介石的口实而发展成为内战。因此中方代表主张先开预备会，签订协定后，再商讨双方高级会谈的召开事宜。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了在澳门召开的第二次秘密预备会议。

澳门会谈，实际上就是香港会谈的继续。会谈的双方代表还是香港密谈的原班人马，从 6 月 4 日 ~6 日，共历经三天。双方代表与第一次预备会谈相同，日方出示了闲院宫参谋总长载仁亲王的委任状。中方代表出示了盖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大印和蒋介石签名盖章的委任状。这次会谈的主要问题仍是承认“满洲国”问题、日本在华驻兵问题以及汪精卫的问题。章友三则表示：中国对于“满洲国”和日本在华驻兵两事绝难承认。“满洲国”问题应于实现和平、恢复邦交后，以外交方式解决，驻兵问题应由两国军事专家秘密解决。这次会谈应集中讨论江精卫问题。而此问题的解决，以让汪精卫出国或隐退为上策。日本代表仍坚持原来立场。会谈再一次陷入僵局。但双方都不愿意完全关闭和谈的大门，在此情况下，双方经过磋商，于 7 月 23 日共同签署了备忘录，商定于 8 月上旬在长沙举行蒋介石、汪精卫与坂垣征四郎三人的高级会谈。

在举行三方高级会谈的决定做出后，不少人推测中日“和平”很快就能实现。美国通讯社驻重庆记者毫不讳言地说：中国人关于对日和平问题的议论急剧上升，一般人认为战争将在六个月内结束，政府将还都南京。日本人也说：这时是八年中日战争中“蒋介石感到危机最严重”的时期，“是事变行将解决，日中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⑦]。然而就在这时，日本米内内阁

倒台，近卫内阁再次登上政治舞台，并由东条英机出任陆军大臣。这种日本国内的政局变化，也使国民政府对于和谈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开始转向强硬。7 月 31 日，重庆方面突然提出两项问题，要求坂亲笔答复。一项是要求近卫内阁以某种方式宣布撤销第一次近卫内阁发表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另一项是要求在即将举行的蒋介石与坂垣的会谈中，不要触及蒋汪合作问题．并要求废除日汪之间签订的条约。日本方面认为，这些要求使“交涉难以进展，陷于困境”。但是，他们并未因此而减少对重庆国民政府诱降的期望。近卫给蒋介石的函件说：“……近期阁下将与坂垣中将会见。余深信此次会谈，定会奠定调整两国邦交的基础”坂垣也给蒋介石写了信，说：“关于蒋、汪合作问题……我方应有提供善意的意见的机会。但……不作为一项停战条件”[8]。8 月 28 日，铃木带着亲笔信回到香港，向“宋子良”展示了近卫的信。9 月 5 日，“宋子良”回复说：“近卫亲笔信仍然没有直率地取消不以重庆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同时对坂垣参谋长出席的长沙会谈，不是全面支持，而是旁观态度。万一日本内阁再度更换，将会把长沙会谈后的执行问题，完全推到坂垣个人负责而不承担履行义务”。[9]9 月 19 日，铃木将重庆方面的态度报告了日本，其中说：“9 月 13 日 ~ 15 日在重庆的重要干部会议上决定，关于满洲问题及日军部分驻兵问题，只要日华双方未取得一致的意见，长沙会议暂行搁置。”在这次会见中，“宋子良”还对铃木说：重庆方面“人们纷纷议论：中国的抗战力量还很强，今天没有必要谋求屈服性的和平”。铃木说：“中方若有抗战能力，愿意打就打吧”。这实际是蒋方中止了会谈，宣布暂不进行妥协活动，继续抗战。

从以上事实看，蒋介石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从 1939 年底到 1940 年 7 月中旬，蒋介石为了摆脱日军的军事压力，为了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对付在抗战中迅速壮大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为了缓解因为国土大量沦陷、税收锐减而造成的财政困难，曾不惜谋求对日妥协。然而，由于“宋子文赴美，一亿美元贷款有望，美英在太平洋上对日压力正在加强，蒋介石 8 月 15 日至 20 日在新疆某地与苏联要人会谈的结果，苏联可能加强对华援助”，又加之“美国远东政策的加强，英国大使重庆之行，以及苏联、中共情势趋于活跃等，致使处于紧急关头的蒋介石举棋不定”，[10]对日妥协的态度逐渐变得强硬冷淡。基于此，日本方面采取了坂垣征四郎的建议，暂时停止“桐工作”，此次的中日密谈宣告破裂。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

②④⑦⑨（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1分册，《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6页，第119页，第55页，第82页。

③⑩（日）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33页，第574~575页。

⑤⑥⑧（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页，第143页，第157页。

日汪签订卖国条约全国各地掀起讨汪运动

从1939年6月开始，为了筹备建立伪国民政府，汪精卫集团与日本一直在进行秘密谈判。9月，日侵华殖民机构兴亚院借口“和平政府成立后，为中日两国间缔结条约奠定基础”，提出了与汪精卫谈判的具体方案。这是一张“详细清单”，开列了如果要日方支持建立新政权，汪精卫必须遵从的各项条件，包括一系列要纲、原则和谅解事项等。汪精卫在看过之后，认为日方的条件大大超出了重光堂协议的范围，也违背了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的精神，因而感到非常的失望。

然而为了伪政权的建立，汪精卫仍抱有幻想，希望能在谈判桌上取得日方的让步。于是11月1日，日汪双方代表在上海六三花园开始了密谈。日本方面出席的谈判代表是影佐少将、须贺彦次郎海军大佐、犬养健、谷萩那华雄陆军大佐、矢野征记外务书记官、清水董三外务书记官；中国方面则由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周隆庠负责谈判工作。会议一开始，影佐递交了日方拟定的草案，并表示日本将要求一次性提出时出于诚意。但显然这样所谓的“诚意”并不能为汪精卫方面所接受，在看过草案之后，梅思平表示，双方今后的讨论应坚持以重光堂会谈、近卫声明及汪精卫访日时的约言为基础，超乎这三者以外的，难于接受。由于根本出发点不同，因此日汪双方争论十分激烈，从11月1日~12日，共开了七次会议，对日方提出的草案讨论了一遍，提出了一个修改案，但仍然有17个重要问题作为悬案留了下来，包括：蒙古与华北的境界、华北税收的分配、日本驻兵与撤兵以及海南岛问题、交通运输问题、派遣日本顾问问题等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日汪双方一方面通过谈判缩短距离，另一方面影佐派犬养健每晚到周佛海家里去，与周夜间折冲。然而，由于双方分歧较大，会议难以继续下去。于是11月16日，影佐回到东京，向陆军大臣畑俊六、



参谋次长泽田茂等人说明谈判情况和汪精卫集团的态度，寻求解决的办法。20日，日本兴亚院作出了修正案，其中决定下来的日本让步方案，要点如下：

"一、防共驻兵关系——维持原案

驻兵地点不写明。无从预测将来共产军会窜入到哪些地方，因此，驻屯地点不能预定。说明在今后认清形势时决定之。

二、铁路

原则上认作国有国营。但对于军事上为必要的铁路，认作委托经营。

三、蒙疆、华北等行政机构——承认汪案

原则上认作为置于中央政府统制下。

四、治安驻兵关系——加入期限

日本于和平恢复后认为治安确立之后，开始撤退其在防共驻兵地区以外的军队，二年以内撤退完毕。"①

这个修正案严重体现了日本军方的强硬态度，仅仅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做了些许的让步，但对于汪精卫方面提出的诸如驻军等实质性问题，却没有给予丝毫考虑。带着这样一份修正案，影佐回到上海，与汪精卫集团重新开启谈判。但对于汪精卫集团，这个修正案显然仍旧不能接受，以陶希圣为代表的强硬派表示，在看到全部悬案事项总括让步之前，交涉不能继续。至25日，谈判已经完全进入决裂状态。然而进入12月下旬，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在日本方面，迅速树立一个新的中央政府对其当前的形势极为有利，其真意在于帮助脆弱的日本内阁安全度过下届议会；而在汪精卫集团中，内部力量则发生了明显变化，周佛海等妥协派重新得势，陶希圣等强硬派则退居二线。在此情况之下，日汪双方都作出了相互的让步，终于在12月30日黄昏时分，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

日汪密约的签订，淋漓尽致地显露了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其中除《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以外，另附《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的具体原则》，同时还提出了《秘密谅解事项》八件。其主要内容有：中国承认"满洲国"；在新国交恢复以前，"维新"、"临时"政府经办事项由"中央政府"加以继承；确保日本在"中央政府"外交、教育、宣传、文化以及军事等各方面的权益和合作关系；承认日本在内蒙、华北、长江下游、厦门、海南及附近岛屿的政治、经济以及地下资源开发、利用的权力，承认在以上地区的防共驻兵和治安驻兵权以及与驻兵地区有关的铁路、航空、通讯、港湾和

水路在军事上的要求；在“中央政府”及各级机构中聘请日本军事、财政、经济、技术顾问，以确保上述条款的执行。此次密约内容之多，范围之广，不仅包括了过去临时、维新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卖国条件全部内容，而且更超出了6月6日日本政府五相会议所作出的《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内容。参加这次谈判的陶希圣事后披露说：“日方的条件所包含的地域，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包含的事物，下至矿业，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大陆上则由东南以至于西北，这一切的一切，毫无遗漏的由日本持有或控制”。[②]

为了实现日汪双方的“和平”大计，按照双方规定：这一密约“永不公布”。可仅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高宗武、陶希圣便叛汪而去，并带走了密约的影印件和照片，并在报纸上公布。于是，这一见不得人的密约，就被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石激起千层浪，香港《大公报》将密约全文披露后，日汪密约的卖国行径，激起了全国上下包括不同党派爱国人士的极大愤慨，各地纷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汪运动。

1940年1月28日，毛泽东在《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的党内指示中，要求极力扩大反对汪精卫卖国协定的宣传，在反汪运动中要强调“反共就是汪精卫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要求各地在2月份“普遍举行民众大会，掀起全国反投降反汉奸反摩擦的热潮”。2月1日，延安召开军民讨汪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演，又把“普遍扩大反汪反汉奸的宣传，坚决揭露一切投降分裂阴谋，从思想上政治上打击投降派与反共派”列为十大任务的第一条。2月上中旬，各抗日根据地也相继举行讨汪除奸大会。4月15日，八路军、新四军将领发表《讨汪救国通电》，严正指出：汪精卫的所谓“和平”就是投降；所谓“反共”就是灭华。并庄严表示：“誓率全军为祖国流最后一滴血，驱逐敌伪，还我河山，虽赴汤蹈火所不敢辞。”[③]

在沦陷区，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的反汪怒火，也冲破日伪的残酷统治而迸发出来，他们以各种可以利用的方式，开展反汪斗争。汪伪政府成立的当天，上海租界内的中国学生举行罢课，冲破巡捕的阻挠，高举“打倒汪精卫傀儡组织”等标语，举行游行示威，掀起了全市规模的反汪运动。各校学生纷纷进行反汪宣传，进行抗战必胜、投降必亡的教育，并揭发少数企图投靠汪伪的学校当局，反对学校伪化，开展护校运动。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还印发了反汪宣言，在学校和社会上广为散发。各校纷纷举行讨汪大会，上街散发讨汪传单，张贴反汪标语和漫画，推动了上海各界的反汪



斗争。

全国各界民众、各阶层人士也纷纷举行声讨集会，发表讨汪通电和宣言。就在汪伪政权建立的同一天，湖南各界于3月30日举行讨逆锄奸大会，发出讨汪通电，痛斥汪精卫“于倭寇卵翼之下，僭窃伪号为签订卖国契约之傀儡，甘夷邦家于附庸，沦国民为奴隶，其卑劣狂悖亘古所无，乱臣贼子人人可得而诛”。[④]。接着，广西、云南、贵州、甘肃、宁夏、山西、广东民众先后通电谴责，贵阳人民仿秦桧夫妇跪于岳墓，亦塑汪精卫夫妇之像长跪于公园之内，让人民群众唾骂。

与此同时，各抗日党派和各界人士再次掀起讨汪高潮。4月上旬，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会议在重庆召开。根据各党派参政员的提议，会议通过了《声讨汪逆兆铭南京伪组织电》。通电指出：“敌人占领地，安能有政府？降人订和约，安能有效力？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以血汗保障之国家主权，安能容敌伪盗窃？无量数忠勇将士及各项辛勤工作人员血战三年取得国防之信誉，安能被敌伪动摇？”[⑤]表达了不承认汪伪政权和坚持抗战的决心。

汪伪政权成立后，重庆国民政府也作出了强烈的反映。1940年3月30日，重庆国民党政府发表“悬赏拿办汪兆铭之命令”，谴责汪：“依附敌人，组织伪政府，卖国求荣，罔知悔悟”，命令“各主管机关，严切拿捕，各地军民人等，并应一体协缉，如能就获，赏给国币十万元，俾元恶归案伏法，用肃纪纲”。[⑥]继对汪精卫、褚民谊、周佛海等28人下令通缉之后，国民政府又对陈公博、温宗尧、梁鸿志、王揖唐等77人下令通缉。总计下令通缉105人，包括了汪伪国民政府的所有要员。同时，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照会各国，否认汪伪政权，要求各国不要承认，并发表声明，日汪非法签订的条约全然无效。

汪伪政权的建立和卖国条约的签订，在海外华侨中间也激起了强烈的愤慨。一时间，新加坡、马来亚、菲律宾、印尼乃至欧洲、美洲的海外各地爱国华侨也纷纷来电讨汪。吉隆坡华侨黄盖堂通电怒斥汪精卫一伙“罪恶滔天，甘作虎伥，成立伪府，有血皆愤，誓不甘休”。[⑦]在新加坡，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南洋总队部和马来亚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两大华侨团体联合发起反汪运动宣传周，共同拟定《反汉奸反汪派宣传周工作大纲》，召开反汪座谈会和群众大会，并印发反奸反汪派的宣言，标语，漫画，歌曲、小册子和英文宣传品。大街小巷的墙壁上贴满了醒目的讨汪宣言，标语，漫画和壁报等，参加反汪大会的群众“打倒汉奸汪精卫”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签订卖国条约，是日本采取政治诱降为主方针的结果，也是国民党集团内一直存在的妥协倾向发展的结果。全国人民反对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运动，对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遏制国民党内的投降暗流使其坚持抗战，无疑具有重大的作用。

注释：

①黄美真，张云：《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 4 月版，第 57 页。

②陶希圣：《日本对所谓新政权的条件》，香港《大公报》1940 年 1 月 23 日。

③《解放日报》，1940 年 4 月 15 日。

④《湖南省各界讨逆锄奸大会耒阳来电》（1940 年 3 月 30 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转引于王秀鑫、李荣，《中国 20 世纪全史第 5 卷全民抗战 1937—1945》，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年 5 月第 1 版，第 191 页。

⑤王秀鑫，郭德宏：《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1931—1945）》，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年 8 月版，第 305 页。

⑥《国民政府令》（1940 年 3 月 30 日），国民党中央党史会库藏史料。转引于黄美真、张云，《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 6 月第 1 版，第 303 页。

⑦《黄益堂吉隆坡来电》（1940 年 4 月 2 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转引于黄美真、张云，《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 6 月第 1 版，第 303 页。



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和策略

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改变对华策略，将军事进攻的重点从正面战场转向敌后的八路军、新四军，对国民党则以“反共防共”为诱饵，加紧对其的诱降活动。蒋介石虽因为各方面的压力，没有最终对日妥协，但对日方提出的“反共防共”却深有同感。随着抗日战争在中国国土上逐渐的深入化与扩大化，蒋介石发现原本仅偏居一隅的共产党，在进行抗日活动的同时，其政治、军事势力已深入到敌后广大地区，填补了国民党在遭到日军攻击而撤出后留下的空白，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面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权在敌后纷纷建立和有效地行使权力，这让一向对共产党毫无信任的蒋介石大为惊骇。因此，南岳会议确定了军事限共的方略，五届五中全会又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以所谓“合法”、“统一”为名，限制中共、八路军及其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和群众团体的发展。1939 年 2 月，蒋介石又秘密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文件。除此之外，蒋介石还增派大军，并纵容国民党地方顽固派向八路军寻衅进攻，制造摩擦，妄图向中共和八路军以及抗日民众“收复失地”。于是，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之下，国民党的反共摩擦更为频繁，反共活动愈加猖獗，在这一时期内不断地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9 年底，阎锡山在晋西北制造了“十二月事变”，将这次反共摩擦推向了高潮。

针对国民党所表现出来的日益强化的反共防共倾向，中共中央即向全党指出：国民党之主要政策在于加紧限制八路军的发展，制造国民党地方部队与八路军的摩擦，以孤立八路军。对摩擦如果逆来顺受，则将来摩擦逆流必更大，顽固派的气焰必更高，故应以冷静严正态度对之。

中国共产党科学地、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毛泽东指出目前的政治形势是，虽然敌我形势已处在战略相持阶段中；但日本帝国主义仍然坚持其灭亡中国的基本政策，并用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加紧敌后“扫荡”、加紧经济侵略等方法，实行这种政策。所以“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①]中日民族矛盾决定和影响着其他各种社会矛盾。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与日本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的，这种情况决定了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采取两面政策，一面还要团结国民党以外的各派势力对付日本，一面却极力摧残各派势力，尤其尽力摧残共产党和进步势力。”[②]对于国民党的反动两面政策，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必须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即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坚决反共的方面是加以孤立的政策。”[③]另外，也必须认识到，国民党是一个成分复杂的党派，其中有顽固派，也有中间派，也有进步派，整个国民党并不就等于顽固派。抗战时期，顽固派还站在支配其党的政策的地位，但在数量上只占少数，它的大多数党员（很多是挂名党员）并不一定都是顽固派。必须认识清楚这一点，才能利用他们的矛盾，分别对待，用极大力量去团结国民党中的中间派和进步派。

在这个前提下，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确定了处理国内各阶级关系的基本政策，即“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

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就是发展全国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等的民众运动，就是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扩大争民主的宪政运动到广大人民中间去。

以上的进步势力，均是革命的力量，对抗日战争是有利的。只有一步一步地发展进步势力，才能阻止时局逆转，阻止投降和分裂，而为抗日胜利树立坚固不拔的基础。为了更好的发展进步势力，毛泽东在《放手发展革命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中号召：“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



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④在这一号召下，敌后抗日根据地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虽然在反摩擦斗争中，国民党对根据地的包围和封锁给根据地军民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我军留守部队和根据地的群众团结一致，实行精兵简政，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大生产运动，最终打碎了国民党的险恶企图。

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中等资产阶级就是除了买办阶级即大资产阶级以外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虽然同工人有阶级矛盾，但在抗日问题上，他们赞成团结抗战；在争取政治权力问题上，他们赞成宪政运动，反对顽固派的分裂和妥协。开明绅士的政治态度同中等资产阶级大略相同。他们虽然同农民有阶级矛盾，但他们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亦有矛盾。地方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两种力量在内。他们虽然同进步势力有矛盾，但他们同现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损人利己的政策亦有矛盾，所以只要有正确的政策，他们是可能在与顽固派的斗争时采取中立态度的。在争取的策略上，不但同争取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有区别，而且对于各部分中间势力也有区别。中间派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针对他们的动摇态度，除了争取的努力，还应该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

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一场斗争中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对中间派的争取，是党和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极为重要的任务，也是中国在反摩擦斗争中对国民党军队采取的又一策略。1940年6月，在国民党江苏政府省主席韩德勤发动了针对苏北新四军的摩擦事件中，中共对反共顽固派韩德勤采取了坚决打击的方针，而对于中间势力李明扬、李长江则采取了团结争取的方针，使其在我军与韩德勤部发生冲突的时候，保持了中立的态度，分化了国民党的反共力量，从而增强了抗日的武装力量，使我军在摩擦中打退了韩德勤部的围攻。

孤立顽固势力，就是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势力。对于还在抗日阵营内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采取两面政策，一面尚在主张团结抗日，一面又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我党对于反共顽固派采取的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即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坚决反共的方面是加以孤立的政策。这就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针对共产党内许多干部对于策略问题上的片面观点，和由此而来的过“左”过右的

摇摆倾向，毛泽东深入地阐明了团结与斗争的关系，他说："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只有我们勇于斗争，"才能使顽固派有所畏而不敢压迫我们，才能缩小顽固派防共、限共、反共的范围，才能强迫顽固派承认我们的合法地位，也才能使顽固派不敢轻易分裂。所以，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⑤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贯主张：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不论是在理论上、政治上、军事上、原则上均应坚决地反抗之，均应采取坚决斗争的政策。但这种斗争，应从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出发。有理的原则，就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利的原则，就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和无把握的斗争。有节的原则，就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双方实行休战。这时，应该主动地又同顽固派讲团结，在其同意之下，与之订立和平协定。除此之外，同反共顽固派作斗争，还应实行针锋相对的政策。当他们对共产党、进步派加以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压迫时，则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即在思想上提出正确的革命理论，对他们的反革命理论给以彻底的批判；在政治上采取适合时宜的策略步骤，对于他们的反共反进步政策给以有力的回击；在军事上采取适当的军事步骤，对于他们的军事进攻给以坚决的打击。只有向顽固派采取这种针锋相对的态度，和在斗争时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才能使顽固派不敢轻易分裂，不敢向进步派进攻，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才有可能争取还愿意抗日的顽固派，延长其留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时间，从而才可避免大规模内战的发生。所以，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和计锋相对的斗争。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避免大规模内战、巩固国共合作的不可缺少的手段。在反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中，八路军、新四军采取了以斗争求团结的正确方针，很快取得了理想的效果，成功地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在反摩擦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中国革命克敌制胜的法宝。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是把马列



主义与中国抗战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在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它为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粉碎国民党第二、三次反共高潮的胜利斗争，奠定了全面的策略基础。正是由于实行了这种正确的策略方针，既反对了共产党内的右倾倾向，又反对了“左”倾危险，才坚持了抗日，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支持与同情，争取了战略时局的好转，保障了最后的胜利。

注释：

①《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 年 5 月 8 日，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781 页。

②《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 年 3 月 11 日，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744 页。

③《论政策》，1940 年 12 月 25 日，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763 页。

④⑤《放手发展革命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1940 年 5 月 4 日，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753～754 页，第 755 页。

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斗争

1938 年广州、武汉沦陷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之后，日本改变了对华侵略的战略方针：一方面加大对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事进攻，另一方面则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与此同时，英、美等国又继续实行其绥靖政策，单方面与日谋求妥协。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开始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为限制和束缚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蓄意制造了多起反共摩擦，破坏了国共团结。此外，汪精卫也不断与日本勾结，签订卖国协定。1939 年冬至 1940 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加紧反共、军事上向我进攻的同时，还在思想战线上鼓吹“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叫嚣“共产党不需要在中国存在”，重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老调，妄图继续维护其一党专制统治，由此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不安和深深忧虑，“特别是文化人和青年学生，感觉敏锐，首当其冲”。[①]于是“中国向何处去”又一次成为重大而迫切的现实问题。

为了批驳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言论和教育全国人民，同时也为了表明中共的根本主张和鲜明态度，以统一全党思想和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毛泽东适时的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一文，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其实早在 1939 年 12 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小册子中，就曾对中国革命的相关问题作出过明确论述。针对中国革命的任务，毛泽东指出：“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②]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因此，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1940 年 1 月，《新民主主义论》一文的发表，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毛泽



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观点。《新民主主义论》最初是毛泽东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稿，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2月15日首次发表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机关刊物《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后来经过毛泽东修改，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在《解放》上。

《新民主主义论》在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的基础上，论述了中国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如何等问题，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说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指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新民主主义论》首先以“中国向何处去”作为文章的第一个标题，指出了写作的缘由：“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③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呢？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即“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④

毛泽东在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了中国的历史特点，着重论述了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国情，指出中国现在“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因此，我们要革除的，恰恰就是这种社会的旧政治、旧经济和旧文化，而我们要建立起来的，“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与新文化”。因为我们现阶段的革命属于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所以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与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为此，“在中国从事革命的一起党派，一切人们，谁不懂得这个历史特点，谁就不能知道这个革命和进行这个革命到胜利，谁就会被人民抛弃，变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⑤

在文章的第四部分，毛泽东首先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因为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这一发展进程和规律。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

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

为什么会呈现出这种特点呢，毛泽东认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此时的中国革命，“就不能不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基于此，中国第一阶段的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⑥]革命发展到第二阶段，再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在全面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发展进程后，毛泽东又详细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下的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毛泽东首先对五四运动前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进行了分析，然后指出：五四运动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成为无产阶级，因为这时的中国无产阶级“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而资产阶级本身具有两面性，所以他们不能领导革命走向成功。针对上述分析，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⑦]现阶段来说，我们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式，“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它是抗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又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的”。[⑧]毛泽东最后总结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为“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今天‘建国’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方向”。[⑨]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毛泽东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即：一、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使之成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同时，“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二、在农村“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



和少地的农民”，在此基础上，发展具有各种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经济；对于农村中的富农经济，允许其存在和发展。三、“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的路”。以上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在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进行论断的基础上，毛泽东严厉批判了“资产阶级专政论”，指出：一、现在的国际环境，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的环境，是资本主义向下没落，社会主义向上生长的环境，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二、中国要独立，决不能离开苏联的援助，不能离开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国无产阶级在其本国进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援助。不然，中国革命必然会失败。三、中国以往的革命教训表明，中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以大资产阶级为首的反动派以往曾不断制造内战，热衷“剿共”，结果却造成了今天这种一党专政和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局面，更为甚者如汪精卫一伙，竟卖国投敌。所以，“中国必须抗战下去，团结下去，进步下去，谁要投降，要分裂，要倒退，我们是不能容忍的。”

在批判“资产阶级专政论”的基础上，毛泽东同时也批判了故意混淆两个革命阶段任务的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指出：中国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但此时，又会有人（顽固派）提出：“你们共产党既然把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推到后一个阶段去了，你们既然又宣称‘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那么就把共产主义暂时收起好了。”[⑩]毛泽东对此指出，这种叫嚣，本质是顽固分子们的资产阶级专制主义，或者是他们“毫无常识”的表现。为了“免除误会”，使顽固派们“开开眼界”，毛泽东就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异同及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不同两个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指出：新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就是伪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⑪]只有新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才称之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才宣布“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我们将和一切真诚的三民主义者实行长期合作。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⑫]中国的新文化，在“五四”以前，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在“五四”以后，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一言以蔽之，“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

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13]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14]

基于对以上中国革命现状的分析，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和命运，充满了希望和信心。他基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对未来发展方向的科学预见，在文章的结尾向全国人民发出了伟大的号召：“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15]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一文影响巨大。它全面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整形成，从而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际指导作用。另外，《新民主主义论》在某种意义上，更是中国共产党对全国人民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次启蒙教育，通过《新民主主义论》的普遍教育，许多见识幼稚的青年学生告别了徘徊而走向革命，连许多过去一贯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也由于对侵华日军的深恶痛绝和对国民党腐败无能的彻底绝望，而纷纷投入到民族民主抗争的行列，为统一战线的维护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注释：

①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新民主主义论》，1940 年 1 月，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 6 月版，第 662 页，第 662 页，第 663 页，第 665 页，第 668 页，第 675 页，第 676 页，第 677 页，第 685～686 页，第 690 页，第 694 页，第 698 页，第 708～709 页，第 709 页。

②《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 年 12 月，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 6 月版，第 637 页。



中国共产党内的状况和建设党的任务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很快，但大批的新党员还没有很好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他们对中国的历史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规律等还懂得不多，对革命也缺乏足够的经验。此外，随着我党的逐步发展，一些新的党组织逐一建立，但它们还不稳固，他们同老党员和老组织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区别，许多投机分子和敌人的暗藏分子因此混进到组织中，对党进行破坏活动。基于以上原因，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巩固党的组织，克服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险，党的重要领导人针对性的写了一些文章，以此教育全党，同时加强党的建设。

1939 年 5 月 30 日，陈云在《解放》第 72 期上发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指出：党员质量如何，是关系能否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关键问题。根据党的性质和任务，文章明确提出了共产党员应具备的六条标准：一、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二、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三、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四、百折不挠地执行党的决议；五、群众模范；六、学习。只有具备了以上六个条件，才不愧称为一个良好的共产党员。

8 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报告，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和修养问题，明确提出共产党员增强党性的基本要求，进而全面阐述了共产党员加强党性锻炼和修养的具体内容。这篇演讲报告对于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10 月，“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①]中共中央出版了党内刊物《共产党人》，10 月 4 日，毛泽东专门为此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

毛泽东在发刊词中首先分析了当时党内的状况和党所处的复杂环境，然后提出了建设党的重大任务。

关于中国共产党当时的自身状况和所处的环境：文章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说来，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党，也已经是一个群众性的党；而且就其领导骨干说来，就其党员的某些成分说来，就其总路线说来，就其革命工作说来，也已经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和布尔什维克化的党。”但是，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我党存在的不足，“我们现在有大批的新党员所形成的很多的新组织，这些新组织还不能说是广大群众性的，还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同时，对于老党员，也发生了提高水平的问题，对于老组织，也发生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问题。”[②]

关于党所处的环境，文章指出：现在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已同资产阶级建立了统一战线，我们党的武装正配合友军在前线上同敌人进行残酷的斗争。但是，尽管当前民族危机日益加重，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竟时时刻刻在企图破坏我们的党，企图破坏统一战线。一方面，他们不断制造与我党的军事摩擦事件，并想以此作为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分裂统一战线和拉中国向后倒退的准备；另一方面，他们还在思想上企图“溶解”共产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企图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取消党的武装力量。基于以上状况，所以我们提出了建设一个思想政治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的伟大任务，以确保民族统一战线的维护和巩固，保证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毛泽东在阐明加强党的建设的必要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回忆和总结了我党 18 年来的斗争历史，从而得出结论：“十八年来，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是这样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所以，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③]围绕着这三个问题，毛泽东就建党问题进行了论述。

毛泽东首先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在各个革命阶段以及同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统一战线的经验，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组织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必须实行坚决的、严肃的两条战线斗争。一方面，要反对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斗争的可能性的错误。这种错误，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资



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看做一样，因而忽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保持这个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就是‘左’倾关门主义。另一方面，则要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做一样的东西，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错误。这种错误，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不但在极力影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且还在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力求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力求使革命果实归于资产阶级的一群一党的事实；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一到革命同他们一群一党的私利相冲突时，他们就实行叛变革命的事实。如果忽视了这一方面，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又如果我们党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不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武装斗争，同样党也就会瓦解，革命也就会失败。”④文章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政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政治路线。

毛泽东在论述党的发展和武装斗争的关系时指出：“我们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武装斗争。”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我们的政治路线，也不能了解我们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文章强调，这是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

文章在最后着重论述了党的建设问题，他将党的建设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党的幼年时期，在这一阶段中，党的组织发展了，但是没有巩固，没有能够使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另外，一些投机分子也趁机混入党内，对党进行阴谋欺骗，最终导致了革命的失败。第二阶段是土地革命战争阶段。由于总结了第一阶段的经验，加之对中国的历史状况、中国革命的规律等有了进一步认识，党在这一时期紧紧依靠农民，得到了很大发展，主要表现在：党的组织得到了重新发展和进一步巩固；大批干部涌现并成为党的中心骨干；党的武装部队学会了战争的艺术。在这一过程中，我党也受到了一些来自党内的个别领导的错误思想的影响，给党造成了危害。前期受到李立三同志“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而在另一个时

期，又遭受到革命战争中的“左”倾机会主义和白区工作中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直到遵义会议后，党才彻底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党的建设的第三阶段，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阶段，在这一阶段，党凭借过去两个革命阶段的经验，凭借着党的组织力量和武装力量，凭借着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更加深入统一的理解，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我党已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成为了全国性的大党。在组织统一战线进行抗日战争的这一阶段，由于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和投降派，坚持分裂，反对统一；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所以，这一阶段我们的任务，就是克服这种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尽可能的维护统一战线，保持国共合作，争取抗战团结和继续进步，同时，也要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免遭意外的损失。“为达此目的，就要巩固党的组织，巩固党的武装力量，并动员全国人民，进行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坚决的斗争。这种任务的完成，依靠全党的努力，依靠全体党员、党的干部、党的各地各级组织实行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斗争。”⑤

文章最后总结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人冲锋陷阵的战士，坚持并做好这两项工作，党的建设才会有发展，中国的革命才会胜利。

毛泽东《〈共产党员〉发刊词》一文，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对中国革命进行的科学的总结，他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全党，对于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注释：

①②③④⑤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 年 10 月 4 日，《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602 页，第 603 页，第 605 页、第 606 页，第 607 ~ 609 页，第 613 页。



毛泽东论述新民主主义的性质

在革命性质和前途问题的认识上，中国共产党是在成长过程中逐步明确的。在多年革命的实践中，毛泽东吸取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有了深刻的认识，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1940 年 1 月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要经历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对党的历史上出现过的错误认识进行了批判，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进方向。

1922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在二大上提出了反帝反军阀的民主革命和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但党在幼年时期，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的认识是模糊的，并因此犯了许多错误。由陈独秀在党的二大后所写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等文章中，可以看到他认为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统率，只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等资本主义在中国充分发展之后才能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所谓的“二次革命论”。这说明，当时党的领导人还没有认识到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特殊性，不懂新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区别，不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党内的主要领导人，虽然开始承认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但却认为民主革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实现的，实质上把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放在民主革命阶段去进行，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过早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措施。这就是所谓合并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它否定了革命的阶段性。因此，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使党又走了许多弯路。

鉴于历史的教训，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民主革命的性质和前途，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与联系作了系统的论证。他认为：“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①]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规律

的认识，制定了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完成。”[②]

毛泽东首先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依据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提出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而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毛泽东说：“很清楚的，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③]也就说，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

民主革命的对象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封建主义解放农民，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但因为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投降帝国主义，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因而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式的民主革命，也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指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所谓“新”，是相对于欧美国家由资产阶级领导，推翻封建专制主义压迫，确立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民主革命的特殊国情，中国的民主革命只能由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进行。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彻底完成革命的任务，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认清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的根本任务是要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独立，推翻封建地主和官僚



资本的统治，走上民主发展的道路。社会主义革命要求消灭资产阶级，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这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是不能实现的。

新民主主义要求在政治上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经济上没收帝国主义和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为国家所有，使私有资本主义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变为其私有财产，但富农经济依旧允许其存在，从而使个体经济充分发展，在此基础上逐步地发展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经济，使之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同时，对于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毛泽东在强调了在民主革命胜利后，"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因为这样有益于社会的进步，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这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最革命的政策"。④也就是说，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既有社会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因素，既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既为资本主义扫清了道路，又为社会主义准备了重大的条件，是一个特殊形式的过渡性社会。

经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延安时期和解放初期毛泽东的一贯坚持的思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基本国情的，是指导中国革命正确方向的理论方针。

首先，批驳了"一次革命论"。经新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纲领。"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在中国没有新民主主义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⑤也就是说，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由之路，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不可或缺的历史阶段。毛泽东论述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辩证统一，批判了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

其次，否定了"二次革命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果必然要发展到社会主义，这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部条件决定的。在政治上，"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⑥；在经济

上，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的发展还有全国政权的建立，革命根本问题的解决，无产阶级不需再进行一次夺权斗争，“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⑦新民主主义为社会主义准备了条件，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两者密切联系在一起。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上成功地解决了两个革命阶段的联系和区别，彻底批驳了二次革命论。

最后，认识到新民主主义的性质，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毛泽东从中国社会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过程，阐述了中国社会怎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怎样才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怎样发展为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阐释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历史辩证法理论。

注释：

①②《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51~652页，第651页。

③《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66页。

④⑤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60页，第1060页。

⑥⑦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50页，第650页。



毛泽东论述新民主主义的纲领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所谓中华民族的新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①]这是我党首次对新民主主义的"新"从内容上做的界定，为怎样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提出了新思路。

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把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主张作为党的基本纲领提了出来。指出"实行这个纲领，可以把中国从现在的国家状况和社会状况向前推进一步，即是说，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和社会状况，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②]因为"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来，那只是完全空想"。[③]

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的提出，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党关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怎样建设新中国?"的基本问题。早在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第一次提出建立"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的思想。而后，通过在实践中的不断摸索，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向做出了科学判断："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④]提出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个独特的历史阶段，它要建立的是一个新型的独立的共和国。20世纪30年代末，毛泽东就已经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国，一定要是一个由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其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国。"[⑤]虽然这时对新中国的构想处于雏形阶段，但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国家形态的构成已经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标志。"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形式。"[⑥]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目标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既不同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不同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所以，毛泽东指出“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⑦]它所建立的“国体”，是指社会各阶级在新民主主义国家中的地位，是一切革命阶级对于反革命阶级的专政。它所要建立的“政体”，是指政权的构成形式，即无产阶级采取何种形式组织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机关。实现“政体”的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集中制则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原则。

1947年12月，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已进人历史转折的新形势，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提出建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及人民民主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⑧]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为了回答“建立一个怎样的新中国”的问题，毛泽东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中提出，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1948年12月30日，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毛泽东第一次公开使用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为了更加系统地回答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国家政权的性质、各阶级在这个国家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这个国家内外政策以及发展前途等问题，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完整地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科学地阐释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历史必然性，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从理论上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作了新发展。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用国家根本大法的方式，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是新中国的根本国家制度，成为新中国的国体。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新民主



主义的经济纲领，指出“在中国建立这样的共和国，它在政治上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在经济上也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1947 年，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进一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

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内容。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也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首要的是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阶段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采取了不同的政策。1946 年 5 月 4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将减租减息的政策改为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1947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全国土地工作会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这是一个彻底的比较完善的土地纲领。针对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的偏差，毛泽东在 1947 年中共中央 12 月会议上强调，土地改革中必须注意两项基本原则：一、必须满足贫雇农的要求；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1948 年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即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到 1948 年秋，中国共产党已在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农民获得彻底解放，工农联盟得到巩固，并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质基础，翻身的农民参军支前，使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足以保证夺取胜利的人力、物力，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作了分析：“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⑨]从而对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成分的构成给予历史定位，阐发了新民主主义独特的经济形态，确立了新民主主义国家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奠定了新民主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毛泽东认为在这个阶段，“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

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10]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并具有长期指导意义的文化纲领，即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代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的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关系的基本观点。[11]“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12]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首先，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毛泽东说：“有人反对共产党谈爱国主义，这是不彻底懂得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是反帝国主义的，在半殖民地的国家提倡爱国主义，本质上就是反帝国主义的。”[13]尽管中国的这种新文化可以而且应当“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14]

其次，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15]毛泽东说，事实上，要老百姓不信神，就要有科学的发展和普及。有了科学知识，迷信自然就可以打破，没有这一着，他还是要迷信的。[16]所以，我们要提倡科学，“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与不卫生的状态”。[17]

再次，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18]毛泽东指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19]他们是新文化的主要接受者、利用者，因此应当成为新的文化工作基本的服务对象。

毛泽东阐发的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方面向全党指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使我党在政权、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为建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不仅是旧中国向新中国转变的纲领，还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平稳过渡的纲领。它承载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向社会主义社会跨越的历史任务，指导了中国未经



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跨入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尽管这种跨越的“理想化”使我党把社会主义的起点过急过早地定在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使我们经历了曲折和失误，但我们仍应认识到毛泽东等创制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纲领适应了中国反帝反封建和为社会主义奠基的需要，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的重大体现。

注释：

①④⑩⑪⑫⑭⑮⑱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65页，第665页，第705~716页，第663页，第698页，第706页，第707页，第708页。

②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58页。

③毛泽东：《毛泽东同志论无产阶级专政和肃反工作》，群众出版社，1960年01月第1版，第187页。

⑤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49页。

⑥⑦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75页，第677页。

⑧《新华日报》，1949年。

⑨金春明：《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46页。

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2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第2版，第651页。

⑯《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页。

⑰《一九四五年的任务》，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1页。

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55~856页。

《新民主主义论》发表的伟大意义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全面深刻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向，论述了中国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如何等问题，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说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指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一著作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理论结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经过长期思考和探索总结出来的科学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它的发表，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就政治战略而言，《新民主主义论》深刻而具体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学说，丰富和完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相应的一整套具体政策，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了关于民主革命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进一步中国化。中国共产党自创立起即遵循马克思主义，在共产国际指导下领导中国革命运动，但起初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性质、道路缺乏明确的认识，因此在领导实际革命斗争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对中国民主革命进行理论探索，经过曲折反复，逐步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性质、战略方针、目标模式。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于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早已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绝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①]在《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之前，共产党人对革命领导权、同盟军、革命道路等问题作过研究，但既不深入也不系统。对比而言，《新民主主义论》系统地论证了中国新式民主革命的社会性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



级方向（无产阶级领导）、时代特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时代）、革命目标（新民主主义共和国）、革命前途（社会主义）等，这无疑丰富和完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毫无疑问，《新民主主义论》是中国民主革命理论的新的理论结晶。

就文化战略而言，《新民主主义论》全面总结了自烟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变革和新文化运动，从而制定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的战略，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的建设提出了明确的文化指向，并为之作了充分的论证。一方面，这篇著作宏观地考察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新文化产生的客观根据及其与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之间的斗争性质，从而确定了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另一方面，这篇著作又具体分析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化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进而肯定“五四”之后兴起的民族新文化，既不是欧美资本主义式的旧民主主义文化，又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文化，而是具有民族特点的、中国式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即“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是彻底地反封建文化的运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这篇著作中有许多重要论点，诸如：中国近代文化的阶级性质，“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五四”以后，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的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有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对鲁迅的评价：“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方针，是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等。可见，这篇著作对中国近代文化变革和新文化运动的总结是多么全面和具体。

《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进一步从理论上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从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论》一经发表，就备受关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中国共产党为配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发起的新启蒙运动达到了高潮。自《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新启蒙运动才有了标准的、权威的教科书，这篇著作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解放区党员、干部学习的教材，并且在

传播过程中对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分子起到了思想上的影响和理论上的引导作用。概括来说，在《新民主主义论》的影响和引导下，不但感情冲动、思想迷茫的青年学生告别了徘徊，不再犹豫而走向革命，就连许多过去一贯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由于对侵华日军罪恶行径的深恶痛绝，以及对国民党统治集团腐败无能倒行逆施的彻底绝望，或者随着自身生活的贫困化而逐渐认识到下层人民生活的苦难，他们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而倾向进步。例如，著名史学家、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在1949年2月北平解放后，开始接触毛泽东著作，据说他刚一阅读《新民主主义论》，就立刻为其精辟的理论分析所吸引，为其超然的见解所叹服，于是反复钻研，思想急剧变化，不仅在思想上正确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性质究竟是什么，而且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时代洪流中；化学界泰斗曾昭抡是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化学博士，回国后历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教授，抗战爆发后，因强烈不满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他遂开始关心政治，参加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政治斗争，1944年，他开始认真研读《新民主主义论》，并经常引用《新民主主义论》的原话分析时局、发表演讲，因而他被国民党特务组织列入黑名单，所幸当时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俞大维有意识安排他和吴大猷、华罗庚带领李政道、朱光亚、唐敖庆等六位西南联大学生赴美考察原子能技术，才得以逃过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迫害，避免了像李公朴、闻一多那样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新民主主义论》作为一部战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它以其理论的逻辑力量和论证的系统周密，以其对广大人民心目中真正的疑问和长期的论争得到的空前明朗的回答和结论，深深地震撼了当时的思想界，征服了人心，从而使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不仅在军事上被打退，而且在政治思想上也被彻底击垮。这一著作在“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②的关键时刻，起到了破除迷雾的思想廓清作用，它以所向披靡的革命激情，大声宣告：“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唯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③同时，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彻底剥夺了国民党顽固派及其追随者的精神武器，澄清了人们的混乱认识，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及全国人民的革命思想理论水平，统一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帮助了各解放区实现统一的政策，从



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极大地加强了革命的力量；使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更自觉地担负起自己的领导责任，从而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确定，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日趋成熟。《新民主主义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它科学地总结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总结了中国近百年来，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明确地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范畴，它深刻地、具体地阐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转变等一系列根本问题，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经过18年的风风雨雨，毛泽东终于为中国人民指明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夺取民主革命胜利、建设新中国的正确道路——新民主主义。

注释：

①②③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72页，第662页，第686页。

抗日根据地政权组织形式　三三制

抗日战争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后，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方针上提出了“三三制”政策。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条件下推进民主政治的一个创举，充分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又保障了各抗日阶级、阶层的广泛的民主权利，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政策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基础。

首先，三三制体现了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总要求。1940 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现在所要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①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独创的用以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该理论在政权问题上的总要求就是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实行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因此，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三三制政策的理论基础，三三制符合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总要求。

其次，三三制适应了抗日战争尤其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特定政治形势的需要。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决反抗投降派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又一方面，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②中国共产党认为实行有效抗战的基本条件是巩固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为了“巩固与扩大各个抗日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上建设完全民选的没有任何投降反共分子参加的抗日民主政权”，就必须要改变以往根据地政权建设中排斥地主资本家及非中共人士的错误做



法，保障一切愿意抗日的阶级、阶层及各界人士的民主权利，“使地主资产阶级容易脱离日寇的反动宣传和顽固分子挑拨离间的影响，比较安心地与我们合作抗战，支持根据地的建设事业”。[③]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可以使国民党顽固派不敢公开投降，从而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度过相持阶段的困难，扭转抗日战争的局面。

最后，三三制是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必然选择。按照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本要求，陕甘宁边区率先于1937年下半年展开了民主选举，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新的边区政府，新民主主义政治在边区得以实现。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一批抗日根据地在华北、华中广大地区纷纷建立，改造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为了在全国的抗日根据地实现民主的政治改革，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改造成为各阶级各党派联合专政的政治制度，党中央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提出以三三制作为抗日根据地政权组织形式。

1940年3月6日，毛泽东同志发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首次正式提出三三制原则。文中提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区别的。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区别。”“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由于“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而“必须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我们这样做，对于争取小资产阶级将有很大的影响。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些阶层的争取，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重要的步骤。”[④]此后，毛泽东又在延安中共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就此作了进一步的强调：三三制政策“是我们党的真实政策，必须认真实行，不能敷衍塞责”。“这种规定，在最下级政权中可能须作某种变动，以防豪绅地主把持政权，但基本精神是不能违背的。”

1940年5月1日，中央政治局批准，边区中央局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施政纲领》，又称为《五一施政纲领》，纲领规定：“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

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5]此纲领把"三三制"原则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定了下来，标志着"三三制"原则由宣传进入到了普遍的实施阶段。

1941年2月至5月的四个月时间里，根据地各级政府按"三三制"原则进行了选举。据统计，边区80%以上的选民都参加了直接选举，不仅选举产生了县、乡两级参议会和政府，而且选出了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的参议员。在普选的基础上，1941年11月，召开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和无党派参议员209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按照"三三制"原则，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选举。由于中共长期以来在人民中所形成的崇高威望，在选举参议会常驻议员和政府委员时，小组提名的候选人中中共党员较多，人数超过了三分之一，于是谢觉哉、马文瑞等12名党员自动要求退出政府委员候选人，肖劲光等六名党员退出常驻议员候选人，在选出的18名政府委员中，中国共产党只能占六名，结果选中了七名，略超过三分之一，于是老革命家徐特立同志主动退出，另外补选了党外人士白文焕。[6]此外，为了使"三三制"原则顺利执行，中国共产党还采取了许多补救措施，如对落选的党外候补议员，由政府酌情聘请，或共产党正式议员辞职，以便由党外候补议员补上等。三三制的制定和实行，不但有效地保障了民主集中制在抗日根据地政治组织上的圆满实现，而且有力地回击了当时国内外关于边区政权是共产党把持包办的舆论，提高了党的威望，维护了党的形象。

综合各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情况、中央相关指示和有关论述，可以看出，三三制的政权组织形式具有三个特点：

第一，重视民主选举。三三制规定了具体的人员分配比例，但它的产生仍然离不开选举，选举是三三制政权产生的基本方式。三三制作为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的组织形式，是与民主选举紧密结合的。1940年3月的中央党内指示就在提出三三制的同时，明确规定了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要经过人民选举，为使选举能够切实发生作用，指示还特别指出"政权中三部分人员各占三分之一的"数目的分配是一种大体上的规定，各地须依当地的实际情况施行，不是要机械地凑足数目字"。这一举措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各阶层以前所未有的参政热情投身到根据地政权的建



设中。

第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以三三制原则建立起的抗日根据地政权中，共产党员的数量在政权中虽然不占多数，但在政治上仍然居于领导地位。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在艰苦战争中建立的，根据地政权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创立和巩固起来的，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据地得以存在、巩固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共产党领导并不是说根据地政权机关由共产党员独占，根据地事务有共产党“包办”，更不是“一党专政”。为了反对一党专政，为了巩固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保证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最大限度的实现，根据地政权有必要对一切赞成抗日的阶级、阶层、人士开放，这是实行三三制的重要原因。

第三，具体运作方式上相互合作、共同协商。与党外人士团结合作、协商共事，是中国共产党一向坚持的基本方针，只是在三三制实行之前，这种合作与协商没有相应固定的组织形式。通过三三制建立根据地政权，使得党外人士进入政权系统，共产党在同一政权组织中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民主协商。

三三制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政权建设方面的一大创举，是中国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阶段性标志。这一制度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地位，又保障了其他抗日阶级、阶层的广泛的民主权利，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政治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三三制的实施缓解了抗日根据地内紧张的阶级关系，调动了各方面的抗日积极性，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抗日根据地实行政治改革，使政权民众化，“并不妨碍我们与一切公正士绅及还能帮助抗日的地主商人进行一定程度的统一战线”。[⑦]通过三三制建立的政权“在其阶级成分上，工农小资产阶级是主要的，然而应当吸收进步的中产阶级分子及进步士绅加入，拒绝他们参加政权，对我们对抗日都是不利的”。[⑧]共产党通过三三制将政权之门向一切拥护抗日的和进步的人士开放，最大程度上适应了团结抗日的需要。

另一方面，三三制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建设的一种成功尝试。抗日战争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阶段，这就决定了党在推进抗日的同时必须同时推进民主的进程，对战时及战后中国的政治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抗日根据地既是坚持抗战的堡垒，又是向新民主主义国家迈进的基地。因此，

抗日根据地政权本质上属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或是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战时表现形态，根据地的任何一项民主改革，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上对政权问题的珍贵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原有的抗日根据地及其三三制政权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改变发生了变化。虽然中国共产党将三三制推广到全国的设想因内战没能马上实现，但三三制所蕴涵的民主精神在解放区内各级人民民主政权中得以延续，并对全国性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建立产生巨大影响。

注释：

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74~675页。

②毛泽东：《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1940年1月28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13页。

③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建设和各项具体政策的报告提纲》，《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88页。

④毛泽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1940年3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670页。

⑤《陕甘宁边区政府施政纲领》，1940年5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1页。

⑥王小鸿：《多党合作思想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第139~140页。

⑦《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1939年11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189页。

⑧《中央关于抗日民主政权的阶级实质问题的指示》，1940年2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268页。



抗战时期的土地政策　减租减息

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土地政策，具体要求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方面要求地主、债主适当地减租减息，另一方面要求农民交租交息。这一政策的实行适当改造了根据地阶级关系和土地占有关系，巩固了农村各级政权，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激发了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

减租减息政策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原因和漫长的过程。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除汉奸和亲日派以外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为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创造先决条件。这一方针政策不同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反对地主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的政策，因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的土地政策也必须随之改变。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土地属于日本人还是属于中国人，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既是在保卫中国的大前提下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那么，由暴力没收方法转变到新的适当方法，就是完全必要的"。①减租减息政策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和民族革命紧密的结合，把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统一起来，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这种改变并非表示中国共产党放弃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目标，而是由于抗日战争时期，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挽救民族危亡。

1926 年 10 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检察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党部，海外代表联席扩大会议，在其政纲关于农民问题的部分中，规定了减轻佃农田租。1929 年 6 月，国民党在三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二五减租的决议案。虽然国民党根本没有实行这些决议，但对于中国共产党执行减租减息的政策国民党政府不能公开阻挠。更何况在民族危急的紧要关头，中共在

政治上作了重大的让步，表示愿意停止直接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以换取全民族所需的和平、民主和抗战，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支持。从1937年2月起，中共就在各种场合多次向国民党中央表示这种意愿。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实行民主自由、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代表会议、迅速完成对日作战准备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五点要求，那么，我党将实行停止武装暴动、改工农政府和红军为边区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在特区内实施普选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等四项保证。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说明中国共产党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政策开始发生了变化。

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代表会议中表示为停止国内武装冲突，中国共产党愿意停止使用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并准备在新的民主共和国建设过程中用立法和别的适当方法解决土地问题。7月15日，我党在送交国民党的《为公布国共和合作宣言》中，重申四项保证，提出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1937年7月，党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发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阶段上的农村革命政纲》一文中提出："没收汉奸卖国贼之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整理农民债务，禁止高利盘剥"、"修改土地法便于农民有利，规定最高限度的地租，保障农民有永久细租他所耕种的土地之权"。[②] 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提出"地租的减少，高利贷的限制"以改良农民生活等主张。[③]

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中，专门就土地问题，其中特别是减租减息等问题提出意见，指出"停止没收地主土地财产，注意改善群众的日常生活……如增加工人雇农的工资，改良待遇，减租、减息、减税"，[④]完整提出了减租减息问题。8月25日，我党在洛川会议上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第一次用纲领的形式正式确定了减租减息政策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毛泽东指出："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方能发动基本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但也不要减得太多。地租，一般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到群众要求增高时，可以实行倒四六分，或倒三七分，但不要超过此限度。利息，不要减到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另一方面，要规定农民交租交息，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权仍属于地主，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老账而无偿收回典借的土地。"[⑤]也就是说，减租减息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要求地



主、债主适当地减租减息，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农民也必须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够过活。

洛川会议后，各抗日根据地都根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规定的减租减息政策，结合本地区具体情况，分别制定了各自的施政纲领条文和减租减息的法令。开始的时候，减租仅局限于少数区村，一般地区还谈不到真正减租，大都采取了按当年收成再二五减租的办法，例如，原租一石、年成八成，先将原租额减至八斗，然后再二五减，实交六斗。收成的标准由当地讨论决定。但因当时局势混乱及减租工作不切实际，所以交租情形异常混乱。减租过程中仍存在着较大的问题，一些地方以定收成的方法进行减租，佃户尽量将实际收成压低，以使地主多减租，还有一些地方减租不够普遍。

1939 年底，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在策略上有所改变，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抗日根据地集中兵力进行围攻和扫荡。中国共产党为了粉碎日本侵华势力的阴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抗日，决定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巩固，集中主要力量深入群众工作，加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减租减息运动由此而开展起来，但政策在执行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为此，1942 年 1 月 28 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提出三项基本原则：

一、承认农民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故党的政策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保障农民的人权、地权、政权、财权，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

二、承认中国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绅士是赞成民主改革的，因此党的政策仅是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更不是打击赞成民主改革的开明绅士。故于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于保障农民的人权、地权、政权、财权之后，又须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只是对于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的汉奸分子，才采取消灭其封建剥削的政策。

三、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社会成分与政治力量。富农的生产方式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富农不但有抗日的要求，而且有民主的需求。故党的政策，不是削弱资本主义

与资产阶级，不是削弱富农经济与富农生产，而是在适当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同时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民。但是富农有其一部分封建性质的剥削，为中农贫农所不满，所以对富农的租息也须照减，在对富农减租减息之后，同时须实行交租交息，并保障富农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一部分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经营土地的地主（所谓经营地主），其待遇与富农同。

1942 年 12 月 29 日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37 条），从法律上对减租租额做了具体规定：在未分配土地区域，定租“一般减租率，不得低于二五”；活租“按原租额减 25%—40%，减租之后，出租人所得最多不得超过收获量 30%。土地副产物，皆归承租人”。伙种“按原租额减 10%—20%，减租之后，出租人所得最多不得超过收获量 40%”，安庄稼“按原租额减 10%—20%，减租之后，出租人所得最多不得超过收获量 45%”。并规定“民国 28 年底以前欠租一律免交”。《条例》保护了出租人即地主、富农的应得利益，规定“承租人应依本条例所定减租之后之租额交租，不得短少，其有力能交租而故意不交者，出租人有请求政府依法追缴之权”。[⑥]该法令从法律上保证了中共中央的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和落实。

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使解放区农村阶级关系和土地占有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多数的雇农、贫农上升为贫农、中农，而大多数的贫农、中农则上升为中农以及新富农，农村出现了中农化趋势，而地主和旧式富农则削弱了。减租减息后，地主收租获得的利益远不如投资工商业利益大，所以除自己耕种的土地以外，一般社会上的闲散资金不再追求土地收租，而农民由于地租的减轻，农业赋税的合理负担，愿意也有力量从地主手中购买土地自己耕种。因此，根据地卖地的多为地主，买入土地的多为中农贫农。这说明，减租减息实行后的封建关系的削弱，地主的部分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土地所有权由集中变得分散。减租减息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封建土地制度，为以后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进行了准备。

实行减租减息改造了农村各级政权，巩固了抗日根据地，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保证了长期抗战的坚持和胜利。通过减租减息，提高了农民的阶级觉悟，激发了农民抗日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为抗战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同时，从民族利益出发，确保地主的人权、政权、财权、地权，调整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缓和了农村的阶级矛盾，稳定了地主阶级，拆散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与敌人的联合，争取他们中的多



数站到抗日民主政权方面来，扩大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了长期抗战的胜利。

虽然减租减息政策取得了巨大成效，解决了农民生活的实际困难，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这个政策具有改良的性质，不够彻底。各抗日根据地虽然经过多年贯彻减租减息政策，但农村的封建势力依然严重，地主占有的土地仍很多，农民普遍感到土地不足，迫切要求平分土地。减租减息政策不能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政策。抗日战争胜利后，减租减息政策需要向彻底的土地革命政策转变。减租减息政策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最革命的土地政策，适应了抗日战争这一特殊阶段的需要，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土地革命历程上光辉的一页。

注释：

①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3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60页。

②《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③毛泽东：《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47~348页。

④《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1937年8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298~299页。

⑤毛泽东：《论政策》，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67页。

⑥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6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428页。

西北会议纠正“四大动员”中的“左”倾偏差

1940年1月中旬，贺龙、关向应率一百二十师主力回师晋西北以后，开始处理“十二月事变”后遗留下的种种难题。这时，中共中央发来指示：要求“贺、关将整个晋西北及绥远，南起汾离公路，北至大青山脉化为巩固的根据地，建立西北与华北的战略枢纽。”①贺龙、关向应等人明白，这是中共中央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晋绥地区地位重要，把它建设成巩固的根据地，意义重大。于是，贺龙、关向应等人认真分析了晋西北地区的基本形势，开始了领导建设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艰苦工作。

贺龙、关向应首先决定，成立晋西北根据地的领导机构。1月26日，在贺龙、关向应回到晋西北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上，着重讨论了成立晋西北政权机构及制定施政纲领问题。2月1日至3日召开的第一次行政会议上，宣布成立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署（这是为了便于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沿用的阎锡山政权机关的旧称，1941年8月1日改称晋西北行署）。由续范亭任主任，牛荫冠任副主任。2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由贺龙、关向应、滕代远负责，将晋西南、晋西北两个党委合并，成立晋西区党委，由原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林枫任书记，原晋西北区党委书记赵林任副书记，领导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党的工作。2月24日，遵照中共中央1月23日指示，成立了晋西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晋西北党政军各项工作，贺龙为书记，关向应为副书记。在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下，逐步展开了建设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后，为了加快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晋西北发起了一场号召地主、富农和其他农民献金、献粮、献鞋和扩大军队的“四大动员”运动（又称“四大号召”。仅仅两个多月，“四大动员”运动就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下，参军青年达1.5万人，做军鞋12万双，



献粮600万公斤，献金折合法币（国民党政府1935年11月废止银本位制，采用纸币制，以中央、中国、交通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币）181万元。[②]这些成果，对解决根据地的困难，壮大人民武装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同时，中央书记处也指出，虽然“创造晋西北根据地和四大动员都获得了很大成绩，然而工作中还有很大缺点与很大错误”，“政策一般过左，有离开统一战线正确原则的极大危险。”[③]

贺龙、关向应作为晋西北根据地的最高负责人，也及时发现了在“四大动员”工作中出现的“左”倾问题。春季反“扫荡”结束后，贺龙、关向应立即把主要精力转入纠正“四大动员”出现的错误上来。1940年5月15日，为了参与总结根据地建设中的经验教训，部署纠正“四大动员”中的偏差，晋西区在兴县召开扩大干部会议，贺龙、关向应、林枫、赵林等人出席了会议。贺龙在会上指出：“四大动员”的主要问题是用强迫命令的方式让地主、富农献金、献粮，有的还吊起打地主，擅自搜查。这些过激的行为不仅使地主富农害怕失去其经济利益，而且感到人身安全无保障，对共产党失去信心。关向应进一步强调：我们共产党人不怕犯错误，错了，就要及时纠正。这次会议，根据中央有关统一战线策略问题和政权工作的指示，检查与总结了反顽斗争与根据地建设中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经验教训。会议肯定了成绩，纠正了“左”的偏向。会后还组织了军政民联合考察团，分赴各地贯彻会议精神，检查并纠正偏向；召开士绅座谈会，对受害者进行了经济赔偿。

扩大干部会议结束以后，贺龙、关向应及时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就晋西北根据地建设上存在的问题做了详细汇报。中央书记处在听取了汇报后，于6月8日发出了《中央书记处对晋西北的工作指示》，指出：“晋西北是华北与西北联系的桥梁，地位非常重要，中心任务是建立巩固的模范的根据地，与敌人的扫荡作斗争，长期坚持我们的阵地，凡妨碍长期坚持斗争的做法，都应当避免，一切要照顾到长期坚持这个基本点，现在的许多过左办法及不适当的计划，如不改正是很危险的，是不能长期支持的。”[④]针对晋西北各地执行政策中发生的过“左”偏差，指示中强调执行政策应当注意的问题：“晋西北各种政策应以各阶级各党派统一战线政策为根据，而以坚持长期斗争为出发点，打土豪及没收商店等过左行动是自杀政策，应严格纠正，犯错误者应加处罚，受损害者应加赔偿。”[⑤]随后，6月29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和第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根据中央书记处关于晋西北工作的成绩、缺点与错

误的指示，对晋西北工作又作了补充指示。在谈到政策问题时，《补充指示》指出，晋西北在发展进步势力及反对顽固力量方面有最大成绩，但对中间势力的争取不够，“左”的思想根源仍然是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阶级路线对立起来，或者对此观点抱折中态度。并强调，党和军队的干部都应掌握政策，对于中央及北方局关于政策的指示必须详细研究。晋察冀是模范的根据地，他们的许多经验必须好好学习。[⑥]8 月 19 日，毛泽东在给贺龙、关向应的电报中说：晋西北新旧斗争后，由于未能妥善实施政策，地主一部分逃跑，民众亦动摇不安；要巩固民心，落实中央七七宣言；军队要停止扩大，集中改编，提高质量；新军与八路军是有区别的，对他们要求不要过严；要加紧对干部进行策略教育，使之真正懂得党的政策与掌握政策。[⑦]

贺龙、关向应对此十分重视。他们认为必须认真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进一步端正和提高干部思想，克服“左”倾倾向。1940 年 9 月 21 日，晋西区党委书记林枫在晋西北第二次行政会议上，对“四大动员”运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四大动员’没有很好地把握统一战线的原则，违犯了统一战线，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许多本来不是要反对我们的人，由于我们过左的错误，引起了他们的逃跑，很多人本来可以和我们一道抗日的，但我们的错误做法，使他们产生恐惧，以致影响到统一战线的巩固。”[⑧]然而，此时，日军又发动了夏季大扫荡，晋西北全体军民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反扫荡之中。贺龙、关向应当即决定，在高级干部中先行传达，并联系实际，分项检查政策上“左”的倾向。

“百团大战”结束后，晋西区党委根据贺龙、关向应的意见召开了晋西北地委书记联席会议，贯彻中共中央指示，以提高干部认识，检查纠偏工作。贺龙、关向应参加并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开得很成功，与会的各级领导干部充分认识到，晋西北出现这种“左”倾错误的根源“是对中国革命性质、统一战线政策及中国革命长期性认识不足”。通过对《中央书记处对晋西北的工作指示》的学习，从而提高了广大干部的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使纠正“左”倾偏差的工作顺利开展。在贺龙、关向应的领导下，晋西北根据地纠正“四大动员”中“左”倾错误的工作取得了成绩，争取回来逃亡在外的富户 364 户，占逃亡富户的 2/3；同时争取了不少中间分子和知识分子参加工作，[⑨]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促进了统一战线工作；认真执行了党中央关于政权建设的“三三制”原则，提高了干部的威信。

在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的领导下，此次会议使晋西北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和其他各项工作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1941 年 1 月 27 日，关向应和贺龙、林枫、赵林向中共中央及北方局就晋西北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的情况写了报告。主要内容是：晋西北 1940 年下半年关于纠正统一战线中的“左”倾错误，关于政权中“三三制”执行情况及村选问题，关于财政经济建设，关于敌占区工作等，以及 1941 年上半年工作部署。2 月 12 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晋西北的工作经验，并向各地党委指出：晋西北区“根据去年 12 月中央关于策略指示检查部署工作，在其报告中有很多经验，特摘转各地以供参考”。

注释：

①《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1940 年 2 月 10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辑组编，《八路军·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94 年版，第 461 页。

②孙科佳：《山河呼啸：八路军一二〇师征战实录》，湖南出版社，1995 年版，第 196 页。

③④⑤《中央书记处对晋西北的工作指示》，1940 年 6 月 8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16 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 1986 年编印，第 193 页，第 193 页，第 194 页。

⑥谢远学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纪实第四部铁血河山》中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 291 页。

⑦穆欣：《关向应传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版，第 176 页。

⑧《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年版，第 303 页。

⑨谢远学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纪实第四部铁血河山》中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 291 页。

晋察冀根据地的建设

随着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迅猛发展，日本方面认识到，他们在中国最难对付的敌人不是国民党的百万大军，而是活跃在敌后战场上的中共游击队。为了加速“中国事变”的解决，日军将越来越多的兵力投入了敌后战场，对我军的敌后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与“清剿”，企图将中共消灭在敌后战场，摧毁我抗日根据地。另一方面，日本对国民党的策略转为政治诱降为主，这使得蒋介石从与日军的大规模战斗中抽出身来，将关注的重点重新放回在敌后发展的中国共产党身上。为了遏制共产党在敌后的发展，避免对其政权造成威胁，国民党顽固派有意与我军在敌后根据地造成“摩擦”，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为了巩固我军来之不易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在粉碎日伪军的扫荡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活动的同时，加强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聂荣臻指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需要有党的坚强领导，有强有力的主力部队和人数众多的地方部队与人民武装，这是根据地得以巩固和扩大的根本保证。而要实现党的正确领导，就必须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制定和执行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法令。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决不只是抗日的问题，也不单纯是一个武装斗争的问题，它包括着民主政治的建设，政权机构的改革，经济政策的规划，人民生活的改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等各个方面的内容。”[①]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晋察冀根据地开始了全面的建设工作。

首先，在根据地的政治建设中，加强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1939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曲阳县青山村召开了组织工作会议，亦称青山会议。在会议中讨论了关于巩固党的方针政策，决定“党在组织方面的总方针是：党的发展一般的停止，集中力量从事党的组织的整理与巩固工作；但同时决定加紧克服工作的不平衡。”[②]在步骤上先从组织的巩固入手，然后转为政治上、思想上的巩固工作。在组织整理工作中，主要抓住审查干部、



整顿党支部和健全领导制度三个重要环节。干部审查清楚，党才有可靠的骨干队伍；党支部整理清楚，党才有可靠的组织基础；领导制度健全，才能使党在组织上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在组织上整顿巩固党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巩固，根据地党委大力开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和党的知识教育，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觉悟，使边区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得到进一步巩固。

边区党组织的整顿和巩固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纯洁了党的组织队伍，面且在思想上、政治上进一步巩固，增强了党的战斗力。建立了大批模范党支部，使党支部工作开始向着正规化道路上迈进，进一步加强了党支部在群众中核心作用与堡垒作用。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从而，使边区党成为领导全区人民对敌斗争和进行根据地建设的核心力量。

其次，巩固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建立政权与巩固政权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根本任务。1940 年 2 月 1 日，《中共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指出："要巩固和扩大各个抗日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上建设完全民选的没有任何投降反共分子参加的抗日民主政权。"[③]并提出："要广泛开展宪政运动，力争民主政治。"[④]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指示，1940 年 7 月至 10 月间，晋察冀边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民主选举运动。根据中共中央实行"三三制"政权的精神，边区在民主选举中，不论在各级选举组织机构中，还是在各级民意机关和行政机关的人员分配上，都贯彻了"三三制"政策。除共产党员和基本群众外，还吸收了一些抗日的国民党员、地主士绅、上层知识分子、各族各界包括和尚、喇嘛等宗教界人士参加。因此，边区政权基础和社会代表性更加广泛，更能代表边区各抗日阶级、阶层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在选举运动中，充分实行了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原则。

据不完全统计，晋察冀区参加区选的选民，占全部选民的 80% 以上；参加县选的选民，占全部选民的 86.3%；参加边区参议会选举的选民，占全部选民的 91.1%。中心区的阜平、平山，参加选举的选民，占选民总数的 98%，有的区村达到 100%。就是在游击区的县份，进行秘密选举，参加选举的人数一般也占 70% 以上。[⑤]由此可见此次选举运动之广泛、深入和群众参与热情之积极、高昂。

在此次民主选举中，中共中央北方分局还制定和颁布了《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这个纲领共 20 条，故又称《双十纲领》。《双十纲领》

是根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晋察冀边区的实际情况，经过长期的酝酿而形成的，其起草和修改工作，由北方分局书记彭真主持，最终于 1940 年 8 月 13 日正式公布。

《双十纲领》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科学地总结了边区坚持敌后抗战的经验，正确地规定了最适合于抗战需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方针和政策。纲领要求：在政治上，必须坚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反对一切破坏团结抗战、破坏边区建设的行为；在政权建设上，充分发扬民主，健全各级民意机关及政府机构；在经济政策上，规定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财产所有权；在社会福利方面，设立专门机关，救济灾民，保障妇女儿童的权益；在文化教育上，普及免费教育，建立健全学校等。《双十纲领》的具体政策和内容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了根据地内抗日爱国人士的交相称赞，一致称之为"治国纲领"。曲阳一些绅士联合写信说："《双十纲领》的每一条，都贯穿着统一战线的精神，全是对抗战建国和老百姓有好处的。"⑥

《双十纲领》的颁布和实施，起了良好的作用，使晋察冀的各项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更好地贯彻了党的方针路线，贯彻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巩固与发展了晋察冀边区，对于坚持敌后抗战，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有着重大的意义。《双十纲领》颁布后，延安的《新中华报》发表评论指出："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民主主义的施政纲领，是最适合目前抗日需要的。"⑦

最后，加强了根据地的军事建设。为了使根据地的部队达到彻底的巩固和较高程度的正规化，军区于 1939 年 3 月到 1940 年前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编整军运动（即两期整编和两期政治整军运动）。基本方针是："从编制上、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进一步巩固党，巩固军队，创造出基干兵团，并完成更高度的正规化的要求"，⑧从而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在此基础之上，军区开始对部队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以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政治思想觉悟和纪律观念。除此之外，晋察冀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中，不仅拥有强大的正规军队，还有众多的地方武装和民兵。这三级武装组织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便成为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巩固发展根据地的有力基石。

经济建设是巩固、壮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战胜敌人的一个决定条件，是边区各级政府的中心工作。鉴于自 1938 年初以来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及在地主与农民之间关系中出现的许多问题，1940 年 2 月，边区政



府对《减租减息单行条例》作了修正，重新颁布。修正后的条例，重申实行"二五减租"，并根据边区情况及1930年6月30日国民政府公布的土地法令限制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使国民政府难以反对，"充分表现着条例的统一战线精神与合法性。"[⑨]由于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排除了封建的超额地租和高利贷剥削，大大减轻了广大农民的租息负担。从1939年起到1940年6月，仅晋察冀区两个专区减租额即达614.5万吨，4个专区的减息额达32.6万多元。同时地主为了减少负担而当地、卖地，使农民得到一部分土地，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明显改善，农村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农成分急剧增加，贫雇农大为减少，地主封建势力大为削弱，边区基本群众在政治上树立了明显优势，同时也创造了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巩固了农村各阶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⑩]

晋察冀根据地在普遍开展减租减息群众运动的同时，为了打破敌人对我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实现自给自足，发动群众掀起了生产建设的热潮，打响了反经济封锁的斗争。在边区政府的号召下，晋察冀根据地的党政军民齐动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业生产运动。在发展工业方面，边区政府提出了"争取边区工业品自给自足"的口号，以避免边区成为敌人的商品倾销市场，使根据地能够完全独立自主的进行经济建设。在商业贸易方面，边区政府于1940年8月制定了《管理对外贸易暂行条例》等一系列政策法令，依据这一系列政策法令有计划地进行贸易的输入和输出，逐渐控制了对外贸易，使"敌人占领的城镇和交通沿线农产品供不应求，这就使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经济战线上反封锁的主动权，迫使敌人不得不以我们所需要的工业品来换取他所需要的农产品及土特产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⑪]此外，我边区银行成立后，统一了边区货币，开展了对敌的货币斗争，建立起自己统一的货币市场和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以促进生产发展，打击敌人的经济封锁与掠夺，稳定边区财政。

在边区经济建设和对敌经济斗争取得重要成就和胜利的情况下，为了总结经验，确定边区经济建设今后的任务。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于1940年8月1日至10日召开了边区第一次经济工作会议。会议明确了边区经济建设及对敌经济斗争的方向、中心任务和具体政策；作出了关于投资法、劳动保护法、工人管理法和贸易问题等项重要决定。这次经济会议，对于进一步奠定边区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使根据地经济建设健康的发展，加强对敌经济斗争，起了重要历史作用。

晋察冀根据地各项建设的进行，为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根据地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首先是从学校教育的恢复和改造开始的。1939 年以后，边区普及了义务初小教育，70% 的村庄建立了初小；中等教育除了中学以外，开始创办与发展短期的师范学校；“在中学之上，还有从延安过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和抗大二分校。华北联合大学由成仿吾同志任校长，抗大二分校由陈伯钧同志任校长。此外，边区自身还创办了抗战建国学院，院长由宋劭文同志兼任。”[12]此外，新闻出版事业也有了一定的巩固和发展。晋察冀省委主办的《抗敌报》、边区政府机关报《救国报》、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抗敌三日刊》等，都是在边区内外很有影响的报纸。另外，根据地的戏剧、诗歌、小说等各种形式的艺术创作也都以活跃的姿态迅猛发展，在根据地的文教和宣传方面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根据地的卫生事业也蓬勃发展，成立了专门的军区卫生学校，教学和医疗设备日臻完善。值得一提的是，这所军区卫生学校是在白求恩大夫的帮助下建成的，在白求恩牺牲以后，晋察冀军区将学校更名为“白求恩卫生学校”，以纪念这位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了自己生命的国际友人。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在敌后创建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被中共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13]它的创立、巩固和发展，对于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和全国持久抗战起了“坚强堡垒”的作用，对于反攻及配合苏联红军对日作战、收复东北失地起了“前进阵地”的作用，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有许多新的开拓和创造，各方面政策也比较完备，不仅在对敌斗争方面，而且建党、建军、建政、群众工作以及经济、文教、卫生等工作，都创造了伟大的成就和丰富的经验，为日后新中国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注释：

①⑥⑦⑪⑫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 年 8 月版，第 459 页，第 470 页，第 467 页，第 473 ~474 页，第 480 页。

②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年版，第 144 页。

③④《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52 年版，第 1088 页，第 1087 页。

⑤⑩谢忠厚，肖银成：《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改革出版社，1992 年



6月版，第203页，第246页。

⑧《晋察冀军区建军工作之初步总结》，1940年12月12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文献选编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469页。

⑨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北省档案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195页。

⑬《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主席团致晋察冀边区电》，1938年10月5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文献选编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200页。

一百二十九师整编

抗日游击战争在华北战后战场的迅猛发展，使华北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得以迅速扩大，处在战斗频繁、条件艰苦、环境险恶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亟需整顿与加强，否则难以承担中共中央赋予的重任和适应坚持持久抗战的需要。于是，自1939年下半年开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先后发出一系列关于加强华北根据地和军队建设的指示，明确要求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切实做好党的巩固工作，加紧军队训练，努力建设抗日民主政权，以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发展需要。

1939年是八路军迅猛发展的一年。截止到1939年12月，八路军的总兵力由1938年的15.6万余人发展到27万余人。八路军的迅速发展，使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武装力量得以壮大，但也为八路军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如八路军中新成员增多，新干部的增加，军政素质有待于进一步提高，部队的组织体制亟需进一步整顿。八路军总部于1939年上半年和1940年2月21日连续发出整军训令，强调巩固党的领导，提高军队的纪律性，提高战斗力与技术教育，切实建立军队中的一切制度，克服游击主义，使其正规化，特别注意提高各级干部军事、政治与文化水平。并要求在军政整训的同时，进行组织编制整顿。以巩固抗战成果，使八路军适应持久抗战的需要。计划规定于1939年两期整顿60个团，1940年两期再整顿50个团。

为了保证整军计划的顺利进行，1940年4月11日至26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在驻地黎城县召开了太行、太岳、冀南地区的高级干部会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宣布，成立以邓小平为书记的太行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太行、太岳、冀南三个地区工作。与会者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和《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两个文件，统一了思想认识，并结合本区实际提出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今后建设的任务。会上，杨尚昆和刘伯承分别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和《党军建设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建军、建政、建党



三大战略方针与积极打击日军“囚笼政策”的任务，明确了三个行政区转入巩固根据地建设、逐步走上正规的目标。关于军队建设，会议指出“是全党的任务，总目标是建立党军”[①]，要重点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提高部队政治素质并要求对军队进行扩大和补充，军队的编制要重新调整，充实战斗部队，缩小非战斗机关，还要加强部队作战训练和队伍训练，指定条令、法规，使部队逐步实现正规化等等。这是抗战以来华北地区一次重要会议，它标志着边区创建大业的条件基本达到，使根据地建设有计划的走向正规。会议以后，晋冀豫根据地的建党、建军、建政三大任务全面展开，从而使华北抗日根据地的面貌为之一新，极大地巩固了根据地。

根据黎城会议精神，建军工作在紧张的对敌斗争和反顽作战间隙中进行，重点是政治整军和军队整编。在此背景之下，一百二十九师开始了整编。

1940 年 5 月 5 日，刘伯承、邓小平签发了《一二九师建军整军训令》，提出要“争取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巩固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与巩固进步力量，彻底完成创造模范党军的光荣、伟大、艰巨的任务……使我军在组织上加以巩固，提高战术修养。”[②]训令要求经过整军，使全体指战员不仅要简单地执行命令，而且要激发他们创造性的参加各项建设。政治整军以阶级教育为中心，以干部为重点，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提高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增强部队的战斗意志与干部的决策水平。整军中，制定颁布了《一二九师连（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支部工作暂行条例》、《救亡室工作暂行条例》等，提出了创造模范党支部的号召，加强了连队党支部的建设。另外，有些党支部还建立了经常性的党日、党课制度，进一步加强了政权建设。通过积极慎重的发展新党员，各部队的党员一般保持在 40% 左右，地方团队达到 30%，大部分党员在完成任务过程中都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政治整军始终把加强党的建设放在首位，采取各种形式举办新党员训练班、干部党员学习班，组织党员先后学习《克服目前时局危机》、《抗日民族统一政策》等文件，并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在学习理论的基础上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每位党员从思想上积极入党，经整顿，提高了广大军队干部、战士的阶级斗争觉悟，部队党员的数量和质量都得以提高。

同时，为解决一百二十九师在大发展中干部的工作能力不能适应工作需

要的矛盾，特确立了干部轮训制度，在部队中设立了干部教育部门，规定八路军干部每天学习两小时，普遍进行形势教育、艰苦奋斗教育、光荣传统教育和政策纪律教育。并针对部队中存在的连队政治干部、党支部骨干对政治工作把握不够，各地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不强等主要问题，一百二十九师政治部组织了政治工作研究会，总结了工作经验，吸收和培养了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做政治工作，充实政治工作队伍，加强了各级政治机关。对于一些混入军队的奸细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在政治整军过程中给予严肃处理，纯洁了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

一百二十九师干部的特点是文化水平较低，学员中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严重阻碍军事科学的学习。刘伯承、邓小平多次强调“培养干部，首先要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学习文化就好比是一把开锁的钥匙，掌握了它才能打开学军事科学知识和革命理论的大门。”[③]因此，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是先决条件，通过在党校、抗大分校、随营学校、轮训队、政工训练队的努力学习，很多学员的知识水平有显著提高，他们把课堂上讲的理论及战斗经验与野外训练结合起来，有针对性的进行游击战术、班排连战术的野外演习，收到了很好效果。

在政治整军的基础上，1940年6月7日，由刘伯承、邓小平直接领导，一百二十九师进行了军队整编。除第三百八十五旅（旅长陈锡联、政治委员谢富治，辖第七百六十九、第十三、第十四团）、三百八十六旅（旅长陈赓、政治委员王新亭，辖第七百七十二、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团）及原属八路军第二纵队新编第一旅（旅长韦杰、政治委员唐天际，辖第一、二团）改归第一百二十九师建制外，主力部队新编了6个旅：以3纵队改编为新编第四旅，旅长徐深吉、政治委员吴富善、副旅长杜义德，辖第七百七十一、第十、第十一团；以东进纵队改编为新编第七旅，旅长易良品、政治委员文建武、钟汉华，副旅长邹国厚，辖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团；以筑先纵队和先遣纵队改编为新编第八旅，旅长张维汉、政治委员萧永智，副旅长王近山，辖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团；以冀南部分基干武装改编为新编第九旅，旅长桂干生，副旅长杨宏坤，辖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团；以晋冀豫边纵第一、第三团与保安第六团及平汉纵队改编为新编第十旅，旅长范子侠、政治委员赖际发，副旅长汪乃贵，辖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团；以冀西游击队、边纵第二团、宗书阁大队及赞皇独立团改编为新编第十一旅，旅长尹先炳、政治委员黄振堂，副旅长秦基伟，辖第三



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团。师特务团改为第三十四团。

1940 年 6 月，八路军一百二十九师司令部、政治部在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副主任黄镇等首长的率领下，从辽县桐峪镇迁驻涉县常乐村，整军建军工作已进入到了整训与整编的最后阶段。为了适应斗争需要，一百二十九师在此调整了军区、军分区的划分，撤消了晋冀豫边纵机构，成立了太行、太岳、冀南三个军区，13 个军分区。并作出了大力发展地方人民武装，“保卫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决定。

由一百二十九师兼太行军区，并直接指挥第三百八十五旅和新编第一、第十、第十一旅，下辖五个军分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为秦基伟，政治委员为高扬；第二军分区司令员为张园传、曾绍山（后），政治委员为赖若愚；第三军分区司令员为郭国言，政治委员为王一伦；第四军分区司令员为石志本，政治委员为王孝慈；第五军分区司令员为皮定均，政治委员为鲁瑞林。”④

第三百八十六旅兼太岳军区，陈赓仍为司令员，周希汉为参谋长，苏精诚为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军分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为张春森、刘绍棠（后），政治委员为金世柏；第二军分区司令员为张汉臣，政治委员为史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王清川，政治委员为孙雨亭。”⑤

冀南军区指挥新编第四、第七、第八、第九旅。司令员为陈再道，政治委员为宋任穷，副司令员为王宏坤，范朝利为参谋长，刘志坚为政治部主任。冀南军区仍辖五个军分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丁先国，政治委员刘大坤；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吴诚忠；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张维翰，政治委员萧永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荣；第五军分区司令员赵义京。”⑥

正规军队整编完后，1940 年 8 月 1 日，一百二十九师兼太行军区于赤岸召开了军区扩大干部会议，作出大力发展地方人民武装，“保卫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决定。会议中提出了建立统一的民兵制度，从军区到县级逐级成立武装工作科，开始全面组织民兵。到年底时，民兵迅速发展到一万余人，成为敌后抗日一支重要的人民武装。

一百二十九师经过政治整军、军事整编及加强军区建设后，部队的战斗力有了显著的提高，对巩固华北根据地，加强对敌斗争和争取时局转变，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加强了统一领导，理顺了管理体系。各军区和军分区成立后，立即把发展地方武装列入议事日程。军区、军分区司令部都建立了人民武装科，政治部设立了武装动员科。军区、军分区还选派有能力有经验的

干部充实和加强地方武装领导，并对地方武装干部进行轮训。经整编后，兵力的重新调配使部队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大为增强，主力军和人民武装有机联系在一起，统一了领导，便利了对敌斗争和人民武装的发展。在军队整编的同时，人民武装力量也在逐步壮大发展，建立起自己的管理体系，为深入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保卫抗日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第二，通过这次政治整军运动，带来了军队的好传统和好作风，使部队的军政素质有了进一步提高，士气格外旺盛。同时，大力发展的正规军和民兵队伍，使一百二十九师在抗战期间从不到一万人的兵力，迅速壮大为有 30 万正规军和 40 万民兵的强大队伍，成为日后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的四支野战军之一。

注释：

①《杨尚昆：在黎城会议上的报告——目前政治形势与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 年 4 月 16 日，《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上、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233 页。

②宋玉玺，莫巧琳：《邓小平与抗日战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年 07 月第 1 版，第 110 页。

③杨国宇，陈斐琴：《二十八年间续编——从师政委到总书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年 6 月第 1 版，第 73 页。

④⑤⑥谢远学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纪实第四部铁血河山》中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 335 页，第 335 页，第 335 页。



聂荣臻、邓小平、罗荣桓论根据地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八路军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独立自主地在华北、华中、华南广大地区建立了十几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人聂荣臻、邓小平、罗荣桓等同志根据实践，精辟地论述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重大问题，在诸如根据地的武装力量、政权建设、经济建设、与群众运动等方面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创建性的文章和讲话，及时总结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因地制宜地开展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

政权建设，是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首要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抗日民主政权。其人员组成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各占1/3。这种在根据地建立的民主政权，既包含了统一战线性质，又具备人民民主内容，它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了各党、各派、各界、各救亡团体，又保证了基本群众占政治优势的完全新型的民主政权结构。

聂荣臻于1937年11月7日领导成立了晋察冀军区，由此诞生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他认为：“政权建设是关系根据地能否生存的根本大计。这是因为，一方面形式的发展急需建立统一的政权领导机构，长期的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混乱。另方面，这也是群众的迫切要求。”[①]于是，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立之初，聂荣臻就积极组织建立了一个抗日临时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并说明：“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形式，包括着各党、各派、各阶层及各种民族分子。它的实际内容是贯彻抗日与真正民主。”[②]对于政权的建设，首要的就是党的建设。在根据地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有机地把根据地各个战线的斗争统一组织起

来，协调起来，结成一个坚强的整体，使边区党组织真正成为边区人民斗争的坚强领导核心。"③随后从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进行了巩固党的工作，提高了边区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政治思想觉悟，加强了组织性纪律性，纯洁了党组织。

对于根据地的政治建设，邓小平在《敌后方的两个战线》中，详细地阐述了他的抗日民主政权构想："敌后方的政府应该是民族主义的政府，亦即是真正领导抗日的政府；民权主义的政府，亦即是尊重民意，成立民意机关，接受民意监督，由选民选举产生，给民众以行动、言论、出版等自由的民主政府；民生主义的政府，必须在'有利于国而无害于民'的原则下，改善民生，增加生产；统一战线的政府，不仅是各抗战党派共同拥护的政府，而且是团结各阶层的核心；与人民密切联系的政府；按照地形、敌情等条件划分行政区域，以适应于抗战需要。"④1940 年 3 月 6 日，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各根据地要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邓小平指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与巩固，其中心环节，厥为民主政治之树立与发挥，以及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之认真建设。"⑤认为"三三制"政权"既能合乎统一战线原则，团结大多数以与日本侵略者、汉奸、亲日派、反动派进行斗争，又能保证由共产党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所以这不仅是今天的敌后抗战的最好形式，而且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⑥

罗荣桓认为，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除了要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及"三三制"政权形式，还应该加强党的建设，"严格建立同级工作互相联系制度与自上而下的检查制度，打击官僚、腐化、贪污分子与地主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因为这是最容易损害我们的。从各个工作组织中间，开展自我工作检讨，发展自我工作批评，巩固党的一致，团结全党像一个人一样，并经过军政民去实现党对全盘战争的领导。是我们充分发展根据地与建设巩固根据地最可靠的保证。"

武装力量的建设是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内容。聂荣臻认为，"军事建设和军事斗争，是根据地建设和发展的中心问题"，"必须不断发展和壮大人民军队的力量，坚持以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队和人民武装相互配合，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方针。"⑦根据地的军事力量是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三位一体的结构，"主力部队是开创和保卫根据地的支柱"，除此之外，还需要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的紧密配合。1941 年 1 月，聂荣臻在晋察冀北岳区党委扩大会议的报告中提出，对于主力部队，应该继续提高质量，增强



战术素养；对于地方武装，要加强领导和提高干部质量；而对于人民武装，要作为以后军事建设的中心，“把最大的力量放在改造与整理人民武装方面，把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口号变为现实，才能把群众性的游击战术具体化，才能把广大民兵变为主力军的后备力量与补充源泉。”[⑧]另外，聂荣臻又强调了各种武装的领导与指挥权。在同一块根据地内，必须要求集中领导与统一指挥，做到低级武装服从高级武装，而组织起来的任何武装，都是党领导下的武装。邓小平在武装力量的建设上，同样认为，一方面，“丝毫不可放松正规军的教育管理和军事政治质量的提高，使之成为现在游击战争的骨干和将来反攻军队的基干与干部的源泉。”[⑨]另一方面，要重视地方武装建设，并认为地方武装和民兵是建设革命根据地的首要条件。地方武装和民兵是正规军发展的重要补充来源和正规军作战的有力支援力量，是群众性抗日游击战争的主要力量，因此，为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进行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不建立地方人民武装是不可能的。“加强地方武装、人民武装，使其成为游击战争的骨干”，[⑩]是根据地生存的需要。罗荣桓也着重提到了地方武装的建设问题，指示应“整理现有地方武装，克服其弱点”，“统一编制、统一指挥”，加强党对于游击部队的领导，“克服各自为政的游击主义现象”，并“有计划地发展和扩大，提高质量”。[⑪]在《关于创造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初步检讨》中，罗荣桓表示：“地方武装的嫩弱与不纯洁，既不能成为主力的有力助手，又不能成为主力唯一的补充来源。”因此，“目前尤为必须的是加紧深入发展群众组织，普遍发展自卫武装”，“克服主力与地方武装造成分离的现象”，并在现有的地方武装中，“加紧党的建立，开展政治工作”，[⑫]给予地方武装必要的改造，成为主力部队的重要补充来源，从而加强根据地的武装建设。

敌后抗战虽以军事斗争为中心，但根据地的建设不能只是一个军事斗争问题，根据地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实体。如果单纯地用军事观点去进行战备那是很难取胜的，必须使武装斗争与其他斗争密切配合，加强根据地的全面建设。而其中，经济建设是根据地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聂荣臻在谈到根据地的经济工作时说：“生产建设和经济斗争的胜负，直接关系着边区军民的生活、根据地的巩固和敌后游击战争的持久坚持。”因此，对于经济建设，聂荣臻给予了高度重视。“在全边区普遍实行了‘二五减租’和‘一分减息’，改善了农村的生产关系，提高了农村的生产力”；大力发展生产，“保障了人民的粮食与部队的给养，使边区人民的经济生活

得到了初步改善”；“财政上普遍废除了苛捐杂税，由开始的合理负担，进到建立统筹统支和必要的税收制度，并发行自由认购的救国公债，使民众没有感到负担的痛苦。”[13]邓小平在领导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中，同样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实行减租减息、军民大生产等一系列经济政策，在长期的实践中，邓小平归纳和总结了四条经验：“第一，敌后的一切离不开对敌的尖锐斗争，我们每一点经济建设的果实，都是用血换来的。第二，没有正确的政策，就谈不上经济建设，而这些政策的制定，必须以人民福利和抗战需要为出发点。第三，任何一个经济建设的事业，没有广大人民自愿地积极地参加，都是得不到结果的。第四，将大批的得力干部分配到经济战线上去，帮助他们积累经验，才能使经济建设获得保障。”[14]罗荣桓认为。经济建设应基于“一切工作给人民以部分的生活改善”，因此在根据地范围内，“公平合理负担”，“反对摊派”；“由政府设法救济灾难同胞，帮助耕种，利用失业的劳力，开展生产”；“减租减息，禁止虐待学徒”；“废除杂税，以区为单位统一国家税收”；“对商人的营业应特别注意”；“奖励家庭手工业及农产品”；“查禁和没收伪币” 等。[15]

在根据地的建设中，发动群众是至关重要的。人民是对敌斗争一切力量的源泉，群众组织建设是根据地建设的主要内容。聂荣臻指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必须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为依靠，关键是发动群众。敌后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抗战的支持和拥护，是我们战胜敌人的最可靠基础。”[16]那么如何发动群众呢？聂荣臻接着指出：“要想把千百万群众发动起来，党的决策又是决定的因素。”在创建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要有一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这一整套的政策，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有总的政策，还有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包括减租减息政策、统一战线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两面政权政策、除奸政策等等。”[17]只有政策的正确和稳妥，才能将广大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从而保持基本的群众优势，使统一战线得到日益加强和巩固。

“群众斗争要约束于统一战线范围之内”，这是邓小平关于群众运动的独到见解。统一战线是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武器，群众斗争不再是单纯的农民斗争，是各个有抗日意愿阶级的联合抗日斗争。邓小平在《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中认为：一、对于地主阶级，要“把打的阶段与拉的阶段结合起来，实行打中有拉，拉中有打，打得要恰当，拉得要及时”；二、“削



弱封建，而不是消灭封建”；三、“削弱封建不只是在经济上，而且表现在政治上思想上”；四、团结地主抗日，应使之能够生活，能够保有一定的经济地位，保障其合法的财权；五、对富农应采取削弱其封建部分、奖励其资本主义部分的方针。[18]邓小平还总结论述了群众运动的规律：“群众运动的规律，一是发动群众，在发动群众中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二是发动群众之后，要注意整理和健全群众组织生活；三是在发动和组织群众中，注意群众的政治教育；第四，把群众的政治经济斗争约束于统一战线范围之内。不了解这些规律，不懂得诱导群众运动逐渐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就会使运动脱节，就不能逐步提高群众到自为阶级的阶段，就不能保卫既得利益。”[19]因此，群众运动要结合抗战实践，要拥护党对抗战的领导，要在对敌武装斗争和积极参与民主政权建设中发动和开展。

罗荣桓从鲁南的斗争经验中得出，群众运动的落后，是由于封建地主势力的强大和我根据地工作不广泛、不深入并缺乏坚持性而造成的。由于群众运动的落后，影响了地方武装不能取得大量的发展与质量的改善，影响了主力不能大量的补充与战斗力的增强，使革命根据地的扩大受到限制，而这也正是联合政权虚弱的根源。因此要发动群众，开展群众运动，就要切实落实好农民生活的改善，使之打碎封建地主势力的枷锁。另外，要组织农会，以农会为基础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这将成为联合政府主要的支柱与坚持抗战主要的动力，是群众运动中最中心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人聂荣臻、邓小平、罗荣桓等同志关于根据地建设的论述，是在长期的实践中摸索、总结出来的，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关于抗日游击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宝贵的历史财富。

注释：

①②③⑦⑯⑰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577页，第58页，第584页，第574页，第572页，第573页。

④⑤⑥⑨⑩⑲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邓小平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

89~91 页，第 169 页，第 200 页，第 357 页，第 360 页，第 342 页。

⑧⑬聂荣臻：《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 年 7 月版，第 165 页，第 60 页。

⑪⑫⑮罗荣桓：《罗荣桓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 年 11 月版，第 39 页，第 93 页，第 40 页。

⑭⑱邓小平：《邓小平文选（1938——1965）》，人民出版社，1989 年 5 月版，第 85 页，第 71~73 页。



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抗日根据地是敌后军民坚持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①中共中央华中局在第一次扩大会议后，根据会议决议和所提出的巩固根据地的九项具体措施，作了普遍深入地加强根据地建设的部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抗日根据地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基本内容的社会经济改革。抗战相持阶段后期，当敌后抗战处于十分困难、战争极端残酷的时候，党中央提出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根据地建设的正确方针，要求各抗日根据地一面作战，一面建设，在粉碎日伪军扫荡，清乡，击退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前提下，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彻底实行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政策，并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完成改造政权、发展人民武装等各项任务。

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在开辟之初，先后都进行了发动与组织群众，实行减租减息等工作，尤其是中共中央中原局到达华中敌后之后，在中原局领导下，各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建立政权和扩大抗日武装等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由于战斗频繁，干部和经验不足，因而，减租减息等群众运动开展得尚不够普遍、深入，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与组织起来。针对这些情况，刘少奇在总结华中经验时指出：“巩固根据地，其中心一环，就是广泛深入地发动、组织并教育基本群众，以提高其觉悟”，“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群众运动，主要是农民运动，应把农会放在第一位。”②1942 年，各抗日根据地均集中力量，抓紧反扫荡、反清乡战斗间隙和夏、秋收获季节，按照中心区、边缘区和游击区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式，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彻底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减租减息政策使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程度大为减轻，农民在经济上得到了实惠，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也大为提高。同时，交租交息、合理负担等民主政策的实施，也团结了大多数地主，扩大了抗日阵营。至 1942 年冬，各抗日根据地基本完成了减租减息、发动与组织

群众的任务。由于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政策的彻底执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抗战积极性，农民抗日救国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组织蓬勃发展起来，增强了抗日力量。

在充分发动的群众基础上，各抗日根据地普遍进行了自下而上的政权民主改造工作。在中心区，废除旧的保甲制度，民主选举村、乡政权，并在县以上政权机构彻底实行“三三制”政策，即在人员的分配上，共产党员占1/3，非党左派分子占1/3，中间派占1/3。1941年11月7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参议会上发表演说，阐明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所实行的各项新民主主义政策和共产党与党外人士进行民主合作的原则。他批评党内一部分人“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保存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指出“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③]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各抗日根据地纷纷按“三三制”原则彻底完成了民主政治改革。以晋察冀、陕甘宁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例：晋察冀根据地颁布了《晋察冀边区施政纲领》，调动了各阶层爱国群众积极参政的热情；陕甘宁边区作为社会民主改革最彻底的地区，通过普选产生了县以下各级参议会及政府机关，并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及各项重要法案；晋西北根据地继完成村、区的民主选举后，又召开临时参议会并通过《巩固和建设晋西北的施政纲领》。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的建立和健全，进一步提高了工农群众的政治地位，团结了各抗日阶层，巩固、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了根据地的政治建设。它表明抗日根据地从性质上讲，已经属于新民主主义范畴。

在加强政权建设的同时，各根据地也丝毫没有放松对武装力量的建设。1942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分会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多次指示，发出了《关于精兵简政的通知》。各根据地的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按照通知规定的方针和步骤，结合本地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实行了精兵简政。精兵简政是节约财政开支，减轻人民负担，提高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的重要办法，也是党克服严重困难的极其重要的政策之一。“精兵”的目的是提高主力部队的质量，扩大和加强地方部队及民兵建设。各抗日根据地在县区乡各级普遍成立了武装委员会，抽调大批干部从事民兵工作，健全人民武装的领导机构。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及精兵简政的原则，各根据地多次压缩机关，整编部队，加强基层，充实战斗部队。以主力部队师或旅兼军区或军分区，以主力团为分区基干团，使主力部队地方化，以加强地



方武装和人民武装的建设。从1941年冬季开始至1943年，各根据地大都经过二至三次精简，裁并重叠机构，精简冗员，实行合署办公。陕甘宁边区政府机构减少四分之一，政府系统的脱产人员由11 500人减至7 500人，减少了近35%。晋察冀边区政府精简了50%。晋绥根据地党、政、军、民、学在精简后，全部脱产人员由5.7万人减少至3.5万人（除调陕北外，实际减14 600人）。山东根据地自1942年至1943年共精简了3万余人，占原有脱产人员的27%。④经过精简整编，主力军一部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更有力地促进了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广泛展开。至1943年年底，华中各根据地的民兵总数已达到62万人。强大的地方武装和农民，是巩固根据地的一支重要力量，担负着地方自卫、清剿土匪、维持治安和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等任务，在粉碎日伪军扫荡、清乡和"蚕食"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由此说明，精兵简政是一项积极而非消极的政策。它一方面节约了财政开支，减轻了人民负担，同时精干了指挥机关，提高了主力部队的战斗力，加强了地方兵团和人民武装的建设，对人民游击战争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精简整编之后，各根据地的武装力量进一步加强了政治思想建设和军事训练。根据军分会的指示，召开了党的代表会议，以整风精神检查军队建设问题，强调发扬民主，搞好官兵关系，严格群众纪律，搞好军民和军政关系，健全政治、经济民主制度，加强连队党支部建设。经过这次会议之后，根据地武装力量的各项建设有了明显进展，部队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战斗力更加提高。

为了进一步加强根据地建设，集中力量开展对敌斗争，各根据地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实行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党中央决定，中央代表机关及各级党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根据以上指示，各抗日根据地在整风运动和精兵简政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调整了领导机构，加强了党的统一领导。同时，各根据地在党内进行民主集中制和增强党性的教育，在党政军民各组织之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工作制度、方法和互相关系中存在的缺点。在晋察冀地区，由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直接领导各地委、冀热边特委和冀中工作委员会；在晋绥地区，于1942年10月成立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统一领导晋西北及绥远地区党、政、军、民工作；在晋冀鲁豫地区，1942年9月成立了以邓小平为书记的太行分局，统一领导太行、太岳、冀南、冀豫区党委。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实行，密切了党政军民各组织间的关系，增强了全局观念，并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这对发挥各抗日根据地的整体力量，战胜严重困难，坚持敌后

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各抗日根据地在进行上述各项建设的同时，为克服财经困难，支持长期抗战，改善军民生活，还大力领导军民发展生产。广大群众在各级政府领导下，兴修水利，组织互助，有力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机关、部队利用作战间隙进行生产，努力减轻人民负担，改善自身的生活。据苏南、苏北、淮南、淮北、皖中、浙东等根据地统计，1940 年秋至 1943 年春，各根据地抗日军民共同修筑圩堤 818 公里，开浚大小河道 3 370 公里，使 1 100 余万亩土地受益。[5]经过党政军民共同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初步战胜了敌顽的掠夺封锁和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严重困难。

与此同时，各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也成绩斐然。中共中央及时作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将发展抗日的革命文化运动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各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创办了大量的中小学校，并派出许多干部战士到学校担任军事、政治、文化教员，广泛推行新民主主义教育。另外，各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事业、文艺工作也非常活跃，极大地丰富了各抗日根据地的文化生活。

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坚决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在根据地建设中取得了显著成绩。根据地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军队素质不断提高，地方武装和民兵组织也不断发展，在敌顽夹击下，不仅粉碎了日军的扫荡、清乡和“蚕食”，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犯，坚持了敌后抗战，而且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在广泛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开展游击战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为争取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注释：

①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 年 5 月 30 日，《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387 页。

②刘少奇：《关于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1942 年 12 月 9 日，《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 年 12 月版，第 233 页、第 235 页。

③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 年 11 月 6 日，《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767 页。

④何理：《抗日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 7 月版，第 362 页。

⑤谢远学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纪实第四部铁血河山》中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 397 页。



德、意、日签订《三国公约》与所谓《日、满、华共同宣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到1940年和1941年，国际局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尤其是国际法西斯势力，在这一时期表现尤为猖獗。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1940年，希特勒并没有按照西方帝国主义的意旨，东进去进攻苏联，而是看准了西方国家的绥靖政策和战争准备不足的弱点，把进攻的矛头首先指向西方。1940年4月，德军攻占挪威和丹麦；5月，侵占荷兰、比利时、卢森堡，随即向法国猛烈进攻；6月，德军攻陷巴黎。接着，德国又对英国展开了海空激战，并相继占领了英伦海峡中的各岛屿，封锁了英国的全部海岸线，英国由此陷于空前困境。在实施战争打击的同时，希特勒还在中欧和东欧各国进行种种阴谋活动，通过威逼利诱等手段策动了一些国家加入到其法西斯战争的行列。

欧洲战场发生的巨大变化，使德国开始重新认识到建立德意日军事同盟的迫切需要。首先，德国在欧洲战场的进一步扩张，迫切需要日本能在亚洲发动攻势，以牵制英美；其次，德国在横扫欧洲之后，下一个进攻的目标即强大的苏联。在制订进攻苏联计划的过程中，德国首先需要的就是比以前更加密切地协调同它的“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盟友日本和意大利的行动。按照希特勒统帅部的设想，日本应当牵制美国的力量，不让他们进入欧洲战场；应当吸住苏联几十个师和大部分空军，使他们无暇兼顾。

早在二战爆发前，为了协调三国的军事行动，德、意、日建立军事同盟的谈判即已开始。但由于希特勒首先要进攻英、法，而日本则试图把侵华战争扩大到苏联，双方目标不一，谈判未获结果。1939年5月，德国与意大利订立军事同盟“钢铁条约”。而这时欧洲战场的迅速变化，又更加刺激了

日本夺取太平洋地区、建立“东亚新秩序”的侵略野心。为了扩大在亚洲的侵略战争，日本倡议订立军事同盟，这立刻得到了德国更加有力的反应。

德日谈判于 1940 年 9 月 9 日在东京举行。代表日本的是外相松冈，代表德国的是施特默尔和奥特两位大使。9 月 18 日，里宾特洛甫前往罗马，说服墨索里尼和齐亚诺同意意大利加入德日军事同盟。1940 年 9 月 27 日，德、意、日三国在德国柏林签署军事同盟条约，即《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通称《三国轴心协定》，又称《柏林公约》。条约有效期为十年。至翌年六月，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克罗地亚等国也相继加入该条约。条约共 6 条，主要内容是：日本承认并尊重德、意两国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德、意两国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三国保证如缔约国一方受到目前未参与欧战或中日“冲突”中的一国攻击时，应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援助；上述条款毫不影响各缔约国与苏联现存的政治地位。

在谈判期间，德日两国政府还以互换照会的形式就南洋问题签署了许多秘密协定。日德两国商定，一旦日本与英国发生武装冲突，“德国将尽其所能，以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援助日本”。希特勒一伙同意曾处于日本委任统治之下的德国过去在南洋的殖民地仍由日本管辖，但以德国得到一定补偿为条件。德国以前在南洋的其余殖民地，于欧战结束之后德国应自行收回，然后再与日本政府讨论它们的分属问题，尽可能照顾日本的利益，日本为此应向德国提供相应的补偿。与此同时，三国还协议建立一个总委员会和两个技术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总委员会由德意两国驻日本大使参加，设署东京办公，以日本外相为主席。在柏林和罗马也拟设立同样的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也设在东京，由日本的陆海军代表和德意两国大使馆的陆、海、空三军武官组成。在德意两国首都也设立同样的委员会。总委员会的目的是协调三国的政策；军事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的任务是解决协同作战和相互进行经济援助的问题。

三国条约的签署，正式产生了三个侵略国的军事同盟。这个条约是针对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首先是针对苏联的。条约补充了 1936 年德日协定和《反共产国际协定》的不足，并消除了德国与日本因 1939 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引起的嫌隙。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开始积极部署东侵苏联，而日本则加紧了侵占中国大陆的步伐。

为了早日结束中日战争，1940 年 7 月 27 日，日本近卫内阁通过了“处



理时局纲要”，提出了向南使用武力的两种情况：一种是在中日战争结束以后发动太平洋战争，另一种是在中日战争尚未结束就发动太平洋战争。但无论哪一种情况，日本的最终目的都在于早日结束中日战争。按照“处理时局纲要”，从1940年秋开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即尽一切可能组织在华的兵力，疯狂地扫荡抗日民主根据地，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强占抗日根据地。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正式形成，这更是助长了日本的这一战略行径。同时，日本政府还加紧扶持汪精卫傀儡政权，加强同蒋介石集团的谈判活动，以为中日战争的早日结束摇旗助威，推波助澜。

1940年3月30日，汪伪傀儡政府在南京成立。当天，日本政府即发表声明表示“庆贺”，并声称“予以全般之协力与援助”，但没有给予承认。4月1日，日本政府任命前首相阿部信行为驻南京对华交涉特命全权大使，到南京表示“祝贺”，同时，完成日政府交给的任务，其中一项为：签订中国、日本与第三国的关系及日中新关系的条约。

早在1939年12月30日，日汪双方即签订了《调整中日新关系之协议》的密约，就所谓调整中日新关系的原则、事项、方法、条件等作出了详细的规定。这也是日汪直接签订的第一个条约。1940年6月11日，日本政府为了进一步明确日中新关系，使汪私人订立的《调整中日新关系之协议》官方化，随即向阿部发出了训令，要他依照下列情况，就调整日中新关系与汪政府开始谈判，缔结条约：

第一，帝国政府承认新中央政府，要在签订条约的形式下进行。

第二，中国承认满洲国，在此次签订条约前或至迟与此同时，必须实行。在“承认”的形式上，以发表中日满三国政府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并以互助合作精神为宗旨的共同宣言的形式进行。

第三，新条约是日本在中国对抗日势力进行大规模战争之后，〔以〕在我方占领区内成立的新政府为另一方缔结的条约，与通常交战双方在停战后缔结的讲和条约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

总之，新条约要作为事变的善后处理，并作为今后长期的中日关系准则。除此，对内要唤起国民士气，加强团结，为完成战争，竭尽国民职责；对外要争取中国人心，以促进事变之解决；对第三国方面，要显示日本为完成国策决不动摇。

第四，因战争仍在进行中，作为我方承认新政府，缔结新条约，当然不

能累及战争行为，也不能受其约束。

第五，此次谈判大致以去年梅机关与汪之间的密约之线进行。因此，谈判开始时，首先要求中方做到全面确认密约，但日方又不应受密约的约束。①

7月5日，汪方以汪本人为首，日方以阿部为首，开始举行谈判。谈判过程中，汪伪代表曾厚颜无耻地哀求日本在条约中写进一些虚伪的词句和条款，以掩盖其卖国投敌的真相，结果得到了日本代表的强烈反对。日本政府清楚地认识到，汪伪反共反人民的本质和没有实力的弱点，是完全可以利用的。经过十多次正式谈判，8月底双方谈判结束，形成汪伪"中华民国"与日本间的《基本关系条约》，31日由汪精卫和阿部草签，却没有正式签字。

由于日本当局在和汪伪谈判的同时，又暗中与蒋介石进行勾搭，直到11月30日，日汪双方才在南京正式签署《关于中华民国日本国间基本关系条约》（以下简称《条约》），这标志着日本对汪政权的正式承认。同日发表《日、满、华共同宣言》，汪政权承认了"满洲国"。

该《条约》是汪精卫卖国集团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的第一个公开的条约，它的内容基本上是从密约来的。但这些内容并没有全部公开出来，而只是一部分公开了，一部分仍保持秘密。据《周佛海日记》中载，条约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条约本文共8条；第二，附属议定书共4条；第三，中日两国全权委员间关于附属议定书了解事项共5项。这三部分是公开的，条约签订后即行公布。第四，附属秘密协约共4条；第五，附属秘密协定共4条；第六，秘密换文两件。②

《条约》③本文中曾有如此规定，第1条中规定："两国政府为永久维持两国间善邻友好之关系，应互相尊重其主权及领土，并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讲求互助敦睦之手段。"第7条规定："随本条约所规定之中日新关系之发展，日本国政府应撤废其在中华民国所享有之治外法权，并交换其租界。"对于以上规定，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只不过是一些漂亮的外交辞令和虚假的允诺，其卖国投降和反共反人民的实质，是无论如何不能被掩盖的。如《条约》本文的第3条中，即明文规定："两国政府相约，对于足以危害两国安宁及福祉之一切共产主义的破坏工作，共同防卫之。"还规定"日本国为实行两国共同防共计，在必要期间内，根据两国间另行议定，驻扎必要之军队于蒙疆，及华北之一定地域。"这些充分说明，该条约所谓"共同防共"是幌子，出卖中国领土主权、肯定日军有权常驻中国才是其真



正目的。另外，《条约》本文第6条，又有如此规定："关于华北及蒙疆之特定资源，尤其国防上必要之埋藏资源，中华民国政府，允诺两国紧密协力开发之。关于其他地域内，国防上必要之特定资源之开发，中华民国政府应予日本国及日本国臣民以必要之便利。"这其实是公开宣布日本有开发和利用中国一切资源的合法权利，实在是丧权辱国。日汪除签署了公开的《条约》之外，还签订了一些密约。在所谓"附属秘密协定"第2条中，更明文规定："中华民国政府约定：对驻扎于中华民国领域内的日本国军队所在地区和有关地区内的铁路、航空、通讯、主要港湾和水路等等，按照两国间另外的协定，须答应日本国有关军事上必要事项的要求。"这乃赤裸裸地认定：日本军队在中国的领土、领海、领空有自由出入、随心所欲、控制一切的宗主权。

至于《日、满、华共同宣言》，规定："一，中华民国、日本国及满洲国，互相尊重其主权和领土。二，中华民国、日本国及满洲国，讲求各项必要之一切手段，俾三国间以互惠为基调之一般提携，尤其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得收实效。三，中华民国日本国及满洲国，根据本宣言的旨趣，速行缔结协定。"[④]这个宣言实际是公开承认伪满洲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德、意、日《三国公约》的签订和所谓《日、满、华共同宣言》的发表，加速了日本在中国战场的侵略步伐，并加紧了日本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步伐。由此，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于1941年和1942年迎来了抗战以来最为艰难的时刻，陷入空前的军事和物质困难当中。与此同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也受此局势的影响，开始部署积极反共，策划内战。

注释：

①转引自，张振：《日本与汪精卫》，《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第17～18页。原文载于蔡德金，《历史的怪胎——汪精卫国民政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9页。

②此后三部分，未见中文本约文。《周佛海日记》中所载，是蔡伟、常凯根据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大事年表及主要文书》第469～472页，翻译过来的。

③④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259～1270页，第1271页，原文载于上海《中华日报》，1940年12月1日。

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抛出“中央提示案”

1940 年下半年，新四军东进北上任务的完成，使国民党开始感到恐惧，蒋介石开始将其反共活动的重点逐渐由华北转到华中，由八路军转向新四军。

1940 年 5 月 10 日，为进一步解决第一次反共高潮后的国共关系问题，刚从苏联回延不久的周恩来即离延赴渝，负责主持南方局工作，并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继续和国民党进行谈判。31 日，周恩来到达重庆。6 月，开始与国民党进行正式会谈。

6 月初，周恩来面见蒋介石。向他陈述了中共拥蒋反汪的抗战诚意，揭露了国民党内分裂投降派的阴谋。蒋介石亦表示愿意通过相互商谈来解决问题。这次谈判后，周恩来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他认为：蒋介石对国共破裂尚未下最后决心，但投降的危险日益严重。随后，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国民党当局的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进行了多次商谈，主要谈了陕甘宁边区、中共军队的编制和划分作战区域三个问题，双方分歧很大。

6 月中旬，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向国民党正式提交了全面解决两党关系的具体方案。其内容如下：“一、请实行抗战建国纲领所规定之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1）请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之合法存在；（2）请即释放一切在狱之共产党员，并保障不因党籍信仰之不同而横遭扣留、拘禁、非刑与歧视；（3）请停止查禁各地抗日之书籍杂志，对《新华日报》之出版发行请予以法律之保障，禁止各地非法扣留，并允许该报登载中共之文件决议及其领导人之言论文字；（4）请通令保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军人家属，一律按抗战军人家属优待，禁止非法骚扰和残害。二、请在游击区及敌占领区内实行《抗战建国纲领》所规定之指导及援助人民武装抗日，并发动普遍的游击战，对各该地区之地方政权，请予开放，实行民主，

对当地民众组织，力予扶植，使各党各界之人才，均充分发挥反对敌伪斗争之能力与效用。为加强经济战争，避免敌人吸收法币，夺取外汇起见，请批准各游击根据地发行以法币为基金之地方流通券。三、关于陕甘宁边区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问题：（1）请命令划定延安、延长、延川、保安、安定、安塞、甘泉、鄜县、定边、靖边、淳化、栒邑、宁县、正宁、庆阳、合水、环县、盐池、及河防之绥德、米脂、吴堡、葭县、清涧共23县，为陕甘宁边区，组织边区政府，隶属行政院，并委任林祖涵同志为边区政府主席；（2）请扩编第十八集团军为3军9师，其所属游击部队按战区所属游击部队同等待遇；（3）请增编新四军为7个支队；（4）为确定战争职责及避免误会和冲突计，请规定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与友军作战分界线；（5）请依同等待遇，按时补充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以枪械、弹药、被服、粮秣及卫生通信交通等器材。”①

1940年7月1日，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在重庆开幕。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89人出席，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候补中央监察委员等列席。此次会议着重讨论抗战期间的经济问题，并对党务、行政机构进行重新设施。

7月2日，国民党中央针对周恩来6月所提方案，提出复案，其主要内容是：一、关于党的问题，俟宪法颁布后再谈。二、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中央决定区域为绥德、米脂、吴堡、葭县、清涧、延安、延长、延川、保安、安定、安塞、甘泉、鄜县及定边、靖边两县之各一部，以上15县，名称改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关为陕北行政区公署，暂隶属行政院，但归陕省政府指导，并直接管辖该区内所属各县。十八集团军在陕甘宁留守部队一律撤至该区内。三、关于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域问题，决定两种方案：第一案：将十八集团军全部与新四军调赴河北省境内，并将新四军加入晋察战区之战斗序列，少数调赴该战区；第二案：将十八集团军之大部分及新四军之全部调赴河北省境内，其十八集团军之一部留置晋北作战，但所留部队应编入第二战区之战斗序列，但山西之政治党务军事，驻军不得干涉，绝对服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之命令。委任朱德为晋察战区副司令，免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职务。四、关于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编制问题，决定：十八集团军除编为三军六师三个补充团外，再增加两个补充团，不准有支队（师之编制为整理师两旅四团制）；新四军编为两个师；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应绝对服从命令，所有纵队、支队、其他一切游击队一律限期收束，编军

之后不得再委其他一切名义或自由成立部队。

国共双方的主要分歧是：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周提出以现在的 23 个县的区域划界；国民党只承认 15 个县。关于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的编制问题，周提出第十八集团军编三个军九个师，新四军编三个师，而国民党只准第十八集团编三个军六个师加五个团，新四军编两个师。关于防区的划分问题，国民党要求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全部开到黄河以北，不让新四军在长江以南。周恩来表示，原则上同意划界，但必须实现以下六个条件：一、各党派在全国的合法权；二、人民在全部敌占区的游击权；三、八路军、新四军有正规军的足够战区（华北五省）；四、八路军、新四军有足够的补给；五、中共有冀、察两省的行政领导权和其他游击区的行政权；六、八路军、新四军有发展的保证（扩充补给）。

7 月 7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指出：现在是反共高潮的下降时期，应该强调团结一致。“现在强调团结并不是停止一切斗争，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一天不停止，我们站在自卫立场上的斗争是不能停止的”，“但现在我们斗争的主要火力应该向着真正的投降派，而不是向着一般的顽固派，在反共高潮已经降低，某些顽固派初步表示某些好转之时，我们应对他们强调团结，以便争取合作时间的延长。”② 《指示》特别规定：“我们军事力量的发展（这是完全必要的）限制在战区与敌人后方及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境内，而不向国民党后方作任何可以引起冲突的行动。”③

7 月 16 日，国民党中央通过《关于陕甘宁边区及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作战地境编制问题的提示案》，即所谓的“中央提示案”。其主要内容为：“（一）划定陕甘宁边区范围（此时准其包括十八县），改称为陕北行政区，暂隶行政院，但归陕西省政府指导。（二）划定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境。将冀察战区取消，其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山东省黄河以北，并入第二战区，仍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以朱德为副司令长官，秉承军事委员会命令，指挥作战。（三）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于奉令一个月内全部开到前条规定地区之内。（四）第十八集团军准编为三军六个师，三个补充团，另再增两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为两个师。”此外所有纵队、支队及其他一切游击队，一律限期收缩，不准自由成立抗日部队。“不得在原驻各地设立留守处、办事处、通讯处，及其他一切类似机关”，也不得留置部队或武器弹药于原地，更不得在原敌后组织秘密的抗日民众武装。④



这个“中央提示案”的中心点，是要把中共军队全部赶到黄河以北，并从作战地区和编制数量上进一步限制我军发展。企图把共产党抗日武装通通驱赶到北方狭窄、寒冷的地方，待机一举歼灭。由于与中共中央的要求相差甚远，中共中央不接受该案。

为使谈判不至于就此终止，周恩来于7月27日携国民党“中央提示案”回延安研究，8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讨论目前政治形势，特别是国共关系问题。周恩来在会上说，现在的国内形势不会立即好转或立即转坏，会是拖的局面。他主张谈判的态度采取在小问题上让步而在大的问题上求得有利的解决，以缓和反苏反共的危险。他说，要解决的悬案之一是边区问题，按现有地区不变，名义可改为陕北行政区，在这点上可以让步。第二是扩军问题，要求八路军成立三军九师，新四军成立三个师。至于划分作战区域，可以同意，而冀、察两省政府主席要由中共保荐。会议同意周恩来提出的稍作让步的意见。25日，周恩来返回重庆，28日便与蒋介石、白崇禧会谈。虽然周恩来表示愿稍作让步，蒋、白却寸步不让，仍坚持要求八路军、新四军一律开到旧黄河以北，游击队留在当地交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周恩来只得加以拒绝。不久，周恩来又同何应钦进行一次会谈，仍然没有取得进展。

9月初，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在8月中拟订的复案交张冲转国民党中央。此案要求陕甘宁边区“现在所辖的区域”划为陕北行政区；扩编十八集团军为三军九个师，新四军为三个师，其编制照甲种军及调整师办理，应供给足够的补给；改组冀、察两省政府，其主席由中共保荐；保障“各抗日党派在全国之合法权”，“中国人民之敌后游击权”，“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之作战权”，在此情况下，中共原则上同意划分区域，并向国民党提出关于调整作战区域及游击部队的三项具体办法：一、扩大第二战区至山东全省及绥远一部；二、按照第十八集团军及各地游击队全数发饷；三、各游击队留在各战区，划定作战界限，分头迎击。但这些意见被国民党搁置，国共两党关于化解问题的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国民党‘中央提示案’是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引线。”⑤此后，国民党为肃清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即进一步加紧了在华中的武装摩擦。10月4日，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率军数万人向江北新四军陈毅支队大举围攻，制造了“苏北事件”。10月19日，参谋总长何应钦及副总长白崇禧联名向中共发出最后通牒（即所谓“皓电”），强令八路军和新四军限于电到

一个月内全部按照7月16日“中央提示案”的规定，开赴旧黄河以北。11月9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等发出“佳电”，只同意将长江以南之新四军部队移到江北。之后，何、白又发出“齐电”重申前令。12月9日，蒋介石也亲下手令，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务必在12月底和明年1月底分别移至黄河以北，而新四军皖南部队则必须在12月底以前先开到长江以北。一场反共、反抗战的内幕在国民党内酝酿。

注释：

①黄修荣：《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431～432页。

②③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21页。

④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9～460页。

⑤何理：《抗日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9页。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941 年 1 月 6 日，国民党顽固派不顾抗战的大局，悍然对皖南新四军发动突然袭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给新四军造成了重大损失，给全民族抗战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皖南事变之所以爆发，有着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1940 年 9 月 27 日，德、意、日三国政府代表在德国首都柏林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三国同盟正式形成。这一事件的发生对中国抗战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在：日本依仗三国军事同盟的建立，加紧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诱降活动；德国在中德关系中再次扮演劝降角色；英、美、苏三国出于对法西斯势力严重扩大的担心，加大了对中国政府的援助。在此国际形势下，蒋介石俨然成为了一个左右局势的大筹码。但是，"蒋介石更为感兴趣的，是他可利用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为他在国内的反共摩擦服务。日本要拉他，他可在反共内战方面同日寇达成某种合作默契；英、美、苏要靠他拖住日本，对他加剧国内国共摩擦或者会无可奈何，或者亦不至特别横加干涉。"[①]总之，此时的蒋介石已打好了自己的如意算盘。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新四军一直坚持华中敌后战争，"至 1940 年底，对日伪军共作战 2 400 余次，毙伤日伪军 5. 13 万人，在华中的大江南北建立了苏南、皖中、皖东、皖东北、苏北、豫皖苏、豫鄂等抗日根据地，部队也从开始时的 2 万余人，发展到近 10 万人，对日寇在华中的统治形成了严重的威胁"。[②]对此，蒋介石却深感恐惧和仇恨，一心想除掉这一眼中钉、肉中刺，早在 1939 年春开始，就不断制造与华中新四军的摩擦，以后逐渐扩大。1939 年秋，华中的反共摩擦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蒋介石要求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必须全部开到长江以南。此举表明国民党已决意将反共摩擦的中心从华北转向华中，使新四军不仅在江北，而且在江南亦难以立足。此时，新四军正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东进北上的政策，国民党却对此竭力反对和百般阻挠，双方矛盾开始逐渐激化。1940 年 6 月，为进一步解决第一次反

共高潮后的国共关系问题，周恩来在重庆与国民党进行了主要谈判。7月16日，国民党提出一个所谓“中央提示案”，其中除旧调重弹，要求取消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归陕西省政府指导外，竟命令八路军、新四军于奉命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这是中共所不能接受的。中共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调整游击区域及游击部队办法三项”，坚决拒绝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之后，国民党开始为肃清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进一步加剧了在华中的武装摩擦。对此，新四军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为了抗战的大局，始终执行“退避三舍”、“先礼后兵”的政策，在“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求得消解摩擦，争取自己的生存发展和抗战的胜利。1940年10月，国民党制造的反共摩擦却再次升级。10月4日，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率军数万人向江北新四军陈毅支队大举围攻。陈毅支队以大敌当前，团结抗战为重，遂令所部退让。韩竟下令“切急击勿失”，大举进犯，新四军被迫自卫应战，在黄桥打垮韩德勤部，6日结束战斗，歼韩德勤部1.1万余人。这就是“苏北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为后来皖南事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命令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向第十八集团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出“皓电”，污蔑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强令八路军和新四军接电报后一个月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断然拒绝了中共提出的三项办法。何、白“皓电”是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起点，从当年10月开始，国民党即停止了八路军的军饷。此外，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收到此电文后，立即召开会议，策划围剿新四军的方案，他布置了七个师以上的兵力准备围剿新四军皖南部队。同时，蒋介石又密令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部30万军队，准备向华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大举进攻；并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骤增至20万之多。

针对以上情况，中共中央分析了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确定克服反共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正确策略是：表面缓和，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缓和以争取群众，揭露蒋介石的反共阴谋；抵抗以保卫自己，坚持抗战的基本阵地”。[③]

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四人的名义，发表了答复何应钦、白崇禧的“佳电”，用大量事实说明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三年，坚持抗战，驳斥了国民党的造谣诬蔑，并拒绝撤出华中。但是，为了



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中共中央也作了一些让步，同意将皖南的新四军部队转移到长江以北。同时，我方还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了严重交涉，要求保证皖南北移部队的补充和道路安全；停止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部署，停止构筑封锁线，保证各办事处安全；取消何应钦停发八路军军饷之命令，立即发给11月经费和10月余欠。

12月8日，蒋介石令何、白向朱、彭、叶、项发出"齐电"，再次强令八路军、新四军于限期内北移，即于1940年12月31日前，将黄河以南八路军部队开到黄河以北，将长江以南新四军部队开到长江以北；1941年1月底前，将黄河以南所有新四军部队开到黄河以北。9日，蒋介石一面下达手令，重申"齐电"，另一方面又于10日秘密下达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计划"和"解决江南新四军方案"，规定新四军如不限期北移，将尽数消灭。12月下旬，顾祝同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指示上官云相主持召开徽州军事会议，确定由上官云相担任指挥，拟定一套兵力编组方案。29日，上官云相发出"进剿匪军计划"。至此，国民党为迫新四军北撤，已在皖南调集了七个师、约八万兵力，在泾县、茂林一带布成口袋形，待新四军人网。同时又故意泄露新四军北移路线，暗示日军，对我进行袭击。

1941年1月1日，新四军军部致电毛泽东等，告知决定将新四军全部移苏南。3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叶挺、项英："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④

1941年1月4日夜晚，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 000余人奉命由泾县云岭地区出发，准备分左、中、右三路纵队，经江苏南部向长江以北转移。5日，到达茂林地区，因部队过度疲劳，秩序混乱，军部决定暂留原地休息。6日，奉命北移的皖南新四军在行至泾县境内的茂林一带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四十师的袭击，发生战斗。同日下午，军部决定仍分三路继续前进，7日正午前会攻星潭，打破第四十师的阻拦。因国民党军队四面压迫，多方阻截，未能实现预定计划。1月7日，毛泽东、朱德电令叶挺、项英："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⑤这时，北移新四军先头部队在星潭附近又遭顽军拦击。乘部队对星潭实施攻击的机会，项英在百户坑召集会议讨论部队行动方向。会议对攻下星潭后能否向苏南转移，认识不一致，争论达七个小时之久。至晚12时，才决定部队改向西南方向行动，经廉岭和高岭转向太平，待机再向苏南转移。这一决定打乱了原定的行动计划，陷入国民党军七个师

八万余人的重围之中。8日，顾祝同密电上官云相："限电到12小时内"将其"一鼓而聚歼之"。当夜国民党军发起猛攻，包围圈愈缩愈小，叶挺果断指挥，身先士卒，率部突围。尔后转至茂林以东五公里的石井坑，正当整顿队伍，准备继续突围时，又遭顽军第四十、第五十二、第一百零八、第一百四十四师等部的围攻。10日，叶挺、项英在被围中报告毛泽东、朱德，新四军"被围于泾县、茂林以南，准备固守，可支持一星期"。11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将此情况电告周恩来，并要周在重庆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坚决要求其在皖南停止进攻，撤围让路。蒋介石一面口头答应下令查处，一面却督令顾祝同加紧围攻，务期"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皖南新四军在叶挺指挥下，多次打退国民党军的进攻，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至14日，除2 000余人分散突出重围，一部分被俘，其余大部壮烈牺牲。项英、周子昆遇害，叶挺根据组织决定，赴国民党一方谈判时被扣。17日，蒋介石竟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并声称要将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

皖南事变的发生，使亲者痛仇者快。日伪对蒋介石的反动行动多方表示嘉许。汪伪政府还特地召开庆祝大会，汪精卫称"数年来蒋介石不作一好事，唯此次尚属一个好人"。[⑥]皖南事变给新四军造成了重大损失，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后，中国共产党针对国民党的这一恶劣行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注释：

①②李良志：《烽火江南话奇冤——新四军与皖南事变》，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页，第96页。

③何理：《抗日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9页。

④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50页，第250～251页。

⑥转引自龚古今，唐培吉：《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



中共中央采取紧急应对措施
新四军军部重建

1941 年 1 月 10 日，叶挺、项英在被围中曾致电毛泽东、朱德：“我全军被围于泾县、茂林以南，准备固守，可支持一星期。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上下一致，决打倒最后一人一枪，我等不足惜。一周后如无转机，则将全部覆没。”①11 日，叶挺又致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指出“本军五昼夜不停与五、六倍（之敌）激战于重围，计划又告失望，现将士疲劳过度，只好固守一拼。”②

1 月 12 日，中共中央针对当时皖南新四军的具体情况，作出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③同日，中共中央又给周恩来、叶剑英发出指示：新四军全军“被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已六天，突不出去，据云尚可固守七天，望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放我东进北上，并向各方面呼吁，证明国民党有意破裂，促国民党改变方针，否则有全军覆灭危险。”④

1 月 13 日，为深刻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对我新四军实施的聚歼计划，向其施加压力，以促使我新四军顺利北上，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发表《抗议皖南包围通电》。指出：“我八路军、新四军前受日寇之扫荡，后受国军之攻击，奉命移防者则遇聚歼，努力抗战者，则被屠杀，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为此，“敬恳中央力解皖南大军之包围，开放挺等北上之道路，撤退华中之剿共军，平毁西北之封锁线，停止全国之大屠杀，制止黑暗之反动，以挽危局，以全国命。”⑤

周恩来在接到皖南新四军被围、袭击的急电后，于 1 月中旬多次致电张冲、蒋介石等，强烈谴责其破坏团结的行为，要求其速令包围新四军的国民党部队立即停止攻击，撤围、让路。同时，他还指示新华日报社撰写关于皖

南事变真相的报导和抗议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社论；指示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编印揭发皖南事变真相的传单，使广大国内爱国人士了解到皖南事变的真相。为使国外人士也了解到皖南事变的真相，以获得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周恩来积极动员外国记者携带关于皖南事变的材料分别到香港、南洋和美国等地发表，他还安排王炳南、王安娜、龚澎等去访问所认识的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告以国民党袭击新四军事件。通过这些活动，皖南事变的消息很快在国内外传开，并获得了广泛的同情。

除了在政治和舆论上采取一系列必要的应急措施外，中共中央也从军事上做了必要的准备。1 月 14 日，毛泽东同朱德、王稼祥发急电给彭德怀、左权、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真、刘伯承、邓小平、吕正操、程子华、朱瑞、陈光、罗荣桓、刘少奇、陈毅、周恩来、叶剑英，指出：“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除已令苏北、山东迅即准备一切待命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同时发出最严重抗议通电，并向蒋介石直接谈判外，我华北各部须遵前令提前准备机动部队，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⑥18 日，鉴于皖南新四军已失败，毛、朱、王又致电刘少奇、陈毅、朱瑞、陈光、罗荣桓等，指出：“皖南已失败，华中汤恩伯（华北区）、李品仙（淮南区）、王仲廉（鄂中区）、冯治安（襄西区）已开始向我进攻，因此我华中、山东各部须为适应反共军进攻而分别作具体之部署，统由刘、陈规定指挥之。”⑦

1 月 17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不顾全国舆论的反对，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交军法审判。为了反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维护统一战线，也为了今后新四军力量的发展，以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中国共产党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

1 月 20 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向国内外揭露了国民党围歼皖南新四军的滔天罪行，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全文如下：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军长叶挺，领导抗敌，卓著勋劳；此次奉令北移，突被亲日派阴谋袭击，力竭负伤，陷身囹圄。迭据该军第一支队长陈毅、参谋长张云逸等电陈皖南事变经过，愤慨之余，殊深轸念。除对亲日派破坏抗日、袭击人民军队、发动内战之滔天罪行，另有处置外，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代军



长等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8]

1月23日，新四军将领发表就职通电。通电说："当此寇氛迷漫秦桧横行之际，毅等誓遵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与万恶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亲日派奋斗到底。惟望全国袍泽，共矢抗日之忠诚，勿为奸邪所蒙蔽，拒绝内战，一致对敌，民族国家之前途，实深利赖。特电奉闻，敬候明教。"[9]翌日，新四军将领发表声讨亲日派通电，呼吁全国人民，必须速起注意，监视真正的叛变者。

1月28日，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新四军新军部以原华中总指挥部为基础在苏北盐城重新建立，陈毅代军长发表了就职演讲。他说，新四军军部的重建，"这在中国抗战乃至整个革命史上都将是一件大事"，"我们可以告诉亲日派和反共顽固派，新四军是取缔和消灭不了的。反共顽固派一月十四日，偷袭了我们的军部，但是一月二十五日我们的军部又成立了。皖南新四军遭到很大损失，但是在安徽、湖北、江苏、河南，新四军仍继续存在，而且会更加发展和壮大。事实已经粉碎了亲日派和反共顽固派的梦想，他们不能不感到极大的失望"。陈毅说："新四军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他是最坚决的为着中国人民的事业而奋斗。中华民族一天不解放，中国人民一天不解放，则新四军必然要奋斗，必然会发展，是毫无疑义的。"他号召新四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我们要明白自己的责任，坚持抗战的大旗，英勇奋斗下去，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10]

中共中央军委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得到全国抗日军队的热烈拥护。抗日军队纷纷致电祝贺。1月26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电贺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等就任新职，表示"愿为其后盾"。同日，八路军第一百二十九师师长刘伯承等通电，请缨南下增援新四军。30日，一百二十师师长贺龙等电贺陈毅就新四军代军长职，并"勒马待命，誓作后盾"，"共除妖氛"。2月4日，一百二十九师师长刘伯承、邓小平等亦电贺陈毅等就职。

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重新建立后，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立即开始整编队伍，将活动于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整编为七个师、一个独立旅。第一师由原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及所属部队编成，共1.3万余人，活动于苏中抗日根据地；第二师由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所属部队编成，共

1.5 万余人，活动于淮南抗日根据地；第三师由原八路军第五纵队编成，共 2 万余人，活动于苏北抗日根据地；第四师由原八路军第四纵队编成，共 1.5 万余人，活动于淮北抗日根据地；第五师由原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编成，共 1.4 万余人，独立坚持鄂豫皖抗日根据地；第六师由江南指挥部及所属部队及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编成，共 6 000 余人，活动于苏南抗日根据地；第七师由原新四军无为游击纵队、原第三支队挺进团及皖南突围部队编成，近 3 000 人，活动于皖中抗日根据地。独立旅由八路军第一百一十五师教导第五旅编成，共 4 000 余人，活动于淮海区与鲁南抗日根据地的接合部。此外，还有军部直属单位：特务团、总兵站、抗日军政大学华中第 5 分校及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全军共计九万余人。2 月 18 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委任令，委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所属各师军政负责人如下：第一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炎，第二师师长张云逸（兼）、政治委员郑位三，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第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第七师师长张鼎丞、政治委员曾希圣。

1941 年 5 月 20 日，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为了加强党的统一领导，中原局和东南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正式合并，在盐城组成华中局，刘少奇任书记，饶漱石为副书记，陈毅、曾山为委员，华中局主要负责华中抗日根据地党和新四军的工作。与此同时，由刘少奇、陈毅、张云逸、邓子恢、赖传珠组成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华中分会，刘少奇任书记，负责统一领导华中地区的抗日斗争。为进一步加强地方武装建设，更好地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新四军还从 1941 年起，在各师活动的地区，相继成立了苏中、淮南、苏北、淮北、皖江几大军区，军区之下设立军分区。

新四军军部在组织上完成高度统一的同时，还重点加强了对新四军将士思想方面的提高，为此，华中局和华中军分会于新军部成立前后，先后召开了几次重要会议，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加强了对新四军政治、思想和军事方面的指导，使华中全党全军更坚定地贯彻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

1941 年 5 月 15 日至 19 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在盐城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的经验教训，为此，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刘少奇则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作了《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的总报告，阐述了皖南事变发生的内外原因、经过情况及经验教训。最后，与会人员一致表示：“为了避免今后发生类似的错



误，加强党性的学习与教育是一个绝大的问题。每个共产党员，必须加强党性锻炼，提高党的纪律性，坚决服从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的领导，一切行动听指挥。”

紧接着，6月初，华中军分会在盐城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解决新四军建军路线问题。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会议检查和总结了新四军成立以来的建军工作，清算了以前在建军工作中的错误，号召为把新四军建设成为正规化的党军而奋斗。通过此次会议，新四军建军工作有了明确的方向，为新四军今后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因此，这是新四军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建军会议。此次会议之后，新四军各部迅速展开了部队建设工作，通过健全政治制度，扩大和发展党组织，加强军事、政治教育，完善军事机关，培训干部等一系列工作，极大提高了新四军军政人员各方面的素质。

在加强军队建设的同时，新四军还同日寇展开了殊死较量。7月，敌人抽调五六万人的精锐部队分几路进犯阜宁、盐城地区，妄图一举歼灭我新四军军部和摧毁苏中根据地，面对危局，陈毅军长临阵指挥，采用灵活的战术，最终经过广大军民的艰苦奋战，终于赢得此次反扫荡的胜利，保护和巩固了新四军军部及华中抗日根据地。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的重建和新四军广大指战员在思想方面的高度统一，使华中地区党、军队和根据地的建设逐步走上正轨，新四军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进一步发展壮大，为今后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日战争，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和思想基础。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的这一系列举措，同时也使得蒋介石妄图消灭新四军的迷梦彻底破产。

注释：

①②③④皖南事变编纂委员会：《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09页，第111页，第111页，第112页。

⑤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第20页。

⑥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55～256页，第258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71页。

⑩《江淮日报》，1941年1月26日。徐君华等著：《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97～298页。

以打对打，以拉对拉　中国共产党击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

在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开始时，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让政策，以“佳电”态度回应了何、白“皓电”，从而取得了广大人民和中间派的同情。但是，国民党却视我们的退让政策为软弱可欺，竟又发出“齐电”，并最终发动皖南事变，宣布新四军为叛军。针对国民党这一破坏抗战团结的罪恶行径，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转入必要的反击。中共实施反击坚持的对策是：以打对打，以拉对拉；政治上采取攻势，军事上采取守势；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1941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指出：“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我们‘佳电’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18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指出蒋介石1月17日反动命令，是七七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重大政治变化的表现。为了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中共中央决定：在各抗日根据地内通过刊物、报纸、会议、群众大会，对于国民党反动派阴谋歼灭皖南新四军的行动，提出严重抗议；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应无情揭露国民党当局自抗战以来，对人民、对革命分子肆意压迫与屠杀，对日寇汉奸消极应付与宽容等等一切倒行逆施；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应充分提高警觉性和作战的充分准备；在大后方应经过各种不使党的组织遭受破坏的、侧面的、间接的方式去动员舆论与群众。同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公开谈话，首次历数国民党顽固派近两年来发动反共摩擦直至皖南事变的种种罪恶行径，戳穿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本质，痛斥了其1月17日反动命令。

1月2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向全国人民彻底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勾结日寇、实行联合“剿共”的整个阴谋计划。指出“袭击皖南新四军部队和发布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不



过是此种计划表面化的开端。最重大的事变，将在今后逐步演出”。[②]向国民党提出了中共关于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解决办法：“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③]25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将此12条办法，交国民党代表张冲转交蒋介石。

1月28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张云逸、邓子恢、彭雪枫、李先念、黄克诚等，指出：“在皖南事变及一月十七日蒋介石宣布新四军‘叛变’后，我们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应有政策上的变动，即由一打一拉政策改变为完全孤立他的政策，在党内外尽量揭破他的反动阴谋，惟在蒋没有宣布全部破裂时（宣布八路及中共‘叛变’），我们暂时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而以当局二字或其他暗指方法代替蒋介石名字。”[④]

2月2日，毛、朱、王又致电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等，指出目前我们的方针：政治方面，继续攻势，坚持12条，在适当的条件下不拒绝妥协，但目前绝不松口；军事方面，八路军原地不动，仍不松懈准备，新四军力争河南，不惜全力以赴；统战方面，注意团结中条山、河南、湖北各友军，“大大发展交朋友，共同打退日寇的进攻，良机难得，以德报怨”。14日，关于目前国共关系和中共的策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反共高潮可能下降，“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我们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之政治攻势（12条）压倒了蒋之攻势，我们的目的不在蒋承认12条或12条之一部分，他是不会承认的，而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一月十七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十七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就在于此。”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及发言人谈话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维护抗战团结，坚持抗战的决心，给国民党顽固派造成了政治上的巨大压力。

周恩来在重庆的多方努力，也是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重要一

环。1941 年 1 月 11 日，担任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得知新四军被围的消息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立即向国民党代表张冲提出抗议，并指示《新华日报》将国民党军队袭击新四军的罪行透露出去。晚上，他又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事变后的形势和斗争方针，决定采取种种有力措施，以回应国民党的反共举措。随后，周恩来还广泛发动南方局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令其向大后方的各界人士，揭发何应钦、白崇禧的反共罪行。与此同时，周恩来分别打电报谴责顾祝同、何应钦、白崇禧，并直接写信给蒋介石，要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队撤围、让路。1 月 17 日，蒋介石发出“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反动通令，周恩来立刻严斥国民党参谋总长何应钦，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同日深夜，题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的悼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发表在第二天的《新华日报》上。

除了在政治上发动对国民党的巨大攻势外，为了在军事上更直接有效地打击国民党的嚣张气焰，1941 年 1 月 20 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23 日，新四军将领在盐城宣誓就职，并发表就职通电。28 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正式成立。随后，全军改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共计 9 万余人，继续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日战争。

中共在皖南事变后作出的一些列反应，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的决心，其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政策，得到了全国人民及一切爱国党派的支持，在国际上也取得了广泛的同情。

1 月 18 日，美国记者斯诺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从香港发出了皖南事变的电讯，报道了事变的真相。随后，英美苏许多报刊纷纷报道皖南事变的相关消息并发表评论，指责国民党制造内战，破坏团结。同时，皖南事变的爆发还引起了苏美英等国政府的强烈反应，他们纷纷通过外交途径明确表明其态度和立场。2 月 8 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居里访华，会见蒋介石，面呈总统给蒋介石的亲笔信，表示希望国共双方能消泯歧见，密切合作，共同对付日本。英国政府通过驻华大使阿齐博尔德·克拉克凯尔，向蒋介石发出警告，指出内战只会更加纵容日本。而苏联在要求中共以让步的方式处置皖南事变的同时，对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质问、谴责和施加压力，促使其继续抗日。1 月 25 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到蒋介石的官邸，就皖南事变一事与蒋介石会谈，表达了苏联政府关于此事给国民政府的忠告。

苏美英三国政府在对蒋介石施加舆论和外交压力的同时，还在经济方面



对蒋介石施压。居里在渝期间，即已向蒋介石转达美国政府的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⑤]英国则以内战危险没有消除为借口，暂缓开通滇缅公路，以此作为对蒋介石的惩戒。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崔可夫在会见何应钦、白崇禧时曾暗示，国民党如再进攻中共军队，挑起内战，苏联将停止对华援助。在苏美英三国政府强大的外交、经济压力和国际舆论一片责难声中，蒋介石在国际政治上陷入异常孤立和被动的境地。

与此同时，海外数百华侨团体，也纷纷以各种形式来反对国民党亲日派制造皖南事变。1 月 8 日，全美洲洪门总干事监督司徒美堂、阮本万、吕超然致电毛泽东及蒋介石。主张由各党各派各界领袖组织特别委员会调整国共关系，并及时召集真正代表民意之国民大会奠定民主基础，巩固抗战大局。28 日，仰光的 18 个华侨团体联合发表宣言，斥责那些主张以武力对付新四军，以武力对付共产党的人，是混在抗战阵营中，擎着三民主义的旗帜来诬陷共产党的顽固派。并且尖锐地指出这伙顽固派的反共活动，就是投降的准备。宣言呼吁要彻底粉碎一切分裂阴谋，坚持团结，枪口对外，共同抗战。2 月 2 日，英援华总会致电蒋介石，称："本会坚主给新四军以正当之待遇，和平解决一切冲突，并能克服种种困难，而恢复各党各派间之一致合作。"2 月 5 日，南洋华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代表 3 100 万侨胞通电全国，呼吁"制止内战，加强团结"。广大海外侨胞的强烈舆论谴责，使国民党陷入更加内外交困的境地。

与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相呼应，国内各民主党派、团体和爱国人士也纷纷发表各种通电和言论，抗议皖南事变。1941 年 1 月 14 日，宋庆龄、何香凝等联名上书蒋介石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监委会，指责蒋介石的反共行径，已使抗战之成果毁于一旦。信中强烈要求蒋介石遵守孙中山遗训，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改弦易辙。18 日，宋庆龄、何香凝由香港再电蒋介石，要求其"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⑥]1 月 24 日，冀中区抗战建国联合会、武装自卫委员会、抗日救国会，以及农、工、青、妇、回民、文化界等团体代表冀中 800 万人民，联合致电全国各抗日报社，声讨亲日派何应钦，抗议制造皖南惨案。同日，冀中新闻界亦向全国发出抗议皖南

事变的通电。2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两次同周恩来在重庆举行谈话，后来他在日记中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被政府消灭，政府方面实没有办法能挽救人民的反对。"⑦另外，为抗议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邹韬奋于3月1日（即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开幕前夕），发表声明辞去参政员职务，出走香港。

在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的斗争下，在国际反法西斯国家的外交和经济压力，及海外华侨和国内爱国民主人士的舆论压力下，蒋介石陷入了空前的孤立，另外，日军乘皖南事变之机，突然于1月下旬发动豫南战役，继而进攻中条山等地，国民党更加陷入政治和军事的困境，这也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收敛反共势头，继续谋求与中共合作。

1941年1月27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纪念周上发表讲话，被迫声明：新四军事件"完全为整肃军纪，当然不牵涉其他问题"，意在缩小皖南事变的范围，推诿责任。为了进一步改变国内不利的政治局面，蒋介石积极组织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在会前，他极力邀请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企图欺骗舆论，粉饰太平。3月2日，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临时办法12条，并明确规定以此作为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的条件。12条临时办法是：一、立即停止全国向共产党的军事进攻；二、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及各地的被捕人员；三、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各地扣寄抗日书报的命令；四、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的一切压迫；五、承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六、承认敌后的抗日民主政权；七、华中、华北及西北的防地均维持现状；八、中共领导的军队，于十八集团军之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应共辖六个军；九、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者的家属；十、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兵员，发还所有枪支；十一、成立各党各派联合委员会，每党派派遣一人，以国民党的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国民参政会主席团。

国民党拒绝答复以上12条临时解决办法，中共七参政员未能出席参政会，其他党派也都无精打采，这次会议开得冷冷落落，国民党陷入十分狼狈的境地。3月6日，蒋介石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发表演说，尽管还重弹军令、政令必须统一的滥调，并攻击中共提出的解决办法"双十二条"，但又



不得不表示他今后“决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更不忍以后耳闻有此种‘剿共’之不详名词，留于中国历史之中”。8日，中共参政员董必武被选为参政会常驻参政员。12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分析蒋介石6日在参政会的演说并提出对策。指出：“蒋介石六日演说及参政会决议仍是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我们七参政员齐（本月8日）电，亦是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这种拉锯式的斗争将延下去，就是所谓拖，可能再拖一年。”[⑧]蒋介石近日选举董必武为常驻参政员，实际是结束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退兵一招。但我们还应继续我们的攻势，直到我们的临时办法各条实际上被承认。14日，蒋介石主动约见周恩来，双方就军事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洽谈，国共关系开始缓和，统一战线得到维护，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成功打退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说明中共坚持的统一战线中既联合又斗争的方针是正确的。5月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写的《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的党内指示中指出，在对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时，首先，不要忘记中国的基本矛盾。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国共两党继续合作抗日的可能性就存在，只有充分地认识这一点，才不致犯“左”的错误。其次，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有清醒的、本质的认识，他们具有两面性：既反共，又不愿意完全破裂；既抗日，又不积极，甚至有时与日本勾勾搭搭。只要他们还没有投降，其对我们的政策依然是一打一拉。因此，我们的方针便只能是“以打对打，以拉对拉”，“针锋相对”，除此之外，别无他路可循。任何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只有和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否则，我们就要犯右倾错误。“但是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三者缺一，就要吃亏。”第三，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要从最坏处即全面破裂做准备，努力争取好的即继续共同抗日的前途。第四，要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以便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顽固派，以利更加广泛地争取和团结中间势力。这些就是我党我军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取得成功的主要经验。

注释：

①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 页。

②③《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772 页，第 775 页。

④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61～262 页，第 282 页。

⑤转引自，谭岗：《皖南事变》，新华出版社，1991 年版，第 40 页。

⑥延安《新中华报》，1941 年 1 月 26 日。

⑦转引自，蒋铁生：《冯玉祥年谱》，齐鲁书社，2003 年版，第 187 页。

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召开前后的斗争

蒋介石在制造皖南事变，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后，遭到中国共产党的坚决反击，并受到国际国内的强烈反对。蒋介石意识到，他在政治上已陷入空前孤立。王世杰在给蒋的密呈中提到：以为目前为彻底剿共之最良时机者，殊非的论。理由是：一、经济上面临着重大恐慌；二、目前对苏，实不得不力事容忍，务期保持最低限度的邦交；三、英美在表面上只能助我抗日，对于制共，必认系我国内军纪与秩序问题，而不便径行支援，且英美虑牵及苏联邦交，实有不得不采取慎重之行动之苦衷。基于上述种种原因，他主张："（一）严令负监视任务之国军，不得妄发一弹，以防引起破裂。（二）由各方人士一致努力、奔走、转圜，务期以政治方式解决全案"。①王世杰的这一密呈表明，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已处于尴尬境地，他不得不开始寻求由政治进攻转为政治防御。

与此同时，皖南事变也给了日本以可乘之机，他们开始酝酿利用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发动新一轮的攻势。另外，日本对于蒋介石驱逐新四军、八路军到华北的意图是极为不满的，因为日本一直把华北视为他们的根据地，国民党的这一举动，使日本巩固华北的战略更难实现。东条英机就曾公开宣称，蒋介石驱逐新四军、八路军到华北，破坏了日本的利益。1941 年 1 月 25 日，日军突然发起豫南战役，分数路将汤恩伯等部包围在平汉铁路以东，并发起激烈的进攻。此后，日军又连续发动了中条山之战、上高战役和第二、第三次长沙之战。日本海军则先后攻克了惠州、潮州、温州、宁波等要地口岸，企图禁绝一切外援从东南沿海进入我国。日本先后发动的这一系列进攻，使国民党在政治上更加被动。因为正是皖南事变，才造成国共间深刻裂痕，致敌乘虚而人。针对这一严峻形势，蒋介石只得暂缓反共军事行动，继续与中共保持合作，抵抗日寇进攻。

为了转移人们对事变的视线，压制人们的愤怒情绪，同时也为了混淆视听，粉饰太平，以改变自己在国内政治上的不利地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

党开始积极筹备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并在会前积极动员国民党人士和其他党派人士，竭力说服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企图以此让中共作出让步。因此，此次参政会前后，国共主要针对中共七参政员出席参政会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

1941 年 2 月 10 日，周恩来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钧、张申府、左舜生、黄炎培、张君劢等在重庆玉皇观就出席第二届参政会问题进行商谈。周恩来说明了中共不出席国民参政会的方针，沈钧儒等表示谅解，他们还建议中共以 12 条（老 12 条）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事后，周恩来将商谈情况电告毛泽东，并建议以中共七参政员的名义将善后办法 12 条（老 12 条）交参政会要求讨论，以期恢复国共团结，坚持抗战，并以此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否则不能出席。14 日，中共中央复电周恩来，表示同意。

2 月 15 日，中共七参政员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致函国民参政会秘书处，正式提出关于皖南事变之善后处理办法 12 条（老 12 条），要求国民政府采纳。18 日，周恩来将这一公函交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并声明在中共所提 12 条“未得政府裁夺”以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同时，还将这封公函抄送国共两党以外的各党派和有正义感的国民参政员 20 余人。这是一个爆炸性的消息，王世杰接到这封公函后十分紧张，立刻找张冲商谈，认为这是中共表示决裂。19 日，周恩来同张冲进行会谈，张冲要求周恩来收回七参政员致国民党参政会公函所提出的 12 条（老 12 条），以免蒋介石翻脸，并称蒋将约周谈话。这两项均遭周恩来严词拒绝。周恩来指出：“现在政治压迫严重，无理已极，实属忍无可忍，见蒋不会有结果。”[②]20 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将见张冲情况进行了汇报。23 日，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转告张冲以下几点：一、皖南事变及 1 月 17 日通令是国民党表示破裂的开始行动，我党七参政员公函，是我党企图挽救此种破裂的行动，因为现时挽救破裂，除请求国民党及参政会实行 12 条（老 12 条）外，无其他办法。二、自 1 月 25 日将 12 条交与张冲转达蒋先生后，国民党方面置之不理，故不得不函达参政会要求解决。三、如国民党方面认可 12 条（老 12 条），参政会方面自可暂时不付讨论，而由两党在会外谈判，但在谈判无满意结果前，我们不能出席参政会。四、国民党方面如无破裂决心，必须迅速停止各方面的政治压迫与军事进攻，否则一切欺骗之词，我们不能置信。

2 月 25 日，离参政会开会只有四天了，国民党方面愈加着急。是日，



周恩来再次会见张冲，由于周恩来仍然拒绝收回七参政公函和见蒋，于是，张冲提出如下三点具体解决意见：一、军事上，第十八集团军的正规军开到黄河以北，游击队全部留在华中，配合友军作战。另外还给一军，补新四军缺，归还叶挺及其他干部，边区及晋察冀政权照前议。二、参政会改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另成立分区调查委员会，讨论党派问题，以蒋介石为主席、周恩来为副主席。三、目前军事进攻已停止，政治压迫总要解决，请蒋介石负责纠正，再不许发生新事件。张冲请周恩来将这些意见电告延安请示，并最后要求中共参政员考虑出席本届参政会。26日，中共中央向周恩来作出指示，重申在12条（老12条）未获满意答复前不出席参政会，张冲所提的条件也不能接受，并且指出：如国民党方面有诚意解决问题，则应：一、参政会延期二个月开会；二、在二个月内解决12条及一切悬案；三、派飞机送周恩来回延安开会，以便讨论彼方意见。同日，周恩来约见张冲，向张冲交付了中共中央的电文，张看完后认为电文中所提条件等于破裂。随后，即与周恩来围绕中共所作答复意见进行了商谈，周恩来表示要回延安商讨意见，遭到拒绝。

2月27日，为了拉拢各民主党派出面促请中共参政员尽快参加参政会，蒋介石约见黄炎培、张君劢、褚辅成、左舜生、沈钧儒、张澜等六位中间党派人士，晤谈要求中共参政员出席本届参政会问题。张澜等六人对此提出四点建议：一、参政会开会，中共参政员必不可少；二、军队国家化，与党派绝缘；三、检讨《抗战建国纲领》及一切决议之实行；四、成立各党派委员会，以讨论并保证以上各项之执行。[③]针对以上建议，蒋介石原则表示同意，并最后经商定：希望中共参政员出席本届参政会；中共要求各点由参政会组织特别委员会商讨解决办法。同日，黄炎培等见周恩来，转达了与蒋介石会谈经过情形及意见，希望中共再作一次让步，出席本届参政会。他们表示，只要中共出席，蒋介石若再失信哄骗，我们大家共进退。周恩来、董必武向他们说明了蒋的政策和共产党的立场，表示不能出席参政会，并提醒他们不要上当受骗。

同日，为了揭露蒋介石的政治骗局，教育和团结各民主党派，中共中央又拟定临时解决办法12条（新12条），以此作为出席国民参政会的条件。新12条在坚持原则的坚定性的同时，注重了策略的灵活性。与老12条相比，新12条作了相对让步，删掉了蒋极不愿答应、事实上也不可能实现的如要求蒋“取消1月17日的命令”、“惩办皖南事变祸首何应钦、顾祝同、

上官云相三人”等谈判条件，增加了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如“承认中共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启封各地被封书店”、“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党每派出席一人”，这些条件不仅在政治上要求打破国民党的一党统治，最主要的是它再次表明了中共的立场，从而获得了各中间党派的同情和支持。

3月1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在重庆开幕，由于国民党拒绝接受我党提出的处理皖南事变善后办法12条，我党七参政员拒绝出席会议。2日，周恩来致函张冲，请将中共临时解决办法12条（新12条）转交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作为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的条件。同日，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合致函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章伯钧、沈钧儒、张申府、邹韬奋、罗隆基、张澜等16人，说明中共中央为顾全大局，已交原定的12条善后办法改为临时解决办法12条，只要实行这个12条有了明确保证，董必武、邓颖超必能出席参政会。

不料，蒋介石对这个12条也未能接受，并在3月6日的第六次会议上作了《政府对中共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问题的态度》[4]的演说，重弹“军令”、“政令”必须统一的滥调，攻击污蔑中国共产党及第十八集团军、新四军。最后还以大会秘书处的名义再次致电中共参政员，促其出席。中共中央及时分析了当前形势，认为蒋介石正发动一切压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一切条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8日，中共参政员致函国民参政会秘书处并转全体参政员，重申中共参政员不能出席会议，并指出了不出席的理由。中共的这一不妥协的政治攻势，迫使蒋介石不敢轻易破裂，回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轨道上来。8日，董必武在没有到会的情况下，仍被选为驻会委员，这实际是国民党结束第二次反共高潮时的退兵一招。

3月14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宋美龄也在座。蒋介石这次谈话的目的已在缓和对立空气。他不再有前一时期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一开始就向周恩来表示：“两月多未见面，由于事忙。参政会开会前，因不便未见”，“现在开完会，情形和缓了，可以谈谈”。周恩来将新四军事件和近来各地政治压迫的状况说了一遍，要求按中共所提12条解决。蒋介石对新四军事件有意置而不答，对各地的政治压迫则推说，这是底下做的，不明白他的意旨。对周恩来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如《新华日报》、放李涛等人、发护照



等问题，表示都可以做到。周恩来又提到防地、扩军问题。蒋介石对防地问题没有回答，但也没有再讲开往黄河北岸的事，而是含糊其辞地说，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15 日，周恩来将会谈情况电告毛泽东，毛泽东回复说可先解决一些小问题。25 日，宋美龄又出面宴请周恩来和邓颖超，蒋介石、贺耀祖、张冲也在座。周恩来再一次谈了停止军事进攻和制止政治压迫等问题。当天，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说："今天见面时蒋只是表面上轻微缓和，实际上要看他是否真正做些缓和的事。"⑤在这以后，国共关系趋向一定程度的缓和。

此次国民参政会前后，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钧、张申府、左舜生、黄炎培、张君劢等中间党派人士还提出"成立各党派委员会"一事，目的是用它来讨论国共关系和国内政治民主化问题，并以此作为促使中共出席此次参政会的辅助条件。2 月 14 日，中共中央复电周恩来，表示同意。23 日，蒋介石宴请国民参政员，也表示同意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并允诺增加委员的人数，同时要张群、宋美龄做好中间党派的工作。24 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指示其组织各党派委员会的条件为："（一）名为各党派委员会；（二）在国民参政会之外；（三）各党派有平等权利，每党派代表一人；（四）为民主的讨论建议机关，非权力机关；（五）讨论抗战建国的大政方针，向国家民意机关及政府建议；（六）保证各党派独立性，不得干涉各党派内部事务；（七）党派委员会应讨论调整各党派间争议问题，但非取得各该党同意不发生效力。"⑥并指示他们绝对不能同意蒋介石组织的特别委员会。28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周恩来："（一）可以加入各党派代表委员会，每党派代表一人。（二）我党派恩来为代表参加委员会。（三）委员会以讨论各党派关系（当然首先是国共目前的紧张关系）及国家大事为其任务。（四）委员会不隶属于参政会。（五）我党参加委员会，但在十二条没有满意解决前，仍坚决不出席参政会。"⑦后来，由于蒋介石组织各党派委员会的用意不明，3 月 20 日，周恩来、董必武致电毛泽东，指出，为了对付蒋介石拉拢各党派而组织党派委员会的计划，建议采取以下对策：向蒋提出党派委员会必须置于参政会之外，各党派必须平等。21 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指出："（一）党派委员会问题中央还未讨论，请暂时不要答复他们。（二）请你考虑在新四军问题未解决前，不加入党派委员会是否更妥当些，因蒋目的在使我加入党派委员会束缚我们手足。"⑧25 日，周恩来又致中共中央，指出，关于各党派委员会，我们拟提出成立各党派平等

的联合委员会，并且不属于任何政府机关来与蒋所拟成立的委员会对立，迫蒋让步。最后，各党派委员会没能成立。

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前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展开的一系列斗争说明：为了坚持抗战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同国民党顽固派坚持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通过这次斗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维护，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的影响和威望，也得到了很大提高。

注释：

①转引自龚古今，唐培吉：《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93页。

③⑤⑥韩信夫，姜克夫：《中华民国大事记》第4册，第27～3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79页，第692页，第678页。

④全文见，孟广涵：《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881页。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页。

⑧转引自黄修荣：《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509页。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东三省很快沦陷。面对危机的形势，中共中央于1931年9月20日、22日、30日，先后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等文件，号召全国人民一致行动起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强调要在满洲组织武装力量，“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宣言和决议极大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抗日精神，并很快演变成为全国人民的抗日行动。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北平等地各界群众纷纷成立抗日团体，举行集会、游行、发通电，要求蒋介石南京政府迅速平息内争，对日宣战，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在中共满洲省委的号召和直接领导下，1931年9月，以东北籍爱国人士为主体的三个抗日群众团体相继在北平、锦州两地成立。一个是“东北同学抗日救国会”，一个是“东北同乡反日救国会”，还有一个是“抗日救国会”。

为了把东北各界人士已组织起来的一些抗日群众团体联合起来，共同成立一个统一的抗日团体，以利于统一领导抗日救亡运动，1931年9月26日，王化一在得到张学良的暗中支持后，邀请高崇民、阎宝航、陈先周、卢广绩等人在北平议事，决定把东北人组织的这三个抗日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抗日救亡团体，定名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下简称东救会）。是日，他们分头串联，得到了东北各界人士和青年学生及上述三个抗日团体领导人的热情支持。

9月27日，东救会在北平旧刑部街奉天会馆内召开成立大会。400多位东北流亡同胞和其他各省的爱国人士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大会宗旨是：“抵抗日本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①决定成立救国会工作委员会，并选出27名委员。9月28日，东救会发表由秘书胡石如起草的《东北民众

抗日救国会宣言》。痛述了日本制造九一八的暴行，揭露了日本侵略者正在一步步地实施其吞并我国的罪恶计划，抨击了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全国同胞，为保卫与收复“我祖我宗，辛苦经营，方有今日之繁荣”的神圣国土东北，要“速起自救”。并表示“本会甚愿追随全国民众之后，共效驰驱；一息尚存，誓死靡他！时机迫切，急不择言，凡我同胞，易兴乎来！”[②]

东救会成立时，因被选出的委员中大部分不在北平，故没有马上选举常委，也未立即组建机构。10月20日，各位委员齐集北平。翌日，举行全委会议，选出高崇民、阎宝航、王化一、卢广绩、彭小秋、霍维周、熊飞、杜重远、李梦醒九人为常委，组成常委会，作为东救会的最高领导机关。常委会下设总务、宣传、军事三个组，总务组主要是筹划捐款，由卢广绩、高崇民负责；宣传组包括政治训练，由阎宝航、杜重远负责；军事组由王化一、彭振国负责。1932年1月中下旬，东救会机构改组，将委员会改名为执行委员会，设执委41人，常委15人，并成立监察委员会，设监委五人。同时将原来的三个组改为一处两部：原总务组改为秘书处，原宣传组改为宣传部，后改为政治部，原军事组改为军事部。此外，还成立了关外工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还在西山秘密成立了军事训练班，训练抗日指挥人员。

东救会中的人员复杂，其主要负责人都是原东北军、政、商、农、教育和宗教等各界的知名人士，也是辽宁省各法团和反日团体的领导人。这些人不仅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和威望，而且都与张学良有较深的交情，他们当中还有一部分人与共产党建立了联系。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反帝大同盟盟员和广大爱国青年学生占了东救会中会员的大多数，他们虽然不掌握东救会的领导权，却是东救会的中坚力量，东救会中的各项具体工作几乎全由他们去做。此外，东救会中还有一部分爱国的国民党员、国民党改组派和青年党人。可见，东救会是一个“以东北籍广大青年为主体，广泛吸收各党派、各阶层人士组成的抗日救亡团体，实际上，它是一个抗日统一战线组织”。[③]

东救会在存在期间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宣传抗日，奋起救亡；二、组建抗日义勇军，同日本侵略者展开武装斗争；三、千方百计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集资，筹措军械军需物资。东救会的这些工作，为抗日运动在东北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1年9月24日，在日本关东军的策划下，“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成立。对此，东救会于10月4日通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主席蒋介



石、张学良及各院长、部长、各省主席、各市长等，郑重声明：日军一手扶植的伪“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是“欲假此御用机关，以施其掩饰侵略之阴谋”，“本会尊重主权起见，对该会一切设施及与日方所订任何条件，决不承认。”④10月26日，东救会又致电东北各机关，再次声明，对于在日本人扶持下建立起来的一切非法机构，概不承认，凡拥护伪政府的，本会即认为汉奸卖国，将采取有效办法，严加惩处。11月10日，溥仪要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建立伪满洲国的消息传遍了整个东三省，11月18日，东救会为此发表了一篇声讨溥仪宣言，号召国人起来，誓死反对。此后，东救会又于1932年的1月，多次向国民党中央及各级党部和国民政府发出通电，敦促其对日宣战，声讨伪满洲国，缉拿汉奸，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

1931年10月28日，蒋介石、汪精卫在上海举行宁粤“和平会议”。是日，为推动国民政府抗战，东救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联合逃难来北平的东北各大、中学学生及旅北平的东北各民众团体，组成“东北民众救国会请愿团”，赴上海、南京请愿。请愿团组成后发表了《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宣言》，要求政府放弃成见，对日宣战。11月11日，蒋介石接见请愿团，请愿团向蒋介石递交了请愿书，提出了“克日收复东北失地，暴日如再进扰各地应立以武力制止，准备对日宣战，悬赏拿办媚日汉奸袁金铠、熙洽”等八项条件。蒋介石阅后说：“对外交涉，政府自有办法，人民不应过虑。”⑤请愿无果。此后，于12月23日，东救会又一次公开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尖锐批评了其不抗战政策。1932年1月11日，东救会还会同东三省商会联合会、工会联合会、教育联合会、辽宁农务总会和辽宁报界联合会等团体，联名公开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尽快恢复中苏邦交，以共同对付日本侵略。除此之外，东救会还多次向张学良请愿，说服他奋起抗战，收复失地。东救会的南下请愿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广大爱国民众因此而清楚地认识到，只有自己组织起来进行抗战，才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务。

1932年1月，国联组成以英、美、法、德、意五国组成的国联调查团来到中国，调查日本侵略中国一事。东救会为促使国联对东北问题进行公正裁决，于事前大量搜集了关于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证，然后提供给国联调查团。东救会的主要领导人阎宝航、王化一、卢广绩等，还亲自前往调查团下榻的北平饭店，会见调查团团体成员，向他们详细介绍九一八事变的经过，并要求调查团能主持公道。

为了更加深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以及更加系统和有组织地

报道东北义勇军的战绩，扩大抗日宣传，东救会还克服种种困难，创办刊物。1932 年 2 月，东救会创办了《救国旬刊》，同年 9 月，又相继创办了《复巢》小报和《东北通讯》。这些报刊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和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报道了东北各地义勇军英勇杀敌的成绩和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事迹，另外还刊登了国内外各社会团体和个人对义勇军物资及资金的支援情况，刊登国内外对东北事件的评论；阐述救国会的抗日主张。除了办刊物外，救国会还广泛开展报告会、联谊会、亡省纪念会等活动，鼓励广大青年参加抗日，并组织宣传队，沿平津、平汉路南下，介绍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情况，号召各界人民行动起来，支援东北的抗日斗争。东救会的主要领导成员阎宝航、高崇民等还多次到清华、北大、南开等著名大学作演讲报告，号召青年学生奋起抗战，很多学生受到感召，投笔从戎，奔赴前线。东救会的宣传部副部长杜重远先生，为东救会的宣传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1931 年 12 月，杜重远从上海奔赴重庆、汉口、长沙、九江、安庆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1932 年 6 月，他再次离沪，前往广东、广西、香港、澳门、福建等地，向士农工商各界人士、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宣传抗日，并请鼎力支援东北义勇军，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和热情支持。

东救会的以上宣传活动，在当时影响重大，赢得了广大爱国民众的同情和支持，为今后在东北地区开展武装的反日斗争奠定了舆论基础。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纷纷成立，为了团结他们进行抗日，东救会及时派人潜回东北，组建抗日武装，并和各地义勇军取得联系，从组织上进行帮助和领导，从物资上给予援助。1931 年 9 月底，东救会派张新生等人潜回沈阳，在新民县帮助绿林首领高鹏振组建了一支抗日义勇军——东北国民救国军，随后还帮助他们进行了队伍扩建、整编和训练。11 月中下旬，东救会常委、军事部副部长熊飞和执委黄显声派人去辽南联络绿林首领张海天、项青山、盖中华等，组建了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一、二、三路军。为了进一步扩大抗日武装，1931 年 11 月，熊飞、黄显声又以张学良新委任他们的“清乡督办”的名义颁布了《收编加委方案》，鼓励各界人士组成抗日武装，参加抗日。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部分绿林首领、中下级军政人员、爱国士绅纷纷而起，组织起各种名称的抗日义勇军。到 1931 年 11 月下旬，仅辽宁境内和热河部分地区已成立的义勇军即达 30 多支。12 月中旬，东救会通令这些义勇军统称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整编成 22



路，并委任了各路司令，指定了活动地区。为加强对这些抗日义勇军的领导，东救会派出70余名军政人员出关到各路义勇军中担任军事、政治部门的参谋，宣传、联络工作。他们参与拟定作战计划，沟通各路义勇军之间的联系，培训军政干部，传递东救会与义勇军之间的情报，对官兵进行“专抗日，不扰民，不杀俘虏”的宣传教育，动员群众投身抗日武装斗争、支援义勇军等工作。

在东救会组织、发动和领导下，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很快，到1932年3月，仅辽宁地区接受东救会委任的义勇军即达54路（不久又增加到56路），另有27个支队和六个路的骑兵，此外还有特种编制的义勇军，总计人数约10余万人。此后，东救会又派黄宇宙等数十名军政人员到东边道14个县组建19路抗日义勇军共10余万人。为加强吉黑两省的抗日工作，1932年2月，东救会特派常委车向忱和工作人员李述全等，前往吉黑各地慰问与指导各部抗日义勇军，鼓励他们英勇杀敌，与辽宁、热河地区义勇军南北配合，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1932年6月，为了克服各路义勇军各自为政、单独作战、互不配合、编制不一等弊端，东救会对辽宁和热河地区抗日义勇军进行了统一整编，划分为五个军区（后改称军团）。对其他地区的抗日义勇军也加强了指导。辽宁、热河等地义勇军整编后，全东北抗日义勇军又有较大发展，到1932年夏秋间，总兵力已达50万人，其中除共产党组织与领导的之外，接受东救会委任和领导的近30万人。这些抗日武装，在东救会从关内派往关外的400余名军政人员的帮助和指导下，同日伪军展开了殊死的斗争。“据《救国旬刊》报道：1931年12月至1932年8月，仅辽宁一省，义勇军攻打中小城镇就有43次，其中一度攻占的有29次。”[⑥]1932年9月18日，中共满洲省委曾在《为加强义勇军工作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中对他们在抗战中的作用进行了高度评价，指出：“他们英勇的战斗行动，弥漫了整个满洲，它震撼着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铁血的统治；它冲击着满洲地主资产阶级走狗的统治。”

由于蒋介石南京政府在经济上拒绝对东救会进行支持和帮助，因此，东救会自成立之初，即决定主要依靠和发动一切爱国的社会各界人士及海外侨胞的支持，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一、争取张学良的支持和帮助。东救会存在期间，张学良曾多次批给活动经费和枪支弹药等其他军需物资，然后由东救会转发给各路义勇军，开展抗日斗争。二、争取国内各界人士和海外华侨

的资助。东救会成立之后，曾派人分赴上海、南京、苏州等地，拜会各界人士、海外华侨及国民党军政人员，宣传抗日主张，募集抗日资金。因此，东救会的抗日义举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东救会还派人赴香港、菲律宾、南洋、旧金山等地向华侨为义勇军募捐，募捐的大量资金、物品及时发给各路义勇军。一部分受感召的国民党爱国将领也加入到募捐行列。三、开展“劝募”和“义卖”活动。东救会还多次联合北平各抗日群众团体及东北学生，组织各种形式的“劝募”活动，救济东北难民及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余下的少部分进行“义卖”，所得款项全部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四、发行“爱国奖券”。1932 年 5 月，东救会倡议发行“爱国奖券”，以筹集抗日经费，得到了张学良和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积极支持，奖券发行后他们纷纷认购。到 1933 年 1 月，“爱国奖券”共发行七期，所得净余款 17 万余元，对支援东北抗日救亡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五、为义勇军提供武器弹药等军械军需物资，并直接进行现金支持。“据不完全统计，仅 1932 年 10 月至 1933 年 6 月的 9 个月中，东救会向东北义勇军大批量的运送军械军需物资就有 4 次，每次约计 20 吨左右，小批量的运送从 1931 年末开始就接连不断”，“据不完全统计，救国会从成立到 1933 年 8 月被国民党政府勒令解散止，共支援东北义勇军总金额为 38.7 万余元，用以购买军械军需物资及粮秣等。”⑦

东救会自成立以来一直为抗日救亡而奋战，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民族精神，这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妥协投降政策所不容，因此，受到了来自国民党方面的各种形式的压迫。1933 年 7 月 10 日，国民政府通过高仁绂向东救会传达了取消的命令，遭到了东救会的强烈反对。最后，国民政府竟公开采取镇压措施，于 7 月中下旬期间，不断制造镇压东救会事件。在这种情况下，1933 年 8 月 31 日，东救会常委扩大会议正式决定：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宣布结束。但在这之后，它的成员并没有结束抗日救亡活动，而是转入地下，以新建立的秘密组织“复东会”为阵地，进行隐蔽的、但是更坚决的斗争。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存在的两年多的时间里，给了东北民众的抗日斗争以极大支持和鼓舞，它所支持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和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队伍及其他民众抗日武装，给日军以重大杀伤，这对于延缓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进程，对于推动东北乃至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注释：

①③④⑤王驹，邵宇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1 页，第 16 页，第 17 页，第 22 页。

②何世芬，康雅丽：《东北人民的第一个抗日救亡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5 年第 6 期。原文载于陈觉，《国难痛史》第 3 卷第 8 章，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 年 9 月出版。

⑥⑦边吉：《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成立及其在东北抗战初期的历史功绩》，《党史纵横》，1995 年 12 期，第 19 页。

以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东联”为核心的东北救亡总会

华北事变发生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1935 年 12 月 9 日，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1936 年初，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关内东北抗日救亡工作的领导，以充分发挥东北流亡在关内的人士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作用，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成立“中共东北党务特别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东特委”），由苏梅任主任，负责在东北流亡同胞中开展工作。“东特委”成立后设立了两个委员会，一个是“上层工作委员会”（简称“上委”），赵濯华为负责人，负责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一个是“群众工作委员会”（简称“群委”），汪之力为负责人，负责领导下层统一战线工作。另外，“东特委”成立后，还把在东北流亡青年中开展工作作为重点，为此，它相继领导成立了几个以流亡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抗日救亡团体。一个是东北妇女抗日救国会（简称“东妇”）；一个是东北旅平青年救国会（简称“东青”）；另一个则是东北人民抗日会（简称“东抗”）。这三个团体都是在东北大学成立的，其成立后“使东北流亡同胞在复东会解体后，重新有了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团体”。①但是，这些团体毕竟是一些范围较小的组织，而且各自为战，活动方向也不相同，这样就限制了抗日力量的发展。1936 年 12 月初，“东特委”决定在以上三个组织的基础上联合其他各抗日救亡团体，建立一个统一领导东北同胞抗日救亡的团体——东北旅平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东联”）。

10 月 20 日，“东联”发表了成立宣言。在宣言中提出八项主张：“（一）要求立刻对日作战，收复失地；（二）联合各党各派召开救国会议，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政府；（三）全国民众立即自动组织起来，采取有效的行动，执行抗日的斗争；（四）坚决反对任何消耗国力的自相残杀的内战；（五）坚决否决一切有损领土主权的条约和协定；（六）要求立即严厉制裁



卖国贼汉奸走狗，并没收其财产充抗日经费；（七）要求人民有结社集会言论出版和爱国运动的自由；（八）建立被压迫民族联合抗日战线。”[②]“东联”会址设在东北大学校部，主要负责人为赵濯华、王之力和于毅夫。

“东联”初期开展的工作主要有：“报道西安事变发展情况；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各项主张；呼吁东北同胞加强团结，要求蒋介石南京政府释放张学良。”[③]到1937年3月时，“东联”的参加者已发展到十五六个团体，理所当然地成为领导东北流亡同胞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机构。1937年5月间，“东联”领导了东北大学学生的“护校运动”[④]，中间还组织了声势浩大的“赴京请愿团”，最后取得了初步的胜利，这是一次成功的爱国救亡行动，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和同胞的大力支持，为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推动国内民主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东联’虽然存在时间较短（1936年12月—1937年6月），但它是‘九一八’事变后关内东北救亡团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首次实现联合的群众救亡团体，它为东北救亡总会的成立作了组织上的准备。”[⑤]是东北各救亡团体由一个松散联盟发展成为一个有严密组织和完备领导机构的团体的过渡阶段。

东北救亡总会（以下简称“东总”）1937年6月20日，在北平白塔寺东北大学成立。“东总”实际上是在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关怀、领导下，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吸收各个方面的代表人物和形形色色的东北流亡同胞的团体，并邀请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负责人为代表的东北抗联加入，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上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几十万的流亡同胞和东北军无疑成为抗战的一支主要力量，团结并利用好他们，是抗战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但是，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却遭到蒋介石的分化瓦解，面对这种情势，周恩来于1937年2月指示“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中共在东北军内部设立的秘密组织，简称“东工委”）书记刘澜波：“要把东北人民、东北军团结起来，抵抗蒋介石的分化瓦解；把进步的东北军官、东北人士组织起来，把东北救亡团体联合起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争取张学良将军早日恢复自由。”[⑥]3月18日，周恩来又致信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指出建立东北民众救国联合会的重要性，并在信中提出了五项具体意见。刘少奇接到信后，立即给“东特委”发出指示，要求其迅速派“有组织的东北人，去组织无组织的东北人；以东北人的组织力量，来推动东北军，影响东北军及

东北中上层进步人士，使之更加进步，更进一步走向团结抗战，以推动国共合作。”[⑦]在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推动下，东北救亡团体联合会的筹建工作于3月下旬分别在北平和上海两地展开，其中，上海的筹建工作是周恩来亲自领导的。经过长时间的准备过程，1937年4月下旬，东北救亡团体联合会的主要筹建人在上海齐聚，召开了该会的筹备会议，确定该会的名称为“东北救亡总会”。

1937年6月20日，“东总”成立大会在北平市白塔寺东北大学礼堂举行。“出席成立大会的正式代表约70余人。主要有：原东救会和复东会负责人高崇民、阎宝航、车向忱、陈先舟、卢广绩等；‘东联’及其所属团体的代表于毅夫、赵濯华、张希尧、陈大凡、宋黎、李向之、张庆泰、张东之、关梦觉、王桂五、田雨时、韩立如等；东北军代表刘澜波、栗又文、苗渤然等；东北抗日联军代表李延禄、孙山等；东北义勇军著名将领李杜的代表于炳然；东北大学代表周鲸文；东北名流王之相（曾任驻苏领事）、纪元（曾任章士钊秘书）等；归国留学生代表张克威（留美）、徐寿轩（留法）、杜清轩（留德）等。北平、天津、上海、汉口、保定、石家庄、绥远、太原、西安、淮阴等地区都有代表出席会议。此外，还有一百多名东北青年也参加了大会。”[⑧]大会选举高崇民、阎宝航、杜重远等30余人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高崇民、阎宝航、车向忱、陈先舟、卢广绩为常务委员。

成立大会通过了“东总”《组织大纲草案》和《工作报告》。规定东总的宗旨是：团结东北救亡力量，领导东北救亡工作，并推动全国抗日运动，以达到恢复东北失地、完成民族解放的目的。《工作报告》则提出了“东总”成立后应急需开展的六项工作。1938年1月19日，“东总”在《东北救亡总会目前的任务和中心工作》决议中，对“东总”的中心工作进一步作了明确规定：“（一）粉碎亲日派汉奸破坏抗战的阴谋，加强推动各救亡团体、各抗战力量与政府间的密切联系。（二）在东北人民中进行广泛的团结运动，扩大并建立各地分会组织，争取大多数东北人参加本会。（三）参加抗日的宣传工作。（四）积极训练、培养，并提拔大批干部以增进本会工作效能，即以充实抗日力量。（五）经常加强总会与各地人员的内部教育，提高政治水准，树立自觉的纪律，以增进工作效能。（六）协助政府，特别加强抗日武装的政治工作（如建立游击队中有力的政治领导等等）。”[⑨]

“东总”的成立，“标志着关内东北同胞的抗日救亡活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由自发的分散活动的阶段走向了组织严密的统一联合行动的新

阶段。”[10]根据制定的工作纲领，“东总”迅速投入到抗日救亡的巨大浪潮中。

七七事变爆发后，“东总”迁往南京，不久又迁往武汉，1938 年武汉失陷后又迁往重庆。在这一过程中，周恩来曾多次指示“东总”要把流亡关内的东北军、东北同胞最大范围地团结起来，一同坚持抗战，打回老家去。为此，“东总”尽一切努力做好各方面的统战工作。主要表现在：一、重视对原东北军上层军官和东北爱国人士的团结工作。“东总”党组书记刘澜波曾多次同五十七军一百一十一师师长常恩多、六百六十七团团长万毅谈话，帮助他们提高政治觉悟，1938 年 3 月，万毅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外，1937 年 10 月，“东总”在南京对组织机构进行改组，吸收了与国民党关系较深但却坚决主张抗日的东北籍上层爱国人士王化一、王卓然为主席团成员，为“东总”在国统区的合法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王卓然还在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上为重建东北行政机构一事立下重要功劳。在“东总”巨大压力下，1940 年 5 月 2 日，国民党政府终于正式组建了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四省政府。“这是‘东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东北同胞复土还乡斗争的一个胜利。”[11]除了加强对东北籍上层军官和爱国人士的统战工作外，“东总”也不忘加强对东北籍文艺界人士的统战工作，以使他们在抗战中充分发挥其应有才能。二、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推动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发展。武汉期间，“东总”负责人于毅夫等参加了董必武领导的，由沈钧儒、邹韬奋等组织的宪政座谈会，为宪政运动的开展作出了贡献。

“东总”成立后，为了向各抗日根据地培养和输送得力干部，先后在北平、武汉、西安等地开办了政治、军事训练班（也称之为“战时服务训练班”），以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和训练。在武汉开办的训练班，由刘澜波亲自主持，“东总”领导人和其他爱国人士都曾在训练班上讲过课。为了更加有力地开展这一工作，“东总”还专门成立了由阎宝航、徐寿轩、徐仲航负责的“训练委员会”，以负责训练班的具体工作。从训练班结业后的学员大部分都去了抗日前线从事抗战服务工作，“据阎宝航统计，截止到 1938 年 10 月 1 日，‘东北爱国青年经过东北救亡总会的介绍，参加到各战区去工作的不下千余人’。”[12]“东总”的这一举动为抗战前线输送了大量人才，推动了抗战胜利的进程。除此之外，“东总”还直接训练和培养抗日骨干，让他们参加游击队，参加抗战。西安、武汉、绥远、济南等地的分会则大批收容东北流亡青年，加以培养后，送往前线。

加强对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是“东总”成立后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1938年2月1日，“东总”在武汉创立了其机关刊物《反攻》半月刊，成为抗战时期在国统区宣传抗战到底、反对投降的重要舆论阵地。《反攻》存在期间，很多共产党人士及其他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共议抗战形势。其中，几乎每期都有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的报道，“有时这类文章竟占一期文章的三分之一”。通过这些报道，全国人民更多地了解了中共的抗战主张，极大地鼓舞了抗战士气。汪精卫投敌后，曾秘密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约，为此，“东总”也发表专门性的文章，表示强烈谴责。此外，《反攻》也是全国人民详细了解东北抗日联军抗战情况的最主要渠道。

《反攻》还是关内流亡东北同胞增强其“打回老家去”信心的重要思想武器。通过《反攻》的广泛宣传，广大东北流亡同胞增强了抗战信心，变得更加团结，并始终站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

除了办刊物外，“东总”还于1938年春以后，先后成立了抗日宣传队和三个战地服务团。其中战地服务团主要是以文艺演出为主，目的是：“动员民众参加抗战；加强军队政治工作，提高部队士气；瓦解敌军与争取伪军反正。”[13]这些组织深入到各战区、各抗日根据地和大后方，进行了广泛的抗日宣传工作，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丰富了战地文艺生活，凝聚了抗战力量。

“东总”存在期间，还在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大力支持下，召开过一次“追悼东北抗敌阵亡将士”大会。1938年2月18日，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在武汉空战中击落日军飞机16架，但我空军五名飞行员不幸遇难，其中队长李桂丹、队长吕基淳和队员巴正清都是东北人。为此，“东总”负责组织了这次追悼大会，最后发展为抗战爆发以来规模巨大的一次群众集会，振奋了民心，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东总”存在期间，也为营救张学良将军一事作出巨大努力，通过多种关系了解了张学良的情况，并尽最大努力争取他恢复自由。

总体来说，“1939年10月以前，‘东总’的工作是相当自由的；10月以后，情况逐渐恶化。”[14]主要表现在：“东总”在各地的分会，纷纷遭到严重打击：“洛阳分会与郑州分会被迫关闭；西安分会遭到搜查，被迫逐步进入秘密活动状态；汉中通讯处的李华春同志竟遭逮捕并被活埋；成都分会亦受到酷苛的限制……。”[15]此外，“东总”的机关刊物《反攻》也受到无理审查。1941年以后，这种情况更是严重，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活动更加肆无忌



惮，各分会的一些同志相继被捕暗杀，他们还攻击、诬蔑“东总”是“军阀残余集团”，是“中共外围组织”。“东总”面临异常困难的境地。

1942年5月30日，国民党中统和军统两个特务组织合谋，以取消原有东北各团体，另组一个总的团体为“理由”，组织了由CC派把持的“东北抗敌协会”，阴谋以此取代“东总”。同年秋，东北救亡总会被蒋介石勒令取缔。“东总”转入地下活动，但其出版的刊物《反攻》，“因系单独立案，遂能克服困难，继续出版，与‘东北抗敌协会’出版的反动刊物《东北论坛》进行斗争，直到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于9月18日出完最后一期才停刊”。[16]至此，“东总”圆满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其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贡献将为我们永远铭记。

注释：

①⑤⑦⑧⑩⑫⑬戴茂林，邓守静：《八年抗战中的东北救亡总会》，东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第31页，第42页，第44～45页，第46～47页，第64页，第68页。

②③戴茂林，邓守静：《八年抗战中的东北救亡总会》，东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原文载于《张副司令讲演集》（第1辑），第5页。1935年武汉出版。

④东北大学，成立于张作霖统治东北时期，1923年4月正式开办，1928年张学良任第三任校长后，经过改革成为国内著名的高等学府。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迁往北平，成为宣传抗日救亡的重要阵地。西安事变后，国民党于1937年1月12日，任命国民党CC系分子臧启芳为校长，妄图控制东北大学，瓦解抗日救亡运动。因此遭到东北大学学生的反对，掀起护校斗争。

⑥《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2～173页。

⑨张金榜：《东北救亡总会》，《沈阳文史资料》（第15辑），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88年版，第202页。

⑪⑯贾玉华，史艺军：《中国共产党与东北救亡总会》，载于谭译，高树桥主编，《牢记历史发愤兴辽辽宁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7年版，第50页，第53～54页。

⑭⑮于天存，于波：《欧风亚雨，虎穴龙潭—抗日救国传奇人物于炳然传》，北方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页。

致公党对海外华侨的影响和激励

中国致公党是1925年由海外华侨洪门人士建立起来的组织。它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重要党派之一，也是成立最早的民主党派。早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致公党的前身洪门致公堂即积极追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为辛亥革命的胜利作出过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1925年10月10日，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大会（即致公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旧金山举行，会议正式宣布，该日为驻美国旧金山致公党总部成立日期。但此次会议后，改堂为党的决议并没有完全得到执行，美洲有些洪门组织仍然保留着堂，抵制改党。为了使中国致公党成为名副其实的政党，中国致公党中央又于1931年10月在香港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党堂分开，以党领导堂。会议选举陈炯明为总理，陈演生为秘书长，司徒美堂为美洲总支部主席。此次大会后，致公党又在大洋洲、南洋群岛及香港等地建立了许多新的地方组织，至1933年，据统计，致公党已拥有300多个支部，党员40余万，遍及五大洲。

其时，正值日本侵略者侵占我国东北地区，因此，致公党即迅速投入到动员广大海外侨胞支持祖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工作中。1932年1月28日，日本又制造一·二八事变，驻上海的19路军（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在人民的推动下，奋起抵抗。对此，致公党人倍受鼓舞，倾尽全力勉励侨胞捐款输将，并鼓励在上海的党员投身行伍，奔赴前线，捍卫国土。为了更有效地接济抗日军饷，1932年3月，致公党人和华侨又在旧金山成立了“美洲华侨抗日救国会后援总会”。同年11月，召开全体职员大会，决定将巨额捐款大洋10万元移汇上海广肇公所，然后转交朱庆澜将军，作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军费。

1933年11月，19路军奉调入闽“剿共”，陈铭枢、蒋光鼐和李济深等联合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反蒋抗日。致公党美洲总支部获悉后，立即宣布誓与广大华侨一起，为新政权效力。不久，福建



事变失败，蔡廷锴被迫解甲出洋，1934 年 8 月 28 日抵美，访问十几个城市。蔡廷锴的这一访美之行无疑激发了侨胞爱国抗日的热情，促进了华侨社会的大团结。继蔡廷锴之后，又有杨虎城、陶行知等爱国将领和民主人士在蒋介石的迫害下避祸美国，这也得到了司徒美堂和其他爱国侨胞的热情接待和保护，还大力协助他们顺利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日军入侵华北后，妄图变华北为第二个“满洲国”，意图进而独占整个中国。在此严重形势下，中国致公党人和华侨展开了新一轮的抗日救亡活动。1936 年 1 月 5 日，芝加哥各华侨社团与留美学生联合会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日本扩大侵华。1936 年 5 月，纽约、芝加哥、华盛顿等地的致公党人和华侨又借“五卅运动”11 周年纪念日之机，主张目前的抗日救国，唯有重振“五卅”精神，恢复全国的一致联合，才能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在华盛顿的纪念会上，他们向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施肇基提交了给南京国民政府的电报，“要求即刻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力量抗日”。还发表宣言，号召全体华侨“踏着五卅烈士之血迹，恢复与发扬五卅时代之反帝精神，再接再厉作救国运动。”①1936 年 11 月 22 日，蒋介石政府在上海逮捕主张抗日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七人，制造了“七君子事件”，激起了海外华侨的义愤。致公党人和华侨与全国人民配合，立即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营救七君子的运动，为七君子的最终获释作出了努力。

1937 年 7 月 7 日，全面抗战爆发，在此紧要关头，致公党人继续发扬其爱国的光荣传统，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的号召，迅速加入到反抗日本侵略的伟大的民族斗争中来。在其影响和号召下，数千万海外侨胞也踊跃参加抗战，他们或运用原有报刊、团体大力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或组织华侨抗日武装回国参战、服务，或“倾家输将”以协助军饷，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据不完全统计，仅 1937 年 10 月和 11 月两个月，美国致公党人和华侨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和救助东北难民的捐款总数就接近 14 万美元之巨。除了在军费上给予大力支持外，致公党人和许多海外华侨团体还成立了许多华侨航空救国会，主要负责筹款购买飞机，并组织人员进行训练，最后配备熟练的飞行技术人员，连同飞机一起返国抗日。据统计，从 1937 年 7 月到 1940 年 10 月，海外华侨共捐献飞机 217 架，仅美国华侨献机就有 50 架。司徒美堂和旅美进步人士还共同发起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发

动华侨捐款支持抗战，并与在香港以宋庆龄为首的“保卫中国同盟”取得联系，把美洲侨胞的捐款送往国内，支援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斗争。

1941 年 1 月 6 日，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这不但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谴责，同时也受到了海外侨胞的强烈抗议，纽约致公党的《五洲公报》与《华侨日报》、旧金山的《世界日报》以及加拿大、古巴等地的十多家报纸联名谴责国民党这一罪行。纷纷要求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及蒋介石迅速停止反共行为，加强团结，共同抗战。1 月 8 日，致公党总监督司徒美堂、阮本万等分别致电蒋介石、毛泽东，提议召集各党派、各界领袖，组织特别委员会调整国共关系，要求及时召集真正代表民意之国民大会，制定国家根本大法，奠定民主基础，巩固抗战大局。3 月 14 日，毛泽东电复司徒美堂并全美洲侨胞等，对其关怀祖国，呼吁团结的精神表示敬佩，并请司徒美堂对中共提出的“善后办法”及“临时办法”予以赞助，以期迅速见之实行。

同年，司徒美堂被国民政府聘为华侨参政员。为了督促蒋介石国民党尽快与共产党团结抗日，同时也为了联络南洋、香港和国内洪门兄弟，为祖国抗战出力，1941 年 10 月 11 日，司徒美堂乘船返港。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特为巩固其在香港的“占领秩序”，威胁利诱司徒美堂，迫其当维持会长，让他出面组织香港帮会。司徒美堂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他在爱国致公党员和洪门弟兄帮助下，化妆离港脱险，以 75 岁的高龄，跛足持杖，步行 300 里至东江游击区，经曲江、桂林，于 1942 年 3 月 9 日抵达重庆。蒋介石夫妇也想利用他，颇加青睐，到访必迎，出则搀扶。蒋介石还叫吴铁城引诱司徒美堂参加国民党，并以“国府委员”作饵，但遭司徒美堂拒绝。在渝期间，司徒美堂还尽力敦促国共两党合作，集中表达了千百万海外赤子要求祖国团结，反对国共分裂的共同心愿。另外，他还广泛接触重庆各界人士，了解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艰苦作战的真实情况，从而打消了对共产党的疑虑。1942 年，司徒美堂途经印度返美，旋转赴南北美洲十余国，深入华侨社会各个阶层和社团，更广泛地接触洪门人士，宣传祖国抗战的大好形势，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华侨的抗日救国热情。

侨汇问题的解决是促使海外华侨汇款支援国内抗战的重要一环。抗战以来，华侨将大量个人所得捐给国民政府用作抗战经费，仅留部分交由中国银行汇给国内眷属用作生活费。但这部分生活费却受到层层克扣和剥削，导致沿海一些侨胞乡族的生活困难。当时在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议的司徒美堂回广东老家探亲，就亲眼目睹了这一现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邮路不通，侨



汇更加困难。对此，司徒美堂强烈呼吁国民政府迅速拨款救济侨眷，并体谅国家在财政上确有困难的现状，建议政府先予借贷，允他返美后募捐偿还。此外，司徒美堂还建议政府保护华侨合法权利不受侵犯，在此前提下，他可鼓励华侨回国投资，支援抗战建国。随着国民参政会的结束，司徒美堂立即投入到进行救侨护侨的工作当中，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在重庆枣子岚垭办起一家华侨兴业银行，并亲自担任银行的董事长。银行开业后及时接通信汇，保证了侨资归国，解除了侨眷的疾苦，同时还为华侨输财抗战、投资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以司徒美堂为主要发起者的致公党的救侨护侨工作，对抗战时期动员华侨从经济上支援祖国抗战以及战争的胜利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国民参政会上报告，1939 年国民政府全年战费是 18 亿元，而根据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提供的数字，该年华侨捐款和汇款达 13.3 亿”。“有人统计，从 1937 年到 1941 年底，国民政府总收入约为 226 亿，华侨汇款达 53 亿，相当于国民政府总收入的 1/4，将近国民政府军费开支的 1/2”。[②]华侨汇款在战时中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怪乎有人把华侨称为“抗日长城”，而日本政府及学者则把抗战时期的侨汇统统直接称为“抗日战费”。[③]

海外致公党（堂）的许多下属组织，也为抗战的胜利作出过巨大贡献。他们创办报刊或运用华侨洪门原有报刊，积极宣传抗日救亡，还组建了许多个以洪门团体中爱好文艺的青年为主的文艺宣传队，上街举行抗日募捐演出会，原为支援辛亥革命所创设的美洲洪门筹饷局，此时也被利用来为抗日筹款，八年抗战期间，他们所募集的捐款与公债，总数达到几亿美元。

1941 年香港沦陷前夕，中国致公党总部被迫停止活动。但是，中国致公党在各地的党员继续积极支持祖国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经常以各种名义动员党员、华侨为抗日捐款，还动员和支持洪门青年和华侨青年返国直接参加各地区各种抗日部队，与日寇作殊死的搏杀。总之，中国致公党的成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或抗战，以致为国捐躯，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中国致公党和海外华侨的上述工作，为抗日救国，为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共产党早在 1935 年 8 月 1 日发表的《八一宣言》中就曾表示，把它列入中国“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之中，并表示愿与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

此，在抗战胜利前夕，美洲各地致公党办的报纸与其他爱国华侨办的报纸还联合发表《十报宣言》，号召中国要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并召开国民代表会议，成立民主政府。

注释：

①转引自薛启亮主编，彭湘福分卷主编：《中国民主党派史丛书：中国致公党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7 页。

②陈昌福：《抗日战争与中国致公党》，《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 年第 5 期，第 62 页。

③（日）市川捷三朗：《陈嘉庚和华侨的政治汇款》，《东洋学报》，第 51 卷第 2 号。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政治主张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前身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0年8月9日，邓演达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通过了党的纲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推翻南京政府反动统治，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会议还选举出邓演达、黄琪翔、彭泽民、章伯钧、季方等25人为中央干部会干事，推举邓演达为总干事。8月10日，中央干部会发出第一号《通告》，宣告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正式成立。此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就一直为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而努力。直到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因叛徒出卖而不幸被捕，11月29日被蒋介石残忍杀害。这一事件给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各项工作带来了极大影响，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事先准备的武装起义计划也未能付诸实施。但是这并没能阻止临时行动委员会的行动，他们重振组织，继续战斗，并提出了"倒蒋抗日"的政治纲领，先后为一·二八淞沪抗战和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行动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参与十九路军发动的反蒋的福建事变。

1935年，日本发动华北事变，国民党继续妥协退让，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在此民族危亡时刻，中国共产党于8月1日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和各军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临时行动委员会负责人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等也深受鼓舞，他们于1935年秋开始，即纷纷联络在各方的临时行动委员会人士，齐集香港，共同商讨重振组织的具体问题，并确定了"抗日是我们的中心工作，一切应该服从抗日"的原则。

1935年11月10日，根据事先的准备工作，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香港九龙召开了第一次临时代表大会（后改称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章伯钧、彭泽民、丘哲、彭泽湘、郭冠杰等2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

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改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行动委员会”），以担负起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会议集中讨论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及恢复党的组织问题，从而使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最后，会议选举出黄琪翔、章伯钧等19人为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黄琪翔为总书记。会议还决定在北平、上海、广州建立华北、华东、华南三个大区机构，以领导有关省市迅速恢复和发展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此次大会通过了两个重要的文件，《告同志书》[①]和《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临时行动纲领》[②]（以下简称《临时行动纲领》）。《告同志书》实质是一个重振组织的文告，宣称“我们现在的政治任务，在于完成中国反帝反日的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号召一切革命党派在目前的生死关头，应放弃宗派成见，形成巩固的联合战线，组织统一的行动指导机关，联合抗日。宣言还确定以“抗日、联合、反蒋”为总方针。“这个文件的发表，标志着建党以来历史的专折：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开始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新历程。”[③]会议上通过的《临时行动纲领》，是解放行动委员会为适应抗战形势，实现民族革命战争的一个临时性政治纲领。它首先对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作了深刻的分析，然后全面地阐明了斗争任务、政策和动员组织全民抗战的具体主张。指出：党和广大中国人民的斗争任务是进行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二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政策和策略应加以改变，应进行联俄联共，动员组织全民族共同抗战。

此次大会的召开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局势下，实现了党的政治策略和行动方针的重大转变；它比较鲜明地提出了抗日、民主、团结的三大要求；它一改过去理论上和思想上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明确提出要联俄联共。大会还完成了复党和党的改组工作，使一度遭到挫折的党，再一次振作起来。虽然这次会议及其通过的《临时行动纲领》，还有不足的地方，但它却集中反映了行动委员会坚决要求抗日的愿望与决心，表明了该党的政治新主张，是一个爱国的、民主的、进步的纲领，它标志着行动委员会在政治上的重大转变。

第一次临代会后，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中央机关设在香港跑马地。为了进一步指导各地党组织的工作，中央机关开始编印《政治通讯》和《工作通讯》等油印品，秘密送往华北、华东、华南各地组织。同时还在上海、广东、北平出版了《行动》、《草原》等刊物，宣传行动委员会的

政治主张。到1935年底，解放行动委员会在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鼓舞下，已使华北区、华东区、华南区及日本东京的各地组织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1936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领导下，各方面的抗日救国力量迅速团结起来。上半年，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参与策动了反蒋抗日的两广事变，并提出"立即组成反蒋政府，发动抗日战争"的口号。10月，为响应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黄琪翔从德国回到香港，同章伯钧、彭泽民、彭泽湘、丘哲等中央负责人共同商讨对时局的意见。通过这次会议，解放行动委员会在领导层中进一步统一了认识，从思想到行动上开始了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转变。1937年6月，彭泽民代表行动委员会发表了《致全国各界领袖书》，强烈呼吁国民党当局"早定国是，予人民以共同努力之具体救亡方针"。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为了促进国内的统一和团结，在政治上以"联共"为基础，采取与国民党实行合作的形式，承认国民党政府为"抗战政府"，承认蒋介石为"抗战领袖"，通知全党积极开展一切抗日活动。1937年7月10日，行动委员会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实行民主抗战的八项主张：一、提前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全国上下一致遵守的政治纲领，俾全国各阶层力量，能迅速集中，各方政治意见能彻底融洽，以树立政府之坚实抗战基础。二、实现最低限度之民主政治，以增强人民对政府之信赖，并使人民得以自由发挥其抗战能力。三、建立特殊机关，统一各党派所领导之民众活动，俾全国宣传组织与训练，完全趋于一致。四、成立武装民众指导之机构，指挥全国义勇军之活动，使之与正式军队之动作，有适当配合，借收指臂之效果。五、于全国各地成立在乡抗日志愿军，以备征兵制未完成之调用。六、成立战时经济计划机关，计划战时必须之生产与分配，并分设于各省市以促成战时计划经济之实现。七、对广大战区中之劳苦人民、自由职业者、中小手工业者、失业公务人员等须有妥善之救济方法。八、除汉奸外，宜从速开释全国政治犯，并取消以前有碍民众运动之各项特殊条例。"解放行动委员会提出的这八项政治主张，是对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主张的公开呼应，其基本精神与中国共产党公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一致的，它说明，解放行动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在团结抗战上有着共同的政治基础。"④

随着抗日战争的展开，解放行动委员会的组织活动也迅速转入战时状

态，广大成员立即投入了抗日战争的行列。他们或成立抗战团体，出版抗日刊物；或组织抗日游击武装，直接参加对日作战，为抗战初期的反日斗争作出了巨大贡献，部分干部还因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37 年冬，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领导人及从华北、华东撤退下来的许多干部和成员，纷纷到达武汉，成立了"临时工作组"，他们组织成员深入到工人、学生中，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和发展组织的工作。

在武汉期间，解放行动委员会虽然在形式上已取得半合法地位，但实际上却仍处处受国民党的歧视与压制。而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抗日团体却非常活跃，中共的书刊和文件大量出售，影响极大，武装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头脑，从思想上把中国人民团结在中共的周围。这些都是解放委员会的领导人认识到"政治上没有什么绝对的中立，总是要偏向某一方面的。我们是代表工农平民的政党，应当偏向共产党。"⑤为了加强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由章伯钧、彭泽湘和周恩来、王明分别代表两党在武汉举行会议。回顾了过去两党之间的关系，表示今后密切合作，共同战斗。这次会议意义深远，为两党以后的进一步合作打下了政治和思想基础。

为统一全党的认识，发挥抗战时期党的作用，1938 年 3 月 1 日，行动委员会在汉口召开了第二次临时代表会议（后称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章伯钧、彭泽湘、丘哲、张云川、李士豪、何世琨等 30 余人。会议通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和《抗战时期人民自卫武装组织条例》。会议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人选，增选王一帆、陈其瑗等六人为临时执行委员，最后由 25 人组成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章伯钧被推选为总联络人。会议决定全国地方组织分为后方组织和沦陷区组织两个方面，各自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工作。1938 年 2 月 1 日，党的中央机关刊物《抗战行动》（旬刊）创办，以抗日和民主为主要宣传内容。

这次会议通过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是行动委员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重要文献，它分为内政和外交两大部分，重点在内政方面。《主张》全面阐明了中华民族临时行动委员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团结、民主、进步的立场，阐述了争取全国抗战胜利的各项政治主张：一、要实行全民的全面抗战，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起点。二、中国要求抗战胜利，必须发挥自身的优点，攻击敌人的弱点，因此要坚持长期的持久抗战。三、中国要"扬优抑弊"，实现全面的持久的抗战，必须：（一）改革政治。只有改革政治，才能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配合军事上的新战略，把握抗战



胜利的前途。（二）改革政治的内容在于切实实现民主政治。由此可革除官僚主义，增加政府的信用，得到多数人民的支持，同时也有利于政府施政方针的有效执行。（三）必须改善全国工农劳苦群众的生活。由此可增强人民的民族意识，培养持久抗战的新生力量。（四）必须增加物力，并改善财政政策，以用于解决战时经济，因此要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五）必须要改善和加强战时教育，训练青年使其成为国家柱石。（六）争取抗战胜利还必须要加强民族团结，以吸收他们共同抗战。

第二次临时代表会议及其通过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对于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争取民主，团结抗战，具有重大意义。1938 年 10 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对各抗日党派也采取了排斥、消灭异己的政策。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带动下，立刻投入到民主宪政运动中，推动国共两党之间的所有中间党派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40 年，章伯钧、丘哲等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在重庆进行谈判，表明合作诚意，并要求中共给予帮助。周恩来等表示同意。党在政治上进一步向中国共产党靠拢。1941 年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为“团结中间党派，抗拒国民党的打击，同共产党合作”，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参与组建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从此即把工作重点放在了盟内，与其他进步力量团结在一起，在组织建设和政治斗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民盟中的骨干。

1945 年初，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中国共产党提出成立一个由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联合组成的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张。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对此表示完全支持，并于 2 月创办了《中华论坛》半月刊，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的反动独裁统治。8 月 15 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民族矛盾的解决，和平建国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共中央及时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亦积极响应，发表了《抗战结束后对时局宣言》，严厉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内战的罪行，呼吁全国人民组织起来，制止内战。

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政治主张是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国内时局的变化而逐步完善的，为了抗战的大局，他们始终站在民主、团结、抗战的立场上，主张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统治，主张实现民主政治，为动员全国的各个党派、各界人士积极抗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全民族抗战得以最终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抗战期间，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

员会还进一步密切了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二者共同为国内民主力量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合作中，二者的政治主张也越来越趋向一致，这为抗战胜利后共同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内战独裁统治，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奠定了基础。1946 年 6 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央机关由重庆迁上海，地方组织也陆续恢复和整理，开始为继续开展组织活动和政治斗争做准备。

注释：

①全文见：《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参考资料》第 3 辑，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1982 年版，第 1～11 页。

②全文见：《中国民主党派历史资料选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97～204 页。

③于刚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年版，第 286～287 页。

④薛启亮主编，张磊分卷主编：《中国民主党派史丛书：中国农工民主党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97 页。

⑤转引自于刚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年版，第 292 页。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斗争实践

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中国近代社会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时反专制统治的人民民主运动不断高涨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现为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营救广大爱国志士，启发人民的民主意识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国近代社会尤其是中国近代反日斗争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民党政府理应担负起抗日救亡的重担，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侵略的斗争。但是蒋介石却顽固地执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加紧对苏区红军进行“围剿”，同时对国内日益高涨的抗日民主运动进行残酷镇压。在国统区，他们建立和加强特务组织，实行文化“围剿”，查禁书报、钳制舆论、践踏民权、强奸民意，同时还大量逮捕民主人士，滥杀无辜。所有这一切，激起了许多爱国人士的强烈愤慨。中国共产党在粉碎国民党军事和文化“围剿”的同时，多次发表抗日救亡宣言，号召全国人民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日寇的侵略。各中间派势力也纷纷要求蒋介石在内政外交上“改弦更张”，停止“剿共”，实行民主政治和全民族抗战。此外，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从国民党营垒内分化出来的部分国民党爱国将领，亦纷纷反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强烈要求政府积极抗日。

为了保障中国人民的基本权利，营救狱中的革命者，以团结各方力量共同抗日，1932年10月，宋庆龄亲赴武汉营救陈独秀时，就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资格“向中央提议组织一特种委员会，专门处理政治犯事件”，[①]但未获蒋介石批准。之后，宋庆龄即决定组织一个团体，以“专门保护及营救所有政治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她四处奔走，积极开展筹备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12月18日，经过筹备，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等人终于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委会”，并发布宣言，明确提出“同盟”的目的与任务：“（一）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法

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而奋斗。本同盟愿首先致力于大多数无名与不为社会注意之狱囚；（二）予国内政治犯以法律及其他之援助，并调查监狱状况，刊布关于国内压迫民权之事实，以唤起社会之公意；（三）协助为结社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诸民权努力之一切奋斗。”②

12 月 29 日，“同盟”在上海正式宣布成立。宋庆龄因病未能出席会议，由蔡元培代她在“同盟”成立大会上对新闻界发表了书面讲话，明确表达了“同盟”在争取自由与正义的斗争中愿与舆论界结成统一战线的真诚愿望。同时，宋庆龄还强调指出，“同盟”首先关切的是援助那些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大量无名无告的政治犯（多为非法逮捕监禁的共产党人和其他民主进步人士），从而体现了“同盟”的革命性和进步性。会议最后选举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邹韬奋、胡愈之七人组成临时执行委员会，作为同盟的最高执行机关，宋庆龄为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根据其章程，立刻设立全国委员会并在其他大城市的分会，总会设在上海。1933 年 1 月 7 日和 30 日，上海分会和北平分会也相继成立，从而基本上完成了“同盟”的创建，扩大了其在国内外的影响。

早在“同盟”成立之前，宋庆龄等人其实就已经展开了营救被囚革命者的活动，他们最早的营救活动应是营救国际友人牛兰夫妇。

1931 年 6 月 15 日，国际主义战士牛兰（时任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的秘书，也是泛太平洋职工会秘书处上海办事处的秘书）及其夫人因被怀疑有所谓的“共产党嫌疑”而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同年 8 月，租界当局将他们交与法院。此后一年，牛兰夫妇辗转于南京、苏州的军事监狱、法院监狱之中，待遇极为恶劣，期间，他俩还曾为要求改善待遇而绝食四次。宋庆龄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与杨杏佛、斯诺等中外知名人士发起组织了牛兰夫妇营救委员会，由宋庆龄担任主席，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牛兰夫妇。但是，1932 年 8 月 19 日，国民党竟不顾国内外人士的反对，悍然以“危害民国，扰乱治安”的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减为无期徒刑。12 月 29 日，“同盟”成立，宋庆龄领导“同盟”继续展开了更大规模的营救活动。国民党反动派在各方的巨大压力下，虽然口头答应释放牛兰夫妇，但却迟迟不履行诺言。为此，宋庆龄于 1933 年 12 月 30 日和 1934 年 1 月 12 日两次致电南京政府当局的汪精卫、居正、罗文干等，指出：“牛兰绝食已十日，牛兰夫人绝食亦已三日。此次请勿再以‘暂缓’、正式手续等等空言搪



塞。前此政府人员所期许之正式手续等等诺言，今日已经证明完全为谎骗之辞。”[③]宋庆龄再次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释放牛兰夫妇，并告诫其若一意孤行，“则全世界革命舆论、自由主义舆论皆将指牛兰夫妇之死为国民党所预谋杀害，皆将指此种谋杀仅与德国希特勒式之野蛮残酷差可比拟。”[④]

由于以宋庆龄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不懈努力，再加上当时国际友人的顽强斗争。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国民党当局终于不得不释放了牛兰夫妇。通过此次斗争，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政策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得到了暴露，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也遭到严重损失。

在迫害牛兰夫妇的过程中，国民党不但不引以为戒，一心抗战，反而不顾国人的反对，继续施行其反动统治，大肆逮捕和打压革命群众及爱国民主人士。因此，自“同盟”成立后，即把营救国内的“政治犯”作为其首要任务。并主要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践踏民权、屠杀革命人民的残暴罪行；二、直接参与营救大批爱国革命人士。

1933 年 1 月，宋庆龄收到来自“北平军人反省院政治犯”刘尊棋的两封英文信，一封是揭露北平军人反省院“政治犯”的黑暗生活；一封是请求被释放，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这两封信引起了宋庆龄的极大重视，1 月 31 日，受其委托，杨杏佛、胡适、成舍我在张学良外事秘书王卓然的陪同下，视察了北平各监狱。视察结束前，杨杏佛还向天津军政当局转达了宋庆龄关于举行“政治犯”大赦，释放爱国青年的要求。2 月 6 日，杨杏佛将视察北平各监狱的经过向“同盟”总会作了详细汇报，对北平监狱内生活条件的恶劣和践踏人权的情况进行了揭露。2 月 11 日，他们又将刘尊棋两封信的中文本在犹太人办的《中国论坛》第 2 卷第 1 期上刊登出来，同期还刊登了宋庆龄《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一文，强烈呼吁国民党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迫于“同盟”的舆论压力，张学良最终无条件释放了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刘尊棋等少数“政治犯”。

“枪杀刘煜生案”是 30 年代国民党政府制造的一桩文字狱，是对人民言论出版自由等基本权利的严重侵犯。刘煜生是镇江《江声日报》的经理兼编辑，只因发表了《时代不是时代》、《端午节》、《当》、《下句须知》、《我们的希望》等五篇反映农民和劳工痛苦生活的作品，就被江苏省会戒严司令部逮捕，判为宣传共产之罪，于 1933 年 1 月 21 日晨，在镇江被枪决。

为了使广大人民更深刻地认识到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实质，揭露事件的真相。1933 年 2 月 1 日下午，“同盟”在华安大厦举行了一次大型记者招待

会，宋庆龄、蔡元培、林语堂、伊罗生、陈彬龢、邹韬奋等十人及在上海的各报记者40余人出席了会议。“同盟”首先发表了中英文宣言，指出国民党的此次暴行与北洋军阀“毫无二式”，要求“全国人民应共起而作坚决之抗争”。“同盟”还要求政府严办顾祝同及有关人员，为死者昭雪，为新闻谋保障；并主张由上海报界领导全国新闻界罢工一日，以示坚决抗议，以振民气。面对全国各界汹涌的声讨浪潮，国民党反动派颇感害怕，他们把一切为刘煜生案发表的反对顾祝同的文件，一概禁止发表。但“同盟”却冲破重重阻力，千方百计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最终，蒋介石不得不解除了顾祝同的省政府主席职务，以息民愤。

除此之外，“同盟”还参加了“左联”、上海文化界、北平文化界等抗议杀害青年作家应修人的斗争活动。强烈谴责了蒋介石政府的恐怖统治，使政府当局肆意践踏民权，屠杀民主革命人士的罪行昭然于天下。

宋庆龄对国民党统治的揭露，唤醒了民众，使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们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识破了国民党所谓正统合法的骗人把戏。与此同时，“同盟”继续开展了更为广泛和直接的营救“政治犯”活动。

日本侵占东北后，一些敢说敢为的大学教授，如北京大学的许德珩，北平大学法学院的侯外庐、师范大学的马哲民等，因经常到各校讲演抗日救亡的道理，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触怒了蒋介石，竟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被秘密逮捕。

宋庆龄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与蔡元培、杨杏佛等以民权保障同盟筹委会的名义，致电蒋介石、宋子文和于学忠，要求他们释放被非法逮捕的北平爱国师生，并指出：“欲求全国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唯有即日由政府命令全国，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诸自由，严禁非法拘禁人民，检查新闻。”[⑤]同时，宋庆龄还派杨杏佛去北平与张学良进行当面交涉，积极展开营救。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北平军政当局被迫释放了许德珩，随即许德珩参加了同盟北平分会的筹备，并选为执行委员。

许德珩被释放后，“同盟”继续展开对侯外庐、马哲民等爱国师生的营救。1932年12月29日和1933年1月7日，宋庆龄与蔡元培分别致电北平公安局长鲍毓麟和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指出北平师生被拘禁一事，完全系国民党中央的一手操纵，属非法行为；斥责国民党政府披着民主自由的外衣践踏人权，要求北平公安局立即释放马哲民等师生。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最后大部分师生被陆续释放，并成为后来一·二九运动的骨干。



除了努力营救爱国师生外，“同盟”还对被捕的共产党员进行多方营救。1933年3月24日，陈赓和化名为陈藻英的谭国辅在上海公共租界被非法逮捕。同年3月2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罗登贤、秘书余文化、中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也因叛徒的出卖在法租界被捕。五位共产党人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宋庆龄立即召开“同盟”中央临时执委会，商讨营救办法。31日，租界法庭在未获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将罗登贤等五人引渡给中国政府。为此，4月1日，宋庆龄发表《告中国人民——号召大家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命者》，揭露国民党与帝国主义狼狈为奸，压迫反帝抗日战士的罪行，强烈要求释放廖承志、罗登贤、陈赓等人。在宋庆龄、柳亚子、经亨颐三人联名担保下，廖承志首先被释放，其他四人则被引渡到南京政府。3日，为了不使罗登贤等人被害，“同盟”特别成立了由宋庆龄、蔡元培等七人组成的营救政治犯委员会，并派宋庆龄、杨杏佛、沈钧儒、伊罗生四人赴南京进行营救。5日，宋庆龄在南京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再次向汪精卫提出书面要求：“（一）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二）废止滥刑；（三）给予政治犯阅报读书之自由，禁用镣铐及改良狱中待遇；（四）严惩狱吏敲剥犯人及受贿行为。”[⑥]并当面提出立即释放罗登贤、陈赓等四人。当晚，宋庆龄还亲自率领“同盟”代表团到苏州监狱探望了陈赓等人。经过宋庆龄等人的积极营救以及全国舆论的压力，蒋介石被迫释放了陈赓。但营救罗登贤的行动失败，罗被国民党秘密杀害。

除此之外，宋庆龄还领导“同盟”对著名的工人领袖邓中夏，中共左联党团书记丁玲，中共中央文委书记潘梓年等共产党人也进行了营救，而且她还亲自召见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黄平，了解其叛变真相。总之，“同盟”在存在期间，为中共党员的营救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

除了不遗余力地营救国内的“政治犯”外，“同盟”还积极成立抗日救亡团体，加入到抗日战争的行列，为抗日运动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33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热河，中国抗日救亡运动再次高涨。为了团结各界抗日力量，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联合上海30多个进步团体，主持发起了一个范围更广的抗日救亡团体——国民御侮自救会，宋庆龄被推选为会长。

3月8日，国民御侮自救会在上海青年会召开成立大会，各社会团体代表、知名人士、新闻记者等60余人出席了会议。宋庆龄在大会上发表长篇演说，强烈谴责蒋介石开门揖盗的卖国行为，号召抗日群众团结起来，共同

为反对国民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而努力。同时，宋庆龄还第一次提出了对于中国抗战的全面主张，即四项要求："（一）全国军队至少百分之八十以上，配以适当的军械与飞机，应开拔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收复满洲热河、保卫祖国；（二）人民应全部武装，组织人民自卫团；（三）人民的民权（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立即恢复，革命分子的监禁酷刑与杀戮应立即废止；（四）停止向中国苏维埃区域的进攻。"⑦这是当时中国各种救国主张中最全面、最彻底的主张，实际上也体现了共产党的主张。

由于"御侮会"成立后，始终致力于开展抗日宣传和组织募捐，接济东北义勇军，并提出武装抗日民众的激进主张，还与外国洋行签订了购买枪支合同，因此，建立之初，即遭到了国民党的嫉恨，不久被国民政府取缔。"御侮会"存在的时间虽然很短，活动也仅限于上海，但它对抗日救亡的宣传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参加国内救亡运动的同时，"同盟"还积极参与到协同世界反帝委员会派代表团重新调查日本侵略东北事实的工作中。为此，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从 1933 年 2 月开始，就积极筹备在华召开远东反战大会，并于 7 月成立了由宋庆龄、蔡元培等主持的远东反战大会筹备委员会。毛泽东和朱德还曾先后给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及宋庆龄拍来了贺电。经过精心筹备和布置，9 月 30 日，远东反战大会终于在上海秘密召开。大会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法西斯蒂的决议宣言》、《反对白色恐怖的决议》等文件。这些文件的发表深深地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救国御侮的斗争。会议最后还决定成立远东反帝反战同盟中国分会，宋庆龄被选为主席。此次会议的召开使世界人民更加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并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事业。

由于民权保障同盟坚持不懈地同国民党黑暗统治作斗争，国民党反动派极为恼恨，他们发表宣言，诬蔑同盟为"非法组织"，要求予以解散。1933 年 6 月，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宋庆龄在杨杏佛被害时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杨杏佛的无耻行径，并表示自己将再接再厉，直到达到最终的目的。杨杏佛被害后，"同盟"的活动无法进行，因此被迫于当年 7 月解散。虽然该同盟存在不足一年，但它却在中国爱国民主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启迪了人们的爱国民主意识，营救了大量被囚革命人士，团结了抗日力量，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和抗日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注释：

①《申报》，1932 年 11 月 1 日。

②陈漱渝，陶忻：《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年版，第 25～26 页。原文载于《申报》，1932 年 12 月 18 日。

③④陈漱渝，陶忻：《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年版，第 54 页，第 55 页。原文载于《中国论坛》第 3 卷第 4 期，1934 年 1 月 13 日。

⑤《申报》，1932 年 12 月 18 日。

⑥《申报》，1933 年 4 月 14 日。

⑦陈漱渝，陶忻：《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年版，第 42 页。原文载于《中国论坛》第 2 卷第 3 期，1933 年 3 月 27 日。

中华职业教育社投入抗日民主运动

民国初年，中国内忧外患，为了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振兴中华，国内一些有志之士纷纷探寻救亡的道路。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则把当时比较流行的两种救国思潮——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熔为一体，不仅在思想上开发民智，唤醒民众，而且要在经济上为民族企业培养专门的技术人才，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增加国力，并认定此为职业教育的历史使命，因而举起了“职教救国”旗帜。1914 年～1917 年，黄炎培等人还先后对国内外教育进行了两次考察，通过考察，黄炎培于 1916 年明确提出了发展职业教育的主张。

1917 年 5 月 6 日，黄炎培联合蔡元培、梁启超、张謇、宋汉章等 48 位教育界、实业界和南北政界知名人士于上海联名发表宣言，宣告中华职业教育社正式成立。宣言指明其任务，在于“推广职业教育，改良职业教育，改良普通教育为适于职业之准备”①。职教社的宗旨是，沟通教育与职业，以发展社会经济，救国救民。当时参加职教社的成员是广泛的，文教界的知识分子是职教社研究推广职业教育的核心力量。同时，也得到了民族资产阶级实业家的大力支持，特别是经济援助。“可以说，职教社是文教界和实业界相结合的产物，文教界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实业界的资产阶级企业家，是职教社存在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②

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首先致力于为发展生产力服务，因此，职教社于 1918 年创设了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以便解决如何办好职业教育的问题。这所学校采取新的教学模式和教育方针，把“知识与技术并重，理论与实践并行”作为教学原则，因而适应了社会的某些需要，取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促进了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但是好景不长，一战爆发后，民族经济受到重创，职业教育的发展也进入低谷。为了拓宽职业教育的路子，黄炎培又适时地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的理念。提出在开办职业教育的同时，要加强和职业社会的密切联系，并积极参加全社会的各项活动。据此，他们在农村办起了农村改进事业，在城市推行就业指导。从而把职业教育由学校



推向了城市和农村，扩大了工作范围。

据统计，1926 年，中华职业教育社联合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教育平民促进会和东南大学，在江苏徐公桥共试办农村改进试验区等乡村事业 30 多项，在促进农村发展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1927 年起又相继在上海、南京等地成立职业指导所，面向社会免费开展职业指导服务，努力“使求人者得人，求事者得事”，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职业教育社人士逐渐认识到，“为教育而教育，已不足以配合变幻莫测的大时代”，在此民族危机关头，应迅速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为此，1931 年 9 月 26 日，黄炎培、江问渔、杨卫玉联络上海具有爱国反帝热忱的知名人士 35 人，共同成立了“抗日救国研究会”，并于27 日以黄炎培为代表奔赴南京，会见蒋介石，要求出兵抗日。12 月 23 日，职教社又创办了政治刊物《救国通讯》（1934 年 1 月改为《国讯》），专门报道“国难要闻”、“国难大事”、抵制日货的情况以及各界著名人士的抗日主张，并不时就国民党的卖国政策发表评论，直接担负起宣传抗日、动员群众的重任。1932 年 1 月 28 日，淞沪抗战打响后，职教社又发起成立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负责组织各项后勤工作，战后，黄炎培等人还纷纷撰文谴责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7 月，日军又向我热河省及华北地区进犯，黄炎培连续三次北上天津，帮助当地人士筹组地方协会，援助东北义勇军，并再三督促国民党政府重视华北局势，尽快为抗日军队拨发战争经费。除了黄炎培为国事奔走外，在七七事变前，职教社其他人士也都积极组织募捐筹饷，慰问伤员等活动。另外，职教社还大力支持爱国学生的救亡宣传运动，江问渔在一·二九运动后就曾撰文指出：“从今以后，关于爱国救国的事，所有知识分子，尤其是有职业的知识分子，一定要和学校青年，联合起来一致行动”。[③]

为了维护民族利益，职教社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还联合上海其他一些团体在中华职业学校召开了有 2 000 多人参加的“不用日货宣誓大会”，坚决抵制日货。1932 年夏，又联合工商界开展国货运动，共同发起组织“中华国货指导所”，指导国人购买国货抵制外货。

1937 年 7 月，全面抗战爆发。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下，职教社突破了“职教救国”的范围，为抗日救亡运动献策献力，为资产阶级民主宪政运动奔走呼号。

1937 年 8 月 13 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蒋介石被迫宣布进行全面抗

战。从此至 11 月，职教社即和上海人民一致行动起来，为保卫上海而斗争。职教社做的主要工作有以下几方面：一、募捐筹饷，组织运输；二、救护伤兵，修筑工事；三、创办难民收容所，并与其他单位合办国际救济会和难民救济处，救济难民；四、迁移工厂去西南，保存有生力量。虽然几经努力，国民党军队最终还是没能阻挡住日本的进攻，11 月 11 日，上海失陷，12 月 13 日，南京也沦于敌手。此后，职教社的主要活动基地也随之转移到西南几省，上海方面则主要由姚惠泉、潘文安等人负责，他们在共产党的指引下，充当了“职业界救亡协会”中的骨干力量，与敌在租界内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主要形式有：一、通过各种方式振奋上海市民的爱国热情，坚决不向日寇妥协；二、大力发展职业补习教育，为大后方输送人才；三、支持开办“现代知识讲座”，为党培训干部；四、成立中华业余图书馆；五、发动群众支援新四军。④通过这一系列活动，职教社加强了同其他各抗日团体的联系，宣传了爱国主义，振奋了民族精神，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此后，直到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原留上海的人员才被迫撤到大后方，在上海的职业指导所和各职业补习学校则相继停办，中华职业学校改名为工商学艺所。

职教社迁西南后，逐渐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政策、主张的了解，开始与中共相关人士频繁接触，并在某些方面加强了合作。尤其当时周恩来在重庆，更是使得中共和职教社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当时，国民党正加紧推行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并于 1941 年 1 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职教社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站到了共产党这一边，帮助中共把皖南事变的消息迅速公布出去，并致电蒋介石，谴责其反共行为，主张停止内战，继续抗日。

通过和中国共产党的密切交往，职教社对自身的发展也开始有了新的认识。1939 年 3 月，职教社在昆明召开了工作会议，通过此次会议，职教社认识到在开展职业教育的同时，要用更多的精力参加政治斗争。因此，面对当前中国政治的混乱现状，首先就要力倡民主宪政。

1939 年 9 月 9 日，国民参政会第四届大会召开。共产党再次提出《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第三党、青年党、国社党、救国会及其他一些抗日民主党派和团体也纷纷提出提案，要求改革政治、发扬民力、结束党治、立施宪政。江问渔则代表职教社提出了《为决定立国大计解除根本纠纷谨提具五项意见建议政府请求采纳施行》案，其用语虽不似前几案那样激烈，但同样提出了实行宪政的要求。9 月 15 日，大会开始审

查共产党、中间党派和国民党提出的七个宪政提案，由黄炎培任审查会主席。黄炎培坚定地站在了进步力量一边，联合其他党派人士，最终迫使国民党作出了较大让步。参政会最后通过的修正案虽然仍未写入“结束党治”和“给予各抗日党派以法律保障”的字样，但毕竟迫使国民党在原则上承认了“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承认了“全国人民，除汉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承认了“政府行政机构应加充实并改进”，因此中共中央认为这个决议“不失为进步的决议”。

9 月 18 日，按照会议的要求，蒋介石以国民参政会议长名义提出 25 人为宪政期成会委员，由黄炎培等为召集人。20 日，黄炎培主持召开了宪政期成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请政府宣布召集国民大会的时间最好在 10 月 10 日以前，公布宪法期间以速为宜，至迟不超过参政员现任期满九个月”。[⑤]与此同时，各中间党派领导人还与董必武等共产党人一起，成立宪政促进会，在重庆、成都、桂林等地召集群众大会，为实行宪政大造声势。至 1939 年 11 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最终作出决定：1940 年 11 月 12 日召开国民大会，这使宪政运动见到了一线曙光。为此，黄炎培等民主人士兴奋地频繁集会，在宪政期成会内外反复磋商，为即将到来的宪政时期奔走呼号。

1939 年 11 月间，为了加强各中间党派之间的联合，黄炎培、梁漱溟、晏阳初、李璜等还联络第三党的章伯钧，国社党的罗文干、罗隆基，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于 11 月 23 日正式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并拟定了《简章》和《信约》，要求各民主力量一起反对一切内战；主张各党派一律平等；要求国民党政府尽快颁布宪法，成立宪政政府。但是，国民党的许诺只不过是表面的应付，是明显的“宪政的两面派”，随着宪政运动的高涨，其本来面目终究会暴露出来。1940 年 9 月，国民党中央自食其言，宣布延期召开国大，同时，还加紧了对民主人士的压迫。人们所一直向往的民主宪政从此化为泡影。

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的爆发促使了各民主党派政治上的进一步觉醒，为此，他们加快了联合的进程。经过长时间的筹备，1941 年 3 月 19 日，由三党三派组成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职教社负责人黄炎培被推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不久辞去主席职，由张澜接任）。职教社以政团资格加入民盟，正式开始了同各民主党派力量的联合，并最终完成了由一个单纯的教育团体向政、教两重性团体的过渡。

民盟成立后，职教社积极开展工作，1944 年 1 月，创办《宪政》月刊，

为民主宪政运动推波助澜，“在当时的国统区，《宪政》月刊已成为各民主党派鼓吹宪政、争取宪政的有力工具，宪政月刊社也成为民主人士们的一个主要活动基地。”[⑥]为了调解国共关系，制止国民党企图用召开所谓国民大会的空言来抵制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阴谋，黄炎培等人于1945年7月1日，飞往延安，进行访问和考察，并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多次进行诚挚友好的会谈，双方就两个问题达成了一致的协议：“一、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双方规定政治会议的主要点在于制定‘民主改革的紧急措施’和‘结束一党专政及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⑦]这一协议，表明了职教社和共产党就抵制国民党关于召开国民大会的问题采取了联合的行动。从延安归来后，黄炎培根据延安会谈协议，联合江恒源、冷遹发表了《关于不参加国民大会问题讨论的书面声明》，这对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大”是一个较强硬的抵制。

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到1945年抗战结束，职教社的主要活动是放在政治方面，但同时他们也加强了自身工作的发展。1937年以后，他们把原有的职业教育实践经验推向了西南内陆，在西南建立了多所职业学校，同时还创办了两所具有大专性质的职业学校：银行专科学校和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并在大专教育和职业教育挂钩的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在职业补习教育方面，在上海办事处增设了第3、第5、第6、第7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在西南则设有桂林、重庆、昆明、贵阳中华职业补习学校。此外，职教社还将职业指导工作迅速推广到内陆各地，在桂林、重庆、昆明、贵阳成立了职业指导所及战时人才调剂处，主要帮助青年谋取职业和提供学习机会。职教社在抗战期间从事的这些工作虽然不是直接同日本侵略者打交道，但他却激发了国人的爱国热情，为国家培养和储备了大量人才，从而也是职教社救亡运动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职教社在抗战期间，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和平民主运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反对独裁，坚持抗战，抵制日货，救济难民，并发起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和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1945年12月16日，为了适应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职教社和迁川工厂联合会在重庆共同成立了民主建国会。黄炎培、杨卫玉、孙起孟、冷遹等人被选为理事或监事。他们主张和平统一，政治民主，继续为中国的解放事业而努力。



注释：

①中华职业教育社编：《社史资料选辑》（3），中华职业教育社，1982年版，第6页。

②曲广华：《中华职业教育社延续发展探因》，载于《北方论丛》，1996年第1期，第23页。

③④⑤⑥黄嘉树：《中华职业教育社史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0页，第152~157页，第204页，第207页。

⑦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科研组编：《国民参政会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0页。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抗日主张

1934 年 1 月底，福建事变失败，参加福建事变的主要领导人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黄琪翔等纷纷于 2 月下旬避居香港。到港后他们继续开展抗日反蒋的斗争，并积极筹备组建一个新党，但由于福建事变的原参与者内部在组党问题上存在分歧，因此组党问题被搁浅。为此，多数人选择了出国考察游历，只有李济深、陈铭枢等人还选择继续留在香港，在开展抗日反蒋斗争的同时，继续为组建新党而努力。这一举动得到了中共的大力支持，在中共积极斡旋和调解下，自 1934 年下半年起，组党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

1935 年 1 月，日本悍然发动了华北事变，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形成进程也随之加快。是年春，蔡廷锴赴欧美考察归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经常与之聚会，商讨中国目前的形势，寻找解决的办法。他们认为："目前中国应走之路，唯有'抗日'之一条出路"，要"集中全国人才力量，一致奋起团结作民族斗争"。他们还认为，目前时期组党的条件已经成熟。不久，李济深即召集干部会议，决定组织民族革命大同盟。这一时期，中共还专门派潘汉年、宣侠父、胡兰畦等到香港，负责支持和推动李济深、陈铭枢等的建党活动。

经过充分的酝酿和筹备，1935 年 7 月 25 日，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以下简称"同盟"）成立大会终于在香港举行。大会讨论了华北事变后的国内形势及"同盟"的基本政治主张和斗争任务。通过了由彭泽湘、胡秋原等人共同拟定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并推举出由李济深任主席，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徐谦、冯玉祥、方振武、陈友仁、李章达、梅龚彬、陈希周、翁照垣等任委员的中央委员会，作为"同盟"的主要领导机构。其下设机构有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民运部、总务部、海外部等。"同盟"还决定将总部设于香港，并决定出版《大众日报》，以作为宣传阵地。



"同盟"的成立引起世界舆论的广泛注意，当时的美联社和路透社就曾对此作了相关报道。中共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也以《抗日统一战线中添一劲军十九路军等组织民族革命同盟》为题，称赞"同盟"继续完成其未竟事业的可敬行为。

"同盟"成立大会上通过的《成立宣言》、《政治纲领》和1936年1月4日发表的《时局宣言》等重要文件，对"同盟"的政治主张，作了系统的阐述。归结为一点即"抗日反蒋"。

在《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中，"同盟"提出中华民族的革命战争"必须从抗日反蒋开始"。"同盟"的基本政治主张则为"一、争取民族独立；二、树立人民政权"。[①]"同盟"还提出要完成抗日反蒋的任务，目前的行动纲领有八条："一、集中一切力量进行民族革命；二、策动全国海陆空军武装全国民众对日作战收复失地；三、推翻南京汉奸政权召集人民代表大会解决国是；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没收一切汉奸财产；五、联合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一切民族及被压迫阶级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六、凡同情及援助中国抗日战争及严守中立的国家视之为友，凡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破坏中国抗日战争者视之为敌；七、铲除贪污土劣废除苛捐杂税；八、争取人民的身体居住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之绝对自由。"[②]

1936年1月4日，鉴于一二·九运动后蓬勃发展的全国抗日救亡高潮，李济深等再次发表《对时局宣言》。指出"抗日如不打倒蒋介石，决不能收抗日的实效"，"倒蒋而不抗日，也决不能实现倒蒋"，主张"发动全国民众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南京政府作坚决不挠的斗争"。[③]通过此次宣言，"同盟"再次竖起抗日反蒋的大旗。

为了实现抗日救国的目标，"同盟"还主张建立反日联合战线，实行武装抗日；召开救国会议，成立国防政府。

1936年7月25日，为了纪念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成立一周年，同时也为了积极响应中共中央于《八一宣言》中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陈铭枢在《救国时报》上发表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成立一周年》一文。指出在此民族危机下，中国人民应自动团结，自动武装。各党派分子，要以民族利益为前提，捐除一切成见站在民众的最前线。文章历数了过去一年中，在中共《八一宣言》影响下，民族战线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指出过去的一年"是'联合战线，武装抗日'的光明的口号由提出，而浸透到全国人民的心中的一年"。[④]因此，从陈铭枢的文章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华民族

革命同盟是主张联共的，是极力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为了实现“树立民主国家”的目标，“同盟”同时还主张必须召开有各党派参加的救国会议，成立国防政府，开放民主，建设民主政治。为此，“同盟”在《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成立一周年》一文中，提出修改后的“目前行动纲领”：一、召集人民救国会议，讨论救国方案；二、组织抗日国防政府，成立全国抗日联军；三、随时随地武装民众，发动自发的全国抗战；四、释放救国政治犯，争取救国的一切自由；五、恢复十九路军，扩大民族反日战线；六、厉行保护国产，彻底肃清仇货案；七、实行抗日教育，发扬民族精神。⑤

基于以上的政治主张和奋斗目标，“同盟”自成立之日起，即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反蒋斗争。在广州，“同盟”派梅龚彬等到中山大学等学校工作，吸收了部分知识青年加入“同盟”，同时还使得广州的学生运动搞得轰轰烈烈。1935 年 11 月，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将在本月召开，会前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人给即将出席大会的邹鲁、冯玉祥、阎锡山等发出电文，要求南京政府将不抵抗政策改为积极抵抗政策；为失地一事向国民请罪；放弃一党专政；释放一切政治犯，实行民主自由；召集全国国民大会，共同解决民族危机。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同盟”又及时发表《告同胞书》，声援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主张立即组建抗日救国军和国防政府；恢复十九路军，扩大革命联合战线。

1936 年 5 月 31 日，为了响应新一轮的抗日救亡热潮，扩大救亡力量，由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人发起组织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宣告成立，“同盟”成员李章达、方少逸等参加了此次成立大会，李章达还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此前后，“同盟”的许多领导人和盟员都曾积极参加了华南地区的救国运动，在华南各地发起成立了救国会组织，并在香港建立了救国会华南区总部，简称“南总”。李章达为主要负责人，李章达、何思敬、陈希周、梅龚彬等人为理事会理事。“南总”成立后为广东和香港两地的救国运动做了许多工作，在其领导下，广东省建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筹备会，广东东莞等许多县市则成立了许多救国会的组织。至此，整个华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同盟”的参与和指导下蓬勃发展起来。

1936 年 6 月 1 日，两广地方当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因和蒋介石发生了利害冲突，公开举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号，要求蒋介石尽快抗战，同时还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并在广东、广西分别建立了



"集团军"，向湖南出兵。这就是著名的"两广事变"。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迅速地解决了广东陈济棠的势力，然后又调集大军，准备用武力解决广西问题。这时，应李宗仁、白崇禧的邀请，"同盟"的主要成员李济深、蔡廷锴等纷纷来到南宁，共同商讨对付蒋介石的办法。在此期间，蒋介石曾多次派人到南宁去劝说李济深等放弃抗日反蒋的活动，遭到坚决反对。8 月 22 日，南宁各界召开大会，欢迎李济深、蔡廷锴及各地赴南宁的抗日救国团体的代表。李济深在大会上就抗日反蒋等问题发表演说，坚决主张广西方面应立即联合全国各抗日反蒋的力量，建立抗日政府，公开抗日反蒋。与此同时，蔡廷锴还在李宗仁、白崇禧的支持下，集中十九路军的军事干部，在玉林设立了十九路军指挥部，并在广西迅速组建了两个师，分别由翁照垣、区寿年任师长。十九路军重建后立即投入到抗战中，9 月 3 日，广西北海人民在翁照垣师的鼓动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

"两广事变"最终在双方的互相妥协下走向失败，蒋介石答应了李、白提出的"确定抗日计划"等条件，并于 9 月中旬同李宗仁在广州举行了会晤，广西问题和平解决。蒋桂妥协后，李济深、蔡廷锴等又离开了南宁。

1936 年 12 月 12 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在这场事变中，坚持了正确的立场，从而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当"同盟"的主要领导人李济深等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时，他们毅然地放弃了以前的成见，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当时的南京却作出了飞机轰炸西安，以示讨伐的决定。李济深在得知消息后，立即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指出"为了保护蒋总裁的安全，决不可轰炸西安"，同时又致电张学良，要其一定要保护好蒋的安全，以达到一致抗战。接着他又写了四封信，并派专人送往上海。其中两封是写给宋庆龄和何香凝的，希望她们必要时亲自到西安一行，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以免引起内战；另外两封则是写给国民党高级人物、蒋介石的亲信张群和吴稚晖的，信中力陈保卫蒋介石安全的重要性，要他们尽量设法制止南京轰炸西安，以免引起内战。宋庆龄、何香凝、张群、吴稚晖在接到李济深的亲笔信后，都很重视。此后一段时间，他们都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自己的努力。除了李济深的多方努力外，"同盟"的另一位领导人陈铭枢也为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在得知消息后曾致电在香港的蔡廷锴、蒋光鼐，要求"同盟"立即通电"表示我们的共同主张，并呼吁和平解决争端。"[⑥]此外，"同盟"还在《救国时报》上发表公开宣言，表明"同盟"的主张，即"停止内战，一致对

外"，支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中国共产党及各方人士的共同努力下，西安事变最终获得了和平解决，从而促使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实现。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在抗日的过程中还与中共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同盟"成立之初，李济深、陈铭枢等就和中国共产党有密切的联系，他们还曾得到过中共代表潘汉年、朱瑞、宣侠父等人的各种帮助。1936 年春，"同盟"领导人陈铭枢专程访问莫斯科，与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进行会谈，商谈"同盟"与中共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工作中的合作事宜。"两广事变"发生后，陈铭枢回国。路过巴黎时，在旅居巴黎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安排下，陈铭枢曾应邀在巴黎华侨召开的抗日救国群众大会上发表了演说，激起了旅法同胞和华侨的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热情；陈还应邀去瑞士、荷兰参加国际反法西斯和反战大会，并发表了演说，对推动欧洲掀起反法西斯和反战浪潮起了积极的作用。

1936 年 9 月中旬，李济深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拥护"，诚意希望同中共"合作进行抗日救国运动"。9 月 22 日，毛泽东也分别给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等去信，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于本年 8 月提出的关于国共合作的最新主张，同时送交中共方面起草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八条，主要内容是：国共双方停止敌对行动，互相合作，唤起民众，实行对日武装抗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等。建议与广西当局及十九路军签订此《抗日救国协定》。"同盟"收到信后对此作出了积极回应。"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又向"同盟"传达了中共要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十点意见，李济深、蔡廷锴听后立即给毛泽东、周恩来等去信，表示对蒋介石专制独裁的不满，要求迅速召开全国政治会议，并随时准备同中共开展合作。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1937 年 9 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由香港到南京，经过磋商，认为要求一致抗日，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目的已经达到，决定解散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遂于 10 月 30 日发表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解散宣言》，要求海内外"同盟"组织一律解散，所有力量自当贡献政府，效力抗战。"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存在虽然只有两年时间，但此时正值中国历史由十年内战到全面抗战的转变关头，它的反蒋抗日的宗旨及向联蒋抗日方针的转变，以及为抗日救亡所作的宣传和种种努力，对于全民族的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国民党民



主派的历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⑦

注释：

①③《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成立宣言》，《救国时报》，巴黎，1936 年 1 月 4 日。

②转引自，徐文生编著：《中国民主党派革命斗争史》，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 88 页；原文载《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成立宣言》，《救国时报》，巴黎，1936 年 1 月 4 日。

④⑤陈铭枢：《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成立一周年》，《救国时报》，巴黎，1936 年 7 月 25 日。

⑥《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年版，第 130 页。

⑦郭文明，路笃盛主编：《中国民主党派概论》，华文出版社，2002 年版，第 33 页。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政策

1935 年初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一系列旨在变华北为第二个满洲国的侵略事件，我们称其为“华北事变”。为此，中国共产党于 8 月 1 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以挽救民族于危亡。“华北事变”的发生和中共《八一宣言》的发出加速了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1935 年 12 月 9 日，北平数千名大中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抗日救国的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很快得到了全国学生的回应和全国人民的支持，12 月 12 日，沈钧儒、马相伯、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等 280 余人联名在《大众生活》上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坚持领土主权完整，否认一切有损领土主权的条约和协定，坚决反对在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的特殊行政组织等八项主张。宣言还号召全国民众立即自动组织起来，开展救国运动。

在一二·九运动和全国各界人士救国运动的影响和号召下，上海各界民众的救国运动也迅速发展起来。1935 年 12 月 21 日，上海市中华妇女同盟会、妇女生活社、妇女大众社、妇女园地社、妇女文化协会等百余妇女团体联合成立妇女救国会，选举史良、王孝英、罗琼等 11 人为理事，并发表了宣言，要求全国妇女立刻自动地组织起来，以贯彻实现我们的救国主张。12 月 27 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也召开成立大会，教育、新闻、出版、电影、戏剧、法律各界知名人士 300 多人出席会议，沈钧儒主持了大会并致开幕词，选出了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沈兹九、江问渔、邹韬奋、周建人、李公朴等 35 人为执行委员。并发表宣言《民族解放运动的呼声》，提出了开放民众组织，保护爱国运动，迅速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一切内



战，武装全国民众，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绝对自由等八项救国主张。此后，1936 年 1 月，周新民、潘大逵等 60 余人又成立了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表示将义不容辞地站在青年学生面前，共负救亡责任。同时，复旦大学等一些大中学校也成立了学生救国会。

为了团结各救亡团体的力量共同抗战，1936 年 1 月 28 日，由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妇女界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学生救国会等组织共同召开了会议，决定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并选举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史良等 30 人为理事。会议还决定扩大组织，筹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会后，沙千里领导的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和陶行知领导的上海国难教育社也分别于 2 月 9 日和 23 日成立，并相继加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

1936 年春夏，日本进一步扩大了对华北的侵略，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为了更有效地联合全国抗战力量进行抗战，这就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救国组织。3 月间，全国学生救国联合筹备会在上海召开，提出要把促进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作为它的任务之一，并派出一些人前往华北、华中、华南各地联络，邀请各地派代表出席全国学联和全救会成立大会。5 月 29 日，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并通过重要提案和宣言，呼吁全国青年联合起来组成联合阵线，共同对日作战。这实际为下一步全国救国联合会的成立作了重要准备。

1936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1 日，在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人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各界救国联名会（简称“救国会”）成立大会终于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全国 18 个省市 60 多个救亡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章程》等重要文件。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 40 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孙晓村、曹孟君、何伟等 14 人为常务委员，沈钧儒为主要负责人。

《成立宣言》、《初步政治纲领》及《章程》等文件对救国会的政治主张作了明确规定。文件首先指出，日本大陆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灭亡全中国，“我们唯一救亡图存的要道，在立刻全国团结一致以全力抗敌”，任何党派和政治团体“想用武力征服敌党敌派，用权威排除异己，用权术巩固政权，那结果反只有使人心离散，而自陷于覆亡”。[①]文件规定：救国会的宗旨是“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案，保障领土完整，图谋民族解放”。[②]其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党各派团结合作，共同抗日；要

求各党各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制定共同纲领，建立统一的抗敌政权。文件还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统治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国民党中央最近颁布的宪法草案及国民大会组织法仍没有放弃一党专政，要求国民党尽早放弃一党专政，在全国实行民主制度，并给予民众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另外还督促国民党早日促成统一的抗敌政权的实现。基于以上的主张，救国会建议：一、各党各派立刻停止军事冲突；二、各党各派立刻释放政治犯；三、各党各派立刻派遣正式代表，人民救国阵线愿为介绍，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抗敌政权；四、人民救国阵线愿以全部力量，保证各党各派对于共同抗敌纲领的忠实执行；五、人民救国阵线愿以全部力量，制裁任何党派违背共同抗敌纲领，以及种种一切足以削弱抗敌力量的行动。③除了以上的抗日救国主张外，全救会还主张联络欧美，联合苏联和弱小民族，联合全世界反日、反战的人民势力，共同抗战；主张实行抗日的经济政策和文化、教育、社会政策。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及其抗日救国政治主张的大力宣传，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各地纷纷成立救国会的分支组织并且发展迅速，遍及全国各大、中、小城市。据统计：到 1936 年底救国会会员已发展到数十万人。④他们多数来自全国各个行业、各个阶层和各个党派，为了抗日救国的同一目标而加入到联合阵线，为民族解放作坚强不屈的斗争。

救国会组织成立及扩大后，根据自己的政治宗旨，结合当时时局演变中的重大政治事件，立刻投入到各种抗日救国的活动中。

1936 年 7 月 10 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开幕。13 日，救国会请愿代表团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彭文应五人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五届二中全会会场，向大会提出了四条建议：一、要求大会准许代表团在大会发言五分钟；二、要求大会议决立即对日作战；三、要求大会议决开放民众救国运动，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并释放政治犯；四、停止内战。但是大会却以人民代表不能出席中央委员会为由，拒绝了让代表团在大会发言。同日，蒋介石又在“中央纪念周”上讲话，继续鼓吹其“安内攘外”的对日妥协政策。7 月 15 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重申了救国会主张各党各派合作抗日的坚定立场，抨击了国民党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错误政策，要求国民党从大局出发，消除过去之成见，联合各党各派，特别是联合共产党，共纾国难。该文对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主张，明确表示“我们赞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这一政策，而且相信这一政策会引起今后中国政治上重大的影响”。[5]救国会的这篇文章立刻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响应和支持，9月18日，毛泽东致信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代表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他们抗日救国言论和英勇的行动，致以无限的敬意。并提出要和救国会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中共中央还派潘汉年与他们就中共所执行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与实际行动等交换意见。

1936年9月18日，救国会召开第二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决议要求严密组织，扩大救国阵线，加紧争取张学良、冯玉祥等上层人物的工作。会后发表了《全救会为团结御侮告全国同胞书》，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新阴谋，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停止外交谈判，团结全国力量，共同抗日。随即，南京和上海的救国会组织，分别就《为中日问题敬告同胞》和《为中日外交已到最后关头宣言》，发起签名请愿运动。10月19日，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逝世，在救国会的主持下，上海举行了三天群众性悼念活动。10月22日，上海学生、工人、店员、作家、教授等各界人士六七千人，为这位伟大的中国文化巨人、民族解放战士送葬，大家唱着悲壮的挽歌和《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救亡歌曲，悲愤地呼喊着“鲁迅先生精神不死！”、“纪念鲁迅先生，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宋庆龄、蔡元培和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胡愈之、王造时、史良、李公朴等都参加了送葬仪式，并在鲁迅墓前发表了简短演说，号召人们继续发扬鲁迅精神，打倒帝国主义，完成民族革命。在救国会的发动和组织下，这次送葬仪式变成了1936年下半年上海各界人民一次大规模的救亡示威游行。

1936年11月，绥远抗战爆发，驻绥远的傅作义将军率部奋起抵抗。为了支援他们的抗战行动，11月上旬，南京救国会在孙晓村、曹孟君等人领导下，与王昆仑、许宝驹等密切配合，冯玉祥也大力支持，积极推动国民党政府中的上层人士如张继、孙科、居正、覃振等发起援绥抗日运动。不久即在南京召开了由各界人士参加的援绥大会，国民党元老张继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国民党左派如经亨颐、柳亚子和不少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等也都出席了会议，会议最后决定成立“首都各界援绥后援会”，以支援抗战。此次大会冲破了国民党不准抗日救国的禁令，使南京的救国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11月16日，救国会针对绥远问题再次发表宣言，并致电国民党政府及傅作

义、张学良。宣言表示“华北中日经济协定，已经把所有的国家命脉，断送净尽”，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内争，动员全国武装力量奋起抗战。本月上旬，救国会还在上海开展了支援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的运动，并迅速成立日商纱厂罢工后援会，发动募捐，还印发了《请全国同胞援助日商纱厂罢工工人》呼吁书，动员各界人民支援罢工，最后工人罢工取得了胜利。

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爆发，为了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同时也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着想，救国会于 12 月 15 日发表《为当前时局紧急宣言》，希望全国各实力派、各军政领袖在抗敌救亡的大前提下，立即捐弃前嫌，和衷共济，为全国抗敌而努力，为收复失地而奋斗。希望张学良、杨虎城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同时坚决反对国民党中央用讨伐的方式来解决目前的纠纷。要求停止一切现存的内战，反对一切可能的新内战。这些宣言和主张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一定的舆论作用。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救会又发表了《为保卫北方紧急宣言》，呼吁全国同胞全力保卫北方，支援二十九军抗战健儿；要求实施抗战国策，以保证最后的胜利；给人民以抗日活动的自由；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打击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自此以后，救国会就一直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和国家的宪政民主运动而不懈斗争。

注释：

①李勇，张仲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事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01 页。

②《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章程》；周天度：《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 106 页。

③黄修荣：《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年版，第 109 页。

④⑤蒋景源：《中国民主党派爱国奋斗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2 年版，第 62 页，第 64 页。



"七君子"事件的前前后后

救国会成立后一直致力于大力宣传抗日救亡的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建立联合战线，一致对外。1936 年 7 月 15 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又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公开呼应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剿共，和红军议和，共同抗日。11 月 12 日，正值孙中山先生诞辰，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提出"反对中日合作防共，要求立即停止剿共"的主张。同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又在上海静安寺路基督教女青年会举行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的大会，大会由沈钧儒主持，大家纷纷发言，高度赞扬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特别是他实行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李公朴指出，"中山先生主张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尤其主张联俄容共"，用加紧民族解放斗争的行动，来纪念孙中山先生。章乃器在讲演中说："现在的中国有两种人，一种是表面人，开口先总理，闭口先总理，而其实际行为表现的事实上无一不叛弃了中山先生的遗教"，"中山先生主张容共，我们为了当前民族危机的严重，我们更主张联合国内各党各派，以及一切社会阶层分子。"①此外，救国会的其他领导人王造时、史良、沈钧儒、沙千里等也在会上相继发了言。这次大会，实际上是一次宣传抗日救国、批评国民党反动派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大会。

救国会多次同情中共的举动终于惹恼了当时急于消灭中共的国民党，也得罪了上海的日军。11 月 18 日，日本驻沪总领事若杉命令领事向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发出警告，要求立即"逮捕抗日救国会的幕后人物章乃器、沈钧儒、李公朴以及其他五人"。于是，为了杀一儆百，迅速瓦解救国会，同时也为了迎合日本，1936 年 11 月 23 日凌晨 2 时，上海警方根据国民政府的命令，会同租界巡捕房，以"莫须有"的罪名非法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与史良七人，随后移解苏州，押于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史良被单独押在司前街女监狱）。这就

是当时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七君子”事件发生后，立刻引起了救国会及其他各界人士的强烈愤慨，他们纷纷谴责国民党的恶劣行为，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

11 月 24 日和 27 日，救国会分别发表《紧急宣言》和《告当局及全国国人书》，强烈谴责国民党当局非法逮捕“七君子”的行为，驳斥了其对救国会所谓是“非法组织”、“勾结赤匪”、“推翻国民政府”、“扰乱治安”等谰言，要求立即释放被捕诸领袖，保护救国运动，进行抗战。同时还表示“我们将更坚决地秉承领袖们过去的言论、主张，而永远继续奋斗下去”。宋庆龄也于 26 日向新闻界发表《为沈钧儒等人被捕声明》，说明救国会的主要任务是要促进全国人民不分政治信仰党籍的区别，以成立联合战线从事民众解放战争。指出七位救国会领袖虽然被非法逮捕了，“可是我们中国还有四万万人民，他们的爱国义愤是压迫不了的”。[②]

除了救国会的舆论谴责外，11 月 24 日，北平文化教育界李达、许寿裳、许德珩、齐燕铭等 107 人联名致电国民党政府，说沈钧儒等“热心爱国，全国敬仰”，应该“即日完全开释，勿再拘传”。26 日，北平大学生联合救国会作出决议，要求释放被捕的救国会领袖，开放民众救国运动，并停课两天，以抗议国民党政府的暴行。月底，中国共产党的《红色中华》报和巴黎《救国时报》也发表《争取救国自由》等社论，声援“七君子”，谴责国民党对爱国人士施加的暴政。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蔡元培、冯玉祥、于右任等也都参与了营救运动，尤其是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对蒋介石摧残救国运动的行径，表示强烈不满。12 月初，张学良亲自飞往洛阳，请蒋介石改变内战政策，释放爱国将领，却遭到蒋介石的蛮横拒绝，张学良当面质问蒋：“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七君子”事件在海外华侨和国际人士间也引起了强烈反响。旅居海外的华侨，以及国际知名人士罗曼・罗兰、爱因斯坦、杜威、罗素、孟禄等，都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恢复“七君子”的自由。

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被迫答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释放“七君子”及一切政治犯。12 月 16 日，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借此时机，发表了《为七领袖被捕事件宣言》，再次要求国民党立即释放救国会领袖。不料，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竟背弃了诺言，拒绝释放“七君子”，同时派杜月笙和钱新之对“七君子”进行诱降，遭到了“七君子”的严词拒绝。



诱降不成，蒋介石干脆撕破脸皮，竟下令对“七君子”提起公诉。1937年4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以“危害民国罪”，对“七君子”下达了起诉书，内中罗织了“十大罪状”，称他们共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6条之罪。这立刻引起了国内各界人士的强烈愤慨，宋庆龄以救国会的名义发表《告全国人民和全体会员书》，对所谓的“十大罪状”进行了一一批驳。4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共中央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指出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诸先生，为救国运动之民众爱戴领袖；要求立即释放沈、章诸先生及全体爱国政治犯，彻底修改《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6月7日，为了系统地驳斥《起诉书》强加在“七君子”身上的所谓“罪状”，“七君子”在张志让为首的辩护律师团的帮助下，发表了两万余字的长篇《答辩状》，用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据，再次驳斥了起诉书罗列的罪状，坚持了救国无罪的正义立场。除此之外，全国的其他各界救国会组织、各地民众团体和海外侨胞也都纷纷致电南京政府，表示抗议。

国民党见“七君子”已根本不可能作低头屈服，全国民众的谴责之声又一浪高过一浪，遂于6月11日和25日，在江苏高等法院对“七君子”进行了两次开庭审问。“七君子”每人都聘请了律师，组成了以著名大律师张志让为首的辩护律师团，出庭辩护。11日下午，高等法院正式开庭，“七君子”在被审问中大义凛然，同检察官进行了唇枪舌剑的激烈辩论，弄得审判官张口结舌，无以应对，一副尴尬相。6月22日，“七君子”再次向法院提交了《政治意见书——第二次答辩状》，用铁一般的事实进一步驳斥了《起诉书》的种种诬陷不实之词。“七君子”在狱中团结得如同一人，他们“义正词严，据理痛斥种种莫须有之罪名，弄得国民党当局欲判不能，欲释不甘，进退失据，狼狈不堪。”[3]

除了“七君子”的针锋相对斗争外，全国人民也对“七君子”的案件给予了高度关注，并不断给国民党施压，要求迅速恢复“七君子”的自由。6月13日，救国会动员上海各界群众5 000余人举行抗议大会，要求无罪释放七位领袖，取消《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派代表赴苏州监审，沿途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纷纷请求他们向苏州法庭转达释放“七君子”的要求。成都、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及救国会华南区总部也都纷纷发表宣言和代电，要求立释“七君子”，切实取消爱国治罪的政策。此外全国学生也加入到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中，有的举行示

威游行，有的则举行签名活动，要求爱国自由，并主张七领袖无罪。全国舆论界亦对国民党审讯“七君子”并拟定罪判刑，表示强烈不满，纷纷发表评论，宣扬爱国无罪。

国内民众的大力支持和新闻媒体的强大舆论压力，使国民党当局不但在法庭上输了理，在法庭外也陷于被动，他们审判拿不出罪证，定罪找不到根据，处于异常尴尬的境地。但是国民党当局不甘心认输，仍然无理地坚持要给“七君子”定罪判刑，并定于6月25日对“七君子”进行第二次审判。

面对强大的阻力，宋庆龄意识到必须寻找新的营救途径，恰在此时，冯玉祥派他的女儿冯弗伐持其亲笔信送到何香凝处，再转给宋庆龄，内容是建议宋庆龄“以国母的身份，也要求与七君子一同坐牢”。看到此信后，宋庆龄等人立表赞同，立即发起历史上有名的“救国入狱运动”。1937年6月25日，在第二次开庭审理的当天，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潘大逵等16人联名呈文高等法院，表示：“爱国如竟有罪，则具状人等，皆在应与沈钧儒等同受制裁之列。具状人等，不忍独听沈钧儒等领罪，而愿与沈钧儒等同负因奔走救国而发生之责任”，“爱国无罪，则与沈钧儒等同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具状人等愿以身试法律上之救国责任”。[④]26日，宋庆龄等人又发表了《为救国入狱运动向上海新闻界的书面谈话》，说明他们发起这个运动的动机和今后的态度和希望，同时在书面谈话中介绍了《救国入狱运动规约》。同日，又发表了《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庄严地向社会声明：“我们准备好去进监狱了！我们自愿为救国而入狱，我们相信这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我们的责任！”[⑤]宣言号召中国人民为救国而勇敢入狱。

7月5日，宋庆龄、胡愈之、彭文应、潘大逵、陈波儿、沈兹九、张天翼、胡子婴等12人，分别乘车到苏州，要求法院羁押审讯。其他各界人士也纷纷具状要求入狱，上海戏剧界以及各大学教授、学生和工商界的职工，都纷纷呈状江苏高等法院，请求与“七君子”并案处理。“救国入狱运动”还得到了社会舆论的积极支持，7月20日，《救国时报》发表文章指出：“要争取爱国自由；要争取七领袖被释，从各方面更广泛地开展营救和抗议运动，实在是最有效的办法。”

由于救国会及各界人士的奋力营救，再加上当时抗日高潮的巨大压力，国民党当局最终未能对“七君子”强行定罪。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对此案件已难以继续审理，不得不在7月31日将“七君子”释放出狱，“七君子”事件最终胜利解决。8月1日他们由苏州回到上海。“七君子”



事件最终获得胜利，集中体现了广大爱国志士在民族危机下的团结一致，暴露了国民党的妥协投降政策，为督促国民党尽快抗战及后来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此外，救国会及全国各界人士营救“七君子”的活动还得到了海外华侨及国际舆论的巨大支持，为他们今后更大范围地支持中国抗战奠定了基础。

“七君子”出狱后，立刻投入到神圣的抗日战争中。8月19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抗战》三日刊（第7期起改名《抵抗》），12月11日在武汉创办了由李公朴、柳湜主编的《全民周刊》，1938年7月7日两刊合并称《全民抗战》，由邹、柳主编。1938年，沈钧儒、邹韬奋、史良、陶家瑶被国民政府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参政会内外，他们同中共及其他抗日党派合作，共同为坚持抗战、团结，为争取民主而奔走呼号。

注释：

①转引自李勇，张仲田：《统一战线大事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卷》，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28~129页。

②何俊良：《民国时期重大事件纪实（第2卷）》，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8页。

③蒋景源：《中国民主党派爱国奋斗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2年版，第73页。

④⑤周天度：《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0~331页，第331页。

宋庆龄发起筹组保卫中国同盟

1937年下半年上海、南京沦陷后，宋庆龄移居香港，继续从事其抗日救亡的各项运动。为了获得更多的国际援助，特别是"争取世界人民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先锋力量——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解放区人民"，[①]宋庆龄意识到必须要建立一个专门的组织，以负责开展国际援助工作，向全世界人民介绍中国抗战的基本情况，获得他们的支持；得到国际援助后，又能利用这个组织迅速地对援助物资进行有效分配，以备战时之需。

经过长时间的多方努力及国际知名人士的大力支持，1938年6月14日，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宋子文出任会长，宋庆龄担任主席。经宋庆龄邀请，许多在港的国际友人也参加了"保盟"工作，国际友人克拉克女士担任名誉书记，香港大学教授诺曼·法朗士担任名誉司库，原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爱泼斯坦担任宣传工作。此外，廖梦醒、邹韬奋、金仲华、许乃波等也相继参加了"保盟"的工作。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则始终与"保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负责将"保盟"拨给八路军、新四军的医疗设备、经费等，迅速安全地转送到抗战前线。"保盟"成立后不久，为了更有效地开展各项工作，又在以宋庆龄为首的"保盟"中央委员会下面设置了四个工作委员会：法朗士负责的财政委员会；贝克登负责的运送委员会；邹韬奋负责的宣传出版委员会；玛丽恩·苔德莉女士负责的促进委员会。

"保盟"成立后，立即发表了《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向全世界人民庄严地宣告："同盟目标有二：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②]最后《宣言》还指出："中央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成为需要者（中国人民）和资金、物资捐助者（国外有关机构与'保盟支部'）之间的桥梁。保盟中央委员会将告知国外



有关机构，中国需要什么，并注意资金、物资是否按照需要和原捐赠机构的意见进行分配。”[③]按照这样的主张和目的，“保盟”自成立后即迅速展开了对国际援助的争取工作。

要争取国际社会的广泛援助，前提必须要将中国抗战的情况向国际社会作大力宣传，使他们明了中国抗日战争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战争中所占的地位，以此能获得他们对中国战场，尤其是对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和根据地的大力支持。为此，在宋庆龄的领导下，至1940年初，“保盟”共出版了各类形式的英文宣传物20余种，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保盟”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刊——《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由原美国合众国际社爱泼斯坦负责该刊的编辑出版，其首要任务是向全世界人民真实地介绍中国抗战的真相。当时，宋庆龄、爱泼斯坦、艾黎、王安娜、白求恩等很多人都曾为《新闻通讯》撰稿或提供战地报告，从而使该刊成为真实全面报道中国抗战的英文宣传物。

《新闻通讯》创刊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情况进行了大量报道。1940年8月到12月，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向日军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不但克服了投降的危险，而且还争取了时局的好转。为此，《新闻通讯》对此次战役进行了及时报道并作了大量评论，向全世界人民宣传了八路军在抵抗日军侵略的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成果。1939年起，新四军在江南地区广泛出击，不但巩固了皖东根据地，开辟了苏北根据地，而且还取得了1940年黄桥之战的胜利，从而在日军的封锁线上打破了好几处缺口。对此，《新闻通讯》也进行广泛报道，并呼吁国际友人、爱国侨胞在财力、物力上大力支援新四军。《新闻通讯》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作了全面的报道，主要向海内外人士介绍了抗日圣地——延安边战斗、边生产建设的情况，尤其详尽地介绍了培养和训练抗日军事干部和宣传干部的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这两所院校的情况。此外，对抗日根据地的医疗卫生情况和陕甘宁边区的战争孤儿保育院的情况等也作了多次报道。

“保盟”的《新闻通讯》在主要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敌后根据地的同时，还客观地介绍了国民党方面进行的抗日活动以及国统区的情况，从而使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国共双方在中国战场上同日军作战的情况。与此同时，《新闻通讯》对国民党发起的旨在破坏抗战，专制独裁的恶劣行为，也给予了重点揭露，并致以强烈的谴责。1941年1月6日皖南事

变爆发，为了使世界人民及时地了解事变的真相，揭露蒋介石的阴谋，《新闻通讯》多次发表文章，对事变前后经过及发展进程作了详细的报道，国民党蒋介石因此而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并进一步促使他放弃内战的政策，继续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

除了对国内战场的大力宣传外，“保盟”的《新闻通讯》还对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具体支援情况作系统报道，以此来赞扬他们为中国所作的巨大贡献；对于英美等国实行的绥靖政策则进行猛烈抨击，呼吁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联合起来，为战胜法西斯势力而斗争。

“保盟”在加强宣传的同时，十分重视对国际援助的争取，并把它作为“保盟”的首要任务和主要目标。

1938 年 7 月 28 日，宋庆龄致函美国“中国人民之友社”，详述了中国各战区急需食品、药品的情况，吁请该社努力唤起全美人民的对华同情心，积极援助中国之难民。此信引起巨大反响，美国的中国救济委员会立即决定募集 500 万美元以援助中国，此后，又有美国各地的 100 个团体积极加入到中国救济委员会。1938 年 9 月 3 日，英法对德宣战，全世界的目光因此而转移到欧洲战场，很多与“保盟”保持密切联系的国际团体也停止了对中国战场的援助。为此，宋庆龄于 1939 年 10 月 20 日给国外援华机构写了一封公开信，系统阐述了中国抗战的国际意义，指出了中国现阶段抗战面临的新的困难，呼吁各国“不要放松你们过去为中国所作的努力，而应当继续并且发展这些努力。”[④]1940 年圣诞前夕，宋庆龄又发表圣诞致词，再次呼吁全世界人民，特别是法西斯侵略的战火暂时还未烧到的国家，应该关心和支持处于艰苦斗争之中的中国人民。最后，经过宋庆龄和“保盟”其他人员的共同努力，许多国家的援华团体，如美国援华会、纽约的美国医药援华会、旧金山援华会、美国的中国人民之友社、英国的中国运动委员会、伦敦医疗援华委员会、法国巴黎的中国人民之友社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和平民主联盟等团体等，都与“保盟”建立了联系，并且通过“保盟”向中国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经费和物资援助。

除了争取大量的国际友人和组织团体对中国进行抗战支持外，宋庆龄和“保盟”还特别注重吸收广大海外华侨加入到援助中国抗战的行列。1938 年 9 月，宋庆龄发表《华侨总动员——庆祝华侨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一文。在热烈赞扬海外千万侨胞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援助的基础上，提出为适应抗战的需要，争取抗战胜利，必须使华侨能够实现全体总动员。“保证华侨



能够动员，最重要迫切的是加紧华侨中的团结，充实与扩大华侨救国的组织，统一华侨运动的领导，以及发扬应有的民主精神。”此外，“还须依靠和经过各种的实际工作，组织侨胞到实际工作中，才是真实的动员。如果今天仅仅限于纸上的计划，口头的空谈，是万分不够的。”[5]1941 年，为了进一步使海外侨胞能够及时了解中国战场的信息，同时又有利于援助工作的进行，“保盟”又帮助他们创办了爱国的中文晚报《华商报》，1941 年 4 月 8 日，《华商报》于香港正式创刊，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矛盾、金仲华、邹韬奋、千家驹等很多知名人士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向国内人民和海外华侨宣传抗日救亡的主张，并动员他们积极加入到抗日战争的行列。抗战期间，《华商报》为争取海外华侨的支持作出了巨大贡献。

通过“保盟”和宋庆龄的多方努力，广大海外华侨在抗战期间为中国人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不但向中国捐资捐款，而且还直接派青年参加到中国抗战的第一线，甚至为抗战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保盟”自成立之日起即把争取国际援助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争取来的援助物资及善款，除部分用于救济苦难同胞外，其余大部用到了抗战前线，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保盟”对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极大援助。

“保盟”自成立之日起就与中国共产党保持有密切的联系，并把援助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作为其援助工作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抗战期间，宋庆龄和“保盟”向海外华侨及国际援助团体和人士，募集了大量药品、医疗设备及各种物资和大笔捐款，并有效地将这些物资和款项输送到抗日根据地，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对日作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很快站在了抗战的第一线，但是他们队伍中的医疗条件和卫生条件却极其落后，因此在战场上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伤亡。1938 年，在“保盟”和国际和平运动会的帮助下，白求恩率领的加拿大医疗队在晋察冀边区建立起了第一个国际和平医院，白求恩任第一任院长。当时该院所得 2 450 英磅的医院基金就是“英国援华会”通过“保盟”捐募的。后来，以这座医院为基础，又在其他各根据地建立了分院，最后发展到有八个中心医院和 42 个分院的医疗网。在帮助中共建立国际和平医院的同时，“保盟”还向和平医院派去了大量的医务人员，其中有白求恩大夫，他在这个岗位上，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此外还有马海德、柯棣华、巴苏华、爱德华、卓克华和米

勒等，他们都为根据地的医疗保健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后，“保盟”还准备继续派遣来自德国、匈牙利、捷克、波兰、罗马尼亚、奥地利等国的反法西斯志愿医务人员去延安，最后由于国民党的阻挠而未获实现。

“保盟”还把一批批的国际援华物资和大批的药品及医疗设施，利用合法手段或是委托香港的国际友人护送，运送到延安等各抗日根据地。1939年“保盟”派出了一个车队，内配备有英国工业家捐赠给国际和平医院的一个流动手术室，通过越南的海防，前往延安。这个任务是由新西兰作家杰姆斯·贝尔特兰和随车的几名支援根据地的医生负责护送完成的。在向抗日根据地提供大量医疗设备的同时，“保盟”还在香港为国际和平医院多次举行募捐活动，所得的款项全部送到了国际和平医院，从而为北方抗日根据地医疗条件的改善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保盟”在对中共领导的北方军队进行积极援助的同时，还加强了对南方新四军的援助，这项工作主要是通过“保盟”上海分会来完成的。1938年12月，在上海党组织和“保盟”分会的安排下，第一批“上海各界民众慰劳团”在王纪华、顾执中的率领下，通过了日军的封锁线和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的防地，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慰问团给新四军带去了“保盟”筹集的一批手术器械和大量药品，以及其他食品、被服、文化用品等，有力地支持了新四军军部和各支队的医疗工作。1939年5月初，上海的党组织和“保盟”分会又组织了第二批慰劳团开往新四军驻地，给新四军送去了“保盟”对新四军医院的紧急援助品。

1939年，“保盟”还进行了一项重大活动，即为新四军募捐“两万条毛毯运动”，并连续几期在《新闻通讯》上刊登呼吁。宋庆龄还多次亲自出面举办由香港上层人士参加的募集活动，并在纪念“保盟”成立一周年的工作报告中，用《救救中国的伤兵们!》的标题，极力呼吁人们积极支持“两万条毛毯运动”。她告诉大家：“去年冬天，那些为保卫你们的自由以及他们自己的自由而受伤的士兵中，每千人中就有十人由于挨冻而死”，“当你们听到伤兵们因为无被御寒而冻死时，还会泰然置之吗?”在宋庆龄和“保盟”的多次呼吁下，“两万条毛毯运动”的募集活动最终取得了圆满成功，许多国外机构和个人直接向“保盟”提供了毛毯、寒衣等物资，此外，还有更多的团体和友好人士踊跃捐款，请“保盟”代购毛毯，以援助新四军伤病员。

宋庆龄领导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地区开展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积极



支持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以下简称“工合”）。“工合”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少数爱国人士和国际朋友共同发起的，以工业合作生产支持长期抗战，并使千百万难民得以生产自救的运动，当时曾被称为“经济国防线”。“工合”最初的发起人有路易·艾黎、斯诺夫妇，还有卢广绵等人，其中新西兰作家艾黎最热心也出力最多。1938 年 8 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会在汉口成立，当年年底在重庆正式建立了“工合”的组织机构，宋庆龄担任“工合”的名誉理事长。

“工合”初建时，曾得到宋庆龄的大力支持，宋庆龄多次在演讲、文章和给国际友人的信件中，阐述中国“工合”的性质、作用，呼吁国际友人、援华机构和广大海外华侨及港澳人士大力援助新生的“工合”事业。在她的大力宣传和多方号召下，国内外人民很快对“工合”有所了解，并从各方面支持“工合”运动的开展。1939 年 1 月，为了争取更多的国际援助，推动“工合”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经宋庆龄倡议，“工合”国际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工合”国际委员会成立后，宋庆龄立即着手在国外建立“工合”促进委员会，使国际友人和机构支持中国抗战的活动能更有效地开展。与此同时，宋庆龄领导的“保盟”和“工合”国际委员会也在物资、设备、资金等方面给“工合”以大力援助，使全国各地的“工合”组织都能够迅速地建立起战争所需要的工业企业及合作社组织，并利用本地资源，大量生产军毯、军鞋、手榴弹和其他必需品，及时送到抗日最前线。从而为整个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为了进一步支持“工合”的工作，同时更重要的是为了救济中国的伤兵难民，宋庆龄和其领导的“保盟”还于 1941 年 7 月至 9 月间发起了一场“一碗饭运动”。“一碗饭运动”原是美国医药援华会等团体于 1939 年首倡的。它每年举行一次，在美国人民和华侨中募集捐款，以购买医药和医疗设备，支援中国抗战。不久，“一碗饭运动”扩展到英国、加拿大和南美的许多国家。1941 年 5 月初，根据宋庆龄的倡议，“保盟”在香港成立了以宋庆龄为名誉主席，香港立法局华人首席议员罗文锦律师为主席，克拉克夫人为副主席，并包括香港华商总会负责人在内的“一碗饭运动”委员会。经研究，委员会决定发售餐券一万张，每张港元二元，餐券的价值本可享受几道菜肴，但认购者只能持券到提供赞助的餐馆吃炒饭一碗。整个活动获得的收入将捐赠给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作为救济基金。7 月 1 日，为了扩大影

响，宋庆龄在英京酒家举行了规模盛大的“一碗饭运动成立典礼”，并在会上发表了关于开展“一碗饭运动”的讲演。之后，香港的许多饭店酒家茶室义卖炒饭，而各阶层爱国人士则积极认购饭券，甚至连香港总督也表示赞助。8 月 1 日，“一碗饭运动”正式开始义卖，亲赴酒家就餐的有宋庆龄、廖梦醒，还有驻港陆海军司令、医务总督司徒永觉及其夫人，以及“工合”技术顾问路易·艾黎等外国朋友。这次义卖活动共募到“港币二万二千一百四十四元九毫半、国币六百一十五元。美国赈华会香港分会当即将捐助款凑足港币二万五千元。”⑥这些捐款都作为“工合”基金，以赈济难民和难胞。

抗战时期，宋庆龄领导“保盟”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旗帜，吸引和团结了无数国际友人、港澳同胞、爱国侨胞，从道义上、物质上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这项伟大的工作在当时却受到来自国民党方面的种种威胁，特别是当“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加紧策划时，蒋介石勾结英国驻中国大使向宋庆龄施加压力，要宋庆龄离开香港，放弃“保盟”工作。宋庆龄不怕威胁，坚守“保盟”阵地，同他们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逼近香港机场时，宋庆龄才在“保盟”同事的苦苦劝告下乘最后一架班机飞离香港抵重庆。

1942 年 8 月，宋庆龄在重庆重组了“保盟”中央委员会，一批新的中外支持者，如孙科、冯玉祥、茅盾、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埃德加·斯诺、赛珍珠等，成为新的荣誉会员。重组后的“保盟”，任务依然是向国内外取得援助，以资金、医药和物资，重点支援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保盟”又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迁至上海，把帮助中国人民的战后恢复工作作为自己的职责。

注释：

①宋庆龄：《为人民服务四十年》，《人民日报》，1978 年 6 月 14 日。

②③⑥郑灿辉，季鸿生，吴景平：《宋庆龄与抗日救亡运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 172 页，第 173 页，第 212 页。

④宋庆龄：《给外国机构的一封信》，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英文）第 9 期，1939 年 10 月 20 日。

⑤转引自尚明轩，陈民，刘家泉，赵楚云编著：《宋庆龄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版，第 114 页；原文载于《宋庆龄选集》。



国民参政会里的尖锐斗争

国民参政会是抗日战争时期成立的，最初由中国共产党极力号召和推动，并最终由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同参加的全国最高咨询机构，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在抗战时期，他曾为推动全民族的共同抗战和民主宪政作出过巨大的努力，但随着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执意要发动反动反人民的内战，国民参政会最终走向消亡。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国共双方摒弃前嫌，建立了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1937 年 8 月，为了表示国民党抗战的诚意，同时也为了应付中共和全国人民提出的积极参政的要求，国民党成立了“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决定由国防最高会议的主席聘请共产党、青年党、救国会和各界人士作为参议员，组成国防最高会议的咨询机关。针对国民党的这一举动，中共表示赞成，同时为了进一步促成真正民意机关的建立。1938 年 3 月 1 日，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即将举行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发出提议，指出：“为增强政府与人民间的互信和互助，为增加民众和政府抗战救国的效能，健全民意机关的设立，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此机关要真能包括抗日各党派各军队各有威信的群众团体的代表”，“同时，此机关要真有不仅建议和备政府咨询作用，而且能有商讨国是和谋划内政外交的权力。”①1938 年 3 月 29 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大会发表宣言强调“抗战之胜负，不仅取决于兵力，尤取决于民力。民力之发展，与民权之增进相为因果”；故决定“设置国民参政机关，俾集中全国贤智之士，以参与大计”。②同时此次大会还制定公布了《抗战建国纲领》。4 月 7 日，国民党又召开了五届四中全会，根据“临全”大会决定，制定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确定：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特设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200 名，各地“遴选”100 名，由国民党政府和省党部提名，国民党中央圈定；其余社会领袖 100 名，亦由国民党中央指定。7 月 6 日，由 149 人

参加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武汉正式召开。

表面上看，《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中规定的参政员，包括各党派、各团体、各领域的各界人士，参政员在参政会上也可以自由地提出自己对于当局的看法、观点、意见及施政措施，因此国民参政会酷似一个“民意机关”。但是稍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它与人民所期待的真正之“民意机关”相差甚远。参政员均是由国民党中央遴选产生，而且国民党员占了参政员的大多数，因而它不能真正代表全国之民意，最多只算是政府的一个“咨询机关”，其决议对政府的施政行为并没有多少约束力。此外，参政会并不承认各抗日党派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因此在后期，它就变成了国民党的一个御用工具。

基于国民参政会本身的局限，其成立之初就存在着复杂的斗争，并愈演愈烈。国民党、共产党和中间党派三大政治势力围绕着坚持抗战、民主宪政等问题，逐渐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国民参政会成立的一个首要目的，就是要巩固和加强全国各党派尤其是国共两党之间的团结，以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顺利实施，最终赢得民族解放事业的伟大胜利。因此，从一开始，国民参政会内部就围绕着坚持抗战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和争论。

抗战开始后，汪精卫暗中与日本勾结，力劝蒋介石接受停战条件，在国民参政会上又大造和平舆论，想利用参政会作媚敌投降的工具，因此第一届大会主要围绕着汪精卫叛国投敌问题展开讨论。1938 年 7 月 6 日，一届一次会议在武汉召开，身为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竟派参政员李圣五等提出“加强德意外交”案，并请德意出面调停中日和谈，这显然是与日本勾结，中共参政员和其他党派参政员坚决反对此提案，从而瓦解了汪逆分子的阴谋。10 月 28 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大会在重庆召开，汪精卫一面派梅思平去上海与日密谈，一面公开宣扬“再战必亡”的论调，对此，与会的广大参政员对投降派展开了猛烈的抨击。中共参政员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等提出《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紧全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案》，痛斥汉奸亲日派妥协投降的无耻言论，重申“蒋委员长为领导抗战建国的民族领袖，国民政府为领导抗战建国的最高行政机关，我全国军民一致信任和拥护”。告诫汪逆分子“任何人如果有妥协投降的阴谋活动，即等于民族的败类和叛徒，全民族应群起而攻之”。[3]其他的各党派参政员也纷纷提案或在中共的提



案上作连署人，坚决反对议和，坚持抗战到底。大会最后排除汪派分子的干扰，通过了《拥护蒋委员长决议案》，从而粉碎了汪逆分子的阴谋，使全国军民为之振奋。会后不久，汪精卫即叛国投敌，之后又不断发布言论，挑拨国共关系，鼓动国民党投敌。为此，其后召开的一届三、四、五次会议又分别通过了《拥护政府国策案》（1939 年 2 月 19 日通过）、《声讨汪逆兆铭电》（1939 年 9 月 15 日通过）、《声讨汪逆兆铭南京伪组织电》（1940 年 4 月 2 日通过）等，重申了坚持抗战到底的主张，表示了参政会“一致斥伐，以昭大义”的严正立场。

1939 年 1 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逐渐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并于当年年底至 1940 年春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抵抗其军事进攻，另一方面又于 1940 年 4 月一届五次会议的前夕，再次向参政会表达了中共要求加强国共团结的愿望，并表示愿以诚意来解决国共间的纠纷。但是，国民党却对此置之不理，令何应钦在大会上作了《冬季攻势开始以来晋冀鲁各省所发生之不幸事件》的军事报告，诬蔑攻击共产党、八路军和边区政府，扩大和激化了国共矛盾。至此，参政会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摩擦和分裂，第一届参政会结束后不久，国民党即掀起了以皖南事变为标志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皖南事变过程中，中共采取的策略是：政治攻势，军事守势。在这一方针的正确指导下，中共获得了国内外舆论的一致同情，而国民党蒋介石却陷入了空前的政治孤立。为了掩盖抗战阵营内部存在的重大裂痕，造成国共团结的假象，国民党提出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并于会前百般诱骗中共七参政员出席会议。中国共产党为了公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分裂活动，团结教育中间势力，以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议利用这个舞台，来向国民党顽固派发起新一轮的政治攻势。

1941 年 2 月 15 日，毛泽东等中共参政员向国民参政会提交了解决皖南事变的具体办法“12 条”，并以此为出席本次参政会的条件。对此，蒋介石深感恐慌，他一方面要求周恩来收回“12 条”，并以“翻脸”相威胁，另一方面又表示可以做出三点让步，周恩来对此都予以坚决拒绝。3 月 2 日，为了进一步表明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和解决问题的诚意，董必武和邓颖超向大会提交了解决皖南事变的临时办法“12 条”，以此作为让步条件，从而得到了中间人士的谅解，使蒋介石颇为被动。3 月 6 日，蒋在参政会上发表演说，尽管还重弹军令、政令必须统一的滥调，并攻击中共提出的解决办法

"双12条"，但又不得不表示，今后"决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8日，中共参政员董必武被选为参政会常驻会员。14日和25日，蒋介石两次接见周恩来，商讨国共关系缓和的相关问题。至此，中共七参政员"不出席"二届一次参政会的斗争取得了彻底胜利。正如中共中央所总结的那样：参政会的斗争"使广大群众过去对于蒋的幻想开始消失，蒋之狰狞面目由蒋自己大大揭露了，这是蒋的最大损失"。[④]

中共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不仅打退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同时还使中间派认识到，以妥协求团结，不但得不到团结，还会丧失共产党和中间党派已有的地位。参政会期间，中间党派曾联络共产党提出在国民参政会之下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以此作为各党派的一种协议机关，最后因担心被蒋介石利用，没有付诸实施。为此，二届一次参政会结束不久，他们即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标志着中间阶级逐渐向统一战线内部进步势力的方向转化。

1943年，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并准备利用9月召开的三届二次参政会反共。9月21日，何应钦到会作军事报告，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十八集团军，报告完毕，董必武当场提出质问，并列举大量事实，对何应钦的无端攻击逐一进行反驳，何应钦理屈词穷，无言对答，出了大丑。此时，国民党CC分子王普涵等人开始叫嚣捣乱，会议无法进行，董必武当即向会议主席声明退席并表示不再出席本次大会，以示抗议。10月5日，《解放日报》又发表了毛泽东写的长篇社论，对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和批驳。通过此次斗争，中间党派和中共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争取民主宪政的实现是抗日战争的中心环节，也是国民参政会的重要议题。由于国民党坚决执行其独裁政策，因此从一开始，中共、各民主党派就围绕着民主宪政问题同国民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一斗争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会议期间表现得最为激烈。

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前夕，中共七参政员就曾在《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中提出了"确保人民言论集会出版结社之自由及保证各抗战党派之合法权利"等项内容。会上，吴玉章又领衔提出《改善县区政治机构与保甲办法案》，深刻揭露保甲制度的腐败，建议"从速精简县以下机构，实行乡保长民选，设立战时民意机关"。沈钧儒等提出《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褚辅成等提出从速实行下级自治等案。这些提案都直接触动了国



民党的利益，最后被国民党以各种手段予以否决。之后几次会议上，中共和其他党派参政员继续为此展开斗争。一届二次会议上，邹韬奋提出了撤销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案，强烈要求新闻出版自由。一届三次会议上董必武提出《加强民权主义的实施，发扬民气以利抗战案》，要求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各机关切实保障人民权利，给各党派以法律上的保障。不料国民党却利用其人数的优势，强行删去了原提案中关于党派合法地位的要求，董必武坚持原则，据理力争，两次退席以示抗议。

一届四次会议期间，中共参政员联合中间党派和无党派参政员，向国民党发起了强大的攻势。会前，中共七参政员发表《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提出“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之合法权利，认真取消各种所谓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禁止对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之歧视压迫行为”，“不以党派私见摒弃国家有用人才”等三点要求。[⑤]会上，中共和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救国会、职教派等参政员提出了实行政治民主、改革现行政府的六个提案，一致要求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国民党参政员则提出了《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案》（1939 年 9 月通过），妄图以此扭转局面，赢得主动。围绕上述七个提案，统一战线内部的三种政治势力，以共产党和中间党派为一方，国民党为另一方，在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民主与专制问题，斗争的焦点是保障抗日党派合法地位和结束党治问题。最后，大会通过了一个妥协的主要反映中间党派意志的《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决议案》。随后，全国掀起了宪政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由于国民党对任何有关民主和党派合法的提案一直不予采纳，或者采纳了而拒不实施，因此从一届五次会议起，中国共产党就再也不提出任何提案，而只是通过报纸向历次会议发表自己的“希望”和“要求”，使全国人民了解中共的政治主张。随着抗日战争的进一步发展，中共自身的力量逐渐壮大，其在全国人民和各中间党派人士中的威信也逐渐提高。这时，中共意识到提出成立联合政府主张的时机已经到了。1944 年 9 月 5 日，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9 月 15 日，中共中央代表、参政员林伯渠在向大会报告四个月来的国共谈判经过时，正式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

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以加强全国团结"的主张。[6]中共的这一主张，立刻得到了各中间党派和无党派知名人士的一致拥护，国统区也因此出现了民主运动的新高潮，而国民党却对此极度不满，最终国民参政会未能通过这一提案。

1945年7月7日至7月20日，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召开，由于国民党顽固坚持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拒绝联合政府的主张，因此中共中央决定不出席第四届参政会。但是，四届一次参政会前，中共和中间党派人士就某些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7月1日，由中间党派代表人士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六参政员组成的延安视察团抵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并于7月4日与中共达成了两点一致意见：一、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因此，在四届一次参政会上，黄炎培、冷遹、章伯钧、左舜生等中间党派人士纷纷要求国民党放弃召开国大的决定，从速召开政治会议。由于中共和中间党派的联合斗争，国民党想利用参政会强行通过召开国大决定的企图被粉碎。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和民主党派联合促成了政协会议的召开，但国民党参政员却在四届二次参政会议上攻击政协不合法，还叫嚷要立即撤销政协会议，此时，国民参政会已完全失去了其原初的作用，成为了国民党独占的御用工具。1948年3月，国民参政会结束了其历史使命。

国民参政会自1938年7月成立至1948年3月结束，共开过四届13次会议。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各中间党派和国民党在历次会议上就抗战和民主问题展开的将，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国民参政会为国内各党派提供了一个合法公开的政治舞台。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参政会沦为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御用工具。

注释：

①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6～487页。

②四川大学马列教研室编：《国民参政会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原文载于《新华日报》，1938年4月3日。



③四川大学马列教研室编：《国民参政会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1页。

④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59页。

⑤重庆《新华日报》，1939年9月9日。

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34页；原文载于《新华日报》，1944年9月17日。

民主宪政运动在全国开展 统一建国同志会成立

1938 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的政策重心逐渐由对外转向对内，开始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民主。1939 年 1 月，国民党又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融共、防共、限共”的方针，并设立了防共委员会，会后即不断制造多起反共军事摩擦，并强化特务统治，压制民主力量。国民党的这些举动不但破坏了抗战团结，给中共带来重大损害，同时也对各民主党派及各界民主人士所一直期望的政治民主构成威胁，对此，中共和各民主党派人士感到非常愤慨。为了挽救抗战的前途，同时也为了实现政治民主，各中间党派决计和中共联合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提出实行民主宪政的问题，并决定如果政府不接受，则各党派的代表一律退出参政会。

1939 年 9 月 9 日至 18 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会前，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参政员即纷纷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行宪政，并决定在参政会上提出关于实施宪政的提案。为了向人们作出民主的姿态，以争取舆论的主动，并控制会议的局面，国民党参政员孔庚在会上首先提出了一个关于实施宪政的提案——《请政府遵照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开始宪政案》。各党派在会议上也纷纷提出实施宪政的提案：共产党参政员陈绍禹等提出《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参政员左舜生、张君劢、章伯钧等提出《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国社党、青年党、第三党张君劢、左舜生、章伯钧等提出《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面案》；救国会参政员王造时等提出《为加强抗战团结以增强抗战力量而保证最后胜利案》；救国会参政员张申府等提出《建议集中人才办法案》；职教派参政员江恒源等提出《为决定立国大计解除根本纠纷，谨提具五项



意见，建议政府请求采纳施行案》。以上六项提案加上国民党的那一提案共七个提案，成为了此次大会上讨论的焦点。

9月15日，国民参政会审查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正式讨论关于宪政问题的七个提案。会上，国民党参政员与中共及各民主党派参政员“显然分成了两个阵营”，围绕两个焦点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第一个是“关于抗日各党派的合法保障问题”，这是各民主党派的提案集中提到的问题；第二个是“结束党治”问题，也是此次舌战的高峰。经过两天一夜的争论，本次参政会最后将七个提案合并，通过了一个决议，即《召集国民大会施行宪政决议案》，其内容为：“甲、治本办法：（一）请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二）由议长指定参政员若干人，组织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成宪政。乙、治标办法：（一）请政府明令宣布全国人民除汉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二）为因应战时需要，政府行政机构应加充实并改进，借以集中全国各方人才，从事抗战建国工作，争取最后胜利。”[①]这个决议尽管还有搪塞拖延之辞，但毕竟承认要实行宪政，并决定组织宪政期成会，这是中共和各民主党派以及其他党派团结斗争取得的一个胜利，从而推动了民主宪政运动在全国的开展。

1939年10月1日，中间党派和无党派参政员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张君劢、章伯钧、张申府、王造时、李璜、左舜生、江恒源、褚辅成、莫德惠12人率先在重庆发起宪政座谈会，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吴玉章及《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等也应邀参加。宪政座谈会从1939年10月~1940年3月，共举行过八次会议，参加人数一次比一次多，影响也愈来愈大。1939年11月19日，第四次宪政座谈会在重庆召开，大会决定成立“重庆各界宪政促进会”，以切实推进宪政运动，并选举黄炎培、沈钧儒、李璜、董必武等84人为筹备委员，会后，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张友渔等即亲往各地作关于宪政问题报告，向各界人民宣传宪政的重要性。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还将各报刊发表的有关文章编成《宪政运动论文选集》和《宪政运动参考资料》一、二两集，向全国发行，这些对宪政运动的开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在重庆宪政运动的影响下，1939年11月以后，成都、上海、桂林等地的宪政运动也相继开展开来，成立了各种宪政团体。1940年2月20日，由毛泽东等党政军各界领导人80余人发起筹备的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在延安成立，毛泽东等47人被推选为理事，吴玉章为理事长。大会发表了《延安

各界宪政促进会宣言》，提出了关于宪政问题的四点主张。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讲，指出：抗日和民主是目前中国的两件头等大事。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但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文章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对人民的宪政欺骗，指出蒋介石所说的宪政，不过是“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他还提醒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要自己把握宪政运动的方向，这个方向“决不会依照顽固派所规定的路线走去，一定和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它必然是按照人民所规定的路线走去的。”②文章最后号召全国人民集体动员起来，一起为争取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实现而努力。

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的宣言和毛泽东讲演为全国的宪政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之后，山东、皖南、晋西北、晋冀鲁豫等根据地的宪政座谈会、宪政促进会也先后成立。“全国各界人士踊跃发表宪政言论，参加座谈，撰文著书，形成了第一次宪政运动热潮。”③

由于国民党一开始即无意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宪政，因此，随着宪政运动的一步步发展，国民党开始着手结束这场运动。1940 年 4 月 1 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大会在重庆开幕，黄炎培、张君劢、罗隆基等将汇集各党派对宪法草案意见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案》提交到大会，各党派同国民党在会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蒋介石未等辩论结束即连忙指示双方将建议整理出来，上交政府处理。最后毫无结果。4 月 18 日，国民党中央通过《宪政问题集会结社办法》，严格限制政治活动。9 月 18 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原定本年 11 月 12 日召集国民大会，各项工作大体办竣，惟因各地交通受战事影响，颇多不便，国民大会召集日期应俟另行决定。”④至此，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宪政运动终于被压制下去。

虽然此次宪政运动最后被国民党破坏，但是它的影响深远。全国人民通过此次运动，提高了对宪政问题的认识，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也在运动中受到了锻炼和教育，加深了对中共的了解，并寻求进一步合作。同时，此次运动还促进了各党各派在组织上的联合。

第一次宪政运动的失败使中间党派人士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反抗战反民主的本质，在这种形势下，为了进一步向国民党争取民主，同时也为了调解国共间的关系，促进国共团结抗战。一些民主党派开始意识到有必要组织一个“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团体，同国民党作斗争。1939 年 11 月 23 日，由



部分参政员和非参政员发起组织的统一建国同志会在重庆成立。参加者有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乃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江恒源、冷遹；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国家社会党的罗文干、罗隆基、胡石青；青年党的曾琦、李璜、左舜生、余家菊；第三党的章伯钧、丘哲，以及无党派人士张澜、光升等人。会议通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简章》，选举了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梁漱溟等为常务干部，并公推黄炎培为主席。会后，黄炎培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简章》以及会员名单，交给张群、王世杰送国民党最高当局审查，要求取得合法地位。

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简章》共8条，《信约》12条。《简章》主要说明了该会的宗旨、组织、经费等问题，指出："本会以巩固统一积极建国为帜志，定名为统一建国同志会。"[⑤]《信约》则主要提出以下主张：一、抗战建国方面，"诚意接受三民主义为抗战建国最高原则"，"拥护蒋先生为中华民国领袖，并力促其领袖地位之法律化"。"对外抗战，对内建设"，口号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二、宪政实施方面，主张"宪法颁布后，立即实施宪政，成立宪政政府。凡一切抵触宪法之设施，应即中止，一切抵触宪法之法令，应即宣告无效"。"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三、党派关系方面，"凡遵守宪法之各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不赞成以政权或武力推行党务"。四、军事方面，主张"一切军队属于国家，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反对一切内战"，反对"一切国内之暴力斗争及破坏行动"。[⑥]统一建国同志会的这些主张，虽然对国民党还抱有幻想，对国民党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但它终究反映了各民主党派要求国民党实现民主政治的愿望，为今后各党派政治上的联合奠定了基础。

11月29日，常务干事会推派梁漱溟为代表去会见蒋介石，说明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第三者的立场"，要求蒋介石允许该组织合法存在。蒋介石审查后，对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参加该会表示不满，说救国会"是中共的外围"，最靠近共产党。梁漱溟解释说："与其让他们在这一组织的外面，不如约到里面为好。"最后蒋介石表示同意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成立，但以该会不能成为正式政党为条件。从此，统一建国同志会取得了合法活动的权利。但统一建国同志会终究不算是一个政党，其会员人数总共只有20多人，且平常都是通过座谈会和聚餐会的形势来交换政见，商谈国事，所以不具有一般政党的组织形式和日常工作制度，顶多只是一个政党的雏形。

统一建国同志会建立后，蒋介石继续推行反共反民主的政策，1939年

末和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国共关系异常紧张。在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在积极反共的同时，又对民主党派特别是其中的进步人士也进行打压。在这种情况下，建国同志会感到有必要促进各民主党派的进一步联合，决议把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成民主政团同盟，以真正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调解国共纠纷，团结抗战，争取实现民主宪政。

注释：

①四川大学马列教研室编：《国民参政会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3页。

②《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1~739页。

③蒋景源：《中国民主党派爱国奋斗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2年版，第121页。

④韩信夫，姜克夫：《中华民国大事记》第4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11页。

⑤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革命问题教研室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革命问题教研室出版（校内用书），1982年版，第31页。

⑥徐文生编著：《中国民主党派革命斗争史》，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4页。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是统一建国同志会。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在对共产党进行政治军事压迫的同时，又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迫害。1940 年 10 月，国民党顽固派在新疆逮捕了要求抗日的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12 月，国民党改组国民参政会，无理取消了许多主张抗日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社会贤达的参政员资格。同月，又拘留了公开批评孔祥熙、宋子文贪污问题的马寅初。1941 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然后国民党又封闭了救国会负责人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十多处，2 月 25 日，邹韬奋愤然离渝赴港，并致函国民政府，决然辞去国民参政员职务。面对国民党这一系列摧残民主、破坏抗战的举动，各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进一步认识到，要想争取民主斗争的伟大胜利，必须要扩大和加强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团结合作，以集中各方力量和国民党作斗争。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民主政团同盟应运而生。

民主同盟在筹建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早在 1939 年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就向全党发出了《中央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指出："一切站在国共之间主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所谓中间力量（从救国会朋友直到各地公正士绅、名流学者及地方实力派）最近期间表现出政治积极性日益增长，成为推动时局好转的极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应用极大努力帮助他们用各种方式组织起来。这一中间力量应该成为我们当前组织工作的第二个对象。"[①]根据中共中央的这一精神，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在重庆还经常同中间党派人士接触，参加他们的活动，讲解国内外的形势，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并对他们要求联合起来的愿望给予鼓励、支持和推动。至 1940 年 12 月下旬，中间党派领导人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等已在重庆多次秘密集会，酝酿各党派间的联合。1941 年 2、3 月间，围绕中共七参政员出席国民参政会事，各民主党派和中共进一步加强了沟通和联络，民主政团同盟的筹建工作也随之积极展开。

1941 年 3 月 19 日，统一建国同志会成员左舜生等人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黄炎培、张澜、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张君劢、左舜生、李璜、林可玑、丘哲、江恒源、冷遹等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敬告政府与国人》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章》。会议还建立了中央领导机构，推举黄炎培、张澜、左舜生、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李璜、江问渔、冷遹、杨赓陶、丘哲、林可玑 13 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其中，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五人为中央常务委员，推举黄炎培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左舜生为总书记，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原为 12 条，后经多次修改，到 1941 年 10 月 10 日发表时题目改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内容改为 10 条，称“十大政治纲领”，其主要内容为：“一、贯彻抗日主张，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反对中途妥协。二、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在宪政实施以前，设置各党派国事协议机关。三、加强国内团结，所有党派间最近不协调之点，亟应根本调整，使进于正常关系。四、督促并协助国民党切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五、确立国权统一，反对地方分裂，但中央与地方须为权限适当之划分。六、军队属于国家，军人忠于国家，反对军队中之党团组织，并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七、厉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反对一切非法之特殊处置。八、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保护合法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九、在党治结束下，应注意下列各点：（一）严行避免任何党派利用政权在学校中及其他文化机关推行党务。（二）政府一切机关，实行选贤与能之原则，严行避免为一党垄断及利用政权吸收党员。（三）不得以国家收入或地方收入，支付党费。（四）取消县参议会及乡镇代表考试条例。十、在当前政务上亟应注意下列各项：（一）厉行后方节约运动，切实改善前方待遇。（二）纠正各种行政上妨碍生产之措施，以苏民困，并力谋民生之改善。（三）健全监察机关，切实为各种行政上弊端之澄清。”[②]从这些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民主政团同盟的政治主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贯彻抗日主张”和“实践民主精神”，既主张抗战到底、党派团结，同时又主张实行民主宪政，保障人民权利，此纲领“是一个反帝爱国的民主进步的政治纲领”。[③]但是，纲领中又提出“军队国家化”等主张，说明民主政团同盟在反对国民党政治独裁的同时，也不同意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



民主政权的存在，因此，他反映的终究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代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其目的是要扩大自己的政治力量，以期在国共之外形成“第三方政治势力”，参与国家政权。尽管如此，同盟的纲领仍是一个爱国的、进步的政治纲领，它毕竟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抗战、民主、团结的愿望。

民主政团同盟主要由三党三派组成，它们是：中国青年党、国社党（后改称民社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亦称第三党，后改称农工民主党）、中华职教社、乡村建设派和救国会。救国会的沈钧儒本是民主政团同盟的发起人之一，但鉴于早在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时，蒋介石就曾对救国会加入统一建国同志会发难，为减少麻烦，在事先征得沈钧儒同意与谅解的情况下，民盟召开成立大会时没有邀请沈钧儒，沈钧儒等救国会领导人直至1942年才正式加入同盟。民主政团同盟并不是由“三党三派”组成的一个政党，而是这些党派的领导人代表各自的党派组成的一个松散的政治联合体。至于这三党三派本身，则在盟外仍保持独立自主的地位。入盟的各党派领袖都是跨党的，各党派成员入盟则本着自愿的原则，入盟后既是民主政团同盟的盟员，同时又是另外一个独立政党的党员，他们不受组织纪律的约束。参加民盟的各个党派和个人，其动机不完全相同，“有的同情中国共产党，企图组织民盟，把国统区的中间政治力量联合起来，以对抗蒋介石的迫害，开展抗日民主运动；有的企图在国共两党之间，扩张第三种力量，以便利用国共两党的矛盾和斗争，向国民党争取一些经济上政治上的利益；有的企图利用民盟，捞取政治资本，准备在适当的时机出卖民主，向蒋介石邀功请赏，换取高官厚禄。”④

尽管民主政团同盟的成分复杂，动机也不一样，但是其争取抗战团结和民主政治的最终奋斗目标没有变，为了这一共同目的，他们实现了大联合，并最终将成为一个介于国共两党间的、影响力和实力都超过以往任何中间性党派的新政党，开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解放和民主政治的最终实现而奋斗。

注释：

①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04页。

②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

③蒋景源编：《中国民主党派爱国奋斗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2年版，第132页。

④徐文生编著：《中国民主党派革命斗争史》，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页。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由秘密到公开冲破国民党的党禁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一直是秘密开展工作，因为国民党蒋介石不可能承认和允许该组织的存在。早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时候，蒋介石就已经表示严重不满，现在民主政团同盟又要求成为中国的第三方政治力量，组织规模也比以前更大，因此，这是蒋介石决不能容忍的。但是，民主政团同盟又不能一直隐蔽下去，要实现其促进团结抗战和民主政治的目标，必须在公开的形式下才能进行，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广大人民和爱国人士的支持，才能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正面交锋。从秘密发展到公开冲破国民党的党禁，民主政团同盟经历了长时间的准备过程，最终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诞生”。

民主政团同盟冲破国民党党禁的第一步是：在香港建立自己的言论机关《光明报》，宣告组织的成立及纲领主张，并吸引国内外舆论的注意和支持。这项工作主要由梁漱溟来完成。1941 年 3 月 28 日，梁漱溟受同盟委派，专程赶到重庆周恩来住所，向其通报了民主政团同盟成立的整个经过，并就办报事宜作了探讨，要求得到中共的援助，周恩来表示将转告中共驻港机关予以协助。3 月 29 日，梁漱溟又来到桂林，得到了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的关照。5 月 20 日，梁漱溟抵达香港，然后即与先期在港的已参加民盟的各党派人士曾琦（青年党）、徐梦岩（国社党）、张云川（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甘介侯（桂系）等开始筹备办报事宜。对此，中共驻港机关负责人廖承志和主持《华商报》的中共党员范长江给予了大力支持，他们不仅资助办报经费，就连报名《光明报》也是由范长江与梁漱溟共同拟定的。此外，保卫中国同盟成员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救国会的邹韬奋和萨空了等各界人士也纷纷给予支持。在香港各界人士的帮助下，《光明报》的筹备工作很快就绪。9 月 18 日，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正式出版，梁漱溟任社长。当天发表的《创刊号》申明了《光明报》

的办报宗旨和原则，指出本报愿为国人提供一个“言论发抒之公共园地”①，因此得到了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热烈欢迎和支持。

1941 年 10 月 10 日，《光明报》发表“启事”，正式宣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同日，公布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十大政治纲领”）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向世人宣布了同盟的政治主张和奋斗目标。10 月 16 日，《光明报》又发表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社论，进一步阐明了民主政团同盟的性质、宗旨、由来等问题。通过这一系列举动，人们对民主政团同盟有了更多的认识。

民主政团同盟将消息传达给国内人士的同时，还千方百计地使国际社会了解到民主政团同盟的各方面信息，以获得他们的支持。为此，民主政团同盟多次召开有英、美等国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向他们散发民主政团同盟各种英译本文件，正式公开民盟组织，从而有力地反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有效地争取了海外舆论，得到了他们的广泛好评和大力支持。

民主政团同盟冲破国民党党禁的下一步，也是最重要最艰难的一步是：在国内公开民主政团同盟组织。1941 年 10 月 9 日，蒋介石宴请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等参政员，交换对国际国内时局的意见。会见中，张君劢坦然承认了民主政团同盟确实已经成立，并向蒋介石“提出民主政团同盟政纲的各点”。10 月 11 日，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举行谈话会，张君劢、张澜、左舜生、李璜、罗隆基等人在会上公开了组织的情况，并纷纷表示：“对民主政团同盟可以负任何责任。”②

1941 年 11 月 16 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首次以组织名义在重庆临江路俄国餐厅举行茶会，招待国共两党代表和国民参政会中的部分民主人士。国民党方面的王世杰、邵力子、张群，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救国会的沈钧儒、陶行知、张申府等出席了茶话会，“到会人数共 47 人”。③会上，民盟主席张澜、总书记左舜生、组织部长章伯钧、宣传部长罗隆基相继发言，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已经正式成立，说明了民盟的成立经过和组织状况，他们特别强调，民盟是一个各党派联合的团体，它的宗旨在于促进民主宪政，加强抗战力量，挽救民族的危亡。

11 月 17 日，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民盟参政员张澜、张君劢、左舜生、罗隆基在会上提出了《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训政”，实施“宪政”。这一提案得到了董必武、邓颖超、史良、王造时等 23 位参政员的联署，最后虽被国民党



蒋介石阻挠未提交大会讨论，但意义重大。通过这一举动，民主政团同盟第一次以政党的面貌在国民参政会的公开场合出现，标志着已冲破了国民党的党禁，从此，民主政团同盟正式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大大增强了抗日民主运动的力量和影响，大大推动了国统区民主宪政运动。

民主政团同盟最初的政治主张是：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推动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宪政运动。为贯彻这个政治主张，民主政团同盟以政治联盟的形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国民党统治区积极开展民主宪政运动，支持中共参政员提出的召开党派政治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为坚持民主团结抗日而斗争。其主要活动有：1942 年底，中央总部宣传部长罗隆基去昆明，筹建了政团同盟第一地方支部（后发展成为云南省支部）；1943 年，民主政团同盟与重庆各界民主人士以庆贺沈钧儒先生 70 岁寿辰的名义举行集会，推动民主宪政运动，国共两党和无党派知名人士于右任、冯玉祥、董必武、郭沫若等 100 余人参加集会，罗隆基发表《宪政的先决条件》小册子，造成较大政治影响；1944 年 1 月，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等于成都成立民主宪政促进会，并发表著名的《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的小册子，主张“主权在民”，在群众中具有很大号召力，并得到中共中央支持，特发《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与之呼应；1944 年 1 月至 5 月，沈钧儒、黄炎培等在重庆坚持每月主持召开“民主宪政座谈会”，批评国民党的寡头政治；总书记左舜生创刊并主编《民宪》半月刊，宣传民主宪政和抗战主张；史良等骨干成员在重庆开展了妇女运动，宣传抗战。

1944 年 9 月 19 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会议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改政团入盟方式为个人身份入盟。会议选举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李璜、罗隆基、梁漱溟、张申府、曾琦、张君劢、张东荪、潘光旦 13 人为中央常务委员，并推选张澜为主席，左舜生为秘书长，章伯钧为组织委员会主任，罗隆基为宣传委员会主任，梁漱溟为国内关系委员会主任，张君劢为国际关系委员会主任。大会还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草案》，此草案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社会六部分，共 46 条，是民盟提倡的民主制度的具体化，它比民主政团同盟时期的政治纲领更加进步、更加完善。

民盟改政团入盟为个人身份入盟的方针，扩大了民盟组织的社会基础，使大批爱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加入民盟，为抗战胜利后民盟的进一步扩大和

发展奠定了基础。同年 10 月，民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公开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其后便同蒋介石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5 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以空洞的诺言再次欺骗国人，1 月 15 日，民盟针对其文告发表《时局宣言》，无情揭穿了蒋介石惯耍的民主骗局。3 月 1 日，在国内各方的巨大压力下，蒋介石在重庆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发表演说，公开反对召开党派会议，反对建立联合政府，同时声称要在 1945 年 11 月 12 日召开国民大会。对此，民盟中央于 3 月 10 日发表《中国民主同盟发言人对最近国内民主与团结问题发表谈话》，重申了民盟对国家统一问题和民主问题的主张，坚决反对召开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从而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1945 年 4 月 24 日，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全面地阐明了中共抗日救国的基本政策和具体纲领，指出要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必须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改革，而其前提是建立一个由各党派联合组成的一个临时的中央政府。中共的这一主张遭到了国民党的拒绝，为此，中共决定不出席定于 7 月 7 日召开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为了调解国共间的关系，听取中共的意见，同时和中共商讨解决国内政治问题的办法，民盟参政员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冷遹，国民党参政员褚辅成及无党派参政员傅斯年等六人，于 7 月 1 日由重庆飞抵延安，与中共共商国是。最后双方达成两点一致意见：一、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同时双方还商定由中共方面整理出此次的《会谈纪要》。7 月 7 日，国民党不顾中共和民主党派的极力反对，坚持在重庆召开了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一次大会。为表示抗议，中共参政员和民盟参政员、民盟中央主席张澜，以及民盟中央常委、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领导人章伯钧等拒绝出席会议，参政会最后通过了一些空洞的模糊的决议。然而，这些并不能使蒋介石有所甘心，为了彻底达到他的军事政治阴谋，参政会闭幕不久，他即迫不及待地调动大军向解放区大举压迫。面对内战一触即发的局面，民盟领导人于 7 月 28 日，立即发表《对时局宣言》，严厉指责了国民党制造内战的卑劣行径，再次重申了自己的政治主张。8 月 15 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面对国内的危机形势，民盟于当天立刻发出《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更加旗帜鲜明地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内战和分裂政策，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从而得到了中共和饱受战争之苦的全国人民的赞许和支持，为制止国民党发动内战作了舆论动员。



民盟的以上举动，对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谈判的胜利举行和政协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

注释：

①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年版，第 4 页。

②③袁旭，党德信著：《中国民主党派与抗日战争》，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年版，第 359 页。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抗战胜利的法宝

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是国共两党合作基础上的全民族抗战的伟大胜利。事实已经证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法宝。对此，早在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就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总结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①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就一直为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懈努力。1933年1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首次提出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这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筹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呼吁各党派和军队首先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同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②，从而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任务。

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中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蒋介石氏"、"南京政府诸



公”，标志着中共开始将“反蒋抗日”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迅速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最后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条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确立。1937年2月10日，为了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早日实现，中共中央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同时提出四项保证：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愿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1937年2月中旬至7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林伯渠等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宋子文、顾祝同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进行了多次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但因国民党方面坚持取消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性，取消红军，取消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双方没有达成协议。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七七事变。7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蒋介石。《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在庐山与蒋介石继续谈判。同一天，蒋介石发表了准备抗战的谈话。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由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直接受到威胁，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8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同蒋介石等就发表中共宣言和改编红军问题，在南京举行第五次谈判，蒋介石被迫同意将在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全面抗战路线。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开赴华北抗日前线。10月间，又将在南方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开赴华中抗日前线。在共产党的催促下，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

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首先促成了抗日战争形成了两个相互依存配合的战场：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从而充分发挥了国共两党两军的作用。1943 年 7 月 2 日，《解放日报》所刊载的《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一文中曾指出："整个中国战场上……实际上是被划分为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这两个战场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一个，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兽的奔窜，在将来就不能驱逐这个野兽出中国"。[3]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前，国民党一直执行对日妥协、积极剿共的政策，使中国东北地区和华北局部地区很快沦陷。卢沟桥事变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在中共的倡导和督促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推动了国民党走向积极抗日的道路。从 1937 年 7 月到 1938 年 10 月，南京政府进行了比较认真的抵抗，其正面战场共投入约 200 万兵力，先后组织了平津、淞沪、台儿庄、徐州、武汉等十多次较大的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许多爱国官兵奋力杀敌，涌现出不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振奋了民族精神，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促进了全国的团结和进步，坚定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据统计：在八年抗战中，国民党 60 余名将领阵亡，如卢沟桥抗战中的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与赵登禹、枣宜会战中牺牲的张自忠将军等，他们的名字将永垂青史。1938 年，战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一直到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党抗日虽有所消极，但在正面战场上还是进行了几次较大的战役。如绥西和五原大捷，南昌与随枣战役，长沙战役等等，都给敌人以沉重打击，配合了敌后战场作战。抗战后期，国民党又远征缅甸，在异国战场上打击日军，为配合盟军作战付出了巨大代价。八年抗战中，尽管国民党在后期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但国民党政府的基本利益和民族利益总体来说是一致的，它始终坚持抗日的方针，没有投降，从而保证了抗战的最后胜利。

在国民党进行正面战场作战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也迅速开辟了敌后战场，并先后组织了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多次战役，从而牢牢牵制住了敌人的有生力量，给予沉重打击。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逐渐演变为主要战场，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1944 年 6 月 9 日，中外记者参观团赴延安参观，6 月 22 日，



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在向他们介绍中共抗战情况时指出："如果把全部敌军及全部伪军合计起来，则在1944年3月以前，共产党担负抗击的，占敌伪军总数134万人中之110余万，即84%，或5/6以上"④。至抗战胜利前夕，中共已依靠人民群众，建立了19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拥有党员120万、人民军队120万、民兵260万，解放了100多万平方公里上的一亿多人口。

在国共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相互依存、相互配合，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殊死搏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还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国内各民主党派，同时发展和壮大了人民革命力量，真正实现了全民族的抗战。

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各中间派势力就为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奔走呼号，同时力促统一战线的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他们又纷纷组织联合起来，建立了多个民主党派，如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救国会、保卫中国同盟、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等，他们迅速加入到抗日队伍的行列，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一、各民主党派始终坚持抗战立场，拥护抗战国策，坚决拥护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二、各民主党派不仅在道义上坚持抗战、支持抗战，而且在行动上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通过出版书、报等刊物，向人们宣传了抗日救亡主张，倡导民主进步，对提高人民抗战意识和抗战热情起到了很大作用，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三、各党派以各种方式，积极动员各自联系的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力支持武装抗战。他们中的许多成员还响应中共的号召，进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直接参加对日作战。四、国共两党的合作团结，是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保证。为了维护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各民主党派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

除了各民主党派的积极斗争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下的中国各界民众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知识分子在呼唤民众进行抗日方面，起到了先锋作用。他们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宣传群众、鼓动群众，唤起了民族的觉醒；广大劳苦群众则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成千千万万支游击队、自卫队、担架队、救护队、运输队，同敌人了展开殊死搏斗，给敌人以重创。此外，中国的工商界也纷纷以捐款、义卖等各种形式支援抗战，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抗日战争过程中，中国各党派之间曾经出现过不团结甚至分裂对立的局面，尤其是国共之间还曾经一度出现过武装冲突。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统一战线中的其他力量始终高举抗战、团结、进步的旗帜，从而维护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团结抗战的局面，保证了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集团则公开叛国投敌。为了正确有效地开展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于1940年3月11日和12月25日，先后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报告和《论政策》的党内指示，提出了一整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指出：统一战线的根本政策，是对资产阶级的既联合又斗争政策，“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⑤]统一战线的扩大与巩固，则必须处理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⑥]为了实现统一战线的根本政策和方针，毛泽东还进一步提出了同顽固派作斗争时，必须采取的原则和方法，即“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斗争方法。

在这些政策、方针和原则的正确指导下，中共成功地打退了国民党自1939年～1943年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从而维护了国共两党的合作，保证了全民族抗战的顺利进行。在这一过程中，中共的威信也进一步提高，加强了对中国抗战的领导，为抗战胜利后中国革命的正确发展方向奠定了基础。在维护国共合作的过程中，中间党派和全国各界民众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舆论上和行动上给予中共以极大支持，使国民党不敢与中共彻底决裂，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上面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在整个抗日战争的过程中，正是由于建立、扩大和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保证了各方力量始终为抗战胜利而奋斗，才最终赢得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解放。因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战胜利的重要法宝，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一笔宝贵的财富。

注释：

①⑤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6页，



第745页，第745页。

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04页。

③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原文载于《解放日报》，1943年7月2日。

④叶剑英：《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612页。

日军在华北实行“囚笼政策”

七七事变后，日军凭借其在军事力量上的优势，旋即入侵并占领了华北。可是不甘心做亡国奴的华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纷纷拿起武器反抗侵略，组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使日军在华北的统治始终处于不稳固的状态。到1939年，随着日军在华战略进攻的暂时结束和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日军为了稳固自己在华北的战时统治秩序，在扶持伪政权的同时，着力于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制定并推行所谓的“治安肃正”，企图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扫荡和政治怀柔，以达到扩大占领区和维持现占领地区的安定，特别是迅速恢复河北省北部，山东省、山西省北部及内蒙古要地的治安。“囚笼政策”正是“治安肃正”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囚笼政策”是指“抗日战争期间，侵华日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时，采取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并辅之以封锁沟（墙），从敌占区向抗日根据地构成一个个网状的囚笼，在囚笼内实行压缩包围，以束缚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活动，达到消灭抗日力量的目的”。[①]由此可见，“囚笼政策”的主要特点是利用日军机械化部队机动灵活、反应快速的优势，在构建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的同时，在地理位置重要的地方修建军事据点，进而对抗日根据地形成“点、线、面”的包围和封锁，希望以此来扼杀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9年，日军开始执行“囚笼政策”，即“以大据点为中心，将小据点按卫星状态加以部署，构筑连接各小据点的呈放射状的汽车公路。其次小据点再互相连接，形成环状线，尔后将据点进一步向外扩大，修筑与上述相同的放射，环状道路”。[②]1939年7月起，日军对晋东南地区进行大扫荡，控制了白晋路北段、邯长大道和平（定）辽（县）等公路后，赶修白圭到晋城的铁路和临汾到高平、邯郸到长治、临汾到屯留的公路，以分割太行、太岳区；还在平汉线西侧增设据点，修建伸向山区的公路，封锁太行区和冀南区之间的交通，同时日军还以暴力手段强迫华北人民为之修路。“从1939年到



1940 年，日军在华北修复铁路 1 870 公里、公路 1.56 万公里，新修碉堡、据点 2 749 个”。[③]同时实行路旁挖沟法，加高路基，在路的两侧挖掘深沟，沟宽约六米，深约四米。在难以挖掘的山岳地带，设置由自然障碍或石墙构成的隔断墙。由这种点、碉、沟、路、墙构成一个个小块，形成囚笼，然后用武力清剿，达到由点到面的占领。

在做好推行“囚笼政策”的前期准备工作之后，日军开始对华北敌后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仅在 1939 年，万人以上兵力的大扫荡就有：1939 年 1 月对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1939 年 2 月至 3 月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1939 年 5 月至 6 月对晋察冀边区五台山地区近万兵力的大扫荡，1939 年 7 月至 8 月对晋冀豫边区晋东南地区六万余兵力的大扫荡，1939 年 10 月至 12 月对晋察冀边区北岳区两万余兵力的大扫荡。扫荡采取的战术主要为“烧毁根据地的设施，采取‘居坐战术’（蘑菇战术）、‘含付战术’（咬住不放）或夜间和拂晓前突然袭击战术，或利用壕沟划定彼我势力范围的方法向外扩展”。[④]日军的大规模扫荡给华北抗日根据地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大量根据地沦为日军占领区，日军占领根据地之后随即设立安抚班、治安维持会、伪县政府、乡政府，设立保甲制度、情报员，管理户口，建立门牌，发良民证，无证人员即予以逮捕，希望以上述措施建立其对新占领区的有效控制。在日军的军事高压之下，日军的上述措施亦曾奏效过一段时间，例如，冀中的绝大部分村庄都变成了敌占区，根据地缩小了 2/3。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将直接与美国对抗这一局面已成定局，因此为了避免两线作战的压力，日本急于解决“中国事变”，并希望巩固其在华北的统治秩序，把华北作为其兵源、粮食的供给基地，实现“以战养战”的目的。因此，日本决心彻底消灭华北的抗日力量，尤其是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此，日军从华中抽调兵力，选定了冀中地区为扫荡重点，认为：“冀中地区是河北省粮仓地带；在战略上、经济上属于重要地位，是华北治安最大的隐患地区；是太行山中共根据地供应、培养战斗力的基地。因此只要扼杀该基地，就会收到很大成效。”[⑤]在冈村宁次的指挥下，五万余陆空协同作战的日军对冀中进行大规模扫荡，其采取的战术主要有：“铁壁合围”，“撒网战法”，“突袭包围战术”，“要求各种部队构成有如网眼的小单位，不论地势如何，都要大小不漏地齐头并进”，“进行扫荡”。“包围圈要形成细小的网眼，必要时可以反复进行彻底的包围，还可以采取反转攻击法，在适当时机

迅速掉转头来进行攻击，在有多余兵力时可形成两层包围圈，形成层层包围圈。”⑥日军的扫荡给根据地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使根据地面积大为减少，同时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仅冀中一带，“八路军遗尸 9 098 具，俘虏 5 197，另抓嫌疑者 20 568 人，所谓嫌疑者大部分是民夫。”⑦

面对日军的“囚笼政策”和一次次大扫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不畏艰险，与日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这样一场较量中，表面上日军是军事上的强者，但是日军作为侵略者，由于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在民族危亡关头的同仇敌忾，实际上是陷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的，虽然可能在一些军事行动中在暴力上取得优势，但是在常态的日军统治秩序下，日军遭受到中国抗日军民或明或暗的抵制和反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敌后的交通战，主要由民兵和群众担任，在民兵掩护下，男女老幼一齐动手，破坏道路，烧毁桥梁，拆围墙，割电线。”⑧“在‘治安地带’其中村民或中国方面（伪）的团体在表面上做出协助我（日）方的态度，暗地里却进行资敌工作”，“处在彼此势力中间地区居民，朝迎日军，晚通共军。”⑨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采取游击战术“秘密地将多数民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个整体，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的方针，与民众一道反复进行顽强的战斗。”⑩同时，广修地道，打破敌人“囚笼政策”下对抗日军民的交通封锁，密集的地道网真如日军所说，“地道建筑非常普遍，几乎所有村庄都有地下设施，甚至有相距七八公里的三个村庄用地道连接起来。”⑪正是依赖这样密集的地道网，敌后抗日军民打破了敌人的交通封锁，出没于日占区，通过游击战和破袭战等方式，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也使敌占区的伪军、伪政权人员在心理上处于首鼠两端的状态，动摇其打击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信心和决心，并策反其暗中帮助抗日军民，使日军处于腹背受敌的两难境地。

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军民的联合打击下，日军的“囚笼政策”不得不以失败告终。1944 年秋，日军高级参谋塞川大佐回忆说：“在方面军占领的三个特别市，四百个县（华北）当中，治安良好的除三个特别市以外，只有七个县（占总数的 1.4%）。有一百三十九个县（31.5%）差不多未布置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的活动，还有相当于 66.9% 的二百九十五个县，居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分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分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共产



党。1941年底，治安地区为10%，准治安地区为40%，未治安地区为50%，恢复县行政机关的为92%（总数398县中的366县），与此数字对比，治安状况恶化情况十分明显。”[⑫]华北方面军高级参谋神崎大佐表示：“对于面的控制，在当前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只能考虑确保‘点’和‘线’的措施。”[⑬]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的联合打击下，日军对“点”和“线”进行有效控制的想法也沦为泡影，不得不在最后无奈地承认“方面军实施的封锁战术，最初，在隔断和敌方地区的联系，实行经济封锁方面取得了成果，然而到头来仍以失败告终。”[⑭]

日军“囚笼政策”的实行，给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使华北敌后抗日活动一度陷入低谷和困难时期，但是就是在这样一种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华北抗战军民不畏艰险，坚持抗战，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体系和完整的对敌战略战术，为日后百团大战的展开提供了作战实践和经验。“囚笼政策”虽然最终遭受了失败的结局，但是我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不计其数，“囚笼政策”作为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的侵略政策，将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注释：

①中共石家庄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石家庄历史大辞典》，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768页。

②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日）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8页，第363页，第131页，第20~21页，第161页，第397页，第82页，第476页，第162页，第440页，第482页，第482页。

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编：《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与全民族抗日战争》（中），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786页。

百团大战对日军的交通破袭战

随着日军“囚笼政策”的不断展开，交织连贯的新旧铁路线、公路线在华北平原上逐渐密集，像一张巨网一样，慢慢向我方各抗日根据地合拢。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严重的形势。八路军为了打击敌人的“囚笼政策”，争取华北战局的有利发展，同时影响全国战局争取抗战时局的好转，决定组织一次交通大破袭战。1940年7月22日，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发出《战役预备命令》的电报。决定将此次破袭战的目标锁定为正太路。

正太路始于平汉路上的正定，通过井陉，爬上巍巍太行，经娘子关天险入山西，西行至榆次与同蒲铁路接轨，上抵太原，全长249公里。正太路横贯太行山脉，沟通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联结平汉、同蒲两线。同蒲路从大同到蒲县，把山西切为东西两半；正太路则把山西省东半部又切为南北两半，是华北敌人的重要战略交通线，也是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破坏的重要封锁线之一。正太、同蒲、平汉、津浦、平绥、北宁、胶济七条铁路干线，形成了日军对抗日根据地构筑交通网，而正太路正处于中心位置。为达到彻底破坏正太路并扫除沿途据点的目的，八路军总部向各参战部队提出了若干要求，要这些部队一定在战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在有关指示中，八路军总部还要求晋察冀军区对管区内的平汉路、北宁路、津浦路、石德路、沧石路等铁路、公路进行广泛的破击，以阻止日军向正太路增援。这样，晋察冀各参战纵队和其他参战部队，抓紧时间进行了攻坚和短期破路的训练，并派出了侦察小分队侦察地形、敌情，迅速完成了进攻道路的选择、爆破器材的筹备和建立兵站等各项任务。为了准备此次破袭战，各参战部队广泛练兵，积极动员，努力做好各方面的战斗准备。

1940年8月8日，八路军总部发出《战役行动命令》，明确规定这次战役成果之大小，主要看破坏正太路的程度而定，破坏工作为这次战役最中心的环节。其中指出：

一、聂集团主力约十个团破坏平定（平定县不含）东至石家庄段，正



太线破坏重点应在娘子关平定段，对北宁线德州以北之津浦线，德石路、沧石路、沧保路特别是对元氏以北至芦（卢）沟桥段之平汉线，应同时分派足够部队宽正面的破袭之，阻击可能向正太线增援之敌，相机收复某些据点，对西北两面之仗以适当兵力监视之。另以有力部队向盂县南北敌据点积极活动相机克复某些据点。

二、刘邓集团以主力八个团附总部炮兵团一个营攻击平定含至榆次段正太线之破坏重点，阳泉张净镇之对元氏以南至安阳段平汉线，德石路，邯大路，榆次至临汾段同蒲线，平遥至壶关段白晋线，临屯公路，应同时分派足够部队宽正面的破袭之，阻敌向正太路增援，相机收复某些据点，对辽平公路应派有力部队积极活动，相机收复沿线某些据点，另以一个团主力住于潞城襄垣间地区。

三、贺关集团应破袭平遥以北同蒲线，同蒲线及汾离公路（部署）应以重点置于阳曲南北阻敌向正太线增援，该集团原拟一个团在阳曲以南配合作战，兵力较小应加强之。如汾河可能徒涉时，该集团阳曲以南配合作战部队应力求以约两个团之兵力，进至榆次南北地区直接加入刘邓集团作战，并归刘邓直接指挥之。对晋西北腹地内各个敌之据点与交通路，应分派部队积极破袭相机收复若干据点。

四、总部特务团主力集结下良西营地区。[①]

8 月 20 日 22 时整，在八路军总部的指挥下，各部队按照预定计划，以迅猛的战斗动作，对华北的各条交通战线同时发起猛攻。抗日军民在华北战场上纵横驰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给日军以严重打击。我八路军指战员在群众的配合下，破坏铁轨，捣毁路基，爆破车站、桥梁、隧道及通讯线路，使日军的交通和通讯一时间陷于瘫痪，日伪方面一片混乱。在战斗开始并取得一些胜利后，除原来布置的 22 个团外，各根据地都自动地增加部署了不少武装力量，乘敌伪仓皇撤退时，随时加入战斗；也有一些武装力量自发地参战，积极追歼敌伪。据彭德怀回忆，实际参战的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大概共计 104 个团，近 40 万人，民兵参战的有 20 多万人，群众参战的更多。[②]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根据参战部队的实际数目，称之为“百团大战”。而在百团大战的三个阶段中，对日军的交通破袭战成为第一阶段的中心内容。

如计划所定，正太路为整个交通破袭战的重点。晋察冀军区部队 40 个团的兵力，在聂荣臻司令员指挥下，以 15 个团分三个纵队破坏平定至石家庄段的正太路；另以 25 个团分头向北宁路、津浦路、平古路、平汉路（正

定以北）、平大公路北段实行破击。20 日至 23 日，仅三天时间，晋察冀军区的武装部队（另有两万多民兵，编成 50 个大队一起出动）就破坏了正太路东段的铁路，连续攻克娘子关、井陉、苇泽关、贾元、关头村、头泉等车站和据点；毙敌独立第 4、第 8 混成旅团 1 000 余人，缴枪 1 000 余支。9 月 6 日，又在盂县境内将敌寇 200 余人包围，歼灭其大部，仅 40 余人逃跑，连克十几个据点，所有公路都被我军破坏。[③]在冀中，参加交通破袭战的民兵、群众达 35 万人，一夜之间破坏了全部公路。冀东则动员了八万多民众，将七八个县内日军修建的公路和电线，破坏得一干二净。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一百二十九师决死一、二纵队，冀南部队，八路军总部炮兵团、特务团等 46 个团，以主力 15 个团和炮兵团进攻由平定至榆次的正太路；以八个团进攻元氏以南至安阳段的平汉路；以九个团分头破坏德石路、平大公路南段及邯济线；以 12 个团分头进攻太谷至临汾段的同蒲路、平遥至壶关段的白晋路；另以两个团破坏临汾屯留公路。当刘邓大军潮涌般秘密扑向正太路时，日军正在睡梦之中，毫无防备。经一昼夜激战，刘邓大军就攻克了一批车站、据点，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为破路和进一步扩大战果扫清了障碍。正太路上的据点、车站，一个又一个地被拔除，到 8 月 25 日，在正太路西段，除少数据点外，已基本为我军所控制。广大八路军参战部队、游击队、民兵和人民群众在“不留一个车站，不留一座水塔，不留一条铁轨，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座桥梁，不留一根电线杆，彻底破坏路基”的战斗口号下，冒着敌机的低空扫射，对日军建设的铁路、公路及一切附属建筑物，展开了大规模的破坏活动；路轨、枕木、电线杆、电线、车站、水塔、桥梁、涵洞、路基都被悉数拆毁或炸掉。有的还把拆下的路轨抬到数十里外埋掉，把枕木烧掉，有的把路轨放在枕木堆上，点燃枕木，枕木烧完，铁轨也就随之被破坏了。在广大参战部队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十个昼夜的大规模破袭，正太路许多地段被夷为平地，日军的阴谋在我军的打击下破产了。

整个战役在正太路沿线打响时，为了拖住支援正太路的日军，尽可能地延续百团大战的作战时间，八路军总部命令其他各部积极出击，阻滞敌军向正太路增援。在冀南地区，大大小小的公路，特别是德石路，被陈再道指挥的冀南军区部队和破路民工（前后达三万人）破坏殆尽，德石路的路基被一段一段地挖掉。平汉路由石家庄到安阳段，受到我军东西夹击的破坏，几座铁路桥被炸毁，安阳敌机场三架飞机被焚毁。白晋路由于洪口至长治段的



铁轨被搬走，各处铁桥只剩下一副残骸。贺龙、关向应指挥下的一百二十师和决死二、四纵队共22个团，在北起内蒙古大青山，南至吕离的离汾公路，西起黄河岸边，东至同蒲沿线的广大地区，也同时发起了旋风般的攻击，有力地牵制了日军向正太路的增援。8月21日夜，三百八十五旅向忻（县）静（乐）公路的重要据点康家会发起强攻，全歼守敌50余人，并歼灭由静乐增援的敌人40余人。

百团大战时对日军的交通破袭战，在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使日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据日方统计，在战役第一阶段，石太路被破坏桥梁、铁路36 038米，通讯线路85 000米；同蒲线被破坏桥梁、铁路8 350米，通讯线路23 000米，平汉线被破坏桥梁、铁路1 400米，通讯线路38 000米。井陉煤矿（新矿）至少半年不能出煤。[④]对此，在日军《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中有如下的记载；“盘踞华北的全部共军，根据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部署的所谓百团大战，于昭和15年（即1940年）8月20日夜，一齐向我交通线与生产基地（主要是矿山）实施奇袭。特别是在山西省，其势甚猛。在袭击石太线及北同蒲线警备部队的同时，并破坏、爆破铁路、桥梁及通讯设施。井陉煤矿等设备被彻底毁坏。共军这次奇袭完全出乎我军预料，损失重大，恢复需要相当时间与大量资财。”[⑤]

注释：

①《朱德、彭德怀等关于百团大战的行动命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52～653页。

②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234～235页。

③龚古今，唐培吉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上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457页。

④何理：《抗日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198页。

⑤《日军战史资料中的百团大战》和《关于百团大战资料》，载《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9期。

百团大战的歼灭战阶段

我军在正太铁路沿线的交通破袭战给予日军严重的打击。日军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损失了大量的兵力和据点，其内部也接连数日陷入混乱状态。但是，当日军查明战场的基本情况以后，随即紧急调动兵力对我军进行反扑。8 月 25 日，日军独立混成第四、第九旅团，会同部署在白晋铁路、同蒲铁路南段的第三十六、第三十七和第四十一师团的部分兵力，向我八路军第一百二十九师反击。独立混成第八旅团在从冀中、冀南抽调来的约 5 000 日军的配合下，向晋察冀军区的部队反击。八路军担任破袭战的各部队在继续坚持对日军的交通破袭的同时，还要抽出兵力对付日军的反击。

鉴于这一形势，又考虑到破袭正太路的第一步战役目标基本实现，八路军总部于 8 月 26 日下达了关于《开展正太线两侧作战之战役部署》的命令。命令指出："在正太路不能继续坚持作战或未彻底完成正太战役任务之情况下，我之行动方针，应是乘胜开展正太线两侧之战果，去收复敌深入各该根据地内之某些据点，继续坚持正太沿线之游击战，缩小敌占区，扩大战果，同时以一部兵力进行休整。"①并对在交通破袭战之后的第二步方针作了具体部署："聂集团应不少于四个团之兵力，力求收复上下社以北各据点，并向太原、寿阳、盂县以北，定襄、忻县以南开展工作；另以三个团之兵力，坚持寿阳、石家庄段正太线南北游击战争。贺集团应以适当兵力乘胜拔除根据地腹地之若干据点，另应以九个团之兵力继续开展忻县、太原段同蒲线及太原交城地区工作，打通与边区及晋东南之交通路。刘、邓集团应以不少于四个团之兵力出击平辽公路，而彻底毁灭之，并力求收复辽和两城；另以两个团之兵力坚持阳泉以西及榆太地区之游击战，开展工作与晋西北打通联系。"②

8 月 31 日，在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战役胜利的形势下，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发出继续扩大战果的建议电，建议彻底毁灭正太路和同蒲路的忻县至朔县段．突破日军的封锁，使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连成一



片。但是，日军迅速调整兵力，向八路军破袭部队进行疯狂反扑。9月初，日军在正太路两侧集聚了两万多人，企图从东西两面对我军进行夹击，并连续出动空军，一面猛烈轰炸八路军阵地，一面设法联络日军的地面部队，协调地面作战。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和左权看到，“扩大战果已不可能”。9月2日，八路军总部给各参战部队发出了关于执行第二步作战方针。方针指出：

“1. 连日由晋南往援正太路之敌约一旅团之兵力，其先头已达正太路西段，榆次、芦家庄、寿阳各据点之敌向外扩张，已夺回西段不少据点，井陉、石家庄、定县沿线集敌五六千人，后续可能增加，娘子关、阳泉敌亦向东西扩张，估计敌正图东西夹击我军。

2. 正太战役已取得伟大成绩，在上述情况下，特别在聂集团方面继续扩大战果已不可能，决心从明三号电令第二步行动方针转移兵力，力求乘正太路遭我大破击后，敌不易转移兵力之有利时机完成第二步计划之任务。”③

遵照八路军总部关于执行第二步方针的命令，第三百八十六旅旅长陈赓整编了第一百二十九师的左右两个破击队，并以四个团的兵力，在正太路南侧的松塔、马坊、安丰等地区，对日军独立混成第四、第九旅团8 000余人的反扑进行英勇的阻击，毙伤其200余人，掩护了师部的安全转移。9月5日，日军第三十六师团永野大队600余人由太谷向榆社以北的双峰镇进犯。刘伯承得知后，命令陈赓、周希汉分别率第七百七十二、二十五团与第十六、二十八团从南北两面对来犯日军进行夹击。陈赓、周希汉二人接到命令后，分别率部与日军永野大队激战两昼夜，至9月7日晨，八路军歼灭了日军的大部，毙永野大队长以下400余人。随后，第三百八十五旅主力在向平辽公路转移途中，于张建地区设伏，给向辽县撤退之日军以重创。

晋察冀军区根据八路军总部8月26日的命令，决定乘着破击战役的胜利向盂县地区转移进攻。针对正太路东段的战略部署，聂荣臻提出对部队进行重新编组，组成三路军开展进攻。

9月2日，聂荣臻向所属部队发出整编命令：以主力第十六、第十九、第二、第五团共四个团组成西路军，统归郭天民、刘道生指挥，乘日军集中兵力向正太路南侧反击，北侧较为空虚的时机，向盂县和寿阳以北地区发起攻击，收复该地区向内的日军据点，彻底摧毁公路以及日军的据点工事，开展地方工作，筹集粮食。以熊伯涛率军区特务团两个营、第一百二十师骑兵营、正（定）新（乐）灵（寿）行（唐）游击支队和军区教导团组成东路

军，统归叶长庚、蔡顺礼指挥，仍担任原任务不变。教导团到达后可担任边境日军据点的监视，并力求逼退日军与收复据点。以第三团和第4分区特务营、井获支队一部组成中路军，由杨成武指挥，负责钳制并吸引正太路东段的日军，便于配合主力机动。第三团稍向南伸进，担任矿区与井陉方面的钳制；井获支队一部约四个队仍留获鹿、平山间地区；第4分区特务营立即出动到第三团右翼，担任娘子关南北峪的钳制。

随即，聂荣臻、聂鹤亭、唐延杰发出《给各钳制方面的战役补充指示》，对战役各关键方面再次作了强调：

“1. 第二期战役作战的基本方针仍以乘胜扩张战果，主力转移攻势于正太北侧之西端，继续攻击盂县周围及寿阳以北地区之敌而消灭之，详细部署见十三时命令。

2. 冀中及各分区应基此方针密切配合，更进一步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彻底破坏一切公路及尽可能地继续破坏铁路交通，用一切方法夺取某些深入之敌据点，将这一斗争与保护秋收密切地联系着，作为秋季斗争的实际的重要的准备步骤。具体布置由各该首长决定之。

3. 军区司令部拟移至郭苏以北沟里附近。”[4]

兵力转移后，晋察冀军区西路军部队乘日军集中兵力向正太铁路南侧反击而使背侧出现空虚的时机，以主力四个团挺进盂县周围，主动出击，相继收复了东会里、北会里、上社、下社，苌池、关头六个日军据点，歼灭日军200多人，并破坏了该地区大部分公路。东路军炸垮了灵寿县城东关之大石桥，在微水炸火车使30余名日伪军毙命，还组织抗日力量在正太路的上安、孙庄、岩峰一线阻击由石家庄经获鹿西援的日军，连续攻击平山西北之田舍日军据点，破坏正（定）行（唐）灵（寿）之间公路，有力地钳制了日军。9月上旬，活动于正太铁路东段的中路军曾打退了由娘子关、巨城向北进犯的日伪军800余人，并再度袭击了娘子关和井陉煤矿，有力地钳制了日军的反扑。晋察冀军区各配合作战兵团，也都遵照八路军总部和军区指示，对附近的日军据点和铁路、公路展开了全面大破击，并取得了不小的胜利。其中冀中军区部队与日军作战48次，先后攻克了霸县之千人水、固安之临城铺、永清之赵家务三个日军设防坚固的据点，并一度攻入安次（廊坊）、万庄和渠沟、南碑店，破坏了平汉、津浦两条铁路线各一段，共毙伤日伪军740人，生俘166人。[5]第十军分区司令员朱占魁9月2日率第二十九团攻击安次至万庄、张店至落垡段铁路据点时，炸毁日军火车头一个，焚烧车厢



49节，炸死日军十余人，活捉日伪军15名，使北宁铁路中断两天不能通车。

与此同时，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晋西北新军各部和第一百二十师继续对同蒲路北段及其两侧公路和根据地腹地的日军据点开展破击。8月24日，新军一部一度攻入五寨县城，毙敌数十。31日，独立第二旅一部直捣宁武、朔县之间的军事要点阳方口，与日军鏖战三小时，占领火车站。日军200余人分别自宁武、朔县出动，妄图南北夹攻阳方口，但均被独立2旅所击退，毙伤俘日伪军共120余名。晋西北新军各部和第一百二十师的英勇出击，使同蒲路北段被切断，9月8日前无法通车，阻滞了察绥和晋北日军对正太路的增援。截至9月上旬，晋西北新军各部和第一百二十师共进行大小战斗163次，连战连捷，有力地保障了正太路主战场大破袭的胜利。

至此，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战役，也就宣告胜利结束了。从8月20日至9月10日，八路军在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作战中共进行大小战斗265次，攻克日军据点91座，毙伤俘日伪军6 000多人，并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6]使日本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经济上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给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民和敌占区同胞以极大的鼓舞，并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实现了八路军总部规定的破击计划，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彭德怀对此也作出了高度的评价：“这一次百团大战及其所获得的胜利，在华北抗战历史上，乃至在全国抗战历史上，都占很重要的地位。在敌人后方进行主动的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百团大战还是第一次”，“这一战役进攻在华北抗战历史上是空前的，在全国抗战历史上亦甚少见”，“这一战役进攻的胜利，将为华北创造出一个新局势，而这个新局势将更多地牵制敌人兵力，阻滞敌人向我大后方进行正面的进攻。”[7]

注释：

①②《开展正太线两侧作战之战役部署》，1940年8月26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编审组，《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1页。

③《敌援正太兵力已到我执行第二步方针》，1940年9月2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编审组，《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8页。

④《给各钳制方面的战役补充指示》，1940年9月2日，中国人民革命

军事博物馆，《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编审组，《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76页。

⑤王政柱：《百团大战始末》，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86页。

⑥谢远学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纪实第四部铁血河山》中卷，人民出版社，第464页。

⑦《彭副总司令谈百团大战的伟大意义》，1940年8月31日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编审组，《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413页。



百团大战扩大战果阶段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胜利结束后，八路军各部队转入休整期。然而此时，日军的大批援军已由东西两端进攻正太路地区，对我军造成威胁。1940 年 9 月 16 日，彭德怀、左权根据最新敌情动态，决定参加百团大战的八路军各部转入第二阶段作战。

9 月 16 日，朱德、彭德怀、左权联合署名，发出了下达给各部队首长并上报中共中央军委的《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命令》，指出：“为扩大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之战果，贯彻百团大战之目的，拟定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之作战计划如次：

甲、作战基本方针：

1. 继续破坏敌寇交通；

2. 克复深入我基本根据地内之某些据点。

乙、作战部署：

1. 一二〇师以截断同蒲路北段交通之目的，集结主力破击宁武，轩岗段同蒲路而彻底毁灭之；2. 冀中、冀南部队以打击敌寇修筑沧石路、德石路，邯清路之目的，应集结主力彻底毁灭各该路已修成之部分及前线路基；3. 晋察冀军区以开展边区西北方面工作之目的，应集结主力破袭涞灵公路及夺取该两城（主要是涞源），并以有力一部在同蒲路东侧积极配合一二〇师之作战；4. 一二九师以收复榆社、辽县之目的，开展榆辽地区斗争，并以有力一部不断破袭白晋路北段；5. 晋察冀与一二九师原留正太线行动之部队不变，并积极阻挠敌修复铁路；6. 挺进军应以有力部队向平汉路北段、平绥路及北平城郊积极活动；冀中应以有力一部在北宁路及津浦路北段积极活动，不断破路倾车，扩大影响，阻敌增援；7. 对其余各大小交通线之配属作战部队，由各战略区自行配置之。

丙、第二阶段之作战统于本月 20 日开始战斗。”①

根据八路军总部的规定，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扩大第一阶段

的战果，继续破击交通线，重点在于歼灭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日伪据点。其主要攻击目标，就是一百二十九师榆（社）辽（县）地区；晋察冀军区涞源、灵丘地区；冀中部队沧石、德石路；冀南部队德石、邯济路；一百二十师同蒲路朔县至原平段。

接到命令后的八路军各部迅速行动起来。9 月 17 日，聂荣臻、聂鹤亭、唐延杰下达了《涞灵战役的攻击部署》的命令，决定将涞灵战役的战斗开始时间定为 9 月 23 日 22 时，要求战斗中各兵团注意互相密切联络。《涞灵战役的攻击部署》中对于各参战部队作了如下部署：

"一、右翼队——第一、二、三、二十、二十五团、游击一支队、一分区特务营、骑兵第一团一个营。

（1）以第一团夺取涞源，第三团夺取上庄、因堡，第二团、二十五团一个营夺取涞源周围支点。

（2）以二十团（缺一营）、一分区游击一支队及特务营、第六团截断蔚县至涞源（已不通车）西河营到涞源两汽车路，并扫除该两线故支点，出一部向西河营、蔚县活动，主力随时准备打击敌南下增援。以上各部，为便于统一指挥组成右翼队之北路支队，由黄寿发、王道邦指挥之。

（3）对扬徐方面，控制次要兵力，积极活动、钳制，以保侧后安全。

二、左翼队——六团、二十六团、察绥支队。

（1）六团在战役前半期为便于协同右翼队作战，暂归右翼队北路支队黄、王指挥，以一个营出占北口后向蔚县活动，一个连攻占留家庄，主力位置于尖山。

（2）二十六团主力控制于灵丘东之北罗、孤山台、沙口之间地区，以一个营出至灵丘、广灵汽车路活动。

（3）察绥支队采积极活动于古子河、枪风岭之线起有力的动作，吸引灵丘之敌注意于该方。"②

9 月 22 日晚，八路军 1 分区部队对涞源城日军发起攻击。经过一夜激战，一团攻占了涞源城东关、西关和南关，日军被迫退进城内防守。一团战士继续冲杀，一部曾攻入城内西北隅。进攻其他日军据点的部队虽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遭到日军猛烈的反击。由于日军施放毒气，我进攻部队于黎明时分撤出。第二团在攻击插箭岭、三甲村、中庄三点时，由于日军的严防死守和连续的反冲锋，使我攻击部队先后退出。对插箭岭的攻击也未能奏效。右翼部队第三团主力进攻东团堡，以第一营攻上庄，切断东团堡与中庄



的联系；第二营在东团堡东南两面助攻；第三营由东团堡西面和西南主攻，第九连为突击队。战斗打响后，第三营指战员在当地民兵的带领下开到东团堡附近的馒头山，以突然袭击占领了村西的馒头山阵地。拂晓前，九连奋力攻占了东团堡西南角的炮楼，打开了突破口，后续部队乘势冲入村内。担任助攻的第二营在拂晓前抢占了村南路口的碉堡，因日军兵力过大，凭借碉堡、房舍死守，且不断组织反冲击，多次施放毒气，二、三营未能将村庄占领。攻击上庄的第三团第一营夺取了日军的堡垒，打退了日军的五六次反冲击，但因伤亡过重，只好后撤。针对这种局面，聂荣臻令杨成武对涞源之敌“暂采取监视手段，集中主力以猛烈迅速之动作，扫清涞源周围各点，然后再集结主力夺取涞源。因此，令一团暂停止对涞源之强攻，以一个营并附炮兵，配合原攻击三甲村之二团部队，坚决夺取三甲村，其他各部均仍依照原来计划。”③调整部署之后，我八路军一团、二团对三甲村发起猛攻，全歼据点日军。与此同时，三团也对东团堡、上庄发起了激烈顽强的攻势。我军战士冒着日军的枪林弹雨和浓烈的毒气，一夜之间接连发起了六次冲锋，歼敌一部，占领了东团堡外围的全部据点。至 25 日晚，经过我军的反复冲杀，日军支持不住，于东团堡内纵火自尽。

八路军在涞源地区发动进攻以后，日军由张家口及蔚县、涿鹿各据点陆续以小股兵力向涞源方面增援。根据当前形势，晋察冀军区决心按照原定计划，由邓华指挥左翼队第六团、第二十六团，察绥游击支队，和原属右翼队之第一团，转移攻势于灵丘、涞源、广灵地区，右翼队在侧面积极配合。灵丘日军发现八路军动向，随即抽调日军合击八路军二团的部队。因二团预先占领了附近阵地，先后打退了分路合击之敌的多次进攻，激战至黄昏，紧紧咬住了敌人。与此同时，右翼纵队第六团抓住时机在浑源南部与日军展开激战，占领枪风岭据点，歼敌约 30 人。当八路军进一步展开攻击的时候，灵丘、涞源、广灵地区各重要据点的日军，会同大同增援的日军，纷纷向八路军反击。同时，其他方向的日军也在作进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准备。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审时度势，于 10 月 10 日致电各参战部队，决定“放弃全战役之最末期之一步作战计划，立即结束全战役之主力攻势”。当天，晋察冀军区各参战部队撤出战斗，涞灵战役结束。

在晋冀鲁豫军区，根据八路军总部的统一部署，9 月 23 日，八路军一百二十九师以三百八十六旅和决死队第一纵队两个团组成左翼队，以三百八十五旅（附第三十二团）组成右翼队，发动了榆（社）辽（县）战役，向

守备榆辽公路的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展开攻击，目标是摧毁榆社至辽县公路沿线的日伪军据点，并乘机攻取榆社、辽县两城。刘伯承、邓小平决定以左翼队攻取榆社、沿壁、王景三个日伪军据点；以右翼队主力攻取管头、铺上、小岭底等日军据点，一部扼守辽县以西的狼牙山，阻击辽县可能西援的日军；以新编第十旅分布于和辽线上破路袭敌，并打击沿线的日军，牵制出援的日军，阻击昔阳、和顺的日军。9月23日23时，一百二十九师所属各部队同时攻击预定目标。

左翼队接到命令后，决定由陈赓指挥决死第一纵队之第二十五团、第三十八团攻取沿壁和王景，周希汉指挥第三百八十六旅之第七百七十二团和第十六团攻取榆社县城。在陈赓的部署和指挥下，沿壁和王景被我军迅速攻破。而榆社县城的日军在我八路军三次强攻之后，仍然负隅顽抗。第四次攻势中，八路军决定根据刘伯承的指示进行坑道作业。经过一昼夜的努力，八路军战士将坑道挖到日军中心碉堡的底下。在我军三夜两天，四次的强攻之后，日军的碉堡终于被我军炸毁，榆社县城终于被我军攻占，守城的一个中队200余人全部被歼。第一百二十九师专门总结了这次战斗经验，认为“整个的说来，进攻是有严密的组织和动作协同”，特别是“攻坚的最后手段采用了坑道作业是正确的”。[④]在左翼队攻取沿壁、王景、榆社的同时，右翼队第三百八十五旅在陈锡联指挥下，向榆辽公路东段的小岭底、铺上和管头等日军据点攻击。9月28日，我军攻占石匣。同日，和顺、武乡日军分别向辽县、管头增援。刘伯承、邓小平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改变原定攻击辽县的计划，把主力部队转移到红崖头、关地垴地区，准备一举歼灭由武乡东援管头的日军。对和顺南援的日军，八路军则以一部兵力进行牵制。29日夜，我部队占领管头。日军指挥部急忙电令武乡、和顺的日军火速增援。31日晨，辽县日军400余人猛攻狼牙山，遭到八路军第三十二团的坚决阻击。上午10时，日军从侧面突破了狼牙山阵地，沿榆辽公路逼进。和顺日军也集中兵力攻占了塞王镇，向辽县急进。而我八路军久攻之后已经很是疲惫，在此情况下，刘伯承在向八路军总部报告后，令部队撤出战斗。至此，一百二十九师在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榆辽战役以基本达到预期的目的而结束。

在百团大战第二阶段，八路军总部命令一百二十师破击忻（县）宁（武）段同蒲铁路，配合其他部队进行正太路破击战，并规定八路军各参战部队在9月21日统一行动。而实际上，早在百团大战第二阶段命令下达之



前，第一百二十师就制定了破袭忻（县）宁（武）段同蒲路的计划。贺龙、关向应将部队作了如下部署：以第三百五十八旅担任破坏原平镇至宁武间铁路，并袭击轩岗、良庄、东寨等据点；独立第一旅破坏忻县至原平镇间铁路，并相机袭占忻县之奇村、楼板寨等据点；另以晋西北新军工人武装自卫旅之一个团逼近忻县方向警戒，阻敌援兵，独立第二旅破坏宁武至朔县段铁路，并逼近宁武阻敌援兵；新军暂编第一师担任阻击岢岚、五寨之敌，师特务团位于宁化堡，掩护侧后交通；新军决死第二纵队及第三五十九旅之第七百一十七团一部，继续活动于汾离公路、离石至军渡公路和临县、方山以南地区，积极打击日军，严防日军对我后方之袭击；新军决死第四纵队和工卫旅主力活动于太汾公路，积极破击，牵制日军。一百二十师对于同蒲铁路北段的破击，使该地区的交通再度被切断，有力地配合了涞灵、榆辽地区的作战。

与此同时，冀中军区部队一部协同冀南区军民破击沧石路、石德路，另一部袭击北宁路和津浦路。冀中军区主力部队还在10月1日至20日之间，趁日军抽兵加强重要交通线守备的时机，发动了以打开中心区局面为主要目标的任（丘）河（间）大（城）肃（宁）战役。在冀中部队内外线的密切配合下，日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八路军对日军连续40余天的袭击，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扩大了第一阶段的战果。但八路军部队在战斗中的损失也颇为严重。为此，八路军总部于10月初发出命令，基本结束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八路军总部在命令中指出，在此阶段，八路军“在连续克复许多据点中，提高了部队克复据点之信心，锻炼了部队克复据点之艺术。使敌陷入被动地位，各方增援应付我军，现以敌增援过众，我军力量阻挡（相当）疲劳，暂难继续发展。决定第二阶段作战即开始基本上结束，但在某些地区如能继续扩大战果，则应继续作战。”⑤

“百团大战一二阶段取得了伟大胜利，开辟了华北大规模进攻的新纪录，证明了敌人的交通线与据点不是牢不可破的，大大地削弱、沮丧与疲劳了敌人，兴奋了全国，提高了我党、我军地位，打击了投降派，巩固与开拓了根据地，锻炼了党政军民，提高了部队战斗力，保证了秋收秋耕，缴获了许多军需资材。”⑥遭受到打击的日军为了扭转局势，火速调遣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开始向我晋察冀、晋西北等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自此，百团大战转入了第三阶段。

注释：

①《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命令》，1940 年 9 月 16 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编审组，《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 年 7 月版，第 42 页。

②《涞灵战役的攻击部署》，1940 年 9 月 17 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编审组，《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 年 7 月版，第 80 ~ 81 页。

③《晋察冀军区百团大战总结报告》（摘要），1941 年 1 月 26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十六册，1979 年版，第 401 页。

④王政柱：《百团大战始末》，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47 页

⑤《决定第二阶段之作战基本结束》，1940 年 10 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编审组，《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 年 7 月版，第 51 页。

⑥《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结束后部队中应有的解释与准备》，1940 年 10 月 2 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编审组，《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 年 7 月版，第 53 页。



晋察冀军民内外线反扫荡

日军遭到我八路军一连串的严重打击后，深感八路军对其威胁的严重性。为稳定局势，巩固占领区，遂调集重兵，从10月6日起，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报复扫荡，企图消灭我八路军主力、破坏我领导机关、摧毁我敌后抗日根据地，恢复其在华北平原的交通线。于是，扫荡与反扫荡的斗争，便构成了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主要特点。

我军经过40多天的连续战斗后，伤亡减员甚大，且极度疲劳，亟待休整补充。榆辽战役结束后，曾集结主力于洪水、蟠龙一带，准备进行整补。地方工作也准备由大规模支援战争转向积极恢复生产。然而这些工作还未及进行，即不得不投入大规模的反敌报复扫荡作战。在日军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采取空前毁灭政策的形势下，八路军总部下达了反扫荡作战命令，要求各根据地党政军民密切配合，实行空室清野，坚决歼灭敌一至二路，并分散部分主力部队协同地方游击队、民兵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彻底粉碎敌人之报复扫荡。于是，全体八路军指战员不顾连续作战的疲劳和战斗减员，英勇地投入到了反扫荡作战中。

从10月6日起，日军首先从太行区开始，逐次及于太岳区、晋察冀、晋西北等地区，对敌后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报复性扫荡。10月13日，日军驻蒙军第一军、第一百一十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临时混成第一百零一旅团各一部和部分伪军共万余人，分十路由晋东南与平西向晋察冀根据地进攻，重点对斋堂和三坡地区进行合击。平西地区八路军协同游击队、民兵，以内外线相结合的广泛游击战，歼敌190余人，至27日，扫荡之敌撤退。然而日军仍留有相当多的兵力和据点，并在扫荡途中对根据地大肆进行烧杀抢掠，使平西根据地开始进入困难时期。10月14日，聂荣臻等向晋察冀军区各部队发出夹击扫荡平西日军的部署命令，要求八路军以内外夹攻、密切协同、配合作战的方针，击退进犯的日军，粉碎日军的围攻。

聂荣臻在部署命令中提出了内外线配合的部署原则，具体内容包括：

“一、平西主力已处在内线的保持集结于机动位置，至适当时机，选择敌之薄弱部分解决之，主力免于分散；另以得力一部配合地方武装游击队开展广泛积极的游击战，于必要时机主力再分途绕迂敌侧后（外线或内外线的交钳中）。

二、外线积极配合密切协同动作：

（一）平北部队应向平绥线上积极动作。

（二）第一分区第一团全部集结大良岗后，如何（果）情况无大变时，则继续向紫荆关前进，打击敌之侧后（一团不必迂回内线作战）。曾支队在流井镇（易县北）地区，应协同三十二团配合作战（均归肖指挥）。邱支队应极力牵制乌龙之敌，该分区在易、满、徐地区之游击支队，依前电积极行动。

（三）各分区内派出一个连，在内大清河以西、平汉线之涿县高碑店段地区积极配合作战。”①

此时，日军陆续在平汉铁路增兵，由平西退出的日军不甘失败，于11月9日，日军第一百一十师团等部集结于涞（源）易（县）线，会同平汉路沿线完县、唐县、曲阳、定县、行唐、正定等地集结的敌人，分数路对北岳区进行扫荡，合击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阜平。11月9日，涞源、易县、保定等地敌人出动6 000余人，进入第一军分区地区，合击管头、银坊、黄土岭等地；完县、唐县、行唐、定县、正定等地敌人出动七八千人，于13日进入第三军分区地区，向店头、军城等边区腹地推进。军区机关和主力部队及时跳出了敌合围圈。15日，敌人占领阜平后，随后将扫荡转入从内向外的所谓“分区清剿”。

11月10日，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发布《为彻底粉碎日寇“冬季扫荡”告各界同胞书》，号召：“边区各界同胞们，要立即动员起来，迅速完成公粮的动员和储藏工作，以保障边区子弟兵的给养，优秀的壮丁们要准备随时补充部队的缺额，以保障部队的满员，要把一切农具家具粮食和柴草，尽量地收藏起来，敌人到来时，实行彻底的清野空舍，把门窗都堵起来，东西都埋起来，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动员民兵，到处配合主力用土枪土炮刀矛手榴弹，困扰敌人，严防、镇压、肃清汉奸，使他烧不到一根草，抢不到一颗粮，毁坏不到任何东西，找不到一个人带路探消息，饥不得食，渴不得饮，居住不得其所，烧杀不得其暇。面对于我们的子弟兵却要保障其有粮有柴有草有用。要担架有担架，要人则随处有民兵配合服务。这样我们便可以



随时迎接并粉碎敌寇的进攻，让气势汹汹杀来的敌人，阴沉凄惨地搬运着他们的尸灰和脑袋回去。”②

在边区党委的号召下，边区各界民众立即行动起来，迅速地完成公粮的动员和储藏，保证了部队给养，实行彻底的清野空舍，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取得反扫荡作战的胜利。针对日军的企图，边区部队一方面将主力兵团隐蔽于机动位置，以此等待战机，另一方面以一部分兵力散活动，与地方游击队和民兵一起，广泛进行游击战，实行内外线密切配合的方式，疲惫和消耗敌人，连续不断地给日军予以打击。11 月 19 日，我军区部队一部攻克阜平外围的日军据点。20 日，又攻克陈庄，歼敌 1 000 余人。除此之外，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坚持在本区本村，机智勇敢地同日军进行周旋，用土枪、土炮、刀矛、手榴弹打击敌人。敌人来了，就掩护群众上山，敌人一走，立即回村抢救被毁坏的房屋财产。在我边区军民内外线配合的有力打击下，深入边区内地的日军从 11 月 25 日起即开始撤退。但在阜平及王快、党城、灵山地区，日军仍留有 1 000 余人驻守，企图长期盘踞，以分割北岳区。为打破日军之企图，肃清在我根据地内残余之敌人，迫使日军全部撤退，边区军民进一步开展游击活动，到处破坏公路，割电线，袭扰敌人。主力部队则集中摧毁敌人的堡垒，歼灭日军的有生力量。晋察冀军区以主力四个团，从 12 月 13 日开始，发起了阜（平）王（快）战役。战役中，我军时而集中，时而分队，机动灵活地打击扫荡之敌，迫使其于 1941 年 1 月初全部撤退。11 月 28 日，边区部队在唐河之歧潭庄歼灭日军指挥官以下 180 余名。③29 日，攻克王林口日军据点，歼敌 40 余名。30 日，在黑山关附近歼敌 120 余名。北岳区反扫荡从 11 月 9 日开始，持续 55 天。日军企图用反复、连续的合击和疯狂的烧杀来挫伤八路军主力的斗志，摧毁抗日根据地。但是，八路军同广大人民一起，积极开展游击战，终于粉碎了日军的疯狂扫荡。

同时，日军对冀中区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报复行动。10 月 24 日，日军在冀中的蠡县、安国、博野地区屠杀民众 800 多人，屠杀政府工作人员 200 多人。27 日，日军又在赵晖、郭家庄屠杀民众 2 200 多人，屠杀政府工作人员数百人。④日军开始扫荡晋察冀根据地后，对于被破坏的公路、铁路及据点开始进行迅速的修复，以此重新建立对华北平原的控制。日军在冀中到处强抓民夫，修复公路，填平道沟，恢复一些地区的据点和堡垒，并竭尽“华北交通公司”的全部力量抢修石德路，企图在 11 月下旬接轨通车。冀中区

军民为了配合平汉路西山区根据地的斗争，并破坏日军修通石德路的计划，粉碎敌人对冀中平原的点线分割政策，于11月15日夜开始，向日军发起进攻。到11月26日，冀中八路军与日军作战60余次，毙伤俘敌人1 100多人，争取伪军反正121名。参加破路群众达7.7万多人，共毁坏铁路10公里，公路240多公里，[5]并摧毁了多处铁路和车站设备，使日军修复石德路的工程又遭到破坏，恢复起来的据点重新被拔除。从12月7日起，冀中部队又把作战重点转向平汉路。冀中军民的积极作战，沉重打击了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山区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

此外，在晋冀鲁豫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太行区、太岳区，在晋西北、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日军与我军均有局部扫荡与反扫荡战争多起。在扫荡初期，由于根据地军民对此次报复性扫荡认识不足，缺乏思想准备，在反扫荡斗争中出现过某些被动局面，给反扫荡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是我根据地抗日军民在反扫荡作战中，及时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坚持以灵活多变的战术，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在我抗日军民顽强斗争之下，均取得反扫荡的最后胜利。

至1940年12月5日，日军的报复性扫荡被粉碎。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至此也宣告结束。

注释：

①《夹击扫荡平西敌之部署》，1940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编审组，《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91页。

②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北省档案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436页。

③④⑤谢忠厚，肖银成：《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改革出版社，1992年版，第292页。



百团大战辉煌战绩与历史评价

百团大战，原名大破袭战役，后来由于参战部队达到105个团，故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从8月20日起至12月6日止，历时三个半月，大小战斗共1 824次，共歼灭日伪军20 645名，伤5 155名，生俘日军218名，伪军1 471名，收复县城45座，最后得到巩固的仍有26个以上。这次破袭行动严重地破坏了日军的交通干线，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 500多公里，桥梁、隧洞和火车站260多处，致使正太、平汉路处于瘫痪，摧毁了大量的敌堡和据点，缴获了各种炮53门，枪支5 900多支和众多军用物资。百团大战中我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据当时八路军总部给国民党当局呈报的数字看，我军阵亡官兵有5 890名，受伤11 709名，中毒官兵有21 182名，由于我军主动出袭，采取夜袭、奇袭的办法使敌人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主动权掌握在我军之手，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八路军战士绝大部分是刚刚武装起来的农民，从敌人手中夺取枪支弹药，与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者斗争，以较小的代价换取了较大的胜利，创造出如此战绩实属不易，令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对八路军刮目相看，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具有战略性质的进攻战役，具有很强的主动性，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持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正如彭德怀所指出的：“在敌后方进行主动的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百团大战还是第一次”，“我军完全处于主动的地位”，“这一战役进攻，在华北抗日历史上是空前的，在全国抗战历史上亦甚少见。”①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中发动的对日军最大一次战役，此次战役沉重打击了日军侵华的嚣张气焰，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巩固和发展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乃至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有着重大影响。

第一，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和“以战养战”的阴谋，粉碎了敌人“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梦想。

1940年夏，日本趁德军在欧洲迅速推进，英美无力东顾之机，在加紧诱迫国民党投降的同时，加强了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肃正”讨伐——实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之以封锁沟、封锁墙，对敌后抗日根据地构成网状包围圈的“囚笼政策”，用“清乡”、“蚕食”、“扫荡”三种方法，企图将八路军一举歼灭。这使抗日根据地形势日趋严重。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和克服国民党投降危险，八路军对华北敌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作战。

百团大战的战果是日军也承认的，日军华北司令部称之为“挖心战”。[②]华北方面军在作战记录中供认不讳：“此次奇袭，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间和巨款方能恢复。”[③]大本营陆军作战科长服部惊呼：“对华作战已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④]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多田骏因此而被撤职。日本众议员微中利一撰文说：“要想消灭中共军，则必须依靠百年战争方能解决。”[⑤]这无异于公开承认“迅速解决中国事变”阴谋已经破产。百团大战后，敌军被迫从已经集结准备发动新的战略进攻的部队中，抽调了两个师团到华北战场，进攻抗日根据地。正如彭德怀在关于百团大战的谈话中所说：“这一战役进攻的胜利，将为华北创造出一个新的局势，而这个新局势将更多地牵制敌人兵力，阻滞敌人向我大后方进行正面的进攻。”[⑥]这样，敌人的战略进攻计划就破产了。

百团大战的胜利，不仅牵制了敌人对正面战场的进攻，沉重地打击了日军“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经济政策，而且粉碎了日军在军事上的所谓“囚笼政策”。正如朱德同志指出的，“敌人对抗日根据地采取了封锁政策、囚笼政策，它沿铁路公路修碉堡，希望把八路军这只老虎囚在里面不能出来。我们有多少根据地，它就筑多少囚笼，企图来围困消灭我们。但我们仍有办法，这就是百团大战。”[⑦]

第二，百团大战的胜利，提高了全国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粉碎了蒋介石的投降阴谋。

1940年，日本借助德、意的支持和利用“远东慕尼黑”阴谋，一面对国民党加紧政治诱降，在香港进行所谓“和平”谈判。一面又对国民党施加军事压力，攻襄阳，占宜昌，炸重庆，双管齐下，妄图迫使国民党政府尽快投降达到它“以华制华”，破坏中国抗日战争的目的。因此，在国统区的大后方笼罩着浓厚的失败主义乌云，国民党政府妥协空气和反共声浪一日高于一日，投降危险空前加重。



在这种情形之下，百团大战对解放区人民的振奋是不必说的。当时，各根据地纷纷举行庆祝百团大战胜利的大会，我党的主要报刊，如《新华日报》、《新中华报》等，大量刊登欢庆百团大战胜利的报道和各界群众的贺信，日必数封。同时，百团大战的胜利，在国统区也被一致称赞，重庆《大公报》、《新蜀报》、《新民报》、《力报》、《国民公报》等报刊竞相刊载百团大战的战绩，发表社论赞扬华北敌后的胜利。重庆《力报》专题社评中说：“我们认为华北胜利是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的。华北我军出击之日，正是敌机 170 架狂炸我陪都，市区大火，精华悉付一炬之时。我军以胜利的出击回答敌寇之残暴兽行，为被难同胞雪恨……华北胜利粉碎了敌寇这种阴谋，坚定了全国的抗战意志，而使一般动摇妥协分子无以其逞。”⑧《国民公报》也指出：百团大战“使一切悲观、失望、动摇、妥协心理的谬误，都被充分暴露出来，从此抗战必胜，更加不容有丝毫的怀疑。”⑨大后方的群众反应更是热烈，成都有一位叫于泽霖的写信给《新华日报》说：“捷报传来，足以振奋全国同胞，鼓励全国军人，对坚持抗战不啻一兴奋剂，而对敌伪谣言攻势，妥协投降与阴谋活动，以及那些对抗战前途抱悲观情绪者，正是一当头棒喝。我所以兴奋万分而致流下热泪者，原因就在此。”大后方群众还掀起了支援八路军的热潮，自发去八路军办事处赠送慰问品和感谢信。

百团大战后，蒋介石被迫于 1940 年底中断了对日和谈。至此，日本政治诱降的阴谋彻底破产。蒋介石对日态度的改变，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国内国际的，然而，百团大战在政治上的巨大影响，无疑对避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和一次全国性大内战的发生有着重大积极意义，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第三，百团大战粉碎了国民党顽固势力的造谣污蔑，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威望，巩固了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

从抗战全面爆发到百团大战前的三年里，共产党坚持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共毙伤日军 129 400 余人，收复县城 150 座，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 50 万人，创建了十多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取得了巨大胜利。而国民党顽固势力为掩饰其大溃退的形势，对中国共产党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1940 年初，国民党高级将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甚至公开发表讲话，污蔑八路军“游而不击”，延安的军医院里“没有一个伤兵”等。国民党的报纸舆论也大肆攻击污蔑八路军。以至于一部分人对八路军产生怀疑，造成了统一战线的内部混乱。

百团大战的辉煌战绩，以铁的事实证实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功绩。蒋介石在嘉奖电中说："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10]甚至，日本陆相东条英机在1941年对议会所作的军事总结报告中也承认："昭和十五年度（即1940年），重庆敌军抗战之特色为作战之非常消极，迄未进行主动的反攻，只有共产军于去年8月在华北举行大规模的出击。"百团大战的胜利，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中共是民族利益的代表，八路军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共产党八路军的声威因之而大大提高。百团大战刚刚结束，在1941年1月6日，蒋介石就发动了皖南事变，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联合严厉谴责蒋介石的反共活动，沈钧儒、邹韬奋、黄炎培等人组织了"民主政团同盟"。这说明，进步和中间民主势力已经不对蒋介石政府抱有任何幻想，共产党得到了民主人士的一致支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百团大战的巨大政治作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直接影响了整个抗日战争的局面，同时也影响了抗日胜利后国共两党的关系以及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第四，百团大战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提高了八路军的战斗力，为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百团大战是根据地，国统区，敌占区军、政、民共同奋斗的一曲胜利凯歌，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在这次战役中，20余万八路军指战员，上百万民兵，上百万群众协同作战，配合默契，破路与战斗配合，袭击与打援并用，在长达5 000里的战线上，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进攻战，实为我国抗战以来的巨大创举。参战的八路军兵团在这场异常激烈的战斗与艰苦的破坏作业中，得到了最好的锻炼，使八路军的战斗力更加提高起来。同时，百团大战在作战指挥及实战方面也取得了成功经验，在战术上，实现了八路军、新四军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作战史上极其宝贵的财富。

综上所述，百团大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同时，百团大战也难免带来一些不利影响，它过早地暴露了八路军在华北的兵力部署和总体实力，引起了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惊慌，致使日军随之将华北兵力的主力从对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争转到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上，发动了数次大规模的扫荡；也使得国民党将中心任务从前期的抗日转入反共，形成了新的反共高潮；造成了长达近两年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严重困难时期。在这个困难时期，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大大减小，人口大大减少，作战兵力大大降低，财



政收入大大滑坡。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一方面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政治、军事斗争，另一方面继续展开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的斗争，并在根据地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生产自救运动，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中，继续坚持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总体来说，百团大战是当时形势下一场伟大的抗日政治行动，它的胜利不仅在于军事上的伟大胜利，更在于政治上的伟大胜利，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注释：

①《彭德怀对新华社记者谈话》，1940 年 8 月 31 日，《八路军政军杂志》第 1 卷第 9 期。

②③④（日）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280 页，第 296 页，第 359 页。

⑤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 218 页。

⑥何理：《百团大战史料》，人民出版社，1984 年 5 月版，第 257 页。

⑦《朱德在延安庆祝大会上的讲话》，转引自金春明，《百团大战》，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 42 页。

⑧《力报》社评，1940 年 9 月 12 日。

⑨《国民公论》第 4 卷 3 期，第 99 页。

⑩郭化若：《论百团大战及其胜利》，《军政》第 2 卷第 10 期。

抗日根据地反击日军的扫荡、“清乡”与“蚕食”

随着我军在百团大战中的节节胜利，我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迅猛发展，收复了许多被日军占领的地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相继扩大，有力地钳制和歼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侵华日军在华北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这使得日本侵略者不得不重新认识深入敌后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民，重新思考对其发动和扩大侵略战争的威胁程度。加之太平洋爆发后，日本提出了“完成大东亚兵站基地，建立华北参战体制”的方针，竭力想把中国华北沦陷区变成它太平洋战争中的“兵站基地”和稳定的后方。由于以上原因，日军抽调了60% ~70%的侵华兵力，采取“治安强化”、扫荡、“蚕食”、“清乡”等战略战术，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凶残的进攻。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日军针锋相对，开展了积极的反击斗争，以此坚持我军的敌后抗战工作。

日军按其既定政策，首先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展开了残酷的扫荡。在华北，日军将“清乡”、“蚕食”和扫荡有机地结合起来，推行抗日强化运动，以消灭其抗日力量。根据所谓“治安强化运动”的方针，日军把整个华北地区划分为“治安区”、“准治安区”、“非治安区”，分别对各区采取不同的办法实行控制和进攻。对“治安区”，即敌占区，日军侧重于“清乡”，建立保安队、警备队、治安军等伪军和伪政权，强化保甲制度，厉行大编乡，清查户口，立门牌，发“良民证”，推行“爱护村民连坐法”。对“准治安区”，即游击区，日军以“蚕食”为主，采取怀柔政策和恐怖政策并用、特务与武装相结合的办法，步步逼近，威胁人民“接头”、“维持”，建立伪政权。日军实行“绝缘政策”，强迫“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此外，日军还大修公路，在交通线两侧普遍掘沟，筑墙，修建碉堡，作为他们进行“蚕食”的依托，以推广其占领区，封锁抗日根据地。在“非治安区”，即



解放区，日军着重实行军事扫荡，并实行“三光”政策，企图彻底摧毁解放区军民的生存条件，消灭一切抗日武装，铲除抗日根据地。

日军对根据地扫荡的方式，由短促的扫荡、“突击”转为长期的“清剿”、“驻剿”，由分散的扫荡转为集中优势兵力的扫荡，由长驱直入的线式扫荡转为步步为营的纵深扫荡。其战术特点表现为所谓“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等。从1941年至1942年，日军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频繁的大扫荡，千人以上的扫荡达174次，较前两年增加了2/3；使用兵力达83万余人，较前两年增加一倍；扫荡的时间也延长了，有时竟达三个多月之久。[①] 日军扫荡的残忍程度令人毛骨悚然。日本军事指挥机关曾向参加山西作战的军队下达命令：“这次作战的目的，与过去完全相异，乃是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八路军根据地内的人民。因此，凡是敌人区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运输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并要一律埋死或投入毒药。”[②] 日军的疯狂扫荡、“蚕食”、“清乡”使敌后抗日力量受到严重威胁。由于日军的公路线网、碉堡据点和封锁沟墙的大大增加，一些抗日根据地程度不同地受到分割封锁，根据地变成了游击区，游击区变成了敌占区，导致我敌后抗日根据地遭遇到极大的困难。

面对华北日益严重的状况，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打破日顽夹击、战胜困难的方针和政策，于1941年1月6日和2月26日先后发出对日军作战的指示，要求各区八路军要广泛进行交通破袭战，打破日军的分割封锁，随时进入反扫荡的战斗状态；大力开展政治攻势，争取与瓦解日伪军，削弱日军的力量；利用战斗间隙，加紧整训部队，提高战斗力；尽一切办法和一切努力积蓄力量；全面加强根据地建设，大力发展地方武装，以利于坚持华北抗战。6月21日，为了粉碎日军在我华北的扫荡，八路军总部发出了《注意侦察敌情加强作战准备》的命令。命令中指出：“敌人有可能以‘扫荡’中条山的经验，运用到我各个根据地来，以集中优势兵力分区“清剿”，企图澈（彻）底歼灭我军。自从铣日起，敌集中近四万人向我冀东盘山之狭小山岳地区围攻，迄今仍未终止，我损失甚大，此即为敌毒计之一，应引起我各部严重注意”，“各部应速侦察该区四面各据点敌调动情形、兵力（并派得力干部查明报告本部），以后应经常注意侦察敌人动态”，“敌人果然施展其毒计，集中极优势兵力向我某一地区进攻时，该区之部队应尽一切方法取得外围之配合，同时加强技术的

装备，多制地雷（等）炸车毁路器具。只有如此，才不致被各个击破。”[③]

在晋察冀边区，日本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于1941年8月集结七万余兵力，向北岳区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扫荡。日军首先在晋东北与冀西交界处的高山上，建起了一条南北500里长的封锁线，并在边区周围大力筑公路，建据点，挖沟渠，包围边区，并采取“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马蹄形堡垒线”、“点鳞式包围阵”战法，兵分多路对我晋察冀边区实行“三光”政策。边区八路军在聂荣臻等的指挥下奋起抗击，进行大小战斗800余次，迫使日军的主力于9月开始撤退。随后我边区主力攻占阜平，日军于10月中旬全部撤退，我军胜利地击败了日军的大扫荡。

1942年5月1日，日军纠集五万兵力对冀中解放区进行残酷的大扫荡。日军在8 000个村庄、六万平方公里的地面上，密布1 500个据点，一万里网状公路，经常用700辆巡逻汽车，进行所谓“拉网大扫荡”，妄图消灭我主力部队。在“扫荡”中，日军利用施放毒气等残忍手段，血洗村庄，惨不忍睹。冀中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了战略转移，并以一部分主力配合地方游击队坚持斗争。其中宋庄一役，我八路军创造了以两个连歼灭日军坂垣旅团长以下1 200余人的奇迹。在两个月的反扫荡中，冀中军民作战270多次，歼敌一万余人，粉碎了日军对冀中平原的扫荡。在此次反扫荡中，《解放日报》还专门发了《保卫冀中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社论，号召边区军民动员起来，用洋枪、土炮、手榴弹保卫自己的土地房屋，“主动袭敌”，要用“麻雀战疲劳敌人，扰乱敌人，用地雷战使敌人寸步不敢移动”。[④]此后，边区军民运用1941年反扫荡的经验，创造了“三击”（迎击、侧击、尾击）和三速（速战、速决、速撤）的火力急袭战术，有效地打击了日军。

在晋冀鲁豫边区，1941年和1942年中，日军扫荡达500多次，其中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19次。从9月22日至10月18日，日军集中兵力，以2.3万兵力，向太岳区进行大“扫荡”。由于八路军采取以小部与敌接触，避免主力与敌拼消耗，分遣作战，广泛开展游击性活动，内外线积极配合的反扫荡作战方针，常常使日军合围扑空。日军往返清剿合击、围歼八路军主力的企图失败后，乃于13日开始撤退。10月底，日军又将扫荡中心移到太行区，采用所谓“捕捉奇袭”的战术，妄图捕歼八路军首脑机关，摧毁八路军军工建设。在晋冀鲁豫根据地军民的英勇抗击下，屡次粉碎了日军的扫荡阴谋，巩固了根据地。在此次反扫荡斗争中，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率部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附近与日军的激战中不幸壮烈牺牲。



在华中和华南，为了肃清日占区内的抗战势力，日伪军实行“清乡运动”，企图由梅花式的点线占领扩张为全地区的面的占领，从而扩大和巩固其殖民统治。其特点是强调实行“以华制华”的政策，推动汪伪出面主持“清乡”。皖南事变后，日军把在华北用的扫荡、“蚕食”办法，也同样用于华中根据地来对付新四军。日军对华中根据地的扫荡，重点是苏中和苏北解放区；对苏南解放区重点进行了“清乡”运动；同时，对华中其他解放区也加强了扫荡、“蚕食”和“清乡”等活动。1941 年～1942 年，华中根据地军民在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的领导下，广泛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斗争，并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华南的解放区，中共的地方组织在敌占区迅速建立起了游击队，对日开展游击战争。1941 年，东江人民抗日游击纵队成立，于广九两侧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抗日军民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一场空前激烈的、广大的人民游击战争，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据不完全统计，1941 年 7 月 7 日至 1942 年 7 月 7 日，八路军、新四军共作战 14 000 余次，平均每天作战 40 次，毙、伤、俘日伪军 13 万余人。在抗战的第六年，共作战 27 000 余次，平均每天作战 75 次，毙、伤、俘日伪军约 20 万人。”[5]这一胜利，粉碎了日本侵略者的“扫荡”，“蚕食”和“清乡”政策，坚持了解放区的抗战斗争，虽然我军有的抗日根据地相对缩小，八路军、新四军的人数也相对减少，但终于顶住了敌人的扫荡，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从而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使人民武装力量得以在 1943 年后迅速恢复和发展。

注释：

①谢远学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纪实第四部铁血河山》中卷，人民出版社，第 635 页。

②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 45 页。

③军事科学院《左权军事文选》编辑组编：《左权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 年 3 月第 1 版，第 696～697 页。

④《保卫冀中坚持平原游击战争》，《解放日报》5 月 24 日社论，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冀中武装斗争》（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 年 1 月版，第 59 页。

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政治部宣传部编：《军史集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 7 月第 1 版，第 119 页。

活跃在白洋淀水上的“雁翎队”

白洋淀是一个大型淡水湖，位于冀中平原的雄县、高阳、任丘和新安县境内，由近100个大小湖泊组成，方圆366平方公里。它连接着大青河和海河，是天津走水路到达保定的必经之地。

抗日战争打响后，日本侵略者也意识到了白洋淀的重要性。1938年日军侵入白洋淀，在赵北口和同口等地设置据点。日军倚仗汽艇艇身坚固、速度快的优势，在淀内横冲直撞，撞翻渔船，损坏荷花，连鱼鹰也不放过。白洋淀周围46个村庄惨遭侵略者烧杀掠抢，素有“鱼米之乡”[①]之称的白洋淀，在日军的肆意破坏下，面目全非。群众不但遭受物质损失，还遭到杀害。例如在端村，日军一次就杀害群众200余人。群众生活艰难，被迫以野菜充饥度日。然而，日军的残暴并不能使白洋淀人屈服。他们在八路军的领导下，抗日斗争情绪高涨，纷纷组织抗日武装，充分利用水淀的有利地形，开展水上游击战争。在这些队伍中，雁翎队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支。

要说雁翎队的建立，还得从安新县三区的抗日斗争谈起。

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安新县成立了县大队，在3区成立了3小队，郑少臣任队长。3小队刚成立之初，只有20多名民兵，十几副打野鸭的大抬杆（土枪）。大抬杆是白洋淀一带土制武器中杀伤力最大的一种，它的枪杆长约一丈，装满炸药、铁砂，射程很远。不久，20多名民兵就拥有了20只小船，几乎每人一船，他们自幼在白洋淀长大，熟稔水性，驾船如飞，对白洋淀里复杂的水港河岔，了如指掌。他们个个又都与日本侵略者有血泪深仇，所以战斗意志尤为坚决。

1939年秋，民兵们侦知赵北口据点的20多个日本兵将乘一条汽船到安新据点。摸清情况后，他们埋伏在下张庄和下赵庄之间的芦苇塘里，这是敌人的必经之路，待其进入包围圈，十几副大抬杆齐开火，敌人惊慌失措，汽船翻了身，20多个鬼子都落入湖底，除一人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灭，还缴获20多支步枪，一挺机枪。当他们得胜回村时，寨南村全村村民出村欢



迎。乡亲们看到返回的十几条木船排成人字形，仿佛大雁在空中飞行时排成的队形，便亲切地把游击队称作“雁翎队”。[②]

不久，上级正式授予安新3小队以“雁翎队”的称号。

关于“雁翎队”这一称谓的来源，还有一种说法。水上游击队成立后，使用的是火枪，为防止枪上的药孔被水打湿，队员们常在信口（点火处）插上一根雁翎，所以县委书记侯卓夫命名它为“雁翎队”。[③]

雁翎队连战连捷，使得日伪当局十分恼火。1941年3月，驻新安县的日军头目龟本为了报复，从天津、保定等地调集了130多只汽艇，配合步兵、骑兵，扬言要对白洋淀进行水陆联合大扫荡。日伪在白洋淀周围修建大量岗楼，在各村建立伪基层政权，派汽船在淀里反复巡逻，气焰嚣张，不可一世。[④]

面对严峻的形势，雁翎队不与敌人作正面交锋，而是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不断给扫荡的敌人以狠狠打击。5月的一天，侦察员田振江、赵波侦知新安据点的20多名日军和30多名伪军乘两只巡逻艇到赵北口据点，下午返回。经过区委研究后决定，派雁翎队和3小队在大张庄和王家寨之间的芦苇丛中打伏击。下午3点钟，敌船驶入包围圈，大抬杆、排子枪、手榴弹一起向敌人开火。战后清点战果，日伪共伤亡20余人，日军小队长下太郎被当场打死，而我军无一人伤亡。我军及时撤出作战区域，使得敌人从赵北口、新安赶来支援的近百艘汽船，枪炮齐发，企图报复，却找不到目标。龟本奇怪地说：“难道这些八路入地了？”[⑤]

随后，根据冀中区党委的指示，雁翎队与3小队合编成立新的3小队，郑少臣任队长，魏泽民任指导员。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雁翎队在战斗中经受住了考验，并不断壮大，不久便拥有战斗人员180余人，战船50多只，火枪也逐渐被淘汰，换成了更先进的三八大盖。

1940年，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百团大战”，取得了辉煌的战果，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大大鼓舞了处于抗战低谷的全国人民。日军十分惊恐，转而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进攻，并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给根据地军民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此，党中央先后提出了精兵简政、发展生产、整风运动、三三制等举措。

为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冀中军区党委、新安县委于1944年10月对全县抗日武装进行缩编、整顿。3小队和雁翎队合编成15人的部队，其余一部分划归县大队，一部分回家种田，发展生产。合编后的队伍统一名

称为3小队，不过由于小队的主体部分是雁翎队员，加上“雁翎队”的名号远近闻名，所以人们习惯上仍称其为“雁翎队”。这时的队长仍是郑少臣，指导员是魏泽民，文书是张杰，侦察员是赵波、田振江，队员是胡宝善等。此时的雁翎队规模较小，但是更精干，行动灵活，战斗力有了很大提升，而且由于人少，目标也就很小，适应了反扫荡斗争的形势。

由于日军的扫荡，白洋淀军民的生活很艰苦，人们缺吃少穿，四处流离。据统计，在最困难的1942年，仅王家寨、端村、圈头等12个村，就有逃荒者2 100余户，家破人散者490余户，因缺少食物饿死、缺少取暖措施冻死的多达393人。[⑥]严峻的形势并没有使白洋淀人民倒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他们更加坚定信心，继续斗争下去。

1941年冬，三区区委决定突袭赵北口，占领敌伪合作社，补充军民的生活必需品。某日夜间，郑少臣带领雁翎队员，静悄悄地行进，突然闯入伪合作社主任家中，强令其打开仓库，雁翎队队员们将火柴、食盐、煤油等日用品取走。

1942年3月，日本侵略者将驻扎在新安县的部队进行整顿。5月，开始新一轮的扫荡。日本人将白洋淀周边村庄合并为一个大乡，伪乡政府设在王家寨，指派汉奸朱玉其为乡长，田廷贵为副乡长。这样一来，为日军控制白洋淀地区提供了方便。为了改变这一不利局面，上级决定除掉朱玉其，摧垮伪乡政权。一天晚上，雁翎队队长郑少臣带领队员，悄悄进入朱玉其家，将朱玉其和田廷贵抓获，朱玉其被当场枪毙，田廷贵罪行较轻，经过教育后释放。这一举措使敌人闻风丧胆，使广大民众欢呼雀跃。敌伪人员从此不敢再过于嚣张，有些人甚至还私下联系雁翎队，表示不再干坏事，并及时提供情报，为抗日部队提供了不少方便。

1942年冬，在上级指导下，雁翎队除掉了伪军中队长韩恩茶、伪军参谋曹茂林、伪军副官冯德新三个死硬派汉奸，对伪军产生相当震撼。

1943年是战果全面开花的一年。上半年，雁翎队与其他抗日武装一起合作，攻占了30多个据点和岗楼，日军再也不敢把兵力分散开，龟缩于新安和赵北口两个据点，其余据点全部交给伪军把守，而伪军在我党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也产生了分化，作战意志全无，并且时常出现开小差、投诚的现象。雁翎队的成员乘机扩大到100余人。白洋淀的敌我形势发生逆转。

日本侵略者不甘心被动挨打，为强化对伪军的控制，撤除了邸庄、大田



庄、寨南村等多个据点，把仅剩的70多个伪兵集中到大淀头岗楼里，由伪军中队长胡风才指挥。为了不给日军以喘息的时间，区委决定派雁翎队攻占这个碉楼。1943年8月的一个夜晚，雁翎队突出奇兵，没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大淀头岗楼，将包括伪军中队长胡风才在内的158名敌人全部俘获，缴获步枪130多支、手枪两支、子弹20多箱。[⑦]

1943年9月，日军为支援其对太行山根据地的秋季大扫荡，雇了有100多只货船的运输队，在天津装上枪支、弹药等军事物资，由伪军河防大队和部分鬼子护送，利用大清河、白洋淀水上运输线，把军事物资源源不断地从天津运送到保定。区委决定袭击这支船队，首先派侦查员赵波到赵北口侦查。赵波化装成装卸工，仅用了四天的时间就把敌情摸得一清二楚：押船的是敌人的河防队，共有120余人，另有日军17人。区委根据赵波侦查到的消息，决定打伏击，消灭河防大队。9月14日黎明，雁翎队队员100余人全部出发，埋伏在王家寨东边的横埝苇塘里。运输船队来了，当100多只货船过去后，最后三只押运船进入包围圈。队长郑少臣一声令下，全部队员一齐开火，经过半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河防大队，俘获日军小队长十加三郎和伪军河防大队长秦风祥，缴获步枪100余支，机枪两挺，大批军用物资若干，创造了水上伏击战的范例。雁翎队战士也有三人英勇牺牲。

战后，冀中军区第九分区发来贺电，通报嘉奖了雁翎队全体队员，赵波侦查有功，被评为抗日战斗英雄，并出席了1943年分区召开的英雄大会。

雁翎队乘胜进军，在地下工作者的配合下，先后端掉多个据点。到1944年初，敌人在白洋淀的全部据点被消灭，为解放全部白洋淀地区奠定了牢固的基础。1944年4月，雁翎队在高保公路的板桥一带，成功打了一个伏击。5月后，领导人员参加了整风运动，全体战士参加了大生产运动。1945年6月30日，雁翎队配合主力部队，包围了新安县城，经过两昼夜的激烈战斗，于7月2日解放新安。8月29日，又解放了安州。这两个县城的解放，标志着整个白洋淀地区的完全解放。日本侵略者投降后，雁翎队编入9分区38团，投入到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斗争中来。

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雁翎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成长为一支全国闻名的水上抗日武装力量。他们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利用白洋淀复杂的水文因素和队员们熟悉地形的有利条件，同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先后同日伪进行了大小70余次战斗，歼灭、俘获敌人数百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以及其他军用、民用物资。到1945年初，雁翎队已发展成拥有三个中队、

100多队员的抗日部队。不仅如此，雁翎队还在抗战过程中为上级机关输送了600余名干部、战士，步枪200余支，机枪三挺，以及大量军事物资。这一生动的例子证明了毛泽东关于“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⑧]的著名论断。雁翎队员的水上作战，是冀中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敌后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注释：

①孙月娥，徐伯勇：《敌后神兵、八路军、新四军反“扫荡纪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②高鹏：《敌后游击战》，中国盲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页。

③《人民日报》，2007年3月20日，第2版。

④郭加复等：《抗日战争大事集》，上海社联出版社，1985年版，第239页。

⑤⑥张泽：《白洋淀雁翎队的抗日斗争》，《上饶师专学报》（社），1990年第4~5期。

⑦郎建良，马长仕等：《88岁老民兵英雄孙革忆当年——“淀上神兵”雁翎队》，《中国民兵》第5期。

⑧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敌后武工队战斗在日军心脏

在日军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清乡"、"蚕食"时，我根据地的军民为了扭转反"扫荡"的被动局面，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权，也以部分兵力深入到敌人的后方，广泛开展军事、政治攻势，对伪军、汉奸加以引导或清除，这一部分人民武装力量，后来逐步发展为深入日军心脏地区活动的敌后武装工作队。

早在1942年3月，我军领导人刘伯承在总结了二月反"扫荡"的经验后，提出了敌进我进的战略战术方针。方针指出，必须派遣武装工作队、武装便衣队，不断渗透到敌占区活动，一方面配合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阻止敌人向根据地发展；一方面则鼓动敌占区民众的抗日情绪，领导和帮助他们展开反抓壮丁、反配给制度的斗争，广泛发动和繁殖那里的游击战争，变敌人的后方为我们的后方。[①]这个方针包括了政治、军事等全面对敌斗争的内容，对根据地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具有根本的、全局性的指导意义。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肯定了这一创见，并指示华北的晋西北、冀鲁豫、山东、晋察冀等根据地也照此办理，普遍开展敌后武装工作队的建设工作。

在晋西北，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根据毛泽东"发动群众，搞民兵，搞武装工作队，把日军'挤出去'"的指示，在兴县召开了中共中央晋绥分局高级干部会议，晋绥分局、行署、军区、抗联以及各地委、专署、军分区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结合晋绥地区反"蚕食"的实际情况对根据地的斗争进行了充分讨论。认为"必须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主力军、游击队和民兵相结合，党政军民一齐动员，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种斗争全面配合起来，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一个村一个村地向敌人挤地盘。"会议中指出，武装工作队是全面"挤敌人"的先锋，必须大量扩充与建立。因此会议决定："把开展全面的对敌斗争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主力部队以三分之一的兵力，地方武装以二分之一的兵力，普遍组成武装工作队（武工

队由15个发展为37个），深入敌后开展工作”，“党政军民各级组织，统一于各级党委的领导之下，开展积极的全面的对敌斗争”。[②]指示中还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和规定：在军事上，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采取各种方法把日军“挤出去”；在政治上，大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日伪军和伪政府，肃清汉奸特务；在经济上，坚决打击日军对根据地的掠夺，禁止伪币的流通，加强根据地的生产建设；在思想上，肃清亡国思想、奴隶思想、苟安思想、失败思想，树立民族思想、抗战思想、斗争思想、胜利思想。在我党正确的政策领导下，晋西北地区的武工队由原来的15个增加到37个，此外，还增派了39个主力连和49个游击中队，配合武工队进行对敌斗争。仅在1943年的最初三个月，军区各部队即对敌人进行大小战斗387次，民兵参战222次。在反“维持”斗争中，摧毁伪村政权881个，建立抗日民主村政权555个，使据点敌人活动范围，由一二十公里缩小到2.5公里以内。[③]“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迅速地取得巨大效果，根据地军民对敌斗争由被动转为主动。

晋鲁豫根据地是比较早地派出武装工作队进入敌后活动的地区之一。1942年3月14日，刘伯承、邓小平在给冀南军区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对特别严重的地区，必须依照北方局指示组织武装工作队，深入到敌占区，接敌区，三角区进行工作。这种工作队以五十人为一队，以营特派员为队长，好的县委书记或委员为政委、书记。队长和队员质量要非常优良，都能懂得政策。”[④]此后，刘伯承，邓小平又发出了《武装工作队初次出动到敌占区工作的指示》，派出首批武装工作队。刘伯承要求武工队突出政治进攻，以政策和革命的两面策略对敌人予以出击，并对于武工队的战术战法进行了详尽的讲解：“武工队的战斗应根据政治工作任务的需要与否来决定，不进行任何与之相违背的战斗。战术一般采用避实击虚的奔袭动作，使得敌人措手不及，无法捕捉。在突然与敌人遭遇时，小敌可捕捉击杀，大敌则避开。当敌人来合击时，以麻雀战分遣撤退，但预先应确定第一、第二集合场，便于收拢部队。行动应利用隐蔽地形和昏暗天气，声东击西，神出鬼没，散布谣言，曲折运动，以迷惑敌人。行军不重复一路，宿营、休息不久停一地，即使暂时停止也应在四通八达之处，一切使敌人不意。放警戒不宜过远，以免过早暴露。全部活动必须严守秘密，不露动向，依靠居民作潜伏，通信也极应秘密，不落痕迹。对敌人要特别注意捕击它的侦察与通信机关，使它耳目手足麻痹失知，摸不着我方规律，而利于我方抓住它的弱点进行袭击和合



击。”[5]在刘、邓二人的带领下，晋鲁豫地区的武工队很快在各地组建起来，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太行区、太岳区和冀南区就派出了42支武工队，约1 400余人，打入敌占区内开展对日斗争。由于根据地反攻和武工队的积极斗争，敌占区的形势大为改观。1943年6、7月以后，日伪军开始被迫从一些据点和碉堡撤退。到年底，仅在冀南就逼退和拔除日伪军据点140余处。冀鲁豫第一军分区到年底也恢复和发展了1 147个村庄，并在齐河，茌平、禹城边敌占区开辟出一块纵横六七十里的游击根据地。晋冀鲁豫边区，在1943年一年中，由敌后武工队、小部队积极活动而恢复和发展的根据地面积和人口约占全年恢复和发展根据地总数的五分之二，从此，全区的形势开始改变。[6]

山东的八路军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于1942年初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军事上实行“敌进我进”，普遍组建敌后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开展群众工作，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打击并分化瓦解日伪，配合主力部队粉碎敌人的“扫荡”，打破日军的“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仅1943年初，山东军区和一百一十五师就派出600余人，组建了43个敌后武装工作队，其中就有著名的铁道游击队。为了更有力地开展斗争，罗荣桓提出，要尽量挑选当地人或熟悉当地情况的干部，担任武工队的领导。武工队员要经过特别的军事政治训练，做到既能打仗，又能与汉奸、特务作隐蔽斗争，既能宣传、组织群众，也能对敌人开展政治攻势。武工队插入敌后的方法是，首先建立关系户，取得立足点，造成小部队进行活动的便利条件；然后逐步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地发展。工作上则采取隐蔽斗争的方式，依靠基本群众，广泛团结开明士绅和爱国人士，进而以合法形式与名义，组织秘密的群众抗日斗争。[7]罗荣桓还根据山东根据地敌后的具体条件，提出了“敌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那里去”的“翻边战术”，给予日军极大的打击。在武工队的配合下，山东地区仅1943年一年中，就拔除敌据点342个，解放村庄7 000多个，在伪军组织中建立了1 000多个内线关系。在以后的山东抗日战场上，在坚持边沿游击区和开展敌占区的斗争中，敌后武工队逐步贯彻了“翻边战术”的积极主动的对敌斗争精神，使斗争一步步推进到了日军的心脏地区。

在晋察冀根据地，由于日军对我基本区的“蚕食”和压缩，使我敌后抗日根据地逐渐缩小。聂荣臻针对此情况，在1942年1月召开晋察分局、分区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到敌人侧后去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

会后，晋察冀根据地的一些部队和县游击队纷纷深入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活动，并收到明显效果。9 月 11 日，晋察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在平山县寨北村召开。会议着重总结了反“蚕食”斗争的经验教训，正式提出了敌进我进，向敌后之敌后伸展的方针。特别强调了到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不仅地方部队要这样做，主力部队也要这样做。必须组织大量的游击队，把敌人从面的占领押回据点去，在敌占区建立许多小块的游击根据地，以阻止敌人继续进行面的占领。[⑧]会后，北岳区派出了多支武装工作队，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敌后，在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发动群众，瓦解伪军，捕捉汉奸，摧毁伪政权，组织人民武装力量。在敌人发动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时，敌后武工队袭击了平汉路，正太路，烧毁王京车站上敌人的棉花 20 多万斤。在武工队的打击下，敌人被迫由“逐步蚕食”改为“跃进蚕食”，由全面进攻压缩为重点进攻，使其建立统治区的目的破产。到 1943 年底，北岳区共恢复和发展了 2 000 多个村庄，建立起五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开始扭转 1941 年以来的被动局面。冀中军区军民利用青纱帐和地道与敌人开展灵活的斗争，改变了自“五一大扫荡”以来的困难局面。到 1943 年 6 月，冀中部队在平原作战 400 多次，毙伤日伪军共 4 000 多名，恢复和发展了人民武装力量。[⑨]

敌后武工队是在根据地、敌占区或边沿地区进行隐蔽斗争的有效形式。它立足于边沿游击区（即敌占区与根据地相连接的地区），并逐步深入到敌占区，是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斗争的精悍的武装斗争组织。随着各根据地相继建立起敌后武装工作队，我军在敌后的武装斗争开展得有声有色。武工队在敌占区纵横出没，大显神威，日军惊呼出现了“心腹之患”，不得不抽出部分兵力加以对付，这就直接减轻了根据地的压力，有效地支援了根据地的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斗争。敌后武工队是活跃在敌人心脏的一支轻骑兵，其中的每个武工队员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组织员；既能打仗，又能独立进行各项宣传和动员群众的工作：他们深入到敌占区，以军事斗争同政治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同隐蔽斗争相结合，广泛地向群众开展宣传，揭露敌人，搜集情报，除奸反特，破坏日伪统治秩序，争取并瓦解伪军和伪组织，发展秘密武装，建立两面政权，形成“隐蔽根据地”，把日伪统治的心脏地区变成打击敌人的前沿阵地。敌后武工队在发动群众，惩治汉奸，瓦解敌军，开展敌占区游击战争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注释：

①⑤程蕊：《刘伯承传》，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78 ~ 179 页，第 181 页。

②贾维桢，尚永红，孙海声：《兴县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年版，第 559 页。

③刘秉荣：《贺龙全传》，第 4 册，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 2247 页。

④⑥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 299 页，第 305 页。

⑦李文：《八路军 115 师征战实录》（下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 245 页。

⑧⑨魏宏运，左志远主编：《华北抗日根据地史》，中国档案出版社，1990 年版，第 185 页。

地雷战 地道战 游击战

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制定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的战略方针。七七事变以来，日军侵占了我国黄河以北的华北国土约60万平方公里，铁路3 000公里，县以上城市250余座。日军七个师团14万人守备这一广大地区，如以土地面积计算，每十平方公里仅有日兵2.2人；如全部用来守备城市，每个城则只有650人，不足一个营；如全部用来守备铁路，每公里也仅有47人。[①]兵力不足使得日军只能占据重要的战略据点，控制主要交通线，广大乡村、集镇和一些边远县城则无力掌握，即使某些非常重要的县城也不能顾及。这就在敌人占领区留下了大片空隙，这些空隙地区，便是游击队活动的广阔天地。到日寇占领区去开辟新的作战线，创造敌后战场，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

八路军的游击战争，主要不是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战役作战，而是独立地开辟战场，并且经过长期努力把自己造就成为正规军、运动战，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1937年8月下旬洛川会议时，毛泽东将红军的战略方针原则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所谓独立自主，就是在共同抗日这一统一战略目标下，八路军实行独立自主的指挥。着重于山地，就是着眼山地的有利条件，首先在山区创建根据地，以此作为战略依托，然后向平原发展，所谓游击战，就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游与击结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②]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③]

在此形势下，敌后游击战争全面开展。八路军以山西为中心实行分兵，将正规军转化为游击军，正规战转化为游击战。同时，分遣有力部队组成游击队，实施战略挺进，迅速完成战略展开，逐步建立新的战略支点，创造新



的战略区域，向整个华北扩展。晋察冀根据地，晋察绥根据地，晋冀豫根据地以及晋西吕梁山地根据地相继建立，各种形式的游击战相继展开，给敌人以有力打击。

1938 年 5 月，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重要军事论著，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上考察，从理论上系统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并提出一整套实行游击战的具体作战方针原则，包括：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二、和正规战争相配合；三、建立根据地；四、根据不同战略形势正确指导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五、逐步使游击战向正规战发展；六、实行战略统一指挥下的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④]这些原则使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得到进一步发展完善，对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1937 年 7 月到 1940 年底，是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上升阶段。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伪军越来越加紧了对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疯狂进攻。根据地军民全民参战，同敌人展开了全面的游击战。抗日根据地军民充分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麻雀战、联防战和水上游击等一系列适合平原、山地、河湖的独特作战方法，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其中，地雷战、地道战是各根据地运用最为广泛，给敌人以有力打击的方式。

地雷战始于胶东，并逐渐普及到其他根据地。它是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军民与敌人作战的出色创造。地雷战的兴起和发展，有其客观必然性。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民兵也是全民族抗战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由于当时民兵武器装备极差，枪支少，容易制造的地雷自然就成了民兵打击日军的主要武器。而且，地雷本身也具有较强的杀伤力。同时，地雷战的战术和技术在对敌斗争中不断发展，从单个的地雷发展为连环雷、子母雷。埋设的方法也越来越巧妙。民兵们埋下地雷后，在表土上印上牛羊蹄印或小孩脚印，掀上牲口的粪便，以迷惑敌人。同时，民兵们针对敌人的心理精心选择埋雷地点，以诈对诈，使敌人更难以捉摸。有时民兵们在村口挖一条深沟，阻断交通。预计到敌人大队人马为了过沟，必定要寻找门板，于是民兵们就在就近人家的门下埋设地雷。当敌人去摘除门板时，地雷突然爆炸，把敌人炸死。由于埋雷必须在敌人到达指定区域以前秘密完成，因此，地雷战不能用于对原地驻守之敌的进攻。针对地雷战的这一弱点，根据地军民创造了新

的战术。他们先以各种方法诱敌人离开驻守地，例如让民兵包上花头巾，化妆成走亲戚的小媳妇，把敌人引出来；然后派出“飞行爆炸组”以极迅速的动作把地雷埋在敌人即将到达的地方；当敌人半途中止时，民兵们用步枪射击把敌人逼向布雷区；当地雷爆炸而敌人侥幸未死时，民兵立即抓住敌人惊魂未定的好时机，使用“枪雷结合”战术，彻底消灭敌人。当地雷战发展到成熟阶段时，民兵们能做到边打边埋，随机应变，敌到雷亦到，敌未到雷先到，敌不到“请”敌到，使敌人遭受惨痛的打击。

大泽山区的地雷战便极为著名。从 1938 年开始，这里就开始建立民兵组织进行游击战。起初，民兵只使用上级发下来的地雷打击敌人，后来他们又自己动手制造地雷，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到 1942 年，敌人在军事上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封锁，上级很少能把地雷发下来。于是，民兵们开始用大泽山区满山遍野的石头，制造石雷。民兵经常在敌人必经之路上埋设绊雷，以致敌人不敢走大路，民兵们就在敌人可能走的小路上埋石雷。后敌人专走地堰、田野，有时甚至从河水里走。根据敌人行动的变化，民兵便把石雷设在地堰和田野里，还把拉火管用蜡封起来，把石雷布在河里。同时，在游击战的实践中，民兵逐步创造出石雷的多种用法。从拉雷、绊雷开始，逐步发展到连环雷、子母雷、前踏后响雷、水雷、胶皮雷、竹筒雷和滚雷等 40 余种。

在山东的其他地区，也广泛地开展了地雷战，同样取得了重大成绩，海阳民兵也以地雷战闻名于整个山东。他们根据斗争的需要，创造了十多种地雷和 36 种埋雷、设雷方法，从简单的铁雷、行雷、拉雷、绊雷，发展到复杂多变的飞行雷、马尾雷、防潮雷、子母连环雷、慢性自燃雷，等等；从单一的沿路埋雷，发展到村村设下“地雷宴”，门上挂雷，草堆藏雷，家家有雷，人人会布雷。在抗日战争期间，仅海阳一地，就涌现出“模范爆炸村”三个，民兵“爆炸英雄”、“爆炸大王” 11 名。莱芜县李念林爆炸队，在章丘至雪野的公路上埋设了八个钉子雷，一次炸死炸伤敌人 30 多人。沂南县在 1945 年 5 月的反“扫荡”中，共打死打伤敌人 231 人，其中被地雷杀伤 97 名。在平度东北杏庙村，只有百来户人家，同大田的日伪军据点仅隔一条河，该村的民兵以 500 个地雷摆开地雷阵，与大田之敌隔河对峙，敌人始终不敢进犯。[5]

地道战是抗日战争时期华北平原抗日军民创造的对敌斗争的方式之一，它是在 1938 年，“抗日道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北平、天津、保定等华



北重镇陷入敌手后，平、津、保三角地区成为日本侵略军掠夺的重要目标。为了对付敌人快速部队的进攻，有悠久革命历史的蠡县民众首先挖掘“抗日道沟”，以阻滞敌机械化部队的行动，便利我军的转移。于是，道沟遍布整个平原地区。但道沟是裸露式的，不能隐蔽抗日军队和民众的行动，尤其在1939、1940年，敌人连续对平原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为了对付敌人的突袭，保存自己，蠡县宋家庄等地干部民兵就在自己家里挖了秘密地洞，后来一般群众也仿效了。这种地洞，大小仅能容身，又只有一个出口，既不能作战，又无法转移。群众在实践中逐渐将它改进成为有多处出口的小型地道。后来各家各户联结起来，将地道通向村外的树林、古墓，形成了进可以迅速击敌，退可以秘密转移的地道网。[⑥]随着地道战的经验越来越丰富，地道的结构也越来越完备。地道建成“两层楼”或“三层楼”，当面上的一层地道被敌破坏时，抗日军民可以转移到下面一层的地道中去坚持斗争。为防止敌人灌水、放毒气，地道在转弯处设有木板、泥袋，可以迅速封闭地道，保障洞内军民的安全。为对付敌人的长期扫荡，地道内建有休息室、会议室、仓库、水井，甚至有牲口圈，成为一座地下村庄。

地道在对敌作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42年5月，日军发起了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实行灭绝人寰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冀中清苑县冉庄民兵为了躲避敌人的残害，以十字街为中心，修建地道有东西南北主要干线四条，长2.25千米。南北支线13条，东西支线11条，还有西通东孙庄，东北通姜庄的连村地道，有向东南通隋家坟和河坡的村外地道。地道全长16千米，形成了村村相连，家家相通，能进能退，能攻能守的地道网。冉庄地道战工事还有“三通”和“三交叉”的特点，“三通”就是高房相通，地道相通，堡垒相通；“三交叉”就是明枪眼与暗枪眼交叉，高房火力与地堡火力交叉，墙壁火力与地堡火力交叉。形成了“天地人”三通，构成了房顶和地面、野外和村沿、街道和院内纵横交叉的火力网，组成了一个连环的立体作战阵地。

领导抗日斗争的冀中区党委，很快发现并总结了冉庄人民群众的发明创造，于1942年1月发出文件，明确指出：冀中要开展地道斗争。紧接着，又发出一系列的文件，对挖掘地道的组织领导、技术规模等问题均提出具体要求和指导意见。规模宏大的地下工程就此展开，战争史上闻所未闻的地道战从此诞生。华北平原地区军民先在道路上挖沟，使日军的机械化部队难以行进，而根据地军民的转移却有了掩护。随着环境的恶化，敌后军民在一家

一户所挖的土洞、地窖的基础上，建成户户相通的地道。后来，地道由村内相通，发展成村村相连、能打、能藏、能机动转移的巨大地道网，日军用烟熏水灌，或施放毒气，都无济于事。据统计，冀中根据地地道总长度到1944年底达12 500公里，几乎比万里长城还要多一倍。军民依托地道，人自为战，村自为战，有效地打击敌人，保存自己。地道战从此也中外驰名。[⑦]

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正确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全体根据地军民团结起来，用才智打败了日军的侵略，不仅从政治上瓦解了敌人的士气，同时，也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注释：

①张宏志：《中国抗日游击战争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64页。

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注释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54页。

③《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7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0页。

⑤高鹏：《敌后游击战》，中国盲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

⑥郭加复等主编：《抗日战争大事集》，上海社联出版社，1985年版，第244页。

⑦高鹏：《敌后游击战》，中国盲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页。

为什么开展整风运动

1942年春天，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这次运动着重清算了党内占统治地位的错误思想——“左”倾教条思想及其主要表现形式：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通过这次整风，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为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自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奠定了思想基础；为全党正确有效地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困难，打败日寇，争取全国的解放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这次整风是党的建设史上的重要篇章，其具体开展有着深刻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同国内外反动派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斗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尽管也出现过较大的错误，使党的事业和组织遭受过重大的挫折和损失，但自遵义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较为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同时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党的各级组织和几十万党员，在领导人民同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中国共产党这时并不是已经没有问题了。相反，“还是有问题的，而且就某种意义上讲，问题还相当严重。”[①]也就是，党组织内部还是存在着各种不健康的思想。具体来讲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在中央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路线及其表现形式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尤其是对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全党范围内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根源上加以彻底清算。党内特别是高级干部对党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在思想认识上并不完全一致。1940年3月，王明曾擅自重印并在党内散发他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总纲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顽固地标榜自己“一贯正确”。受王明的影响，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群众思想上出现困惑，具体来讲当时党内的主要问题，集中地表现

为学风上的主观主义、党风上的宗派主义和文风上的党八股。这三种不正确的思想作风，实质上都是主观主义思想作风的具体表现。“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②] “党八股是藏垢纳污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③]这种主观主义作风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对立的。它当时在全党虽然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但却经常在作怪，成为党进行革命斗争的严重障碍。尤其是在某些特殊地区、特殊部门，这三种不正确的思想作风并没有完全肃清，甚至有些地方还很严重地存在着。如果不把这种错误作风彻底清算，它就会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

同时，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中共党的组织大大地发展了，党员的数量也迅速增多起来，大批新党员涌入到党内，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增加了70余万新党员，其中绝大多数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农、贫农）。大批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这在中国是完全正常的、合理的。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他们有很可爱的革命积极性，并愿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但是，他们是带了他们原来的不符合或不太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入党的。”他们过去缺乏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没有受过多少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他们入党以后，由于斗争任务异常繁重紧张，党对他们的教育还很不够，他们的世界观尚未得到根本的改造。这些人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在形式上入了党，而在思想上却往往没有入党。加上他们的出身不同，受教育状况各异，参加党组织的动机有极少数并不是很纯正，因而经常把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带进党内来，成为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滋长的温床。正是因为如此，党内严重地存在着无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世界观与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之间的矛盾，因此，在党内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是十分必要的。

此外，由于艰巨复杂的斗争环境，尤其是面对空前高涨的民族矛盾，虽然党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批判和纠正了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但是中共中央还未来得及对王明的错误从思想上和政治上进行全党范围内根本的清算，他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还经常地妨碍党中央正确的路线、方针及政策的贯彻执行。部分党的高级干部马克思主义水平还不高，对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缺乏鉴别能力，对历史问题的认识还不一致，因此思想上容易受到蒙蔽产生困惑。另外，1941年至1942年两年间，由于日军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再加上华北地区连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中共



领导的根据地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据统计，1941 年～1942 年，“解放区人口由 1 亿下降到 5 000 万人，八路军由 45 万人减少到 30 多万人。”[④]大批军队和地方干部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给我党带来重大损失。为此，中共中央先后制定并切实执行了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十大政策，来解决当时的经济军事困难。而在这十大政策中，又以整风和大生产运动最为重要，这二者的有效实行，关系着其他各项工作的开展，尤其是整风运动，由于它解决的是全党的思想政治问题，因此变得更为重要，是克服边区经济困难，迎接抗战胜利的重要思想保证。综合以上几方面必要因素，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的最终开展不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开展的，它在当时是具备了各种主客观条件的。

当时抗战处于相持阶段，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武装力量已在敌后站稳了脚跟。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的兵力更加分散。虽然战争相当艰苦，但总的局势比较稳定，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也处于相对较为安全的位置，客观上使中国共产党能够集中力量进行党内整风；主观上，经过几年来不断的探索，正确路线在党内占主导地位，而且，自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党内的军事领导地位最终确立，此后，他先后发表了大量的著作，深刻地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批判“左”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为整风运动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毛泽东的具体著作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中共经过 20 年来长期斗争的锻炼，已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核心和大批坚强骨干，很多干部在实际斗争中提高了觉悟，迫切要求澄清党在历史上的路线是非，这些又为整风运动准备了组织条件。各种条件都已经或基本具备了，开展党内整风，提高共产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素养也就势在必然了。

整风运动正式开始前，中国共产党经过了长期的准备工作。在这一过程中，在解决“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和进行组织调整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思想路线的高度，认识了“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军事错误，以期解决政治路线问题。此外，毛泽东在这一阶段，将马列主义著作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反对自由主义》等著作，为延安整风运动进行了初步的准备。

1938 年 9 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会议批评了存在于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倾向，尤其对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进行了严厉批评。此外，为了克服由于王明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毛泽东还在会上号召全党同志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环境结合起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阶段的革命斗争，反对抽象地空谈马列主义的方式方法。他还建议全党开展一个学习竞赛，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会后，全党即掀起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热潮。通过此次会议，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在党内基本得到克服，起到了统一全党思想的作用。

除了在思想理论方面加强学习和提高外，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人还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1941 年 3、4 月间，毛泽东先后为《农村调查》写序言和跋，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因此，“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为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⑤经过毛泽东的这一号召，边区各界的调查研究工作也迅速开展起来，从而为整风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真实的素材，保证了今后整风的顺利有效开展。

经过长时间的准备过程，至 1941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标志高干整风正式开始，到 1942 年 2 月时，高级干部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基本完成，并且基本克服了自身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错误，从而为全党整风的开展完全做好了准备。

注释：

①②③⑤《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811 页，第 825 页，第 827 页，第 790 页，第 791 页。

④房成祥主编，郑生寿，李敬谦，宋易风副主编：《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6 页。

整风运动的方针和“团结——批评——团结”公式

整风运动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也即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这是进行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它不仅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并且使得整个整风运动能顺利展开和进行，并能最终取得良好的效果。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一方针，是毛泽东于 1942 年在全党开始普遍整风时，明确提出来的。1941 年 9 月 10 日至 10 月 22 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统一了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党中央领导所犯错误性质的认识的基础上，决定在全党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思想革命运动，9 月 10 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要求延安的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迅速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斗争，同时提出整风的方针方法：“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①]自实行这一方针方法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过去很少说话的同志都说话了’，犯过错误的同志在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决心改正错误之后，思想上感到‘轻松愉快’了。”[②]10 月 13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又提出：针对此次政治局会议上所讨论的苏维埃后期“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问题，他准备作一个结论草案，提交七中全会。该结论草案中的重要一点，即“这次讨论，要从检讨过去错误中得到经验教训……要采用治病救人的办法。”[③]可以说，毛泽东最后能够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整风方针，正是在总结了此次会议的经验后提出来的。

1942 年 2 月 1 日，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正式提出整风运动的正确方针，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

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所谓“惩前毖后”，是指“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治病救人”是说“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即用团结的方法，辩证的方法解决党内的矛盾，就是对于“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绝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④

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又作了《反对党八股》的讲演，在揭露党八股的“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一条罪状时，进一步提出：党内常常有敌人和敌对思想混进来，“对于这种人，毫无疑义地是应该采用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手段的，因为那些坏人正在利用这种手段对付党，我们如果还对他们宽容，那就会正中坏人的奸计。”但是我们不能用同样的手段去对付我们党内偶然犯错误的同志，“对于这类同志，就须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⑤，也就是要厉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整风方针。从前，我们的党内斗争中，曾发生过“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两种错误斗争倾向，这是错误的，是没有对斗争对象进行具体分析的表现，曾给我党带来很大的危害。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使党的力量遭受重大损失。2月21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文中，再次明确指出，讨论过去的中央路线问题，其“研究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⑥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实施，必须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毛泽东曾经指出，看一个人，决不能看一时一事，而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就是说，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一定要全面地、历史地进行分析。在犯错误的同志中，绝大多数本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过去总还给党和人民做了一些好事。他们虽然犯了这样和那样的错误，但绝大多数愿意改正错误。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只是极少数。”⑦因此，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对待方式。在我党的整风过程中，曾进行过审干运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态度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审干前期，由于受个别人的蒙蔽，以及自身不懂的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正确态度，所以出现了错误的



“抢救失足者运动”，一大批无辜党员干部受到隔离审查，给我党造成了重大损失；审干后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及时发现了这一错误倾向，并适时地提出了审干的九条方针，其中重要的两条，就是在审干过程中要开展“调查研究”，并“分清是非轻重”，也就是要根据犯错误同志的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对他们采取不同的对待措施，以纠正他们的错误思想。另外，毛泽东在审干过程中还着重强调“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充分体现了整风运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一方针。经过及时纠正，审干运动回到正确的轨道。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确立，使得在整风运动中处理各种问题时，尤其是处理对待一些复杂的历史问题方面，就不再是着重于个人的责任问题，而是着重于对当时具体环境的具体分析，从当时错误的内容及其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分析，从而力争达到既要弄清楚思想问题，又要达到团结同志，凝聚人心的目的。所以在整风运动当中，任何鲁莽的态度，非说服教育的方法，都不可能达到实际效果和目的，都是应当绝对禁止的。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在整个整风过程中，基本都坚持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从而保证了整风运动的顺利开展。即使在党的审干过程中，发生过背离这一方针的错误倾向，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妨碍了整风的正常进行。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人及时发现并纠正了这一错误方针和倾向，提出正确的审干方针，使后期的整风运动走上了正确轨道，冤假错案也基本得到及时的甄别平反，保证了整风运动的最终胜利完成。

1945 年 4 月 20 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这样评价毛泽东的这一整风方针：“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全党整风和党史学习中所采取的方针，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正确态度的模范，因而取得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提高并团结全党的伟大成就。”[8]

根据整风运动的这一方针，中共中央还规定了领导整风运动的方法，即：组织党员认真学习规定的马列主义著作和党的文件，领会其精神实质，然后在此基础上，联系实际调查研究，深刻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思想和工作，总结经验教训。在个人反省总结的基础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指出对方思想作风上的错误，并促其改正，最终达到丰富和了解马列主义精神实质及党的历史，解放思想，巩固党内团结的目的，这一切最终为抗日战争的

伟大胜利服务。关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及进行自我反省的整风方法，毛泽东曾在多次的讲话和指示中重点阐述。1943 年 4 月，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草案第三号（关于克服自由主义）中，指出："整风是一个伟大的党的思想斗争，实行此种斗争的武器就是自我批评。有自由主义偏向的人则不愿拿起这个武器，尤其是许多上级与高级干部害怕自我批评，这种现象必须在此次整风中着重地纠正过来。自我批评是马列主义政党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马列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政党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最适用的方法，而在目前则是反对错误思想建立正确作风的最好方法"⑨。10 月 14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报告，进一步指出："马列主义的方法论，自我批评是一条，反对自发论的思想是又一条"，"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内也要发展自我批评，反对一切机会主义思想，以斗争求团结。"⑩1945 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总结到："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⑪那么，我们的思想就会始终保持纯正和先进。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建国后，毛泽东又把它具体化为'团结——批评——团结'这样一个公式，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一方针是完全符合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它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达到增强党的团结的目的。"⑫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此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就谈不上什么党的团结。批评，就是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帮助犯错误的同志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就是惩前毖后。批评是达到新的团结的必要环节，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治病救人，团结同志。实践证明，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今天，仍然是我们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行之有效的方针。

注释：

①③⑨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第 327 页，第 332 页，第 434 页，

第 476 页。

②⑦房成祥主编，郑生寿，李敬谦，宋易风副主编：《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62 页，第 105 页。

④⑤⑧⑪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827 ~ 828 页，第 835 页，第 996 ~ 997 页，第 1096 页。

⑥1942 年 2 月 21 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文；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4 年汇编本），解放军出版社，1986 年版，第 19 页。

⑫宋士昌，衣芳主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114 页。

整风运动的内容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明确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①]之所以整顿三风，是因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而是剥削阶级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如果不加以改造，就会给党带来很大的危害。通过整顿三风，希望达到这样的目的：提高党员对马列主义理论的深刻性认识，并学会用马列主义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在此基础上，全党党员干部通过整风学习，基本纠正自身存在的三风不正现象，思想理论得到提高，使我党达到空前的团结和巩固，为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好充分准备。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全党整风运动的第一个重要任务。早在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就曾针对学习中的主观主义问题作出过深刻论述和分析，1942年，《整顿党的作风》一文又进一步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根据现实的状况和历史的教训，毛泽东将党内长时期以来存在的主观主义学风，正确地概括为两种主要的表现形式，“一种是教条主义，只重理论，轻视实践，把马列主义著作的个别词句奉为教条，单纯地为学习理论而学习理论，不从中国实际出发而生搬硬套，根本不懂得马列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另一种是经验主义，经验是重视了，却又轻视理论，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把狭隘的局部经验当作普遍的真理，不懂得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②]毛泽东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③]和主观主义的错误态度截然相对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态度。“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

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④

为了克服主观主义带来的不利影响，树立正确的学风，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首先着重论述了什么是理论和理论家的问题。他十分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做死的教条，他指出：“我们如果仅仅读了他们的著作，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如果我们身为中国共产党员，却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只能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那么，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成绩就未免太坏了。”⑤所以，毛泽东认为那些只知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结论和个别原理，而不能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不能从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的人，是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应当是“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领会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学说，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⑥所以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是把马列主义书本上的个别词句看成是包医百病的现成的灵丹圣药，而这样做的实际结果是阻碍了理论的发展，给自身和革命都将带来危害。在指出教条主义错误的同时，毛泽东还指出了经验主义的危害，“我们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如果误用了他们的经验，也是要出毛病的。不错，这样的人往往经验很多，这是很宝贵的，但是如果他们就以自己的经验为满足，那也很危险。他们须知自己的知识是偏于感性的或局部的，缺乏理性的知识和普遍的知识，就是说，缺乏理论，他们的知识也是比较地不完全。而要把革命事业做好，没有比较完全的知识是不行的。”⑦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有些人拥有很丰富的实际经验，但如果把这些局部的经验误当成普遍真理，那也将是很危险的，因为他们的知识也是不完全的，所以就很难把革命事业做好，并且还很容易为教条主义所影响。为了反对主观主义，发展马列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

神，应该宣传唯物主义，宣传辩证法。有书本知识的人，要向实际方面发展；有工作经验的人，要认真学习理论，二者应当取长补短，相互补充，相互学习。

毛泽东在阐述主观主义的相关理论的同时，还多次具体分析总结了我党历史上存在的几次错误思想。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9月10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总结了我党过去历史上存在的几次主观主义错误，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六中全会对主观主义做了斗争，但有一部分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在延安的学校中、文化人中，都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现在，延安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8]报告强调指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实行学制的改革，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组织思想方法论的研究组，首先从政治局同志做起。

后来，毛泽东又为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起草了一个书面结论草案，题为《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结论草案指出：王明"左"倾路线在思想方面，犯了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严重错误；在组织方面，则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这种"左"倾错误产生的社会根源，"主要的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中国极其广大的生活痛苦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存在，是我们党内右的、而特别是'左'的错误思想的来源"[9]。《结论草案》是后来著名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最初版本。

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是整风运动的重要任务。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它不仅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也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宗派主义在党内关系上的表现，是只顾局部利益，不顾全体利益，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以至向党闹独立性。"闹这类独立性的人，常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他们在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上，往往是不正确的。他们在口头上虽然也说尊重党，但他们在实际上却把个人放在第



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10]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上，以及几部分军队之间、几个地方和几个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上，也要反对和防止宗派主义的倾向。宗派主义在党外关系上的表现是对党外人士妄自尊大，看不起人家，藐视人家，而不愿尊重人家，不愿了解人家的长处。这种倾向也是完全错误的，"对于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及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11]

为了克服宗派主义，全党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执行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顾全革命的大局，团结起来为共同的目标奋斗。

整风运动的最后一个任务：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必然的表现形式。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曾指出：党八股，"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并不是偶然的东西。"它们不是生动活泼的东西，而是死硬的东西；不是前进的东西，而是后退的东西；不是革命的东西，而是阻碍革命的东西。"这种新八股、新教条，在我们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弄得根深蒂固，使我们今天要进行改造工作还要费很大的气力。"但是，这种错误如果不除去，那么"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而对于老八股和老教条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影响，以及洋八股和洋教条在全国许多人中间的影响，也就不能进行有力的斗争，也就达不到加以摧毁廓清的目的。"[12]

毛泽东具体指出党八股的"八大罪状"[13]。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党八股的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就是在文章和演说中用极端言论来装样子吓人，以达到阻止别人对自己可能的批评的目的。"任何机关做决定，发指示，任何同志写文章，做演说，一概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要靠有用。只有靠了这个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其他都是无益的。"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为

此，我们的所有同志都必须要学习语言，否则文章和演说就会乏然无味。党八股的第五条罪状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就是写文章做演说，不按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而是单单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罗列一大堆没有联系的东西，这其实是“不用脑筋的形式主义的方法”，必须禁止。党八股的第六条罪状：不负责任，到处害人。写文章和做演说是专门用来影响人的，但我们的同志却随随便便，不负责任，经常“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这种现象，必须改正。党八股的第七条罪状是：流毒全党，妨害革命。第八条罪状是：传播出去，祸国殃民。这两点也就是说，“党八股如不改革，如果听其发展下去，其结果之严重，可以闹到很坏的地步。”为此，只有彻底抛弃党八股、新教条，采取生动活泼的马列主义革命原理，革命精神才得以发扬，中国的革命事业才能不断向前推进和取得新的胜利。为此，毛泽东在一个题名为《宣传指南》的小册子中向同志们介绍了四篇文章，建议全党同志以它们为榜样，学会正确的文风。毛泽东还指出了今后文风的发展方向，“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⑭

毛泽东以上关于整顿三风内容的论述，具有深远的意义，他及时向我党同志指出了存在于学风、党风、文风中的错误思想，使广大党员认识到三风不正的危害，为全党同志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整风学习的运动中，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外，毛泽东还在整风的不同阶段，针对不同的情况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方法，从而保证了整风运功的正确发展方向，最终赢得重大胜利。实践证明，“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确实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⑮

注释：

①③④⑤⑥⑦⑩⑪⑫⑬⑭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页，第800页，第801页，第814页，第814页，第818页，第821页，第826页，第832页、第831页、第833页，第833～840页，第844～845页。

②⑮龚古今，唐培吉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1页，第146页。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26~327页。

⑨房成祥主编，郑生寿，李敬谦，宋易风副主编：《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0页。

有声有色的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41 年 5 月 ~ 1942 年 2 月，主要进行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第二阶段从 1942 年 2 月 ~ 1943 年 10 月，在全党范围内展开普遍整风。第三阶段从 1943 年 10 月 ~ 1945 年 4 月，对整风运动进行总结提高。

整风第一阶段的重点是党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提高思想认识水平。1941 年 5 月，中共中央组织和领导党的高级干部 120 余人在延安举行了整风学习会议，主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关著作和党的历史文件。5 月 19 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针对党内学风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倾向，正式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任务，要求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以教条主义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要注重调查研究，并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这个报告为开展整风运动作了思想动员。7 月 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出："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①]指示列举了缺乏党性、违反党性的种种倾向，规定了纠正违反党性倾向的一系列办法。9 月 10 日 ~ 10 月 22 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讲话，分析和批判了党内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态度和学风，强调要从党的高级干部做起，部分党内的高级干部还在会上作了初步的自我批评。会议最终认定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党所犯的"左"倾错误是政治路线错误，"这是高级干部整风的一个重大收获。"[②]通过此次会议，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的许多重要问题，取得了一致认识，为以后开展全党整风打下了基础。

1941 年 9 月 26 日，为进一步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

平，从而从政治路线上分清是非，统一认识，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通过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其内容：一、学习组成分以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党委之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某些职员，各高级学校某些教员为范围。全国以300人为限。其中延安占1/3，外地占2/3。二、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20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为目的。三、延安及外地各重要地点，均建立高级学习组，军队至师、军区或纵队为止，地方至区党委或省党委为止。高级学习组设组长、副组长及学习秘书各一人。学习组之下分设若干学习小组，由小组长负责。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按时指定材料，总结经验，解答问题。11月4日，毛泽东同王稼祥又向各地高级学习组发出关于学习内容的通知。通知说："中央学习组及各地高级研究组第一步均以列宁主义的政治理论与我党六大以来的政治实践为范围"，"现定在本年内，先将季米特洛夫在国际七次大会报告及列宁《左派幼稚病》二书，与《六大以来》八十三个文件通读一遍。这种通读目的在于获得初步概念，以便在明春可进到深入研究阶段。"③

根据中共中央的相关指示和规定，中央学习组和各地高级学习组的高级干部迅速投入到指定文件的学习当中，通过学习，他们对马列主义和党的历史经验的认识更加深刻并统一了，基本克服了自身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等错误思想，从而为下一阶段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普遍整风打下了基础。

经过长期的准备过程，到1942年2月，在全党范围进行普遍整风的条件已经成熟，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④2月8日，毛泽东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指出：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打倒党八股，就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没有藏身的地方。演说详细论列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并强调指出："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⑤毛泽东先后作出的这两个报告实际是全党整风的动员，会后，各单位及时向广大党员和干部传达了毛泽东的动员报

告，并制定了学习计划和检查工作计划，普遍地向全党党员和干部作了思想动员。

在全党整风的发动阶段，由于受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干扰，部分机关学校的整风运动走错了方向。1942 年 2 月 17 日，王实味[⑥]在《谷雨》杂志第 1 卷第 4 期上发表《政治家、艺术家》一文。3 月 13 日，他又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野百合花》一文。在这些文章中，他指名道姓攻击党的领导，号召大家把矛头指向领导。受其影响，绝对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一时间在党内滋长起来，小资产阶级思想大有占据上风之势。为了及时纠正整风过程中存在的这一偏向，1942 年 3 月 16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指出："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每天与数十万的群众联系并影响他们，因此，把报纸办好，是党的一个中心工作，各地方党部应当对自己的报纸加以极大注意，尤应根据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号召，来检查和改造报纸。"[⑦]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要这样做，才是名副其实的党报。3 月 31 日，毛泽东同博古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召集延安各部门负责人和作家共 70 多人开座谈会，讨论《解放日报》改版问题。毛泽东在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整顿三风，其目的是为了在共同的目标上，一致前进。他指出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批评态度，才对团结有利。毛泽东尖锐批评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以及在《矢与的》上发表的文章中的错误观点和态度，他强调整顿三风要好好发挥报纸的作用。4 月 1 日，延安《解放日报》正式改版。5 月 27 日～6 月 11 日，中央研究院召开了"党的民主和纪律"座谈会，在会上，针对党的民主和纪律展开了辩论，后来大辩论转变为批判和揭露王实味的反动言行。

1942 年 4 月 3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以下简称"四三决定"），对整风运动的目的、要求、方法、步骤和学习文件，作了明确的具体的规定。《决定》规定，在全党整风中必须精读 18 个文件（后又增加了四个文件），其中主要有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反对自由主义》、《农村调查序言》、《在边区参议会的演说》，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

以"四三决定"为标志，延安党政军各机关、部队、学校从此开始了



有声有色的以整顿三风为中心内容的全党整风运动。这一运动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4 月至 8 月，是重点整顿学风阶段，主要解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端正党的思想路线问题；8 月至 12 月中旬，是重点整顿党风阶段，反对宗派主义，解决组织路线问题；12 月中旬至 1943 年 3 月中旬，是重点整顿文风阶段，着重检查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现象；3 月中旬至 10 月，是总结阶段，各单位就自己的工作和整风学习进行普遍总结。

延安整风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1942 年 6 月 2 日，为了加强对全延安整风学习的领导，中共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任，康生为副主任。总学委会每周或两周召开一次高级干部的学习会，讨论学习问题，并通报时事、政治和工作情况。在中央总学委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五个系统的分区学习委员会，即：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系统，由康生、李富春负责；中共中央军委系统，由王稼祥、陈云负责；陕甘宁边区系统，由高岗、任弼时负责；中央文委系统和中央党校系统。另外，在此期间，延安各机关、学校的高级干部成立中心学习组（甲组），由自己先把文件学习好，然后来领导其他干部的学习。此外，还组成中级学习组（乙组）和普通学习组（丙组）。甲组人数较少，但却是领导核心。乙组人数最多，都是中级干部，甲组同志分别参加他们的学习组。丙组人数不很多，是文化水平较低且又应该学习文件的一些干部，以上课为主。据统计，到此时，延安共有 10 098 人参加整风学习。

在学风学习阶段，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有了进一步深入的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大批文艺工作者从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来到延安，为发展革命文艺事业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上认识不清。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进行一次文艺整风。1942 年 5 月 2 日，文艺座谈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出席的作家、艺术家及文艺工作者共 80 余人，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本次会议的最大成果。

在 5 月 2 日的引言中，毛泽东主要讲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关于立场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⑧]关于学习问题，指出：文艺工作者不应只学习文艺创作，还应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只有这样，文艺才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在5月23日的结论中，毛泽东主要讲了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首先，讲党领导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他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其次，讲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他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党的文艺工作者应当在抗日、民主、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团结起来。关于文艺批评问题，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结论最后指出，延安文艺界中还存在"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⑨

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一场大辩论。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进一步提高了全党的思想水平，成为广大党员和干部批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锐利的思想武器。

延安整风学习进行到6月初，中央根据延安整风运动的经验，决定不仅在延安党的领导机关中，而且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6月8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这时开始，整风运动就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其他各抗日根据地也相继进入到整风时期。

1942年8月初，延安各单位相继转入党风学习阶段，至12月中旬结束。党风学习阶段，"主要是检查脱离群众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以及个人和党的关系、干部之间的关系、纪律和民主等方面的问题"。⑩由于自抗战以来，某些地区的党政军民关系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现象（如宗派主义）。而这些现象，妨害了抗日根据地的坚持与建设，也妨害了我党进一步的布尔什维克化。此外，根据地的建设与民主制度的实行，同时要求每个根据地的领导的一元化。为此，9月1日，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规定了加强党的领导一元化的



一系列措施，并指出："加强各抗日根据地领导的统一，是为了更顺利的进行反对日寇的战争，'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11]这个决议对于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风，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1942年10月19日~194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的任务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根据整风的精神总结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和检查陕甘宁边区的工作。陕甘宁边区各级党、政、军、民、学系统的正式代表266人出席了会议。在开会期间，延安中央高级学习组的全体成员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一、二部学员也都到会旁听。

毛泽东出席了大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参加大会讨论，并且发表了讲话。毛泽东在闭幕会上作了关于领导问题的讲演，用"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两句话阐明了领导的真实意义，指出党的领导就是集中人民意见，经过思考研究变成党的意见，然后又把党的意见拿到人民中去实现，这就是所谓群众观点的领导艺术，就是真正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在会议期间，毛泽东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作了《关于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讲话，对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逐条进行了讲解。指出："这个十二条，很值得我们好好地研究一下。这是我们全党的'圣经'，是'圣经'，而不是教条，是可以变化的。"[12]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领导艺术问题的讲演，任弼时作了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的讲演，朱德作了关于生产问题的报告。陈云、彭真、叶剑英、吴玉章、徐特立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参加了大会并作了讲演。

这次会议历时89天，解决了以下三个主要问题：

一、总结了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经验，分清了路线是非。会议批判了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下陕北党内少数同志所犯的错误，特别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同时认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谢子长、刘志丹等从实际出发，实行土地革命的路线是正确的。

二、检讨了抗战以来边区党内的思想偏向，加强了党的统一领导。会议指出，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党内的思想偏向主要表现在：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在工作中缺乏调查研究，处理问题主观片面；政策上的糊涂观念，实行三三制政策中的关门主义残余，错误地解释宽大政策；组织上闹独立性、自由主义、下级不执行上级指示、各自为政；领导作风上的官僚主义和军队中的军阀主义残余等。会议用大会讨论的方式集中批评了这些思想偏向。同时，为加强党的领导，会议决定，边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工作都统一于中共中

央西北局，分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工作都统一于党的地方委员会；为更加密切军队和地方的关系，发起拥政爱民和拥军运动；整顿党的组织，重新登记党员等。

三、会议认真学习和讨论了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确定今后应按照“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把生产和教育作为边区建设的两大中心工作，以发展生产为边区建设的基本任务，从而为边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是全党整风运动中一次重要会议，它全面总结了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纠正了当时党内的思想偏向，统一了党的领导，从而大大推动了陕甘宁边区整风运动和各项工作的开展，同时也对全党整风的开展起了促进作用。

在党风学习阶段，中央还强调了反对自由主义“小广播”的问题。

1942 年 12 月 18 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文风学习的通知》。通知指出：“文风的改造是整顿三风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正确思想、正确党风借以表现的具体形式，必须认真学习，不可忽视”，“对于文风的学习，各学委会必须抓紧领导，作具体的布置，号召全体参加学习的同志以学习学风和党风的精神来学习文风”[13]。要求每个同志，认真检查自己过去和现在的工作和自己所写的文件、作品，借以坚决地彻底地肃清党八股的余毒。由此，延安整风运动转入学习文风阶段，至 1943 年 3 月中旬结束。

通过文风学习，各单位和各同志都检查了自己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现象，检查了写文章、作决议、作报告的党八股作风，特别是文教部门，用了更多的精力进行了文风学习。

1943 年 3 月 20 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整风学习总结计划》，要求中央各部委和军委直属各机关的学习文件与工作检查 4 月底结束，审查干部可转入学习结束后之下一阶段，作为今年一年的中心工作之一。学校系统的学习文件、检查工作、审查干部 6 月底初步结束。延安普遍整风转入最后的总结阶段。在这一阶段，各单位对普遍整风阶段的学习作出总结，各同志也对自己的工作、思想和历史进行了全面反省，并写出总结。6 月 1 日，中共中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对于全党的整风学习作了高度的总结，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普遍整风时期的结束。

通过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全党的普遍整风，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最大收获，即毛泽东已被全党和解放区人民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领袖”，



"毛泽东思想已被确认为中国化的马列主义。"[14]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定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注释：

①③⑦⑪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页，第211页，第358页，第435页。

②⑩⑭龚古今，唐培吉：《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9页，第153页，第156页。

④⑤⑧⑨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页，第840页，第848页，第854～875页。

⑥时任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1942年6月中央研究院揭发和批判王实味；12月，以托派分子定罪，由中央社会部逮捕，1947年初撤离延安途中被处死。

⑫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页，第418页。

各根据地的整风运动

1942 年 6 月 2 日，中共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主持的总学习委员会，负责领导延安和全党的整风运动；在总学委之下又设立了各个系统的分区学习委员会，负责领导延安地区的整风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延安整风运动走向更加系统和更加深入发展的轨道。

根据延安整风运动的经验，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1942 年 6 月 8 日，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标志整风运动将在全党范围内推开。之后，山西、山东、华中等各抗日根据地即先后开展了整风运动。

山西各抗日根据地的整风运动从 1942 年 4 月开始，前期主要是进行组织发动和学习宣传活动。为此，各根据地先后成立了整风学习委员会（或整风检查委员会）负责领导本地区的整风运动。中共晋绥分局整风总学委会由林枫任主任，晋绥军区学委会由周士第任主任。中共北岳区党委学委会由刘澜涛任主任、胡仁奎为副主任。第一百二十九师整风检查委员会由邓小平、刘伯承、李达等组成，邓小平为主任。太岳区总学委会主任由太岳军政委员会书记薄一波担任。此外，各抗日根据地的各部门和单位还相继召开整风动员大会，发布相关决定和指示，对整风运动的步骤方法作出具体安排。1943 年 4 月 3 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各根据地在进行整风运动的同时，开展工作检查、审查干部工作，为此，山西各抗日根据地重新修订了整风计划，作了精心安排。1944 年 1 月以后，各根据地的整风进入到总结阶段，同时就一些偏差作出纠正。下面就山西各根据地的具体整风过程作一介绍。

在晋绥，1942 年 5 月 30 日，晋西区党委发出了《关于晋西北整顿三风的指示》，要求晋西北区各级领导机关，特别是地委一级的大机关，抽调一部分干部组成调查团，去农村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以发现与检查各种主观主义的具体表现，反省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各地、县接到指示后，立即组织

学习，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作了安排。随后，各地区的整风文件的学习即开展起来，主要精读22个文件，同时结合实际检查工作。1943年3月12日，晋绥分局总学委召开高级干部整风学习会议，在总结检查前段学习情况的基础上，林枫、武新宇、甘泗淇等代表党、政、军作了检查报告，提出了整风运动向纵深发展的具体意见。5月开始，全边区即开始分四部分进行整风，边区党、政、军、体机关干部在分局党校举办学习班。晋西北区党委、塞北区工委、晋西南工委分别集中县级以上干部在兴县、偏关和沁源县（晋西南工委随部队转移太岳区沁源县）成立整风队，开展第二阶段的检查审干。通过整风，广大领导干部在思想上摆脱了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残余，从而坚定了无产阶级立场，增强了党性观念，坚定了抗战决心。

在北岳区，1942年6月2日，北岳区党委组织各群众团体召开了整风动员大会。7月18日，北岳区学习委员会举行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组织章程、学习条例和半年学习计划，要求各地、县务必在一周内成立学习委员会，最迟在8月1日全面铺开整风工作。北岳区的整风学习采取自学和集体学习相结合的方式；对22个整风文件的学习，强调要深入钻研，领会其精神实质，掌握其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此，各单位还划分了学习小组，规定了学习制度，创造出学习漫谈会、疑难解答会、经验交流会等多种学习形式，从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至1943年3月下旬，北岳区开始检查审干工作，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区党委几位领导干部带头检查了几年来在党、政、军、民、学各项工作中存在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政府部门各自为政、军队干部作风骄横傲慢、民众团体脱离下层群众、文化教育只追求数量而不注重质量等问题，要求大家展开对照检查，主动反省自己的历史。通过检查，增强了党内外和军民之间的密切团结，进一步克服了党内的三风不正思想。

在太岳区，1942年5月4日，中共太岳区军政党委员会书记薄一波在纪念“红五月”集会上，作了开展整顿三风的报告，号召全区党政军民立即掀起学习整风文件、开展整风运动的热潮。7月，太岳区党委又制定了整风的具体计划，要求各单位从8月开始进入精读文件阶段。按照党委的指示，全区各级党政军民干部即刻展开了整风学习，他们按照职务和文化程度的不同，分别编为高级、中级、初级三种学习组，精读22个整风文件，着重领会精神实质，初步认识整风的目的、内容和意义，有的还联系实际初步进行了思想和作风的检查工作。1943年，太岳区频繁遭到日军的连续“扫

荡”和阎锡山部第六十一军的进犯，因此，直到1943年底至1944年初，太岳区的整风运动才转入到工作检查、审查干部阶段。1944年1月，太岳区在安泽县小李村举办了120余名县级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整风班。5月又成立了整风学校，集中全区党、政、军、民各级干部868名进行整风学习。在学习中，领导干部主动检查了自己在思想方法、工作作风、上下级关系等方面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不少同志还主动向党交心，讲了从未向党讲过的个人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从而放下了思想包袱，坚定了革命信念。

在太行区，1942年4月15日，晋冀豫区党委发出《关于如何贯彻整顿三风的指示》，部署全区整风运动。4月25日，第一百二十九师政治部召开会议，宣布成立师整风检查委员会，规定了阅读文件、检查工作和进行总结的时限。12月5日，太行区对半年来整风学习进行了一次检查，针对整风学习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太行分局及时召开了地、县两级党、政、军领导及群众团体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强调了开展整风运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求干部要带头学习，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推动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1943年1月25日至2月20日，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在涉县下温村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史称“温村会议”）。会后，区党委采取了“机关整风学校化，学校整风机关化”的方法，在区党委党校开办县级干部整风班；在各地委党校举办区级干部整风班；在各县委党校举办村党支部书记整风班；部队除少部分参加区党委党校学习外，多数参加了太行军区司令部，政治部主办的整风学习班。在学习班上，各级主要干部首先自觉地按照党员干部标准认真检查了自己在参加革命工作以来思想、工作方面存在的三风问题和现实工作中出现的偏差。然后针对这些思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希望获得根本上的改变，从而提高自己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水平。

1944年1月以后，山西各根据地整风运动相继进入总结和纠正偏差阶段。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相关指示，1944年7月和10月，晋绥边区、北岳区分别完成了纠正工作。太行区和太岳区因整风开始较晚，中途又几次因灾荒和扫荡原因而中断，“所以整风结束时间比晋绥边区、北岳区推迟了半年多”。[①]太行区在干部审查过程中，由于邓小平一直留守主持北方局和第一百二十九师的工作，自始至终参加和领导了太行区的整风运动，“正确地把握了整风运动的方向，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②]因此，整风运动发展得比较顺利。

山东各根据地的整风运动在时间上基本和山西的一样，从1942年春到

1943 年 3 月，是初步发动阶段；从 1943 年 4 月到 1945 年上半年，是深入发展阶段。

1942 年 2 月，毛泽东发出整顿党的作风指示后，5 月 8 日，山东分局正式作出《关于执行中央整顿三风指示的决定》，山东整风运动正式开始。省青联组织了调查研究工作团；清河区规定干部学习的中心为整顿三风并印发了研究提纲；抗大一分校成立了整顿三风检查委员会和调查研究会，并确定先研究文件再进行工作大检查；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站工会）成立了以秘书长李竹如为主任委员的学委会，以党中央规定的 22 个文件作为中心学习材料，将干部编为甲、乙两组进行学习；滨海地委在主要负责同志领导下，对整风学习加强领导和督促检查，并定出学习日，克服学习中的自流现象。通过以上各整风组织的领导，山东各地区的整风运动初步发展起来，有个别地区和部门还取得了比较可观的成绩。

山东地区的初期整风过程中，曾受到当时来山东指导工作的刘少奇的重大影响。1942 年 4 月 10 日，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由苏北到达山东临沭县朱樊村第一百一十五师师部。中旬，刘少奇领导召开了中共山东分局与山东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三个重大事项。4 月 16 日，中共山东分局根据刘少奇的指示精神，作出《山东抗战四年工作总结》，充分肯定四年来山东敌后抗战的成绩，同时也指出了山东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提出了今后八项具体工作。自 4 月 26 日起，刘少奇分期分批有针对性地向山东党政干部作《关于山东工作》、《群众运动问题》、《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改造政权问题》、《党内斗争问题》、《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思想方法问题》、《关于财政粮食问题》等八个报告，正确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对开展整风运动，加强党的建设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次会议和会后总结成为山东整风的一个转折点。此后，山东各县级以上党委也都成立了学委会，将党员干部按其职务和文化水平分别编入甲、乙、丙三组进行学习，山东整风运动出现热潮。1942 年下半年，日寇加紧了对山东根据地的扫荡，加之山东根据地本身在组织工作方面还存在些缺陷，因此整风的发展受到一些局限。

1943 年 3 月，山东根据地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斗争形势也开始好转。4 月 18 日，山东分局根据中央 4 月 3 日《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发出《关于重振整风学习的指示》，在总结前段经验的基础上，重新作了动员和部署，根据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相结合的原则，进一步加强了对整

风运动的领导。首先，从 1942 年 7 月起，学委会改由党委主要负责人及宣传部干部教育部门的负责人共同组成。党委书记或副书记兼任学委会书记，从而真正担负起了领导之责。其次，健全了学习组织。在学委会领导下，地委以上机关划分为甲、乙、丙三个学习组。甲组主要为科长级以上干部；乙组主要为科长级以下干部；丙组为一般干部。县、区只划分乙、丙两组。学习文件时，甲、乙组以个人阅读为主，丙组以上课辅导为主。学委会的领导重心放在甲组，以甲组高级干部的学习带动乙、丙组中下级干部的学习。最后，规定学习制度。党员、干部不分上下新老，均应参加学习。规定每周有一天为学习日，专门进行讨论，交流学习心得和经验。为适应敌后游击战争的具体环境，学习方式可采取集体与个人相结合的学习方法。此外，在学习过程中，要将中央规定的文件和本地区党的重要指示决定及时事政策结合起来学习，文化水平低的党员干部还可与文化学习结合起来，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提高自己的综合水平。

1943 年春以后，整风进入到检查工作和审查干部相结合的阶段，在整顿三风的基础上对个人的思想、工作和全部历史进行全面反省，借以审查干部，巩固党的组织。1943 年 9 月，分局开始对主要干部进行审查，以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为了总结经验、指导工作，山东分局还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领导方法，以分局直属队为整风试点单位，对运动的深入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山东根据地在整风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曾出现过一些错误和偏差，如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中，有少数同志不够实事求是，违心地扩大自己的缺点错误，给整风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还有的片面强调自由，把党的工作说得一无是处，这也影响了整风运动的顺利进行。好在山东分局在罗荣桓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很快发现并及时纠正了这些问题，使山东整风运动最终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取得了最后胜利。

华中根据地在 1941 年以后，逐渐成为了国民党和日军侵略的重点，1942 年和 1943 年，为了将华中变为太平洋战争的巩固后方，日军进一步加强了对新四军的残酷扫荡，国民党也不断发动反共摩擦，因此，此时的华中根据地遭遇了空前的困难。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克服根据地的困难，华中根据地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适时地开展了整风运动。

在苏北抗日根据地，1942 年 9 月，中共盐阜区党委成立了以区党委书记刘彬为首的盐阜区整风学习总委员会，领导全区整风运动。10 月，总会



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研究全区整风运动的任务要求、组织领导、计划安排等问题。接着盐阜军区、各县相继成立了整风学习分会；新四军第三师的整风学习则由师政治部负责领导，师直和各旅团分别成立了整风学习委员会。经过充分的准备，1942 年 11 月，盐阜区的整风运动逐步开展起来。不久，日伪向盐阜区发动空前规模的大扫荡，整风被迫暂停，直到 1943 年 9 月才重新发动，并全面铺开。整个运动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学习文件，提高认识；第二个阶段是在学习有关文件的基础上，联系实际进行反省；第三阶段是全面反省，并穿插进行审干工作。1945 年抗战胜利，盐阜区的整风运动也随之结束。

在苏中抗日根据地，1943 年 2 月 16 日，中共苏中区党委发出《关于整风学习的决议》，决定苏中区分九个单位进行整风。8 月 12 日发出《关于整风学习的指示》，要求把整风作为中心工作来进行，1943 年 3 月 18 日，中共苏中区党委召开第五届扩大会议，陈丕显作了《半年来苏中区整风工作检查与会后如何进行整风工作》的报告，以加强和推动整风工作，1945 年 7 月 26 日，中共苏中区党委发出《目前整风指示》，对整风运动进行了总结。

在苏南抗日根据地，1943 年 8 月 30 日，陈毅、饶漱石关于苏南整风任务与步骤给王必成、江渭清、吴仲超、钟国楚[3]发出指示："整风是改造干部与建党的关键，是全党在今明两年的战斗任务，必须限期完成。苏南工作经过四年来从最初的发展到现在的坚持与巩固阶段，整风便成了现在坚持、巩固自己及阵地的中心。其他工作则应列为次要。"[4]指示还规定整风的第一步是学习文件，第二步是反省与审查，第三步是审查干部。指示建议：苏南整风不再全党、全部队均普遍提出精细的整风任务，要分部门、分先后来作，"首先在各重要部门开始进行。在干部方面，部队则先整营级以上及独立部队，地方则先整县级以上及独立的区级。而两者之中又以部队为整风首要工作。"[5]1944 年 6 月 13 日，中共苏皖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贯彻华中局整风精神，讨论整风学习问题。7 月 9 日，中共苏皖区党委、新四军第十六旅召开直属机关排以上干部会议，成立了直属机关学习委员会，部署了直属机关的整风学习。至 1945 年，各根据地的整风运动宣告结束。

苏北、苏中、苏南根据地的整风运动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层次性，而且真正开始整风的时间应该是在 1944 年和 1945 年两年，这是因为在 1942 和 1943 年两年间，战争形势十分严峻，各抗日根据地必须以军事斗争为主，然后才能利用斗争的间隙进行整风。1944 年 10 月 10 日江渭清在《目前我

们要干什么》一文中指出："我苏南是一个游击区，敌伪据点林立，战斗频繁，地区分割，一切以战斗为主，如果战斗稍有不利，则一切就无从谈起。"⑥抗日战争进入到1944年，新四军已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进入到局部反攻的阶段，因此，1944年2月1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发出《关于1944年整风工作指示》，要求各区党委于年内完成整风、审干、防奸工作，并成立了以曾山为主任的整风审干总会。至此，整风成为根据地的中心工作并进入高潮阶段，是根据地整风运动的关键时期。3月，新四军政治部发出《对整风善后工作的指示》，要求对审干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复查，搞错了的要甄别，从而保证了后来整风运动的顺利完成。

在鄂豫边区，1942年全党整风开始后，鄂豫边区党委即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开始在机关、学校、部队中进行整风学习。但是，由于敌、伪、顽的联合扫荡和夹击，"整风工作虽然零零碎碎地进行了一些，但没有全面开展"。⑦1943年末，敌、伪、顽的进攻被粉碎，斗争形势趋于相对稳定。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局指示的精神，边区党委总结和检查了一年来的整风工作，对整风运动重新作了部署。11月18日，边区党委作出《关于彻底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分析了在动荡环境中，边区进行整风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整风计划，对整风运动的内容、目的、要求、方法步骤作了明确的规定和具体安排"。⑧接着，边区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任质斌同志为书记，李先念、陈少敏等同志为委员。师直属队、行署、各军分区成立了分学习委员会。为了加强对整风运动的领导，华中局派了党代表郑位三同志到边区工作。

边区的整风分两期进行：从1943年12月上旬至1944年3月中旬为第一期，主要是提高阶级觉悟和整顿党风；1944年4月中旬至同年冬为第二期，主要是整顿学风、文风和加强党性训练。在整顿党风阶段，边区党委非常重视高级干部的整风，并以高干整风的精神和内容带动全边区党的整风运动。为此，1944年2月4日起，边区党委抽调了县团以上干部115人开办高干整风班，集中近半年时间进行学习与整风，边区的整风运动更加深入普遍地开展起来。通过学习，许多干部联系自己的实际检查了自己的工作、历史和思想作风，还写出反省笔记和自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增强了自己的党性。此外，在高干整风中，还特别强调对鄂豫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学习，以便使广大干部更加具体地检查自己在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方面的种种表现。1944年2月至7月，边区先后召开了群众工

作会议、边区临时参议会，以及新四军第五师党委扩大会议等一系列会议，对整风运动进行了总结，在搞清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还制定了进一步改进工作的方案和措施，使整风运动顺利地进行下去。边区在整风过程中也结合进行了审干工作，由于边区党委正确地贯彻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借鉴了其他地区的经验教训，从而基本上防止了审干扩大化的倾向，保证了边区敌后抗战和根据地建设的顺利发展。

各抗日根据地的整风运动是在党中央的统一号召下，借鉴延安整风的丰富经验，然后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逐步展开的，虽然每个根据地在整风的时间上或方式方法上有所不同，但最终都胜利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从而提高了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纠正了错误的思想和作风，进一步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普遍地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注释：

①②张晓艳：《山西抗日根据地整风运动述评》，载于《党史文苑》，2010年第14期，第18页。

③王必成，江渭清，吴仲超，钟国楚当时分别任新四军第十六旅旅长、政委、中共苏皖区委副书记、新四军第十六旅副旅长。

④⑤中共江苏省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苏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页，第285页。

⑥转引自，许化宁：《江苏抗日根据地整风运动地方特征浅析》，载于《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3月第1期，第116页。

⑦⑧转引自，郑峰：《鄂豫边区根据地整风运功经验初探》，载于《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5期，第57页。

“审干”与“抢救失足者运动”

1942年前后，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形势十分严峻，国民党在对其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同时，还在边区周围，遍设处、站和秘密据点，形成军事包围以外的特务包围。这些特务分子，有的甚至已经打入延安党政机关和学校。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在进行全党普遍整风的同时，进行干部审查工作，以肃清党内的汉奸分子，纯洁党的干部队伍。1942年10月19日～194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在延安召开，1942年11月，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半条心），而且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要注意反特斗争。”[①]12月起，中央的部分部门和延安的部分机关学校即先后开始了审查干部工作，12月6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号召全体党员起来反对这种泄秘造谣的“小广播”；每个党员要深刻反省自己与严正地批评别人，检查自己和别人是否犯了“小广播”的错误；此外，各机关学校要根据具体情况制发“小广播”调查表，分发同志填写，赞扬守纪者，惩罚违纪者。此通知发出一直到1943年4月初，审干运动主要在延安的少数部门和机关学校展开，主要内容是强调反对自由主义，要求每个人填写“小广播”调查，社会关系调查；规定每人写思想自传、历史自传，并从思想反省、历史反省展开坦白运动。

1943年3月20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整风学习总结计划》，规定中央各部委和军委直属各机关的学习文件与工作检查4月底结束，“审查干部可转入学习结束后之下一阶段，作为今年一年的中心工作之一”。[②]4月3日，中共中央又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指出：“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种是革命队伍中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一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③]

4月5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中央及军委直属单位和陕甘宁边区各机关，分别召集全体人员会议，号召特务奸细分子自首。4月9日、12日，任弼时在中央直属各单位、西北局等单位两万人参加的大会上作特务的活动与中央对特务的方针报告。4月28日，中央政治局决议，在中央书记处下设立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刘少奇为主任，康生、彭真、高岗等为委员。在6月、7月、8月三个月内，专门在延安高级干部中进行防奸教育，重新恢复总学委，负责领导学习，日常事务仍由康生主持。肃清内奸必须由各机关、学校、部队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以达到肃清内奸，培养干部两大目的。遵照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和决定，1943年夏秋，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机关学校，先后开始了审干运动。

在审干的过程中，大多数干部认为审查干部，清查特务还是理所应当的、必要的，这样有助于认识党内干部的纯洁性，从而保证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但是，在执行此项工作的过程中，却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尤其是个别负责人竟利用中共中央关于审干的指示中个别不准确或者是错误的提法，搞起“抢救失足者运动”，给党带来了不小的损失。

早在1942年11月，总学委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就曾用“逼、供、信”办法，强迫原甘肃地下党员、西北公学学员张克勤承认是“特务”，进而制造了甘肃地下党是“红旗党”的假案，这对后来审干运动的发展起了十分恶劣的影响。1943年3、4月间，审干工作在延安各机关学校陆续展开，但是康生却宣传什么“特务如麻”、“特务问题是群众性的问题”等错误观点，使很多受到怀疑的人被隔离审查，甚至被成批逮捕关押起来。

1943年6月，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妄图闪击延安。7月11日，为了进一步动员和教育广大群众积极地起来反对内战保卫边区，同时也为了借机推动党内的审干运动，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在延安进行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教育的通知》，指出：“在进行干部与群众的教育中，必须与审查干部坦白运动密切的结合起来，利用这次国民党正要进攻边区的时机，继续加紧反奸细斗争。”[④]“加紧对反革命分子的清查、突破和甄别工作，将精密细心调查研究的个别解决，与有准备的坦白大会、劝说运动结合起来”，“加紧发动群众的积极性，有计划的教育干部，达到百分之十的干部学会反奸工作。”[⑤]

7月15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提出“消除内奸，这是我们目前急不可缓的任务”，“还有一些失足的人至今

没有向党坦白”，强调这些人要在“紧迫的时间中挽救自己，而共产党员们也要在这短促的时间内抢救他们”。他还罗列了一堆未经核实的所谓“案例”，并把张克勤带到会场作典型示范，要求各机关学校追查特务，搞起了“抢救失足者运动”。会后，各机关学校都搞起了逼供信。从张克勤供述的所谓“红旗政策”，演变、发展成了审查“红旗党”。一时，河南、四川、贵州、浙南等地的党都成了“红旗党”，从这些地方来的党员干部或非党群众，都被列为怀疑对象进行审查。

在康生报告后的第二天，有的机关学校就开起了“抢救大会”。接着名目繁多的“规劝会”、“坦白会”、“批判会”、“挽救会”，开遍了中央各机关、团体和学校。“抢救运动”席卷了整个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甚至波及到一些根据地。十多天内，“挖”出大批所谓“特务”，混淆了敌我，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鉴于“抢救运动”产生的一系列严重后果，有不少敢于仗义执言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及中央一些单位部门开始直接或间接地向中央反映整风运动中所出现的问题。7 月 30 日，毛泽东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遏制了错误的扩展，并承担了主要责任。

康生自始至终主持着审干运动，其中造成的错误，他负有实际的责任，他是抢救运动的始作俑者。其实早在 7 月 1 日，毛泽东写信给康生，要他在《防奸经验》第 6 期上登载下列数语：“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⑥7 月 11 日，中央总学委发出的《关于在延安进行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教育的通知》，又再一次指出：“目前紧张时期内，必须更加防止和反对‘逼、供、信’的主观主义，坚决实行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九条方针，这是马列主义的正确路线，任何时候都应遵守的。”⑦康生无视毛泽东的防奸工作正确路线，大搞逼、供、信，给延安整风带来了严重不良影响，也给党的干部资源造成了一定损失。

1943 年 8 月 15 日，鉴于“抢救”运动中所发生的偏向和恶果，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以中央文件形式正式公布了毛泽东关于审查干部和肃清内奸的九条工作方针，尖锐地批判了“逼、供、信”的错误方针。10 月 9 日，毛泽东在批转绥德反奸大会的材料时，又指出：



"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一个不杀则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抓（不捉），则保卫机关只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多数。须使各地委坚持此种政策。"[8]此后，毛泽东提出的清查特务"九条方针"正式在全党贯彻执行，审干运动继续在各机关、学校之间展开，而且扩大到社会上，在群众中清查特务，包括中小学生、士兵也不例外。

1943 年 12 月 22 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反特务斗争问题，决定：今后延安审查干部应转入新的阶段，即甄别是非轻重的阶段。对"抢救"运动以来的反特斗争，要从两方面去进行工作检查。既要检查反特务工作中好的一方面，又要检查反特务工作中阴暗的一方面。不可只作肯定，或只作否定。12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少捉少杀、少捉不杀的指示》，指出：只有实行"少捉少杀、少捉不杀"的方针，"才能保证彻底肃清特务及虽有弄错及诬陷（可能有大部被弄错，可能有一部被诬陷），亦留有最后挽救之余地"。并强调，即便是"对于证据确实的特务分子，一九四四年一年之内不许杀害一人"。[9]

1944 年 1 月 24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发出《关于对坦白分子进行分析甄别工作的指示》，指出：对坦白分子的处理首先要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绝不要将所有坦白了的人都认为是特务分子；从延安的初步经验看，已坦白了的人大致可分六类：第一类是职业特务；第二类是变节分子；第三类是加入其他党派分子；第四类是被特务利用和蒙蔽的分子；第五类是犯有党内错误分子；第六类是被特务诬害或在审查时完全弄错的人。要对以上六类人进行分析：一、对弄错的人要在复查有了结果时予以平反，要认清从党内清出特务固然是成绩，从坦白分子中将弄错的人平反同样是成绩，而且是完全必要的，但这种平反不是在反特务斗争高潮之时，而是在高潮过去，在特务查清之后；二、反特务斗争中要注意保护好人，防止特务诬害，注意不要将所有或多数新知识分子都认为是特务分子或嫌疑分子；三、对坦白分子的党籍问题，目前不要宣布停止；对于不愿真正坦白的分子，主要是依靠调查研究、搜集证据与宽大政策感化教育相结合的方法，促其觉悟，一般不要逮捕。

根据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从 1944 年春开始，中共中央逐渐对冤假错案进行甄别平反。对于在审干运动中处理错了的同志，恢复工作和名誉，中央的部分领导人则多次进行赔礼道歉。

中共中央开展的此次审干运动，确实清除出了一些特务，对干部队伍，

包括老干部、新干部，根据地的干部，在国统区和沦陷区工作的干部，基本上都认识清楚了，认识到党在各地区、各方面的干部基本上是好的。运动中间，由于中央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未能及时纠正审干工作中已经发生的“逼、供、信”的错误，导致康生掀起了“抢救失足者运动”，造成了重大损失。幸好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及时指出运动中存在的错误，提出了审干的正确方针，最后还及时对冤假错案进行甄别平反，使审干运动回到正确的轨道，从而也保证了整风运动的胜利进行。

注释：

①转引自，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党的文献》，1990 年第 3 期，第 71 页。

②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第 431 页，第 448 页，第 475 页。

③④⑤⑦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版，第 29 页，第 75 页，第 76 页，第 77 页，第 140 页。

整风运动的总结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43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打退了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10 月 10 日，中共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整风运动进入总结提高的阶段，全党整风运动至此告一段落。

在这一阶段中，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全部历史，特别是 1931 年初到 1934 年底这一段时期的中央政治路线问题，进行了更加认真的讨论和总结。为了更好地做好此项工作，中共中央书记处还对《六大以来》进行了完善，增加了 1924～1927 年和 1942 年～1943 年的诸多文件，汇编成《两条路线》，供参加整风的干部学习。同时还组织曾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中工作过的同志，召开各地区、各部队的党史座谈会，如红五军团党史座谈会、红七军党史座谈会、鄂豫皖边区党史座谈会、湘鄂赣边区党史座谈会等，把总结党的历史问题和各个地区的历史问题密切结合起来，从而更加明确和清晰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教训。“这种从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群众路线的总结方法，既能彻底弄清问题，又能切实提高马列主义水平。”①

1944 年 3 月 3 日至 4 日，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作题为《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对六大和六大以前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科学的论述，研究了六大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等问题的认识，探讨了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并对六大规定的策略方针和一些政策作了分析。报告肯定六大的基本方面是对的，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同时也指出六大还有一些错误。

1944 年 4 月 12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学习问题与时局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和同年 5 月 20 日在中央党校第一部的报告，合并整理成《学习和时局》一文，系统阐述了此次总结党的历

史经验的方针，回答了干部们在学习中提出的几个重要问题，同时还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作了系统分析。关于学习问题：毛泽东传达并进一步发挥了他3月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路线学习讲的六条意见。这六条意见在当时也是针对党的高级干部在学习党史过程中提出的几个重要问题而提出的，曾经得到政治局会议的同意，作为政治局的结论。此外，毛泽东对于学习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应有的态度和方法问题也作了说明，他指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②]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注重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些缺点应该引以为戒。毛泽东还指出，研究党史“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③]。关于时局问题：毛泽东指出，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实际地位已经改变了。他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升的，第二个阶段是下降的，第三个阶段又上升了。我们现在已完成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毛泽东强调：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必须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既要防止骄傲，解除各种精神上的负担，又要打开思想，善于思索问题。这个重要讲演是延安整风运动的总结性文件之一，从而为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这次全会是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为了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而召开的。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即1945年4月20日，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结论。这个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整风运动结束。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六届七中全会的主要文件，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献。其起草工作于1944年5月份开始，最初蓝本则是毛泽东于1941年起草的《结论草案》，《结论草案》中的许多重要内容和思想观点，都保存在了后来的《决议》中。

整风运动进入总结阶段后，为了进一步肃清"左"倾路线的错误影响，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认识。1944 年 5 月 10 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组织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作为召集人，成员是任弼时、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主要负责《决议》的起草工作。任弼时作为召集人，为《决议》的起草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并参加《决议》草案的起草和修改。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如陈云等，虽未列名于这个委员会，但在《决议》的起草过程中，经常到会参加讨论，提出过不少的意见。1945 年春，成立了由在延安的党的主要高级干部参加的讨论《决议》草案的一系列小组，各小组组长如李富春、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陈毅等人，也都参加过委员会的会议，并在会上发言。针对这些意见，党中央、毛泽东和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对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尽量将合理的、有益的意见吸收在《决议》当中。此外，从 1941 年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的胡乔木（后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宣布他兼任中央政治局的秘书），作为工作的助手，也曾经历了 1944 年开始的《决议》起草工作的全过程。

《决议》草案在起草过程中经历了多次修改和多个重要的稿件。1945 年春天，毛泽东开始在张闻天修改稿的抄清件基础上对《决议》草案稿进行修改。前后共经历过六次修改，其中第一次修改，毛泽东把底稿的原题《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改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

这个决议原准备提交中共七大讨论通过，后征得准备参加中共七大的各代表团同意，改在六届七中全会上讨论通过。1945 年 4 月 20 日，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经毛泽东修改后的《决议》草案。8 月 9 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8 月 12 日，《决议》正式印成党内文件。

《决议》经过几次起草，经过党的高级干部多次讨论，经过多人和多次的修改，前后经过将近四年的时间，才得以完成。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参与这一集体创作的每一个人的辛劳付出的凝聚。其中贡献最大的当属毛泽东，《决议》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思想观点基本都是他提出来的。

《决议》的内容主要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要总结了建党 24 年来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肯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方向和路线，认为这是一条正确的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第二部分，回顾了中国共产党从 1927 年大革命失败至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的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军事上和思想上取得的伟大的成绩，指出：我党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④]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决议》同时指出在这十年内，我党也犯过一些错误，给我党和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因此“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⑤]第三部分，回顾了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路线逐步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特别着重批评了以王明为首的“左”倾路线错误，指出王明“并不是在帮助当时的中央彻底清算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以及党内从‘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就存在着而没有受到清算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而是“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态下，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这样，‘左’倾思想在党内就获得了新的滋长，而形成为新的‘左’倾路线。”[⑥]第四部分，分别分析了王明“左”倾错误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的具体表现，并在对比中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同时得出结论，“一切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都是从思想上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来，都是从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来”。[⑦]第五部分，分析了“左”倾错误产生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强调小资产阶级思想是产生“左”倾错误的重要原因，并从思想方法、政治倾向、组织生活三个方面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作了分析，最后指出：“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采取教育方法，将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分析和克服，促进其无产阶级化，是完全必要的。”[⑧]第六部分，指明了克服“左”、“右”倾错误倾向的方针和原则，即毛泽东“‘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⑨]强调进行党内斗争时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同时，《决议》强调：“全党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并着重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以达到进一步地养成正确的党风，彻底地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项倾向之目的。”[⑩]第七部分，《决议》总结性地指出，“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⑪]



《决议》是整风运动的重要成果，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结论，尤其对历次“左”右倾错误、特别是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的内容、根源作了详细分析，肯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方向和路线，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达到了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一致。至此，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整风运动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革命。经过此次运动，全党深入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真全面地总结了党的历史和经验教训，同时基本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的束缚，提高了党的思想理论水平。整风运动标志着党在思想上、政治上、政策上的进一步成熟，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也完整地形成了，其中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领导人的整风著作和中央有关整风的文件，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学说的完整的理论体系。除此之外，延安整风运动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个创举”，它促进了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完整化。1945年4月23日，中共又召开了七大。七大的召开，进一步团结了全党，同时又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整风运动的结果。

注释：

①龚古今，唐培吉：《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9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7~938页，第938页，第955页，第955页，第962页，第990页，第996页，第996页，第998页，第998页，第999页。

大生产运动与克服经济生活面临的严重困难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军加紧了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事蚕食和经济封锁。此外，国民党顽固派也频繁制造反共摩擦，对边区实行军事经济封锁。这些造成了边区严重的经济困难。

为了战胜这一困难，1939 年 1 月初，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讲话时提出："开展全边区人民的生产运动"，要求全边区广大军民开展必要的生产。2 月 2 日，中共中央又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办公厅主任李富春在会上作了题为《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阐明了开展生产运动的目的和意义，提出了发展生产的具体计划。毛泽东则在会上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伟大号召，再次要求全边区各部队、机关、学校和人民群众迅速开展生产运动，解决经济困难。在毛泽东的这一号召下，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迅速开展起来。至 1940 年年末，已取得了一些可喜成绩。

1941 年～1942 年，由于长期战争的消耗，日军的残酷扫荡与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加上自然灾害的侵袭，非生产人员的大量增加，使根据地的财政经济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至 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后，抗日根据地迎来了空前的财政经济困难。毛泽东在谈到当时的困难情景时曾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①]

为了战胜这一困难，更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在整个边区开展起来，其中成绩最突出的当属 359 旅对南泥湾的开发，为大生产运动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1941 年 3 月至 1942 年春，从华北前线返回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第三百五十九旅，开始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分四批浩浩荡荡地开进南泥湾，实行部队生产自给。部队初到南泥湾时，这里人烟稀少，野兽出没，荒草丛生，遇



到了很多困难，但是经过359旅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努力，这些问题都一一解决了。随着生产的发展，领导层还对生产管理制度进行了有效改进。各级都组织"生产委员会"，专门负责生产；全旅统一安排生产时间，做到农忙时集中生产，农闲时集中练兵，使生产和练兵得到统筹兼顾。全旅还制定了生产计划，防止浪费，厉行节约，实行盈利分红与奖励英雄模范的制度。

由于各项制度的建立和全旅上下的艰苦奋斗，据统计：1941年，359旅共开荒地11 200亩，收获细粮1 200余石，达到粮食自给76%，经费自给78.5%；1942年，种地26 800余亩，收获细粮3 050石，粮食自给88%，经费自给达到90.2%。在农业生产的同时，还开展了手工业、运输业、商业等行业生产，为以后几年的屯垦打下了基础。南泥湾因此出现了荒山变良田的景象。1942年12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的社论，对南泥湾的屯田政策进行了总结和高度评价。

1943年，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发展到了最高潮。旅部领导提出了"不让一个人站在生产战线之外"的口号，上自旅长，下至各种勤杂务人员，一律参加生产。同时还开展起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劳动英雄赵占魁还创造了日开荒四亩一分的好成绩。对于这些劳动英雄模范，中央及时给予了表扬和奖励，并普遍推广他们的先进经验，进而又掀起了新的劳动竞赛高潮。

在开荒运动中，全旅各级首长，也积极参加生产劳动。旅长兼政委王震，由于吃苦在前，成绩卓著，被评为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劳动英雄，毛泽东亲笔题词表彰他"有创造性"。除此之外，各级领导还十分重视改善战士的生活，进一步密切了上下级的同志关系。

在党中央领导下，在朱总司令七赴南泥湾指导下，经过359旅广大指战员的艰苦奋斗，1943年，农业生产获得了大丰收，全旅开荒种地面积达到十万亩，共计收细粮1.2万石，完全做到了自给，基本上实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本年全旅在工业、商业、运输业和手工业等方面的收益也均有增加，经费自给达到了93.3%。

1944年，全旅种地增加到26万亩，收细粮十万石，达到了"耕一余一"。

359旅在屯垦南泥湾中取得的优异成绩，为边区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延安大生产运动中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光辉榜样。在其影响下，边区其他部队和其他各抗日根据地也都因地制宜，开展起了大规模生产运动，至1944年，基本也都达到了生产自给。

为了指导大生产运动的深入开展，中共中央自1942年起发表了一系列指示和报告，适时地为大生产运动规定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报告。着重批判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和那种不注意动员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渡过困难而只注意向人民要东西的错误作风，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②]贯彻这一总方针的正确政策，则是在公私关系上坚持“公私兼顾”（或称“军民兼顾”），“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③]报告还要求边区在这次会议之后，要实行更加严格、彻底和普遍的“精兵简政”，以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这五项对于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关系极大。精简之后，减少了消费性的支出，增加了生产的收入，不但直接给予财政以好影响，而且可以减少人民的负担，影响人民的经济。

1943年10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指出：一、1943年秋收已到，“各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必须责成各级党政机关检查减租政策的实行情况。凡未认真实行减租的，必须于今年一律减租。减而不彻底的，必须于今年彻底减租。”这关系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影响到明年一年的大规模生产；二、关于生产问题。（一）“党委、政府和军队，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二）“实行按家计划，劳动互助（陕北称变工队，过去江西红色区域称耕田队或劳动互助社），奖励劳动英雄，举行生产竞赛，发展为群众服务的合作社”等多种形式，促进生产。（三）“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一切机关学校部队，必须于战争条件下厉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部分种粮”。（四）“除各大小单位应一律发展集体生产外，同时奖励一切个人（军队除外）从事小部分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人业余生产（禁止做生意），以其收入归个人所有。”（五）目前条件下，“发展生产的中心环节是组织劳动力”。每一根据地，组织几万党政军的劳动力和几十万人民的劳动力以从事生产，即在现时战争情况下，都是可能的和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劳动力的全部方针和方法。”三、为使党政军和人民打成一

片，以利于开展明年的对敌斗争和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党委和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于明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④]

陕甘宁边区是经济落后的农业区，而农业又是大生产运动的重点，为了发动和组织农民进行农业生产，以解决经济困难、支持革命，必须要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效率，为此只能在实行减租减息之后，把群众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劳动互助。早在1942年，中共中央就曾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确立了开展劳动互助合作的方针。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又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发表了《组织起来》的重要讲话。提出克服农民穷苦的唯一办法就是组织起来，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就是经过合作社。他总结了在大生产运动中出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运输合作社以及综合性合作社四种形式。明确地告诉大家，“我们有了人民群众的这四种合作社，和部队机关学校集体劳动的合作社，我们就可以把群众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⑤]

通过以上各项方针政策的正确指导，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的生产运动更加蓬勃有效地开展起来。

边区各地广大农民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创造了各种形式的变工队和扎工队组织，从而团结了人力，促进了生产。变工和扎工，是陕甘宁边区农业生产中集体互助的主要劳动组织。“变工即换工，关中老区叫搭工，是农民相互之间调剂劳畜力的办法。参加变工的农民，各以自己的劳力或畜力，相互轮流为参加变工的各家农户耕种、锄草、收割，结算时一工抵一工，多出了人工或畜工的户由少出了的户补给工钱。”“扎工，一般是由有劳动力而土地不足的农民组成，除相互变工互助劳动外，主要是集体出雇于需要劳动力的人家。挣来的钱，按工分配。这种扎工因多用在锄草、收割、开荒期间，所以也叫‘锄工’、‘镰刀工’、‘镢头工’。”[⑥]边区比较著名的变工队和扎工队组织主要有：淳耀县白源村变工队，1943年，他们把三个自然村72家农户的全部人力、畜力都组织起来，全年按不同季节的不同农活，分为若干搭工组，常年变工，从而使全部人力蓄力都充分发挥了其应有作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个变工队在当时曾被树为全边区第一个劳动互助模范村，代表了全边区农村劳动互助合作发展的新方向。还有著名的同宜耀县后殿子村的唐将班子。[⑦]“他们不仅取消包工头抽空头、扣工钱及高

价出赁工具等一系列旧办法，而且废除了包工头压迫工人和一系列封建迷信习惯，代之以读报、教唱新秧歌、公开账目等文化娱乐活动和民主生活。参加这个扎工队的人数很快由 10 人增加到 25 人，差不多包括全村的所有劳动力。他们成为全边区扎工队学习的榜样。”[8]

由于实行了以上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组织，因此，全边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普遍提高。在一般情况下，实行变工、扎工以后，可以提高生产效率 30% ~40%。在延安县，变工开荒，每人七天可开荒一垧地，不变工则需要十天。变工除草，效率更高，绥德县变工锄草，每人每天可锄一垧半，不变工最多只能锄一垧。农民劳动互助极大地推动了边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边区在重点发展农业的同时，还积极发展了工业生产。通过“赵占魁运动”，掀起了工业生产的热潮。这项运动的开展，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工人群众的劳动热情，提高了他们的觉悟，改变了他们的劳动态度，使他们中的多数能够积极主动地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产品数量，提高了产品质量，节约了原材料，降低了成本，使边区工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据统计：“1943 年，边区公营纺织厂的数目已达到 23 个，年产布 32 968 匹；私营纺织厂达到 50 个，年产布 12 000 匹；纺织合作社达到 38 个，年产布 6 000 匹。”[9]另外，到 1943 年，边区的被服厂、造纸厂、钢铁厂、工具厂、肥皂厂、火柴厂、制药厂、皮革厂等其他工业也有发展，为边区提供了不少的军用民用必需品。

为了使边区的大生产运动继续向深入发展，边区党政军还通过各种形式的展览会、生产竞赛、奖励劳模等活动，进一步刺激生产运动的蓬勃发展。通过这些活动，赵占魁、吴满有、郝树才、武生华、马杏儿等一批英雄模范人物涌现出来，此外，还有一些领导干部如 359 旅旅长王震等，也是当时赫赫有名的生产工作模范。1943 年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16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隆重召开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同时举办生产展览会，185 位劳动英雄代表光荣出席了会议，并受到大会的表彰和奖励。29 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全体劳动英雄，对他们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12 月 16 日，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闭幕并发表宣言，表示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组织起来，加紧生产，保卫边区”，迎接抗战的胜利。1944 年春，边区各县又先后召开了劳动英雄大会。通过这些活动，极大推动了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广泛深入发展。

除了以359旅为代表的军队大规模生产和在《组织起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边区大规模群众生产外，中共中央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也都亲自参加生产运动。毛主席在自己的窑洞前，亲自开地种菜，浇水施肥；周恩来认真学习纺线并参加在枣园举行的军民纺线比赛，被评为“纺线英雄”；任弼时在和书记处其他领导同志积极参加开荒生产的同时，也认真学习纺线，他纺出的线曾在陕甘宁边区的农工业生产成就展览会上被评为“一等线”。除此之外，机关、学校的生产运动，也是边区大生产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生产运动是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关怀下进行的。李富春曾提出机关、学校进行生产的原则：“以农业生产为主，分别进行农工商运输及畜牧业。”通过大生产运动，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改善了生活，磨练了意志，坚定了信念，成为抗战胜利的重要保证。

在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其他各解放区也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开展起了大规模生产运动，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等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根据不同的情况，因地制宜，取得了很大成绩。1943年，仅晋绥、北岳、太行、太岳、胶东、皖中六个根据地，就扩大耕地600万亩以上，部队和机关生产的粮食一般能做到二至三个月的自给，蔬菜做到全年自给。很多抗日根据地的军队还利用生产盈余，解决了被服及牙刷、牙粉等生活必需品的困难，达到了全自给或半自给。各根据地抗日军民积极参加生产，不仅直接改善了军队的物质生活，而且使人民的负担也大大减轻，从而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使更多的人可以投入到抗日战争的行列，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贡献。

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中共中央的正确指导下，在军队、机关、学校广大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重大的成绩。据统计，“1943年陕甘宁边区部队种植作物的面积为21.5万亩，产粮三万石，产蔬菜2 300万斤；1944年边区耕种面积达83万亩，产粮九万石，占部队和机关每年所需粮食的1/3。陕甘宁边区机关、学校中，1944年，中央直属机关粮食生产总额64 000石，达到自给65.6%；边直机关粮食生产总额达28 800余石，机关经费自给51%。此外，在其他各根据地：1944年，晋冀鲁豫的太行区6个军分区军民共开荒33.5886万亩，相当于原有耕地面积的13%，太行全区（共8个分区）共增产粮食30万石”；[10]在晋察冀根据地，广大军民大力开荒，建水渠、修堤坝，使该区每年因兴修水利而增产的粮食达百万石以上。除此之外，其他各解放区的生产运动也取得了可喜成绩，根

据地的群众生活也得到了较大改善，负担减轻，收入提高。

大生产运动取得的这些成绩，使中共领导的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彻底摆脱了因敌人封锁而带来的严重经济困难，根据地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军队和人民的生活也得到很大的改善。从而壮大了革命队伍，提高了军队战斗力，为转入下一阶段的大反攻，迎接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注释：

①②③④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页，第891页，第895页，第910～913页，第932页。

⑥杜鲁公，雷敬轩，王一士编：《陕甘宁边区的农业合作》，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第9页。

⑦这是关中老区集体出雇于人的变工组织，内容和性质与扎工队基本相同。这种班子，一般由十多人组成，多者达三四十人。组织班子的叫“包头”，领班子的叫“领头”。主要用于锄草或开荒。

⑧申沛昌，郝琦：《大生产运动》，延安大学中央党史研究院。

⑨⑩龚古今，唐培吉：《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3页，第180页。



局部反攻前后中共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

1942 年下半年至 1943 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国由防御到进攻的战略转折时期。在苏德战场上，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较量，德国的战略进攻已逐渐进入尾声，德军发动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由于苏军的顽强抵抗和最后阶段的包围作战，以苏军的胜利告终，随后苏军又于 1943 年 7 月取得了库尔斯克会战的伟大胜利。从此以后，苏军完全转入了战略进攻。在北非地中海战场，1942 年 11 月英军取得了阿拉曼战役的胜利，德意法西斯在北非的攻势被阻遏；与之同时，美英联军在法属北非登陆，在英美联军的联合打击下，1943 年 7 月北非的德意军队投降；紧接着 1943 年 7 月，美英联军登陆西西里岛，将战争引向了意大利本土，意大利的投降指日可待。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取得了瓜达尔卡纳尔进攻作战的完全胜利，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机动作战力量被基本消灭。同盟国这一连串的军事胜利，结束了法西斯轴心国的战略攻势，同盟国开始转入战略反攻。

在中国战场上，经过中国人民持久抗战的消耗和敌后战场人民战争的有力打击，日军的战力和战心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进展和在中国战场陷入泥沼的情势下，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谋求改变对华策略，企图早日结束中日战争，以便从中国战场抽调更多的军队用于太平洋战场。为达到此目的，日本在 1942 年 12 月 21 日的御前会议上制定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此即所谓的“对华新政策”。《方针》认为：“国民政府（汪伪）的参战是打开日本和中国现状的一大转机，应根据日华合作的根本精神，专心加强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同时应力图消灭重庆借以抗日的口实，和新生的中国一起真正为完成战争而迈进。”[①]日本试图加强汪伪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同时对重庆方面加大压迫，以期最终实现蒋汪合流，达到其以华制华的政治目的。

在这种新的世界战略形势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1942年底开始就不断地发出指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作出分析，以加强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明确各抗日根据地在现阶段的任务和所要实施的方针政策。1942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关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三年工作方针的指示》，指出："一九四三年是国际上两条阵线进入决战之年，反法西斯阵线力量在日益增长，而法西斯阵线则败局已成。在我国内部，自国民党十中全会后，民族团结已较前进步。国际国内形势都在向我有利方向发展。同时，敌寇为挽救其垂死命运，必将加紧对我国正面的进攻与敌后的'扫荡'，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必将进入空前紧张空前艰苦的局面。"因此，北方局提出："华北党的基本任务，在于进一步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克服困难，积蓄力量，替反攻及战后作准备，以便迎接伟大新时期之到来。"②并且提出了实现民主政治，深入发动群众运动，开展普遍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加强民众教育工作，使对敌政治攻势成为经常工作等五项工作。③1943年1月5日，毛泽东针对华中敌后抗战的困难局势，在致电华中局和新四军领导人时指出："苏联冬季反攻胜利极大"、"希特勒总崩溃为期不远，战胜希特勒后，中国时局将好转，日寇亦将夺气，有利我军抗战。我们应利用这种形势，鼓励军心民心，达到坚持目的。"他还提出："整个抗战尚需准备两年，你们须想各种办法熬过两年，保持我军基本骨干，不怕数量减少，只要骨干存在即是胜利。"④然而6月1日，他在致彭德怀的电文中，对抗日战争的发展又作出了新的估计。他认为，"抗战还须准备三年"，同时他对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党应在此三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对敌应用一切方法去坚持必不可少之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之军事斗争与瓦解敌伪之政治斗争，均须讲究最善方策。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⑤

1943年7月1日，在延安举行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抗战六周年的干部晚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并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的形势作了分析，他指出：一年以来，世界战争的形势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苏联冬季攻势的胜利，美英在北非的胜利、太平洋上英美的胜利和中国抗战坚持六年，就是造成这个根本变化的原因。⑥他认为，法西斯侵略阵线已经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同盟国已经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所以今后的问题就是彻底打垮法西斯。而消灭这个问题要分两步：先消



灭德国法西斯，再消灭日本法西斯，因此今后的一年将是欧洲决战的一年。毛泽东还针对中国的抗战指明了方向和政策。最后毛泽东总结了抗战六年和中共成立二十二周年的历程，对抗战胜利，对光明的新中国与新世界充满了信心。⑦

7月2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纪念抗战六周年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向我全国同胞全体将士发表自己的意见"。在宣言中，中共中央首先明确肯定了"我们中国以及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久经艰苦斗争，但是一向处于劣势地位的这种不利情况，现在已经根本改变了"。宣言分别从反法西斯同盟国和法西斯侵略国这两个阵线具体分析了这种已经发生的根本变化。在反法西斯同盟国这方面，由于苏联在斯大林格勒与英美在北非的第一个有计划的联合作战，苏美英三国的团结表现得更加稳固了，纳粹德国意图用和平的烟雾弹来离间苏联与英美的友好合作关系的企图彻底失败了。宣言认为，"苏美英战胜德意法西斯决战，将在今后一年中展开起来"，"在苏美英三国的陆军空军与英美两国的海军已经发展成为无敌力量的时候，苏联从东线英美从西线举行第二个第三个更伟大的联合作战，给予德意法西斯以最后决定性的打击的时机，是已经成熟了。"对于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宣言认为："苏美英团结的巩固与对德意法西斯决战的实现，将不但是德意法西斯的失败，也是日本法西斯的失败。因为侵略国的首领是希特勒，希特勒的失败就是一切法西斯的失败。"而且由于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力量不断得到加强，"美英联军的几次作战胜利与中国的坚持作战"，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战场上已经变为劣势，被迫转入了战略防御。

在法西斯侵略国方面，"由于苏美英三国对于德意匪军的第一个胜利的联合打击，由于美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对于日寇的威胁与中英美三国在太平洋上及中国战场上对于日本匪军的打击与合围"，法西斯轴心国对于战争胜利的信念产生了极大的动摇，因此他们极力施展和平的阴谋，试图离间英美与苏联的同盟关系，"妄想有一方能够和他们订立苟且的和平，以便他们先击破另一方，达到挽救他们自己，并整个灭亡全世界的目的"。与此同时，法西斯国家还试图拉拢那些尚未加入战争的各中立国，以便为自己增加更多的战争砝码。然而非但那些以前倾向同盟国，而只是由于慑于侵略国的攻势而未加入同盟国的中立国丝毫不为所动，就连那些以前有可能被纳粹德国拉入侵略国集团的中立国也由于对世界局势的清醒认识和对法西斯侵略国即将失

败的趋势的认同也渐渐地疏离了法西斯侵略国。因此，“这样就使一切法西斯侵略国在国际上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由于同盟国军事上和外交胜利的打击，法西斯轴心国不论是德意之间还是德日之间，矛盾与不和也在不断发展。“由于希特勒的战争失败与外交失败，希特勒维系意大利、日本及各附庸国的威信已经突然下降”。意大利法西斯国家内部逐渐酝酿着反墨索里尼独裁统治和要求退出侵略战争的异己力量，法西斯统治已经岌岌可危，意大利退出战争也指日可待。日本法西斯统治集团内部极端亲德派与其他派别，陆军和海军之间的矛盾也在逐渐加剧，宣言认为：“只要希特勒再遭遇一二个如同斯大林格勒与北非那样的打击，日本统治阵营内的任何派别都将不敢再依靠希特勒，不敢再依靠法西斯同盟了。”宣言正确地认识到，日本东条英机内阁在近一年中所推行所谓加强伪政权力量的“新政策”恰恰是“日本法西斯在国际地位上已陷入完全孤立状态这一种情况的反映”。由于同盟国军事和外交的巨大胜利，已经使法西斯侵略国遭遇了严重的军事危机和政治危机，法西斯侵略国的战争动员能力已经达到其极限，但仍然无法与盟军相抗衡。而且由于这种对社会超负荷的战争动员，必将造成他们在国内和占领区内的政治危机。宣言预言：“一切侵略国家，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将军与士兵之间的裂口，正像火山的裂口一样，一天一天的扩大起来，酝酿着巨大的爆炸。这是一支从法西斯脚底下轰掉法西斯的大军，其爆炸的时间，必然在法西斯的内外危机达到其顶点的时候，突然地轰发开来。”

在这种有利的国际形势下，宣言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和意见，以助于最终取得抗战的胜利。宣言认为应该加强作战，宣言把中国的抗日战场划分为正面和敌后两大互相援助的战场，要求国民政府要特别加强抗击了日本匪军半数以上却很少得到援助的敌后战场。而且对于国民政府现行的兵役制度所存在的严重缺点提出批评，希望政府能够迅速加以改革。宣言认为应该加强团结，希望政府能够改变以前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制造摩擦、冲突等不良现象。宣言还对政治改革提出了要求，“认为唯一的方针是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希望政府能于抗战的第七年中，按照三民主义原则，实行若干必要的政治上的改革，借以达到各阶级各党派各民族间较之现状更进一步的和睦关系，能够为准备反攻发动人民的积极性”。宣言还认为应该加强生产，实行新的经济政策，动员全国一切力量投入到抗战的民族大业中。

最后宣言对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接下来的抗战中所应实行的政策和坚持



的原则提出了要求，要求各抗日根据地组织一切可以抗日的力量打击敌人，提高自己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提高自己的警觉性，对于日军士兵和伪军要注意争取，并且要努力地发展公营生产和自给自足的生产运动。同时要求共产党员要虚心学习文化，继续进行整风学习运动。⑧

总之，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战略转折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地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分析，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对于抗战胜利的信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断对在新形势下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党和抗日军民在未来抗战中的任务和方针作出指导，为敌后抗日根据地走出敌人扫荡和清乡所造成的困难局面，逐步恢复抗日根据地，并对敌人发动局部反攻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和动员。

注释：

①龚古今，唐培吉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 185 页。

②《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文献选编》第 1 册（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年版，第 737 页。

③魏宏运主编：《华北抗日根据地纪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 363 页。

④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 2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 355 页。

⑤《对国民党现状的分析和关于我党今后的工作方针的指示》（1943 年 6 月 1 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版，第 44～45 页。

⑥⑦陈之中、谭剑峰：《抗日战争纪事（1937～1945）》，解放军出版社，1990 年版，第 374 页。

⑧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版，第 48～61 页。

华北根据地的恢复

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经受住了日军1941年～1942年毁灭性扫荡所带来的严峻考验。根据地以减租减息为主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边沿区县基本制止了敌人的蚕食，敌占区的游击战也普遍展开。到1943年，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有利于同盟国的战略转折的到来，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也基本停止了继续退缩，开始转入恢复阶段，并积极酝酿对敌进行局部反攻。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上转入战略守势，日本政府不得不改变在华的策略手段，企图早日结束中日战争，以便从中国战场抽调更多的兵力投入太平洋战场。因此日本法西斯一方面极力扶植汪伪政府，以加大汪伪政府独立作战的能力，同时对重庆国民政府继续进行政治诱降；另一方面，日军在1943年集中了更大的力量向敌后抗日根据地继续进行扫荡和清乡，妄图彻底消灭中国人民真正的抗日力量，从而更快地结束中日战争。所以，虽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渐趋好转，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却遭到了更大规模的攻击。据统计，仅在1943年，日军就对晋察冀根据地的北岳区扫荡12次，对冀东地区扫荡14次，对冀中平原的扫荡和清剿达40余次。[①]然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在党的正确方针政策的带领下，不但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疯狂扫荡，而且积极进行外线作战，使抗日根据地逐步得到了恢复和扩大。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由于其直接威胁京津保等敌占战略据点，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因此成为日军扫荡的重点地区。而晋察冀根据地的北岳区则是日军扫荡的重中之重。针对日军逐渐加强的扫荡和清剿攻势，1943年1月10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发出《关于军区部队一九四三年的政治工作的政治方针》中指示："华北党的基本任务，在于进一步巩固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克服困难，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及战后建国，以便准备迎接伟大时期的到来。因此，军区部队今年政治工作的基本方针是：第一、加强与



巩固组织，提高军政素质；第二、增强地方武装工作的领导；第三、进一步开展敌伪军工作。”[②]在正确方针的指导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始了积极的反扫荡作战。

日军及伪军在1943年初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主要采取所谓的“跃进蚕食”策略。“跃进蚕食”策略，即以1 000人至2 000人的兵力，先对预定地区采取分进合击之势，以迫使八路军转移。然后分为若干小股部队，掩护民夫迅速修建碉堡、修筑公路、挖沟，从而一举控制较大面积，分割抗日根据地。从1月至4月，日军对晋察冀边区的行唐、平山、灵寿、曲阳等地进行了大扫荡，同时以“跃进蚕食”的策略向根据地进行深入跃进。八路军与地方武装根据北岳区军政领导提出的对付“跃进蚕食”的方略，积极配合，在正面、侧面和日伪军的纵深区域，以积极主动广泛的游击战消耗敌人，以积极的运动战消灭小股敌人，攻占敌方修筑碉堡，破坏交通等手段，对日军及伪军展开作战。北岳区军民的反蚕食斗争，使敌人的“跃进蚕食”基本被粉碎。随后日军万余人协同大批伪军又于4月中旬开始对北岳区进行分区“辗转扫荡”。此次敌军扫荡的重点是平山、灵寿等地区，“以军分区司令部为目标，首先袭击第四军分区，继而袭击第三军分区。设法消灭该地带的共军（约一万五千人），彻底摧毁其根据地设施”，[③]并进而切断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与敌后小部队的联系。由于初期八路军领导机关对此次敌人的意图判断不准，导致了一些损失。但是军区很快调整了部署，将主力分散，以游击战袭击日军，同时以敌后小部队袭击敌人空虚地区，开辟新的游击区。在根据地军民积极的反扫荡作战下，敌人的“辗转扫荡”也归于失败，北岳区根据地军民胜利地保卫了根据地，并且还在敌人后方开辟出一些新的游击区。

1943年9月16日至12月10日，华北日军又集中了大批部队对北岳区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毁灭性大扫荡”。敌人从扫荡一开始就采取了分进合击的战术，驱逐八路军部队，建立据点，然后依托据点进行反复清剿，妄图控制根据地，最后合围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北岳军区以八路军一部据守神仙山牵制日军，主力部队则转移至外线作战。在北岳军区军民内外线结合，游击战和运动战结合的打击下，日军损失惨重，“仅两月中间就损兵折将在六千七百以上，而物质、技术、装备的消耗更是无法计算”，敌伪“士气更益低落，战斗力越益削弱”，[④]因而被迫结束了扫荡。此次抗日军民的反扫荡，粉碎了敌人毁灭北岳区的企图，保卫了根据地的秋收和秋种

工作。

在对北岳区反复扫荡作战的同时，日军对晋察冀军区所辖的冀中平原和冀东抗日根据地也进行了扫荡。冀中区军民在上级正确的指示下，[5]积极运用各种游击战术，粉碎了敌伪军的多次进攻，保卫了根据地，并使根据地得到逐步恢复。冀东抗日军民在敌人严酷的扫荡下也积极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地下工作，对伪军开展政治工作，发动关外"无人区"的群众，破坏敌人的经济掠夺，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在冀东的统治。

由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奋勇作战，晋察冀军区的反扫荡与反蚕食斗争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根据晋察冀军区向中央的报告，自 1942 年 9 月至 1943 年，在北岳区恢复了 3 000 多个村庄，建立了 3 个县级行政单位。冀中日伪军控制据点附近均变成抗日游击区。冀东除遵化等少数地区外，已得到恢复。1943 年 6 月，日军开始撤退一些次要据点，仅北岳第一分区即撤退 121 个。冀中第九、第十分区，攻克和日军被迫撤退的据点有 182 处。"[6]

1943 年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为了更好地进行反扫荡作战，扭转晋冀鲁豫边区的困难局面，1943 年 1 月 25 日，中共太行分局在河北省涉县温村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通称"温村会议"，历时 27 天。分局书记邓小平作了《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的报告和会议总结报告。会议提出了今后晋冀鲁豫边区的具体任务：一、继续贯彻实现民主政治；二、依据各地区具体情况，继续发动与深入群众运动；三、加强人民武装建设，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四、发展生产，建设自给自足的经济；五、开展敌占区和游击区的工作。[7]这次会议对于晋冀鲁豫区 1943 年的斗争和工作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对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从 1943 年春开始，日军就对晋冀鲁豫根据地不断进行扫荡和蚕食，在 5 月和 9 月，又先后进行了万人以上的大扫荡。从 4 月下旬开始，日军首先对太南、豫北的国民党军队进行急袭，国民党第 24 集团军司令庞炳勋和新五军军长孙殿英先后投敌。5 月 6 日，日军集中兵力向太北抗日根据地发动全面扫荡。日军"按照第一军的预定，第三十六师团从潞城、襄垣、辽县附近，独立混成第三旅团从武安东北地区，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从林县北部任村集附近，分别向涉县附近开始进攻"，[8]企图将八路军主力压缩至涉县等地区聚而歼灭。八路军一百二十九师与地方武装积极配合，经过 17 天英勇战斗，粉碎了敌人的扫荡。7 月，日军又组织庞炳勋和孙殿英等新投敌的伪军



向晋冀鲁豫区卫河以南地区发动进攻。八路军一百二十九师对伪军发起反击，经过官桥营战斗、焦虎集战斗和瓦岗集战斗等一系列进攻战斗，取得了卫南战役的辉煌胜利，歼灭伪军5 6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35挺，长短枪2 000余支，[9]恢复和开辟了卫河以南部分地区，并建立了卫南、滨河、滑县等抗日民主政权和地方武装。8月18日，冀南区和太行区又联合进行了林南战役，历时九天，共歼灭日伪军7 000余人，缴获炮21门、轻机枪83挺、步枪3 118支，击落日机一架，攻克与收复据点80余处，解放人口40余万，[10]在豫北、太南开辟了新的抗日根据地。

9月20日至11月13日，日军又集结了三万余兵力，分由济宁、徐州、商丘、新乡等地出发，对晋冀鲁豫军区进行大扫荡，企图将八路军主力压缩至根据地中心地区而消灭之，然后再回兵歼灭转出外线的部队。根据地军民灵活作战，先后作战30多次，毙伤俘日伪军4 000余人，粉碎了日军的扫荡。11月16日，晋冀鲁豫军区主动发起反"蚕食"战役，奇袭八公桥，歼灭伪军孙良城总部及一个团，共2 000多人，俘伪军总参谋长、团长多人，[11]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恢复。晋冀鲁豫军区军民，在反扫荡的同时，也积极派出大批武工队在敌占区开展游击战争和政治攻势。到1943年底，晋冀鲁豫边区军民攻克日伪碉堡千余个，收复县城七座，光复国土五万平方公里，解放同胞五百余万。[12]

在晋绥区，1943年1月，晋绥军区遵照毛泽东"向敌人挤地盘"的方略，制定了对敌斗争计划，决定"以离（石）岚（县）、忻（县）静（乐）、五（寨）三（岔堡）三条公路及第八专区交城以西山地，为'挤敌人'的主要方向，并且大力扩建武工队，向各主要方向派出多个武工队及配合行动的部队，主要分布于公路两侧及日伪军据点周围。"[13]经过三个多月的战斗，根据地军民共战斗462次，毙伤日伪军939名，俘敌162名；摧毁827个自然村的"维持会"，在535个自然村建立或恢复了抗日民主政权，解放人口八万余人；争取并改造了297个自然村的"维持会"。[14]敌人基本被挤到了据点和公路线上。7月以后，岔口和芝兰据点也相继被拔掉，晋西北的形势由"敌进我退"的被动局面，转变为"敌退我进"的主动局面。敌人不甘心失败，于1943年9月开始对晋绥区进行大扫荡，妄图合击晋西北根据地领导机关和八路军主力。合击失败后，敌人分兵进行扫荡，八路军遂对分散敌军进行集中打击。经过甄家庄、阳会崖等几次战斗，根据地军民歼灭了大量敌人有生力量，日军被迫于11月中旬结束了扫荡。经过晋绥军民

的连续作战，1943年一年中共拔掉敌据点70个，收复1 000个村庄，粉碎敌人大小13次扫荡，光复国土24 000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7万[15]，晋绥抗日根据地基本得到恢复。

在山东抗日根据地，1943年随着根据地军民各项对敌斗争的逐渐深入，山东根据地的形势逐渐趋于好转。3月，根据党中央决定，成立了新的山东军区，由罗荣桓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实行主力地方化，将一百一十五师和山东纵队所属各部队番号撤销，进行统一整编，从而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更加有利于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恢复和发展。之后山东军区针对敌人的“蚕食”和扫荡，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游击战，并采取了有力的政治攻势，加强武工队的实力，充分发挥武工队的优势，组织群众斗争，分化和瓦解伪军。到1943年底，武工队在7 000多个村庄开展工作，缩小了敌占区，民兵也广泛开展对敌斗争。在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的同时，主力部队也抓住有利时机，进行多次较大规模的反扫荡作战，取得了很大的胜利。1943年1月和4月，日军及伪军先后两次对清河区抗日根据地发动扫荡作战，企图歼灭八路军主力。清河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为了在更有利的时机打击敌人，暂时转移到外线。7月，清河区军民开始向日伪发动反击，经过3个月的战斗，共摧毁敌伪据点133个，击溃日伪军六个团，基本歼灭伪军三个团，毙伤日军46名，毙伤伪军1 330名，俘伪军1 799名。[16]此后，日伪军又于11月对清河区发动扫荡，也被根据地军民粉碎。

11月10日至12月上旬，日军出动上万兵力对鲁中区沂蒙山发动扫荡作战。在沂蒙山的抗日部队主力转移至外线，避敌锋芒，只留下少数部队牵制日军。鲁中区军民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最终迫使日军于12月上旬退出鲁中区。当日军集中兵力对清河区和鲁中区进行扫荡的时候，由于兵力不足，在其他地区只能采取守势。山东军区遂乘机在鲁南区发动攻势作战，11月15日，八路军集中优势兵力突袭伪军刘桂棠部，最终击毙刘桂棠，歼灭伪军1 000余人，极大地震慑了鲁南日伪军。经过1943年一年的斗争，山东解放区扩大面积三万六千五百平方公里，解放村庄一万五千五百余个，解放人口七百余万，[17]打通了清河区和鲁南区的联系，鲁中区和滨海区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形势有了很大的改善。

综上所述，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基本粉碎了1943年日军和伪军的扫荡和蚕食，歼灭了大量敌人的有生力量，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的殖民统治。各根据地都基本走出了日军扫荡所带来的严峻局面，根据地得



到恢复，并有所扩大，改变了华北敌我攻防态势，为1944年的局部反攻创造了条件。

注释：

①⑨⑩⑭⑯龚古今，唐培吉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6页，第194页，第195页，第229页，第244页。

②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1页。

③⑧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下），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2～303页，第312～313页。

④《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关于庆祝北岳区反“扫荡”胜利和开展复仇控诉活动的通知》（1943年12月24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文献选编》第1册（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885页。

⑤参见吕正操：《在敌寇反复清剿下的冀中平原游击战争》（1943年7月），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6～384页。

⑥⑪何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5页，第311页。

⑦⑫⑰魏宏运主编：《华北抗日根据地纪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2～374页，第436页，第436页。

⑬⑮魏宏运，左志远：《华北抗日根据地史》，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311页，第313页。

华北的局部反攻

经过1943年一年的反“扫荡”与反“蚕食”作战，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到1943年底，各抗日根据地基本停止了退缩，大部分根据地已经得到恢复并有所扩大。而对于日军来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应付太平战场兵力短缺的局面，陆续从中国大陆抽调部分兵力加强太平洋战场，在华北等地新补充的兵力又以缺乏训练的新兵为主，因此日军总体的战斗力已经大不如前。而且日本为了打通所谓的大陆交通线发动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规模空前的“一号作战”，日军相继从华北占领区抽出部分精锐师团参战，这进一步削弱了日军在华北地区的军事力量。鉴于兵力短缺，日军已经无力对抗日根据地发动新的大规模扫荡作战，而被迫转入战略防御态势，收缩兵力以防守重要地区及铁路线两侧地区。由此，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始逐步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各抗日根据地开始进行攻势作战，对日伪军展开了局部反攻。

1944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发出了《关于一九四四年工作方针及任务的指示》，提到：“北局在一九四四年工作方针中指出：‘团结全华北人民的力量，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华北抗战，坚持抗日根据地，积蓄力量，准备反攻，迎接胜利，是一九四四年全华北的方针。’”为此，晋察冀分局认为：“在北局的方针之下，在我晋察冀边区，为了坚持根据地，不论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均须一方面坚持我之巩固区，一方面积极向敌后之游击区、敌占区伸展。只有这样积极进攻的防御方针，才能分散敌之兵力，有利于巩固区之坚持。”[①]根据分局这一巩固地向敌后发展的方针，晋察冀抗日军民积极向游击区、敌占区发展，向日军控制的县城和中小城市发动了一系列攻势。北岳区部队根据晋察冀分局的指示，[②]从1943年1月到5月连续发动攻势作战，攻克和逼退日伪军据点350多个，使当地据点比最多时的1 180多个，大为减少，而且还先后攻入忻口车站和定襄车站。在4月间，北岳区以主力部队与武工队相结合，开辟了察南、雁北新区，在广灵、蔚县北



部山区和应县、恽县一带，及平绥路两侧建立了初步工作基础。[3]6 月，北岳区部队又接连袭击保定、望都、完县、涞源、灵丘等城市。在秋季攻势中，北岳区部队于 7 月间攻克平山以西回舍区日伪军据点 14 处，对日伪建立的晋冀封锁线、唐县至曲阳间封锁线进行破袭；在平北活动的平北支队逼近北平近郊，攻克高丽营，收复香堂、八家、半壁店，袭入十三陵之长陵据点，9 月粉碎了日军对平北大海陀地区的扫荡。[4]冀中区军民积极执行晋察冀军区关于利用日伪军收缩，乘机攻击日伪军据点以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积极对日伪军据点发动攻势。从 1944 年 1 月至 4 月，冀中区军民共攻克和逼退日伪军据点 500 多个，占 1943 年底冀中所有据点 1 082 个的半数以上。[5]5 月，冀中部队趁日军从任丘撤兵，迅速包围任丘县城，并对守城伪军展开政治攻势，最终迫使伪军投诚，从而一度攻占任丘城，与此同时，冀中抗日军民还曾一度攻占肃宁、大城等地。在 8、9 月间发动的秋季攻势中，冀中军民先后攻克肃宁、武强等县城，并深入深泽、安国、献县、饶阳等县城，拔除多处日伪军据点，恢复了藁城、无极地区，并新开辟了青县地区。

晋察冀军区经过一年的局部反攻，共歼灭日伪军四万余人，攻克和逼退据点 1 700 多个，解放村庄近万个，新解放人口 700 多万。不仅恢复了 1940 年以前的根据地，而且大大发展了平西、平北、冀东等根据地，活动范围甚至扩大到伪满洲国境内。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得到了极大发展。1944 年 9 月中共中央指示晋察冀分局和军区成立晋冀、冀察、冀中、冀热辽 4 个区党委、行署和二级军区。在原地区部队的基础上扩建新团，各军区共扩编及新编部队约 20 个团。1944 年底，晋察冀根据地共有县级政权 110 多个，包括三万多个行政村，总面积 20 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近 2 000 万[6]。

在晋冀鲁豫军区，1944 年的攻势作战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晋冀鲁豫军区发动局部反攻主要着眼于三个方向：其一，攻克或逼退深入抗日根据地的日伪军据点，以消除日伪对根据地中心的威胁；其二，对敌人借以封锁隔绝根据地内部以及与其他根据地联系的封锁线进行破袭，逐步将小块的游击区连接扩大为抗日根据地；其三，进行攻势作战，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1944 年春，日军为准备河南会战，抽调大批兵力南下，晋冀鲁豫军区所面临的形势得到极大改善。晋冀鲁豫军区部队随即加紧了对于深入根据地的日伪军据点的围困。1944 年 2 月，太行三分区部队向蟠（龙）武（乡）线上发动攻击，扫清全线敌军，收复了深入根据地腹心，已为抗日军民围困八个月之久的蟠龙镇。紧接着太行 2、3 分区部队乘胜向榆（社）武（乡）

一线进攻，3 月底收复榆社县城，肃清了榆武线的日伪军。4 月发起水（冶）林（县）战役，收复林县县城，歼敌900余人。此后，太行区军民继续发动攻势，对辽县、陵川等进行围困，并且出击新乡、辉县及平汉路部分地区，摧毁日伪军对根据地的封锁线，大大扩展了根据地的范围。1944 年初，太岳军区部队收复了沁水县城。6 月，为开辟豫北地区，太岳军区派出有力部队进入豫北。经过连续战斗，消灭日伪军 800 余人，争取伪军 1 000 多人反正，解放人口 10 万以上，建立 6 个区政权，开辟了东起坡头镇，西至垣曲城附近 75 公里，纵深约 35 公里的地区，同时控制了黄河芮村、蓼坞等渡口，[7]为后来八路军南渡黄河，发展河南创造了先期条件。

1944 年 5 月 11 日，根据华北局的决定，冀南和冀鲁豫两区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平原分局及新的冀鲁豫军区。冀鲁豫军区成立后，即对日伪军展开攻势，发动了昆（山）张（球）战役。从 11 日至 17 日，一周之内就收复了戴庙、寿张集等 50 余处据点，消灭伪军 1 200 余人，摧毁了寿张至郓城的封锁线，昆张地区全部收复。5 月 29 日晚，冀鲁豫军区军民趁夜突袭清丰城，当时城内共有清丰、大名、南乐县的保安队共 4 800 人和日军约三百人的教导队及一个护卫小队，然而防备松懈。经过激战，“到第二天的夜里，离此最近的南村集日本警备队赶来时，只剩下日本人 8 名、保安队 30 多名，名取大尉（日本陆军联络部代理部长）、川本道联络员战死，薛道尹（冀南道道尹）被俘”。[8]随后冀鲁豫军区又发动了夏季攻势，湖西地区抗日军民收复了单县、鱼台、丰县、沛县之间的广大地区，歼敌伪军 1 300 余人，摧毁敌据点 97 处，恢复了湖西区。鲁西北军民也于 8 月初收复莘县，解放了莘县全境。此后，冀鲁豫军民又发起讨伐伪军刘本功的战役，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共消灭伪军 2 600 余人，攻克敌伪据点 37 处，摧毁了黄河大堤封锁线。1944 年冬，冀鲁豫军区又发动了冬季攻势，攻克两座县城和十余个据点。1944 年，冀鲁豫军区军民积极发动攻势作战，共作战 3 604 次，攻克据点、碉堡 395 处，毙伤日伪军 1.6 万余人，俘日军 27 人，俘伪军 32 929 人，收复清丰、内黄、朝城、莘县、寿张、丘县、濮阳七座县城。[9]

至 1944 年底，经过一年的攻势作战，晋冀鲁豫军民共毙伤日伪军 3.8 万人，俘 3.4 万人，争取伪军反正、投诚 3 200 余人，收复县城 11 座，把许多被分割的小块游击区变成了大块的根据地，整个抗日根据地得到迅速的发展，为 1945 年的大反攻准备了条件。



在晋绥区，随着日军兵力不断减少，新兵代替老兵，战斗力大幅下降，晋绥区军民乘机继续奉行“挤敌人”的策略，围困和挤走深入根据地的日伪据点。从1月至8月，晋西北区军民共挤掉日伪军据点58处，收复2655个村庄，解放群众364 500余人[⑩]，恢复和扩大了根据地。8月中旬，晋绥军区对即将展开的秋季攻势进行了研究部署。8月28日，秋季攻势首先从忻静公路和王寨地区展开，先后攻克了利润、风子头、沟口等据点，随后又袭击了岚离公路线的敌人。9月，中外记者参观团从延安到达晋西北，为了扩大抗日根据地的国际影响，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诬蔑，晋绥军区发动了对敌重兵防守的汾阳城的进攻，并获得了汾阳战斗的胜利。汾阳战斗胜利后，晋绥区军民又取得了娄烦战斗和东社、五元城战斗的胜利。从8月28日到9月30日，在一个月的秋季攻势作战中，晋绥区军民共进行大小战斗297次，攻克敌据点48处，毙伤日军499名，伪军414名，俘日军29名，伪军1 014名，解放村庄440多个，人口5万余人，收复国土770多平方公里。[⑪]

1944年，驻防山东的日军第十二军主力为了参加豫湘桂会战而调往河南，留在山东的日军只剩下第五十九师团、独立混成第五旅团及临时编组的独立步兵第一旅团，共约2.5万人。虽然伪军的数量大量增加，达到20多万人，以接替日军守备。然而伪军数量虽多，战斗力却很弱，且受敌后武工队政治攻势的影响很大，军心不稳。山东军区抗日军民遂利用日军收缩兵力，采取“重点主义”配置，调整退缩的有利时机，集中力量对日伪军展开了攻势作战。

1944年1月，滨海区军民率先发起了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对临沂、莒县、赣榆地区的日伪军据点展开进攻，经过三个多月的战斗，攻克多处日伪军据点。从3月份开始，山东军区的军民发动了春季攻势。春季攻势以鲁中军区第三次讨伐吴化文的战役拉开序幕。3月25日，鲁中军区经过周密布置，集中八个团和14个民兵中队的兵力向吴化文部展开进攻。经过20多天的战斗，于4月18日击溃吴化文部，歼敌7 000余人，占其原有兵力的60%以上，攻克40处据点，重要山寨12处，解放人口30多万。5月上旬，山东军区各部又陆续展开了夏季攻势。5月1日，鲁南军民发动了讨伐伪军荣子恒战役，全歼荣部第二师，击毙第二师师长刘国祯，解放了崮山区。7月23日至8月5日，滨海军区军民又发起讨伐伪军李永平的战役，歼灭日伪军近700人。8月15日，鲁中区军民继讨伐吴化文后又发起解放沂水的战役，经激战歼灭日伪军1 000余人，攻克沂水县城。8月17日，渤海区军民又攻克了利津城，歼灭日伪军1 000余人，扩大了渤海根据地的基本地

区。日伪军频遭打击，为了对根据地军民进行报复，日伪军调集大批军队从8月下旬开始对滨海区发动扫荡，企图合击山东军区指挥机关。山东军区领导为了配合滨海区军民反扫荡，指示其他各区又发动了秋季攻势。鲁中区于9月初伏击并歼灭了日军1个大队主力约300余人及伪军1 000余人。胶东区军民经过1个多月作战，歼灭日伪军5 000余人。渤海区军民从8月下旬到10月下旬发起攻势作战，消灭日伪军5 000余人，攻克了乐陵、临邑、南皮三座县城。11月中旬，山东军区组织滨海、鲁中军民发起了莒县战役，最终攻克莒县，歼日军一部，争取伪军3 000余人反正。1944年，山东军区主要作战3 514次，其中进攻战斗占73%；攻克与逼退日伪军据点1 265处，占原有敌伪据点半数以上；毙伤日军4 580余人，俘日军292名，歼灭伪军5.4万人，争取伪军1.1万人反正；解放国土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930万；主力部队与民兵都比1943年扩大1/3，军队发展到15万人，民兵游击队发展到37万人。⑫

综上所述，1944年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在中央和各地方军区的正确指导下，对日军及伪军展开的局部反攻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改变了敌后战场的形势，扩大了解放区，缩小了敌占区，为1945年的大反攻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文献选编》第1册（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896页。

②参见《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关于北岳各地向外发展问题的指示》（1944年3月24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文献选编》第1册（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918页。

③⑤⑥何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13页，第413页，第414页。

④⑦⑨⑫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下），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页，第336页，第337页，第334页。

⑧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下），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6~337页。

⑩⑪龚古今，唐培吉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3页，第235页。



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摆脱严重困难局面

抗日战争进入到1943年，虽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日趋好转，然而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仍然处于严重困难的局面。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华中地区是汪伪政权统治的中心区域，日军为了缩减在华兵力，极力扩充汪伪政权的军事实力，使在华中的伪军总数由18.5万人增加到22.8万人，而且在华中伪军的主要作战对象就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另一方面，华中地区由于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而且极有可能成为日后美军登陆中国，进而进攻日本本土的主要作战地区，因此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根据日军大本营的《对华新政策》和1943年度《对华作战指导计划》，不断调整日军在华中对新四军的兵力部署，以独立混成第十二、十三旅团和由日本调来的独立混成第六十一旅团，分别扩编成第六十四、第六十五和第六十一等三个师团，以替补调往太平洋战场的第十五、第十七师团，以确保在对国民党正面战争发动进攻的同时，对新四军作战的兵力保持在11万人左右[①]。而在华中的国民党军队，继续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积极准备对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进犯。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毛泽东1月5日和中共中央1月10日关于华中地区党和新四军在严峻形势下继续开展对敌斗争的指示，于1月28日向各抗日根据地发出了《关于坚持敌后艰苦斗争的指示》。《指示》指出："在此苏、英、美力量日益加强，德、意法西斯总崩溃为期不远的时候，日寇冒险北进与继续南进虽将遭遇重大的困难，但它为着最后挣扎起见而向中国发动局部攻势，尤其是对我敌后进行残酷的全面'扫荡'，是势在难免的。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局势，一方面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已更加接近胜利；另一方面是我敌后抗战的局面更日趋困难"。因此要求"我华中全党、全军对今后华中敌后空前严重与高度复杂的斗争形势必须有明确的估计，对敌寇的'扫荡'、'清乡'以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等联合的进攻，必须有充分的准备"。要求我党我军"从

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动员全党千百倍提高信心及警惕，在任何严重环境下，咬紧牙关，坚持敌后两年最艰苦的斗争。”[②]在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的正确指示的引导下，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积极按照领导机关的部署开始了艰苦的反“扫荡”和反“清乡”斗争。

事实上，日军和伪军对华中的大规模扫荡从1942年冬就已经拉开序幕。1942年冬，日军继扫荡山东抗日根据地后，将扫荡重点转向了华中的淮海、淮北与淮南地区。1942年11月14日，日军集中第十七师团一部和伪军第三十六师共5 000余人的兵力对淮海区展开扫荡。在淮海区军民的灵活机动的战术下，日军的扫荡劳而无功。同时，日军第十七师团、第十三旅团各一部及伪军共6 000余人，对淮北区进行扫荡，经过朱家岗等战斗，淮北区军民胜利粉碎了日军的扫荡。与此同时，淮南抗日军民也粉碎了日伪军2 000余人对定远地区的扫荡。[③]

在扫荡淮海、淮北、淮南的同时，敌人就已经开始向苏北盐阜地区和苏中抗日根据地内各据点增兵，并且加紧侦察和作战演习，随时准备发动扫荡作战。1943年1月底，日军第十七师团一部自徐州地区向淮阴、涟水方向前进，封锁了盐河及运河交通线；另一部自海州向新安镇、响水口一线前进。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主力则由如皋、东台地区向盐城、兴化、宝应等地集结；原驻江南的日军第十五师团一部也经镇江陆续向兴宝应、淮阴、淮安之线前进。同时，驻守兴化、淮阴、盐城、响水等地的伪军也相继出动。[④]日军与伪军不断运动，逐渐对新四军活动的盐阜地区以及国民党韩德勤部驻守的曹甸、凤谷村地区形成了包围之势。2月12日，敌军集中兵力首先对盐阜地区的韩德勤部进行合击，迅速占领了凤谷村、车桥、曹甸等地区，韩德勤部一触即溃，除一部分投敌外，大部分国民党官兵在新四军掩护下退入淮海抗日根据地。敌军在占领韩部原控制地区后，随即集中14 000余人，采取拉网合围的战术，向盐阜抗日根据地发起大规模扫荡作战。2月17日至19日，敌军反复合击阜宁、陈集、佃湖、东坎、北察桥、王汛港、鲍家墩等地，其后，又对八滩、六合庄等地进行清剿。在敌人的攻势下，新四军第三师留下一部分兵力在根据地坚持斗争，阻滞敌人。部队主力则向阜宁东部和淮海地区转移，与淮海区当地抗日武装联合发动攻势，连克日伪军据点。22日，在钱集消灭日伪军200余人，24日，攻克高家舍、龙集等据点。

与此同时，新四军第一师、第二师、第四师也发动一系列攻势，攻克洋



河镇等据点，并且一度袭入淮阴城[5]。日伪军在内线围歼新四军主力扑空，在后方接连遭受打击的情况下，被迫于3月11日向新浦、淮阴、盐城等地撤退，新四军各部立即转入反击作战。3月14日至19日，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先后在七套、黄营子、单家港、陈集等地歼灭日伪军500余人。至4月1日，日伪军被迫退出盐阜地区，抗日根据地军民以歼敌1 800余人，攻克据点50余个的辉煌战绩粉碎了敌军对盐阜地区的扫荡。

敌伪军在扫荡盐阜地区的同时，错误的判断新四军军部已西移皖中，继又发现新四军一部已南移到苏南地区。敌军遂开始于3月初对苏南地区进行扫荡，并且于3、4月间，两度奔袭皖中，妄图消灭新四军领导机关，但均被打退。与此同时，敌军第十七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在由盐阜区扫荡后向西和向南撤退途中，还扫荡了淮北和苏中区的部分地区，也被抗日军民打退。[6]

在苏中区，1943年4月初，华中日军根据1942年敌中国派遣军和汪伪中央“清乡工作委员会”制定的《1943年上半年清乡工作要领》，计划以对南京、上海及长江下游威胁最大的苏中区作为重点对象进行清乡。但是由于敌军兵力不足，敌伪在向苏中区清乡时，选择了临江濒海、易于分割封锁的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即南通、如皋、海门、启东），作为第一期“清乡实验区”。此次清乡，敌伪计划从4月开始进行为期六个月的清乡，分两步实施。第一步，以两个月为期限进行所谓的“军事清乡”；第二步，进行四个月的“政治清乡”，以消灭或驱逐苏中区抗日领导机关，彻底伪化上述地区。[7]在敌伪清乡开始前，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就根据敌伪的动向，发出了反清乡斗争的指示，要求苏中区军民不可麻痹大意，一定要进行充分准备，周密部署，彻底粉碎敌人的企图。苏中区党委和军区领导根据上级指示和苏南区反清乡的经验教训，结合苏中区实际以及敌我情况，确定了坚持原地斗争，以武装斗争为主的反清乡斗争方针，要求在敌清乡区内的部队和地方党政组织，应加强战时工作，广泛发动游击战，掀起群众斗争高潮，积极发动民兵及自卫队，确定重点尤其是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伪军的斗争意志，运用各种手段和策略彻底粉碎敌伪军之企图。[8]

1943年4月1日，敌伪军集中了日军第六十师及伪军一部共1.5万余兵力，开始了对苏中第四军分区的“军事清乡”。南通、如皋、海门和启东境内各据点之敌也纷纷出动，采取梳篦、拉网式的战术，分多路向抗日根据地各中心区分进合击，企图寻歼新四军主力，摧毁根据地领导机关，同时在根

据地大肆增筑据点，以据点为依托，不断对根据地各村镇进行搜剿。在敌伪军对根据地内进行清乡的同时，敌伪还在清乡地区周围构筑封锁圈，设立瞭望哨和检查站，盘查来往行人，以隔断清乡区内外之联系。通、如、海、启区抗日军民在苏中区党委和军分区领导下，采取内外线紧密配合的策略，对敌人的清乡进行坚决的斗争。当敌伪对根据地进行合击之时，新四军主力大部跃出敌人包围圈，转移到清乡区边缘上，对敌伪后方和交通线发动袭击，配合内线粉碎敌人合击，先后攻入唐家闸，袭击聚星镇，摧毁古坝等据点。当敌伪进入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时，留在根据地的新四军和地方武装，依靠群众掩护，在敌伪清剿的空隙中，灵活穿插，避敌主力，主要攻击敌人的“清乡队”；同时大量组织短枪队，潜入敌军据点和所驻扎的村镇，袭击敌人的清乡机构，捕杀敌伪清乡人员，镇压汉奸、通敌分子。在抗日根据地军民内外线的有力配合下，敌伪的军事清乡进展缓慢，收效甚微。至5月底，敌伪军事清乡即告结束。

6月初，敌伪按其原定计划开始清乡第二步，即“政治清乡”。敌伪计划“6月强化启东，7月强化海门，8月强化南通，9月强化如皋”。[⑨]敌伪调集大批军警宪特和保甲人员，并且诱迫大量反动地主、士绅以及旧乡长保长，在抗日根据地强制推行伪保甲制度，进一步搜捕新四军和根据地党政领导干部。针对敌人的保甲措施，抗日根据地军民一方面积极通过武装斗争，以民兵和短枪队对敌伪保甲工作人员进行打击，镇压汉奸和土豪劣绅；另一方面向群众宣传敌伪保甲制度的险恶用心，同时发动政治攻势，对地主、士绅和旧乡保长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反保甲斗争的同时，新四军主力在清乡区边缘接连发动攻势，迫使部分日伪军撤出了清乡区。在清乡区内的新四军和地方武装则趁机摧毁敌伪保甲制度，从而打乱了敌伪分区分期进行“政治清乡”的计划。8月以后，敌伪在分区清乡失败后，转而采取“机动清乡”，四处出动，既试图寻歼新四军，又要强编保甲。然而这种做法，使敌伪兵力不足的弱点更加暴露。而且在抗日军民的打击下，伪军普遍出现了动摇的情势。因此从8月15日开始，抗日军民对日伪军发动了全面的政治攻势，取得了很大成效。9月6日至18日，又发动了全面的军事攻势。至9月底，敌伪的“政治清乡”宣告失败。

敌伪在为期六个月的清乡计划破产后，不甘心就此失败，又发动了持续三个月的“延期清乡”，试图以“三光”政策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抗日根据地军民继续实施内外线结合打击敌人的策略，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奋战，



最终粉碎了敌伪军的“延期清乡”。

在为期九个多月的反清乡斗争中，苏中第四军分区的抗日军民，共作战2 100余次，毙伤敌伪军、镇压清乡人员2 400余名，并争取了1 700余名伪军、伪组织人员投诚，[⑩]挫败了敌人的清乡计划，保卫了抗日根据地。

在苏中区反清乡斗争同时，苏南、浙东和鄂豫皖边区军民也在进行着反清乡斗争，并且最终也取得了胜利。至1943年9月，汪伪的清乡组织实际上已经解散，日伪的大规模清乡亦告结束。[⑪]

1943年是华中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一年，但是华中敌后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不但通过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加强了抗日根据地的实力，而且通过艰苦奋战，粉碎了日伪军无数次的扫荡和清乡，摆脱了严重困难局面，为1944年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动局部反攻创造了条件。

注释：

①④⑥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82页，第384页，第388页。

②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苏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华中局》，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194页。

③⑤⑦⑨⑩龚古今，唐培吉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4～125页，第125～126页，第257～258页，第259页，第262页。

⑧参见粟裕：《论坚持苏中斗争与任务》（1943年2月），马洪武，王德宝等编辑，《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3～116页。

⑪胡德坤：《中日战争史（193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96页。

华中根据地的恢复与局部反攻

1944年，随着太平洋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华中地区敌我态势开始发生有利于抗日军民的转变。日军为了继续加强太平战场的作战兵力和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发动攻势的需要，从华中地区调走了第十一军和第十四军所辖14个师团中的八个师团，而以新编成的独立步兵旅团和野战补充队接替调走师团的防务，日军在华中的总兵力由21万人减少到17万人。虽然日军为了弥补兵力的不足而大力扩充并强化伪军和伪组织，使伪军的兵力由20万人增加到35万人，[①]但是在华中抗日军民的政治攻势下，伪军战心动摇，士气低落，部分伪军甚至可能为抗日军民所用，对日寇反戈一击。与此相比，华中新四军积极抗日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内发展民主，保障人民生活，因此得到人民的极大支持，军事力量不断壮大。到1943年新四军已壮大到125 892人，民兵也发展到55万人。[②]

在这种形势日趋好转的情况下，华中抗日根据地胜利地渡过了最困难的1943年，开始进入恢复和再发展的阶段。华中区党和军队积极贯彻中共中央的关于抓住时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开始积极部署。一方面针对敌人的清乡展开坚决斗争，巩固和恢复抗日根据地；另一面主动地有重点地对日军及伪军展开攻势作战，发动局部反攻，以扩大抗日根据地。

在苏中抗日根据地，1944年春，日伪军除继续对苏中第四军分区进行“清乡”外，还积极布置对江都（今扬州）、泰州、海安、李堡一线以南地区（即第三军分区）进行“清乡”，对东台沿海地区（第二军分区）进行“强化屯垦”。苏中军区为了打破敌人的“清乡”和“屯垦”计划，发动抗日军民于1944年一、二月间以高邮、兴化、宝应、东台、泰州、泰兴、如皋等地区为重点，对敌伪军展开了连续的攻势作战，相继攻克大官庄、王家营、运粮河、古溪镇以及安丰等敌伪17处据点，并且争取了1 000余名伪军反正。3月上旬，为了进一步改善苏中局面，打通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的战略联系，以粟裕率领的新四军第一师为主力，发起了以夺取车桥为战



役目标的攻势作战。之所以把车桥作为此次攻势作战的目标，一方面由于车桥是位于淮安和宝应之间的一个大镇，是连接苏中和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枢纽，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控制在抗日军民手中可以将苏中区与苏北区连为一片，在敌伪手中则成为敌伪分割抗日根据地，进行分而打击的桥头堡。另一方面车桥处于日军第六十四师团和第六十五师团的结合部，属于突出部，却仅由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大队据守，力量比较薄弱。为了集中兵力，最大限度的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苏中军区集中了第一师的五个多团的兵力，组成了三个纵队，采取攻点打援的战术，以一个纵队攻击车桥，另两个纵队则隐蔽于车桥外围，准备歼灭敌人援军。

1944年3月5日，新四军参与车桥战役的部队隐蔽集结于车桥地区。凌晨1时50分，车桥战役正式打响。担任攻城的突击部队绕开敌人的外围据点直取车桥，在炮兵大队的火力支援下，一举突入车桥镇内，经一夜激战，全歼伪军一个大队，并将日军压缩包围于核心工事。新四军攻城战斗打响后，车桥周围的敌军纷纷出动，分五批在淮安集结，并先后驰援车桥。当第一批援敌到达车桥以西的卢家滩之时，早已埋伏于此的新四军阻援部队立即开火，将敌人迫人预设地雷阵。新四军遂趁雷群爆炸，奋勇出击，歼敌240余人。之后，又对继续增援之敌军以歼灭性打击。6日清晨，车桥的残余日军趁隙逃窜，新四军乘胜扩张战果，至13日收复泾口、曹甸等据点12处，车桥战役胜利结束。[③]此次战役，共歼灭日军三泽大佐以下465人，（内活捉中尉以下24人），伪军483人（内生俘168人），解放了车桥镇。这一战役的胜利，打乱了敌人的清乡和屯垦计划，进一步沟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的联系。

车桥战役后，为了彻底粉碎敌伪对第四军分区的清乡，苏中第四军分区军民于5月发动攻势作战，先后攻克敌伪据点28处，歼灭日伪军近1 000人。6月，新四军第一师又在如皋海河滩歼灭日伪军500余人，并乘胜攻克敌伪据点南坎镇，同时歼灭了来援之敌。与之同时，南通、海门、如皋各地的抗日地方武装、民兵和群众五万余人，发动了为时20多天的破击战，破袭公路700余公里，炸毁桥梁50多座。收缴电线1 400公斤，电杆400余根，并逼退了兵房、三余、北新桥等一批日伪据点。7月初，军分区部队相继攻占洪家垛、戴家窑、石庄镇等重要据点。攻占八总店、鲍家坝等据点。9月，苏中第四军分区部队再次组织了历时45天的攻势作战，基本收复了在“清乡”中被敌伪侵占的地区，[④]这也标志着苏中军民最终取得了反“清

乡”斗争的伟大胜利。

在苏北区抗日根据地活动的新四军主力部队是黄克诚所率领的第三师。为了反击日伪军的所谓“第二期治安肃正”作战，苏北军区部队于1944年1月开始，展开了攻势作战，接连攻克塘沟、史集等据点，3月上旬，又攻克了王集、钱集等五个据点。经过三个月的战斗，基本恢复了1942年冬敌伪大扫荡之前的抗日根据地。为了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改善苏北抗日的局面，苏北军区决定以第三师一部为主力，地方武装配合，在涟水西北的六塘河地区发动攻势，发起了高沟、杨口战役。高沟、杨口地区被伪徐海绥靖军第七十二旅所控制，伪军以该地为核心，控制了前后六塘河地区，不断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和骚扰。4月19日，苏北军区集中了第三师的第十旅主力和第七旅一部，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法，首先包围高沟。25日，在炮火掩护下，新四军放弃了所擅长的夜战，出敌不意的于白天发起攻击，一举攻克高沟，全歼守敌。随后，集中兵力围攻杨口，于28日攻克杨口，并且歼灭自新安镇、大伊山等地驰援而来的敌军140余人。[⑤]这次战役是华中新四军继车桥战役后又一次较大规模的歼灭战，共歼灭日伪军一个旅又一个大队总计2 000余人，收复了六塘河两岸地区，使淮海区和盐阜区两个抗日根据地连为一片。

在进行高沟、杨口战役的同时，新四军第三师一部还攻克了连云港南面的灌河口重镇陈家港和陇海路南侧的高流镇，歼灭日伪军三个大队800余人。6月下旬，第三师又对滨海地区的敌伪军展开攻势，先后攻克交通要冲大兴镇、青龙港等地，并一度攻入敌伪掠夺苏北棉盐资源的基地——合德镇，全歼伪军800余人、日军70余人，缴获大批食盐和棉花，并且在灌河和射阳河之间开辟了部分新区，从而彻底粉碎了敌伪的“屯垦”计划。9月至11月，第三师又接连发动攻势，首先于9月上旬，攻克了宿迁以南敌伪的重要据点林公渡，粉碎了日伪军隔断苏北和淮北两大根据地战略联系的企图。随后又于10月再度攻入合德镇；11月攻入阜宁，从而彻底粉碎了敌伪军对苏北地区的长期清剿。[⑥]苏中区和苏北区军民经过近一年的攻势作战，最终将苏北区和苏中区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在淮北区进行抗日活动的主力是彭雪枫所率领的新四军第四师。1944年3月中旬，日伪军对淮北区的淮阴、泗县等地区进行了为期三天的扫荡，之后又对淮北区部分地区进行了扫荡。为了配合反扫荡作战，淮北军区其他部队自3月16日起对敌伪发起了历时三个半月的军事和政治联合攻势。至



5 月 5 日为止，先后攻克大店集、老韩圩、小溪等敌伪据点 46 处，破坏并控制宿（县）灵（璧）公路之大店集至灵璧段以及泗（县）宿（迁）公路，使泗县、灵璧外围除前后张楼等据点外，其余据点全被扫清；邳（县）睢（宁）铜（山）区除运河沿线、陇海铁路、海郑公路及睢宁城北之魏集、车甸外，已无敌踪。⑦6 月，又发起了以攻取泗县北部的张楼据点为主要目标的战役，先拔掉张楼外围之朱场、三周家等据点，7 月 11 日最终攻克前后张楼据点，全歼伪军一个总队共计 500 余人，在阻击敌伪军增援的战斗中，又歼灭伪军一个总队以及日军一部。张楼战役的胜利，使泗北地区全部为抗日军民所控制。

1944 年 4 月日军发动河南会战，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大规模进攻，国民党驻守河南的大部分军队不战而逃，河南广大地区迅速沦于敌手。中共中央为了开展河南地区的抗战局面并且从战略上将华中、华北、陕北三大抗日根据地连接起来，提出了向河南敌后发展、控制中原的战略方针和任务。7 月下旬，中共中央向华中区做出进军河南的部署，调新四军第五师一部沿平汉铁路两侧向北发展，⑧第四师一部西进豫皖苏边，以打通睢杞太地区的联系，控制新黄河以东地区。华中局根据党中央指示，决定以第四师主力五个团西进河南。1944 年 8 月，彭雪枫率第四师主力从淮北区向豫皖苏边进军。进军途中，冲破了日伪军及国民党顽军的阻拦，到达肖县、永城、宿县地区。9 月，国民党顽固派以四个师、七个纵队的优势兵力，企图趁第四师立足未稳之机，一举歼灭新四军。中旬，顽军开始分三路合击。新四军展开顽强反击，第四师师长彭雪枫不幸牺牲。然而第四师在新任师长张爱萍的指挥下，接连挫败了国民党顽军与日伪军的联合进攻，重建了抗日民主政府，基本上恢复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第五师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分兵北上和南下，于 1944 年 4 月发动豫南战役，收复信（阳）西、确（山）西、遂平、汝南等县，在湘鄂边解放了嘉鱼、岳阳、华容、公安等地。12 月，新四军 5 师与南下的八路军第三五十九旅主力顺利会师，共同收复了鄂南、湘北、赣北的广大地区，成立了湘鄂赣军区。

1944 年上半年，罗炳辉率领第二师和谭希霖率领的第七师，以主力一部和地方武装、民兵积极进攻敌伪守备薄弱的据点，第七师还向安庆敌后地区发动攻势，攻克敌伪据点十余处，扩大了游击区。同时，淮南区地方武装也不断对敌展开攻势。1944 年 1 月 24 日，淮南军区津浦路东军分区的盱嘉支队趁夜袭入盱眙县城，歼灭伪县政府、警察局，消灭伪保安队一部，共计歼敌 200 余人。2 月，浦六工委武工队夜袭六合县瓜埠镇伪区公所及伪军，

歼俘伪区长以下 200 余人。⑨

11 月上旬，敌伪集中 7 000 余人的兵力，分七路向淮南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扫荡作战，国进党顽军第一百七十一师主力也趁机大举进攻，与日伪军联合夹击敌后抗日军民。新四军在抗日根据地人民的积极支援下，对敌顽先后展开打击，首先打退了伪军的扫荡，紧接着对国民党顽军展开反击，经占鸡岗战斗，全歼顽军 1 600 余人。到 11 月 2 日，彻底粉碎了敌顽的夹击。

在苏南抗日根据地，由谭震林和王必成率领的新四军第六师于 8 月发动了长兴战役，攻入长兴城，歼灭伪军四个营。10 月下旬，第六师又在溧阳、高淳、郎溪间发动攻势，连克南渡、周城、社渚等据点，歼灭伪军一个团。12 月中旬，又发动泗安战役，歼灭伪军两个营，俘伪营长以下 400 余人，攻克泗安镇。⑩

1944 年，华中敌后军民积极开展攻势作战，共歼敌五万余人，解放国土 7 400 余平方公里，人口 160 余万，基本上制止了日伪军对根据地的进攻，沟通了津浦路东各根据地的联系，而且还向鄂豫湘赣等省边境扩大了游击区，从而为 1945 年的大反攻创造了条件。

注释：

①③⑤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 2 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 2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 418 页，第 418 ~ 419 页，第 420 页。

②《新四军对日军实施反攻》，魏宏运主编：《民国史纪事本末》第 6 册，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 版，第 556 页。

④田玄，《铁军纵横——华中抗战的新四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 297 页。

⑥⑩龚古今，唐培吉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 266 页，第 272 页。

⑦⑨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下），解放军出版社，1994 年版，第 343 页，第 344 页。

⑧《关于华中部队准备向河南发展的指示》（1944 年 6 月 23 日刘少奇、陈毅致张云逸、饶漱石、李先念、郑位三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版，第 259 ~ 260 页。



不利的国际国内形势

1943 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日趋好转，在苏德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上，盟军逐步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蒋介石面对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好形势，却出现了一喜一惧两种心态。毛泽东同志曾生动地刻画蒋介石当时的心情说："喜的是他们以为欧洲解决，英美可以腾出手来替他们打日本，他们可以不费力气地搬回南京。惧的是三个法西斯国一齐倒台，世界成了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伟大解放时代，国民党的买办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成了世界自由民主汪洋大海中的一个渺小的孤岛，他们惧怕自己'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有灭顶之灾。"[①]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正确方针政策的指引下，经受住了日军的疯狂扫荡和对根据地的破坏，以华北抗日根据地为代表开始转入恢复和再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逐渐壮大，又重新刺激了国民党的反共心理。在 1941 ~ 1942 年间，由于日军的疯狂扫荡，敌后抗日根据地遭受了巨大损失，蒋介石认为共产党的力量已不足以威胁自己的统治，因此在皖南事变以后，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趋于温和，试图通过谈判将中国共产党纳入自己的统治。然而由于国民党方面缺乏诚意，并且还将国共矛盾公之于众，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不满，改变了对国民党的让步，最终国共谈判不欢而散。蒋介石为了巩固国民党一党专政，消除中国共产党的威胁，因此又开始积极准备发动新的反共行动。

1943 年 3 月，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由陶希圣代笔，以蒋介石名义正式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该书比较完整地表述了蒋介石集团的立场、观点和内外政策。在书中，蒋介石继续阐释他自 30 代初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解释，为自己专制独裁的法西斯统治寻找理论基石，表明了蒋介石坚决反对自由民主和共产主义的反动立场。《中国之命运》一书，首先极力宣扬法西斯的民族血统论，说"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而且"融合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四海之内，各地的宗族，若非

同源于一个始祖，即是相结以累世的婚姻”，因此，“中华民族是同一血统的宗族宗支”。由此推导出说中华民族是单一的民族，极力吹捧大汉族主义，无视其他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随后，它又极力宣扬“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提出“这一部悠久的历史，基于中华民族固有的德行，复发扬中华民族崇高的文化”，并且指出“中国国民道德的教条，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而中国立国的纲维，为礼义廉耻”。《中国之命运》一书认为中华民族正是“在这四维八德的熏陶之下”，从而“立己则尽分而不渝，爱人则推己而不争。义之所在，则当仁不让，利之所在，则纤介无私。不畏强暴，不欺弱小。”总之，该书极力宣扬中国固有文化对中国以及东亚世界的意义，号召国民“为大群牺牲小体，为他人牺牲自我，而养成其自卫则坚忍，处世则和平”，其实质是要求全体国民遵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书中把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原因，归结于中国固有文化精神之没落，从而极力美化中国的封建精神，并将家族、乡社、保甲等束缚人民群众的封建组织说成是最完备的社会组织。总之是极力为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寻找理论基础。

《中国之命运》一书还竭力歪曲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为蒋介石背叛革命从而导致国共合作破裂的历史进行大规模篡改。书中指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使中国国民党的基础几至于破坏，国民革命的生命几至于绝灭的事件，就是民国十五年之间汪兆铭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民党中及国民革命军中积极的进行分化工作”，而且认为当时“全国民众的革命运动，皆归于国民革命的青天白日旗帜之下”。这种论调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蒋介石对于国共联合抗日的第二次合作自始至终即抱有敌视之态度，也暗示了蒋介石集团即将再次破坏国共合作的局面。对于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书中也极尽污蔑之能事，认为“他们对于中国文化，都是只求其变而不知其常的。他们对于西洋文化，都是只仿其形迹，而不求其精义以裨益中国的国计民生。致使一般文人学子，丧失了自尊与自信”。并且作出结论说，“他们的思想，也能流行一时，他们的主张，也能鼓动民众。但是他们的思想和主张，在客观上是与我民族的心理和性情，根本不能相应的；而在主观上更并无什么根，不过是人云亦云，所以不能不跟随他人的尾巴随时摇摆，随时变化，而其所变化的又都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东西。所以他们领导的各种学说和运动。只能暂而不能久，而且没有不是自误误人，潦倒一生的。”书中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污蔑，从根本上是为了强调蒋介石所宣扬的伪三民主



义，是为了自己的法西斯统治奠定理论基础。

对于中国将来的命运，书中极力夸大国民党的作用，认为“中国国民党乃是中国国民共有共享的一个建国的总机关”，“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如果中国国民党革命失败了，那亦就是中国国家整个的失败。”狂妄地叫嚣“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对于一起合作抗日且为抗日战争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国共产党，书中却进行恶毒的攻击和污蔑，把共产党称作为“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认为“如果这样武力割据，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势力，存留一日，国家政治就一日不能上轨道”，若“仍如过去之封建军阀武力割据，破坏统一，妨碍建设”，则“中国的命运为衰落，为灭亡”，因此认为中国之命运“其决定即此抗战时期，而不出于这二年之中”，透露出蒋介石意图在两年之内彻底解决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民主力量的狂妄野心。②

《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后，国民党中宣部通令国统区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团体、学校均须购阅。《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发表社论《读〈中国之命运〉》，欢呼“这个大著已经指出了中国革命建国的指南针，已经照耀了中国独立自由的大道。”③日本帝国主义也对此书极力加以赞扬。同盟社评论说：《中国之命运》一书，“如果说其论述之方向，那是没有错误的。但由日本人观之，它只是重复了已为帝国声明说尽了的大东亚秩序论，迎合大亚细亚主义，抄袭汪精卫之和平建国论”④。

《中国之命运》的出版以及国民党中央和各种媒体的宣传鼓动，国民党组织出版和发表了大批反动书刊和文章，向进步文化展开进攻，为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进行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准备。

就在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反共而紧锣密鼓地进行舆论鼓动和宣传的时候，1943年5月22日，共产国际突然宣布解散。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是1919年成立于莫斯科的作为世界革命大本营的国际组织。在组织形式上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国党都是它的一个支部，它是一个共产党世界性的统一机构。共产国际成立之后就以发动世界革命为己任。在中国，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干部，对于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虽然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共产党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曾把一些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经验和理论强加给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遭受过重大损失，而且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中国革

命道路。但是在当时的国人心中，尤其是国民党反动派看来，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与共产国际以及苏联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因此蒋介石把共产国际的解散视为发动反共浪潮的有利时机，并率先对中国共产党发动了舆论攻势。6 月 12 日，即共产国际正式宣布解散两天后，蒋介石指使西安劳动营训导处处长、复兴社特务头子张涤非，纠集了九个人，假借“民众团体”的名义，召开了十来分钟的所谓座谈会，决定给毛泽东发电报说“共产主义已经破产”，要求毛泽东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将中共也“解散”，取消“边区割据”⑤。7 月 6 日，国民党中央社立即把这条电文广为传播。接着，7 日以所谓“陇海路员工七七纪念大会”，19 日，以“皖省临时参政会”，25 日，“以屯溪各法团”，27 日，以“长沙文化界”，28 日，以“桂林市记者公会”，30 日，以“洛阳记者公会”，31 日，“以洛阳文化界”及“鲁山新闻记者分会”等名义“致电毛泽东”，“即日解除中共组织”，“取消边区政府”，大造反共舆论⑥。

1943 年 6 月，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军统头子戴笠拟定了《国民党解决中共问题之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认为“本年五月二十一日，莫斯科正式公布解散第三国际后，各国共党之政治地位及组织策略均将发生重大分化，中共为世界革命之派系，现已逐渐失去国际势力支援，其政治号召力必将失去或减低，中共分子之动摇心理亦必随之而剧烈”，因此“本党应把握此有利时机求中共问题之彻底解决”。《方案》认为为彻底解决中共问题，在原则上应采取“利用第三国际解散时机，把握中共弱点，以达到政治解决为原则，惟在军事上仍须施极大压力，促其就范”⑦。为了以政治解决的方式压中国共产党屈服，《方案》分别从军事、政治、党务三方面拟定了四个方案作为与中共谈判的基础。这四个方案的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方案：

军事：十八集团军完全国军化，遵照中央编制，下级干部由中央调训，改派人员接充，而其他部队一律听中央编遣。

政治：取消边区政府，听候中央处置。

党务：正式解散中国共产党。

第二方案：

军事：A. 十八集团军调驻于黄河以北指定地区。B. 取消该军原有政委制度。C. 解散该军内之共党组织。D. 其他部队一律由中央编遣。

政治：取消各边区政府、组织，听候中央处置。



党务：A. 中共修改党章党纲，改组为纯政党性之团体。B. 绝对接受三民主义服从领袖指导。

第三方案：

军事：A. 取消十八集团军中之政委制度。B. 解散该军内之共党组织。

政治：改组边区政府，恢复原有行政区，划分行政系统。

党务：保存中共现有组织之存在，但在本党任何机关中不进行秘密组织与党团活动。

第四方案：

军事：取消十八集团军之政委制度。

政治：改组陕甘宁边区为陕西省两个行政区，并放弃其在甘宁两省之侵占地区。

党务：保存中共组织之存在，但在本党之任何机关中不得进行秘密组织与党团活动[3]。

这四个方案的实质是胁迫共产党交出武装和根据地政权，否则就试图以武力为主要手段消灭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民主力量。因此蒋介石集团在加紧进行反共舆论宣传的同时，也积极进行了军事上的部署。从 1943 年 6 月开始，国民党军事当局频繁调动军队，向洛川方向集结，并且制定作战计划，准备闪击延安，以摧毁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的中枢。同时，在山东，蒋介石命令李仙洲部队立即执行很早之前就制定的向山东进军的计划，勾结于学忠部积极准备反共；在华中，命令王仲廉部与韩德勤部从东西两面进犯新四军活动的淮北抗日根据地。6 月 28 日，蒋介石要周恩来、林彪等返回延安，表示分裂反共的决心已经下定。

国民党的舆论进攻和军事进攻的准备，使得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好转的态势下，中国抗日战场的上空却逐渐弥散起内战的阴云，国民党的反共浪潮即将全面发动，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行将破裂，这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极为不利的。

注释：

①《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1943 年 10 月 5 日），《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915 页。

②以上引文参见蒋中正著：《中国之命运》，正中书局，1943 年版。

③李良志：《度尽劫波兄弟在——战时国共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1993年版，第310页。

④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9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8页。

⑤黄修荣：《国共关系史》中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7页。

⑥肖一平等：《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大事记》，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9页。

⑦⑧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国防大学出版社，第310页，第311~313页。



反击国民党的舆论进攻
作好自卫反击准备

为了制止国民党反动集团掀起的反共摩擦，打退国民党的舆论进攻，保持国共联合抗战的局面，中共中央根据粉碎国民党第一、二次反共高潮的经验，决定继续实施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1943年7月8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发出关于向国民党发动反击的指示，“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要求“各地应响应延安的宣传，在七月内先后动员当地舆论，并召集民众会议，通过要求国民政府制止内战，惩办挑拨内战分子之通电，发来新华总社，以便广播，造成压倒反动气焰之热潮，并援助陕甘宁边区之自卫斗争”。为了乘此次机会加强党内教育以及人民教育，“应将延安发表诸文件及当地发表之文件，印成小本，给予干部阅读并发动讨论”[①]。

在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前后，抗日根据地的党和抗日军民开始针对国民党的舆论进攻发起反击。为了有力地反击国民党的反共论调，揭露蒋介石集团意图消灭共产党，从而在中国建立法西斯专制统治的野心，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对其思想理论基础——《中国之命运》一书展开批判。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对《中国之命运》进行分析批判，指出：“蒋介石的这本小册子公开抛出，就是集中代表了蒋介石国民党同我们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就是要从思想上、政治上向我们党进攻。蒋介石叫嚣不消灭共产主义死不瞑目。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投降日本帝国主义，联日反共，消灭共产党。”[②]随后中共中央组织了一批党的理论工作者，于1943年7、8月间先后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批判《中国之命运》的文章。主要有：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范文澜的《谁革命？革谁的命?》；吕振羽的《国共两党的中国之命运》；艾思奇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此外，7月18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再接再厉消灭内战危机》，8月25

日，又发表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等一系列针锋相对的社论。这些批判性的文章和社论，从各个方面对《中国之命运》中的反动思想进行了分析批判。

首先，针对《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提出的“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民族血统的论调，陈伯达在文章中批判指出：“民族血统论本来是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糟粕，德、意、日法西斯就是拿这类怪论去进行侵略全世界的工具的。不料蒋先生也以血统立论，实属怪事。”文章认为蒋介石制造此种民族单一论，“其目的就在于提倡大汉族主义，欺压国内弱小民族”。针对《中国之命运》歪曲、篡改中国历史，美化封建专制统治，为帝国主义侵华开脱罪行的言论，陈伯达在文章中指出：“要救中国，必须发挥民权，必须把旧中国重新改造……其所以要把旧中国改造，不就是因为旧中国的统治太黑暗、太残酷、太落后、太虚伪吗？不就是因为旧中国的经济制度是无孔不入地剥夺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的血汗，使得广大人民饥寒交迫，因而使国民经济不得发展起来吗？不就是因为旧中国的统治方法从保甲制度到中央政权，都是窒息人民的生机及其政治活动吗？不就是因为旧中国的思想教育制度及其政策是愚民制度和愚民政策吗？”“《中国之命运》的作者竟把这样的旧中国写成‘黄金世界’”，“一切都几乎是全世界第一。可怪的，既然是一切都那么好，为什么打不过外国侵略者，而且要时常与当时的敌人作城下之盟，订立那么多的不平等条约呢？”③

其次，驳斥了《中国之命运》对国共关系史的歪曲和篡改，驳斥了其对共产主义的恶毒攻击，谴责了蒋介石集团所鼓吹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等反动谬论。中国共产党人在文章和社论中用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批驳了蒋介石捏造的所谓中国共产党阴谋破坏国民党的历史，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的伟大贡献，揭示了蒋介石反动集团如何篡夺革命领导权，破坏国共合作，屠杀革命群众的累累罪行。在批驳的文章和社论中，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之命运》所宣扬的“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论调，针锋相对地提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中国共产党人指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大革命以来直至今天的中国国民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则不但大革命的局面不可设想，即使六年来伟大抗战的局面也不可设想”。而范文澜的文章则从国民党所代表的阶级及其所联系的群众，分析指出：“国民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其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它的‘广大’‘可靠’的群众是军阀，官僚、政客、



土霸、文丐、投机商人、托匪、特务、汉奸、法西斯分子、落后的受欺骗的教员和学生等"。因此，"有了从反共发展到内战的国民党，其去'没有了中国'也就不远"[4]。

为了驳斥《中国之命运》对中国共产党所谓"奸党"、"奸军"、"新式军阀"、"变相军阀"之类的污蔑，中国共产党在1943年8月24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两个重要的文献：即《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和《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并于次日发表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社论，指出"这两个文献以铁一般的事实和数字，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所散布的无耻谰言和荒谬宣传，鲜明地证明了这一真理：即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那就没有了中国"[5]。社论指出："不是共产党是'新式封建'和'变相军阀'，而是国民党反动派是老式封建和道地军阀"。[6]

最后，中国共产党还批判了《中国之命运》的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艾思奇的文章鲜明地指出："在《中国之命运》里并没有真正的三民主义和知难行易的思想，而只是关于这些思想的一些空洞的名词，以及在这些名词装饰下的中国式买办封建性的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学，和反对科学唯物主义，提倡迷信盲从的法西斯主义的唯心论哲学。"[7]

对《中国之命运》反动思想的揭露和批判，打击了蒋介石反动集团妄图建立法西斯专制统治的野心，也从一定程度上反驳了国民党发动反共的理论依据。为了更彻底地打退国民党的反共舆论攻势，中共中央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积极进行反共军事部署的情况，一方面向国民党政府进行交涉，提出抗议，并表达中国共产党谈判的诚意，另一方面向全国人民揭露其阴谋，并将其宣传散布至英、美、苏等国，动员国内外舆论抨击蒋介石的反共企图。

1943年7月4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董必武，"近日边区周围，国方部队纷纷调动增加"，"战事有于数日内爆发可能，形势极度紧张"，要求董必武"立即将此种消息向外间传播，发动制止内战运动，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同时找张治中、刘为章交涉制止，愈快愈好"。同时为了联合抗战的局面，要董必武向蒋介石表达中国共产党的诚意，指出"我党中央准备讨论改善两党关系，不负委座期望，现若动兵，全局破裂，绝非国家之福"[8]。7月6日，朱德总司令在向蒋介石呼吁团结避免内战的电文中指出："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有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兵连祸结，则抗战团结之大业势将破坏，而使日寇坐收渔利，并使英美苏各友邦之作战任

务亦将受影响，心所谓危，不敢不告”[9]。

7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起来！制止内战！挽救危亡!》的社论，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制止内战的要求，“希望国民政府，重整抗战阵容，对于此次破坏团结，挑动内战的祸首日寇第五纵队分子，处以严刑，对于‘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的汉奸言论，明令禁绝，对于三十三个投敌将领，明令讨伐，使抗战军民，人人自奋，国内团结，借以巩固，粉碎日寇的‘对华新政策’，使抗战大业树立在必胜不败的基础之上”[10]。紧接着，7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所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社论针对国民党领导的党政机关发动破坏团结抗日的运动，针对驻防西北的国民党军队以大部兵力包围边区，准备进攻边区，“而使对付日寇的河防，大部分空虚起来”提出质问和抗议。社论经过分析国民党最近的军事部署和党务工作，指出：“我们很疑心你们同那些日本党、汉奸党互相勾结，所以如此和他们一个鼻孔出气，所以说出的一些话，做出的一些事，如此和敌人汉奸一模一样，毫无二致，毫无区别。”因此社论向国民党政府正式提出抗议：“撤退河防大军，准备进攻边区，发动内战，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中央社于七月六日发出破坏团结、侮辱共产党的消息，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言论，也是不能容许的。这两种错误，都是滔天大罪的性质，都是和敌人汉奸毫无区别的，你们必须纠正这些错误。”最后社论“向一切不愿意撤离河防进攻边区和不愿要求解散共产党的真正的爱国的国民党人呼吁：请你们行动起来，制止这个内战危机”[11]。7月18日，《解放日报》再次发表社论，重申7月9日延安民众抗战六周年纪念大会《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中所提出的四条要求，即“撤退准备进攻边区的军队，惩办挑拨内战的特务机关，讨伐三十三个投敌将领，审判日汪密使吴开先”[12]。

中国共产党和抗日军民向全国人民所列出的国民党所进行的反共活动的事实，以及向国民党政府所提出的合乎情理的抗议和要求，蒋介石集团无法作出回应，遂在政治上逐渐陷于被动。中国共产党所发起的舆论闪击战大获成效，极大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气焰。

中国共产党在积极发起舆论反击的同时，针对国民党的军事部署，也针锋相对地紧急动员起来，做好自卫反击的准备，即准备以军事对抗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积极指示各根据地军民举行誓师动员大会，声讨国民党的反共暴行，表达保卫抗日根据地的决心，积极组织群众建立民众自卫武装；另一方面，在陕甘宁边区，除动员边区部队进入战争状态并开赴



边界外，还从边区相邻的其他军区抽调部队支援边区防卫，对于国民党军队所发动的摩擦则给予坚决的打击；在山东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对进攻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发起自卫反击，将国民党的反共军事计划彻底打乱。各抗日根据地还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伪军，并在根据地内展开除奸工作，沉重地打击了日蒋特务的反共活动。

总之，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指示下，中国共产党和抗日军民对国民党的舆论进攻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反击，揭穿了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借以发动反共高潮的理论基础，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联合抗日的诚意，与此同时也在军事上做好了自卫反击的准备。

注释：

①《中央书记处关于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的通知》（1943 年 7 月 8 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版，第 71 页。

②《吕振羽同志回忆批判〈中国之命运〉的一些情况》，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 2 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 693 页。

③以上引文参见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版，第 504 ~ 539 页。

④范文澜：《谁革命？革谁的命》，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重庆出版社，1992 年版，第 142 页。

⑤⑥⑩⑫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版，第 559 页，第 562 页，第 498 页，第 503 页。

⑦艾思奇：《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重庆出版社，1992 年版，第 121 页。

⑧《毛泽东关于发动制止内战运动给董必武电》（1843 年 7 月 4 日），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重庆出版社，1992 年版，第 192 页。

⑨《朱总司令为呼吁团结避免内战致蒋介石等电》（1943 年 7 月 6 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版，第 70 页。

⑪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重庆出版社，1992 年版，第 197 ~ 202 页。

反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粉碎第三次反共高潮

蒋介石集团为了在中国建立法西斯专制统治，积极准备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力量，除了发表《中国之命运》并借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对中国共产党发动舆论攻势外，还加紧了军事上的部署。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也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所以也就成为了国民党发动反共进攻的战略重点。早在 1943 年 2 月，驻兰州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即向胡宗南及该战区所属驻宁夏的马鸿逵、驻青海的马步芳，下达了经蒋介石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指令有关部队“于现地隐蔽，作攻势防御”，俟机“转取攻势”时，“先迅速收复囊形地带”，进而“收复陕北地区”。胡宗南按此计划部署兵力，以所辖的第 37、38 两个集团军共六个军，对“陕北地区”和囊形地带“作攻势防御”[①]。5 月 23 日，胡宗南向蒋介石呈报了具体作战计划，准备分三期逐步侵占陕甘宁边区。共产国际解散后，国民党军事当局加紧了针对边区的军事部署。6 月初胡宗南到三原、耀县视察军队，并与何应钦、白崇禧等举行作战会议。6 月 18 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内定由第 38 集团军迅速攻占囊形地带后，协同第 37 集团军攻占陕北地区。然而到了 7 月初，由于第 38 集团军镇压陇东民众自发武装的战事迟迟未结，不得不抽调原防备日军的河防大军，即第 34 集团军下辖的第一军和第九十军准备攻占囊形地带，预定于 7 月 9 日发动进攻[②]。国民党军事当局还在与边区边界地带，新建飞机场等战备设施。到预定的进攻发起日之前，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已增至 60 万人。

对于国民党军队积极准备对边区发动进攻的部署，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一方面向胡宗南和蒋介石进行交涉；另一方面给八路军和抗日军民发出指示，要求加紧战备，积极动员，并抽调相邻军区部队支援边区，同时对于敌



于入侵边区的国民党部队予以打击。7 月 4 日，朱德以第 18 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给胡宗南发电，呼吁团结，避免内战。电文指出："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③]此电文将胡宗南秘密调兵包围边区，准备发动进攻的阴谋公之于众，打了胡宗南一个措手不及。胡宗南不得不召集会议重新商讨战和问题。与此同时，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号召下，边区抗日军民紧急动员，准备以武装保卫边区。7 月 9 日，延安召开了三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致开会词，朱德、贺龙、高岗、刘少奇等 13 人作了演讲。边区群众群情激昂，严正要求国民党军事当局撤退包围边区的大军，回去固守河防。大会通过了《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向国民政府提出四条要求。边区所属各分区也纷纷开会动员，会后各区、县均建立了人民武装自卫军，随时准备反击国民党的军事进犯。

除此之外，党中央还积极抽调部队加强边区防务。6 月底，八路军第一百二十师三百五十八旅主力，奉命由晋西北调到陕甘宁边区以南、鄜县（今富县）以西之葫芦河地区集结，以增强边区的防御力量[④]。毛泽东还在致彭德怀的电文中提到："我已调晋西北四个团渡河南开准备作战，晋西北现仅留六个小团，颇为空虚。同时，事变有可能发展至两党破裂，我党不能不事先有所筹划。如至那种局面，拟从五台、太行抽调十个大团（约二万人）西开应变。"[⑤]边区留守部队也紧急动员，开赴边界严阵以待。兵力部署大体为：第三百八十五旅驻防陇东分区，第三五十九旅驻防延属分区、警 1 旅驻防关中分区、警 3 旅驻防三边分区。而对于制造反共摩擦的国民党军队则予以坚决打击。7 月 4 日，国民党第五十三师一部闪击陕甘宁边区富县峪口村，八路军留守部队一个班迎头痛击，毙该部副连长以下 30 余人[⑥]。

国民党反动派除以重兵包围陕甘宁边区，准备闪击延安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也积极制造反共摩擦，预谋发起反共的军事行动。

在山东，国民党军沈鸿烈、于学忠部主要控制了沂鲁山区和诸日莒山区。这些地区对于共产党敌后抗日根据地进攻日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却被国民党军队用来作为反共的主要阵地。自国民党军队吴化文，厉文礼部相继投敌后，鲁山区的大部和沂山区的一部已经被敌伪控制，严重威胁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滨海区和胶东区。1943 年，山东抗日根据地进入恢复和发

展阶段，积极准备对这些地区的日伪军发动进攻。然而国民党反动派为了与中国共产党争夺在山东的优势地位，于1943年春命令李仙洲部以支援于学忠部的名义率兵入鲁，准备联合于学忠部发动反共行动。于学忠部是东北军余部，历来受到沈鸿烈部等其他国民党军队和国民党中央的排挤，处境艰难。中国共产党本着联合抗日的诚意，对于学忠部经常给予支持，因此于学忠部一直与八路军保持了良好的统战关系。然而甲子山战斗后，于学忠部遭受重大打击，因而对八路军心生芥蒂。此时，李仙洲部入鲁，中国共产党担心于学忠部会与李仙洲部联合进行反共行动，这对于山东的抗日形势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在李仙洲入鲁前，山东军区即加强了对李仙洲部的沟通和团结，希望和李仙洲部联合抗日。然而李仙洲部入鲁后却不断进行反共活动，一再进攻八路军抗日根据地。

李仙洲入鲁部队初入山东就打着“驱逐逆流、收复失地”的旗号，向八路军根据地展开猛烈进攻。李仙洲部下刘春霖率一百四十二师越过微山湖和津浦路进入鲁南后，即强占八路军滕峄边地区以及中心根据地的山亭、白彦、大炉等地，企图开辟反共基地。他们摧毁民主政权，实行清乡，强迫自首，烧毁抗属房屋，抢去兵工厂的物资，还活埋共产党的五名工作人员，并公开宣称：“先打八路，后打鬼子”，叫嚣要把八路军打到老黄河以北去[⑦]。

国民党发起反共浪潮后，李仙洲部更加强了在山东的反共活动。1943年6月14日，李仙洲亲率第二十一师主力并鲁西地方顽军近两万人，向单县、成武、巨野之间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动进攻。在李仙洲部的步步紧逼下，共产党方面不得不开始考虑进行自卫反击，以打击国民党的反共气焰。6月28日，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提出消灭围攻八路军之李部一部的建议。6月29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同意。7月1日，李仙洲部第六十二团两个连及一个重机枪排在成武县被冀鲁豫军区部队歼灭。2日，冀鲁豫军区部队又在禄刘庄一带歼灭增援的李仙洲部第六十一团一部[⑧]。7月4日，朱瑞、罗荣桓、黎玉、萧华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提出对李仙洲部与于学忠部的对策：对于于学忠部西开不加钳制，并在一定条件给予便利，对李仙洲部东进北上尽量迟滞其时间，并在自卫原则下，乘其深入根据地立足未稳之际，予以歼灭一部。但不放松与之政治疏通及扩大敌顽矛盾。对于部防区附近之地方部队，争取可能争取者，歼灭最坚决反共部分，力求控制鲁中山区及莒县、日照、诸城间山区，并相互联络，以便继续向外围发展[⑨]。7月15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山东分局并告北方局：“一、同意你们对付于学忠、



李仙洲的方针。二、对友好者坚决团结之，对顽固而暂时尚未向我进攻者则设法中立之，对向我进攻者则坚决反击之。这就是你们应付各派国民党军队的原则。"[10]

在中央的指示下，7月中旬，冀鲁豫军区八路军集中六个团的兵力，在鲁西南、湖西地区阻滞李部东进。下旬，冀鲁豫军区集中五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及地方武装，展开反击李仙洲部的战役。29日，李仙洲军总部及第二十一师、暂编第三十师等部被包围于成、单、曹边的陈楼、陈庄一带，第二十一师突围，遭八路军伏击，被歼近千人。随后八路军又给驰援的九十二军军部及暂编第五十六师、一百四十二师以重大打击后，撤围而去[11]。山东军区在基本控制了于学忠部原所控制的地区后，开始寻求击退或歼灭进犯鲁南的李仙洲部。7月26日，罗荣桓、黎玉发电致山东各区，具体部署了反击李仙洲部的作战。8月13日至18日，鲁南军区集中主力第三、第五团及地方武装一部，在天宝山地区向李仙洲部进行了反击，歼敌千余人。李仙洲部受到打击后，越过滋临路进至费县北部，又遭到鲁中区第二团的打击，被迫撤退，此后盘踞在平邑以南的流峪、常庄一带。9月，冀鲁豫军区又集中五个主力团，在曹县阻击进犯鲁西南根据地的李仙洲部，毙伤敌军两千余人，俘虏六千余人，缴获轻重机枪百余挺，步枪四千余支，子弹数十万发[12]。

在山东军区和冀鲁豫军区的联合反击下，李仙洲部损失惨重，总兵力由入鲁之初的两万余人锐减到不到八千人。李仙洲鉴于部队困难重重，士气低落，不得不向蒋介石请求南撤整补。蒋介石虽极不情愿，然也无可奈何，只得同意李部撤出山东。蒋介石集团在山东发动的反共浪潮遂归于彻底失败。

在华中，蒋介石于1943年3、4月间密令王仲廉与韩德勤从东西两面进犯新四军淮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王仲廉与韩德勤积极执行蒋介石的密令，王仲廉部自安徽蒙城地区东进，向淮北根据地发动进攻。而韩德勤（时任国民党苏鲁战区副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部于3月1日在"南返原防收复失地"的烟雾掩护下，突然向西侵占淮北抗日根据地的里仁集、陈家口等地区，并于3月中旬亲率第八十九军、独立第六旅、保安第三纵队等部偷渡运河，进至淮北中心区之金锁镇、界头集、山子头一带，计划在洪泽湖畔建立新的反共基地，然后派第八十九军赶赴灵璧以北以策应王仲廉部东进[13]。新四军为了打退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犯，决定对敌展开反击。3月17日晚，新四军首先集中兵力对西进的韩德勤部发起反击，至18日14时结束战斗，歼灭

韩军总部、独立第六旅、保安第三纵队，生俘韩德勤以下官兵1 000余人。王仲廉部在东进的途中，不断遭到新四军的袭击，进展缓慢。此后，得知韩德勤部已被歼灭，并且根据地军民早已严阵以待，遂不再东进，并向蒋介石报告情况。蒋介石鉴于东西对进的企图已被识破并被挫败，被迫下令王仲廉部折回⑭。新四军对韩德勤部和王仲廉部的打击，有力地保卫了华中抗日根据地，打退了国民党在华中掀起的反共浪潮。

中国共产党所发动的强大的政治宣传攻势和所进行的充分的军事准备，以及对国民党反共军事行动的有力反击，使得国民党所预谋发动的反共浪潮从一开始就陷人极大的困境。蒋介石集团的倒行逆施也引起了国内各界正义人士的愤慨和国际上苏美英等国强烈不满。包括国民党元老在内的国内各界人士连续发表通电，呼吁团结，要求制止内战；各国驻华使节也严正警告国民党不得发动反共内战，否则将停止援助。在这种四面楚歌，政治上限于被动孤立，军事上也占不到便宜的两难处境下，蒋介石集团的反共行动不得不偃旗息鼓。7月10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停止行动，不久胡宗南即命令准备进犯边区的部队撤退，国民党闪击延安的计划最终宣告破产。9月6日至13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蒋介石等虽然继续攻击中国共产党“破坏抗战”，然而却重申了“政治解决”的方针，释放了国民党和缓国共关系的信号。10月初，国民党又派出王世杰等人找到中共代表董必武，表示对边区没有动兵的意图，提出了双方停止互相刺激，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大局出发，于10月6日发出指示：6日起，一切揭露国民党稿件暂时停止，风平浪静，以示缓和⑮。至此，国民党预谋发动的第三次反共浪潮在尚未发展为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前便被制止了，这对于中国的抗战大业是极为有利的。

注释：

①②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页，第22～23页。

③《朱总司令为呼吁团结避免内战致胡宗南电》（1943年7月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

④⑬肖一平等：《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大事记》，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6页，第381～382页。



⑤《关于对付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军事准备问题的指示》(1943年7月9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73页。

⑥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4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2页。

⑦⑩⑫李维民，潘天嘉著：《罗荣桓在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6~227页，第228页，第229页。

⑧⑪杨明清：《李仙洲九十二军入鲁始末》，孙占元，杨明清主编，《山东重要历史事件：抗日战争时期》，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3页，第254页。

⑨陈之中，谭剑峰：《抗日战争纪事（1937~1945》，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375页。

⑭刘庭华：《新四军》，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40页。

⑮龚古今，唐培吉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9页。

美国政府扶蒋政策与蒋介石对美策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日本法西斯，中美两国结成军事战略同盟。但是，由于美国推行“先欧后亚”的方针，将主要力量集中于欧洲战场，对日本则主要依靠中国进行牵制，因此，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存在两种对华政策：一种是承认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主张和这个力量合作，希望利用中国人民的力量抗击日本，反对蒋介石利用美国的支持来打内战；另一种是不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只承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支持蒋氏势力。经过讨论，美国考虑到除了国内反对共产主义的势力逐渐增强，力量不可忽视之外，援助中国蒋介石政府，还可以加强美国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渗透，达到逐步控制蒋介石政府，使美国有可能在打败日本后而取代日本，把中国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使中美关系回到殖民地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上去，而且援蒋策略还可以彻底排除苏联的在华势力。因此美国政府选择了一条援蒋抗日的路线。

随着美国扶蒋政策的确立，美国加紧从各方面对蒋介石的活动给予支持。

政治上，罗斯福承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美国倡议下，1942 年 1 月 1 日，美、苏、英、中等 26 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签署此项宣言时，美国将中国同美、英、苏并列于签字国之首，开始有意识地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会后成立东南亚盟军总司令部，成立了以蒋介石为盟军统帅的中国战区，中国战区包括中国本土、越南、泰国、缅甸等地区。1943 年 1 月，美国与国民政府签订了《平等条约》，即《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宣布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取消 1901 年签订的《辛丑条约》，终止该条约以及附件所给予美国政府的一切权利，终止美国在北平使馆界、上海及厦门公共租界所享受的权利，协助中国政府收回这些地区的行政权；美国放弃关于在中国通商口岸制度的权利，关于上海、厦门公共租界特区法院制度的权利，关于



美国船舶在中国领土内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的特权，关于美国军舰驶入中国领土内的特权等；租界取消后，中国不得取消或以任何理由追究美国人民（包括公司及社团）或政府在中国领土内现有关于不动产的权利等。随后，国民政府又与英国签订了《平等条约》。1943 年 10 月 30 日，在莫斯科，美国坚持中国与苏、英、美三国共同签订关于一般安全的宣言。该宣言承认中国有权，也有责任共同参与其他各大国作战。1943 年 11 月 22 日至 26 日，美、英、中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举行了开罗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罗斯福答应让蒋介石成为“四强首脑之一”，使中国获得“大国地位”。为此，蒋介石则同意向苏联出让中国东北的某些权益，将大连划为国际自由港，并同意中美互相使用陆海军基地。随后，三国共同发表了《开罗宣言》，宣言指出：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①]嗣后，中国以大国的地位参加 1944 年夏秋间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并且是 1945 年在旧金山召开以制定联合国宪章的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的邀请国之一。宪章给予中国以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的地位。可见，美国在国际事务中，逐渐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这是美国扶植蒋介石政府在政治上的表现。对此，罗斯福曾表示：“我们和中国在深厚的友谊上和在统一的目的上，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密切。”[②]

经济上，美国对蒋介石政府提供物资援助。1942 年 2 月，中美签订《五亿美元借款协定》，美国向中国提供了五亿美元货款，用于国民党政府“增强其币制货币及银行制度；以资本供给生产事业并促进一切必要物品之生产、获得与分配；阻止物价上涨，并促进经济关系之稳定，制止通货膨胀；防止食粮与其他原料之囤积；改良运输及交通工具；实行促进中国人民生活之其他社会的及经济的措置；适应租借法案以外之军事需要，并采取业经两国政府认可之其他一切作战力量之适当措置”。[③]6 月 2 日，中美签订了《抵抗侵略互助协定》，规定：“一、美国政府将继续以美国大总统准予转移或供给防卫用品、防卫兵力及防卫情报供给中国政府；二、中国政府将继续协助美国之国防及其加强，并以其所能供给之用品、兵力或情报供给之；三、未经美国大总统之同意，中国政府不以任何根据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美国国会法案而转移之防卫用品或防卫情报，转移其所有或持有，或允许任何非中国政府官员、雇员或代理人之使用；四、如以将任何防卫用品或防卫情报转移于中国政府之结果，而中国应采取任何办法，或给付款项，以充分

保护对此项用品或情报有专利之美国人民之权利时，则中国政府经美国大总统之要求，当采取此项办法或付给此项款项；五、依美国大总统之决定，此次紧急状态终了时，中国政府当以未曾毁坏、遗失或消耗及美国大总统决定为对于美国或两半球之防卫或对美国其他方面为有用之用品，返还美国；六、在最后决定中华民国政府给予美国之利益之时，对于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后，中华民国政府所供给及经大总统代表美国接受之一切财产、兵力、情报、便利或其他利益或事项，应加以充分之考虑；七、在与美国会商以后，中国政府为报酬根据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国会法案而为之援助，应给予之利益之最后规定中，其条件应不致影响两国间之贸易，而应促进两国间相互有利之经济关系及改善世界经济关系。为此目的，上述规定中，应包括载有美国及中华民国同意之行动，并公开使其他具有相同志愿之国家参加，借国际的及国内的适当办法，以增加为全世界人类自由、幸福、物质基础之物品之生产、使用、交换与消费，并取消国际贸易间一切歧视待遇、减低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一般而论，即应实现美国大总统及英国首相于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共同宣言内所列之经济目标。两国间应于迅速便利之日期开始谈判，以期参酌主要经济状况，决定以其本身之协意行动达到上述目的之最佳方法，并谋其他具有相同志愿之政府之协意行动”。[④]此项协定，国民党政府以各种物品及情报换取了美国价值约8.7亿美元的物资。1944年11月，美国战时生产代表团帮助国民政府建立了“战时生产局”，由翁文灏任局长，美国人杰克逊任顾问。不久，又在“战时生产局”下面设立了“中美联合生产委员会”，以生产军需品为主，翁文灏任主任，纳尔逊任副主任。此外，美国在交通运输方面对国民党给予帮助。1945年1月，美国帮助国民政府成立了“战时运输管理局”。此时，中印公路和中印输油管已先后建成，美国对外经济处长克罗莱提出“促进对华供应与租借物资运输方案”，准备在中国建立集中运输制度。美国政府在租借法案下指拨1.5万辆卡车在中国使用，并派遣技术团来中国，协助组织运输制度。据统计，1945年2月至10月，美国仅通过滇缅公路向中国运输物资的卡车就达2.5万余辆，运输总量达16万吨之多。[⑤]

军事上，美国支援国民政府兵力和装备。1941年后，美国不惜代价开辟了一条从印度到中国的“驼峰”空中援华运输线，以保障中国战区的作战物资的供给。1943年4月15日，中美又达成了建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协定，其目的是“在以中国战区为根据地，用美国物资及技术，协



同对远东各地之日本海军、日本商船、日本空军及其占领地区内之矿产、工厂、仓库以及其他军事设备，予以有效之打击”。[6]7月1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重庆市郊的磁器口正式成立，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任主任，美国海军少将梅乐斯任副主任，直接隶属于中美两国最高军事统帅部。在中美合作所建立初期，其主要任务是：扩大情报的搜集与交换，分呈中、美双方最高统帅部作为作战指导的参考；严密布置东南沿海的敌后情报，准备策应美军登陆；布置中国全国气象网，制定气象预报，提供美海、空军参考；侦译敌方电讯，研究敌人动态；加强情报通信，争取情报时效，使能制敌机先；扩大特警训练，以达成防奸防谍，维护治安的任务；展开心理作战，予以有形无形的打击；加强秘密行动，对敌展开有效的破坏工作，摧毁敌人的军事设施及军用物资。[7]但是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中美合作所的主要任务发生变化，成为特务的培训机构。美方为军统训练的特务主要包括刑事警察和保安警察两类，主要课程是学习如何对付政治犯和实施有效的镇压手段，特别是到抗战后期，中美合作所的基本方针是帮助国民党准备内战，成为反共活动的急先锋。1944年12月，美国帮助蒋介石国民政府在昆明设立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何应钦任总司令，原任中国战区美国陆军参谋长麦克鲁兼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作战司令，负责训练地面部队，并统一指挥美国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切人员。美国供应部队司令齐夫斯被派兼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后勤司令，控制美国援华军用物资的分配。魏德迈则以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的名义，直接掌握“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作战与后勤两个部门。1945年初，魏德迈以蒋介石参谋长的名义，同意帮助蒋介石训练和装备36个师的兵力。为此，在美国支持下，国民党军在桂林设立中国军官参谋训练班，培养国民党军高级军官；在云南设立了参谋、步兵、炮兵、摩托、工兵、译员等大批训练学校；在兰州等地成立训练与供应装备中心等。通过这些活动，到日本投降时，美国共帮助蒋介石训练和装备了20个美式机械化陆军师。此外，美国政府还大大加强了陈纳德率领的第14航空队及其运输能力，并在1945年2月，在昆明成立中国第2空运大队，由美军上校勃郎里任司令，国民党军的空运力量得到增强。

对于美国的多方面扶持，蒋介石给予了回应。在政治方面，美国为中国争取大国地位的想法与蒋介石政府试图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大国作用的意图不谋而合。因此，国民政府在由美国主持的《联合国家宣言》的签署和开罗会议上，积极扮演大国的角色，参与国际事务的讨论。1942年11月，宋美

龄作为中国的第一夫人，应罗斯福总统之邀访问美国。宋美龄访美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要求美国支持中国的大国地位。她不厌其烦地大谈中国对战后和平会议和世界新秩序的看法，敦促美国立即行动起来，倡导举行处理战后事务的四大国会谈，并极力强调战时和战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访问期间，宋美龄与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巡回演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对提高中国的声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经济和军事方面，蒋介石对于美国的经济援助欣然接受。但是蒋介石并未按照美国的计划，将物资投在对日战争上，他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将会接过同日本作战的任务，他就可以集中力量准备与共产党进行殊死斗争了。在这个方针指导下，蒋介石将其精锐部队调到大西南，积极积蓄力量以备战后与共产党打内战，因此国民党军队在对日作战中消极对待，直接导致了抗战后期正面战场的大溃败。1945 年 5 月 5 日，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举行。大会确定了抗日战争后国民党对内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决定于 11 月 12 日召开“国民大会”（后因故延期），以抵制全国人民要求民主政治的主张。会议还通过了《对于中共问题之决议案》，强调当务之急在于团结本党，建立反共体系，为发动反共内战制造舆论。

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令美国统治集团感到失望。而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取得了局部反攻的胜利，力量不断壮大，已成为抗日战争中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中国两个战场如此鲜明、强烈的对比，使得一批美驻华的外交官们向华盛顿提出改变对华政策的建议。这样，美国在对日作战的艰难时期采取了扶蒋联共的政策。但是，随着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战后国际形势问题日益突出，以及美国国内反共潮流的加剧，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愈来愈倾向为扶蒋反共。对于蒋介石的消极抗日态度，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谈到，尽管蒋介石政府有很多短处，但是美国在中国却不得不依靠蒋介石。[8]至此，美国政府明确表示了其扶蒋反共的政策，并将其政策延续到抗日战争结束后。

注释：

①《国际条约集》（一九三四——一九四四），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 年版，第 407 页。

②《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1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年版，第 108 页。



③孟默闻：《美蒋勾结史料》，新潮出店，1951年版，第101页。

④《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248～1251页。

⑤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542页。

⑥⑦何应钦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辑：《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台湾国防部印制厂，1982年版，第533页，第538页。

⑧伊利奥·罗斯福著，李嘉译：《罗斯福见闻秘录》，新群出版社，1947年版，第146页。

国民党官僚资本大发“国难财”

官僚资本，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统治者凭借国家政权的力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是政治不民主、经济不发达的产物。1936年以后，主要是指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控制的资本。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利用战争时期的新情况，借助国民政府的政权力量，极力加强官僚资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垄断地位，大发国难财，使官僚资本急剧膨胀。

官僚资本对国民经济的垄断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在抗战前即已开始，抗战时期更为加强，这主要表现在金融和工商业方面。

在金融方面，四大家族采取多项措施，垄断金融业，并通过外汇投机和黄金买卖获得暴利。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是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两家银行。蒋介石上台后，以加入官股的名义，将这两大银行置于四大家族控制之下。1928年，在宋子文的主持下，中央银行成立。1935年，四大家族利用中国金融危机，再次以增加官股的办法，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强行改组，最终得以完全控制这两大银行，同时又把中央银行的资本猛增到一亿元，使中央银行在资本额上对其他银行具有绝对优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四大家族设立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行联合办事处，作为战时金融机构的中枢。1939年9月，国民政府公布了《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着手改进四行联合办事处的组织，统一事权，集中处理。10月，四行联合办事处改为“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简称四联总处，蒋介石担任四联总处主席，把独裁政权和金融垄断结为一体。四联总处成为战时金融和财政政策的决策机构。此外，四大家族进一步充实中央银行的权力。1939年10月公库正式实施，中央银行代理国库的任务为之一变，举凡国库现金票据证券的出纳保管移转及财产契约收据等一切保管事务，均指定由中央银行代理。1941年6月，财政部为了谋求准备金更集中运用起见，改定各银



行准备金由中央银行集中收存。自从重庆成为后方金融中心后，银行业务日趋繁荣，决定由中央银行先行举办重庆市票据交换事宜，于1942年6月开始实行，中央银行对于金融市场的控制有了更进一步的权力，成为全国银行的银行和唯一的金融核心。财政部鉴于中央银行使命的重大，于1943年3月制定《非常时期票据承兑贴现办法》，规定：各银行可将已贴现的票据向中央银行请求重贴现，中央银行核定各银行重贴现的最高限额；中央银行公告重贴现率。这样，中央银行就可以借贴现政策控制市场利率的升降。与此同时，四行两局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分支机构，也有了迅速的发展，到1945年8月已达2 281处，占全部国统区金融机构的67.5%。[①]官僚资本银行的存款，也从1936年的28亿元上升到1943年的417亿元，在本国银行中所占的比重从56.5%上升到90%。[②]这样，四大家族利用政治力量，在短短几年中，很快就形成了以“四行两局”为中心的金融垄断体系。

四大家族实行金融垄断的另一个手段就是币制改革。国民政府实行的币制改革，不是为了促进生产，解决财政困难，而是借用币制改革，实行白银国有，强迫人民把白银兑换成纸币，以此对全国人民大肆掠夺。1935年11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金融紧急处分命令》，实行币制改革，使发行银行由30多家集中到中、中、交、农四家，以纸币代替银币。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召集张群、吴鼎昌等人商议，决定了增发纸币的总方针。1939年以前，法币发行增加的速度还不太大，因此物价虽有上涨的趋势，但幅度也不是很大。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认为：“供应军费，收买物资，使用多量法币，则筹码之流通，自无不足之虑”。[③]于是正式批准了大量增发法币，以日益贬值的法币去“供应军费”和“收买物资”。从1939年起，法币开始走上了高速膨胀的阶段。法币的发行量1941年底就比1938年底增加六倍半以上。[④]特别是1942年货币发行权集中于中央银行以后，大面额法币大量涌入市场，物价的上涨更大大超过货币发行量的增长。法币的购买力大大减弱。法币一元的购买力在1938年底尚合值战前六角，到1939年底只值二角八分，到1940底降至八分左右，自此递降到1943年底只合值半分，到日本投降前夕的1945年6月，已只合值战前法币五毫。也就是说，这时的法币两千元才合值战前法币一元。[⑤]这样，四大家族不仅通过法币贬值把过去他们大量发行的公债几乎变成了废纸，而且还通过货币贬值把全国人民手中的财富逐渐变成了他们的财产。

此外，四大家族又通过外汇投机和黄金买卖牟取暴利。著名经济学家马

寅初曾指出："买卖美国股票物品，买卖外汇，外汇套利等，均为最大之投机事业。"[6]1936 年 5 月，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白银协定》，规定法币一元等于 0.295 美元。1938 年 3 月 12 日，国民政府宣布《购买外汇请核规则》，规定："须购外汇时，除于其本行商业所取得及其自有者相抵外，如有不敷，得向中央银行总行或其香港通讯处申请购买；申请银行应依照规定格式填具申请书，送交中央银行总行或其香港通讯处，前项申请书格式由财政部规定之；中央银行总行或其香港通讯处，于每星期四晨十时截止收受申请书，即依次审核，至迟于次晨十时将核定通知书送交原申请银行，如遇休假，则于休假后开业日办理之；申请银行接到核定通知书后，得于即日凭购外汇；银行购取外汇后，中央银行总行或其香港通讯处，得向该行索取外汇用途清单，以备稽考。"[7]可见，购买外汇者只有按照规定手续才能买到官价外汇，这样就出现了外汇的黑市价格，从而就形成了官价低，黑市价格高的形势。这就为四大家族牟取暴利打开方便之门。

在抗战前夕，黄金是可以自由买卖。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假借抗战之名，于 1937 年 9 月 30 日颁布《金类兑换法币办法》，宣布由"四行"进行黄金与法币的兑换，并规定了收购的价格，"十两以下者给百分之三，十两或十两以上者给百分之四，五十两或五十两以上者给百分之五"。[8]在此兑换办法下，1938 年至 1943 年，四大家族搜刮了价值约一亿银元的黄金。1943 年 6 月，国民政府又借口回笼法币，宣布黄金可以自由买卖，规定由"四行二局"抛售黄金，以收回法币，稳定物价。结果，黄金价格飞涨，从而助长了黄金的投机活动。

官僚资本垄断金融业的同时，也将触角伸向了工商业。

首先，官僚资本依靠政权，吞并民族工业，扶植发展官僚资本工业。1937 年，国民政府成立了工矿调整委员会，对于民营厂矿采取接管或加入政府股份的办法，由政府统筹办理或共同经营。1938 年 10 月，国民政府又颁布《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将一系列农矿工商企业及物品呈行政院核准管理，这些企业及物品包含三类：一、棉、丝、麻、羊毛及其制品；二、金、银、钢、铁、铜、锡、铝、镍、铅、锌、钨、锑、锰、汞及其制品；三、食粮、植物油、茶、糖、皮草、木材、盐、煤及焦炭、煤油、汽油、柴油、润滑油、纸、漆、酒精、水泥、石灰、酸碱、火柴、交通器材、电工器材、电气机器工具、教育用品、药品、人造肥料、陶器、砖瓦、玻璃。以上指定的企业或物品由专设机关执行管理。条例还指出，为了适应非



常时期的需要，战时必需的各矿业、制造军用品的各工业和电气事业收归政府办理或由政府投资合办。[9]这样，四大家族在抗战的外衣下，取得了兼并民族工业的法律依据。吞食民族工业的同时，四大家族通过财政拨款和银行投资、贷款的形式积极发展官僚资本工业。据四联总处拟定的《经济三年实施办法》所载：1940 年至 1942 年拨发"国营"厂矿资金共 16 654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 11 415. 5 万元，占 68. 5%，四行投资 800 万元，占 4. 8%，四行贷款 4 438. 5 万元，占 26. 7%。而同期分配给民营工业的三年计划的资金仅为 3 800 万元，只占国营厂矿资金的 22. 8%。其中国库拨款 250 万元，四行投资 1 760 万元，四行贷款 1 790 万元。[10]实际上，国库拨款和四行投资都是用来侵吞民营工业的，国民政府分给民营厂矿的资金只有四行贷款，仅占国营厂矿资金的 10. 7%。通过这种方式，官僚资本迅速膨胀，到 1944 年春，资本总额比战前增加了 50 倍。[11]由于官僚资本的发展建立在吞并民族工业的基础上，因而随着官僚资本的扩张，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官僚资本由 1935 年占两者总额的 12% 上升到 1942 年的 69. 58%，民族资本则由 1935 年的 88%，下降到 30. 42%。[12]

其次，官僚资本依靠雄厚的金融力量，逐步控制商业，建立起专卖制度和统购统销制度。1941 年 4 月，在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动员财力扩大生产实行统制经济以保障抗战胜利案》中，提出试行专卖制度。从 1942 年开始，国民政府先后出台《战时食糖专卖暂行条例》、《战时烟类专卖暂行条例》、《战时火柴专卖暂行条例》等，对食糖、烟、火柴以及盐、茶叶、酒等六类物品实行专卖。这种专卖，实际上是以低价购进，以高价售出。这样无疑刺激了物价的上涨，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当时任国民参政员的许德珩就价格问题向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提出质询指出："政府自将火柴实行专卖以来，每小盒火柴价格由两元增至八元，人民已不胜负担之重。而事实上，市面于专卖定价之外，竟售至十余元，乡村之间且售至 20 余元一小盒者。"[13]可见，专卖品价格狂涨，黑市价格更高。官僚资本从中牟利。统购统销政策，是依靠政权的强制性为基础的。1937 年 9 月，国民政府成立贸易委员会，下设复兴、富华、中国茶叶三大公司，对国统区的丝、茶、桐油、猪鬃等主要出口物资，实行统购统销。钨、锑、锡、汞等主要出口矿产品，由资源委员会统购统销。1942 年 2 月，国民政府成立物资局，对棉纱实行统购。在统购统销政策下，官僚资本家一方面肆意抬高物价，残酷地掠夺消费者，另一方面又在收购时肆意压价，以低于市价或成本的价格掠夺生产

者，利用买卖之间的差价获得重利。1944年12月间，梧州、桂林、韶关一带，20支纱每件价格徘徊于18—19万元，而重庆官价只有1.9万元，只及市场价的1/10。⑭

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国民党官僚资本，是同国民党政权结合在一起的。它在抗日战争时期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正如吴承明所指出的："1927年蒋介石取得政权后，即沿着从金融控制到产业垄断这条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扩张官僚资本，并于抗日战争时期，发展到它的最高阶段，也是最后阶段——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⑮官僚资本的迅速膨胀，直接导致民族资本受到严重挤压，资源分配极度不合理，进而导致物价上涨，劳动人民遭到严重剥削，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罢工、罢课等项斗争因之不断发生。

注释：

①陈绍周等编：《中国近代经济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5页。

②《上海金融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82页。

③国民政府财政部财政年鉴编纂处：《财政年鉴》续编，第1编，国民政府财政部财政年鉴编纂处1945年出版，第67页。

④吴冈：《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2页。

⑤杨萌薄：《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59页。

⑥马寅初：《马寅初演讲与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页。

⑦⑧⑨重庆市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册，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679~680页，第708页，第78~79页。

⑩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四联总处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页。

⑪⑫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61年版，第1420页，第1419页。

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缉私署档案》（145），第571页。转引自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抗战



时期的经济》，北京出版社，1995 年版，第 320 页。

⑭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 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57 年版，第 157 页。

⑮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19 页。

赫尔利作为总统私人代表赴华斡旋

1944 年 8、9 月，赫尔利作为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来到中国。11 月，担任了美国驻华大使，直至 1945 年 11 月 27 日辞职。赫尔利奉命来华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密切相关。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对华政策，“第一是有效地进行战争。第二是为了准备一个战后（国际）组织以及建立东方的稳定和繁荣，承认并促使中国成为一个与西方三大国俄国、英国和美国具有同等地位的主要大国。”[①]从这一原则出发，美国采取支持中国进行抗战的政策。因此，美国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中国进行援助。为了贯彻执行美国的对华政策和加强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能力，1942 年 3 月，美国政府派遣史迪威来华，其身份和职责是：美国总统代表，驻华美军司令；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的参谋长，并指挥蒋介石让其指挥的援缅部队；管理维持并改进滇缅公路；指挥中印缅美军；代表美国政府出席重庆的军事委员会，监督分配美国援华物资，指挥在印度的美国空军及由印缅出发的空军活动。[②]但是蒋介石政府却希望获得更多美援，装备国民党军队，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地位，消灭共产党和人民武装。蒋介石的作为与美国援华的目的相悖，作为美国政策的执行者，史迪威必然与蒋介石产生矛盾。1942 年 5 月，第一次缅甸战役失利，史迪威要求蒋介石改革国民党军队，蒋介石敷衍了事，使史蒋矛盾加剧。随着战争的发展，史迪威看到共产党军队坚决抗日的决心和抗击日本的成绩，与之相对比，国民党战场出现了大败退。尤其是 1944 年 4 月，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在此战役中，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短短八个月中，丧失了湖南、河南、广西等省的大片国土。国民党军队的大溃败，使中国战场的形势出现了紧张的局面，也使美国在远东的计划受到了破坏。因此，1944 年 7 月 7 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目前我所了解到的危机情况，亟须委派一人，予以调度中国境内所有盟军武力，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的权力……我正将史迪威将军提升为上将，我建议，请你急迫地



予以考虑，将他自缅甸召回，在你领导下，统率中美一切军队，授以全责与全权，以调度和指挥必需的行动而阻遏敌军的深入。我觉得中国的情况如此危殆，假若还不立刻实行彻底和迅速见效的补救方法，我们的共同目标将受到不幸的挫折。”③将领导权授予史迪威，使史蒋的分歧进一步激化。

蒋介石不愿意任命史迪威，又不便直截了当回绝罗斯福的要求。于是，蒋介石在7月8日的复电中，表示原则上赞成这个提议，但建议第一步应由罗斯福总统派一熟悉政治以及军事问题并得到总统完全信任的美国大员到重庆来，调整他与史迪威之间的关系。④7月23日，蒋介石又向罗斯福发出一份电报，提出三个条件：中国共产党不得处于史迪威权力之下，一直要到他们同意服从“中国政府的行政和军事命令”时才能这样做；应当明确规定史迪威的职责、权力、名称和对委员长的关系；租借法案安排之下的一切军事供应物资的分配和处理，应根据租借法案的精神，完全处于中国政府或其总司令权力之下。⑤

为了满足蒋介石的要求和具体解决史迪威的指挥权问题，罗斯福要马歇尔和陆军部长史汀生物色总统私人代表人选。他们推荐赫尔利。赫尔利是一个贫苦的爱尔兰移民。11岁时，下煤矿干活，还当过兵，放过牛。在做牛仔的时期里，他学会了说印第安人的语言。因为懂这种语言的人很少，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军官时，利用这种语言进行保密传话，没有泄过密。战后，他从印第安纳州的一所学院毕业后，当了律师。后来，他当上了胡佛政府的陆军部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初，他被指定为驻新西兰公使，但实际上却被派往澳大利亚，负责派遣救济船到被封锁的菲律宾去。之后，他不断被罗斯福派往世界各地解决困难问题。在完成这些任务时，他忠诚地执行罗斯福的意图。因此，尽管赫尔利是共和党人，作为民主党总统的罗斯福还是十分欣赏他。罗斯福曾对儿子说过：“我希望能有一些像赫尔利这样可以依靠的人物”，因为“像赫尔利这样一类的人物是非常可贵的”，“他们是忠心耿耿的”，“假如说有一个人能够清理中国国内政治纠纷，那就是他”。⑥因此，选择赫尔利作为总统私人代表赴华斡旋，正合罗斯福心意。人选确定后，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我提议：赫尔利将军……在你处做我的私人代表……关于调整你与史迪威将军间的关系，他必将有很大的贡献。”⑦同时，罗斯福指派纳尔逊偕同赫尔利来华，处理租借与其他经济事件。

赫尔利来华前夕，曾于8月18日见罗斯福，19日见国务卿赫尔，21日见国务院中国科科长文森特。这些会晤所涉及的内容，无疑与来华的使命相

关。罗斯福总统给赫尔利定下任务：防止中国国民政府垮台；维持战争时期的中国军队；调和中国和美国军事机构之间的关系；联合中国的抗日力量。[8]在接受罗斯福指令后，赫尔利对中国问题形成两个观念。第一个观念是要维护蒋介石政府。赫尔利分析了中国国内的形势，很明显，威胁蒋介石政权的专制统治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因此，赫尔利认为要维护蒋介石政府，就必定要限制共产党力量的发展。所以，当史迪威和马歇尔提出调拨一部分租借物资给八路军时，赫尔利表示反对。他认为武装共产党的目的，是推翻中华民国政府，而对美国而言，既要支持中华民国，又要去武装一支摧毁中华民国的力量，这是相悖的。罗斯福在这一点上和赫尔利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在赫尔利动身赴华前罗斯福就决定：租借物资不能用于武装共产党人，除非他们承认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委员长的领导。[9]赫尔利对中国问题的另一个观点是中国共产党是得到苏联支持的。在他心中，苏联支持的对象是蒋介石还是中国共产党，在他的赴华使命中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赫尔利在出使到达中国前，先在莫斯科做短暂停留，在中国问题上和苏联政府交换意见。在莫斯科期间，赫尔利和纳尔逊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进行了会谈。事后，纳尔逊向美国政府发出一份报告，谈到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时，报告说，莫洛托夫在会谈中强调“苏联政府对于中国内部的事件和发展，不负任何责任”。并说到“中国某些地区人民很贫困的情况，这些人民中，有人自称共产党人，但与共产主义不发生任何关系。只是对于他们的经济情况不满意的一种表示。一旦他们的经济情况改善，他们就会忘记这种政治倾向。不应把苏联政府与这些‘共产分子’联系起来，也不能因这种情况，而对苏联政府作任何谴责”。谈到美国对华方针时，报告又说：莫洛托夫表示“假若美国帮助中国人统一他们的国家，改进他们军事和经济的情况，并为这种工作选择他们最优秀的人物，苏联方面将至感高兴”。[10]这份报告对罗斯福政府起了重要作用。苏联未支持中国共产党以及苏联将支持蒋介石在战后统一的信息，使赫尔利认为这是他开始执行使命前已取得了一项重大胜利。

9月6日，赫尔利、纳尔逊以及赫尔利的随员美国陆军骑兵上校麦克纳利等人到达重庆，正式开始其斡旋活动。到达重庆第二天，赫尔利和纳尔逊在高思的陪同下首次拜访蒋介石。在这次会谈中，赫尔利首先向蒋介石表明他来华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援助蒋介石和中国、拥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谈及史迪威指挥权的问题时，蒋介石在形式上作出让步，表示可以接受，但是对



使用八路军这个实质问题，仍然不松口。此外，蒋介石还大肆要求美国物资的供应和援助。对此，赫尔利和纳尔逊都表示美国的援助会源源而来。之后，赫尔利为了进一步与蒋介石举行会谈，拟定了一份议程，内容包括十项：一、中美合作的首要目的在于为了立即打败日本和解放中国，实现中国一切军事力量的联合；二、与中国合作以实现和俄国及英国较为密切和融洽的关系来支持中国的目标；三、在委员长指挥下联合一切军事力量；四、为了战斗的目的集合在中国的所有资源；五、在民主的基础上支持委员长关于政治联合的努力；六、为中国提出目前和战后的经济计划；七、规定史迪威将军的权力为野战司令官；八、规定史迪威将军的权力为委员长的参谋长；九、准备送交一份关于指挥权的图表；十、讨论将来对于在华租借法案的控制。[11]这份议程交与蒋介石后，经过商谈，宋子文认为第五项中“在民主的基础上”是一种附加条件，并且认为史迪威既然已有第七项的权力，就不必再兼任战区参谋长一职，最后决定取消第五项和第八项。这样，双方初步决定史迪威的职务为中华民国陆空军前敌总司令，职权是指挥中国陆空军队对日作战，但是要接受蒋介石的命令。

在出兵缅甸的问题上，蒋介石政府与美国出现分歧。蒋介石准备从缅北撤出部队，而美国则打算中国部队在缅北发动进攻，与美军配合收复缅甸。因此，马歇尔经罗斯福同意，以罗斯福的名义向蒋介石发出一份口气相当强硬的电报，要求蒋介石立即补充萨尔温江部队，并发动进攻，同时立即任命史迪威将军，授以指挥所有中国军队的全权，否则将停止对其援助。对此，蒋介石考虑到离开美国的援助将无法维持现在的地位。因此，他改变政策，把矛盾的目标由美国政府转向史迪威，乘机排斥史迪威。蒋介石将宋子文起草的一份备忘录通过赫尔利转交罗斯福。备忘录中明确表示，不能授权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并要史迪威辞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职务。蒋介石的态度，赫尔利是支持的。在寄发备忘录的同时，赫尔利又附上一封信，为他本人没有促成蒋介石与史迪威和解表示遗憾，并且表示赞同蒋介石不任命史迪威的决定。收到这份备忘录后，美国政府出现支持和反对的两种意见，一种是以赫尔利为代表的，表示只要调回史迪威，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另一种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表示如果调回史迪威，美国方面将不再许可任何美国将军担任中国军队参谋长和指挥官。罗斯福经过深思熟虑，向蒋介石回复了一份折衷的电报，表示解除史迪威作为蒋介石参谋长的职务，也表示将不再派人来华继任此职，并保持史迪威对缅甸的军队的指挥权，还以租借物资对蒋介石

施加压力。此份电报虽然融合了赫尔利和马歇尔双方的意见，但明显表现出罗斯福支持蒋介石的倾向。蒋介石在收到电报后，在赫尔利推波助澜下，再次向罗斯福发出电报，重申调回史迪威将军，另派他人。这一次，罗斯福听从了赫尔利的建议，完全站在了蒋介石一边，接到电报后立即召开会议，按照蒋介石的要求，讨论接替史迪威来华的人选问题，并于 10 月 19 日致电蒋介石，表示同意召回史迪威，并任命魏德迈接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和驻华美军司令的职务。1944 年 11 月，美国驻华大使高思辞职，赫尔利接任。

至此，赫尔利来华对史蒋矛盾的斡旋结束，斡旋的结果是美国调回史迪威，对蒋介石作出让步，这表明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转变，从扶蒋联共转向扶蒋反共。1944 年 11 月至 1945 年 11 月辞职前，赫尔利为国共关系进行调解，但是他始终存有反共的思想，在调解过程中必然倾向蒋介石政府，因此，国共经过几次谈判仍然未能走向统一，赫尔利也因此宣告调解失败，于 1945 年 11 月 27 日辞职。

注释：

①［美］赫尔：《赫尔回忆录》（第 2 卷），1948 年版，第 1583 页。转引自《中国抗日战争史》第 526 页。

②转引自傅尚文《史迪威与中国抗战》，《历史教学》1985 年第 10 期。

③④⑦⑩《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1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年版，第 135 页，第 140 页。

⑤⑥⑨⑪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主编：《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社，1988 年版，第 5 页，第 18 ~ 19 页，第 20 页，第 25 ~ 26 页。

⑧［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第 2 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 72 ~ 73 页。



国民党所谓的“政治解决”及实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到1943年，战场双方态势发生显著变化，欧洲战场，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结束，苏联取得了东线战场的主动权，美英联军由地中海沿岸向意大利内陆推进，9月，意大利政府投降，太平洋战场上，美英联军利用优势海空军采取“蛙跳”战术，逐步将日军逐出南太平洋，美英在太平洋的作战进展顺利，使日本帝国主义处境极为不利，法西斯轴心国集团即将面临灭顶之灾。

反观1943年的中国，国民党顽固派却置抗日全局不顾，发起第三次反共高潮，破坏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好局面，妄图取消陕甘宁边区，重兵闪击延安。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大局出发，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将国民党企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目的公之于众，国统区民众纷纷进行集会，展开大规模的反内战运动，要求国民党政府枪口一致对外，同时在军事上，抗日根据地军民坚决地回击国民党的试探性进攻，使国民党顽固派在军事上也无机可乘。与此同时，美、英、苏等反法西斯盟国也纷纷发表意见，谴责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国民党顽固派发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草草收场。

中国共产党在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发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后，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抗日作战中来，各解放区战场上开始进入局部反攻阶段，同时，抗日根据地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与此相反，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严重危机，经济上通货膨胀加剧，军事上节节败退。在此形势下，蒋介石授意戴笠，制定了《对中共方案》，提出了国民党对中共问题的解决办法：“以迫使中共将军权、政权交还中央为主要目的；把握中共弱点，以达到政治解决为原则，惟在军事上仍须施极大压力，促其就范；取消边区政治、组织，听候中央处置；派遣政工人员、参谋人员、军队政工人员至该军工作，对其在特定区域以外之部队，相机予以解决；加强军队之准备，以为政治解决之助力；在宣传工作方面强调第三国际之解散，中共再无

独立组织之必要，以证明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理论最适合世界潮流；派赴延安组织中央通讯社分社，使消息更加灵通，以适应政治解决之需。”[①]国民党政府在处理与中共关系上，从“军事解决”回到“政治解决”上来，开始要求与中国共产党重新谈判。

1943年9月6日至13日，国民党召集了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案件总报告之决议案》，诬蔑中国共产党破坏抗战团结，危害国家统一，要求中国共产党切实遵守1937年9月22日所发表的四项承诺：“（一）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二）取消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三）取消苏维埃政府，期全国政权统一；（四）取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②]蒋介石在对此决议案的指示中指出：“本席听取中央秘书处关于中共案件之报告，及各委员所发表之意见后，个人以为全会对于此案之处理方针，要认清此为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③]

针对国民党宣称的“政治解决”，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毛泽东精辟地指出：“在投降派看来，‘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正是准备内战亦即准备投降的最好的掩眼法，一切共产党人、爱国的国民党人、各个抗日党派和一切抗日同胞，都要睁起眼睛注视这个极端严重的时局，不要被投降派的掩眼法弄昏了头脑。须知正是在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之后，内战危机是空前未有的。”并强调“据国民党多年来一贯的政治路线看来，我们认为这不过是一堆骗人的空话，而其实是为着准备打内战和永不放弃反人民的独裁政治这一目的，争取其所必要的时间。”[④]

但是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全局出发，仍然表示同意随时恢复两党谈判，以团结一致，共同对敌。1944年3月12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大会上，周恩来同志作了《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讲，他明确指出：“欲实行宪政，必须先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⑤]并强调“现时中国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政治解决的内容，应该是双方的与公平合理的。”[⑥]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国共两党恢复谈判。1944年6月5日举行会谈时，国民党代表抛出个《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其内容如下：

（甲）关于军事问题：



（一）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在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四个军，十个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

（二）该集团军应服从军事委员会命令。

（三）该集团军之员额，按照国军通行编制（由军政部颁发），不得再编制外另设纵队、支队、或其他名目。以前所有者，应依照中央核定之限期取消。

（四）该集团军之人事问题，准予按照人事法规，呈报请委。

（五）该集团军之军费，由中央按照国军一致给予规定发给，并须按照经济法规办理，实行军需独立。

（六）该集团军之教育，应照中央颁行之教育纲领、教育训令实施，并由中央派员校阅。

（七）该集团军之各部队，应限期集中使用。其未集中以前，凡其在各战区之内的部队，应归其所在地区司令长官整训指挥。

（乙）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

（一）该边区之名称定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构称为陕北行政公署。

（二）该行政区区域，以其现有地区为范围，但须经中央派员会同勘定。

（三）该行政区公署直隶行政院。

（四）该行政区须实行中央法令。其因地方特殊情形而需要之法令，应呈报中央核定施行。

（五）该行政区主席由中央任免，其所辖专员县长等可由该主席提请中央委派。

（六）该行政区内之组织与规程，应呈请中央核准。

（七）该行政区预算，逐年编呈中央核定。

（八）该行政区暨十八集团军所属部队驻在地区，均不得发行钞票。其已发之钞票，应与财政部协商办法处理。

（九）其他各地区所有中共自行设立之行政机构，应一律由该省政府派员接管处理。

（丙）关于党的问题：

（一）在抗战期间，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办理。在战争结束后，依照中央决议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中共应与其他政党遵守国家法律，享受同等待遇。

（二）中国共产党应再表示忠实实行其四项承诺。[⑦]

从国民党提出的《政治解决提示案》中可以看出，国民党对中共提出的实行民主政治、承认各党合法、释放爱国政治犯等主张一字不提，只承认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四个军十个师，却不顾抗战需要及敌后游击战争的恶劣环境，要中共将十个师以外数十万正在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军队限期取消，明显是为了打击中共的军事实力；对边区政府，只要求实行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法令，却不提实行三民主义，不承认为了抗日需要而实行的各项民主设施和民主法令；对抗日根据地人民选举的民主政府，要求限期取消。这个提示案正如周恩来所揭露的那样，"集中起来就是要我们做三件事：第一，十个师以外的队伍全部限期取消。第二，规定要十个师集中到那里就必须到那里。第三，敌后解放区所有的政府一律都交给流亡重庆的省政府接收"。[⑧]这些条件中国共产党当然不能接受。

在中共的代表到来以前，国民党就加紧研究对策并拟定了对中共的政治解决方案，提出应付这次谈判的原则为"注重其宣传性，而并不期待其成功"，[⑨]在谈判时，"先以试探方式行之"，[⑩]"在大的原则上坚持，俾中外人士易于理解，对具体细目表示无不可以商量之态度"。[⑪]国民党采取以上政策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通过所谓的缓和办法，劝告中共放弃军权、政权。他们以一种自大而武断的态度，只要求共产党无条件地拥护政府、拥护统一，而不许问这种统一是否对抗战民主团结有利。

其实对于国民党提出的四项承诺，中国共产党一直是认真实践的。首先，陕甘宁边区和所有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内中国共产党所施行的政策都是符合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政策，绝对没有任何一项政策是违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其次，在国民党不投降民族敌人、不破裂国共合作、不发动反共内战的条件之下，中国共产党始终遵守不以暴力政策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土地的诺言；第三，原来的红色政权还在抗战第一年就改组了，三三制的民主政治也早已实现了，只是国民党至今没有实践承认陕甘宁边区的诺言；第四，红军名义及番号早已改变了，早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了，早已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统辖，只有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现在是直接受中国共产党中央统辖，不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这是因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 1941 年 1 月 17 日发表了一个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反革命命令，宣布该军为"叛军"，并用武力"解散"，进而导致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从国民党的一系列提案中可以看出，国民党所谓的"政治解决"的实



质是要中国共产党将抗战以来取得的根据地、军队全部拱手送给国民党，将各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自行解散，企图通过和谈的方式达到削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无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和根据地的蓬勃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广大民众衷心期盼的民主、宪政问题熟视无睹。其根本的目的是要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维持蒋介石的独裁地位，用和平谈判的方式逐步削弱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以为战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做好准备。虽然在国共和谈中，中国共产党为了抗日民主团结，一致对外，委曲求全，多次让步以缩小两方面的距离，力图使国共双方能和平解决存在的问题，但对于国民党提出的所谓“政治解决”，中国共产党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大革命失败血淋淋的教训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将广大抗日根据地军民浴血奋战建立的成果拱手让给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

历史证明，要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国共双方必须精诚团结，存在的问题必须解决，而这种解决，只有国民党政府立即实行民主政治，并从民主的途径公平合理地解决国共关系，如此才能增强全国团结抗战力量，才能使一切走上正轨，才能停止目前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实行将来的反攻，才能建立战后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如果仅仅依靠“政治解决”，则是痴人说梦。

注释：

①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 年版，第 503 页。

②③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年版，第 840 页，第 841 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917、921 页。

⑤⑥⑦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版，第 182 页，第 187 ~ 188 页，第 343 ~ 345 页。

⑧《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 204 页。

⑨⑩⑪《1944 年 5 月—1945 年 1 月国共谈判史料》，《民国档案》1994 年第 2 期，第 49 页，第 45 页，第 49 页。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民主政治的看法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另一方面提出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建立民主的共和国。毛泽东指出："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同抗日与和平、民主与和平互为条件一样。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①]抗日战争是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战争，通过这场战争，中国不仅要摆脱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的压迫，而且要结束国内反动势力的专制统治，抗日胜利后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早在抗日准备阶段，中国共产党就明确提出要把争取民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1937 年 5 月 3 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名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这方面，应从改变国民大会的选举和召集上违反民主的办法，实行民主的选举和保证大会的自由开会做起，直到制定真正的民主宪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国会选举真正的民主政府，执行真正的民主政策为止。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地巩固国内和平，停止国内的武装敌对，增强国内的团结，以便举国一致抗御外敌。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不待我们改革完毕，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就到来了。因此，为着随时能够抵抗日本的进攻并彻底地战胜之，我们必须迅速地进行改革并准备在抗战的过程中进到彻底改革的程度。全国人民及各党派的爱国分子，必须抛弃过去对于国民大会和制定宪法问题的冷淡，而集中力量于这一具体的带着国防意义的国民大会运动和宪法运动，严厉地批判当权的国民党推动和督促国民党放弃其一党派一阶级的独裁，而执行人民的意见。今年的几个月内，全国必须发起一个广大的民主运动，这运动的当前目标应当放在国民大会和宪法的民主化的完成上。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论、集



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当前几个月内，全国人民的民主运动，必须争取这一任务的某种最低限度的完成，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等，都包括在内。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人民的自由权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上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②]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政治诉求，基本围绕着这两个方面展开，通过推动国民党的政治改革，以实现群众基本民主权利，为自己的政治活动提供合法保障。1940年初，毛泽东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指出要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主义，并指出这也是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由于当时国共力量对比变化还不明显，国民党在全国处于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更多地是从实际出发，考虑与国民党合作，参与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从而实现民主，为自己的发展创造条件。

中国共产党认为，对于民主政治的建设，关键是要体现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体现在许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实行选举制度。首先，中共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中共在抗战时期制定的选举制度规定，抗日民主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凡年满18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其次，中共坚持无记名投票和竞争原则。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根据地内普遍文化落后、文盲较多，选举中一律采用正规的无记名投票。各抗日根据地的选举法都明确规定了竞争原则。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在提名候选人时，不仅推荐自己的党员，同时也推荐其他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为他们提供条件，在必要时以自己的活动去帮助真正能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非党人士竞选。第三，中共坚持平等原则。抗日根据地民主选举的平等性体现在投票资格平等，不同阶级阶层平等，男女平等，民族平等。

为了在民主政治上进行有益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于1940年春提出了政权建设的“三三制”原则，即在根据地政权人员分配上，规定“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只有反共分子才没有资格参加这种政权。”[③]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

一。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做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必须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我们这样做，对于争取小资产阶级将有很大的影响。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些阶层的争取，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重要的步骤。目前我们决不能不顾到这些阶层的力量，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他们。"④在"三三制"政权中，共产党虽处领导地位，但不是一党控制，更不是由共产党一党包办。董必武指出："'三三制'这个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反对一党包办，反对一党专政，而和各党派、无党派的各阶级人士，更好地团结合作。"⑤谢觉哉指出："三三制是共产党约束自己的一个制度，人民不选或少选共产党员，共产党无权去要求他选或多选。但当选的共产党员若超过三分之一时，共产党就得辞去一些。为什么要这样？因要革命须要有坚强的领导的党，而处于优势的领导的党，很容易走到把持包办。把持包办，不但广大人民不满意于当政的党，对党的本身，也很不利。党得不到群众的拥护，其党必归于失败。"⑥

尤其要指出的是，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实践是在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前提下进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其中强调党的领导的一元化，指出党的各级委员会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应当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无论是政权"三三制"还是参议会都不可能动摇中共的领导地位，这是新民主主义的民主政治与西方民主在性质上的根本不同。

抗日根据地的实践证明，"三三制"的实行得到广大人民包括中间派的衷心拥护，推动了根据地民主政治发展的进程，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政治的实践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经验。

中国共产党极力主张和倡导宪政。1939 年 2 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该纲领具有"宪法"的性质。10 月 2 日和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两次向全党发出关于宪政运动指示，各抗日根据地的宪政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40 年 2 月 2 日，"延安各



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召开，大会通过了《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宣言》，毛泽东作了《新民主主义宪政》的重要讲演。1943 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反对自由主义、共产主义，随后，他乘第三国际解散之际，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面对国内局势的恶化，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加紧军事部署，一方面在《解放日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批判《中国之命运》，表明“这就是现在中国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的政治代表们所提倡的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之内容。”⑦而“国民党背叛革命，是假三民主义。今天起死回生，使真三民主义能够重见天日者，只有共产党所建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内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的民主政策。”⑧在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压力下，国民党于 1943 年 9 月间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会上提出在抗战结束一年后召集国民大会，还政与于民，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推动下，宪政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了，全国对此开展了热烈讨论。1944 年 3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当局允诺实行宪政，“虽其目的在于欺骗人民，借以拖延时日，稳固国民党的统治，但是只要允许人民讨论，就有可能逐渐冲破国民党的限制，民主运动推进一步。”⑨

为了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宪政的态度，中共重新发表了 1940 年的《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宣言》：

“一曰，今日实施宪政之意义，在于发扬民意彻底击败日本帝国主义。

二曰，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必须彻底修正，其代表必须重新选举。

三曰，国民大会组织法必须彻底修正，国民大会应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第一，国民大会于制定宪法，决定宪法施行日期外，应为执行宪法之机关。

第二，国民大会有决定内政外交基本方针之权。

第三，国民大会有选举政府，监督政府与罢免政府人员之权。

第四，国民大会有制定国家法律之权。

第五，国民大会应设常驻机关，执行大会闭会期间之职务。

四曰，全国应发起普遍深入之宪政运动，人民有讨论宪政与选举国大代表之自由，各抗日党有合法存在权利与参加国大代表竞选之自由。”⑩

在与国民党的谈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又提出，实行宪政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⑪但同时中共指出：“战后的中国应当是民主的中国，而不是专制的半

封建的中国，也不是苏维埃社会主义的中国。”⑫“这种民主制度不会是苏联的苏维埃制度，因为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而我国则在抗战胜利以后，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苏联的政府是工人阶级的政权，而我国的政权则是一切参加抗战建国的阶级的联合政府。”⑬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早在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提出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政治主张。1944年，中国共产党适时地提出了“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口号。1944年至抗战胜利，国共在建立联合政府的问题上几经磋商，由于国民党一意孤行，没有谈判诚意，关于联合政府的问题未能达成协议。

通过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主张和在根据地实行的“三三制”原则，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民主政治主张是清晰的，就是要以普通选举制为基础在多党派合作的基础上实行民主政治。在抗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毅然举起追求民主政治的旗帜，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逐渐争取到大后方广大民众的认同，在实践过程中得到根据地内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为将来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页，第256～257页。

③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0页，第742页。

⑤《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0～112页。

⑥谢觉哉：《三三制的理论与实际》，《解放日报》，1942年3月27日。

⑦《解放日报》，1943年3月14日。

⑧《解放日报》，1943年9月28日。

⑨⑪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页，第180页。

⑩《解放日报》，1943年9月26日。

⑫《解放日报》，1942年7月7日。

⑬《新华日报》，1942年7月28日。



国共两党在重庆的多次谈判

1943年春，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蒋介石就提出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谈判。但是由于蒋介石企图借共产国际解散之际，以谈判形式达到“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的目的，所以中国共产党对其提议未予理睬。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发生转变，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和集中全国力量抗日，决定与国民党谈判。1944年1月16日，毛泽东约见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告之中共拟于周恩来、林伯渠、朱德三人中择一人或三人同行，到重庆会见蒋介石，并同国民党重开谈判。2月2日，国民党中央复电延安，表示同意周、林、朱三人同去重庆。2月17日，毛泽东告知郭仲容，中共中央决定派林伯渠赴重庆谈判，行期在3月12日以后，郭仲容可以随行。

1944年5月2日，中共谈判代表林伯渠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同时到达西安。5月4日，国共双方代表开始会谈，至11日，先后进行了五次会谈。中共方面提出，谈判的基础是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宪政和团结问题》的讲演中提出的五点要求，即：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为其地方政府；承认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敌后武装为其所管辖所接济的部队；恢复新四军番号；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包围。[①]国民党代表拒绝了这一要求，主张先就两党目前有关军事及边区问题进行商谈。林伯渠就势阐明中共在军事和边区等问题上的具体要求。在军事问题上，林伯渠提出，经过多年抗战，中共领导的分散在敌后各游击区的正规军已有47.7万余人，都是久经考验，战绩卓越的部队，应立即予以整编，但为问题易于解决，先编六个军18个师。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认为太多，只同意四个军12个师。在边区问题上，林伯渠提出，边区辖区及民主制度不变。国民党代表主张把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直属行政院，实行国民政府的法令。在第五次会谈时双方商定，将历次会谈双

方意见整理成记录，经双方代表签字后各报告其中央，然后由两党中央作最后决定。结果，林伯渠在记录上首先签字，但王世杰、张治中却未签。西安谈判共进行了五次，双方未达成协议。

5 月 17 日，国共双方谈判代表一起飞往重庆继续谈判。国民党方面对中共代表来渝谈判早已作了精心准备。早在 2 月中共决定先派林伯渠赴重庆谈判时，国民党方面就多次召开会议，商讨制定林伯渠来渝后的对策。3 月 15 日，蒋介石就林伯渠来渝与外籍记者赴延安作了专门指示："对林祖涵之来渝后，谈话次序与日程，皆应事先排定，妥为准备应付。至谈话要点，我方应首先提出之最重要者，为军政、军令之统一，中共方面必须遵守"；"我方与之谈判，所持军事与政治之根本要求，两相比较，政治方面可酌予放宽一步；但于军事方面之军政、军令与纪律三者，必须坚持绝对之统一，要求其严格遵守，而不容有丝毫违反"。②国民党为执行上述方针，同时也为了防止林伯渠到重庆后扩大中共在国际上的影响，对林伯渠来重庆的途中及到重庆后的活动都作了监视安排：一、即电西安会报，饬注意林到西安后之活动，并派员随车到渝，注意其在途次之动态与表现；二、到渝后，藉招待之名，指定住所，派宪兵担任警卫，借以监视其行动；三、发动与林过去有友谊关系之党国元老与之来往以感动之，设法促其表示愿意脱离延安；四、派精通外语及有政治修养之干部，充任对林招待，经常随林出入；五、控制其与外人接近。其与外人谈话，事先须予以劝导，发言不得违背国家民族之立场；六、请其到中政校讲话，摘予发表，并予以评论；七、运用各党派对我抱好感之人士与林谈话，表示劝告中共放弃军权、政权，以谋国家之统一。③甚至在公布谈判的消息问题上，国民党煞费苦心："在商谈已有不成之见端时"，应由国民党中宣部向外公布。"若《新华日报》披露谈商不能成时，扣留其消息，而先由（国民党）中宣部发布'如中共以大局为重，此次谈商必有适当之结论'之乐观消息，以混乱《新华日报》之报导。"④可见，国民党当局根本没有谈判的诚意。

5 月 22 日，国共重庆谈判正式开始。林伯渠将中共中央拟定的《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共 20 条，交给张治中和王世杰。此 20 条意见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关于全国政治制度三条：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关于两党悬案有 17 条：中共领导的军队目前至少应编为五个军



16个师；中共军队防地，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请政府在物质上充分援助八路军新四军；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器弹药、药品、金钱，八路军新四军应获得其应得之一份；请政府停止对于华中新四军及广东游击队的军事攻击；请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并承认其为抗日所需要的各项设施；请政府通令取消“奸党”、“奸军”、“奸区”等诬蔑与侮辱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民主地区的称号；请政府停止特务人员对于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民主地区的破坏；请政府释放各地被捕人员；请政府允许中共在全国各地办党办报，中共亦允许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民主地区办党办报；请政府停止对重庆《新华日报》的无理检查与破坏发行。[5]张治中和王世杰认为中共所提意见，无异于宣布国民党的罪状，拒绝转呈蒋介石。为了顾全大局，能够保证谈判继续进行，林伯渠将国民党方面的意见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6月3日，中共中央复电林伯渠等中共谈判代表，决定将原提案的20条改为12条，涉及全国政治及编军、停止进攻、解除封锁等问题；其余关于停止特务反共破坏的条目作为口头要求，仍请国民政府考虑解决。6月5日，双方再次举行会谈。林伯渠将修改后的12条意见送交张治中、王世杰。但是张、王二人借口中共此次提交的意见与之前文件出入太大，仍不能接受，再次拒绝转呈政府。同时，张治中向林伯渠面交了国民党《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这个《提示案》对于中共提出的有利于抗日和两党合作的要求只字未提，反而要借谈判达到其削弱中共力量的目的。在《提示案》中，国民党政府将中共一切军队合编为四个军十个师，将陕甘宁边区定为陕北行政区。这样的条件，中共断然拒绝。6月11日，林伯渠写信给张治中、王世杰，指出张、王拒绝中共提案，又不转报国民党中央，只片面要求中共接受国民党的提示案，阻碍了谈判的进行。6月15日，张治中、王世杰复信林伯渠，称已将中共12条意见转呈国民党中央，但解决办法仍照国民党提示案不能变动，谈判遂成僵局。

为了表明共产党的谈判诚意，林伯渠于7月3日约见张治中，就国民党提示案提出两点意见：要求在政治问题上把民主尺度放宽；要求按16个师扩编共产党军队。林伯渠还表示中共中央欢迎张、王到延安商谈。张治中回答：允许中共军队编为四个军十个师已经尽到最大限度的容纳。他还表示，只有在重庆得出谈判结果，才考虑访问延安的问题。7月25日，林伯渠询问张治中和王世杰，国民党中央对中共所提的12条具体意见如何。二人回

应说，国民党的提示案即为具体意见。会谈无法继续进行。此后，林伯渠与张治中、王世杰又多次会晤和书信往来，但均无进展。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为隐瞒国共谈判的真相，推脱造成谈判僵局的责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梁寒操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国共关系已有改进，并将继续改进”，声称“谈判了三个月之后，国共问题已经有了一部分解决了”，“政府的观点和共产党的观点事实上并无严重分歧”，“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是在于中共党人一方面宣称他们有意合作，但事实不然，他们所做的事情和他们说的话相反”，并宣称国民党中央“始终以最大诚恳，宽容与忍耐谋谈判之成功”等等。[⑥]为了澄清是非，周恩来于 8 月 12 日在延安发表了《关于国共谈判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回顾了国共谈判三个月来的经过和基本情况，驳斥了梁寒操的种种谬论，指出：国共谈判任何一个具体的即使是最微小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国共谈判迄今无结果，根本障碍在“国民党统治人士及其政府始终固执其一党统治与拖延实行三民主义的方针，而不愿立即实行真正的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以保证战后和平”。周恩来还在这次谈话中，表明中共的态度：“依照目前形势，要最后战胜日本强盗，国共两党必须团结，国共之间所存在的问题，必须从速解决。而这种解决，只有国民党的统治人士立即放弃一党独裁政治，立即放弃削弱与消灭异己的方针，立即实行民主政治，并从民主途径中，公平合理的解决国共关系，才能得到效果。”[⑦]

9 月 5 日，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出席了这次会议。9 月 15 日，林伯渠在参政会上作《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报告了国共谈判四个月来所涉及的重要问题、谈判中存在的重要分歧、谈判的全部经过及其真相，谈到了全国人民对国共谈判的关切，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调整国共关系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以及迄今尚无结果的原因，提出了挽救危局，准备反攻的办法。他在报告的最后部分正式提出了中共的政治主张：“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以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才，集中全国力量，这样一定能够准备配合盟军反攻，将日寇打垮。”[⑧]林伯渠的报告，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得到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在继林伯渠的报告之后，张治中代表国民党作了关于谈判经过的报告。至此，国共双方的谈判告一段落。



这次国共谈判历时半年多，虽然因为国民党顽固地坚持反共立场而未获结果，但通过这一谈判，缓和了因反共军事摩擦而造成的紧张关系，避免了国共的内战与分裂，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谈判过程中，中共表现出诚意，得到广大人民支持，在政治上获得主动权。此后，随着美国政府代表和第三方面民主人士的参加，国共两党的谈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注释：

①⑧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88页，第334页。

②③④《1944年5月—1945年1月国共谈判史料》，《民国档案》1994年第2期，第51~52页，第47页，第50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12页。

⑥⑦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723~724页，第723~729页。

延安协议草案提出改组国民党政府为民主联合政府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陕甘宁边区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出现欣欣向荣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适时地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中共联合政府的主张是在借鉴欧洲一些国家建立联合政府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1944 年，欧洲一些国家在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情况下，纷纷成立由各方面反法西斯力量参加的联合政府。如法国共产党人就参加了由戴高乐组成的新的联合政府，并在其中担任部长职务。毛泽东曾指出："大家看到，巴黎暴动，法国共产党力量非常大，人道报的发行数，等于各报的总数。现在法国是共产党领导的，我们大家应该学习他们的经验"。又指出："法国广大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起来了，在南、希、意、罗也是如此，法西斯倒了，则政治是人民的"。[①]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了中国民主党派和国际舆论的支持。中共在正式提出联合政府主张前，曾同民主党派商谈。如果得不到民主党派的支持，联合政府就不可能成立。1944 年 8 月，毛泽东电告在重庆的中共代表与张澜等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商谈组织各党派联合政府问题。随后，林伯渠等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各民主党派赞同改组政府的主张。早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在与蒋介石会晤时就提出了国民党和延安方面共同组织一个联合政府的建议。美国希望蒋介石开放政权，"使其他党派中有资格的代表们来参加并分担政府的责任"，成立一个由蒋介石占主导地位的"多党的统一战线的政府"。[②]美国舆论也认为：中国形势的严重亟待成立联合政府。

1944 年 9 月 4 日，中共中央指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这一主张，应



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③]根据这一指示，9 月 15 日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的报告中，公开地提出了“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

中共在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后，进一步阐明了成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和方法。10 月 10 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如何解决》的演讲，明确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方案。第一，这各方代表，应由各抗日党派（国共两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分国民党中央军、地方军及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军三方面）、各地方政府（分大后方各省及敌后解放区民选政府两方面）、各民众团体（分大后方及敌后解放区带全国性的各界人民团体）自己推选，人数应按各方所代表的实际力量比例规定。代表总额，为应时局急需，且便于召集起见，可不必太多。第二，这国事会议，国民政府应于最近期间召开，以免延误时机，陷大后方于不可收拾的地步。第三，在这国事会议上，根据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原则，必须通过切合时要、挽救危机的施政纲领，以澈［彻］底改变现在国民党政府所执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错误政策。第四，在众所公认的共同施政纲领的基础之上，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以代替目前的一党专政的政府，吸收全国坚持抗战、民主、团结的各方领导人物，罢免失败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分子，以保证真正民主政治的实现。第五，这一联合政府须有权改组统帅部，延纳各主要军队代表加人统帅部，成立联合统帅部，以保证抗战的胜利。第六，在联合政府成立后，应即重新着手筹备真正人民普选的国民大会，准备于最短期间召开，以保证宪政的实施。[④]

美国对国共关系极为关注。罗斯福曾表示，如果国民党与共产党不能相处，可以由美国出面调解。国共双方对美国参与国共关系的协商都表示欢迎。在重庆，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进行了多次会谈。赫尔利声称他已解决了中美邦交中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矛盾，现在正试图调解国共关系。他表示来延安之前，蒋介石送给他一个方案，但是他考虑到中共难以接受，便当场退回。之后，蒋介石又重新起草方案，由他带到延安。11 月 17 日，赫尔利带着经蒋介石修改同意的作为国共协议基础的文件飞往延安。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他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并同赫尔利进行了为期三天的会谈。赫尔利对中共提出的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方针，表示赞同，并同中共签订了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联合军事统帅部及承认中共之合法地位的《延安协议草

案——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11 月 10 日，毛泽东和赫尔利在协定上签字。《延安协议草案》主要内容是："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质应被公平分配。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⑤从协议草案的内容上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为了能够实现联合政府的主张，作出了重大让步，表示愿意与国民政府合作。但是毛泽东也指出："我们承认一个联合的国民政府，并不妨碍将来我们自己组织解放区的政府。在国民党方面，如果蒋介石签字承认，即是最大的让步，因为我们得到了合法地位，这是前所未有的。"⑥

对于《延安协议草案》的签订，中共方面是满意的。毛泽东在致罗斯福的信中曾写道："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已一致通过这一协定之全文，并准备全力支持这一协定而使其实现。"⑦然而，蒋介石拒绝了《延安协议草案》。令中共更加气愤的是赫尔利回到重庆后态度大变，背弃诺言，完全支持蒋介石的意见，还企图对中共施加压力，逼迫共产党接受国民党的不合理要求。11 月 21 日，赫尔利向中共转交了蒋介石提出的另一协定草案，共三条，主要是：中共派代表参加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中共将一切军队交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管辖，进行整编；承认中共合法。⑧这实际上是要取消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已经取得的成果和争取抗战胜利的基本力量。中国共产党当然予以强烈反对。12 月 8 日，毛泽东在接见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时，表示中共坚决反对蒋介石提出的三点建议，批评赫尔利背弃与中共签署的五点建议并为蒋介石的反建议做说客。毛



泽东还指出："蒋介石提出的三点建议等于要我们完全投降，交换的条件是他给我们一个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席位，而这个席位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赫尔利说我们接受这个席位，就是'一只脚跨进大门'，我们说如果双手被反绑着，即使一只脚跨进了大门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欢迎美国的军事援助，但不能指望我们付出接受这种援助要由蒋介石批准这样的代价。"⑨

在赫尔利的支持下，蒋介石更加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政，拒绝接受中共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赫尔利还向蒋介石建议，在行政院下，设立一个由各党派参加的战时内阁性质的机构，成立一个由国共双方和美国参加的整编委员会整编中共军队，并由蒋介石委任一位美国军官作总司令。这是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突出表现，中国共产党当即予以拒绝。至此，国共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争论暂告一段落。

中国共产党联合政府的主张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很快为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所接受，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1944 年 9 月 24 日，各党派、各界人士 500 余人在重庆集会，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第三党领导人章伯钧、中共领导人董必武等出席了会议。在会上，张澜代表民盟发表谈话，认为各党派与无党派共同组织政府，成立联合政权是解决国事，挽救危亡的重要途径，中国民主同盟支持联合政权。10 月 10 日，民盟又宣布：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而斗争。⑩1944 年 12 月 15 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指出 1945 年的任务是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现行政策，以便迅速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⑪1945 年元旦，救国会、第三党、职教社等领导人纷纷献言献词，积极响应联合政府号召。此后，重庆、成都等地文化界、妇女界，要求建立联合政府的呼声此起彼伏。青年学生在集会和游行示威中，也高呼建立联合政府的口号。

中国共产党联合政府的主张表明了中共追求民主和平的真诚愿望，是中共具体纲领的一个重要发展，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虽然要取消独裁专制统治，坚决要同国民党的反动政策进行斗争，但在民族矛盾仍是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仍以打败日本侵略者为当前要务，把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作为抗战胜利的重要保证。因此，联合政府力争把国民党包括在内。为此，中共作了重大让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曾指出：我们的极大让步是与极其腐败的政府合作。我们是在不破坏解放区，不损害民主的原则下同蒋妥协。⑫共产党人的态度是："不管国民党当局现在还是怎样坚持其错误政策和怎样借谈判为拖延时间、搪塞舆论的手段，只要

他们一旦愿意放弃其错误的现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们是愿意和他们恢复谈判的。"[13]在这个意义上，联合政府主张是团结抗战的主张，联合政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上的最高形式"。[14]

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使中共在政治上争取了主动地位。毛泽东在1945年3月谈到联合政府问题时说："长期以来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口号，现在有了联合政府这个口号很好。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群众如此广泛拥护，我是没有料到的"。[15]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自从中共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后，社会反共心理逐渐减弱，政府逐渐陷于孤立地位。

注释：

①王秀鑫、郭德宏主编：《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1931—1945）》，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628页。

②《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85页，第597页。

③④⑤⑦⑪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23页，第364～365页，第393～394页，第397页，第415页。

⑥⑫⑮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4～355页，第354页，第371页。

⑧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59页，第563～564页。

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一九四一——一九四九），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32页。

⑬《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9页。

⑭《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0页。



国共双方在抗战中的最后一次谈判不欢而散，积极准备下次和谈

1944年8月，赫尔利来华，其使命之一就是督促国共两党一致抗日，减轻美国的战场上负担，虽然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由扶蒋联共转变为扶蒋反共，但推动国共合作，尽量维持合作局面以利于抗日仍然是美国的主要目的。

由于国民党方面顽固坚持一党专政，拒绝中共提出的《延安协议草案——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国共谈判一度陷入僵局，满怀信心的赫尔利希望能促成国共双方再次和谈。1945年1月7日，赫尔利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提议在延安举行有他参加的国共两党的会议。1月11日，毛泽东复信赫尔利，委婉的拒绝了他的提议，指出恐此项会议得不到何种结果。毛泽东还请赫尔利向国民党政府转达中共下述提议：在重庆召开国是会议之预备会议，此种预备会议应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政团同盟三方代表参加，并保证会议公开举行，各党派代表有平等地位及往返自由。毛泽东表示如果国民党政府同意这一提议，周恩来可到重庆磋商。[①]1月20日，赫尔利再次致函毛泽东，说他相信国民政府准备作出重要的让步，建议再派周恩来到重庆谈判。1月22日，毛泽东再次复电赫尔利：派周恩来前往重庆代表中共同国民党谈判。周恩来此次再去重庆谈判是在赫尔利保证有所让步的前提下前往的，这次谈判是对国民党政策是否有所转变的检验。在临行前，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一、争取联合政府与民主人士合作；二、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具体步骤，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参加；三、要求国民党先办到以下各项——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实现一些自由，取消特务活动。[②]

经过两个月的交往，中共对赫尔利有所了解。赫尔利的背信，使中共对

赫尔利从信任转变为不信任。虽然中共在 1945 年 1 月初决定派周恩来再赴重庆会谈，但是对曾经食言过的赫尔利是不能再信任了。不过中共还是认为，赫尔利在 1944 年底的这些行动，美国政府是不知情的。中共仍然对美国政府，尤其是对罗斯福总统寄以希望，希望他能直接过问中国问题，能促成中国问题朝着正确的途径顺利解决。[③]

1 月 24 日，周恩来由延安飞抵重庆，临行前周恩来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讲话，向民众表达中国共产党的和谈诚意，同时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为着动员与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国战胜日本侵略者，并为挽救当前危机起见，急须与政府及各方商讨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之具体步骤。此次去渝，即系本此方针，代表我党中央，向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国民主同盟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事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事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现的步骤问题……目前全国人民所期望于国民政府的，实为立即废除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承认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自由的法令，废除一切特务机关，停止一切特务活动，释放政治犯，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和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队，承认中国解放区一切抗日军队及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④]

毛泽东的建议和周恩来的声明表明，中国共产党决心改变以往秘密谈判的方式，决定将国共两党的争论诉诸国人，以公开讨论组织联合政府来推动国统区的民主运动。因此，中共提议首先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是会议预备会议的建议。但是，蒋介石坚持要成立有美国人参加的委员会整编中共军队。

周恩来抵达重庆当天，国民党代表即与赫尔利一起混淆一党专政与民主政治的界限，企图劝说周恩来让步。周恩来当即表示不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任何形式的组织中共均不参加。1 月 25 日，周恩来同赫尔利会晤，赫尔利提出五点：一、去年 11 月 21 日的三条仍要做；二、行政院下设各党派参加的战时内阁性的新机构；三、成立有国民党、共产党、美国各一人参加的整编委员会，整编中共军队；四、为中共军队设一美军官作总司令；五、国民政府承认中共合法。[⑤]对于赫尔利提出的五点，周恩来断然拒绝，声明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随后周恩来应邀同宋子文商谈，参加的有赫尔利、王世杰、张治中。宋子文陈述了国民党和美国方面已经商量好的几点内容，周恩来则坚持必须先解决一党包办问题，指出：民主与党治不能并存，国民党的建议是在维持一党统治条件下的让步；组成三方编制委员会和任命美军



司令指挥中共军队为无理之事，应该代之以改组国民党控制的军事委员会，改编和训练全国军队，承认敌后抗日武装；建立的联合统帅部应指挥全国军队，而不应仅是指挥中共军队。双方立场相距甚远，会谈没有取得结果。会后，周恩来发表声明，详细说明了中共中央对于当前时局的主张，并指出当前全国人民期望的是立即废除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承认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取消镇压人民自由的法令，废除特务机关，停止特务活动，释放政治犯，撤退包围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队，承认解放区军队和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等。

1 月 28 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对周恩来拒绝赫尔利的建议表示支持，“你拒绝了赫尔利的两个补充办法是很对的。这是将中国军队尤其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⑥]

1 月 30 日，周恩来继续同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会谈。在王世杰、张治中口头承认应结束一党统治后，周恩来问如何作法。当王、张表示倾向于召集党派会议时，周恩来追问会议的成分和内容，并提出成分应是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内容应是讨论结束一党统治、共同纲领、改组政府。周恩来指出，要有一个基本的政治解决方案，才会有利于真正解决问题。1 月 31 日，周恩来同王世杰谈判，王世杰主张中共参加最高国防军事委员会；政府承认党派合法；同意召集党派会议，但不接受结束一党统治，周恩来表示不赞成成立整编委员会，主张改组军事委员会，坚持结束一党统治。

2 月 2 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电告的内容，起草关于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内容是：一、党派会议应包含国民党、共产党及民主同盟三方代表。会议由国民政府负责召集，代表由各方自己推出。二、党派会议有权讨论和解决如何结束党治，如何组织政府，使之成为民主的联合政府，并起草共同施政纲领。三、党派会议的决定和施政纲领草案，应通过于将来国民政府召开的国家会议，方能成为国家的法案。四、党派会议应公开进行，并保证各代表有平等地位及来往自由。草案拟就后交予王世杰，王世杰同时将国民党方面草拟的关于政治咨询会议的方案交周恩来。周恩来阅后声明：王的方案中没有改组政府字样，主张仍以协定草案为讨论基础。当日晚间，周恩来继续同王世杰谈判，王世杰主张将党派会议改换名称，加入无党派人士；周恩来坚持党派会议必须讨论和决定结束一党统治、改组政府、起草纲领等问题；王世杰表示企图找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以和缓局势。当日，周恩来电

告毛泽东，指出蒋介石、王世杰有可能接受党派会议。

毛泽东复电周恩来，指出国民党现在急于和我们求得政治妥协，并请周恩来明白告诉国民党及小党派：除非明令废止一党专政，明令承认一切抗日党派合法，明令取消特务机关及特务活动，准许人民有真正自由，释放政治犯，撤销封锁，承认解放区，并组织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我们是碍难参加政府的。同日，毛泽东再致电周恩来：除坚持废除党治外，请着重取缔特务、给人民真正的自由、释放政治犯、撤销对边区的包围四条。请直告赫尔利、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如这四条不先办到，不能证明废党治、行民主不是骗局，我们方难加入政府。固加入政府要负责任，没有先行四条，我们无从负责任，即使形式上废除党治，成立联合政府，亦将毫无用处，不过骗人空招牌而已"。⑦

中国共产党公开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以讨论国事的建议使国民党陷于极度被动的局面，国民党不得不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作出答复，同意召开包括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2 月 3 日，王世杰将草案拟出，其内容是："为增强本国对敌作战之力量，并促进中国统一起见，吾人同意国民政府应邀国民党代表、其他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无派领袖参加一协商会议。此会议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其会员不得超过若干人。此会议之任务在考虑：（一）从事结束训政时期，以建立宪政政府之步骤；（二）将来共同遵行之政治决策及军队之一元化；（三）国民党以外各党派参加国民政府之方式。如政治协商会议获得全体一致之结论，是项结论将提交国民政府考虑并执行。惟于政治协商会议进行期间，各党派必须停止一切责难。"⑧周恩来表示，可以将此作为合作的基础，待研究后再作进一步答复。

2 月 13 日，周恩来同赫尔利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宣称：不接受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组织联合政府相当于推翻现有政府，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还提出整编人民武装，由美国军官担任指挥官。对于蒋介石的言论，周恩来逐条予以批驳，国共谈判再次陷入僵局。为了欺骗舆论，国民党方面还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向记者宣称，国民党政府已作出了让步，企图把国共和谈失败的罪责强加到中共身上。14 日，周恩来于重庆特园宴请于右任、孙科、左舜生、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等，在席间，周恩来报告了最近国共谈判的经过，揭露了蒋介石反民主的本质，说明鉴于蒋介石的态度，谈判无法进行，明日即将返回延安。15 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就国共谈判发表声明，指责国民党方面的声明是不坦白和不公平的，颠倒了事实，说明由



于国民政府在谈判中坚持要中共交出军队，坚持不结束一党专政，反对民主的联合政府，所以谈判毫无结果。至此，国共双方在抗战期间的最后一次谈判宣告彻底破裂。

2 月 17 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关于国共谈判无结果，周恩来返回延安的新闻稿，向全国人民揭示了国共和谈失败的原因。文中指出：由于国民党当局依然坚持一党专政，反对联合政府，反对人民与民主，并企图吞并八路军、新四军，以致仍如过去谈判一样，未能成立任何协议。

注释：

①②⑥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 572 页，第 574 页，第 574 页，第 576 ~ 577 页。

③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主编：《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社，1988 年版，第 87 页。

④《解放日报》，1945 年 1 月 25 日。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 598 页。

⑧《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1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年版，第 148 页。

中共七大的筹备与召开

虽然国共谈判一年多来仍无结果，但是到1945年春夏之交，国际形势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欧洲战场，德意法西斯即将被消灭；在亚洲战场，日本法西斯也行将败亡。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处在最后胜利的前夕，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复杂的战争形势，中共七大的胜利召开是来之不易的。从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到1945年4月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间相隔17年，期间曾多次提出筹备召开七大，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未能如期举行。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最早作出召开党的七大的决定。全会决议案提出："四中全会认为必须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大会，委托新的政治局开始必须的准备工作，以保障这次大会要有各地党部的好的代表，要有对于苏维埃运动经验的郑重的总结的可能，要有对于工业中心党的工作经验的郑重的总结的可能，要通过党的党纲和其他文件。"①但是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推行，加之国民党对根据地连续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革命力量进一步遭到严重损失，使七大的筹备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召开大会的计划落空。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在巩固了陕北根据地后，召开七大，对党在前一段时期内的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就显得尤为必要。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在最近时期内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和党的工作，均有最严重的意义"。对于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任务，决议指出"在于讨论和规定如何在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方针下，组织和保障全中国人民取得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对于自党六次大会以来的革命斗争经验作一个基本的总结"。同时，政治局对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议事日程暂时提议：



一、十年奋斗的基本总结和今后奋斗的基本方针；二、如何组织和保障全中国人民对日抗战的胜利；三、动员工人阶级积极参加对日抗战工作；四、在新工作条件下的党的建设问题；五、改选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为了有系统地进行一切有关召集七次大会的准备工作，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准备委员会成员有：毛泽东、王明、朱德、周恩来、项英、张闻天、张国焘、秦邦宪、康生、陈云、王稼祥、彭德怀、任弼时、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曾山、张鼎丞、陈毅、杨靖宇、高岗，准备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书记为王明。为了便利工作，政治局决定在准备委员会下设立秘书处，由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王明组成。[②]时隔不久，在 1938 年 3 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作会议总结报告，重申了召集党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并且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进行具体准备工作，即发布为召集七大事告全党同志书；发表为召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告全国同胞书；给地方党部怎样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进行七大准备工作的指示；成立大会四个议事日程报告的准备委员会；责成政治局及中央同志起草大会第一、第二两个议程的政治提纲，以及写关于第三、第四两个议程的论文和其他专门问题的论文，不仅作为地方党部和全党同志讨论和研究大会问题的材料，而且作为一切对中共七大愿意发表意见和提出建议的人士们的参考。[③]

中共中央这两次为七大召开所作出的努力，又因抗日战争和党内分歧而未能落实。1937 年 7 月 7 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企图以三个月灭亡中国，因此以强大兵力向中国发动战事，中国军民全力投入抗战之中。抗战初期，1937 年 11 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王明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推行共产国际的以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抗战速胜为标志的一套方针、政策，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抗战爆发前后制定的全面抗战路线相矛盾，党内意见显然不统一。这样，召开七大的计划又一次被搁置。

1938 年 9 月 29 日至 11 月 6 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再次提出关于召开七大的问题，并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重申了召开七大的意义、中心任务和主要议事日程，并对参加大会代表的名额和选举作出指示，“各地参加大会代表的名额，依各地党员的数量、质量，和各地在抗日战争中作用的重要性分配之。代表的产出，除了某

些因环境关系不能进行民主选举的地区外，须尽可能作到用民主方法选举代表"；"各地代表由各地省的或区的代表大会选出，八路军、新四军的代表，由师的党代表大会或支队党代表大会选出。在特殊条件下，不能召集上述代表会议时，由各地中央局或军队的政治部按照实际情况酌定办法"；"地方党部的选举方法由各地最高党部决定"。[4]随后，1939 年 6 月 14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知第二号——选举代表的数量质量及各地分配名额》，指出参加大会代表的总数量在六中全会决定的 350 人的基础上，增加 100 人，共 450 人，根据此数目，对与会代表的数量作出具体分配，即"北方局原定六十三人，增加十一人，共七十四人；八路军原定六十五人，增加三十人，共九十五人；新四军原定四十七人，增加三人，共五十人；南方局（四川在内）原定四十六人，增加十人，共五十六人；边区（中央机关、留守兵团在内）原定五十六人，增加四十四人，共一百人；中原局原定三十五人，增加十五人，共五十人；陕西省委十五人；东北原定八人，暂减五人，共三人；华侨原定五人，暂减二人，共三人（改为特别旁听）；新、兰四人"。指示对与会代表的质量有严格要求：政治上要绝对可靠，一年以上的正式党员，真正能代表该地组织反映该地工作的各级干部，年龄一般为 20 岁以上；要提高警惕性，绝对保证不让敌探、奸细、叛徒等阶级敌人、暗害分子混入；尽可能求得工人 20%，妇女、青年 10%，工人成分尽可能求得其中有大城市、大产业、铁路、海员、矿山等。[5]此后不久，中共中央书记处于 1939 年 7 月 21 日发出《关于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知第三号——关于选举问题的决定》，指示各地除照数选举正式代表外，应选出三分之一的候补代表（150 人），遇到正式代表因工作不能出席时，候补代表可按次递补为正式代表，候补代表也可出席大会，但无表决权；全体中央委员分配在各地选出，其名额不在各地原定代表的名额数目之内。[6]中共中央通过这三次会议，对召开七大的工作安排逐渐具体化，筹备工作日趋完备。

1938 年 10 月，随着武汉三镇相继陷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了艰苦的斗争，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主要战场。此后，国民党于 1939 年 1 月 21 日至 30 日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对内加紧反共反人民，连续在全国各地制造反共惨案，到 1939 年形成了第一次反共高潮，1941 年 1 月，又制造皖南事变第二



次反共高潮。与此同时，在党内，错误路线仍然存在，新党员和新干部还没有来得及培训，党内长期留传下来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不良作风还有待清理。于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内部，逐步开展整风运动。七大因此再次延期，但是筹备工作仍继续进行。

1943 年 8 月 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出席大会的指示》，指出七大准备在年底举行，并决定彭德怀、罗瑞卿、蔡树潘、薄一波、聂荣臻、吕正操、朱瑞、苏振华等同志来延出席大会，近者 9 月内，远者 10 月内到达延安。[7]后来由于国民党正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胡宗南调集重兵准备袭击延安，七大只好再次推迟。从 1943 年开始，世界反法西斯阵线转入对法西斯阵线的进攻，抗日根据地军民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也逐步渡过难关，开始局部反攻；同时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整风运动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一切表明召开中共七大的条件已经成熟。1944 年 5 月 10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了党的七大准备工作，决定组织准备报告委员会。为了进一步进行七大的准备工作，中共中央于 1944 年 5 月 21 日召开六届七中全会。七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七大的议程及报告负责人：政治报告——毛泽东，组织及修改党章报告——刘少奇，军事报告——朱德，党的历史问题报告——任弼时，统一战线报告及公开讲演——周恩来。[8]1945 年 3 月 16 日，七中全会召开主席团会议，决定于 25 日前做好召开七大的一切准备工作，拟向大会提议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康生、高岗、陈毅、陈云、林伯渠、董必武、彭真、张闻天、徐向前、贺龙 16 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主席团常委，并拟定大会开幕典礼程序。[9]1945 年 3 月中下旬，任弼时连续主持七大各代表团负责人会议，再次对代表资格进行审查，审查合格的正式代表 547 人，候补代表 208 人，合计 755 人，其中新增补的 246 人，被停职或撤销代表资格的，或被原来的选举单位撤销代表资格的 49 人。[10]1945 年 3 月 31 日，七中全会召开全体会议，会议议题主要是通过政治报告、党章（草案）。1945 年 4 月 20 日，七中全会召开最后一次全体会议。经过讨论，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朱德拟向七大所作的军事报告和七大的议事日程、主席团、常务主席团、秘书长和以彭真为主任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这为七大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5 年 4 月 21 日，中共七大预备会议召开，任弼时在会上对召开七大的筹备工作作了说明。他指出七大因战争关系、交通分割而一再推迟，实属缺

点，但是也有其积极的方面，在延期当中，中共进一步发展了力量，党内的思想也更加一致，在此基础上七大将开得更好，推迟是有意义的。至此，召开七大的筹备工作全部完成。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胜利召开，毛泽东主持大会，并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在大会讨论过程中，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问题》的重要发言；陈云、彭德怀等也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条例》、《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党章》，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大会经过充分酝酿，选出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6月11日大会胜利闭幕。在闭幕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总结了中共七大的成绩，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教育了全党同志，鼓舞了全党的斗志，成为同志们的精神动力。

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这次大会，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

注释：

①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页。

②③④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05~406页，第464页，第775页。

⑤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资料》第3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114页。

⑥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49年），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页。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60~461页。

⑧⑨⑩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年谱》（一九〇四——一九五〇），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版，第464页，第476页，第477页。



中共七大通过《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和《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议程，是听取和讨论毛泽东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关于成立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早已提出，并为此而作出了长期努力。1944 年至 1945 年，国共进行多次谈判，都未能在建立联合政府的问题上达成一致。虽然谈判的成效甚微，但是中共所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却得到民主人士的一致拥护。《华西日报》发表社论说："抗战若要胜利，必须团结。团结若要坚实扩大，必须民主。""一切问题靠民主解决，一切危机靠民主克服。"[①]到 1945 年初，国民党统治区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民主运动声势越来越大。1 月 15 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时局宣言，提出诸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权"、"开放党禁，承认各党派公开合法地位"、"废除特务及劳动营一类纯粹法西斯组织"等十项主张。[②]各界民主人士也相继发表联合宣言，一致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国事会议，建立联合政府的号召。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于 1945 年 4 月 24 日，在中共七大会议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更为详尽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指出了中国人民当前的基本要求是：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并且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

关于中国人民能否实现这些基本要求，毛泽东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在国际方面，苏军已经攻击柏林，英美法联军也正在配合打击希特勒残军，意

大利人民又已经发动了起义，将最后消灭希特勒；在国内方面，长期的战争使中国人民付出了并还将再付出重大的牺牲，但是也锻炼了中国人民，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同时，中国面临两条路线：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和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二者相比较，后者将是胜利的。毛泽东指出：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国人民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中国人民如果能很好地利用这些条件，积极地坚决地再接再厉地向前奋斗，战胜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是毫无疑义的。从整个形势看来，当前在中国人民面前有好坏两个可能性，存在好坏两个前途，即“继续法西斯独裁统治，不许民主改革；不是将重点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对人民方面；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里去。这是一个可能性，这是一个前途。”另一个可能性和另一个前途是“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是“竭尽全力地去反对第一个可能性，争取第二个可能性，反对第一个前途，争取第二个前途”。

为了争取光明的前途，使中国的历史任务获得完成，毛泽东在报告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是在中国人民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具体纲领概括为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实现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实现人民的统一；建设人民的军队；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解放农民；发展工业；重视文化教育，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正确对待少数民族问题；平等、和平的外交。此外，毛泽东还补充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沦陷区、解放区的任务。在国统区，共产党人应当继续执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沦陷区，共产党人应当号召一切抗日人民，学习法国和意大利，将自己组织于各种团体中，组织地下党，准备武装起义，等待时机成熟，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里应外合地消灭日本侵略者；在解放区，军民必须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并注意解放区的各项巩固工作。



在报告最后一部分，毛泽东号召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毛泽东第一次从理论高度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他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的标志。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建党学说体系达到了完备和成熟。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还深刻论述了党内思想教育和党的组织原则问题。他指出，几年来的整风工作收到了巨大的成效，广大党员受到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那些不纯正的思想得到很多纠正，但是党内思想教育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今后应当继续这种工作，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更大地展开党内的思想教育。"关于加强党组织建设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要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不论什么同志，只要他是愿意服从党纲、党章和党的决议的，我们就要和他团结。针对党内民主程度不够，集中领导也不充分的实际状况，毛泽东在七大总结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实行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的科学论断。他说，放手的民主，高度的集中，性质是讲程度的。历次讲民主程度不够，集中也有不适当的。两个东西是矛盾的，但可以统一。要大开言路，开窗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同志，统一意志，集中意志，形成高度集中。没有集中不能胜利、要被消灭。我们的目标，是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③

《论联合政府》总结了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和抗日解放区建设经验，全面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国家学说。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总结了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的两条不同抗战路线斗争的历史，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纲领，进一步指明了新、旧民主革命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论联合政府》在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斗争的重要时刻，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1945 年 4 月 20 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

八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拟提交七大的朱德作的军事报告草案。朱德在会上说明了军事报告草案的起草情况。[④]4 月 25 日，朱德在中共七大第三次会议上正式作此报告。

在报告中，朱德首先向大会代表介绍了抗战八年来的三个阶段变化：在这八年当中，抗日战局经过了复杂的变化。但是变化不管怎样复杂，其发展过程，仍没有超出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三个阶段的科学预见，这就是：敌人的进攻阶段，敌我的相持阶段，我方的反攻阶段。目前所进行的抗日战争现已处在大反攻阶段的前夜了。

在谈到解放区战场时，朱德指出：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溃败而瓦解了的华北、华中战局，立即由我党、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合作，而迅速恢复起来，敌后变成了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了。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游击战争，在敌后代替了国民党退出之前的单纯防御的地位。为国民党当局所丧失的陷入黑暗的广大沦陷地区，逐步经过共产党之手，收复过来，变成了光明的广大解放区。解放区战场在抗日战争初期，便牵制了日寇很多兵力，随后又变成为与日寇作战的主要战场，解放区战场就在抗日战争中形成了重要的和决定的战略地位，变成为抗日的重心。

朱德根据解放区抗战的历史过程将解放区抗战分为三个时期，从 1937 年 9 月平型关初战胜利，至 1940 年百团大战为止，是第一个时期，八路军、新四军相继打破日寇的扫荡、封锁，创造了华北、华中各解放区，八路军由几万人发展到 40 万人，新四军由 1.2 万人发展到 10 万人，解放区人口 5 000 万，这是敌后解放区的创造与开辟时期。从 1940 年百团大战到 1942 年为止，是解放区面临严重困难时期，八路军百团大战的威力惊醒了日寇，日寇纠集重兵对付敌后抗日武装，到 1942 年为止，解放区人口缩小至 5 000 万以下，八路军减员至 30 万。我们在这时期更加亲密地与人民相结合，因而学会了坚持与敌人顽强斗争和战胜强敌的许多本事。八路军、新四军就这样胜利地渡过解放区战场的最困难的阶段。从 1942 年冬开始，华北各解放区转到新的扩张的时期，也即是开始了解放区抗战的第三个时期，我党乃以敌进我进之战略，到敌后之敌后，去开辟解放区，粉碎敌之进攻。这一战略发生了极大效果，使解放区的发展，超过抗战初期的记录。在此期间，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发动伟大的整风运动和伟大的生产运动；各地再次深入减租减息；三三制联合政府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这些努力都使各解放区内部更加团结起来。在军事上，主力兵团更坚强，地方兵团日益扩大，民兵之



普遍发动，又大大加强了各解放区的军事力量。这一切，把解放区巩固和加强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在报告中，朱德总结了解放区抗战成绩：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抗击侵华日军的64%，抗击伪军的90%，创造了遍于华北、华中、华南19省地区的解放区，解放人口共计9 550万。

谈及解放区抗战经验时，朱德表示：解放区经过了我们党的领导，依据毛泽东同志人民战争的方针，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实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因此，实现了解放区的全民抗战总动员，实现了解放区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实现了解放区各阶级的大团结，也因此实现了抗战一元化的领导。如果没有这一切，就没有解放区全面的人民战争，而如果没有这种人民战争，也就没有了一切。

报告中，朱德还提出中国人民有两条不同的抗战军事路线：从压迫人民、奴役士兵出发，从消极抗战以至观战、专靠外援出发，从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出发，从排除异己、破坏团结出发，就构成了一条反人民的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这是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与此相反，从全民总动员、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积极打击日寇出发，从团结军民、团结官兵出发，从团结一切友军出发，从积极打击敌人增强自己的战略战术出发，这样就构成了一条中国人民的抗日的军事路线，这是解放区战场获得胜利的关键。

朱德还就建军的原则，兵役问题，怎样养兵，怎样带兵，怎样练兵，怎样用兵，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军队的指挥，怎样解决装备和其他事项，强大的主力和强大的后备，怎样瓦解伪军等问题一一作了详细阐述。

在报告最后朱德向大会代表指明今后全国、解放区、沦陷区不同的军事任务。全国的军事任务是八路军、新四军与一切抗日友军团结起来，打败日本侵略者。沦陷区的军事任务是加强对沦陷区人民的政治争取工作和组织工作，加强对敌伪军警的政治影响以争取他们反正，加强敌后各城市工作和组织地下军的任务。解放区的军事任务是：一、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二、扩大人民武装，消灭与瓦解敌伪军。三、为了准备反攻，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正规兵团、地方兵团与民兵自卫军的训练。四、提高军事技术。五、加强指挥机关。六、准备大反攻的物质基础。七、加强优待抗属、抚恤伤亡、安置残废军人及退伍军人的工作。八、要推进这一切工作，完成这许多任务，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内部必须有很好的团结，并在这个

基础之上去团结广大的友军。

朱德总结报告时指出：我的报告总结了八年抗战军事的经验，主要是解放区抗战军事的经验，为的是如何在军事上去完成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去完成其所提出的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抗战建国任务。[⑤]

注释：

①《解放日报》，1944年10月20日。

②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一九四一——一九四九），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36~37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9~1100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0页。

⑤《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5~183页。



周恩来《论统一战线》的发言
修改党章报告的通过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法宝之一。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①对于统一战线的性质、构成和方式，毛泽东总结指出："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这就不但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基本的革命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并且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②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为了国家、民族存亡的根本利益，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③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大。周恩来于1945年4月30日在中共七大会议上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发言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着重讲国共关系；一个是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问题。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周恩来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的主张是同一个东西，联合政府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上的最高形式。从九一八事变到党的七大，周恩来同志把统一战线，划分为五个阶段：

一、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斗争的中心是抵抗日本侵略，还是不抵抗日本侵略。我党在全国人民面前所提出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当局所提出、所坚持的是“攘外必先安内”，实际上就是内战的方针。二、从西安事变到七七抗战：争论的中心是真正准备抗战，还是空谈准备抗战。我党的中心口号是以民主来推动抗战；国民党是“根绝赤祸”，拖延抗战，就是要把共产党的活动消灭、根绝，就是在准备抗战的借口下把抗战拖下去。三、从七七抗战到武汉撤退：斗争中心是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我党坚持持久战争，就是全面的抗战、全民族的抗战，要求建立统一战线组织，制定共同纲领，改革政治机构；国民党方面要速决战，只许政府抗战，不许人民起来，以此来对抗我党的持久战争、人民战争的方针，并且提出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反动口号，落实他们的“溶共政策”。四、从国民党五中全会到1944年国共两党公开谈判：斗争的中心是我们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国民党要妥协、分裂、倒退。我党在此期间，创造了19个解放区，发展了很多军队，支持了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推动了全国的民主运动；国民党依靠外国帮助，等待胜利，勾结敌人伪军制造内战，其间有三次反共高潮，三次国共谈判。五、从联合政府口号提出到现在：斗争的中心是我们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党继续坚持一党专制的政府。我党的方针是立即召开党派会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战后召集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国民党的方针是不放弃一党专政，包办国民大会，继续一党专制。

关于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问题，周恩来依据毛泽东思想，从同左、右倾斗争的丰富实践中，深刻指出，要建立一个巩固的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就是要认清楚敌人、队伍和领导权这三个问题。

认清敌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可是帝国主义不仅是一个，而国内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又有不同的派别和集团，这些敌人常常不一致，所以敌人营垒是变化的。特别是各阶级的代表人物，更不是固定不变的，有些敌人在一定条件下是有两面性的。这就要正确地认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矛盾变化，能够随时地认识敌人，分析敌人，能够提出战胜敌人的正确方针。

要组织好队伍。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有无产阶级，有农民，有小资产阶级，有自由资产阶级，甚至有时有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来参加，这个队伍很大，很复杂，力量不平衡，不容易统一。对这样一个队伍要弄得很清楚，要会分析，懂得怎么争取队伍的大多数。无产阶级是这个队伍的骨干。



无产阶级觉悟高，本事大，可是人数少，力量小，这就要依靠最可靠的同盟军——农民。农民是这个队伍中的主要力量。城市小资产阶级是这个队伍中基本力量，其中典型代表是知识分子，要引导他们和工农结合。还有一个自由资产阶级，是中间力量。对于他们要争取，要联合，至少使他们中立，但不能依靠他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有时也会参加到统一战线队伍里来，但是他们带着很明显的两面性，他们的反动性的那一面是根深蒂固的，与他们合作时，要随时提防他们，反对他们的反动性，绝不能依靠他们。总体而言，我们党将这个队伍分三类：一类是进步力量，就是工农小资产阶级；一类是中间力量，就是中间阶层；一类是顽固力量，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我们的方针是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分化和打击顽固力量。

领导权问题。就是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无产阶级比别的阶级先进，是应当领导别的阶级的。但无产阶级也不是天然的司令官，是通过艰苦斗争而争来的，和我争领导权最主要的力量，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双方争夺的对象是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国民党是用压迫的方法去争取，共产党是用同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合作的方法。领导权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左、右倾都不懂得领导权问题。右倾观点是放弃领导权；左倾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空军司令”。可以说，“右”倾是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给革命造成的损失是一样的。[④]

周恩来的《论统一战线》的发言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对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统战问题上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科学的总结，对当前和今后如何搞好统一战线工作，都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修改党的章程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要议程之一。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制定过七部党章。其中一大到六大制定的六部党章，都是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帮助下制定的，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党的建设的一些特点。1945 年中共七大制定的党章，则是在 1943 年共产国际解散后由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制订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党的建设上的完全成熟。

1945 年 3 月 31 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了为七大准备的新党章草案。刘少奇就修改党章的经过及有关问题作出说明，指出：党章照顾了现在和将来，一方面肯定了严肃性，一方面允许了灵活性。党章以毛泽东思想来

贯串，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5]5月14日，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会议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首先说明修改党章的原因，他说，我们的党章，从1928年六次大会修改以后，到现在已有17年了，党的六大通过的党章已有许多部分不能适用，17年革命斗争中所积累起来的极丰富极重要的经验也必须充实到新党章中去，以加强党的建设，动员全党去执行新的政治任务。因此，七大必须制定完全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党章。

随后，刘少奇在党章的总纲中解释了四个问题。第一，关于我们党的性质问题，他指出：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第二，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刘少奇指出，我们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刘少奇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九个方面：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实践，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第三，关于中国革命的特点问题，他指出了目前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但现在具有近一万万人口的解放区则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性质了。中国的这种社会性质，指明了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不平衡性、复杂性等等。第四，关于党的群众路线问题，刘少奇特别强调党的群众路线，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在报告中，刘少奇还论述了党的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党的干部政策、党的基层组织、党员队伍建设、党员的奖励与处分、党的严肃性与灵活性等问题。

《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完整的建党学说，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经验。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刘少奇的报告和新的党章草案，制定了新的党章。与以往的党章相比，新党章在结构和内容上都有新的特点。

首先，《党章》增加了总纲部分，用以规定党的基本纲领，包括在现阶段的任务及最终目标。这方面的内容，以往通常以党的宣言或其他政治文件形式出现。七大的新党章增加了总纲，就使党章的内涵大为扩展和充实，增强了理论性和政治性，从而更具有指导意义。这个党章，在总纲部分之后，



分设 11 章：党员，党的组织机构，党的中央组织，党的省及边区之组织，党的地方、县、市及区之组织，党的基础组织，党的地下组织，党的监察机关，党外组织中的党组，奖励与处分，经费，共计 70 条。

其次，《党章》第一次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个规定，是用党的根本大法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同时，《党章》对毛泽东思想的对立物也作了明晰的表述，提出"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反对任何唯心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反对任何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第三，《党章》第一次特别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并经常注意巩固与扩大这种联系。这就要求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党宗旨贯彻到一切工作中上，反对任何脱离群众的尾巴主义、命令主义、关门主义、官僚主义、军阀主义等错误倾向。

第四，《党章》第一次明确指出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巩固党的团结统一和提高战斗力的组织保证。1927 年 6 月 1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虽已提出"党的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但只是就组织系统及其权力范围作出规定。七大通过的《党章》进一步阐明：中国共产党是按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是以自觉的、一切党员都要履行的纪律联结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于自己的坚强团结、意志统一、行动一致。

第五，《党章》第一次对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作出具体的规定。以往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或修正案，均只有纪律的规定。七大的《党章》对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各规定了四条，既规定党员享有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实施问题之自由的切实的讨论，可以向党的任何机关直至中央提出建议和声明等权利，又规定党员必须严格地遵守党纪，以及了解并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需要等义务。⑤

新党章的制定，巩固了延安整风的伟大成果，进一步加强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从而使全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实现七大所提出的艰巨的任务。

注释：

①②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5页，第604页，第763页。

④《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0~220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六九）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63页。

⑥《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4~370页。



发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号角

1945年5月1日，苏联红军攻入柏林，8日，德国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亚洲战场上，中国人民的长期抗战和美军在太平洋上的反攻，已使日本帝国主义陷入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希特勒德国的垮台，进一步加速了它的末日的到来。但是，日本法西斯统治集团还有相当大的军事实力，当美军进攻冲绳时，遭到日军的负隅顽抗，损失极大。7月，美英两国参谋长拟定并经杜鲁门、丘吉尔共同批准对日作战报告，认为“终止日本有组织的抵抗的日期为1946年11月15日”[①]。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了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对日本予以最后打击，直至停止抵抗，要求日本政府应立即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日本政府对公报发表了“不予理会”的声明，并一再要求苏联能够出面调停，在日本保持相当国际地位的条件下，与美、英“讲和”。苏联遵守《雅尔塔协定》，拒绝了日本的要求。正当苏联预定对日本出兵日期到来之际，美国迫不及待地于1945年8月6日和9日，在日本的广岛、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加速了日本的灭亡。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并宣布参加《波茨坦公告》。次日，苏联红军同时向中国东北的东部、北部和西部边境发动进攻。同日，毛泽东、朱德致电斯大林，对苏联政府的对日宣战，表示热烈的欢迎。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于8月9日在杨家岭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会议着重讨论时局问题。毛泽东阐述了苏联参战后的形势和党的方针、任务。他说：苏联参战，使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我们准备发表一个声明。我们的任务有四项，即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现在同苏联红军配合作战，是痛快的。具体如何配合，还要等战争的展开。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配备干部，发展攻势，准备几十个旅打仗，考虑一个计划。防御的问题在解放区一般地是不存在了，只有局部还有敌人的“扫荡”，因此我们应广泛发展进攻，这与制止内战有关。……我们在第一个时

期的主要方针是取之于日伪，扩大了地方，扩大了力量，然后才有可能在第二时期回过头来对付内战的威胁。这次会议，毛泽东系统地分析了当时的局势，明确了我党的任务，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指导作用。

同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一文。毛泽东指出：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必须放手组织武装工作队，成百队成千队地深入敌后之敌后，组织人民，破击敌人的交通线，配合正规军作战。必须放手发动沦陷区的千百万群众，立即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消灭敌人。解放区的巩固工作仍应注意。今冬明春，应在现有1万万人民和一切新解放区的人民中，普遍地实行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组织人民政权和人民武装，加强民兵工作，加强军队的纪律，坚持各界人民的统一战线，防止浪费人力物力。凡此一切，都是为着加强我军对敌人的进攻。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了，全国人民应该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②]《对日寇的最后一战》进一步向全党指出现阶段党的主要任务，加强了抗日军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

8月10日，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在延安总部发布了大反攻的第一号命令："一、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器。在缴械后，我军当依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之保护。二、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听候编遣，过期即须全部缴出武器。三、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四、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受，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③]

11日，朱德总司令又发布命令。第二号命令："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敌伪投降，我命令：一、原东北军吕正



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四、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第三号命令：“为配合蒙古人民共和国军队进入内蒙及绥、察、热等地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本、‘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敌伪军投降，‘一、贺龙所部由绥远现地向北行动。二、聂荣臻所部由察哈尔、热河现地向北行动’。”第四号命令：“为肃清同蒲路沿线及汾河流域之敌伪军，并准备接受敌伪军投降与进入太原，‘一、所有山西解放军同归贺龙指挥，统一行动。二、在达成任务时，应克服一切困难，击破前进路上一切敌伪之阻碍，如遇抵抗，应坚决消灭之’。”第五号命令：“所有铁路沿线‘及其他解放区一切敌占交通要道两侧之中国解放区抗日军队，统应积极举行进攻，迫使敌伪无条件投降。在执行上项任务时，应克服一切困难，击破前进路上一切敌伪之阻碍，如遇抗拒，应坚决消灭之’。”第六号命令指出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及朝鲜境内作战，华北对日作战的朝鲜义勇队随同八路军及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兵，消灭敌伪。第七号命令：“当我解放区抗日部队进入敌伪侵占之城镇要塞后，我命令各部队司令员负责实施下列紧急军事管制：一、规定管制区域，指定警戒部队，委任卫戍司令，负责实施军事戒严。二、划出安置俘虏及日本居留民区域，实施军事管制。三、登记及逮捕战争罪犯及卖国奸贼。四、控制一切军事性质的机关、仓库、工厂、学校、兵营及要塞，严禁自由出入。五、控制一切轮船、火车、军用汽车、水陆码头及邮政、电话、电报、无线电机关，实施严格军事检查。六、控制一切军用和商用的飞机场及其仓库，派兵驻守，严行保护。七、维持秩序，保护居民，严防反动破坏分子及残留敌探汉奸进行破坏活动。如有发现，应行军事制裁。八、居民中如有抗日武装组织，应令其报告人数武器，归该地区卫戍司令指挥。九、通告居民不得藏匿敌伪分子及散枪武器，一经发现，应予严惩。十、管制粮食、煤炭及水电，严禁奸商囤积操纵。”④这样，10日至11日，延安总部连续发布七道受降和进军的命令，发出对日寇战争到底的号角。

中共中央发出向日本侵略者进军的七道命令后，解放区各大报纸相继发出社论，号召各地军民团结一致，向日寇发起最后一战。其中，8月13日，《解放日报》发表《当前的紧急任务》的社论，进一步分析了时局和我党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时的任务以及我党所具有的有利条件。社论指出：最

近几天，是远东时局发生空前未有的急剧变化的时候。随着苏联对日本的宣战，百万红军以迅雷之势进入东北；不出两天，日寇政府即在不可抗拒的盟军威力前面和完全毁灭的威胁前面，向盟国举手请降。这标志着：远东反日战争的胜利结束即将到来了！八年来艰苦抗战的中国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解放出来，争取独立自由的日子已经降临了！社论总结了时局的一个显著特点："今天中国战场上的大反攻，是在全国性的民主的联合政府还没有成立的情况下进行的。正因为如此，我们解放区军民负担着把很大部分敌人占领区解放出来的责任。正因为如此，我们完成这样的任务时，还会遇到许多阻碍和困难。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解放区军民应该更加放手，更紧张地工作，用一切力量迅速解除敌伪军的武装，占领城镇和交通要道，解放沦陷区广大人民，把他们武装和组织起来，猛烈地扩大解放区，壮大中国人民的力量。我们越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中国人民的光明前途也愈有保证。"社论指出现阶段中国人民面临的形势，即日寇政府已经要求投降盟国；但是日寇的庞大武装还待迅速解除。在我国战场上，58 万敌军和将近 80 万的伪军，还盘踞着广大地区和许多城市交通要道。因此，社论强调在此历史转变的重要关头，中国人民应当清醒地认识当前的严重任务，坚定不移地奔赴自己的解放目标，这就是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迅速解除敌伪军的武装，收复一切敌占城镇交通要道，把沦陷区一万万六千万同胞赶快解救出来。社论还列举了解放区军民将会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士气。"我们有一百万英勇善战的正规解放军八路军新四军为先锋，有数百万民兵作后备，有一万万人民有组织力量为基础，有沦陷区广大人民和地下军的活动为内应，还有我们的同盟国家，特别是在东北作战的苏联红军的互相配合声援。"为了保证完成任务，社论中提出必须要加强行动的统一和集中。社论分析目前解放军向敌占区全面进军，规模的巨大，工作的复杂，都为以前所未有。各兵团之间，各地区之间，党政军民之间，都需要在统一和集中的指导下协调动作。这方面如果做得不够，便会减弱我军进攻的速度，妨碍紧急任务的执行。因此，在前方和后方的同志们，都必须认识统一和集中的重要性，坚决抛弃长期游击战争中养成的若干不统一不集中的习惯。在大规模的集中行动中，必须服从上级的统一指挥，很好地照顾友邻，任何各自为政，闹独立性，只顾局部、忽视全体的倾向，必须加以克服。同时，社论还指出解放区军民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要具备勇于转变的精神。过去长期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所习惯使用的一套办法，已不足以适应



人口集中、交通便利的城市工作和大兵团运动战的新环境，因此，我们必须在实际工作中细心研究转变的途径，掌握新的一套办法，并按照具体情况，坚决地和有步骤地实行转变。[⑤]

中共中央发出对日最后一战的号角后，各解放区军民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周边日伪军发起大规模的攻势，坚决消灭一切敢于抵抗之敌军。

注释：

①［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1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9～1120页。

③④⑤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7～218页，第219～225页，第575～578页。

中国共产党确定日本投降后的任务

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解放区不仅有雄厚的实力，而且具有十分有利的地理位置，沦陷区的大城市、铁路以及海岸，几乎都在解放区的包围中和控制下，而国民党则因一贯消极抗日，避战观战，所处的局面非常不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从其战略利益出发，极力支持蒋介石垄断接受日伪投降的权利，积极调运蒋军抢夺胜利果实，甚至不惜公开利用日军贯彻其扶蒋反共的侵略政策。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说："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因此，我们便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并开进海港，我们便将他们送回日本。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①]在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下，蒋介石积极抢夺胜利果实。1945 年 8 月 11 日，蒋介石连续下达了三个命令：要解放区抗日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要求嫡系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要伪军切实维持地方治安。国民党中宣部发言人还对于延安总部所发出的限令日伪投降的命令，诬为"非法行动"。同时，麦克·阿瑟以远东盟军总司令的名义，对日本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日军下令，只能向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投降。

对于美蒋勾结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发动内战的罪恶活动，中国共产党坚决予以反击。8 月 11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并转发各区党委。《决定》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在此情况下，我党任务分为两阶段：一、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



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为此目的，各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分甲乙丙三等组成团或旅或师，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以便在解决敌伪时保证我军取得胜利。解决敌伪后，主力应迅速集结整训，提高战斗力，准备用于制止内战方面。但各地均应保留必要数量之地方兵团与游击队，放手提拔地方干部带兵，用以保卫地方，民兵枪支必须保留，决不可一切皆集中。在此阶段内，陕甘宁、晋绥、太岳、河南、湖北、皖中、浙西、湘粤等地应有必要兵力防御国民党进攻，其余均用于解决敌伪。二、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一部分地区如江南、豫、鄂、晋、绥等地，第一阶段之时间可能甚短，对此应有充分估计。此外，《决定》中还规定了其他方面的任务：一、迅速加强城市工作，特别加强我党可能夺取与必须夺取的那些城市的工作。派大批有能力的干部到这些城市里去，迅速学会管理城市中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人参加城市工作，解决维持城市秩序。坚决镇压反动派的反抗，但不可轻易杀人。兵力使用与干部使用应有重心，否则将一事无成。二、掌握政策，任何行动不要脱离群众。扩兵是必要的，但决不可超过人民财力负担的限度。收集物资也是必要的，但决不可只顾军队，不顾人民，尤不可损害人民利益。攻破据点，占领城市，应有统一的指挥与严格的纪律。迅速训练干部，迅速加强军队政治工作。三、我军人力资源是民兵，保卫乡村也是民兵，必须迅速扩大民兵组织。四、今冬明春，必须在一万万人民中，放手发动减租（已经减好的照旧），在一切新解放区一律减租，放手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地方政府与提拔地方干部，以便迅速确立我党在基本群众中的基础，迅速巩固一切新解放区。但是绝对不可损害中农利益（中农也是基本群众），富农除封建剥削部分实行减租外，不应加以打击，地主须使之可以过活。没收分配土地是过早的。某些地区已经分配者不再变动，但对地主必须设法救济，对富农必须设法拉拢，对中农受损害者必须补偿损失。这些方面如不注意，将破裂农村统一战线，使我党陷于孤立，有利于国民党。五、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延安对美国与国民党的批评暂时将取和缓态度。但各地对蒋介石绝对不应存任何幻想，必须在人民中揭破其欺骗，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但目前阶段主要注意力应集中于解决敌伪，勇敢、坚决、彻底地夺取最大的胜

利，不可分散注意力。同时，对美国被难人员仍应救护，对美军登陆仍应准备作双方有利的配合，对美国人民及政府中的民主分子必须表示好意。[②]

时隔两日，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这篇讲演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深刻地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并且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毛泽东在讲演之初就讲到：最近几天是远东时局发生极大变动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大势已经定了。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战，已经取得了胜利。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国共两党的关系，是全国人民和全党同志很关心的问题。因此，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毛泽东提出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按照我们的方针，人民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的。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这个内战是他强迫我们打的。此外，毛泽东在讲演中强调自力更生，并明确指出，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以后，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这场斗争非常复杂，具体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中共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尽力争取和平民主，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推迟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另一方面必须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有充分的认识，对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抱幻想，不怕威胁，坚持群众路线，随时准备以爱国的正义革命战争，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③]毛泽东这篇讲演科学地预测了抗战胜利后时局发展的方向，提出了中共适应形势的科学方针。随后，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发出具体指示：16日，向张云逸等发出《关于当前任务和作战方法的指示》；22日，发出《关于改变战略方针的指示》和《关于改变战略方针的指示——目前方针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24日，向饶漱石等发出《关于抗战胜利后的方针的指示》；25日，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等等。

与此同时，新华社于13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评论《蒋介石在挑动内



战》。社论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评论朱德总司令于8月10日在延安总部所发表的限令敌伪投降的命令，是一种唐突和非法的行动，表示质疑与反驳，并严正指出："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抗日军队才有接受敌伪军投降的权利。至于蒋介石，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坐待胜利，实在没有丝毫权利接受敌伪投降"。评论向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民宣布："重庆统帅部，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真正抗日的军队；中国人民要求，中国解放区抗日军队有在朱德总司令指挥之下，直接派遣他的代表参加四大盟国接受日本投降和军事管制日本的权利，并且有参加将来和会的权利。"④此后，《解放日报》亦发表社论，重申中国共产党应有受降的权利。

8月13日和16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给蒋介石发了两个电报，坚决拒绝蒋介石8月11日要解放区抗日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的命令，进一步揭露了蒋介石集团准备内战的阴谋，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制止内战的六项主张。8月15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朱德电令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一切物资设备，不得破坏"。⑤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各分局、各区党委，立即印发朱总司令命令，向敌伪方面散发。同日，朱德总司令致美、英、苏三国政府照会，发出声明和要求：一、中国国民党政府及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时，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广大人民及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如协定及条约中，有涉及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之处，而又未事先取得我们的同意时，我们将保留自己的发言权。二、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在延安总部指挥之下，有权根据波茨顿（波茨坦）宣言条款及同盟国规定之受降办法，接受被我军所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材，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之一切规定。三、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及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应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国的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四、中国解放区及其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应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五、为减少中国的内战危险，请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站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的利益上，立即停止对于中国国民党政府之租借法案的继续执行。如果国民党政府发动反对中国人民的全国规模的内战（此种内战危险，现已极其严重），请勿予国民党政府以援助。⑥

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客观系统地分析了抗战胜利后的国际国内形势，作出美蒋勾结，蓄谋内战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明确了日本投降后我党的任务。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不被美、蒋反动气焰所吓倒的坚定立场，使解放区及其军队迅速扩大，保卫了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为以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充分有利的条件。

注释：

①［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72页。

②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8～230页，第240页。

③④《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3～1134页，第1137～1139页。

⑤《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5～186页。



中国敌后战场的大反攻
取得重大胜利

1945年春夏期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转变，德意法西斯战败投降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处于四面楚歌，孤立无援的境地，日军大本营为坚持所谓“本土决战”，被迫在中国战场采取战略收缩。8月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表示要与日本侵略者抗战到底。这个声明拉开了中国敌后战场全面大反攻的序幕。10日，日本政府向同盟国发出乞降照会，而日军大本营仍命令各地日军坚持继续作战。为歼灭拒降的日军，中共中央于10日指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各区党委，“应立即部署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在日本投降实现时，我军对日军应令其在一定时间内实行投降缴械，缴械后可予以优待。否则应以各种方法迫其投降缴械。对伪军，则应令其立即反正，接受我之委任与改编，并指令防区驻扎，否则应即消灭之。”[①]10日至11日，朱德总司令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了七道命令，令各部队配合苏联红军作战，消灭抗拒的日伪军。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12日，中共中央又指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区党委，确定必须力争占领之交通线及沿线大小城市：“（一）太原（含）以北之同蒲路，（二）归绥（含）以东之平绥路，（三）北宁路，（四）正太路，（五）道清路，（六）白晋路，（七）德石路，（八）郑州以北之平汉路，（九）郑〈州〉以东之陇海路，（十）津浦路，（十一）胶济路（美军如在青岛登陆，将占去其东段），以上应力争占领之。平绥路西端（包头），太原以南之同浦［蒲］二路，郑州以西之陇海路及以

南之平汉路，长江以南各要道及大城市，根本不作占领计划，而置重点于占领广大之乡村，并须积极准备对付蒋介石之进攻。”[②]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各解放区迅速发动大规模反攻。

晋察冀军区部队进逼北平、天津，攻占张家口等城镇，控制交通要道。

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于 8 月 10 日致电晋察冀分局和军区其他领导人，要求全区部队立即向北平（今北京）、天津、保定、石门（今石家庄）、大同、张家口、唐山、秦皇岛、承德、山海关等城市前进，准备接受日伪军投降；冀东军区抽出三个主力团挺进东北，协同苏联军队和东北抗日联军作战，收复东北国土；冀晋军区尽可能抽出两个团向太原逼近，配合晋绥军区部队夺取太原城及其附近地区。据此，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立即作了部署：以冀察军区主力在冀中、冀热辽军区各一部的配合下夺取北平；以冀察军区一部兵力夺取张家口、张北等城镇，配合南下的苏军作战；以冀晋军区部队夺取大同、丰镇、集宁、商都等城镇，并配合晋绥、冀中军区部队夺取太原、石门、保定等城市；以冀中军区主力夺取天津、塘沽等地；以冀热辽军区主力进军东北，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夺取唐山、秦皇岛等地。11 日，晋察冀军区向日军华北方面军发出通牒，令其缴械投降。8 月 12 日，敌后战场大反攻开始。晋察冀军区所属各部队，迅速逼近指定的进攻目标。冀察军区第一、第十一军分区部队及冀中军区第十军分区和冀热辽军区第十四军分区部队一部，由冀察军区统一指挥，从东、西、南三面向北平逼近。8 月 19 日，冀中军区集中第八、第九、第十军分区等部队 13 个团兵力，以天津为主要目标，对北起杨村（今武清）、南至唐官屯一线城镇的伪军发起进攻。与进军平津相呼应，冀察军区部队一部北上接应南下的苏军，一部向张家口市进攻，战至 23 日，占领张家口及万全县城。在此期间，冀晋军区部队占领了行唐、盂县、平山县城，一度攻入石门和阳曲县城，收复了集宁、丰镇等城镇。冀热辽军区以八个多团的兵力分三路向热河、辽宁、吉林等省进军，配合苏军作战。在冀东的部队，攻克唐山外围的古冶、赵各庄等据点。

晋察冀军区各部队作战半月有余，夺取 29 座县城，使河北、山西两省广大地区获得解放。

晋绥军区部队逼近太原，攻入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夺取日伪军占据



的城镇据点。

8 月 12 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我晋冀、平北、冀东三区部队务速分兵北进，迎接外蒙军及红军。"[③]按照中共中央指示，晋绥军区在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李井泉的指挥下，决定分南北两线对太原、归绥及同蒲铁路北段平绥铁路西段日伪军发动进攻。北线反攻由雁门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副司令员许光达指挥，于 8 月中旬先后攻占武川、陶林县城及归绥以东的旗下营、白塔寺车站等据点。南线反攻在吕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指挥下，以太原为中心展开。8 月 15 日至 19 日，南线部队相继收复汾阳附近的协和堡、太原市以北的思西村、皇后园、南寨等外围据点，并一度攻入太原市以南的太原县（今晋源镇），并在冀晋、太行军区部分军队的配合下对太原形成包围之势。为策应攻取太原，其他分区部队攻占奇村、忻口、离石以东的吴城镇和以西的李家垣等据点。至此，晋绥军区部队已逼近归绥、太原两城及平绥、同蒲铁路两侧，日军被迫放弃中小城镇据点。

晋冀鲁豫边区部队向太原、开封、安阳等城市逼近，切断同蒲、陇海、平汉等铁路线。

8 月 10 日，八路军第一百二十九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指示晋冀鲁豫边区各军区，区分作战任务：太行军区、太岳军区主力集结于沁源以北地区，并以太行军区一部相机夺取榆次、太古，保障和协同晋绥军区部队夺取太原；冀鲁豫军区主力相机夺取开封、新乡、归德（今商丘），解除该地区日伪军武装；冀南军区主力相机夺取安阳至元氏沿平汉铁路线城镇，并以一部兵力北上配合晋察冀军区部队相机夺取石家庄。8 月 10 日起，太行军区主力七个团组成的西进部队向山西省以长治为中心的上党地区进攻；第七、第八军分区部队组成道清支队，于 14 日起向道清铁路沿线日伪军发动进攻；太岳军区主力五个团向山西省平遥、介休进攻，进至平遥以南的东泉镇地区；冀鲁豫军区 13 个团组成的中路军，分三个纵队向河南省郑县、开封地区攻击前进，攻占延津、封丘等县城；冀南军区 11 个团及地方武装组成的北路军，主力收复了河北省平乡、鸡泽、广平等县城，继续向济南、徐州逼近。

山东军区部队向济南、青岛、徐州等地进军，切断津浦、胶济、陇海铁路交通。

8月11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召开高级干部联席会议，讨论和部署占领德县、济南、徐州、青岛、连云港及其他交通要道的任务。同日，山东军区司令部发布向城市进军的命令。8月中旬起，五路野战军部队在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指挥下，向敌占城镇和交通要道展开反攻。鲁中军区部队于8月11日至16日，首先攻克磁村等23个据点。19日至25日，攻克临朐、博山，解放益都、莱芜和淄川。27日至31日，解放周村和新泰。滨海军区部队于8月21日解放赣榆、青口，切断陇海铁路东段，逼近海州、连云，控制了日照以南、新浦以北海岸线，并向胶济铁路东段沿线的日伪军进攻，19日解放胶县。胶东军区部队8月17日攻克威海卫和牟平，18日至20日攻占石岛、福山和龙口，21日至23日收复抚远、黄县、莱阳和蓬莱，24日解放烟台，26日攻占流亭机场和即墨，威逼青岛。渤海军区部队8月17日至23日解放寿光、临邑、高苑、桓台、广饶、博兴、昌邑，攻克长山、阳信、吴桥、临淄、辛店、淄河店等车站，29日至31日，攻克惠民、邹平、青城等地。鲁南军区部队于8月18日攻克滋阳以南的官庄车站，19日攻占泗水和曲阜，25日解放台儿庄，从东北方向逼近徐州。

新四军各部队夺取苏、皖、浙地区敌占乡村和县城。

8月12日，中共中央鉴于华中地区敌兵力量较大，遂向华中局发出指示："江南方面立即有计划分路发动进攻，占领吴兴、长兴、宜兴、粟〔溧〕阳、深水、郎溪、广德、金坛、句容、高淳诸城镇及太湖西岸各地及浙西敌区各县各地，并立即在以上各地造成一整片的（包括城镇）统一的广大农村局面……于占领各城镇后即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武装群众，囤积资财，布置内战战场。江北方面，应将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陇海以南，运河两岸，这一整块地区打成一片，占领所有城市，解放所有地区，打定长期巩固根据地的基础。"④遵照中共中央的指令，华中局各军区迅即向本区内敌占城镇进攻。在江北，相继攻克安徽省宿县西南孙疃集、五河东北双沟、襄安、运漕等据点，收复宿迁、泗县、泗阳、定远、来安、嘉山、天长、盱眙和江苏省六合诸县城。在江南，首先攻克郎溪以北东坝、梅渚等据点，8月19日占领长兴、溧水、溧阳、金坛县城，同时攻占宜兴西南和句容东南集镇50余个。豫皖湘赣军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由大悟山东进，



进占了安陆东南的魏家店、晏家河及花园车站，在孝感东北三汉埠伏击并歼灭撤往汉口的日军一部，同时又在确山、黄陂、天门、咸宁等县攻克据点12处。河南军区于8月18日，攻占密县县城，22日夺取登封县城，尔后攻克了偃师东南的回郭镇、大金店等数十个伪军据点。

华南抗日游击队攻歼当地日伪军。

8月11日，中共中央向广东区党委发出《关于创立湘粤边根据地的指示》，指出："应乘目前混乱状态而蒋、余两系军队又忙于进入广、韶等大城市之际，仍以最大主力用极大速度迅向粤北发展，以便与湘粤边两周后可能到达之王震部队取得联系，造成我华南制止内战的主要根据地。"[⑤]8月13日，东江纵队主力一部攻入北栅、太平，歼伪军一部，17日收复宝安县城，攻克常平、西乡、固戍等据点，20日占领厚街、赤岭和深圳等据点，21日至22日，先后攻入博罗、增城县城，并收复长洲岛和大屿山等地。

解放热河、察哈尔省全境，挺进东北，收复大片国土。

8月11日，朱德总司令在第二号命令中令晋察冀军区部队进军热、察，配合南下苏军作战；令晋绥军区、晋察冀军区和山东军区各以一部兵力迅即进军东北，配合苏军解放东北。随即，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各中央局和各军区发出指示，要求派出组建100个团所需要的干部和主力军队陆续进入东北。至12月上旬，到达东北各地的部队约11万人，干部约两万人。大批军队挺进东北后，与东北抗日联军一起在东三省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剿灭日伪军，摧毁伪满政权，为东北的彻底解放奠定了基础。

在八路军新四军进行大反攻的过程中，根据中国政治形势的急剧发展和蒋介石垄断受降权利、抢占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情况，中共中央于8月下旬决定改变人民军队的作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使敌人向大城市及交通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和巩固解放区，准备应付新的局面。从8月9日至9月2日，八路军和新四军共歼灭日伪军5.79万多人，攻克和收复县城139座，据点740多个，[⑥]破坏和切断了平汉、津浦、正太、同蒲、平绥（东段）、北宁等铁路线，使各大解放区基本上连成一片。

注释：

①②④⑤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页，第232页，第236~237页，第226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⑥王桧林：《中国现代史》（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04页。

苏美英三国签订《雅尔塔协定》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走向最后胜利，大国之间关于战后世界安排的意见分歧也日益暴露和尖锐化。由于结束战争和安排战后世界而产生的一系列政治问题需要迅速解决，特别是应该制定盟军在对德战争最后阶段的协同一致的军事行动计划，处置战败的德意志帝国的基本原则，对日作战，实现战后世界国际安全问题的基本原则，客观上愈加迫切地需要苏美英中等主要盟国举行新的最高级会晤。1944 年 8 月 21 日至 10 月 7 日，苏美英、中美英先后举行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同年 9 月中旬举行美英第二次魁北克会议，10 月上旬举行苏英莫斯科会议。这些会议消除了一部分歧见，一定程度上融洽了各国的关系，但是尚存的若干有争议的重大问题仍需要协商解决。为了尽快结束战争，规划战后的世界秩序，1945 年 2 月 4 日至 11 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克里米亚举行了战时第二次会议，称雅尔塔会议，又名克里米亚会议。在雅尔塔会议上，三国讨论了苏联出兵日本的政治条件，并签订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也就是《雅尔塔协定》。

在德黑兰会议上，美国曾试探苏联对日本作战的政治条件。罗斯福暗示斯大林：如果苏联早日对日宣战，美国可以设法为苏联在远东地区谋取一个终年不冻港，甚至中国的大连港有可能成为国际共管的自由港。[①]当时，苏联正在和德国酣战之中，对日作战尚未真正提上日程。1944 年，战局发生变化。苏联红军把德国军队逐出国境，德国崩溃已经在望。太平洋战场上，日本海军主力虽然在珊瑚岛和中途岛两大战役中被击溃，但是陆军的主力犹存。为了缩短打败日本的时间，并减少美国军队的伤亡，罗斯福决意与斯大林尽早达成一项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协议，即使要作出某些政治上的承诺，也在所不惜。事实上，在 1944 年 10 月莫斯科会议上，美国驻苏军事使团团长迪恩将军在罗斯福指示下，询问斯大林：在击溃德国后，多久才能开始对日行动？斯大林作出答复：红军为了在西伯利亚储备发动进攻的足够战备物资，必须在德国战败后三个月，才能对日本作战。但是美国应首先满足两个条件，即美国必须向苏联提供大量战备物资，其中包括一支 150 万大军所需

的两个月的军事物资和20万吨燃油；关于苏联对日宣战的“某些政治方面的问题”应该得到澄清。事隔两个月，罗斯福再次遣人拜会斯大林，摸底斯大林对日出兵的条件。这次斯大林回应：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即库页岛）的南部应归还苏联；希望再次租借包括旅顺港和大连在内的中国辽东半岛的南部及其周围地区；还希望租借大连到哈尔滨，然后向西北到满洲里，向东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条呈丁字形的中东铁路干线；要求必须承认外蒙古的现状。[②]

在雅尔塔会议期间，罗斯福和斯大林曾举行了一次短暂的秘密会谈，会谈内容主要是苏联参加对日本作战的政治条件。罗斯福首先谈到美国为进一步轰炸日本本土，需要苏联在远东地区提供临时基地。斯大林爽快地回答，他不反对美国在苏联的远东城市共青城或尼古拉耶夫斯克设立美国空军轰炸日本的基地，对美国在勘察加半岛上提供基地的要求，暂时不能考虑。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斯大林在这次秘密会谈中提出几项内容：一、归还日本占领的库页岛南部，割让日本的千岛群岛；二、苏联租借中国的大连；三、苏联租借中国东北地区的中东铁路。关于大连和中东铁路两项，罗斯福称还没有来得及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的蒋介石商量，不能一口答应，并向斯大林建议将大连港作为国际委员会管理下的自由港，同时打算要求英国把香港的主权归还中国，并使香港成为国际自由港。在中东铁路问题上，罗斯福提供了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法：一、通过租借，由苏联直接经营管理；二、置于由一个中国人和一个苏联人组成的委员会管理之下。[③]美国的建议使斯大林感觉到可以进一步讨价还价，便向罗斯福施加了压力。罗斯福无奈，解释称这件事如果告诉蒋介石，会闹得满城风雨，言外之意是这项交易是未征得中国同意而进行的。此时，苏联早已不顾忌中国主权，要求将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写成书面文件，然后由美英苏三大国签署。罗斯福求苏联出兵心切，不但答应了这个要求，而且退了一步，同意大连港可以采取自由港的形式。至此，罗斯福与斯大林就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终于达成了初步协议。

两日之后，美苏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协商。苏联答应将中东铁路交给俄中委员会经营，并同意这些条件需要得到蒋介石的认可，但是中国人必须承认外蒙古的现状。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的使用问题，斯大林只同意让大连港成为国际共管的自由港，而旅顺口因将作为苏联海军的远东基地，必须采取苏联租借的形式。美国表示赞同。关于苏联对日本作战的政治条件就这样决定了。次日，苏美英三国共同签署了《关于日本的协定》，内容为：苏美英三

大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以维持；二、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甲，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乙，大连商业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须予恢复。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三、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需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④

《雅尔塔协定》签订后，罗斯福仍然对这个协定保持绝对的机密，直至1945年5月，罗斯福去世大约一个月后，继任总统杜鲁门才将这些协定的条款向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长宋子文宣读一遍。此后，中国政府派宋子文等两次去莫斯科谈判，于1945年8月14日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大连协定之议定书》、《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队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并交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和苏联对中国政府提供援助的照会，缔约双方承诺共同抗日作战，互相支援，不得单独与日本停战媾和；对日作战终止后，两国共同采取措施，以防止日本再事侵略；双方不参加反对另一方的任何集团。⑤中国政府声明，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愿望，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独立，即以其现在的边界为边界；旅顺口海军基地由中苏两国共同使用，大连辟为自由港，港口工事及设备的一半无偿租与苏联，为期30年；中长铁路为中苏两国共有并共同经营，为期30年，苏联则声明给中国提供道义上、军需品及其他物资援助。从中苏谈判过程可见，中国国民党政府基本上接受了《雅尔塔协定》中有关中国的条款。

《雅尔塔协定》确定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时间，协调了同盟国对日作战的军事行动，这对加速击败日本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美国为争取苏联参加太平洋对日作战，以及讨好苏联以保得自身太平，在中国和远东地区划分势力范围，出卖中国的利益，强行把中国的国土分割开来，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是大国沙文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表现。这是绥靖政策的完美体现，又被称作远东慕尼黑阴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苏双方经过1950、1952和1954年三次谈判，先后将大连港、中长铁路和旅顺口海军基

地的有关权益全部归还中国。

在雅尔塔会议上，苏美英三国除了签署《雅尔塔协定》外，还就德国、波兰以及联合国问题进行了商讨。

关于对德国的处置问题。三国对于分割德国，使其无力再次挑起战争，这一点无分歧。但是对于分割方式和削弱程度三国政府的意见不尽相同。罗斯福主张把德国分割成五至七个地区。根据这个设想，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提出了一个分割方案。他把德国分为：东普鲁士的一部分在十月革命前是属于俄国的，现在仍然归还苏联；东普鲁士的其余部分与西里西亚的南部一起割给波兰；历史上属于法国的萨尔地区还给法国；至于德国最重要的工业区——莱茵—鲁尔地区置于国际控制之下；德国领土的其余部分再一分为二，成立南北两个自治国家。这个方案的目的是想削弱德国，换取苏联放弃德国的赔款要求，挫败英国的“均势外交”的企图。方案提出后，苏英两国强烈反对，罗斯福无奈放弃此计划。在会上，丘吉尔建议把德国一分为二，即把普鲁士从德国南部分离出来，同时在德国的南部建立一个以维也纳为首都的日耳曼国家。这个方案有利于英国，自然也就遭到美国和苏联的反对。最后，会议决定关于分割德国的具体方案交给设在伦敦的专门委员会去处理，这一讨论至此暂告一段落。关于分区占领问题，丘吉尔游说罗斯福，请求美国在分给法国占领区问题上给予合作，同时声明法国占领区不影响苏联对德占领区。在丘吉尔的一再坚持下，苏美作了妥协，同意由三国分区占领扩大到四国分区占领。具体割占情况为：苏联占领东部，英国占领西北部，法国占领西部，美国占领西南部。关于德国的赔偿问题，美英同意苏联的部分建议，即赔偿应按战胜国的贡献大小和损失大小两个原则进行分配，赔偿采取转移资本、支付产品和实行强迫劳动三种形式。苏联提议赔偿总额为200亿美元，英美认为数额偏高，最后决定成立三国赔偿委员会进一步协商。[6]

关于波兰问题三国进行了长期而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波兰疆界的划分和波兰政府的组成问题上。罗斯福首先表示，美国公众倾向于接受将“寇松线”作为苏联和波兰之间的边界，同时表示希望苏联政府能在寇松线东侧的城市利沃夫，以及利沃夫附近的油田上作出让步。罗斯福提出此要求后，丘吉尔马上表示赞同。对此，斯大林严重抗议。但是，他建议可将波兰的西部边界从原先商定的奥得河一线再向西推移，直至西尼斯河，以便用大片战败的德国的领土，满足波兰的要求。在第五次全体会议上，莫洛托夫代表苏联政府正式提出了有关波兰问题的提案，其中关于波兰疆界的两项建议是：波兰东部边界应以“寇松线”为界，在若干地区作出对波兰有利

的五至八公里的逸出；波兰西部边境应从波兰的斯德丁向南沿奥得河，再向前沿西尼斯河为界。对此，罗斯福和丘吉尔从各国利益出发都表示反对。经过再次商讨，三国仅就波兰的疆界划分问题达成一项规定：波兰的东部边界以“寇松线”为准，西部疆界的最后确定留待和会解决。⑦波兰的疆界问题勉强解决了。但是，对三国来说，波兰政府组成问题远比疆界问题重要得多。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波兰已经存在两个政权：一个是在英美护翼下的波兰伦敦流亡政府；另一个是得到苏联支持的波兰临时政府。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罗斯福建议：成立一个由波兰各党领袖组成的波兰总统委员会，然后通过这个联合机构，建立波兰统一的全国政府。这一建议得到丘吉尔的支持，却遭到斯大林的拒绝。斯大林在波兰政府的组成问题上寸步不让，迫使美英无奈让步。在此问题上，三国之间未能达成协议。

关于联合国问题。大国同意苏联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决定美、英、法、苏、中五国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规定实质性问题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的原则。此外，会议还讨论了希腊、南斯拉夫、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有关问题。会议还通过了《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和《克里米亚宣言》等文件。

此次会议巩固和维护了三国战时联盟，对协调盟国对德、日作战，加速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程和促进战后和平稳定局面的形成起到重要积极作用，为联合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会议的某些协议未经有关国家同意，具有明显的大国强权政治和绥靖政策的倾向，严重损害了中国等国的主权、利益和领土行政完整。三大国在会议上作出的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被称为雅尔塔体系，对战后世界影响巨大。

注释：

①③⑤方连庆、杨淮生、王玖芳：《现代国际关系史资料选辑》（一九一七——一九四五）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03～304页，第358页，第481页。

②林汉隽、丁利刚：《美、英、苏三国的雅尔塔会议》，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4～56页。

④⑦《国际条约集》（一九四五——一九四七），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8～9页，第6页。

⑥《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05～123页。

苏联红军进军远东

1945年春夏交替之际，欧洲反法西斯战场结束战斗，亚洲战场仍旧处于烽火之中。为了尽快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美苏在雅尔塔会议上已经达成出兵日本的条件。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造成日本10多万人死伤，这使苏联感到，他们面临着来自西方的一种可怕的新式武器的威胁。因此，苏联决定立即出兵远东。这次远东之战，被称为远东战役。

苏联对于出兵远东一事早已作了准备。1945年春，苏军在远东仅驻有35个步兵师、两个步兵旅、七个坦克旅、一个坦克团、七个坦克营和16个筑垒地域，共约70万人。这些兵力基本上是执行防御任务的，其技术装备较差。因此，为了建立打击日本关东军的必要的兵力兵器部署，在战胜法西斯德国后，苏联立即从欧洲抽调大批兵力和装备到远东地区。从1945年5月起直至远东战役开始前，相继到达远东战区的部队有：从东普鲁士调出的第5集团军、从哥尼斯堡调出的第39集团军、从捷克斯洛伐克调出的第53集团军和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以及大量的独立坦克、炮兵、航空兵、工程兵等部队和兵团。[①]在向远东集中兵力期间，沿西伯利亚铁路干线共发送了2 696列列车，其中1 666列运送兵员、1 030列运送武器装备和物资器材，共计13.6万节车皮。此外，各方面军之间和方面军内部进行的铁路运输量也达到了95 205节车皮。其他方式的军事运输量分别为：汽车运输量51.3万吨、海上运输量6.07万吨、内河运输量8.4万吨。

远东战役前，苏联在伯力成立了远东苏军总司令部，对军队实施全面领导。远东苏军总司令为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军事委员希金上将、参谋长伊凡诺夫上将，其下设三个方面军，共有11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一个坦克集团军、三个空军集团军、三个防空集团军、一个骑兵机械化集群和一个战役集群，合计四个坦克和机械化军；两个坦克师；78个步兵、摩托化步兵和骑兵师；27个坦克、机械化、摩托化和步兵旅，计1 577 725人（其中

作战部队 105 8982 人），拥有火炮和迫击炮 26 138 门、火箭炮 1 171 门、坦克和自行火炮 5 556 辆、作战飞机 3 889 架和舰艇 630 艘。[②]

苏联的三个方面军的具体情况为：一、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员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参谋长扎哈罗夫大将）辖第 17 集团军（司令员达尼洛夫中将）、第 36 集团军（司令员卢钦斯基中将）、第 39 集团军（司令员柳德尼科夫上将）、第 53 集团军（司令员马纳加罗夫上将）、近卫坦克第 6 集团军（坦克兵上将克拉夫钦科）、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司令员普利耶夫上将）、空军第 12 集团军（司令员空军元帅胡佳科夫）、外贝加尔防空集团军（司令员炮兵少将罗日科夫），共由 65.4 万人、7 000 门火炮和迫击炮、2 146 辆坦克和自行火炮、1 360 门反坦克炮、583 门火箭炮、601 门高射炮和 1 334 架作战飞机组成，在外贝加尔方向展开，向沈阳、长春实施主要突击，并向张家口和海拉尔实施辅助突击。二、远东第 1 方面军（司令员苏联元帅麦列茨科夫、参谋长克鲁季科夫中将）辖红旗第 1 集团军（司令员别洛鲍罗多夫上将）、第 5 集团军（司令员克雷洛夫上将）、第 25 集团军（司令员契斯季亚科夫上将）、第 35 集团军（司令员扎赫瓦塔耶夫中将）、空军第 9 集团军（司令员空军上将索科洛夫）、滨海防空集团军（司令员炮兵中将格拉西莫夫）、楚古耶夫卡战役集群（司令员扎伊采夫少将），共由 58.6 万人、8 600 门火炮和迫击炮、1 860 辆坦克和自行火炮、1 538 门反坦克炮、516 门火箭炮、504 门高射炮和 1 158 架作战飞机组成，在滨海方向展开，从东部发起进攻，围歼日本关东军第 1 方面军于牡丹江地区，尔后向吉林、长春、哈尔滨方向进击。三、远东第 2 方面军（司令员普尔卡耶夫大将，参谋长谢夫钦科中将）辖红旗第 2 集团军（司令员坦克兵中将捷列欣）、第 15 集团军（司令员马蒙诺夫中将）、第 16 集团军（司令员切列米索夫中将）、独立步兵第五军（军长季雅科诺夫少将）、空军第 10 集团军（司令员空军上将日加列夫）、阿穆尔沿岸防空集团军（司令员炮兵少将波利亚科夫）、勘察加防御区（司令员格涅奇科少将），共由 33.7 万人、4 400 门火炮和迫击炮、1 280 辆坦克和自行火炮、808 门反坦克炮和 1 095 架作战飞机组成，在阿穆尔河方向展开，担任次要突击任务，战役意图是横渡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向哈尔滨、齐齐哈尔方向推进，牵制并寻机歼灭日军独立第 4 集团军。[③]日本方面，在远东战役前夕，日本关东军对满洲在乡军人实施了总动员，编为两个方面军、两个集团军、两个航空集团军和一个内河舰队，共计 97 万人，拥有坦克 600 多辆、火炮和迫击炮 5 000 多门、飞机 650

架。伪满蒙军编为六个步兵师、七个骑兵师、12 个步兵旅和两个骑兵旅，共计 28 万人。[④]

日本关东军总司令为山田乙三大将，总司令部设在新京（长春），作战司令部设在通化，其兵力的具体部署如下：第 1 方面军（司令官喜多诚一大将）辖第 3 集团军（司令官村上启作中将，共四个师）和第 5 集团军（司令官清水规矩中将，共三个师），共计 10 个步兵师和一个步兵旅，部署在牡丹江和延吉地区，负责东部地区的防御；第 3 方面军（司令官后宫淳大将）辖第 30 集团军（司令官矢田一郎中将，共四个师）和第 44 集团军（司令官本乡义夫中将，共三个师和一个坦克旅），共计九个师、两个坦克旅和三个步兵旅，部署在长春和沈阳地区，担负机动作战任务，并兼顾西部防御；独立第 4 集团军（司令官上村干男中将，共三个师和四个步兵旅）占据海拉尔、哈尔滨、黑河三角地带的各筑垒地域，负责北部和西北部的防御；第 17 方面军第 34 集团军（共两个师和一个步兵旅）配置在北朝鲜，充当战略预备队。另外，在南萨哈林和千岛群岛还驻有第 5 方面军，辖第 88 步兵师（驻南萨哈林）、第 91 步兵师（驻占守岛）、第 89 步兵师（驻北方四岛）、第 129 混成旅（驻得抚岛）和独立混成步兵联队（驻松轮岛）。这样，日军就形成了一个以 1/3 兵力为掩护部队（主要防御东部滨海方面）、以 2/3 兵力配置在纵深担当战役机动作战的兵力部署。其战役企图是：立足以纵深前出的强大反突出制止苏军的深远突破；次则坚守长春、沈阳、锦州等地；再次则撤至朝鲜，依托中朝边境山区凭险固守，策应其本土决战。

1945 年 7 月，苏联最高统帅部就制定对日作战计划，强调指出："三个方面军必须密切协同，向长春、沈阳实施强大的向心突击，粉碎关东军，尽速夺取胜利。避免与日本在满洲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⑤]8 月 9 日，苏联红军按照计划，百万雄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凌厉攻势，从各个方面突入中国东北的中苏边界，对日寇关东军发起全线总攻击。0 时 10 分，外贝加尔方面军各先遣支队越过边界，率先发动了进攻。从拂晓开始，第 1 梯队各集团军分 12 路向东挺进。行动迅猛的近卫坦克第 6 集团军每昼夜前进达 150 公里，12 日已纵深前进约 400 公里，越过了大兴安岭，前出至东北平原。但这时油料告罄，装甲大军不得不在鲁北和突泉集结休整两天。得到情报的日军出动了 86 架轰炸机，进行了 12 次集中轰炸，击毁了苏军 15 辆坦克、27 门火炮和 42 辆汽车。直至 13 日～14 日，近卫坦克第 6 集团军才得到了空

运的油料供应，重新恢复了进攻，左翼先头部队攻占洮南，歼灭伪满骑兵第一师，俘敌1 300多人。至此，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圆满完成了战役第一阶段的任务，打开了进军日本关东军心脏地区的大门，并于18日至19日进抵长春和沈阳，从而加快了整个方面军的前进速度，为其他集团军的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进攻的第17集团军和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5天内在沙漠中行进了300多公里，14日，骑兵机械化集群所属部队攻占了多伦，18日至19日进抵张家口、承德附近，彻底切断了关东军与华北日军的联系。第17集团军也于17日攻占了赤峰。此外，第39集团军紧随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相继攻占了乌兰浩特、索伦，进逼长春。而第36集团军则于9日开始以主力强渡额尔古纳河，发起了夺取扎赉诺尔——满洲里筑垒地域的顽强战斗，次日攻克满洲里，17日进抵齐齐哈尔。至此，外贝加尔方面军在中国东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与远东第1和第2方面军一起合围了关东军的主力部队。

远东第1方面军是于9日凌晨1时在大雨滂沱中转入进攻的。8时30分方面军主力投入了战斗，第5集团军第一天就突破了绥芬河筑垒地域，向前推进了23公里。红旗第1集团军则强行穿越无道路的山林地带，于10日开始抢渡穆棱河，并于13日突入牡丹江市区，从而保证了方面军将第5集团军的主力移至吉林和长春方向，以便与第25集团军共同对该地实施快速地向北攻击。至14日日落前，远东第1方面军已向中国东北纵深挺进了120～150公里。到16日，太平洋舰队登陆部队攻占了朝鲜的清津；同日凌晨，红旗第1集团军完全占领牡丹江。次日，远东第1方面军当面之敌已全部被击溃，大批日军开始投降。为了迅速攻占哈尔滨、吉林和平壤等大城市，从18日～24日，远东第1方面军在上述各地实施了空降兵机降。

远东第2方面军分左、中、右路于9日凌晨1时发起进攻，中路主力渡过阿穆尔河后沿松花江向佳木斯方向进攻；左翼强渡乌苏里江，迅速攻克了饶河筑垒地域，14日到达宝清；右翼于8月11日强渡阿穆尔河后，主力向嫩江——齐齐哈尔方向进击，部分兵力则开始攻击北安——哈尔滨方向。8月17日，远东第2方面军攻占佳木斯；18日进入齐齐哈尔；20日开进已被远东第1方面军空降兵控制的哈尔滨。此外，远东第2方面军还与太平洋舰队协同作战，于26日占领了南萨哈林，31日占领了千岛群岛。[⑥]

在远东苏军的猛烈打击下，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广播投降诏书。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部被迫于16日下

午四时向苏军请求停战。18日，又正式下达了关于停战和解除武装的命令。次日15时30分，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和日本驻哈尔滨领事宫川受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的委派，在哈尔滨同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为首的远东苏军最高指挥人员谈判投降事宜。至此，持续了十天之久的远东战役实际已经结束了。虽然苏军在南萨哈林和千岛群岛还继续采取军事行动，但主要是苏联出于夺取这些前日本领地的急切心情，拖延停战并在上述地区拒绝接受停火，以便完成对南萨哈林和千岛群岛的实际占领。

远东战役以苏军的彻底胜利和日本关东军的投降而告终。在整个战役中苏军损失3.2万人、500多辆坦克、600多门火炮和100多架飞机。日本关东军则有83 737人被击毙、60余万人被俘，被苏军缴获的技术装备和物资包括：1 500门火炮、2 200门迫击炮和掷弹筒、600辆坦克、2 000辆汽车、700辆装甲车、1 000辆拖车和拖拉机、1.3万匹战马、1.2万挺机枪和轻机枪、861架飞机（包括“满洲国”的民航机和日本陆军航空士官学校的教练机）以及679栋各类仓库。

苏联出兵远东，是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仗，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一仗彻底埋葬了关东军，给军国主义分子沉重打击，促使日本帝国主义迅速投降，为避免更多的生灵涂炭，早日结束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美苏大国为了各自利益，以牺牲中国主权作为政治条件，进行交易，使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本质暴露无疑。

注释：

①②⑥［苏］弗诺特钦科著，沈军清译：《远东的胜利》，辽宁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39页，第40～41页，第121～209页。

③［苏］亚·米·华西列夫斯基，柯雄译：《毕生的事业》，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53～660页。

④［日］林三郎编著，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日本问题研究室译：《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9～171页。

⑤《军事思想》杂志，1949年第12期，第125～126页。

日本议和破灭 本土决战的战略企图失败

1945年春夏，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日本军队在太平洋战场连吃败仗，海、空力量损失殆尽，使日本的政治和经济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1945年初，日军大本营曾估计：日本能够有组织地进行战争的时间，大概也只能以1945年中期为限。[①]随着日本国力逐渐枯竭，矛盾与危机日益加深，日本政府考虑以议和的形式结束战争。

1944年下半年到1945年初，围绕着战争与和平问题，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以妥协和平为条件结束战争；另一派主张继续战争。早在1944年9月，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制定议和条件，希望争取国民政府停止抗战，借以全力进行对英美的战争。日本急欲与中国国民政府直接会谈，要求南京汪伪政府作为纽带，开辟媾和渠道。但是当时伪政权内部矛盾重重，自顾不暇，无力理会日方要求。日本此次求和计划落空。1945年2月，前首相若槻礼次郎、冈田启介、近卫文麿分别上奏天皇，认为继续进行战争不会对日本有利，战争的败局已定，不如以缔结和约的形式来最大限度地保持国体为好。要谋求和平，就必须寻找居间调停者。在世界战争末期复杂的格局中，日本统治者权衡形势认为请苏联出面斡旋，同美、英和谈，一可防止苏联对日作战；二可利用苏联不愿让美国称霸太平洋的方针，使日本不致彻底失败。1945年4月7日，铃木贯太郎内阁成立，东乡茂德出任外相。东乡起用前首相广田弘毅与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举行会谈。由于苏联在雅尔塔协定中已承诺在对德战争结束后的两个或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又因4月5日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所以苏联对于日本的谋和反应甚为冷淡。5月11、12、14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主要成员集会讨论局势，在对苏政策问题上，会议委托外务省采取外交措施：防止苏联对日战争；争取苏联对日友善；争取苏联进行调停，以实现同英美的媾和。[②]根据

通过的对苏交涉方针，前首相和前驻莫斯科大使广田弘毅奉命探询苏联大使马立克的意见。6月3日和4日两人几次谈话，未取得结果。6月18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在9月份以前，能够实现停战最为理想；7月上旬以前，应将苏联的态度侦察清楚，以便尽快寻求结束战争的途径。

6月22日，美军全部攻占冲绳岛，逼近日本本土。日本天皇亲自召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提出迅速开辟结束战争的途径，希望苏联以“中立国”的身份在日本和西方盟国之间进行调停。7月12日，天皇派遣近卫文麿为特使，携带天皇的亲笔信，赴莫斯科请苏联出面斡旋和平。东乡电示佐藤转告莫洛托夫，若能避免无条件投降，天皇愿意和谈，并要求苏联外长接见由近卫率领的使团。可是苏联外交部表示，莫洛托夫外长将陪同斯大林前往波茨坦出席会议，无暇接见。后来当佐藤把一份由天皇署名的电报递交苏联副外长库兹涅佐夫时，苏联起初加以拒绝，继而表示等波茨坦会议后再行答复。波茨坦会议期间，在讨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时，斯大林明确表示苏联无意充当调停人，最终要向日本宣战。7月26日，美、英、中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

但是由于苏联当时尚未和日本交战，没有参加《波茨坦公告》的签署，日本对苏联还寄予一线希望。日方认为《波茨坦公告》对天皇体制并未涉及，是取默认态度，可以在《波茨坦公告》基础上同苏联谈判。但是这一切为时已晚，8月5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回到莫斯科，佐藤立即求见。8日下午5时，莫洛托夫会见佐藤，当即向他宣读了将于8月9日晨生效的苏联对日宣战书。日本政府遭到致命的一击。至此日方想以苏联为居间人有条件地结束战争的最后一线希望，终于彻底破灭了。

避战求和的方针失败后，为苟延残喘，日本帝国主义采取全面收缩的战略，即退守中朝边境，保住朝鲜，以日本本土为主要战场实行本土决战，“一亿玉碎”。

1944年10月下旬，美日海军在菲律宾莱特湾进行海空大决战。日军大本营决定，在这里投入全部海军力量与美军进行最后决战。在此战役中，日本海军被击沉战舰三艘、航空母舰四艘、巡洋舰六艘、驱逐舰八艘。日本联合舰队主力损失殆尽。自此，日本海军一蹶不振。在这次战役中，日军开始运用“特攻队”战术（由飞行员驾驶一种特别装置的飞机，去攻击或撞击对方的军事目标，最后同归于尽）。1945年3月初至6月，美军相继攻占马尼拉、硫磺岛、冲绳岛。日军在冲绳岛一役损失惨重，战火已逼近日本本

土，日本法西斯已处于败降的前夕。然而，日本政府仍不甘心失败，极力准备在本土实行决战，妄图进行最后挣扎。

1945 年 1 月 20 日，日军大本营制订了《帝国陆海军作战计划大纲》，预定计划在日本本土动员 240 万陆海军部队，组织大量国民义勇队，大规模生产飞机和特攻船舰，并从中国大陆抽调大量兵力和军需品转用于日本本土，以便进行所谓“本土决战”。[③]4 月 13 日，日本政府决定成立国民义勇队。25 日，大本营陆军部向全国颁发了《国民抗战手册》，要求国民要有参加作战的思想准备，还决定把人民群众组成“国民义勇战斗队”，用以协同军队作战。为了进一步加强本土决战准备，6 月 8 日，日本御前会议就下一步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基本大纲作出决定，其方针是“以七生尽忠的信心为力量的源泉，利用地利人和，战斗到底，以此维护国体，保卫皇土，决心达到征战之目的”，其要点是“迅速加强本土战场的备战阵势，将皇军的主要战斗力量集中于此，在其他疆域上的战斗力量的配置，应考虑我国的实力，要点在于进行对主要敌国美国的战争，同时也要考虑北方边境形势的突然变化；力求迎合世界形势转变的时机，灵活有力地推行对外政策，特别要着重对苏对华的政策，以有利于进行战争；在国内，要准备好可以适应举国一致的本土决战，贯彻国民战争的本质的各种体制，其中，以组织国民义勇队为轴心，更加巩固全体国民的团结，日益提高战斗意志，充实国家的物质力量，特别要把国家政策的重点指向确保粮食，以及生产特定的武器；以本大纲为基础的实际措施，按各自分工，具体规划，力求迅速促其实现”。[④]可见，日本政府要将日本人民、日本民族、日本的历史和文化全部作为赌注，来进行这场“决战”。6 月 9 日，日本国会紧急会议通过“战时非常措施法”和“国民自愿服役法”。按照这两项法案，日本政府有权不经国会批准，可采取任何手段和措施继续进行战争。6 月 22 日，日本召开的帝国议会第 78 次会议，通过颁发了“义务兵役法”，规定凡属 15 岁至 60 岁的男子和 17 岁至 40 岁的女子，均须服役。23 日，公布实施“国民义勇战斗队统率令”，明令规定凡属上述限定年龄内的男女国民均为国民义勇战斗队员。据此，日本全国组织起来的“国民义勇战斗队”队员，包括男女老少在内，总人数达到 2 800 万余人。[⑤]与此同时，为了适应本土决战的需要，日军大本营还重新调整了战时组织体制，撤销了原东部、中部和西部军司令部，成立了专门担负本土作战任务的五个方面军司令部和专门负责地区警备任务的五个军管区司令部。另外，日本还进行了三次扩军运动，在日本本土除原有的

和从关东军调回的21个步兵师、两个坦克师外，又新组建了42个步兵师、四个高炮师、七个独立坦克旅、17个独立混成旅。至6月中旬，日本在本土共有步兵53个师、25个旅、两个坦克师、七个坦克团、四个高炮师。陆军航空兵编为三个军，共有特攻机2 100架，其他飞机1 100架。海军仅有驱逐舰19艘、潜艇38艘。至7月底，组成特攻突击队33个、特攻艇2 593只。海军飞机共有5 200架，大部为特攻机。陆海军总兵力最后达370万人。[⑥]

上述资料可见，日本作了多方面的准备，决心进行一场赌国家、民族命运的本土“决战”。然而事实证明，这些都不能扭转其总崩溃的败局。

从日本国内情况来看，日本的战争经济已濒临破产。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乏，它的作战物资几乎取决于进口。从30年代起，日本一直奉行“以战养战”的方针，企图靠掠夺被侵略国的资源财力支撑和发展其战时经济。但由于中国和亚洲其他各国人民的英勇反抗，使得它的掠夺计划始终难以如愿以偿。特别是到了战争后期，盟军占领了南洋诸岛，切断了日本的海上运输线，日军随即失去了原料产地，与此同时，美国潜艇集中攻击日本商船和油船，使其海运能力大大降低。因此，在日本国内，为了维持战争需求，统治者只得极度压缩民用工业，致使整个生产大幅度下降，国民经济扩大再生产的基础面临塌垮的危险。据联合国和盟军总部统计，如果以1937年为100，日本的生产总指数在1944年达到144，那么到1945年就一下跌到57。[⑦]这说明，日本国力已经衰竭，经济即将崩溃。经济的破产，加剧了日本国内的政治危机。在统治集团内部，政府和军部之间矛盾日益尖锐，难以调和。从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政府的六届内阁频繁更替，其中平沼、米内、第三次近卫等内阁，都是短命内阁，任期均在三至八个月，其矛盾的严重性可见一斑。1941年10月18日，日本天皇敕令东条内阁，由东条英机集政府各要职于一身，实行法西斯军事专政，大力推行侵略战争政策。东条内阁虽经多次改组，但最终难逃垮台的命运，于1944年7月18日宣告结束。随后登台的小矶内阁，又因内部矛盾激化而无法解决危机而于1945年4月5日辞职。统治集团的频繁更替和长期且不知何时终止的战争使日本人民反战厌战情绪日益强烈。受战祸深重的广大工农群众，成为反战厌战、罢工游行等各种斗争的主力军。他们明确表示相信战争已经失败，希望早日结束战争，渴望和平。在这种情绪影响下，东京、横滨和神户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示威者高呼“打倒战争”的口

号，高举“脱离德国”的标语，表达渴望结束战争的要求。同时，1944 年末到 1945 年春夏，日本出现粮食危机，当局对人民实行大米限量供给制，人们忍饥挨饿，而法西斯部队还经常横行抢粮，这就更加剧了人民的反军厌战情绪。加之滥发国债，通货膨胀，整个社会陷于混乱。

从反法西斯同盟国角度来看，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美国对日本本土的轰炸以及苏联出兵远东都是对日本的重创。从 1944 年起，中国解放区军民发动局部反攻，牵制了日军兵力，使得大批日军不能调往国内以防守本土。同时，解放区的不断扩大，使得日军攫取赖以生存的各种物资愈来愈困难，使其“以战养战”的计划难以进行下去。从 1944 年 6 月起，美军开始对日本本土战略轰炸，至 1945 年春夏，硫磺岛、冲绳岛作战时，美国对日本本土岛屿实行布雷封锁，下关海峡、名古屋、横滨、东京和盐釜等港口先后被封锁，日本的海上交通陷于停顿。就在日本面临严重危机时，美国于 1945 年 8 月 6 日和 9 日向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把日本逼近绝境。1945 年 8 月 9 日，苏联依照《雅尔塔协定》，出兵中国东北和朝鲜，切断了关东军和日本本土的联系，进一步促使日本投降。在这种内外合力的打击下，日本法西斯策划的所谓“本土决战计划”完全破产。

注释：

①⑤［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商务印书馆，1984 年版，第 732 页，第 1456 页。

②《终战史录》，第 300 页。转引自［苏］C. A. 戈尼昂斯基等编：《外交史》第四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0 年版，第 827 页。

③④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一九三一——一九四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 492 ~ 494 页，第 534 页。

⑥⑦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 年版，第 554 页，第 548 页。

美军轰炸日本本土投下两颗原子弹

1945 年 8 月 6 日和 9 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先后投掷了两颗原子弹。这对加快日本法西斯的彻底覆灭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提前结束，起了重要作用，这也宣告了人类核时代的到来。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德、法、英等国物理学家对放射性物体的活动规律的研究取得重大发现，为原子弹的研制奠定了理论基础。1938 年 12 月，意大利科学家恩里科·费米，在用中子的撞击产生新辐射物质的试验中发现了核裂变的反应，因而获得诺贝尔奖金。1939 年 1 月 25 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实验室用回旋加速器进行了铀裂变的试验，证实了犹太女物理学家莉泽·迈特纳的试验结果：每裂变一个原子可以放出大约二亿电子伏的能量，如能把铀控制利用，其爆炸力在理论上约等于 TNT 炸药的 2 000 万倍。由此可见，从原子核裂变中获得无比巨大能量的实验已获突破，科学家们推测，如果将它变成实用，就有可能制造一种巨大杀伤力的新型炸弹。1939 年 8 月，爱因斯坦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了一封信，阐述了研制原子弹对美国安全的重要性，建议美国政府应迅速采取行动，争取抢在德国之前赶制出第一颗原子弹。1939 年 10 月，罗斯福决定采纳爱因斯坦的建议，支持研究原子弹的工作，并下令成立一个铀顾问委员会。1940 年 6 月，罗斯福在华盛顿卡内基学会主席万尼瓦尔·布什博士的说服下，建立由国防部门、各大学、私营企业代表组成的国防研究委员会，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便在这个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大量拨款，加快了原子弹的研制步伐。1942 年 8 月 11 日，美国政府制订了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并确立了两条原则，即造出能够结束战争的原子弹供给美国军队；赶在德国人之前造出原子弹。1943 年 8 月，在魁北克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达成美英两国合作研制原子弹的协定，并成立美、英、加共同研制原子弹的联合委员会，美英各派遣科学家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程。由于美国联合西欧最优秀的科学家，并充分调动本国庞大的工业和经济资源，因此美国得

以在纳粹德国之前赶制出第一颗原子弹。1945 年 7 月 12 日，一颗试验性原子弹开始最后装配，7 月 16 日 5 时 30 分在新墨西哥州距阿拉莫戈多50 多英里的一片沙漠地带爆炸成功。原子弹的研制成功后，美国开始考虑对日本使用原子弹。

1944 年底，美国政府曾预想，如果在美国第一批原子弹出世之前欧洲战争仍未结束，就准备将它们投到德国去。然而，在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时，德国早已投降，欧洲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但是此时，日本法西斯仍在负隅顽抗，企图作垂死挣扎。美军在硫磺岛和冲绳岛作战中，伤亡惨重，进展艰难。美国陆军部拟定进攻日本本土的作战计划，打算“在 1945 年秋在日本本土的极南部——九州——作水陆两栖的登陆。这将由华尔特·克吕格尔将军统率下的第六军来完成。第一次登陆以后约四个月，将由第八军和第十军接着作第二次大举进攻，随后由欧洲调来的第一军进攻，所有这一切进攻都将在靠近东京的关东地区进行。总之，据估计，这需要到 1946 年的深秋，才能使日本屈膝”。[①]马歇尔将军预测，在日本本土使日本投降，美国将付出 50 万人的代价。因此，对日使用原子弹，以加速日本的崩溃，减少美军伤亡，已成为美国政府及军方多数人的主张。

尽管对日使用原子弹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和军方的共识，但是就是否预先通知日本一事，美国统治集团出现分歧。马歇尔将军和陆军部长史汀生等人认为原子弹的杀伤力巨大，在投掷之前应警告日本，限其在规定的时间内疏散平民。这样不仅显示了美国的人道主义，而且减少了不必要的伤亡，又可排除日后人们的责骂。对此，杜鲁门总统认为言之有理，准备采纳此意见，但为慎重起见，他又召开了论证会。在会上，马歇尔和史汀生的意见遭到大多数人的坚决反对，多数与会者认为向日本提出预先警告会带来诸多弊端。首先，由于原子弹在前期的实验中曾出现多种故障隐患，如果投掷的原子弹出现哑弹，被日方缴获，日本很可能获得原子弹的秘密，并会利用缴获的这颗原子弹制造出自己的核弹回击美国，届时美国的核垄断地位将被打破，苏联会乘机扩张，无人可阻。其次，假如美国发出预先警告，日本便会有所准备，用各种武器在轰炸目标上空布下天罗地网，甚至会与美机同归于尽。那么，可以预测，携带原子弹的美军飞机还未升空就会遭到日本飞机的攻击，在攻击中如果发生核爆炸，则不仅不会伤及日本本土，反而会危及美国的安全。第三，日本法西斯崇尚武力，生性残忍，日方在得到预先警告后，很有可能会把盟军战俘送到重要的目标地区当人质，以此向盟国要挟，进而迫使

美国削弱原子弹的打击破坏效果，甚至放弃以原子弹打击日本计划。以上三点论述有理有据，经过多次讨论，会议最后决定，此次原子弹轰炸由美国军方选择一个能明确的目标进行打击，此目标最好能够显示原子弹的杀伤破坏力，在行动前不预先向日本提出具体目标的警告，以免留下不可预见的后患。

原子弹的投向目标是美国统治集团讨论的又一个焦点问题。为此，杜鲁门总统专门责成美国军方成立“临时委员会”负责此事。临时委员会认为最为理想的目标应具备以下条件：此目标具有完整的军事设施；能有效显示原子弹杀伤破坏效果，并对日本能起到巨大的震撼作用。经过研究，临时委员会将京都列入打击目标之中。对此，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极力反对，他表示京都是日本的文化和宗教圣地，把京都作为原子弹的轰炸目标，将会使日本人永远憎恨美国。史汀生的建议被采纳，京都从名单上被除去，这样，轰炸目标最终确定为四个城市——广岛、小仓、长崎和新潟。这些城市是按作为第一次攻击目标的顺序排出来的，选择的顺序是依照这些城市的军事重要性的大小而定的，但是轰炸时的气候因素也得考虑进去。[②]目标选定之后，统治集团就投掷的时间和第一个目标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广岛是日本的重要军事基地，所以它成为原子弹袭击的首要目标。

1945 年 7 月 28 日，日本正式表示拒绝接受美英中三国共同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宣布准备把战争进行到底。于是，美国政府向陆军战略空军队司令斯波茨将军发出指令：“（一）第 20 航空队，509 混合大队应于 1945 年 8 月 3 日以后，在气候许可目击轰炸的条件下，立即在下列目标之一投掷特种炸弹：广岛、小仓、新潟和长崎。为带领陆军部派遣的军事人员和非军事的科学人员进行观察和记录炸弹的爆炸效力，应另外派飞机随同运载特种炸弹的飞机飞行。观察机应离开炸弹爆炸点数英里距离以外。（二）在本部准备就绪时，即运去投掷于上述目标的额外炸弹。关于上述地区以外的其他轰炸目标，另候命令。（三）一切发布有关对日使用的武器的情报都由美国陆军部长和总统掌握。非经事先特别批准，司令官不得就这个问题发布公报或透露消息。任何新闻报道都将送到陆军部作特别检查。”[③]由于这项命令，第一次利用原子弹来袭击日本军事目标的车轮开始转动了。经过商榷，美军计划首先打击广岛。8 月 6 日凌晨 2 时，在美军提尼安空军机场，一架“伊诺拉·盖伊”B-29 轰炸机已经做好准备，这次任务的执行者是驾驶员蒂贝茨上校、投弹手费雷比少校、军械师帕森斯上尉、电子技术官杰普逊上尉。3

时，美军开始装弹，15 分钟后，飞机装弹完毕。6 时零 5 分，飞机从高空进入日本本土。此时传来广岛上空天气状况良好的天气报告。8 时 38 分，美机在日本上空作水平飞行。十分钟后，杰普逊检查了一下电子导火线，情况正常。9 时零 4 分，蒂贝茨上校驾驶飞机开始朝西飞行。五分钟后，飞机至广岛上空。9 时 15 分，美机对准了广岛一座桥的正中，被命名为“小男孩”的原子弹翻滚着跃出机舱，扑向大地，这是美国向日本投下的第一颗原子弹。45 秒钟后，原子弹在离地 600 米的空中爆炸，广岛上空立刻出现令人眼花炫目的强烈白色闪光，发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一团巨大的黑色蘑菇云慢慢升起。整个广岛顷刻间变成了人间地狱。广岛当时的人口共 34.3 万人，在接近爆炸中心地区的居民大部分被炸死，幸而逃脱性命的也呻吟于烧伤之中。总计有 78 150 人丧生，51 408 人负伤和失踪，4.8 万幢房屋被彻底摧毁，27 178 幢房屋遭受到程度不等的损坏。[④]随后，又有许多人因核辐射而死去。

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后，许多人对于爆炸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不相信，即使日本首相铃木最初也不相信报告说的一枚炸弹就导致了如此巨大的灾难。[⑤]突如其来的原子弹不仅震惊了日本，也惊吓了苏联。斯大林意识到美国人使用原子弹是要给苏联人看的，是为了威胁苏联。[⑥]他认为，美国在苏联出兵日本前使用原子弹，其目的是“避开斯大林提出的条件，其中包括把俄国在 1904 年至 1905 年战争中丢失给日本的领土归还给苏联”。[⑦]这对斯大林和他同一代的人来说，是个关系到伟大民族自尊心的问题。由于苏联考虑到自身在远东的地位已经受到威胁，遂将对日本用兵的日期提前，由原计划的 8 月 11 日提前至 8 月 9 日。这样，8 月 9 日零时，苏联红军进军远东，向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同日，杜鲁门又发出命令，按照原定计划向日本投掷第二颗原子弹，进一步加速日本投降。

凌晨 3 时 49 分，在美军提尼安机场，B-29 轰炸机起飞，向日本小仓飞去，飞机上装载着命名为“胖子”的原子弹，第二次轰炸日本的行动开始执行。B-29 轰炸机飞临小仓上空时，由于阴云蔽天，飞机在上空环绕三周，依然找不到适合的轰炸目标，加以飞机上的汽油有限，不宜继续等待。于是，在上级指示下，驾驶员临时更换目标，飞往长崎。10 时 30 分，飞机经岛原半岛西部桔湾上空飞抵长崎。尽管这里的天气也不佳，但云雾正在慢慢地消散，透过薄薄的云层，长崎的轮廓依稀可见，这给轰炸提供了机会。11 时零 2 分，飞机对准目标，将原子弹投了下去，蘑菇云再次升起，长崎

十万多人遇难。

两颗原子弹相继落地，日本统治集团内部掀起战与和的争论，经过几次御前会议的讨论，裕仁天皇最终决定停战，并于14日晚录制《停战诏书》，15日，《诏书》以广播的形式播出，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美国对日本投掷原子弹所造成的影响应一分为二地看待。一方面，美国对日使用原子弹无疑是加速日本投降的因素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在亚洲战场疯狂侵略，野蛮残酷，造成生灵涂炭。德意法西斯投降后，日本仍然垂死顽抗，坚持所谓的日本本土决战，妄想继续侵略他国。为了尽快结束二战，美国作出原子弹轰炸的决定。原子弹的到来，不容置疑，加速了日本政府作出迅速投降决定的步伐，杜鲁门曾在回忆录中表示："原子弹威力的第二次示威使东京惊慌失措，第二天早晨就传来了日本帝国准备投降的初次表示"。⑧但是另一方面，投掷原子弹这一毁灭性武器，使日本几十万无辜人民群众遭受了巨大的伤亡和灾难，尽管罪在日本军国主义统治者，他们是发动战争，制造灾难的罪魁祸首，但这样的后果却不应由日本人民来承担。同时，原子弹的投入使用也导致了美苏两国在战后进行不断升级的核军备竞赛，亦为冷战时期的核讹诈战略打开了大门。

注释：

①②③⑧［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74年版，第353～354页，第358页，第358～359页，第365页。

④郝明工，杨政：《20世纪大灾难》，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

⑤殷雄，黄雪梅：《世纪回眸——世界原子弹风云录》，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页。

⑥⑦华列兵，聂虹影，聂虹鑫：《斯大林亲历记》，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7页，第263页。

从《波茨坦公告》到《停战诏书》

雅尔塔会议以后，战争形势发展很快。1945 年 5 月 8 日，德军最高统帅部代表在柏林近郊的卡尔斯霍斯特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盟军对德战争已告结束。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盟军已占领硫磺岛和冲绳，并在亚洲大陆各战场发起了反攻，对日本法西斯的作战即将取得最后胜利。苏、美、英三国为了处理德国和解决欧洲及其他一些问题，于 1945 年 7 月 17 日至 8 月 2 日在德国柏林西南的波茨坦举行会议。这是战争期间三国政府首脑举行的第三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斯大林、杜鲁门和丘吉尔以及三国的外长等。会议进行期间正值英国大选，因此丘吉尔半途回国参加大选。由于英国保守党在大选中失败，丘吉尔下台，新任英国工党首相艾德礼偕新外长贝文于 7 月 28 日参加了最后几天会议。会议除继续讨论德国问题、波兰问题及如何处理德国的附属国意大利、芬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问题外，杜鲁门会前还带来一份敦促日本投降的最后通牒草案，准备作为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的联合宣言。7 月 24 日，杜鲁门将草案送给丘吉尔，很快得到丘吉尔的同意。他们一致认为中国应被列为发起的政府之一，于是杜鲁门又将草案内容电告蒋介石，并立即得到蒋介石的赞同。7 月 26 日，中、美、英三国政府联合发表了这份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又称《波茨坦宣言》。

《波茨坦公告》的内容共有 13 条，指明了当时的形势，阐明了中、美、英三国关于日本投降的条件及对日本将采取的措施：一、美国总统、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及英国首相代表余等亿万国民，业经会商，并同意对日本应予以一机会，以结束此次战事。二、美国、英帝国及中国之庞大陆海空部队，业已增强多倍。其由西方调来之军队及空军，即将予日本以最后之打击，彼等之武力受所有联合国之决心之支持及鼓励，对日作战，直至其停止抵抗为止。三、德国无效果及无意识抵抗全世界激起之自由人之力量，所得之结果，彰彰在前，可为日本人民之殷鉴。此种力量当其对付抵抗之纳粹时，不得不将德国人民全体之土地工业及其生活方式摧残殆尽。但现在集中对付日

本之力量则较之更为庞大，不可衡量。吾等之军力，加以吾人之坚决意志为后盾，若予以全部实施，必将使日本军队完全毁灭，无可逃避，而日本之本土亦必终归全部残毁。四、现时业已到来，日本必须决定一途，其将继续受其一意孤行计算错误，使日本帝国已陷于完全毁灭境地之军人之统制，抑或走向理智之路？五、以下为吾人之条件，吾人决不更改，亦无其他另一方式。犹豫迁延，更为吾人所不容许。六、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盖吾人坚持非将负责之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之新秩序势不可能。七、直至如此之新秩序成立时，及直至日本制造战争之力量业已毁灭，有确实可信之证据时，日本领土上经盟国指定之地点，必须占领，俾吾人在此陈述之基本目的得以完成。八、《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九、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十、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严厉制裁。日本政府必须将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所有障碍予以消除，言论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对于基本人权之重视必须建立。十一、日本将被许维持其经济所必需及可以偿付实物赔款之工业，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工业不在其内。为此目的，可准其获得原料，以别于统制原料。日本最后参加国际贸易关系当被准许。十二、上述目的达到及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后，同盟国占领军队当即撤退。十三、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及充分之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①

因为苏联尚未对日宣战，所以苏联当时没有在《波茨坦公告》上签字。但是，苏联代表在波茨坦会议上，重申了在欧洲胜利后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的保证。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才正式加入公告，所以这个公告最后成为四国的共同对日宣言。

日本于7月27日早晨收听到这个公告，东乡外相认为不能拒绝，但应等苏联表明态度后再决定日本的态度。在这天上午召开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和下午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关于是否应在国内发表这个公告，进行激烈争论，最后决定政府不发表任何正式意见，各报对此应降低调子，不予评论或批评。但是在第二天，几家报纸竟发表社论，《每日新闻》用大标题称宣言

是“可笑的事件”，《朝日新闻》则宣布“美国、英国和重庆的联合宣言并不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只能加强我国政府不折不挠地将战争进行到底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心”。于是，军方要求表明政府反对公告的立场。这样，铃木首相在下午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如下谈话：“我认为那份公告不过是《开罗宣言》的翻版。政府认为并无任何主要价值。只有对它置之不理。我们只能为战争进行到底向前迈进。”[②]日本政府的这种态度，导致了盟军对它的沉重打击。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向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苏联红军同时向中国东北的东部、北部和西部边境的日军发动进攻。同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一文，10日，中共中央指示各地方局和各地方军队竭尽所能，向各大小城市，各交通要道进攻。在各方面的压力下，日本政府考虑向盟国乞降。10日，日本驻瑞士公使根据日本政府的训令，请求瑞士向美国作如下通知：“为了遵从始终渴望促进世界和平事业、真正希望立即终止战争的皇帝陛下庄严的命令以便使人类从继续战争的灾难中拯救出来，日本政府在几周以前曾请求当时保持中立关系的苏联政府进行调停以恢复敌对国家间的和平。不幸这种为了和平利益的努力失败了。日本政府依照陛下恢复普遍和平的庄严愿望，希望尽快地结束由战争引起的不堪言状的痛苦，已决定如下：日本政府准备接受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由美国、英国以及中国政府，以及后来由苏联政府签字的在波茨坦发表的联合宣言中所列举的条款，但应取得如下谅解，即上述宣言并不包括任何有损于陛下作为至高统治者之特权的要求。日本政府真诚地盼望这一谅解能得到保证并迫切地希望能很快地获得对上述谅解的明确指示。”[③]在转达上述信件时，日本公使还提出美国政府通过瑞士为媒介，转交其答复。同时，日本还通过瑞典为媒介，向英国政府、苏联政府，以及通过瑞士为媒介向中国政府转达了同样的请求。日本的做法实质上是要在有条件的前提下投降，其条件就是保留天皇制。同日，中国共产党延安总部为日寇投降对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发布了一号命令。次日，延安总部相继发出二号至七号命令，向日寇发起猛烈战事。

11日，美国国务卿代表美、英、苏、中四国交与瑞士关于日本乞降的复文。在复文中，美国就对日本保留天皇至高统治特权的要求一项表明立场：“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须听从于盟国最高司令官，该司令官将采取其认为适当之步骤以实施投降条款。日本

天皇必须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能签字于必需之投降条款，俾《波茨坦宣言》之规定能获实施，且须对日本一切陆海空军当局以及彼等控制下之一切部队（不论其在何处）颁发命令使其停止积极活动，交出武器，此外并须发布盟国最高司令官在实施投降条款时所需之其他命令。日本政府在投降之后，应立即将战俘及被拘平民运至指定地点，俾能速登同盟国之运输船只。按照《波茨坦宣言》，日本政府之最后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愿确定之。同盟国之武装部队将留于日本，直至《波茨坦宣言》所规定之目的达到为止。”[④]日本政府得知此复文后立即召开会议讨论研究，在到会的15人中，有12人表示能够接受，只有阿南等三人仍竭力主张继续进行战争。14日，盟国再次向日本政府通牒，命其立即无条件投降。在此情况下，日本天皇再次召开御前会议。会上，日本天皇向与会者表明，为维持国家，决心投降。同日，日本政府通过瑞士再次照会美、英、苏、中四国，表明投降态度。15日，天皇向全国广播了《停战诏书》：“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以收拾时局，兹告尔等臣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共荣之乐，斯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为朕所拳拳服膺者。前者，帝国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而出此，至如排斥他国主权，侵犯其领土，固非朕之本志。然自交战以来，已阅四载，虽陆海将兵勇敢善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之奉公，各尽所能，而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真未可逆料。如仍继续交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此，则朕将何以保全亿兆之赤子，陈谢于皇祖皇宗之神灵。此朕所以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者也。朕对于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深表遗憾；念及帝国臣民之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者及其遗属，则五脏为之俱裂；至于负战伤、蒙战祸、损失家业者之生计，亦朕所深为轸念者也。今后帝国所受之苦难固非寻常，朕亦深知尔等臣民之衷情，然时运之所趋，朕欲忍其所难忍，堪其所难堪，以为万世开太平。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并常与尔等臣民同在。如情之所激，妄滋事端，或者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因而迷误大道，失信义于世界，此朕所深戒。宜举国一致，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笃守道义，坚定志操，势必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尔等臣民其克体朕

意。”[⑤]至此，日本宣布投降，同日，铃木内阁辞职，17 日，东久迩内阁组成。

中国人民艰苦奋斗，不畏牺牲，坚持了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全国上下一片欢呼，其他饱受日军蹂躏的亚洲各国人民同样以各种方式欢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了防止日本以投降为名，在发布投降广播和盟军登陆这一时间内隐藏战略物资，拖延投降时间，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不久，盟军总部开始以数种已知的日方波长发出通告：命令日本正式指定东京区域的无线电台经常与盟方保持联系，并负责传达盟方所发的通报，且指出复文应证明电台的一切呼号，周率及名称。此外盟国命令日本天皇裕仁限令日军立刻停止开火。[⑥]8 月 31 日，日本陆相下村向日本全国军民发出广播，说明日本各线军队投降手续顺利，并请他们恪遵盟国所加于日本的任何条件。同日，日本外务省声称：“日本目前静待盟国坚决的处理，因我们自知已被征服。”[⑦]

9 月 2 日，日本新任外务相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大本营，在东京湾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投降书。9 月 9 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举行，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日本法西斯将面临正义的审判。

注释：

①《国际条约集》（一九四五——一九四七），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 年版，第 77 ~78 页。

②［美］约翰·托兰著，郭伟强译：《日本帝国的衰亡》下册，新华出版社，1982 年版，第 1008 ~ 1009 页。

③④⑤《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资料选辑》（一九四五——一九四七）出版者不详，1986 年版，第 330 页，第 332 页，第 337 ~ 338 页。

⑥⑦江天：《日本投降经过》，出版地、出版者不详，1995 年版，第 38 页，第 47 页。

人民军队进军沦陷区，收复国土

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与日伪军相勾结，竭力抢夺抗战胜利果实，进攻解放区。面对国民党军加紧向大小城市推进，夺取大小城市的计划难以实现。于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改变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方针，并于 8 月 22 日向各地方党委和各大军区发出《关于改变战略方针的指示——目前方针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指示指出："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组训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望各地按具体情况逐步转变思想与部署。"[①]据此，各大战略区迅速调整部署，以一部兵力继续威胁大城市，主力立即转向夺取小城市和广大乡村，收复国土。

根据中央指令，从 8 月 24 日起，晋察冀军区各部队积极向日伪军占据的中小城镇发起进攻。冀中军区部队从南、北、西三个方向进行攻击。在南线，第六军分区部队于 8 月 28 日攻占深县县城，9 月 1 日占领赵县、宁晋县城，同时还攻占磨头、王家井等火车站，控制德石铁路 70 余公里，10 月，攻克石门外据点，歼灭日伪军 700 余人。在北线，第九、第十军分区部队在攻占霸县后，于 27 日先后夺取水清、容城县城，29 日占领安次县城以及旧州镇、牛驼镇等 20 多处据点。在西线，第七军分区部队至 27 日相继收复博野、安国、蠡县等三座县城，29 日攻克安新县城，并攻占高阳城外围据点。此外，第十、第七军分区部队又攻克固安、高阳县城和据点多处，并肃清了北平东南地区的日伪军。同时，冀察军区一部由张家口沿平绥铁路东进，迫使沙城伪军投降，并攻入宣化城；另一部占领柴沟堡（今怀安县城），解放了满城、涞水、易县等城。冀晋军区部队先后收复了阳高、灵寿

县城，破坏正太铁路和同蒲铁路北段，其地方武装收复完县、行唐、曲阳等城镇。冀热辽军区进军东北的部队，于8月30日在前站、绥中迫使1 000余伪满军投降，尔后在苏军一部的配合下，攻占山海关，毙伤日伪军一部，俘获2 000多人，同时收复临榆县城，为八路军后续部队进军东北奠定基础。与此同时，冀东部队攻占开平，收复秦皇岛，并于9月9日攻击蓟县城，经过三日激战，全歼日伪军4 000余人，22日攻克玉田县城，歼灭日伪军1 850余人。随后冀东部队又攻占香河、宝城、迁安等县城，逼退乐亭、宁河、卢龙等地日伪军，收复冀东广大地区。至10月，晋察冀边区中小城镇的日伪军已基本肃清，解放区连成一片。此次作战中，晋察冀军区部队共歼灭日伪军七万余人，解放热察两省全境、河北省大部和山西、绥远、辽宁省各一部，收复了张家口、承德、秦皇岛、集宁、丰镇、山海关、绥中等70多座城市；全区野战部队发展到21.5万余人，地方部队发展到10.4万余人，基干民兵扩大到90余万人，建立了察哈尔、热河两个省政府及191个县（旗）政府，拥有人口约4 000万，形成了以张家口为中心的晋察冀热辽解放区。②

在晋绥军区，由于国民党军傅作义部已占归绥，阎锡山部已入太原，因此晋绥军区决定以主力夺取绥南、绥东和太（原）汾（阳）公路上的中小城镇及广大农村。为了完成此计划，北线部队独立第二旅相继攻占陶林、武川、清水河、左云县城、和林格尔、凉城等地；第二、第六军分区部队连克神池县城及东寨镇等五处日伪军据点，直逼宁武城下。南线部队第八军分区部队与贺龙、李井泉率领的独立第一旅、第三百五十八旅第八团会合，先后解放文水、柳林县城和大武镇、上芦桥、张子山等据点，全歼离石城内伪军1 000余人，并攻克离石城外的凤山底等高地。在反攻作战中，晋绥军区军民共毙伤俘日伪军两万余人，收复十余座县城，解放大片国土，使晋绥区与晋察冀、晋冀鲁豫区连成一片。

为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组织晋冀鲁豫中央局及晋冀鲁豫军区。晋冀鲁豫中央局以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滕代远、王宏坤、张际春、王从吾、杨秀峰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薄一波为副书记，下辖太岳、太行、冀南、冀鲁豫区委。晋冀鲁豫军区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滕代远任第一副司令员，王宏坤任第二副司令员，薄一波任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任第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王新亭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太岳、太行、冀南、冀鲁

豫军区。[3]26 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决定“太行应即集结主力（太岳集结一部协助）组织夺取白晋路，收复上党全区，采取一切有效手段澈［彻］底消灭伪顽，逼敌投降。二分区协助赵尔六部夺取正太铁路，重点置于祁县、太谷段。七、八两分区继续向道清路进击，消灭伪顽，造成配合冀鲁豫平原主力包围新乡。太岳区应集结主力，宽正面向同蒲路进击，重点置于该路南段，尽速发动民众、民兵，以游击方式包围封锁敌伪大据点，夺取小据点，澈［彻］底破坏同蒲路，控制平陆、垣曲一带黄河渡口，造成迟滞与打击胡宗南北进之有利条件。冀鲁豫平原主力应继续向开封、新乡、汤阴地区进攻，消灭孙殿英、庞炳勋部，逼敌投降，控制黄河铁桥，必要时破坏桥梁保持桥基。以地方游击队民兵配合适当基干兵团，拔除平原根据地内敌伪据点，逼敌向大城市集中或投降”。[4]8 月下旬，太岳军区主力攻占了平遥东南的邢村镇、张兰镇等据点。同蒲铁路南段沿线各军分区部队先后攻占灵石、霍县、赵城、洪洞、翼城、绛县等城的外围据点，有效地阻止了临汾、运城等地日军向北撤退。同时，太行军区第四军分区部队协同八路军游击第二、第三支队攻占济源、垣曲县城。道清支队先后攻占河南省获嘉、武陟、温县，包围了焦作、沁阳地区的日伪军。平汉铁路各军分区部队，在冀南军区一部兵力的配合下，破击了河北省元氏至邯郸段铁路。其余各部队分别攻占山东省长清、清平、临清及河北省隆平、尧山等县城。冀鲁豫军区中路军攻克河北省长垣县城（今属河南）及河南省道口、新镇等据点，并围攻滑县；南路军收复了河南省通许、杞县、民权等县城，迫使伪第四方面军独立师投降。晋冀鲁豫解放区周边的日伪军在遭到连续打击下，迅速收缩兵力，纷纷撤往洛阳、郑县、郾城等地。为了更快的歼灭这些日伪军，冀鲁豫军区中路第一、第二纵队和太行、冀南军区一部兵力，向其展开了一个多月的进攻，先后攻克河南省滑县及河北省内丘、高邑、邢台、汤阴、磁县、邯郸等 19 座县城，控制铁路 50 余公里。为进一步收复道清铁路沿线地区，太行军区道清支队和太岳军区一部兵力在八路军游击第二、第三支队配合下，先后攻克河南省焦作、修武、孟县、沁阳等城，占领道清铁路及黄河北岸大片地区。与此同时，冀南、冀鲁豫军区各一部兵力，为肃清鲁西地区的日伪军，先后攻克齐河、夏津、高唐、曹县、菏泽、宁阳等县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广大群众支援下，共歼灭日伪军十万余人，缴获步枪七万余支、轻重机枪 1 600 多挺，收复县城 80 余座，使太行、太岳与冀南、冀鲁豫边区连成一片。[5]

山东军区应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令，修改了作战计划，调整了反攻部署，决定以主力夺取津浦、胶济、陇海铁路沿线的车站，继续打击拒绝投降的日伪军。9月10日，鲁中、滨海军区部队各一部，对临沂发起攻势，与负隅顽抗的伪军进行激烈争夺，11日攻克临沂城，歼灭伪军2 000余人，使鲁中、鲁南、滨海三个地区连成一片。9月6日至8日，滨海军区第一师占领诸城、日照。9月7日，胶东军区第五师及警备第五旅发起平度战役，毙伤俘伪军5 700余人，拔除了日伪军在胶东腹地的最大据点。渤海军区部队于9月1日至17日相继收复惠民、济阳、齐东、盐山、宁津和无棣。26日，在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配合下，全歼逃至商河的德平、临邑、济阳等县的伪保安队，俘4 500余人。9月8日，鲁南军区第八师全歼峄县城（今属枣庄市）伪军1 500余人，为进攻津浦、陇海铁路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了控制济南以北铁路线，渤海军区部队于10月16日发起平（原）禹（城）战役，先后攻占恩县（今属平原县）及黄河崖、李家庙、米凤龙等据点，攻克平原城、南皮县城及许官屯、桑园车站，控制铁路30余公里。11月1日，济南日伪军万余人重占平原城，并加强平原至济南段铁路的守备。在此情况下，渤海军区部队连续作战，攻克平禹段铁路两侧据点74处和张庄、林庄车站，控制铁路40公里，接着向平原、禹城日伪军发起攻击。12月10日夜攻入禹城，歼灭守城伪军大部，尔后又歼灭从济南驰援禹城的日军300人。31日，禹城日军，渤海军区部队将弃城南逃的日伪军围困，毙俘敌军758人，平禹战役结束。在济南以南铁路线，鲁南军区部队于10月17日至19日向邹县城发起进攻，全歼城内日伪军，迫使邹县车站日军缴械投降。尔后，鲁南军区部队解放滕县等重要城镇，控制铁路线130余公里。至12月底，山东军区部队共歼灭日伪军12万人，解放54个城镇及港口，切断胶济、津浦和陇海铁路线，山东地区基本获得解放。⑥

为歼灭华中地区拒绝投降的日伪军，新四军以苏中、苏北、淮南、淮北连成一片为目标，将作战重点置于江北。第四师兼淮北军区部队于8月24日在津浦铁路以东占领五河县城，逼近蚌埠；24日在津浦铁路以西攻占永城，歼灭伪军1 000余人，还攻占灵璧、萧县县城及宿县东北据点多处，歼灭日伪军4 000余人，迫使伪军4 000余人投降。第二师兼淮南军区部队攻占蚌埠西南部分地区。9月，两军区部队攻克津浦铁路宿县以北、滁县以南九个车站，切断了徐州至宿县和浦口至滁县两段铁路。第七师兼皖江军区部队解放巢县以南地区，攻克淮南铁路沿线部分车站。8月23日，苏中军区

部队攻占宝应县城，俘伪军2 000余人，9月1日攻克兴化县城，全歼伪军5 000余人。同时，苏中军区部队又攻克东台、海门等县城及盐城西北、如皋东北集镇、泰兴县城及海安、安丰等集镇。10月至11月，苏中军区主力会同苏北地方武装发起盐城战役，攻克盐城、全歼伪军两个师，俘其万余人。与之相呼应，苏北军区部队9月发起两淮战役，6日攻克淮阴城，22日攻克淮安城，共歼灭伪军约1.4万人。12月19日，由新四军主力组成的华中野战军，以第七、第八纵队及地方武装共15个团，采取攻城与打援的战略，向高邮、邵伯之敌发动进攻。战至20日晨，第七纵队攻占邵伯等地，切断了日伪军南逃之路，并沿邵伯、丁沟之线构成对扬州、泰州国民党军的防御。在野战军连续进攻下，于26日解放高邮。在高邮战役中，华中野战军共歼灭日军1 000余人，伪军4 000余人，缴获各种炮80余门，轻重机枪200多挺，步枪6 000余支，拔除了残存在华中解放区内的日伪军据点。在江南，第七师兼皖江军区驻皖南部队扫清了芜湖外围据点；苏浙军区部队先后解放了浙江省安吉、安徽省郎溪、广德和江苏省高淳、句容等县城以及江阴、无锡、常熟三角地带内的全部集镇，并在攻占宜兴县城及附近据点时歼灭伪军1 000余人。总体而言，新四军在大反攻中共歼灭日伪军六万余人，迫使伪军7 000余人投降，解放县城30余座，攻克据点400余处，扩大了华中解放区。⑦

华南地区各抗日游击队依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根据华南地区敌我力量对比的形势，决定以分散斗争，积极寻机打击的方针攻击敌人。9月3日，东江纵队一部围攻元朗日军，迫其投降。9月8日，东江纵队另一部在惠东地区收复白芒花和稔山墟，控制平海盐场，10月10日攻占平山。9月20日和26日，活动于海陆丰地区的部队攻克海丰西南的马鬃港及以北的高潭等地。此间，琼崖纵队一度收复儋县、感恩县城，攻克100多个大小据点。

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各抗日游击队等人民武装，在反攻作战中，共歼灭日伪军40余万人，沉重打击了日伪军，收复了大片国土，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注释：

①④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3页，第250～251页。

②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 年版，第 587 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 9 页。

⑤⑥许农合：《解放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中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年版，第 893 页，第 906 ~ 907 页。

⑦李平：《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 3 卷，解放军出版社，2007 年版，第 70 ~ 71 页。

正义的审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意味着日本法西斯彻底失败，世界各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特别是中国人民艰苦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但是，要实现持久的和平，仅仅在战争中打败帝国主义是不够的。残暴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在十几年的侵略战争中犯下了滔天罪行，深受其害的中国人民、亚洲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伤痕累累，几千万亡灵沉冤九泉。同时，法西斯势力的残余尚未铲灭干净，战争的根源并未彻底消除，再次战争的威胁仍然存在。为了伸张正义、惩罚战犯，维护持久的世界和平，必须对法西斯分子犯下的战争罪行进行彻底清算，对罪行严重的法西斯分子给予严惩。为此，中、苏、美、英等战胜国在日本东京组织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一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

德意日法西斯在二战中对世界人类犯下了滔天罪孽，带来了深重灾难，审判发动侵略战争的元凶，是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共同要求。早在1943年10月，美国、英国、中国等反法西斯盟国就在伦敦成立了“盟国战争犯罪委员会”，开始对德、意、日法西斯的战争犯罪活动进行调查、取证，提出了战犯名单，为战后进行国际大审判做了积极的准备工作。同年11月1日，英、美、苏三国发表《莫斯科宣言》，表示要在战后惩治战争罪犯。宣言指出：“凡曾经负责或同意参加上述暴行、屠杀或执行死刑的德国军官、兵士和纳粹党徒将被解回到他们犯下可恶罪行的国家，以便依照这些被解放的国家以及在这些国家中建立起来的自由政府的法律审判惩处。”[①]宣言还指出，对战争主犯，将依据特别程序，依盟国政府的共同决定加以惩处。《莫斯科宣言》虽然主要是针对德意法西斯的，但也同样适用于惩治日本战犯。1943年11月，中、英、美三国又发表《开罗宣言》，宣布三大盟国将为制止并惩罚日本的侵略而战，表明了盟国惩罚日本侵略的决心。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发表《波茨坦公告》，在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同时指出，对于战罪人犯，将处以法律之严厉裁判。[②]这是日本投降前夕盟

国制定的一个重要的对日政策文件，也是设立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重要法律依据之一。1945 年 9 月 2 日，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正式承担了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条款的义务。1945 年 12 月 26 日，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通过决议，征得中国政府同意之后，决定成立“远东委员会”和“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其成员由苏、美、英、中、法、荷、加、澳、新西兰、印度和菲律宾 11 国代表组成，执行管制日本和惩办战犯的领导任务。[3]经有关各国多次协商，最后决定由 11 国代表共同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便审判日本战犯。1946 年 1 月 19 日，驻日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根据盟国最高委员会决定，正式颁布了关于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别宣言》以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宪章》主要规定了远东军事法庭的任务、组成、诉讼程序及其管辖权。根据规定，该法庭有权审理及处罚那些犯有危害和平罪、违反战争公例罪和违背人道罪的远东战争罪犯。1946 年 2 月 18 日，麦克·阿瑟正式任命澳大利亚昆士州最高法院院长韦伯爵士为首席法官，以及分别来自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菲律宾、加拿大、新西兰、印度十国的十名法官；同时任命美国大律师约瑟·基南为首席检察官，以及来自上述诸国的其他 30 名陪席检察官。其中中国法官和检察官分别由梅汝璈和向哲浚出任。每位被告除可有自选或指定辩护律师外，还各配备一名美国义务律师。

关于战犯的等级问题，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区分和确定了战犯的三种犯罪：（甲）破坏和平罪；（乙）战争犯罪；（丙）违反人道罪。[4]与此相适应，日本战犯分为甲、乙、丙三级。其中乙、丙级战犯的审判由有关各国分别在新加坡、马尼拉、关岛、横滨、伯力、南京、上海、沈阳等地进行。东京法庭只负责审判日本甲级战犯。为了使日本战犯归案受审，远东盟军总部从 1945 年 9 月起下令逮捕日本战犯。到 12 月中旬，共指定了 110 名前日本军政领导人为甲级战犯嫌疑。其中除了前首相近卫文麿、前厚生省大臣小泉亲彦、文部省大臣桥田邦彦、前参谋总长杉山元、前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前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等人自杀之外，其余人等均被盟军逮捕拘押。从 1946 年 3 月起，远东国际检察局开始进行被告选定工作，通过对 100 多名甲级战犯嫌疑进行调查和审问，最后确定了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梅津美治郎、松井石根等 28 名被告。这 28 人都是日本法西斯统治集团的成员，而且是首脑人物或高级将领，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其中东条英机等人更是侵略中国的罪魁祸首。东条英机在被捕之际自

杀未遂，终于没有逃脱历史的审判。在各国提供和议论的战犯名单时，最为棘手的问题是，是否将裕仁天皇列入战犯名单。天皇作为当时日本的国家元首，对侵略战争的发动和军国主义的推行有着无可推卸的责任。日本内外都有追究天皇责任的舆论。但是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考虑到当时远东和中国局势发生的巨大变化，特别是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美国即将丢掉中国，这迫使美国不得不重新调整自己的远东战略。于是，美国选择扶植日本，将其视为阻止共产主义东进的堡垒。因此，在日本天皇的责任问题上，麦克·阿瑟极力为天皇开脱，美国政府也密令首席检察官基南不得对裕仁和皇室任何成员起诉。最后天皇和皇室成员未被追究责任。

1946 年 5 月 3 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市谷高地原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大厦礼堂正式开庭。东京法庭的起诉书以美、中、英、苏、澳大利亚、加拿大、法、荷兰、新西兰、印度、菲律宾 11 国为原告，以“破坏和平罪、战争犯罪、违反人道罪”向 28 名被告提起控诉。起诉书详细陈述了自 1928 年 1 月 1 日至 1945 年 9 月 2 日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如何在国内建立法西斯体制、与德意法西斯共谋瓜分世界、发动九一八事变攫取中国东北继而侵略全中国、发动太平洋战争等罪行，以及实施违反国际公法和人道的各种屠杀和犯罪行为，一共 55 条罪状。最先揭露的是日本法西斯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吞中国东北、扶植傀儡政权“满洲国”和残害、奴役东北人民的罪恶事实。远东国际检察局在向东京国际法庭陈述日本战犯的此项罪行时，将押在苏联的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传唤到庭当面作证。溥仪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日本如何炮制“满洲国”，如何利用他这个清代废帝为傀儡侵略和统治东北。与溥仪一同被拘押在苏联的伪满洲国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等三名日本战犯也被传到东京，以证人身份出庭，以亲身参与者的经历证明了日本关东军对伪满洲国的独裁统治及其在“关东军特别大演习”时期阴谋侵略苏联等事实真相。[5]在结束了关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问题的陈述、取证之后，中国检察官向哲浚代表国际检察团开始进行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罪行立证。向哲浚以一系列无可辩驳的事实和例证，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疯狂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和南京大屠杀等野蛮残害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中国将官秦德纯（七七事变时华北驻军二十九军副军长）以亲身经历在法庭上证实了日本发动七七事变的真相。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伍长德、林庭芳等人也出庭作证，对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犯下的惨绝人寰的罪行进行了血泪控诉，使满庭官员和旁听者万分震惊。在东京法庭上，其他相

关各国的检察官也相继进行了立证陈述，历数了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各个阶段上日本战犯的犯罪事实。在庄严的国际法庭上和确凿的证据面前，日本战犯无论如何开脱都是无济于事的，其罪行都是推卸不掉的。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30日开始，至1948年11月12日结束，历时两年半。先后开庭818次，记录4.8万页，出庭作证人达419名，书面作证人779名，受理证据约4 300余种，判决书长达1 213页，规模超过了纽伦堡审判，堪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审判。[⑥]

1948年11月4日至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后隆重开庭，宣读判决书，对25名被告实行判决（两名被告松冈洋右、永野修身在审判期间病死，另一被告大川周明因精神疾病中止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的内容分为三部十章，其主要部分是用来揭露日本在20余年当中计划、准备、发动和执行侵略战争的秘密史实。判决书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对外侵略扩张的全过程进行了全面、系统和深入的论述，以无可辩驳的史实证明了日本侵略者的累累罪行。判决书以最大的篇幅叙述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在国际法的高度上确定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判决书最后宣布了对25名被告的判决结果：判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坂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七人绞刑；判处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骐一郎、星野直树、木户幸一、小矶国昭、南次郎、冈敬纯、大岛浩、佐藤贤了、岛田繁太郎、铃木贞一、贺屋兴宣、白鸟敏夫、梅津美治郎16人无期徒刑；判处东乡茂德有期徒刑20年、重光葵有期徒刑七年。[⑦]此外，盟国在马尼拉、新加坡、仰光、西贡以及伯力等地对乙、丙级战犯也作出判决。据统计，被盟国起诉的日本各类战犯总数为5 423人，被判刑者4 226人，其中被判处死刑者941人。[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至此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宣布闭庭。1948年12月23日凌晨，东条英机等七名日本战犯的绞刑在东京市内巣鸭监狱秘密执行，行刑现场由中、苏、美、英四国代表监刑。七名战犯的尸体随即运往横滨火化，并将其骨灰撒入荒野。

东京审判声势浩大、举世瞩目，令法西斯分子威风扫地，是对日本侵略者的正义制裁，是中国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最终标志，是维护世界和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历史基础，是战后以反法西斯盟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对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罪行的一次总清算。它向世界宣示，任何妄图发动侵略战争，欺凌、奴役别国人民的军国主义者都将受到国际和平力量和国际法律的无情制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是客观的、公

正的，具有极大的国际权威性。它的公平、客观的判决不容挑战，它的国际性权威不容挑战。尽管在东京审判中，由于正处于冷战即将到来之际，美国从其自身国际战略格局考虑，在很多方面偏袒日本战犯，如昭和天皇和一批重要的战争罪犯逃脱了正义的审判，日本进行化学战、“七三一部队”进行大规模人体实验等许多罪行没有予以追究，单方面释放了未审判的 17 名甲级战犯等等。这是东京审判的不彻底的方面，正是这种不彻底性，为日本右翼势力逐渐壮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国际条约集》（一九三四——一九四四），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 年版，第 405 页。

②《国际条约集》（一九四五——一九四七），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 年版，第 78 页。

③《对日和约问题史料》，人民出版社，1951 年版，第 17 页。

④王铁崖，朱荔荪：《战争法文献集》，解放军出版社，1986 年版，第 198 页。

⑤［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满洲国史》（总论），第 902 页。

⑥谢朝晖，罗庆旺：《战后世界重大军事事件始末》（一九四五——一九九〇），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 年版，第 5 页。

⑦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 年版，第 608 ~ 611 页。

⑧［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商务印书馆，1984 年版，第 1015 页。

抗日战争胜利的经验和意义

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大本营，在东京湾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举行的投降签字仪式上签字，正式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中国战区，9月9日在南京举行签字仪式，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陆军大将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了字。至此，日本帝国主义被彻底打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八年浴血抗战胜利结束。

"由于日本投降，我全民族八年来所坚持的神圣的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地结束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了！在全中国与全世界，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对日战争胜利结束，最后扑灭了法西斯的暴政、奴役和侵略，在全人类面前展开了和平发展的前途。"①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胜利，是所有抗日的中国人的胜利。在抗日战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为其在日后的发展和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要以弱小的综合国力战胜处于帝国主义阶段的日本，就必须实行全民族的大团结、大联合，建立起以国共两大军事、政治势力为主的统一战线。而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是阶级基础和性质完全不同的党，特别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以后，无数共产党人遭到杀害。两党处于不共戴天的仇视状态，但在困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以博大胸怀、摒弃前嫌，从国家和民族大局出发，提出与国民党第二次合作。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和努力坚持下，建立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有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参加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才能够取得胜利，这是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结果，也是由于中国的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化敌为友，重新走向合作救国道路的

结果。

其次，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开始了全新的中国革命。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把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长期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曾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中国革命也曾因此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正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出发，通过调查研究，论证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大革命的失败，给了中国共产党人以深刻的教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大小近百次武装起义，开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期间，毛泽东对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与条件及其在革命中的作用，对土地革命路线，对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与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对农村与战争环境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等问题进行了科学阐述，成功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这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1935 年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正确指导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日作战。抗战全面爆发后，在国民党内出现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等论调。在共产党内，也有一些人寄望于国民党正规军的抗战，轻视游击战争。但是，抗战十个月的实践证明“亡国论”、“速胜论”是完全错误的。抗日战争的发展前途究竟如何？一时成了人们关注的问题。1938 年 5 月，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初步总结了全国抗战的经验，批驳了当时盛行的种种错误观点，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方针。此外，毛泽东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积极开辟敌后根据地。实践证明，敌后军民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力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思想在抗日战争中逐渐成熟，坚持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经验之一。

第三，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其指导思想都是自力更生。这是因为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虽然建立了，但是蒋介石政府的抗日并不坚决，并且时刻不忘记削弱和消灭人民的力量，我党绝不可依靠他

们来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另外，在国际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中，当时的主要国家苏、美、英等国虽然不同程度地也援助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但他们都相信国民党超过了相信共产党，尤其英美帝国主义在我国抗日战争时期采取了极端狡猾的反革命两面政策，其目的是使日本和中国两败俱伤，以便坐收渔人之利。我党同样不能依靠他们来打败日本。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依靠中国各族人民自身的力量，经历千辛万苦，战胜无数艰难险阻才取得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毛泽东一贯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己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尤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我们一定要有自己奋斗到底的决心，要信任和依靠本国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否则，无论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取得胜利，胜利了也不可能巩固。

第四，加强军队党的建设，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保证。抗战初期，在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始终坚持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同国民党妄图剥夺我党对军队的领导权、改变我军性质、限制我军发展的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党中央向全党全军明确指示，红军改编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在部队恢复实行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加强和改进政治思想工作。部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指战员，自觉听党的话、跟党走，在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毫不动摇，党的政治路线、军事战略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在人民军队中得到坚决贯彻落实，从而为胜利完成民族解放的神圣使命提供了根本保证。

最后，历史证明落后就要挨打。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的100年间，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列强都侵略和欺凌过中国。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惨无人道，无恶不作，在中国犯下的滔天大罪罄竹难书。这一方面是由于旧中国在政治上衰朽腐败，另一方面是由于旧中国在经济上积贫积弱。因此，无数仁人志士致力于救亡图存，追求中华民族的振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中国各族人民都不希望再次战争，要求重新建设国家，谋求发展，尽快甩掉贫困落后的帽子。这便是蒋介石发动内战始终不得人心的重要原因。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阶段。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对中华民族有重要

意义。

一、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国在战争全局上打败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的胜利。这个胜利扭转了100年来中国同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作战中屡战屡败的局面。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了对中国的一系列侵略战争，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把独立自主的、封建的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半封建的国家。中国人民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了长期英勇不屈的斗争。然而，这些英勇的革命斗争最后都在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的抗战。在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整个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团结一致，同敌人血战到底。最后以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彻底胜利而告结束。这一胜利，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长期斗争及其胜利，大大地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影响和推动了各国特别是被压迫民族的进步。②

二、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抗日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③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全民族利益最坚定的维护者，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力量。在中共中央的正确政策指导下，各地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根据地日益扩大，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在八年抗战中也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过程，正规部队由抗战之初的五万余人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260余万人。从1937年9月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止，人民武装在敌后解放区战场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援和密切配合下，与日伪军共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7万余人，歼灭伪军118.6万余人，缴获各种枪69万余支、各种炮1 800余门，牵制了日本侵华军总兵力的半数以上，成为中国战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要力量。同时，解放国土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1.2亿，解放区遍布19个省区。④在抗日战争这个历史阶段中，中国共产党通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中国革命经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进一步结合，提出了

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理论和政策，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中国共产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朝气蓬勃、团结奋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然而战争也锻炼与教育了人民，促进了人民的觉醒。人民赢得了胜利，也赢得了进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壮大，改变了中国政治力量的对比，极大地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抗日战争的结束，带来的不仅是和平，它既是对于法西斯恶魔的毁灭，也是民主势力在广大范围内的巨大胜利。[5]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世界各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的支援，同时也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有力地支持了世界各国的反法西斯斗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日本法西斯的败亡，远东战争的结束，也就是进行了六年之久的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完成，这是全世界爱好和平势力的胜利，是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与人民团结抗战的胜利。[6]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战场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要战场，一直抗击和牵制着日本大部分陆军和大量的海空军。它开战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歼灭日军最多，民族牺牲最大。抗战八年，中国军民伤亡3 500万人以上，直接财产损失1 000亿美元，间接财产损失达5 000亿美元，中国人民付出了极大的民族牺牲，终于打败了号称“东方第一强国”的日本法西斯。由于中国抗日战争极大地牵制、打击和削弱了日本法西斯的军事力量，打乱了日本的侵略部署，阻止了日本“北进”苏联的企图，有力地支持了苏联的对德作战，使苏联避免了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解除了后顾之忧，才敢于将其主力从远东西调，集中力量打击德国法西斯。中国的抗战还推迟了日本“南进”的步伐，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英美联军和亚洲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促进了第三世界的崛起。战后，朝鲜、越南和东欧各国先后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一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也相继走向独立。据统计，二战前夕，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总人口为14.5亿，总面积为7 800万平方公里，到1959年，人口降到1.6亿，面积缩至2 550万平方公里。此外，战争粉碎性地摧折了法西斯思潮、运动和政权，战后在法西斯国家废墟上开展的非法西斯化和非军国主义化运动，以及这些国家各阶层民众对法西斯专政教训的总结，使这些具有浓厚的封建残余和军国主义思潮

的国家不同程度地走上了和平民主发展的道路。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7]中国人民八年斗争的战绩，将永存史册。

注释：

①《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新华日报》，1945 年 8 月 25 日。

②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年版，第 242 页。

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 1 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年版，第 849 页。

④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 2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 533 页。

⑤《庆祝胜利》，《解放日报》，1945 年 9 月 3 日。

⑥《新时期的路标》，《解放日报》，1945 年 8 月 28 日。

⑦《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474 页。